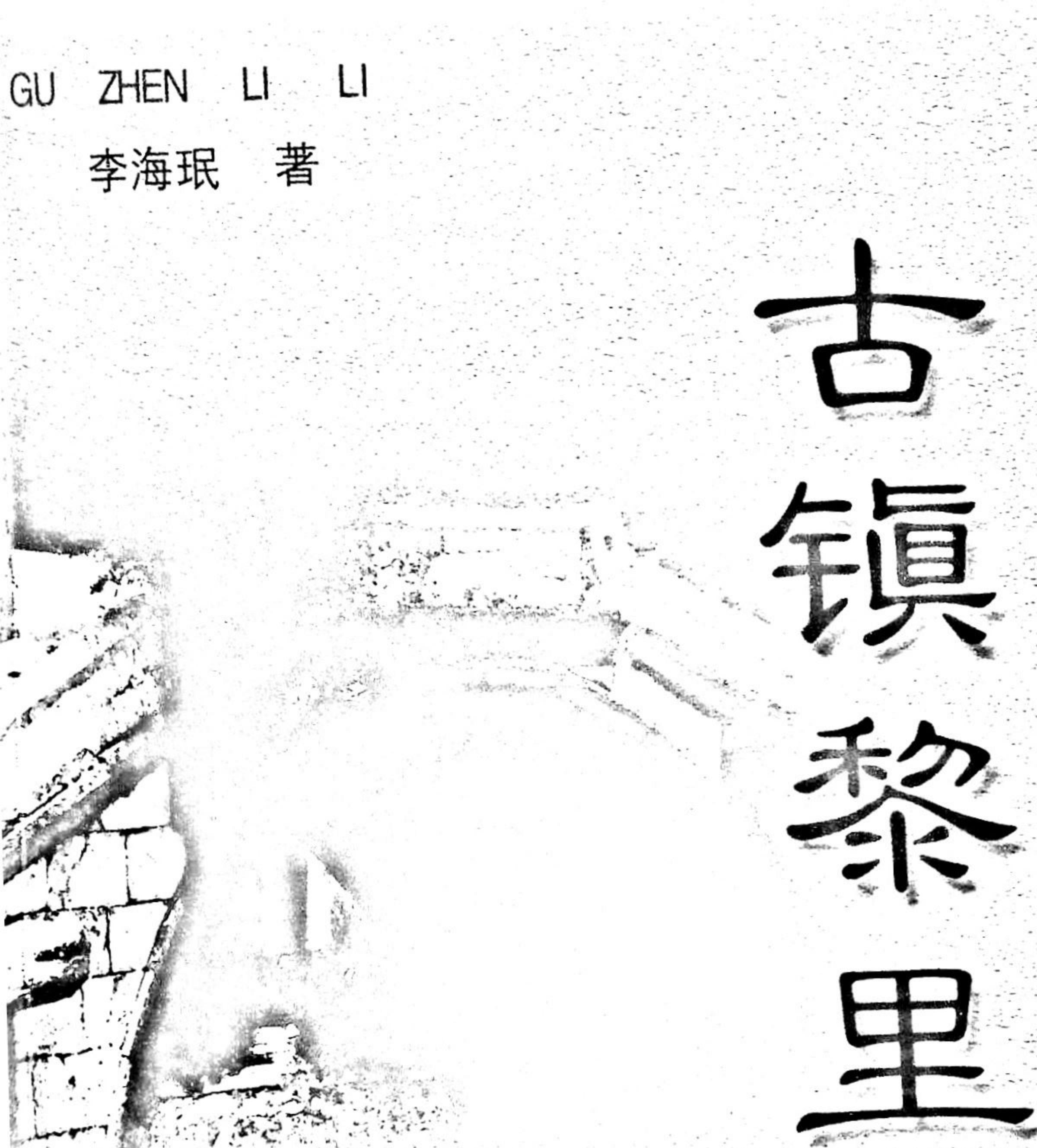
GU ZHEN LI LI

李海珉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海珉，笔名李展、南雁，1947年9月生于吴江黎里。1967年毕业于江苏省新苏师范，最高学历为南京师大中文本科。当了20多年中学教师，1994年因工作需要调入柳亚子纪念馆，后担任馆长兼黎里文保所所长，评为文博副研究员，苏州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主攻南社文史、书画文物和江南古镇研究，也写作各类散文随笔。

中学教书期间，对江南古镇的地理、历史、建筑和人文进行过调查、考察和采风。1982年开始发表文章，出版过《中学修辞指南》（与人合作）、《柳亚子》、《奇珍揽胜》和《水乡足迹 缆船石》等书。

责任编辑　程连升
封面设计　欧阳胡可
版式设计　侠子工作室
责任校对　王洪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镇黎里/李海珉 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4
ISBN 7-5035-2897-5

Ⅰ.古 … Ⅱ.李… Ⅲ.中国-文献 Ⅳ.B.412.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2158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印刷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4印张
字数：450千字　印数1-3000册
定价：35.00元

《古镇黎里》序一

花了整整三个半天的时间，把李海珉先生刚刚脱稿的《古镇黎里》通读一过，一向忙于政务的我，在对古镇的认识方面也算是充了一次电吧。

江南市镇是中国人类发展史上独特的聚居地，是水乡百姓生存体验的悠久历史遗存，包容着江南水乡独到的生活、建筑等等方面的伟大成就。经济的因素使它发展使它繁盛，在特定的地域内形成了完善的网络体系。南宋以前人烟稀少，江南市镇不能形成，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活方式和交通工具发生了巨大变革，人们需要的是商品房和别墅，可以开汽车的通道，新兴的江南市镇那是全新的形态。江南古镇只出现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就时间来说，是南宋至民国的产物，尤其是明清两代的遗存；就空间来看，只存在于苏南、浙北和上海部分地区，北中国没有，南中国也没有，更不必说世界其他地区。

有人说，而今江南古镇已经太多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说法。就目前已知的，保护并开发较为成功的古镇不过周庄、同里、南浔、乌镇、西塘、木渎、甪直等10多个，即使将现在能够加以保护、复原的古镇全部汇总起来也不会超过50个。这些江南古镇从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仅仅沧海一粟，珍贵异常。

江南古镇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无论如何也都无法原汁原味地再现。当前有好多古镇的建设性破坏是非常严重的，须知破坏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应当将眼光放开、放远，留给子孙后代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黎里作为古镇，至今保留着不少宋元建筑的遗存，保留着九万多平方

米的明清民居，自南宋以来，我们黎里产生了特奏名状元1人，进士26名，举人61名，从“周陈李蒯汝陆蔡”八大姓中走出了各种各样各奇各式的人才，还有从那时那地产生而传承的民风民俗。目前黎里有省级重点文保单位1个，市级重点文保单位8个，还有市级文物控制单位18个。即将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柳亚子故居，拥有国家一级藏品5件，二级藏品6件，三级藏品109件。黎里还有其他尚未列入文保单位的建筑多处，柳亚子故居还有尚未列入国家级的藏品600多件，内中不乏价值连城的精品和海内孤品。

黎里是一个九百岁的古镇，江苏省、苏州市都非常看好，2005年苏州成立古镇古村专业委员会，已经将黎里列入重点保护、重点开发的古镇行列。李海珉先生就是专业委员会的成员，他多次说过：“保护古镇，我责无旁贷；开发古镇，我义不容辞。即使吃辛吃苦，也无怨无悔。在保护方面，我一定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原汁原味的明清风貌的古镇，在开发方面，我定当全力配合，奉献自身的力量。”我认识李海珉先生始自他的文章，后来才见到他本人，知道他原先在中学当语文教师，由于他文史博物方面的特长，调到柳亚子故居，出任馆长兼黎里镇文保所长，现在是文博副研究员。热爱再加责任，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反复踏勘了黎里古镇的角角落落，走遍了江南50余个市镇及村落，每到一地，他都要拜访乡贤宿儒，召开座谈会。因此对江南古镇的形成、发展和规模、性质等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他决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有他自己的视角，独特的思考。

目前，我们黎里在保护古镇的基础上，正拟逐步开发。《古镇黎里》一书，内容丰富，调查翔实，更主要在于撰写得非常及时，称得上一项开发古镇、规划部署的基础工程。此书作者正是古镇黎里孕育出来的人才，在保护、开发古镇的时代大潮中，期待他发挥更大的作用。

黎里镇党委书记



《古镇黎里》序二

柳亚子故居的李海珉先生花了多年的心血，写成了《古镇黎里》一书，我匆匆一阅，觉得此书对保护古镇开发黎里大有裨益。

黎里历史上有三本镇志。第一本问世于1805年，徐达源撰写的《黎里志》，第二本是蔡丙圻编著于1897年的《黎里续志》，以上两本镇志都属于私家撰编，第三本《黎里镇志》由黎里镇政府，组织人力编定于1992年。

本书的作者通过多方努力，广泛阅读和查证，实地踏勘和考察，查看黎里八大姓的家谱，采访黎里散居各地的后裔，多次召开乡贤宿儒座谈会，汇集第一手资料，积12年的努力终于汇集成这一本《古镇黎里》。本书不以镇志的面目出现，写法上也与镇志有所不同，不是面面俱到。原先镇志缺失的，就补充；原先错误的，纠正过来；原先镇志语焉不详的，就补充叙写。总之《古镇黎里》可以补三本镇志的不足。

《古镇黎里》的古建篇，最有价值，写法上也富有特色。它探讨了市河、驳岸、缆船石、弄堂、厅堂、廊棚等等的起源、功能、种类和文化。它写的是黎里古镇，又把黎里作为典型，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解剖，了解了黎里，也就基本掌握了江南古镇的成型、发展的脉络。

《古镇黎里》的人物篇，其中写到了黎里八大姓的始祖，还有他们的渊源和曲折，特别是八大姓的兴衰，以唯物史观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黎里八大姓之类的记载，至今阙如，只是在民间流传，这

次本书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调查和记述。

《古镇黎里》的风情篇和杂录篇，较为独特，诸如《名字中的“官”》、《“请”长命锁》、《中秋显宝》和《叫火烛》，还有《俗语数则》和《趣味对联》等等，这是一般镇志上所没有的，一一写来，犹如叙说一个个故事，这些故事全部打上了黎里的印记；还有那些俗语和对联，好就好在同黎里明清两代的地理、建筑、行业、风土人情息息相关，也为一方水土所独有。

最近，我们黎里在保护古镇的前提下，正着手旅游开发。可是，有些人将保护古镇与开发旅游混为一谈，其实保护古镇与开发古镇并不是同一回事，保护黎里古镇这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头等大事，开发旅游使古镇增添活力，那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从长远的眼光看，保护重于开发，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

有人说，保护黎里古镇开发黎里古镇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摸人家屁股了。实在这种认识是非常糊涂的。黎里作为江南古镇，保护是必然的，开发也是必然的。且不必说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呼吁，就是光从黎里当前计。为子孙后代计，保护总比不保护好，开发总比不开发要好，迟开发比晚开发要好。现在保护正是时候，怎么会来不及；现在开发完全来得及。

《古镇黎里》一书的问世，不仅对江南古镇的价值作了充分的肯定，而且也对保护黎里和开发古镇作了重要的铺垫。

黎里镇镇长 



目　录

◇◇《古镇黎里》序一 ..... 徐晓枫

◇◇《古镇黎里》序二 ..... 严伟方

◇◇第一章　概述 1

◇◇第二章　古建篇 16

⊙ 一、驳岸河埠 18

⊙ 二、缆船石 26

⊙ 三、古桥 48

⊙ 四、民居 71

⊙ 五、弄堂 93

⊙ 六、廊棚 103

⊙ 七、厅堂 112

⊙ 八、碑坊 124

◇◇第三章　人物篇 130

⊙ 一、八大姓 133

⊙ 二、特奏名状元魏汝贤 180

⊙ 三、爱国将领张曜 187

⊙ 四、输财办学的倪寿芝 205

⊙ 五、活跃于桑梓的柳亚子 211

⊙ 六、壮怀激烈的蔡寅 240

⊙ 七、中国第一代影星殷明珠 249

⊙ 八、东京审判中的倪徵噢 266



目　录

⊙ 九、女中豪杰张应春..... 286
⊙ 十、农学家倪慰农..... 303
⊙ 十一、红潮碧血毛啸岑..... 308
⊙ 十二、梨村五子..... 315
⊙ 十三、翳桑社..... 325
⊙ 十四、群像侧影..... 331
附录一：杨毕冤案的真相及创作..... 341
附录二：黎里的南社社员..... 352
◇◇第四章　风情篇 355
⊙ 一、抗租暴动..... 358
⊙ 二、中药铺问心堂..... 368
⊙ 三、老茶馆万云台..... 376
⊙ 四、中秋显宝..... 385
⊙ 五、名字中的“官”..... 387
⊙ 六、“请”长命锁..... 389
⊙ 七、叫火烛..... 391
⊙ 八、岁时节令..... 394
◇◇第五章　杂录篇 415
⊙ 一、俗语数则..... 417
⊙ 二、对联趣话..... 432
⊙ 三、地名及传说..... 434
◇◇后　记 440

第一章 概述

黎里的规模。现在，即本书撰写的2006年，黎里镇（2002年北厍归并黎里）的面积计107.47平方公里，人口6.4万（不含外来人员）。黎里镇区，不包括北厍，也不包括农村，面积5.5平方公里。本书重点介绍的是黎里古镇，也就是东起梅兰桥，西至望平桥，南起接桂桥，北至望恩桥，上岸、下岸和横街的宽度，以弄堂的后门为界，面积为0.4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3000左右。这是黎里文保所重点保护的区域，还有需要控制的范围。东自梅兰桥延伸到中立阁旧址，增加约560米的长度，北从望恩桥延伸到褰湖道院，接桂桥南面也有20余米护卫着石驳岸的古河道，那么古镇面积将超过0.6平方公里。

本书介绍的黎里古镇，主要就是上述空间范围。内容包含历史沿革、建筑、人物、文物，还有风土人情和其他杂录，前四方面，不会逸出古镇范畴，后二方面，属于意识形态，本书将涉及黎里的乡脚或其他。

历史发展到现在，经济和人的意识，终于使黎里臻于古镇保护的成熟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黎里开始办厂，一个个作坊式的小型工厂相继问世，浒泾桥南堍沈宅鸳鸯厅有针织厂，浒泾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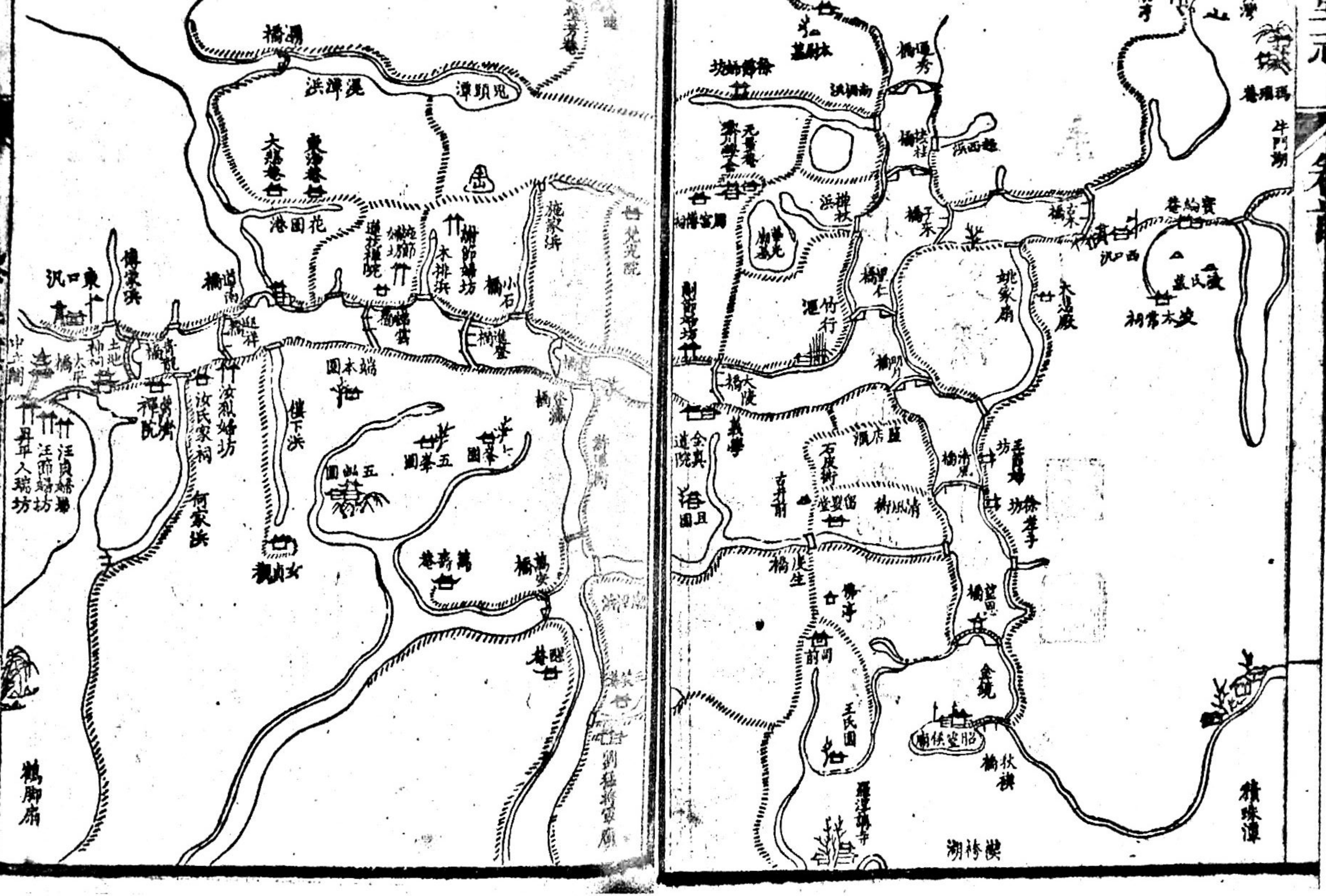
堍有五金厂，填掉的楼下浜办起了远红外元件厂，天主堂一侧有煤矿电器厂，庙泾浜边上有国营瓦厂，还有吴江开关厂、皮鞋厂、滤布厂、粮油食品厂等等，不下20家。各家都利用镇区的一些老式建筑，占据镇区的某些地块搞工业。为拓宽道路，或者为利用面积，填掉了不少浜兜，首先是浒泾、楼下浜，接下来有何家浜、施家浜、藻西浜、木排浜、庙泾浜等等。这些浜兜，是船只停泊的地方，在农船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时代，必不可少。在车辆运输的现代，填掉似乎也是必作之举。汽车运输，古镇的街道、廊棚不能适应需要，于是上岸的廊棚全部拆除，下岸仅仅留存极少部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黎里的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老镇区所有的主干道，拆除沿市河一侧的房屋，街道拓宽成五至七米，变石子街、石板街为水泥路面，又把太平桥和明月桥改建成水泥平桥。不过，仅仅十余年时间，占居老镇区一隅的工厂，终归腾挪不开，处处受制。在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之后，各家工厂相继寻觅新址，建造厂房，以求更大的发展。特别是太浦河北边，厂房连接连地出现，成为新兴的工业区。与此同时，黎里的新镇区也在悄悄兴起。大凡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多数购买了商品房，经济实力较好的家庭，则自建小型别墅，都一一迁居到古镇区的外围。黎里古镇，保护下来，开发利用的条件成熟了。

1988年起，市镇建设进展迅速。拓宽了浒泾路，从黎新桥直通太浦河大桥。在老镇的北面，开辟兴黎路，接着再新辟人民路，东起渔业村，西接浒泾路，全长近三千米。有了这两条东西向的道路，黎里镇大大的发展了。近年来，新镇区继续向北扩大，在浦北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市场，俨然一个新兴的小集镇。

目前，黎里古镇保留下来的明清及民国建筑，多达九万多平方米，那“丁”形的市河，及市河上的古桥，依然一派明清风貌。

黎里的历史。黎里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春秋时期，黎

1805年前黎里镇



湖橋
溪潭浜
兒頭潭
大悲巷
東海巷
花園港
施家浜
東口汎
傅家浜
道南橋
汝烈婦坊
汝氏家祠
何家浜
僕下浜
端本園
五峯園
五山園
萬壽巷
萬安橋
女貞觀
汪貞婦坊
汪節婦坊
昇平入瑞坊
鶴脚扇
牛門湖
寶綸巷
西口汎
姚家扇
竹行
大陵橋
義學
金真道院
且園
古井前
清風街
王氏園
金鏡
昭靈侯廟
秋禊橋
積珠潭

里在长水（今浙江嘉兴）境内。公元前496年，吴越揕李之战发生，战后，黎里的御儿荡作为吴越分界线的一部分。这时，黎里已经有人烟聚居。东晋永熙元年（公元290年），黎里有一位姓施的大户舍地，与法灯和尚建造寺院，取名普同院。宋淳熙元年（1174年），在原有基础上扩建普同院，宋孝宗赐额“罗汉讲寺”，寺名就改名罗汉讲寺，简称罗汉寺。此后，罗汉晓钟成为著名的黎川八景的中一景。在1700多年之前，能够建造颇具规模的一座庙宇，可以想见此地村落的多少及其大小。唐朝时，黎里属于嘉兴范隅乡，仍然是村落。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吴越王钱鏐割吴县南部及嘉兴北境部分，置吴江县，黎里始属吴江县。

江南的古镇，大多数从南宋开始。黎里镇由村到市再发展到镇，也是始自南宋。一般研究者认定，市，就是集市，户籍在100户至1000户之间，多数在三五百户，每户平均5人。镇，1000户以上，多数在三五千户，巨镇可达万户以上。要查阅出黎里人口的历史轨



川八景·罗汉晓钟）

迹，看来没有可能，只能参照其他资料。

在梁仲方编著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洪焕椿编的《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同治《苏州府志》卷12卷13“田赋”和《苏州博物馆学术论文资料选编》(1987年-1988年)的《苏州历代人口密度析》等文献，可以查得苏州府至清的人口变化。

北宋时期，苏州府每平方公里约65人。建炎初，赵构南渡，追随归附的北民多达百万以上，他们散居于浙江北部和苏南地区。，这个时期的苏州府，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5.41人。元代(公元1279-1368年)，也许时间太短，只有89州博物馆学术论文资料选编》(1987年－1988年）的《苏州历代人口密度析》等文献，可以查得苏州府自宋至清的人口变化。

北宋时期，苏州府每平方公里约65人。建炎初，赵构南渡，追随归附的北民多达百万以上，他们散居于浙江北部和苏南地区。这个时期的苏州府，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5.41人。元代(公元1279－1368年)，也许时间太短，只有89年，一直为人所忽略。其实，元代恰恰是人口飞跃增长的阶段。元朝统治者固然歧视汉人和南人，但是元统治者忙于北方的战争，对于江南地区没有足够的力量加以控制，江南一带的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北方的战乱，促使中原地区的汉人不断南移，江南人口得以迅速增长，人口密度直线上升，每平方公里高达368.74人。元末农民战争，江南人口有所减少，洪武四年（1371年）苏州府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297.84人，到洪武26年（1393年）每平方公里达到343.80人，此后一直在300人上下徘徊。清代是人口密度最高的阶段，嘉庆25年（1820年）每平方公里高达1158.52人。

黎里属于苏州府，人口密度不会小于平均数。

一般认为黎里在宋元时是个较大的村落，到明代成弘年间，居民千百家，俨然大镇。

实在黎里在北宋时期是村落，不过决不是一个村落，至少是两个村。一个在西边，范围在南栅浜、明月桥和大陵桥一带，一个在东头，在傅家浜、桥后底和何家浜周围。两个村落相对而言，西边的村落经济、人口和都强一些。南宋时期，许多北民迁徙到黎里定居，使东西两个村落衔接起来，升格为“市”。元代，黎里人口继续增加，三五日一集的市很自然的发展为经常性的市。原本天然的河道加以整理开挖，成为三里有余的一条东西向市河，河埠驳岸等设施也开始修筑。

明代成弘年间（1465 — 1506），黎里居民千百家，成为大镇。清嘉庆年间（1796 — 1820）黎里镇自西向东长三里半，人口稠密，瓦屋鳞次栉比，市场繁荣，舟楫塞港，街道上行人摩肩接踵。这些徐达源编著的《黎里志》上都有明确的记载。

公元1465年，黎里镇至少有一千户人家，人口达到5000以上，这是公认的定论。照此推算，元时黎里应当已经跃升为集市，人口



彭宅宋

在1500至2500，不可能是村落，即使两个村落也不可能，两个村落最多1000人口。以后的百来年，又没有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突然出现千百户人家是不现实的。

据现存种种实物来看，镇西的明月桥和大陵桥，初建无考，前者重建于元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后者大陵桥，重建于明成化13年（公元1477年），此桥初建时使用的建材为武康石，专家认定大陵桥始建年代也是南宋。大陵桥北堍的全真道院，志书明确记载建于南宋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至今道院的棂星门依然存在，那里的石柱明确镌刻着“癸酉至顺闰三月吉日”，癸酉至顺，公元1333年。距全真道院仅50来米的彭家弄内，还有一口宋井。种种历史遗存表明，黎里在南宋时已经由东西两个村落，连接而成为集市，元代人口继续增长，于是明初黎里才顺理成章成为大镇。

明清至民国时期，黎里镇一直属于粮食市镇。明清时期，江南市镇迅猛发展，形成了三大经济板块，一大板块是丝绸专业市镇，以南浔、菱湖、震泽、盛泽等为代表；二大板块是棉业专业市镇，以松江乌泥泾、朱泾、枫泾、南翔、章练塘镇等为代表；三大板块是粮食专业市镇，以枫桥、平望、新市、同里等为代表，黎里镇属于粮食专业市镇。嘉庆年间问世的《黎里志》载：镇之东栅，每日黎明，乡人咸集，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尤多。据资料统计，抗战前夕，黎里有米行17家，粮号7家。抗日战争开始后，黎里没有大量日本驻军，各地逃难者纷纷来黎，人口骤增，米行粮号猛增到56家。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黎里共有大小米行及粮号52家，其中豫康、鼎盛、德盛等20来家，资金雄厚，规模较大。

明清两代，黎里镇，还有其他诸如盛泽、震泽等镇，其人口、经济和文化都超过了吴江县城。因为县城属于政治，市镇属于经济，县城由朝廷王权控制，市镇由经济杠杆决定。“镇”的概念由来已久，只是含意随着历史的更替而有所不同。古代在边关险要处设“镇”，



南宋赵磻老

以驻兵防守。《新唐书·兵志》:“唐初,兵之戍守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宋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罢镇使、镇将,将他们的权力归于知县。南宋开始原本属于军事性质的镇就转变成经济性质的了,这个概念一直沿袭到今天。江南的镇往往是位于水道交通汇集之地,一个镇担负着周围乡镇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供销任务。当然镇也有行政管理机构,相当于现代的镇政府,执行赋税和纳租,负责一方安全,解决民事纠纷,但它形成及担负的任务,主要是经济的。镇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自发形成的社会空间,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南宋以后,黎里涌入了大量的北方人口,原先只种稻子,进而变为稻麦两熟。明清时期,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逐步发展,处于粮食经济板块的黎里镇不仅在人口、经济方面超过县城,而且在涌现的人才方面也超过了县城。

黎里的人物。古镇黎里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人才辈出。清代乾嘉年间,确定了“周、陈、李、蒯、汝、陆、徐、蔡”八大家,从中走出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才,数以百计,为家乡更为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历史上出过特奏名状元1人,进士26人,举人61人,贡生43名,秀才无数。

南宋时有赵磻老、魏宪和魏志。黎里具备准确文字记载的历史,

始于南宋，至今留存的历史遗迹最早年代也是南宋。赵磻老，赵匡胤的后裔，他与宋高宗赵构同辈。赵磻老不愿出仕，隐居于黎里的花园浜，手中虽然没有权力，但受到黎里一带百姓的爱戴和称颂。赵磻老能诗词，《全宋词》中录有赵磻老的18阕词。赵磻老身故后，黎里百姓纪念他，专门建造了东圣堂，把他作为圣人顶礼膜拜。现在黎里平楼街的东圣堂是经过明清两代多次翻建而留存下来的。魏宪和弟弟魏志，分别于北宋绍圣丁丑与元祐辛未考中进士，魏志的儿子魏贲于政和丁酉科也登进士第。接着国事动乱，赵宋南渡，魏氏没有人再考得进士，直到魏志的第四队魏汝贤，成为特奏名状元。

元时，战事频仍，世乱如麻，江南一带经常有强盗出没。富有胆识的汝尚质虽一介平民，却组织起了黎里一支自卫队，多次击退群盗，确保黎里安定，又不违农时耕种田地，竟使黎里成为近悦远来的宝地。自汝尚质之后，汝姓中出了4名进士，5名举人，8名贡生，具备

徐达源《黎里志》



一技之长者更多。

明代有太常寺少卿凌信，出使安南凭外交安抚了安南国王。清代有位居工部尚书的周元理，浙江布政使蒯士芗，抗击沙俄屡立战功而晋升兵部尚书出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徐达源、吴珊珊夫妇以诗文著称，徐达源编撰了第一部《黎里志》，蔡丙圻编撰了《黎里续志》，1903年，倪寿芝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学校，开一代学风。辛亥革命后，涌现的名人更多，袁世凯复辟时宣布吴江独立讨袁的殷佩六、爱国诗人柳亚子、女革命家张应春等。还有南社、新南社的人物30来人，较为著名的有：蔡寅、毛啸岑、朱剑芒等。名医金一新、朱莲舫、金诵盘。当代著名人物有，第一代影星殷明珠、国际大法官倪正旸、水利专家汝贤、植保专家倪慰农、翻译家出版家蒯斯曛、世界著名教育家柳无忌、竹刻专家徐孝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汝信等等。

黎里的文物。历史上黎里的名胜古迹众多，据《吴江县志》、《黎里志》、《黎里续志》记载，有关黎里文物古迹的条目共计258处。方志上记载有“黎川八景”：玛瑙春游，禊湖秋月，罗汉晓钟，中立晚眺，鸭栏帆影，鹤渚渔歌，江村夕照，揽桥残雪。目前八景中完好的是禊湖秋月，残存的有三处。

古镇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计有27处，其中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市级文物保护和控制单位26处。(列表如下页)

黎里可移动的文物很多。

最近文物调查，发现了一座石雕牌坊和三口古井。牌坊建于清代，是吴江的一个知县为表彰汝氏的一名烈女而建。三口古井，年代最为久远的是彭宅内的那口宋井，接下来就是洛雅草堂宅内的元井，再就是进士第的清代古井，井圈上刻有“凝华”字样。

黎里文保所珍藏着各类碑刻共30余块，苏州府严禁抗租碑、乾隆御笔梅花碑、著名画家张问陶和著名书法家刘墉祝寿图碑、乾隆御赐周元理诗碑、灵鹫读书图碑、书院改筑记碑、禊湖书院碑记、董

黎里古镇各级文物保护和控制单位：

序号	名称	级别	年代	地理位置
1	柳亚子故居	省保	清至民国	黎里镇中心街
2	端本园	市保	清	黎里镇大观弄
3	黎里镇大观弄	市保	明清	黎里镇鸿寿弄
4	周宫傅祠堂	市保	清	黎里镇庙家桥弄
5	徐达源故居	市保	清	黎里镇徐家桥弄
6	东圣堂	市保	清	黎里镇平楼街
7	退一步处	市保	清	黎里镇新蒯家弄
8	南社通讯旧址	市保	清	黎里镇浒泾街
9	市河驳岸古桥河埠头缆船石	市保	明清和民国	黎里镇
10	全真道院石柱	市控	元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	黎里镇梨花街
11	李厅	市控	清康熙年间	黎里镇浒泾街
12	秋禊桥	市控	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	黎里镇
13	邱宅德芬堂、敬承堂	市控	清雍正年间	黎里镇中心街
14	汝氏砖雕门楼	市控	清乾隆年间	黎里镇平楼街
15	中徐宅砖刻门楼	市控	清道光年间	黎里镇浒泾街
16	王宅	市控	清道光年间	黎里镇中心街
17	闻诗堂	市控	清道光年间	黎里镇梨花街
18	禊湖道院	市控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	黎里镇西
19	王三房砖刻门楼	市控	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	黎里镇中心街
20	进士第	市控	明基清建	黎里镇平楼街
21	沈宅鸳鸯厅	市控	清末	黎里镇南新街
22	新蒯宅	市控	清末	黎里镇浒泾街
23	东蔡宅	市控	清末	黎里镇东亭街
24	德心堂	市控	清末民初	黎里镇中心街
25	彭宅	市控	清及民国年间	黎里镇梨花街
26	万隆桥	市控	民国二十四年	黎里镇黎泾村
27	中共淞沪地委吴江秘密联络点	市控	民国	黎里镇梨花街

其昌临摹颜真卿《赠裴将军》诗书法碑条石等，不乏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柳亚子纪念馆收藏有国家一至三级文物藏品120件，其中国家一级藏品5件，国家二级藏品6件，三级藏品109件，还有待定藏品152件，宋教仁的行书对联为海内孤品，何香凝等国手所作的丹青都是国家级文物。其他书画文物藏品更多，超过五六百件，一些南社著名书法名家，比如白蕉、沈尹默、潘伯鹰的手迹，都是珍品。柳亚子纪念馆保藏的白蕉手迹20件，面目众多，件件精品，堪称独领风骚。此外，还有数十件紫檀、红木、黄花梨等明清时代的家俱，一件明式黄花梨的供台，长385厘米，宽72厘米，国内少见。

黎里自古民风淳厚，多数人家崇尚读书，入夜书声琅琅，不绝于耳。梨花街有条弄堂叫“闻诗堂弄”，那第三进大厅名“闻诗堂”。据记载，清道光年间，有殷寿彭、殷寿臻兄弟俩在此用功勤读。以后殷氏兄弟双双得中进士，兄长寿彭于道光20年高中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紧随状元、榜眼和探花之后，实际是进士的第4名。吴江科举考试，没有正而八经列名三鼎甲的士子，这传胪是最高名次了。为了纪念殷氏兄弟，为了不忘兄弟俩声震瓦屋的苦读情状，后裔把他俩读书的厅堂命名为“闻诗堂”。

崇尚儒学是古镇传统，黎里民众也崇尚佛教和道教，三教合一，显现出黎里人的胸怀和眼光。儒教倡导积极用世，佛、道二教以佛事、庙会聚人。一年四季有种种祭祀和庙会，正月初四夜里接财神，初五路头酒，春季有春台戏，接着有祭台会、城隍老爷和城隍夫人会、冬至节、年廿四祭灶送灶等等。最为盛大的当属春台戏，名为娱神，实则娱人。节庆的礼俗更多，诸如立夏野火饭、中秋显宝、腊月的叫火烛等等，拿而今的眼光来评审，应当说属于社会良俗，值得肯定。偶尔也有七月半祭台会之类的恶俗，不过不多。

黎里的老字号有问心堂中药店铺、万云台茶馆、紫阳观南货店

等，一百多年以来，仍然发挥着服务社会的功能。

黎里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一些俗语，深思一下产生的背景或过程，确实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事。像“浒泾弄里摇船——勿推扳”，“忧啊勿要忧，八角亭上只葫芦，照样抹油”，与俗语相关联的是旧有的河道和建筑：“厚脂纳德梅兰桥”一语，涉及到梅兰桥的一段建桥风波：“鹤脚扇屋脊高，十个姑娘九个俏”，鹤脚扇的姑娘由于能够经常吃到一点儿鱼虾，竟然细皮白肉而令人艳羡，从某个侧面折射出封建时代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境况：“一塔廿五坊”，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也就了解了当时农村某些自发的组织及其活动。再如有关“歪马张”的几句俗语，塌马张已经成为了历史陈迹，但“火烧马张店，迟早要归天”，“面孔吃虽像马张”以及“印歪马张”，依然活跃在黎里人的口头。

黎里作为集市自南宋至今已有近九百年的历史，作为江南大镇，也已经六七百岁年龄。

第一章 古建篇

江南市镇是中国人类发展史上独特的聚居地，是水乡百姓生存体验的悠久历史遗存，包容着江南水乡独到的生活、建筑等等方面的伟大成就。与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不同。江南市镇是一种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自发形成的社会空间。经济的因素使它发展使它繁盛，在特定的地域内形成了完善的网络体系，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非常罕见的。当然也有相同之点，江南市镇和平遥、丽江一样，都完整地保留了历史的信息，延续着传统的生活。

黎里正是这样一个古镇，属于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发祥地的一隅，拥有着一样灿烂的历史文化。

黎里古镇是特定空间，特定时间的产物。早在春秋时期，黎里就有先民聚居，晋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建起了著名的寺院罗汉寺，唐朝与北宋成为村落，根据范围，村落较大，而且还是多个村落，至少有二个较大的村庄。南宋和元朝，黎里人口增长迅速，几个村落自然合并成为集市，到明代初年，黎里升格为集镇，大镇。现在的黎里古镇，它积淀着宋、元、明、清和民国，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的种种历史遗存。这些遗存，在南宋以前产生不了，现在也无法原汁原味地再现。这是黎里的老百姓在特定时段中的特定生活体验，成功的生活体验。保护它是当今义不容辞的责职，研究它是为了更好的保护。

本章叙述的古建筑，就包容了南宋时的桥梁，元代的棂星门，明清时期的驳岸、河埠和缆船石石雕，明清时期民居以及厅堂、廊棚和弄堂。

一、驳岸河埠

黎里镇的驳岸，总共全长6000余米，其中完好保存的古驳岸3800多米，六七百年以来，古驳岸护卫着兴旺发达的“丁”字形市河。江南的市镇都有市河，市河，市河，顾名思义做买卖的河，这是个泛称，有的本有专称，黎里的市河就有“黎川”之名。

早在春秋时期，黎里就有先民选择了这里的河道，搭屋定居。到晋代黎里已经是颇具规模的村落。黎里先民选择的是自然的河道，稍加开挖整理，亲水、靠水、吃水，劳作生活，送往迎来，桩桩件件都离不了河道。

唐朝初期黎里村南种有不少的梨花，于是就有了梨花里的美称。唐元和4年（809年），湖州刺史范传正奉旨疏浚平望至吴县的官河，特派一村官黎逢吉到梨花里整理河道，开辟道路，当地百姓感激黎逢吉的恩德，为纪念他，将梨花里改名黎里，穿村而过的河道也有了“黎川”之称。

赵宋南渡，追随而来的北方百姓达一百多万，元

代北民继续南移，江南人口迅速膨胀，黎里由村落上升为集市。集市的功能就是做买卖，做买卖主要的通道是河道，于是，“市河”之名问世了。宋元时黎里升格为集市，中间的河道有了“市河”之名，黎川一名反倒被人淡忘了。舟来楫往，买卖兴盛，保护河堤，不使坍塌淤塞市河是必作之举。据昆山、太仓等地的古市河的发掘，再

参照《清明上河图》的河岸，宋代市河重要的地段，人们大多用木板竖插在河岸边，打上木桩加固。木板毕竟容易朽烂，用石头取代势在必然。黎里的石驳岸，最早始筑于元代。

目前，黎里保存着的古桥、驳岸和河埠，到底哪个最早呢？毫无疑问，河埠头最早，石桥其次，驳岸最晚。先民们傍水而居，他们必得在河岸边安置几块石头，汲水、洗刷，木船停靠供人踏脚。这是原始的河埠，还不能算真正的河埠，或者说是河埠的雏形。这类简易的河埠，在江南一些古村落里还有踪迹。不过，由于多次修建重筑，现在黎里市河两边，我们看到的河埠大多是明清两代的。

原始的河埠使用的石头并不是规整的，只是自然的石块，安排垒筑起来，能派用场就行。后来，考究一点人家把石头凿一凿，整齐一些，那河埠不仅使用方便而且气派。为了使河埠坚固耐用，为了防止河埠两边的堤岸坍塌，人们纷纷在河埠两边垒筑一段石堤，这就是驳岸的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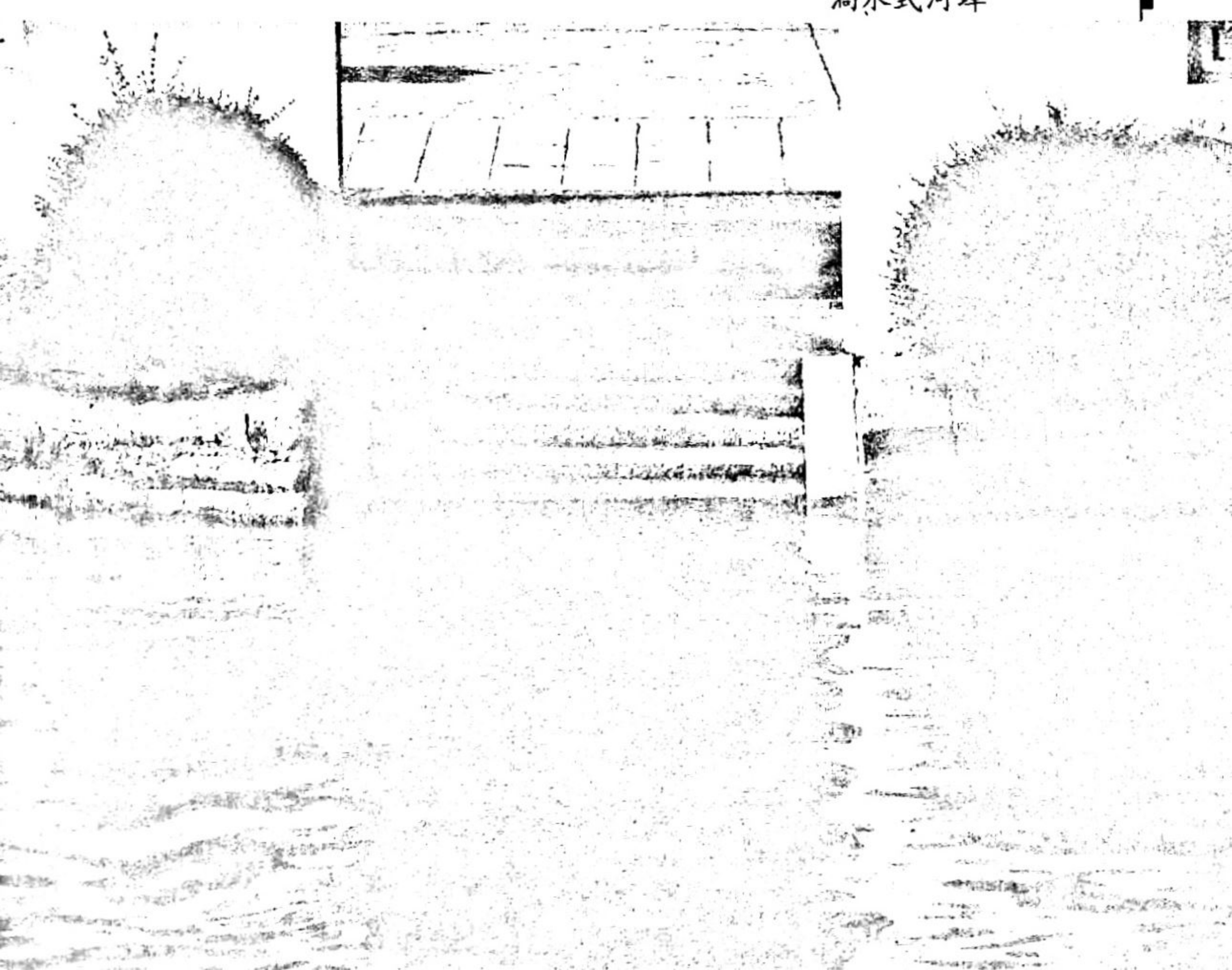
驳岸联缀成为系统，与人口增长密不可分。黎里镇人口的演变，缺乏资料，好在黎里属于苏州府，可以参照。北宋时期，苏州府每平方公里不足65人，南宋时，苏州府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145.41人。元代（公元1279-1368），也许时间太短暂，因此一直为人所忽略，其实元代恰恰是人口飞跃增长的阶段。元朝统治者固然歧视汉人和南人，但是元统治者忙于北方的战争，对于江南地区没有足够的力量加以控制，江南一带的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北方战乱频仍，中原地区的汉人不断南迁，江南人口得以迅速增长，人口密度直线上升，每平方公里高达368.74人。黎里镇的人口密度，肯定不会低于苏州府的平均数。元代黎里作为集市，大约在300到500户之间，每户以5人计，人口当在1500到2500。人烟一多，宅院鳞次栉比的建造起来，每家每户还必须建一个码头，于是每隔一二十步就有了一座河埠。很自然的，河埠两边垒筑的石堤就连结

起来了，形成一个系统，这是黎里早期的驳岸。

明代初年，朱元璋七次从中原移民至南方，因而成化年间，黎里居民增至千余家，俨然吴江县一大镇，当时建筑的驳岸与河埠更为讲究了。驳岸和河埠本是笨重的石头，堆叠在泥土的基础上，时间不长，石头就下陷、位移或走动，河埠与驳岸就得不断地重建，重建。聪明的黎里人发明了在驳岸与河埠的基础下打桩，安上一排排整齐的木桩，再将凿得平平整整的条石，一块一块地驳上去，码得平平整整。这样的驳岸与河埠，就坚固而耐用了。

现在的黎里，元代和明代前期的驳岸与河埠，还能找到部分遗迹。那个时期使用的是青石，青石遇水会有溶化，上面一层的石头光滑溜溜的。河埠上，妇女们天天上上下下，跌跤打滚的，河埠是个交换的平台，装卸货物，搬搬运运的，也容易发生危险。到了明

淌水式河埠



代中期，黎里人改用花岗岩，主要采自苏州西郊的金山村，习惯上称为“金山石”，也叫“麻石”。历经七百来年的风霜雨雪，现在纯青石的石驳岸和河埠头，已经难觅，只在镇东头和镇西头，各有一二十米的青石驳岸，那上面大多也罩上一层麻石，东西相距1300来米，中间的驳岸多数由青石和麻石相掺杂。至于河埠头，绝大多数是麻石的，少数底座是青石，上面一定垒上一层麻石。

上面谈了黎里市河名称及其演变，驳岸与河埠的垒筑，下面再说说河埠头的多种形式。

河埠头，简称河埠，黎里叫作“河桥”，江南还有多种叫法：水码头、河码头、水桥等等。江南的村庄、市镇，到处都有河埠的位置，像黎里这样的古镇，河埠更是密集，每隔三五丈必有一座。全镇现在有淌水河埠 10 座，单落水河埠 82 座，双落水河埠 174 座。

黎里的河埠不仅密集，而且花色繁多。从使用的角度来说，河埠有公用的、半公用的和私家之分。从外部形态来分，则有淌水式、双落水、单落水，还有悬挑式。

黎里的老百姓，对河埠头有着种种形象的叫法。双落水河埠，多数作外八字形，叫“菱角河桥”；单落水河埠，“木鱼河桥”；小型的淌水河埠，“畚箕河桥”。生动的比喻，让人过耳不忘。

淌水式的河埠最为宽阔，一级级的石阶与河道平行，七、八级十来级不等，那是最气派的码头。悬挑式最为简便，只在石驳岸边上横插五、七块条石，大多为私家使用。单落水，可分两种，外凸式和内凹式。人们根据河面的宽窄，设计河埠。有内凹式的也有外凸式的，一般宽三尺左右，七至九级石阶，远远看去，就像八字的那一撇或一捺，斜斜的插进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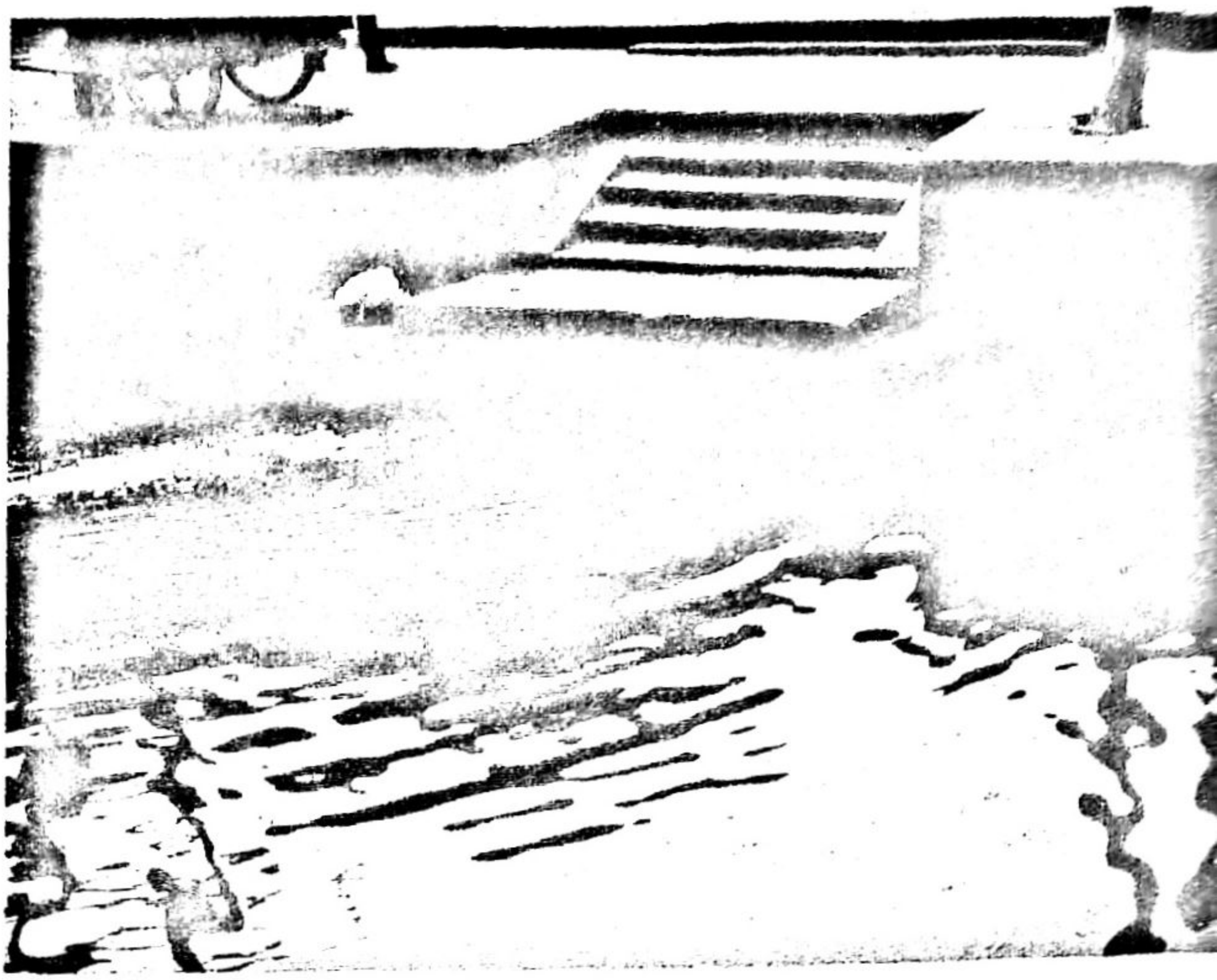
菱角河桥，就是常见的双落水河埠，还有许多的变式。先有内凹式和外凸式两种形状，河面宽阔的地段一般采用外凸式，狭窄的大多筑成内凹式。双落水很象个“八”字，有正“八”字和倒“八”



悬挑式河埠

字之分。正“八”字，一般中间一个三、五尺宽的平台，两边安排七至九级石阶。倒“八”字，就像两个相对的单落水的河埠安排在了一起。这种河埠，讲究实用，也不乏艺术。像“顺和春”茶馆、“紫阳观”南货庄那一段，连接连的都是双落水河埠，这里曾经是最为繁华热闹的去处，就是在开发了新镇区的今天，顺和春和紫阳观依然天天摩肩接踵。

还有更复杂的，就是几种形式的河埠的组合。市镇街道两旁，河埠的石阶最多不会超过10级，石阶过多，搬运货物及买汰烧，实在不够安全。因此，在较高的河岸上修建河埠，就先安排淌水式的石阶，大多先淌它个三至四级，再安排外八字式的双落水，这叫做“内淌水外双落水”。在“易安书场”附近的街面很高，即使这样安排仍不能到位，过多的落水石阶容易发生危险，过多的淌水式石阶，又会影响街道的宽度，就先筑成内凹式的倒“八”字，再接外凸式的正“八”字双落水。这样一来，水涨水落，都不会影响居民的用水



淌水式接外八字河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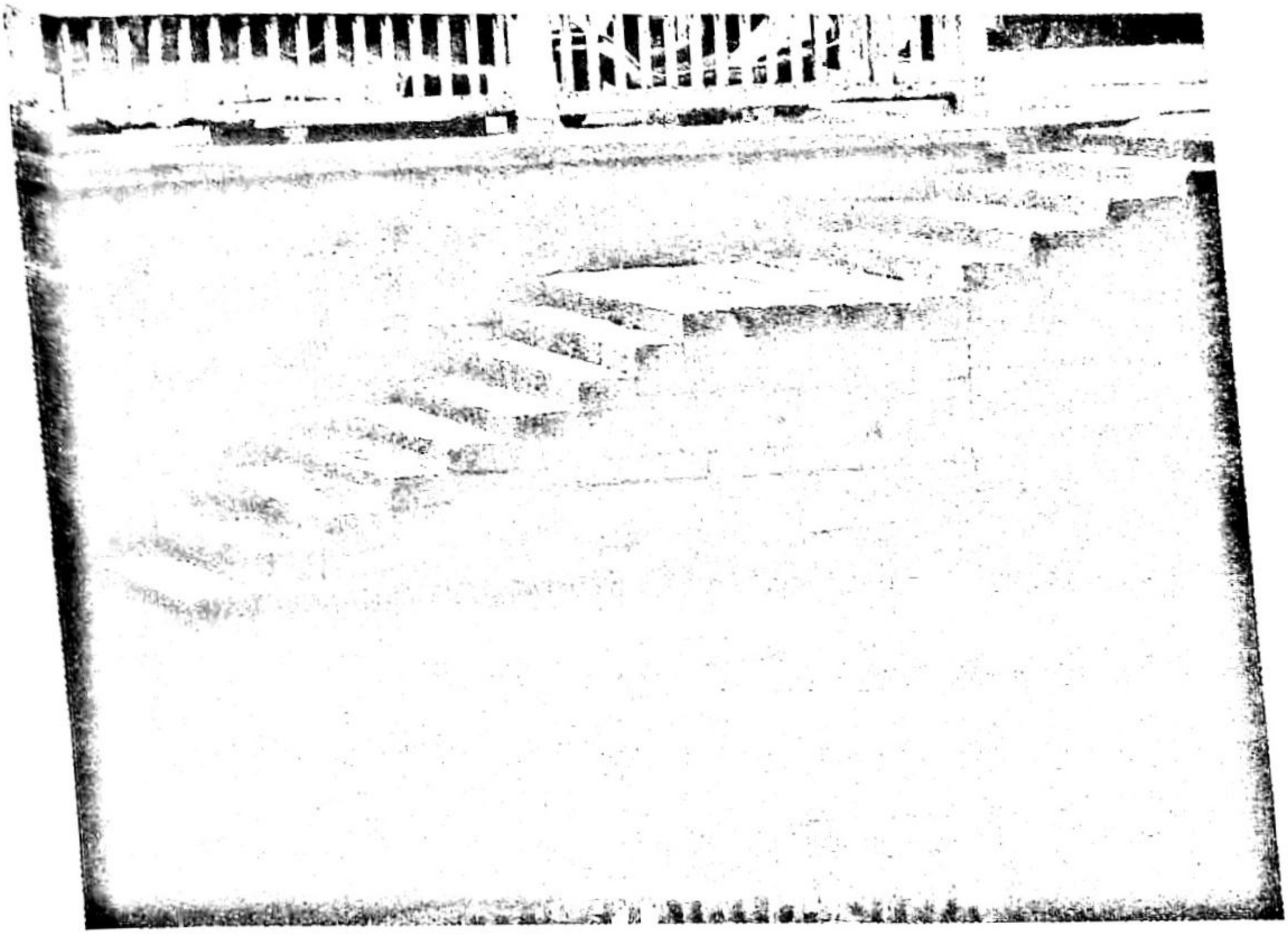
和上下船。

因地制宜的巧构妙造还有不少。有的单落水河埠的石阶超过了10级，设计者就在半腰中间增加一个平台；有的河埠限于空间，腾挪不开，河岸与水面落差又大，人们就采取来复式的单落水。亏得

内八字式接外八字河埠

黎里民众的智慧，出现了这么多科学合理的设计和安排。

河埠头，明清两代黎里的老百姓生生息息的历史遗存，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河埠依然是黎里人民，送往迎来，籴米买柴的重要平台。而今，舟船运输需要河埠作为平台已经成为了历史，不过黎里的河埠至今没有完全退出人们的生活，居民们洗洗刷刷仍然



中设平台单落水河埠

需要。

河埠头，明清两代黎里镇重要的经济平台，密集的河埠头是黎里古镇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标志。江南是水的经济，水的文化，人民以水为路，凭水为生。人们从高高的山上移来石头，护卫市河，垒筑驳岸，打理河埠，创作了石与水的韵律，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和谐而又美丽。

二、缆船石

缆船石，船只停靠系缆的支点，水乡泽国的繁盛，在这一小小的支点上竟然也能看到它五彩缤纷的折射。黎里保留的缆船石最多，光洞穴式的就有254颗，堪称江南市镇之最。缆船石雕刻只是历史文化中一丁点，但是一样闪耀着绚丽的色彩。

立柱式缆船石



黎里的缆船石，主要有两种形态：立柱式和洞穴式。立柱式一般不加藻饰，少数雕有简单的花纹，洞穴式始自明代，多数雕刻成精致的艺术品。本节主要介绍的是洞穴式缆船石。

黎里的缆船石始于明代，保留在驳岸上的青石质地的缆船石就是明朝的遗物，很少有雕饰，大多是象鼻形的，所以黎里人把缆船石叫做“象鼻眼”。清代，缆船石在实用的基础上逐渐增加纹饰，构图古朴庄重，典雅美观，有横式、竖式，平雕、浮雕和透雕多种。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缆船石在生产与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缆船石维系的主要是农船、航船和渔船，明清两代的黎里，繁华的动力就来自这些载重三、五吨，至多十来吨的小船。

缆船石作为江南水乡特有的一种石雕文化，透过它，可以多角度、多层面地得到多种信息。

缆船石，探寻黎里古镇历史性规模的重要证据。

缆船石使用的材质与修筑驳岸、河埠所采用的石料同步，对此，江南地区自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明代中期以前采用青石，明代晚期开始采用麻石，俗称“金山石”。黎里留存下来的青石象鼻形，还有定胜形的缆船石不多，连同残缺的，不超过10颗，主要分布在青龙桥至明月桥的驳岸两旁，凭此，我们可以确定，明代中期以前，黎里是个一河两岸型的集镇。明月桥向南的横街，子来桥往西至望平桥，那里的缆船石全是麻石雕刻的，可以认定，黎里镇从明代后期又由横街向南北拓展了400来米，形成“丁”字形的镇区，清代再向西扩展了200米。镇区由丁字形发展为“十”字型。

缆船石最实用的功能就是系缆，再就是测量水位，预报水灾。

江南地势低洼，平均海拔只有3米上下。封建社会，中国始终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国，治水历来是头等大事。为了测量水位，江南市镇多处设置“水则碑”，明朝年间，吴江垂虹桥就竖了两块，嘉

善的西塘也有一块。因为水位的升降，维系着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所以百姓称之为“忧欢石”。黎里驳岸上洞穴式的缆船石，一般河埠本身安排的两个较低，河埠两边驳岸上的两个高一些，二者相差大多在一尺上下。驳岸上的缆船石距离路面总在40到80厘米之间。这是基本的定式，凡出现例外的，尤其是那种安置得特别高的，就有警报水位的作用，也是一种“忧欢石”。



葫芦吐蝙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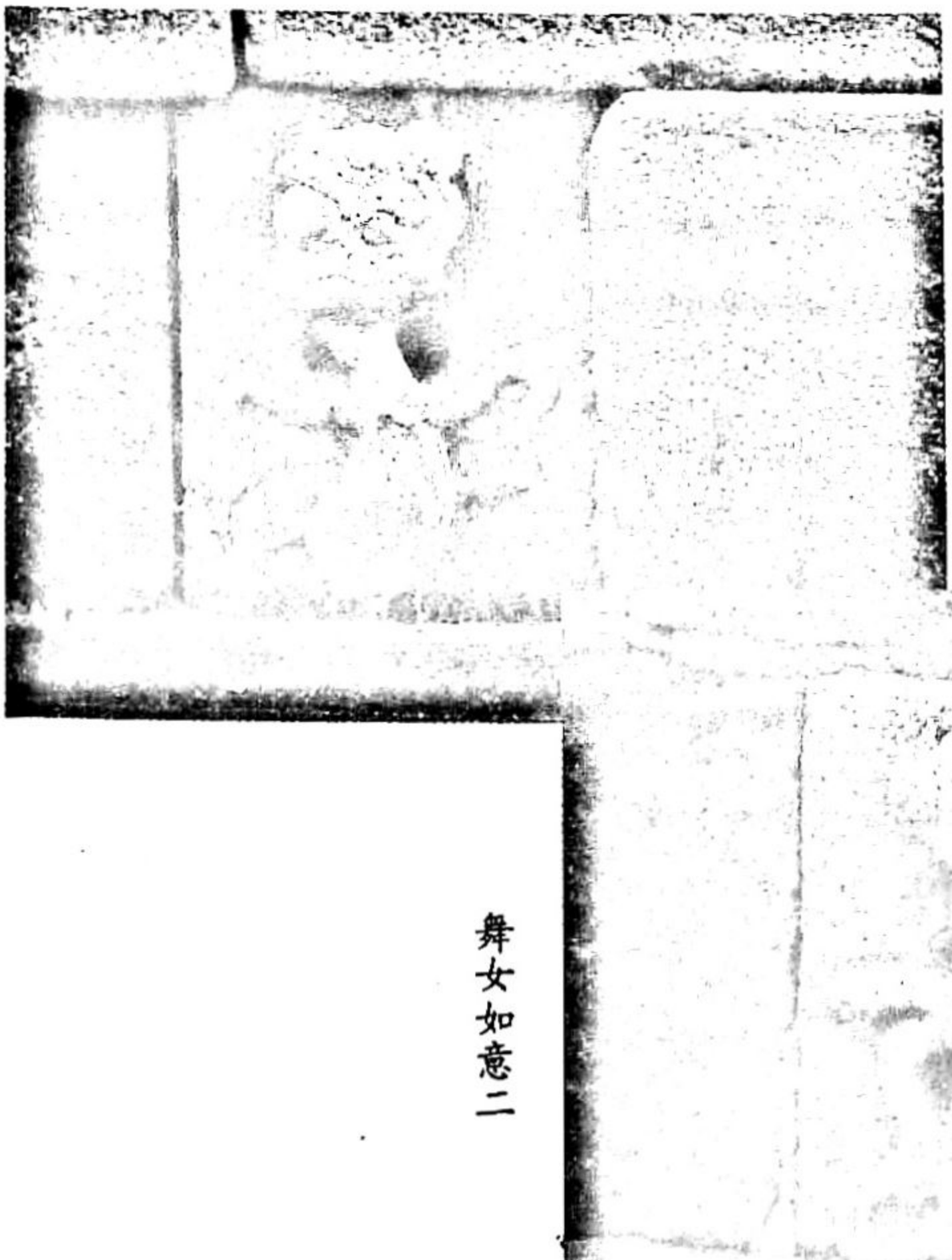
黎里镇中心北岸，有一颗缆船石，雕刻的是葫芦吐蝙蝠，一个葫芦，上部有一只奋力高飞的蝙蝠。这颗缆船石位置较高，一般的缆船石都在1尺至1.2尺，而葫芦吐蝙蝠特别长，达1.3尺。这是黎里的“忧欢石”。中国是个巨大的农业国，靠天吃饭，江南最大的忧患是水涝之灾。每年的雨季，黎里民众都密切注视着葫芦和蝙蝠，假如水位在蝙蝠以下，那么人们笑遂颜开，水碰到葫芦底了，担心开始了，漫过葫芦了，甚至连奋飞的蝙蝠也没掉了，那么黎里人就会凄苦地说：“没蝠，没福，蝙蝠没脱没得收！”那么，这一年的农田看来又将颗粒无收了。

系缆停船、预报水位是缆船石存在的基础，逐渐地，人们雕琢出了种种纹饰。黎里市河两侧至今保存着30来种。有动物的，象

鼻、犀角、河蚌、蝙蝠、猴子、麋鹿和蚕宝宝；有植物的，蕉叶、桃子、佛手等。有表吉祥的，如意、定胜、经幢。有宝剑、葫芦、扇子、横笛、花篮、渔鼓、荷花、宝板等暗八仙。有铁锚、金锭，甚至出现了民国肇造时的五色旗。还有几种事物或动物组合而成的，比如瓶生三戟、瓶生蜂猴、如意得鹿等等。

黎里的缆船石，显示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祈求的，主要有如意、桃子、桔子和石榴等。

黎里古镇的缆船石，如意特别多，三五步就有一块，形态生动，形体各异，好似一群俳优，腰萦彩绸，左顾右盼，各呈所长，又似蔓草缠身，卷延不绝，这叫“蔓带如意”，口彩语“万代如意”的谐音。驳岸上的如意，有的地段连续出现，这有讲究，连续安排四颗，那是祈求“事事如意”。在八坼等地，连接连地出现了九个，那是“九如”，九如出于《诗经·天保》，一首专门祝福的诗，“天保九如”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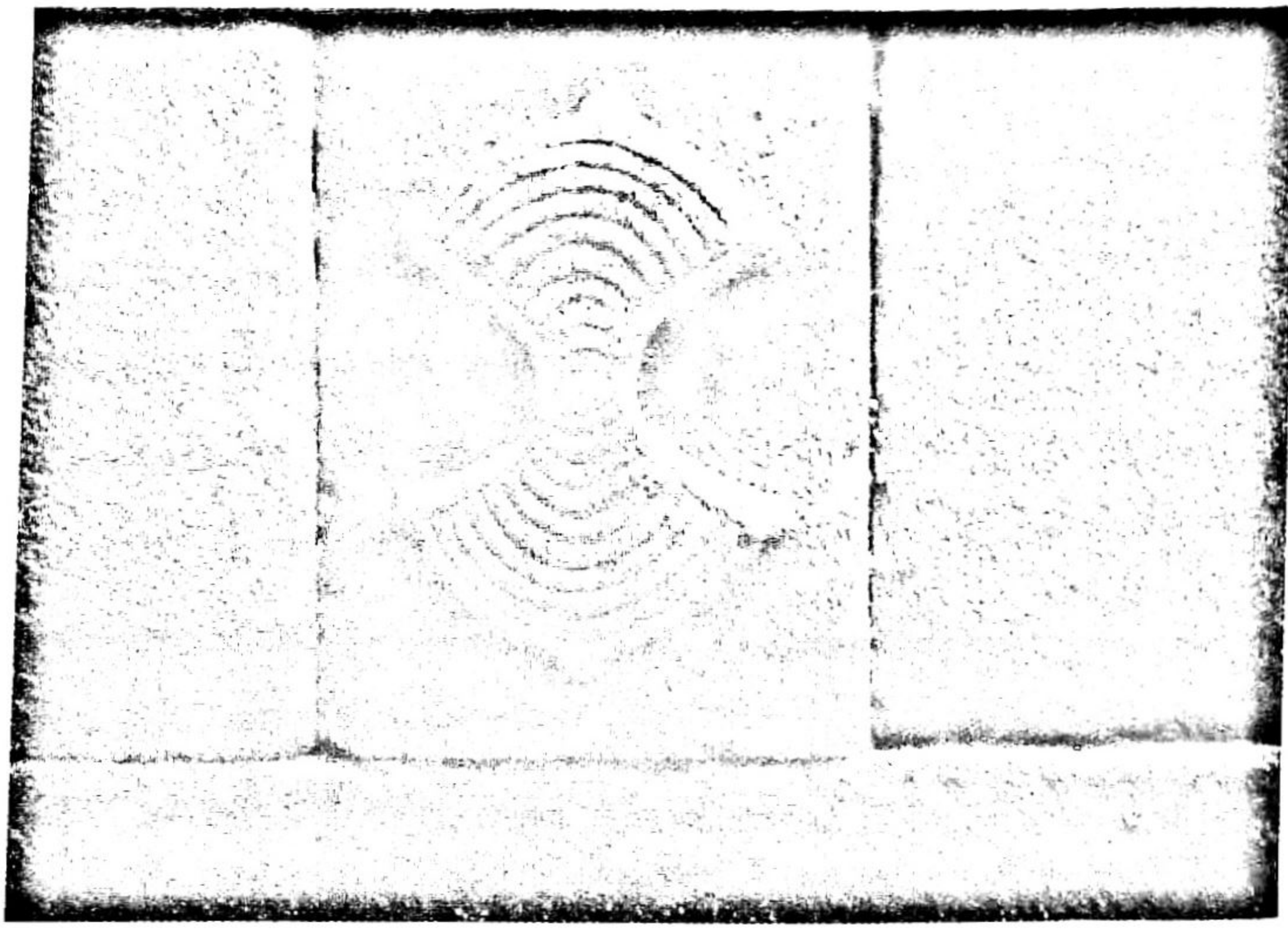
舞女如意一

舞女如意二

祷人如日、如月、如山、如川、如冈、如陵、如阜、如石、如松柏，集中了人生所有幸福的祝颂。

黎里缆船石的安排还有许多讲究，有的在如意的上首安上一块“笔锭”或“笔定”。就是一支毛笔加一个金锭，或者一支毛笔加一个定胜。古镇的河埠上，常常有这样成对的组合。金锭一般用一个金元宝代替，定胜是两头大中间小，状如两个菱形压角相叠组成的图案。讨口彩“必定如意”。

笔与定胜（必胜）



双桃、双桔和石榴也表露民众美好的祈求。桃子，在中华民族心目中，历来是长寿的象征，习称寿桃；桔，谐音吉，祈求吉祥。桃子和桔子成对出现，也与民族习惯有关，双喜，双喜，逢双必喜。石榴因为多籽，黎里人认为多子必定多福，所以是追求人丁兴旺子孙

满堂的家庭，或家族，他们喜爱这样的缆船石雕刻。

黎里的缆船石，雕琢出了读书出仕的科举印痕。

中国独创的科举制度，自隋朝初创至晚清寿终，长达1300多年，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渗透进民风民俗以及百姓心态，它必然会在缆船石的雕刻中显现出来。与科举密切相关的缆船石，黎里最多见的要数“瓶生三戟”，还有“平生封侯”和“如意得鹿”各一颗。

瓶生三戟是一幅优美的图画，一个造型独特的花瓶，宽宽的底座，上面插着三支戟，只在瓶颈处透雕作细腰，这细腰正好成了系船缆的缆船洞。戟，古代使用的一种长兵器，大凡瓶上左右两边的是单戟，中间一个双戟，像《三国演义》里吕布使用的那一种双戟，也叫方天画戟，集戈、矛于一体，既能直刺又可横击，挺有威力。戟，还可以充作仪仗，唐初，规定三品以上列门戟，后来门戟制度时有变动，规定逐渐具体。终于，戟作为兵器逐渐淘汰，日益突出的是

瓶生三戟



仪仗功能，能够列戟那是荣耀，列戟的多少又显示身份的尊卑。“戟”与“级”同音，又是有身份者的仪仗，于是民众就讨它的口彩，在花瓶上生出三戟，组成赏心悦目的图案，谐音“平升三级”。

平升三级与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密切相关。明清两代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县试，包括府试和院试，考中者俗称秀才；乡试，中式的称举人；会试，合格称贡士，再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排定名次，成为进士。一介平民假如能够顺利通过这三级考试，那么就可以跃入统治阶级的行列。那时流传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语，可以说道尽了科场上的辛苦辛酸以及考场拼搏成功后的踌躇满志。科举考试几乎吸引了所有的读书人，调动了所有的国家机器，动员了社会所有的角角落落。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可以免赋税免徭役，每年参加“科考”，成绩合格的称“增生”，列入高等的称“禀生”，二者都由官府供给一份薪米补贴，凭此，穷秀才不经商不务农不做工勉强可以苫度光阴。举人，这是科举中最关键的一关，俗称“金门槛”，翻过了就是老爷，有资格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如果参加会试三次不中，按清朝规定，由吏部派员接见考察，时称“大挑”，列一等的委任知县，列二等的以府、州、县学教职用，每六年举行一次。大挑的标准重在形貌与应对，相传有“同田贯日气甲由申”八字诀，例如长方形的面相为“同”，方形的为“田”，身体高大者为“贯”，身材匀称者为“日”等等，合于前四字者为一等。至于中进士的作官，那就不消说的了。至今赞扬某些行家里手，往往用“科班出身”“三考里出身”之类的话，这都出自科举考试。“科班”和“三考”，是说做官的资格通过正而八经一级级地考上来的。封建社会除了科举，似乎也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通向富贵和显赫，因此平升三级也就成了读书人终生的祈求。能够顺利通过这三级考试，那真是平步青云的快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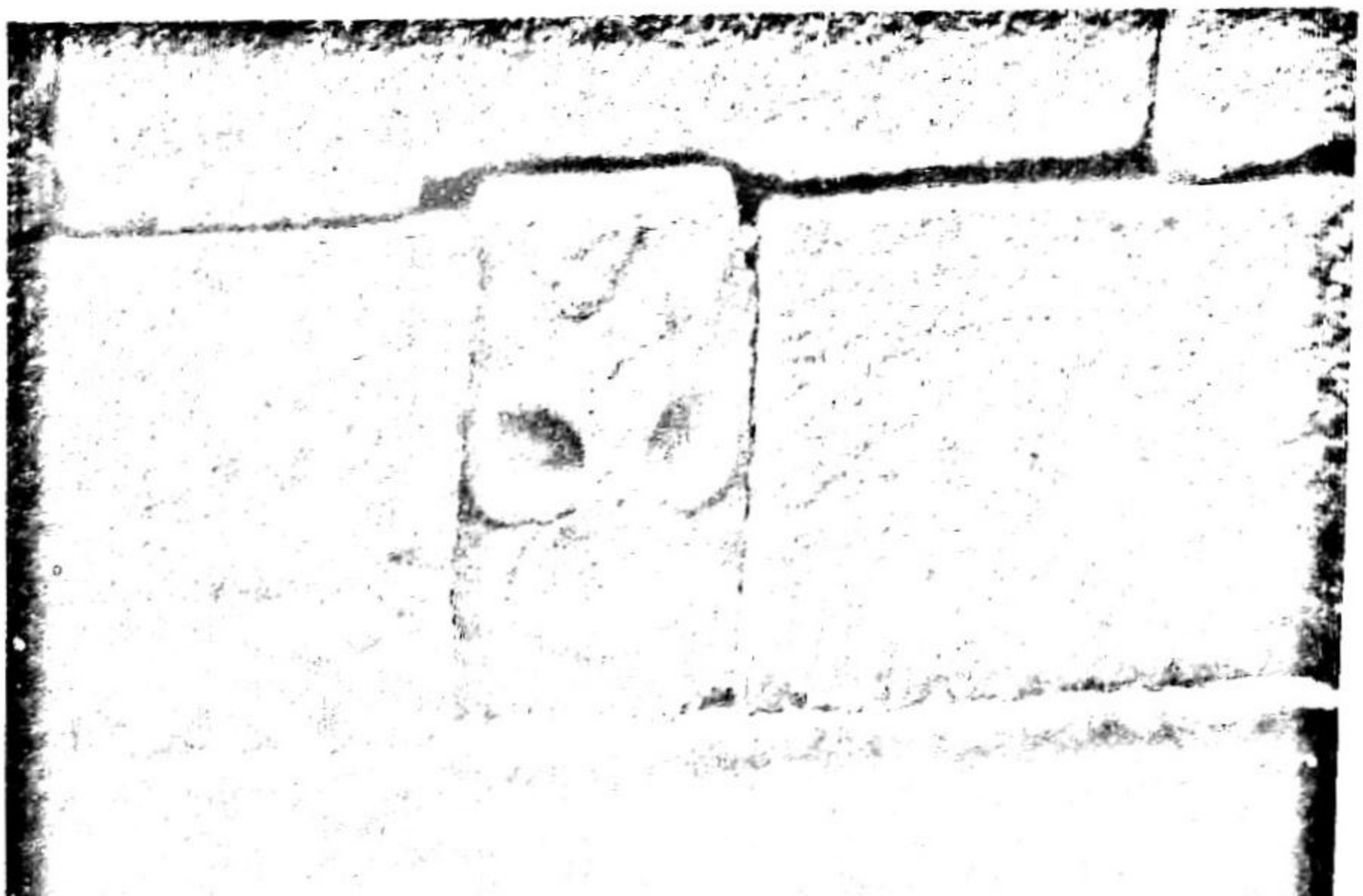
瓶生三戟的缆船石在江南古镇很多。科举制度消亡了，瓶生三

戟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然而作为一种雕刻艺术，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前不久，黎里有人家造了一座仿古建筑，那长窗上面就刻有瓶生三戟。艺术品尤其是文物，寿命远远超过产生它的社会基础。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至今还能听到人们用“平升三级”作为祝颂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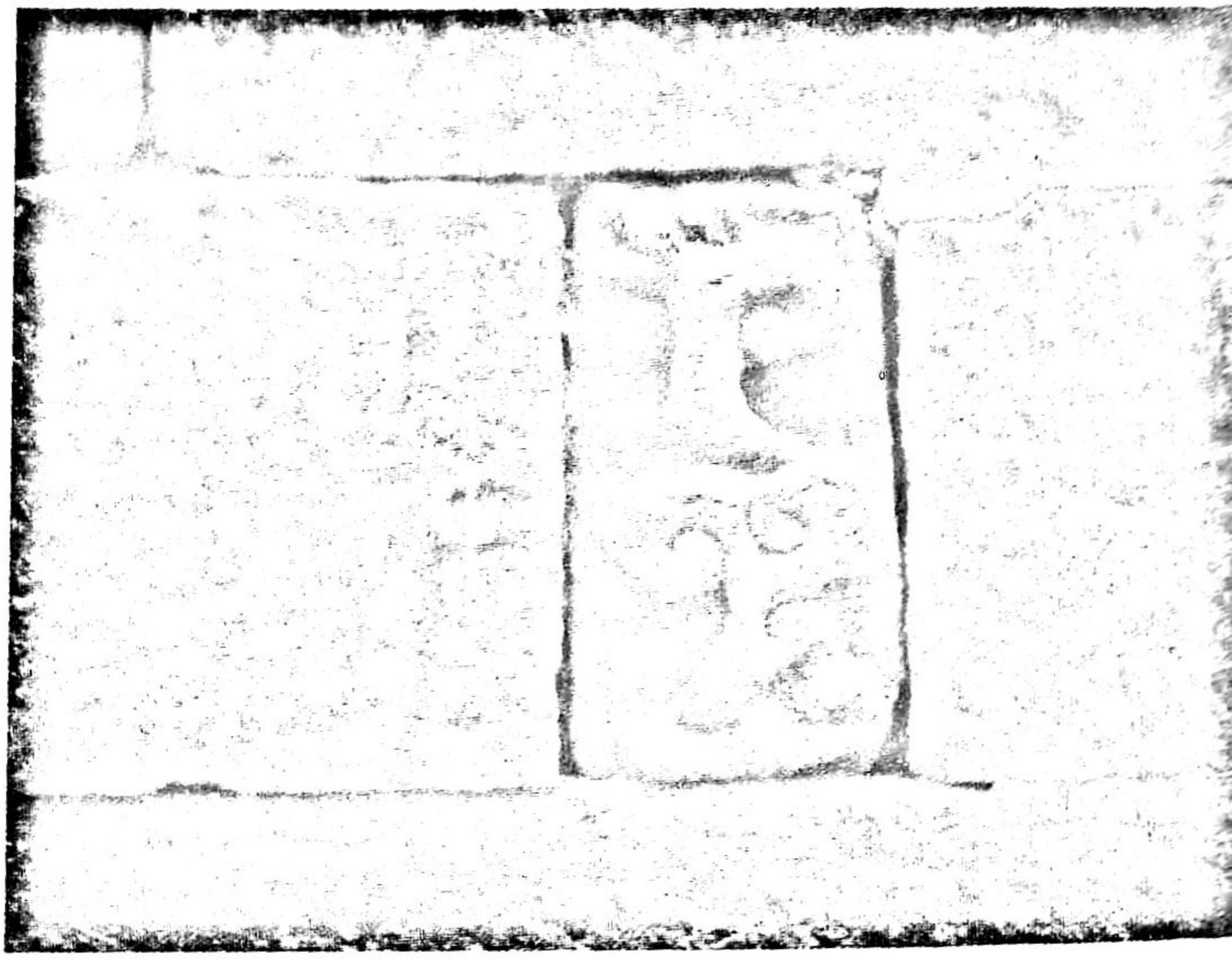
雕刻瓶生三戟的，一般总是读书人家，指望儿孙们能够考科举，首先是支撑门户，不受欺压，再则飞黄腾达，荣宗耀祖。朱德写过一篇《回忆我的母亲》，文中谈到，他家父母节衣缩食，培养他读书，希望他应考科举，将来支撑门户。考上秀才，就有三大特权，除了上文提到的经济待遇之外，还有政治待遇，见了知府以下的官员不必五体投地地下跪，只要拱手作揖，犯了小罪，一般不须官府惩处，由学政，也就是学校老师处罚。假如犯了大罪，那么必得先开掉秀才这个功名，方能判罪。民间一直说，革掉秀才能抵它三五年官司，不过，在清代的史书中，似乎没有明确的记载。

自宋以来，黎里出了特奏名状元1名，进士26人，举人61名，贡生43名，秀才无数。

黎里镇横街南头的两个河埠上，静静地安排着两颗醒目的缆船石，靠西侧的那颗，一个花瓶，上面蹲着一只猴子外加一个小蜜蜂，



瓶生蜂侯



东侧的那一颗上，一个如意，顶上蹲着一头梅花鹿，梅花鹿高高地昂着脑袋，灵活机警，同猴子蜜蜂隔河相望，煞是可爱。两颗缆船石，一颗谐音“平生封侯”，另一颗谐音“如意得禄”，与平生三级可谓异曲而同工。

从明代开始，对功臣一般封到侯伯为止，不是皇族子弟不会封王称公，那些重要的开国功臣，也只有在死后才追封王爵。清代，名义上封赠分“公侯伯”三等，事实上封公者极少，只在清初实施过。简单地说，“王”和“公”，不是皇家后裔，不是开国功臣，那是无缘企及，无法消受的。平民庶人，最高的奢望就是企盼封侯。看来，平生封侯，明清两代文人学子仕途通达的至高境地。

鹿与禄同音，鹿成为高官厚禄委婉的代称和形象的表现。读书人考科举，当时叫作“干禄”，译成大白话就是追求利禄。鲁迅在《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描写到，他童年上书塾，第一天第一次就对着三味书屋的一幅中堂行礼，那中堂不画别的，画的是一幅梅花鹿。上

学，向梅花鹿行礼，不就是求禄、干禄吗？

鹿与禄同音，由高官厚禄逐渐转义，产生了政权之义。唐魏征有《述怀》诗，“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这个禄指的就是政权。政权的最高表现是皇帝，所以鹿又可以称代帝位。《汉书·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成语逐鹿中原，就有了特定的含义，那是群雄并起，争夺皇位争夺天下。《三国演义》第20回，写到曹操与汉献帝率领大队人马到许田围猎，遇到一头大鹿，献帝连发三箭，都没有射中，回过头来让曹操发箭。曹操一边微微颔首，一边向献帝讨弓箭，献帝不加思索就将自己的雕弓金箭递了过去。曹操弯弓搭箭，扣个满弦，嗖的一声，射个正着，大鹿应声而倒。群臣将校，望见鹿背上的金箭，只道是天子出手不凡，踊跃欢呼，“万岁”连声。曹操纵马，直出阵前，遮于献帝面前，领受众人的欢呼。刘备欠身向曹操祝贺，曹氏语带双关，说：“此天子洪福耳。”后来，勉强回马向献帝称贺，可是又假痴假呆的，没有归还天子宝弓，擅自随身悬带。这是罗贯中的象征之笔，围猎点出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气焰，射鹿又暗示了曹阿瞒僭越自代的野心。

当然，黎里镇的百姓大多不会野心勃勃到把眼光瞄准什么帝位，他们心目中的鹿，就是高官，就是厚禄。希望子孙后代能够考秀才、中举人、中进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无可厚非。就在“平生封侯”和“如意得禄”那两颗缆船石的周边，确实出过好几位进士。不远处有一条“闻诗堂弄”，弄内最主要的建筑就叫“闻诗堂”，清时殷氏有兄弟两人，昼夜诵读，声传四近，后来兄弟俩先后得中进士，据查，兄长传胪及第，也就是仅次于状元、榜眼和探花的第四名，由此闻诗堂遐迩闻名，至今仍然是黎里文人的一段佳话。

黎里镇的缆船石，烙上了宗教的印记，主要有经幢和暗八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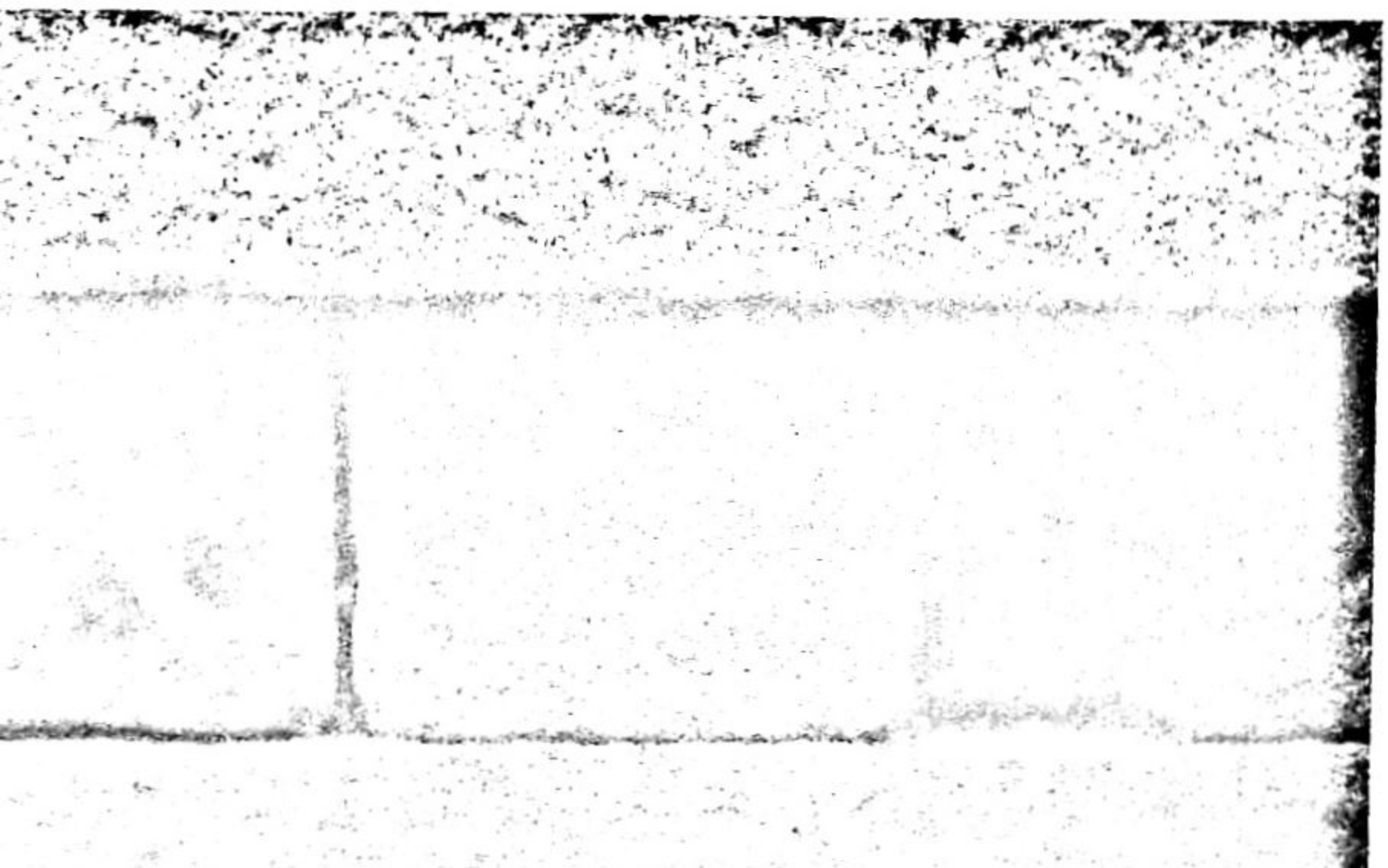
经幢，石柱状佛教用具，始于唐代，柱身大多刻有陀罗尼、佛像和经文。黎里早在西晋永熙元年就建造了普同院，南宋改称罗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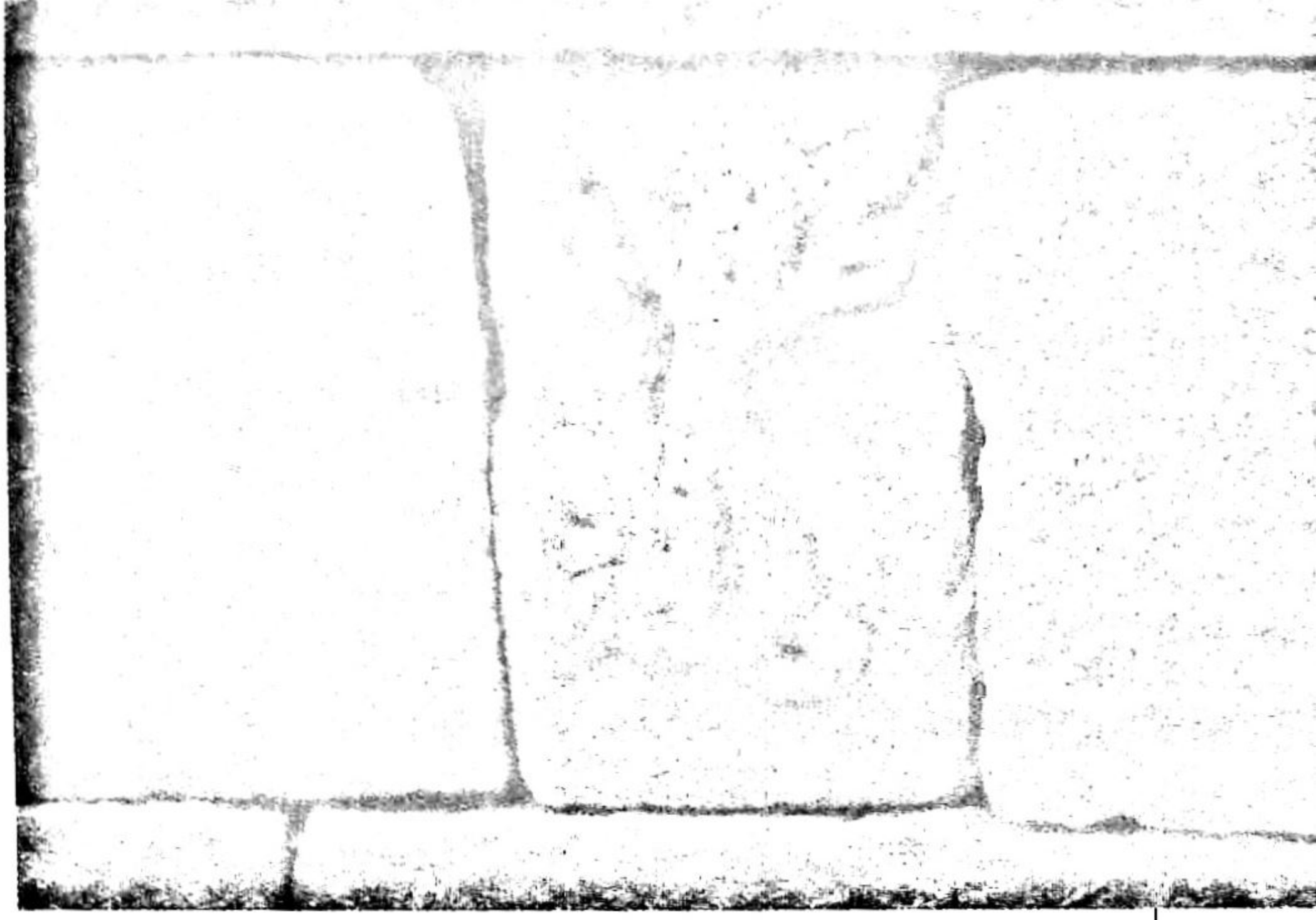
讲寺，简称罗汉寺，一座遐尔闻名的大刹。此后一再修建、改建和扩建。明清两朝，黎里信佛蔚然成风，除罗汉寺外，较为有名的还有玛瑙庵、宝纶庵、观音庵、莲华寺等近20座。除了经幢，黎里市河的南岸残留着一颗佛手。将经幢还有佛手刻成缆船石，安排在自家的驳岸上，显现了佛教徒的虔诚。

黎里的道教，同样兴盛。早在南宋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黎里建成了“大庙”——全真道院，元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规模扩大，增建山门，明清两朝不断修建、改建和扩建。同属道教较为著名的有城隍庙等一批称院、称堂、称洞的道教建筑9处，信徒众多，香火旺盛。道教在缆船石上刻下的印痕，就是仅次于如意的“暗八仙”。

八仙是我国道教中的八位仙人，在民间流传非常广泛，始于唐朝的《八仙传》及《八仙图》，唐以后，有关八仙的故事越传越多，宋元两代更有众多的八仙和众多的故事增加出来。明朝的吴元泰撰写了《八仙出处东游记》，排出了如下八人：吕洞宾、张果老、铁拐李、汉钟离、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和曹国舅，至此，八仙的名号才正式确定下来。传说每年的3月15，八仙要赴上界瑶池，参加蟠桃大会，为王母娘娘祝寿，他们从山东的蓬莱岛启程，各自祭出护身法宝，飘洋过海升腾天国。这，“八仙庆寿”的故事家喻户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成为熟语，老少尽

吕洞宾宝剑





知。

雕刻八仙形象，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艺术，在小小的缆船石上雕刻八仙形象，稍一不慎就会弄巧成拙。我国的能工巧匠，别出心裁，创造了“暗八仙”，就是用八仙各自的法宝代替八仙其人。民间至今有顺口溜：吕洞宾剑现灵光魑魅惊，常背一剑；张果老鱼鼓频敲有梵音，常笃鱼鼓；铁拐李葫芦一只存五福，常带葫芦；汉钟离轻摇小扇乐陶然，常摇一扇；韩湘子紫箫吹度千波静，常吹一箫；蓝采和花篮内蓄无凡品，常携花篮；何仙姑手执荷花不染尘，常执荷花；曹国舅玉版和声万籁清，常拍宝版。所雕的宝剑、鱼鼓等八种物件就代表了八仙。

八仙，多数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在口耳之间不断被加工被神化，以致我们难以看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八仙是道教酝酿出来的仙人，土生土长的，品一品八仙中的人物就会觉得此话不虚。张果老、曹国舅和蓝采和都是唱道情的，而道情是宣传道教的民间曲艺。张果老的鱼鼓也叫道筒，大多是竹筒，一种打击乐器，唱道情时用手指叩击蒙皮的一头作为伴奏；曹国舅的玉版，也叫筒板、檀板，通常用两根长约二尺的竹片组成，唱道情时用左手夹击发声，配合鱼鼓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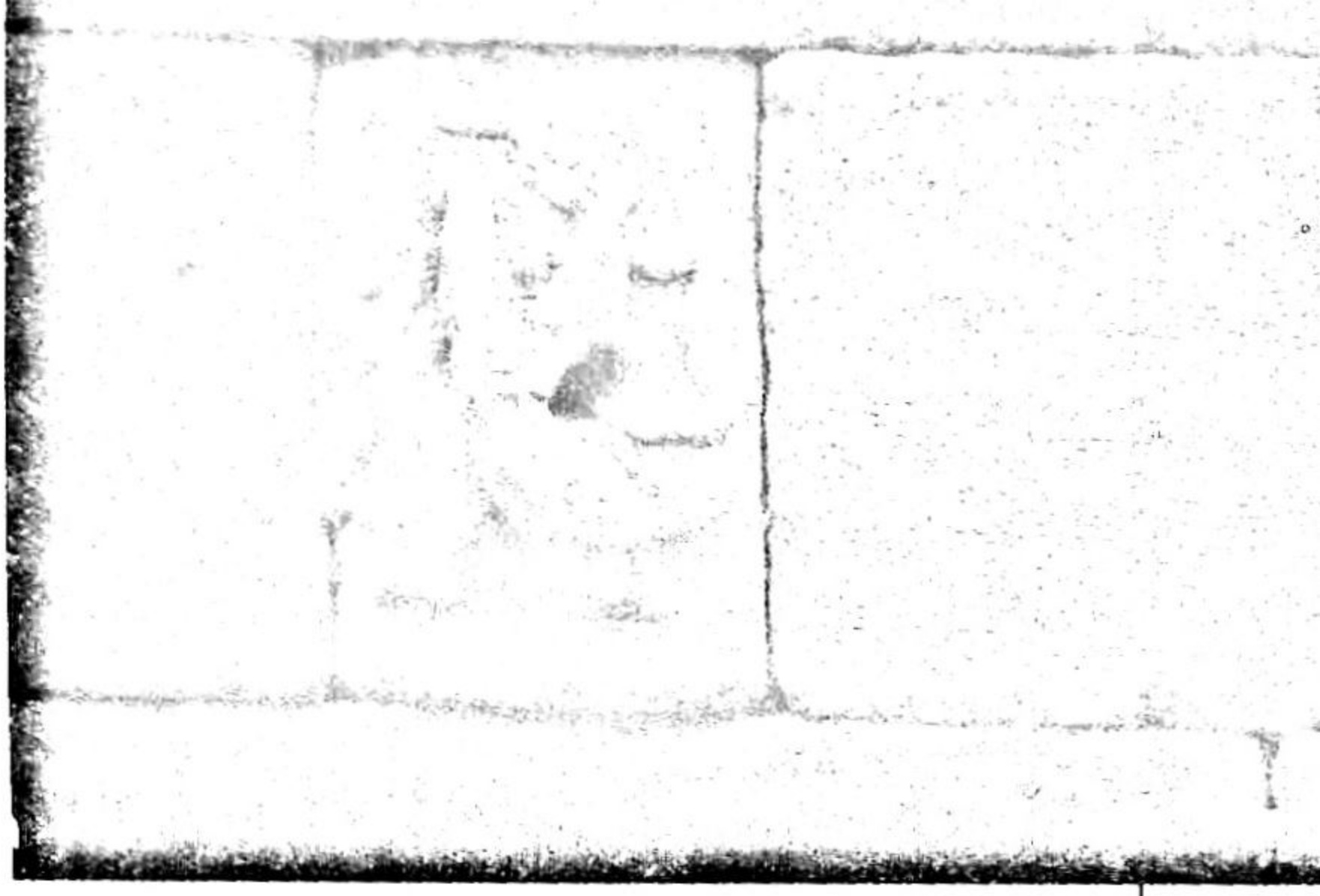
用；那个蓝采和，最早传说他手抓两块大拍板，四处高唱《踏踏歌》。还有那个铁拐李，身背好大的一个药葫芦，不消说，是四出云游的江湖郎中。道教对我国的医药颇有贡献，道教中人大多懂点医道。暗八仙缆船石，也是一种艺术的创造。

黎里的缆船石，显现了民众驱邪避凶的心态。

黎里水乡，缆船石刻下镇水避水的印记要数犀角了。有单犀角，也有双犀角；有直犀角，也有弯犀角，大多腰缠彩带，大有飘飘欲飞的灵动。

犀牛角，简称犀角，是名贵的药材，也是雕刻工艺材料中的极品。在我国，犀角的名贵不在犀牛兴盛繁衍的时代，而是在它绝迹了一千多年以后的明清两朝。犀牛绝迹了，人们对它的怀念却与日俱增。拥有的时候并不知道珍爱，失去之后才感觉到了它的可贵，这也许是人们的一种通病。《本草纲目》等书记载过犀角的医药功能，《蠕范》和《格古要论》等记述了犀角的品类和优劣。人们把犀分为山犀、水犀和兕犀，判定水犀最为名贵。就角而言，有一角犀也有二角犀，生于额上的那个角最名贵。犀角的品色也有种种说法，犀角中的纹丝和鱼子相似，称为粟纹，粟纹中有眼出现，就叫粟眼，还有云头雨脚、通天相透、重透、正透、倒透等等分别。有些千年老犀，角内有一白缕或黄缕贯穿全角，出气而通天的，称为通天犀，就是李商隐诗中的“灵犀”，属于犀中极品；犀角内的花纹，如果是正透纹，黑中有黄花，黄中有黑花，或者黑中又有黑，黄中又有黄，属于珍品；花色相同，属于倒透花纹的，则略次一等；如果有深色的椒豆斑，再次一等；有淡色的散斑纹，又次一等；只有纯黑而无花的犀角，才不甚珍贵，一般用来制作象棋。

明代著名市井小说《金瓶梅》，描写西门庆有一条犀角革带，清客应伯爵夸赞这条犀带是水犀角的，可以分水和照明，说什么“夜间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灭”等等。这些并非兰陵笑笑生一时兴



双犀角

起的杜撰，那是文献上有过记载的。《吴越志》载：有人献给钱武肃王一件云鹤水犀带，武肃登上了碧波亭，命手下一个叫许彦方的人系上犀带下水，结果，分开的河水达七尺有余。《杜阳杂编》载：敬宗时，南昌进贡一件夜明犀，入夜犀光照耀百步开外。犀牛角是名贵的，它有许多的特殊之处，但说得如此玄妙，则是民间神化的结果。

古人早已认识犀角，知道犀角能够清热解毒。中医认为犀角医治伤寒有特效。得伤寒症，即使生命垂危，只要进服些许犀角粉，就能够起死回生。民间盛传，用犀角杯喝酒饮茶，可以延年益寿，精力旺盛，百病不侵。所以明清两代，从泰国、印度、尼泊尔等国进口了数量可观的犀角，小的一二斤，大的十几斤，这些进口的犀角主要用于雕刻犀杯。

明清时期，犀角的疗效及其神奇可谓家喻户晓。尤其是犀角分水的神奇功效，深得江南民众之心。于是水乡市河的石驳岸和河埠头上雕刻了众多犀角缆船石。船只系缆在这样的缆船石上，可以免受水浪的袭击，船上的孩子和妇女可以平安无虞。

除了犀角，还有一些缆船石雕刻着双剑、怪兽（同里），厌胜钱（新市），以及上文谈到的暗八仙等等。这些缆船石，都寄寓着江南人民驱邪避凶、希望平安的种种心理。

黎里的缆船石，更显示了民众冲决封建藩篱的觉醒，积极要求参政、议政，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黎里镇的东北侧的驳岸上，民国元年正好重新修筑，那里需要安排一方缆船石，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主持人，有感于民国肇造，万民欢腾，他别出心裁进行了设计，请了同样没有留下姓名的匠师雕刻了一眼图案为“五色旗”的缆船石。

五色旗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明确规定的正式国旗，这眼“五色旗”记载着一段纷纭的历史。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宣告满清王朝成为陈迹。在筹建民国的日子里，各革命军使用的旗帜颇不统一，讨论国旗时，意见纷歧，各地代表都力争将自家打出的旗帜定为国旗。主要的有如下四种：一、十八星旗，又叫铁血十八星旗，本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共进会的会旗，十八星象征十八行省，星用红色象征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武昌起义打出的就是这面旗帜，影响很大；二、五色旗，旗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我国古代以这五色为正色，其余都是间色，五色并列象征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和。上海光复，宋教仁、陈其美在苏浙沪等地使用；三、井字旗，廖仲恺和陈炯明在惠州一带扯起的旗帜；四、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武昌起义成功，异常振奋，亲手为在美华侨团体绘制的旗式图样，标定格式及尺寸，主张定为国旗。1911年12月，各省都督代表云集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召开共和联合大会。江苏都督程德全代表江浙沪提出以五色旗作为国旗，获与会代表通过，并把武昌首义的十八星旗作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作为海军旗。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正式议决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并由大总统颁令全国。

1914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在他撰写的《革命方略》中，明确规定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党旗。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由非常国会明令废除五色旗及十八星旗，统一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五色旗作为国旗，在人民心里影响深远，尤其是在吴地，更是深入人心。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重新制定《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明文规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替代五色旗为国旗，五色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数千年来，江南古镇，舟楫始终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黎里民众粜米卖柴，送往迎来，桩桩件件仍然使用大船小舟。水乡的缆船石就如北方的栓马桩一样重要，一样实用，一样星罗棋布。缆船石，水乡泽国生生不息的历史见证，五色旗，更是烙上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印记，烙下了黎里人民的政治觉悟。

过去，江南所有的市镇都有相当数量的缆船石，据甪直文保所人员统计，甪直镇有过1000多颗，可惜现在只剩50来个。黎里而今保留254颗，算是江南古镇最多的了，但这个数量仍然不到原先的一半。河埠头与缆船石的数量有个定式，一个双落水河埠，一定伴有4个缆船石，单落水河埠也有3颗。现在的江南古镇，河埠头大多保留着，我们只

五色旗



要点数河埠头的多少，就可以推算出原先的缆船石数量。算下来，我们不得不惊讶缆船石的数量。用直文保所人员说用直过去有过一千多颗缆船石，一点也没有夸张。

缆船石之多，是江南手摇木船的数量决定的，其中最多的是农船，还有名称各异的航船、不同种类的渔船，以及为适应不同行业需要而制作的其他小木船。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家”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每家每户必须拥有一条农船，人称“田装船”。罱河泥、扒草灰、运秧苗，上街、赶集、探亲、运肥、粜谷、采桑、婚娶、丧葬，都离不了田装船。这种船江南随处可见，各地对它的叫法不尽相同，浙北叫“摇摇船”，浙江温州一带的田装船安有四舱，所以浙南就称为“四舱”，黎里民众则称为“罱泥船”。

缆船石，还有河埠头，映现出明清两代江南市镇发达的专业经济。自从明代开始，江南的市镇形成了粮食、棉花和丝绸三大经济板块。浙江的新市，驳岸上雕刻了“嘉禾”缆船石，在蚕桑丝绸专业市镇的驳岸上雕刻着“蚕”形缆船石。专业市镇，虽有分工，但并非绝然排斥，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明清两朝，黎里属于粮食专业板块上重要的一个点儿，不过黎里并不乏从事棉布和丝织的人家。时至今日，那驳岸上和河埠头，一颗颗生动的“蚕宝宝如意”，昂着脑袋，好象正在吐丝，正是蚕丝留下的印记。

明朝开始，江南重要市镇的四乡，经营水稻的农家日渐减少，致使江南这个米粮仓发生了质的变化，终于由“湖广熟，天下足”取代了“苏湖熟，天下足”。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湖广地区的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江南农业生产的新变化。江南农家的经营方式不断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改变了传统的结构，把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结构变为经济作物为主体，本来的粮仓变为缺粮区。缺乏粮食当然不行，于是，一批专门经营粮食的市镇出现了，他们从

湖广地区调运大批粮食，分运各地供应需要。这些市镇以枫桥市、平望镇、同里镇、长安镇、新市镇、皂林镇为代表，黎里镇也跻身其间，四乡农村固然种植水稻，出产大米，但更多的是运进湖广的大批粮食，且看现在密密匝匝的河埠头，一颗挨一颗的缆船石，是大小米行遍布，大驳船运进，再派小船四处调运的历史见证。



蚕宝宝如意

黎里的河埠头缆船石上，当年系缆的，除了农船，还有更多的专业市镇的专用船只。无锡西樟船、江苏常熟船、上海浦东船和杭州驳船等，是米业的专用船；浙北的农村手划船，是运输丝绸的专用船，撬舫船，那是专运棉花的船只。

缆船石的雕刻，有浮雕有透雕，也有平雕，从不加藻饰到逐渐增加藻饰，从简单到日趋复杂，从单一的景物到多种事物的组合，处处打上了民风民俗和心理印记。江南缆船石的种种艺术，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寄托着美好的理想，蕴含着丰富的追求。五色旗之

类的缆船石，寄托着深刻的理念，从纯粹的民间艺术上升为现实主义的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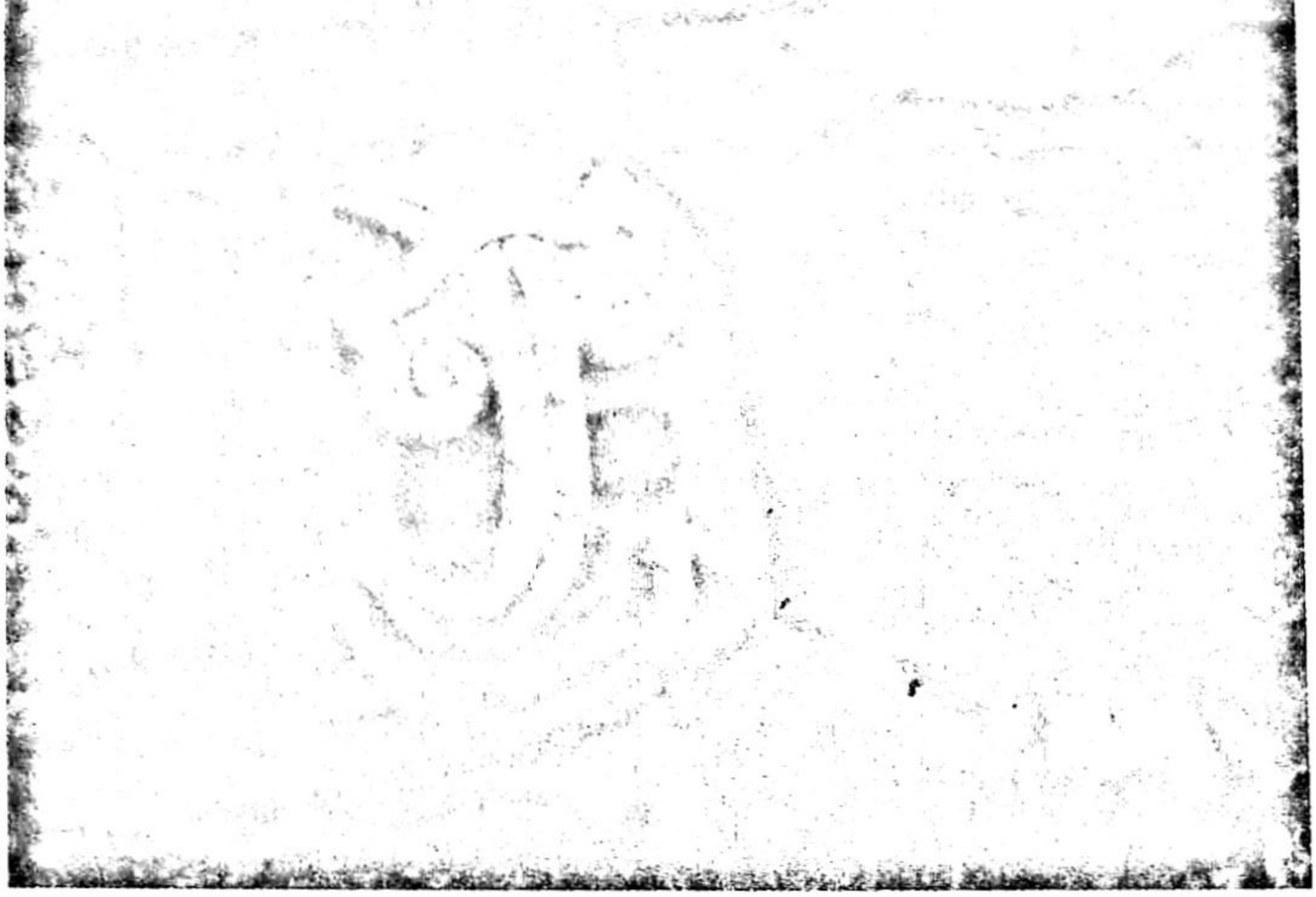
黎里的缆船石，雕刻千姿百态，即使是同一品种，也决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据老一辈的石匠师傅说，缆船石的纹饰，大多由



平雕佛八宝

石匠老师傅雕出范本，其他石匠及徒弟根据样品进行批量生产。由于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执钎者有较大的自由，可以即兴发挥，可以别出心裁。看看数量最多的如意吧，有的河埠及驳岸上连续出现，从形式看就有竖式如意、横式如意和S形如意，从雕刻形态看，有舞女如意、童子面如意、猫面如意、狐面如意、河蚌如意、蝴蝶如意、蚕宝宝如意……黎里人民的居室、器用、环境，不仅实用，更蕴蓄着深沉的文化内涵，就连这小小的石雕缆船石，在灵巧的匠师手中，竟也打理得如此的灵动，如此的细腻。

观赏缆船石，让人们欣赏到它轻捷灵动的雕刻美。大凡石雕艺



术，风格不外乎沉稳重实，硕大浑厚。而缆船石雕刻的图案，不管动物，还是植物，乃至静物，显现的总是轻松的形态。它们的形象结构、刻画手法，都洋溢着灵动的活力，充满了和谐的韵律。

缆船石上的动物图案，黎里的雕刻者大多选取惹人喜爱的小生灵，比如蝙蝠、猴、狐和猫，每一样都是那么小巧可爱。大一点的，蹲在如意上的一头鹿吧，竖起耳朵，机警地聆听着四围的动静，似乎稍有动静就将腾跃而起。

小生灵是这样，那么大动物大象之类呢？本来庞然大物，笨重之极，可是雕刻者经过巧妙的艺术处理，他们只选取象鼻，寥寥几笔，有写意的，也有工笔的，恰到好处，就举重若轻了。

缆船石上的植物，最多出现的是芭蕉、石榴、桔子、桃子、灵芝、葫芦，随便哪一样都没有沉重的感觉，都是人们源于生活的爱物，赏心而悦目。

对于无生命的静物，雕刻者的处理手法更多。最常见的手法是赋予动态感，系上飘带。比如定胜、金元宝之类，雕刻者给它们以衬托，以装饰，缠绕上飘带，蔓长的飘带，上下翻飞，远远望去，大有飞升之势。像犀角之类就给它一种张力，将犀角雕成弯曲变形的

富有弹性的单犀角

态势，一种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似乎蕴含着相当的能量，马上就将反弹。

再有就是赋静物以生命，那俯拾即是的如意，就有狐面、蝴蝶、猫头、河蚌、蚕宝宝如意等繁多的类别，听一听它们的名字，此类如意的灵动活泼已经跃然眼前。

拟人化也是常用手法，匠师们十分擅长把无生命的物品雕琢成活生生的人，比如童子面如意，舞女如意。前者天真幼稚，可爱至极；后者秀色可餐，各具情态。全都有头有脸有眼睛，姿态优美，细腻柔婉，亭亭玉立。有直挺的，有曲屈的，更有一波三折的。个个腰缠彩带，裙裾绵延，左顾右盼暗送着秋波。站在河埠头和石驳岸

旁，犹如欣赏一幅仕女长卷，徐徐展开，一群群轻盈之极的蜂腰美女，正翩翩起舞，妩媚婀娜，多姿多态，她们娇嫩的躯体中蕴蓄着美女们的万种风情。

数千年来，江南古镇，舟楫始终是最主要的运输工具，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江南民众粜米卖柴，送往迎来，桩桩件件仍然使用大船小舟。水乡的缆船石就如北方的栓马桩一样重要。记得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对人类社会实践作了全面考察的基础上，从揭示劳动本质、人的本质着手，揭示了美的本质。他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人的实践活动是人对世界审美的基础。缆船石雕刻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正好是人们在从事社会性的劳动中“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美，既美化自身也美化周围的环境，缆船石的美，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

缆船石上的吉祥图案，来源于生活，创造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那些能工巧匠的即兴创作堪称民间艺术的瑰宝，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透过缆船石艺术的图案，我们似乎看到了它内部蕴含着的神奇吸引力，也看到了长期以来，淳朴勤劳、心灵手巧、敢想敢干、不断前进的黎里劳动人民那丰富多采的内心世界。

童子面如意



三、古桥

江南市镇，水多桥也多，黎里就是这样一个多桥的古镇，且听老话“出门就是两座桥”、“三步上下两座桥”，可见古镇桥梁之多。黎里古镇东自中立阁西到望平桥，南自通秀桥北至褉湖道院，在0.45平方公里的地面上，雄踞着30座形态各异的石桥。由于建设性的破坏，好几条小河被填，石桥没有了，又为了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好多石桥改建成水泥桥。时至今日，黎里古镇保留着12座古桥，其中原汁原味的有8座，略作改建的4座，基本面貌不变。

桥的形态

12座古桥，各各不同，大桥小桥修短合度，秾纤得宜，各呈其美。青龙桥、望恩桥和道南桥是拱桥，迎祥桥、清风桥为梁式三孔，进登桥、梯云桥等则是梁式单孔，还有一座较为特别的“叽咯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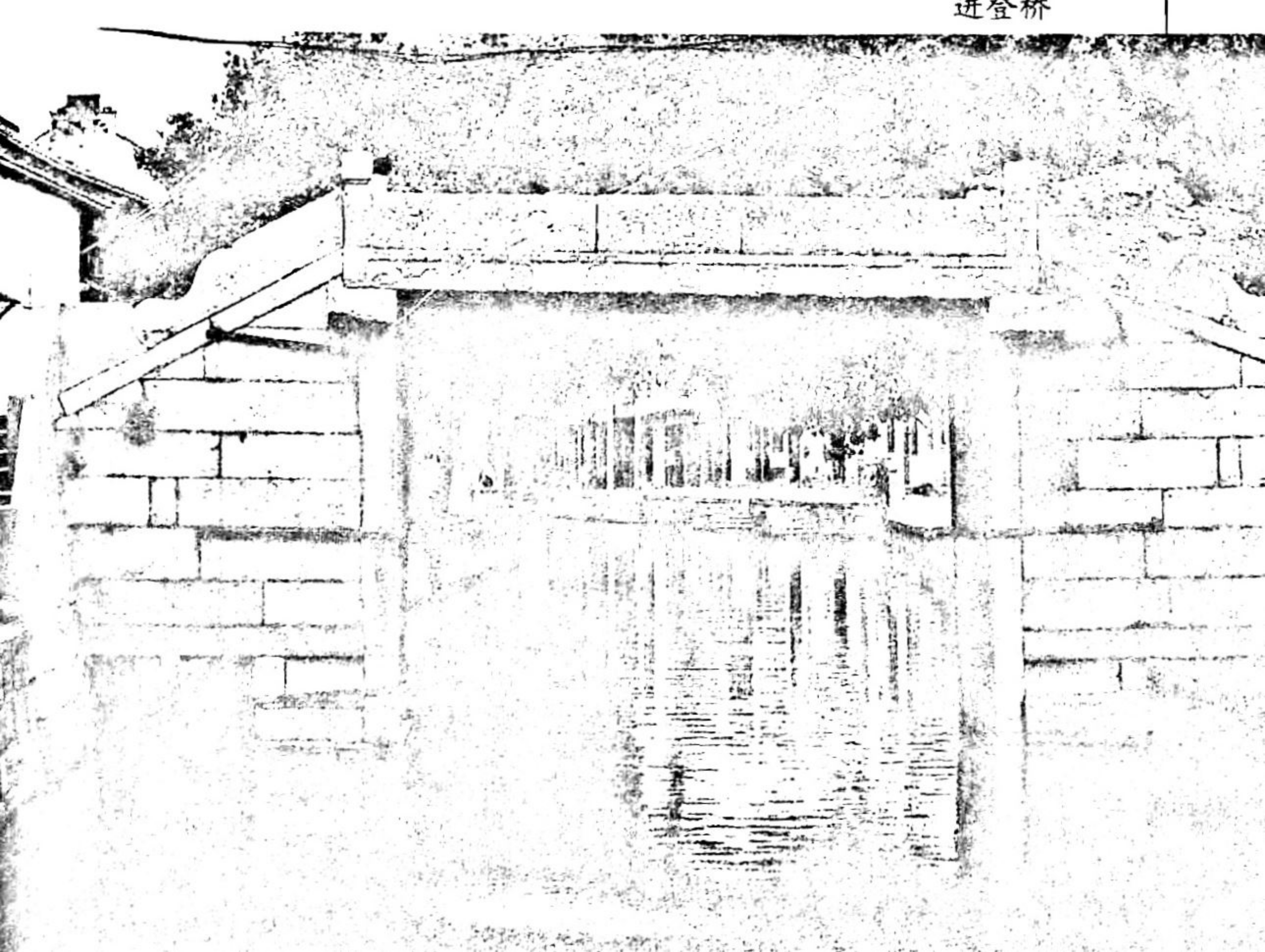
迎祥桥等三孔梁式石桥，高高耸起，大有临空飞架的不凡气势；梯云桥和进登桥单孔梁式，犹如苍龙横卧市河。青龙桥和道南桥等拱桥，桥面设计独特，上狭下宽，呈喇叭形，拱圈都是半圆形的陡拱型制，有诗赞扬：“弯弯飞桥出，敛敛半月彀”，拱桥就好象半个月

亮，又象一张扣在市河上的弓，在古人的眼里，沉重的石桥竟变得这么轻盈，大有欲飞的架势。市河水平如镜的时候，那水上的半圆就和水下的半圆衔接起来，组合成一个浑厚的圆，有虚有实，又动又静。

圆拱桥曲线柔和，形式美观，梁式桥横平竖直，轻快明朗。它们的桥头落坡，因地制宜，灵活而又多变。新丰桥的桥面不太高，两头的街道比较宽阔，于是两头都是垂直于市河的单落坡；迎祥桥桥面高爽，北岸紧接热闹的商业街，于是南岸单落坡，北岸安排成双落坡；进登桥两头都是商店，因此南北全是双落坡。结构不拘一格，图的是方便过往行人，适应繁华的街市。

进登和梯云两桥，是建于镇中心的单孔梁式桥，聪明的黎里匠师在桥墩内侧各增建了一个泄水孔，减少了桥身承重，发大水的时

进登桥



候，增大了水流量，减轻水流对桥墩的冲击力，延长了桥的寿命，两两对衬的泄水孔，又增加了美观，一举三得，真乃独具匠心的创造。

那横跨伏虎洞和禊湖道院的秋禊桥，由石梁与石板组合而成，此桥又名“叽咯桥”。梁式三孔，花岗石砌筑，东西向，桥长18米，桥宽2.10米，两边是条石，中间搁着35块长方形石板，行人走在石板上，一半的石板会发出“叽咯叽咯”的响声。这里是黎里的风光带，“禊湖秋月”属于黎里八景之一，烧香的、赏月的、溜达的，人来人往，从早到晚秋禊桥“叽咯叽咯”响个不停，因此就有了“叽咯桥”这一形象的名字。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国家形势江湖日下，黎里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愤懑之极，

他带领吴江及周边的南社社友组织成支社，名曰“酒社”，定期在叽咯桥畔的金镜湖上泛舟集会，边喝酒边吟诗，常常喝得醉熏醺的，就痛骂袁世凯，指责主和派，留下了许多感叹时事的诗篇。

桥的建造

佛教文化在中国广为流传，黎里自古多佛寺，最著名的有罗汉寺，相仿的寺庙不下三四十座。黎里的道教同样发达，著名的有全真道院，还有禊湖道院等道观10余所。在僧侣和道士们眼里，修桥铺路是善事，因此他们积极参与造桥。黎里又多书香门第，读书士子众多，黎里可以说是典型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宝地，佛道二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酝酿出了黎里的历史文化，在桥梁上就留有文人墨客与僧道携手的一段段佳话。

翻开清代的两部黎里镇志，太平桥、进登桥、民悦桥、清风桥、渡僧桥、青龙桥不是僧侣和道士募捐集资初建，就是由他们斥资修建或重建。一些桥本身与寺庙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甚至就建

在庙内。如大陵桥，南北都是寺庙，老百姓干脆不称大陵桥而叫“庙桥”了。秋禊桥和宛转桥则径直建在寺庙之内。这些桥本身是进庙的重要入口，或成为寺庙的组成部分，俨然凡俗界进入佛门仙境的必由之路。

乡绅或市民出资建造的桥也很多，随便点一座都是，不是首建，就是修建或重建。太平桥、浒泾桥、夏家桥、明月桥、里仁桥、望恩桥，都是由乡绅一家或者几家联手建造的。读一下道南桥上面镌刻的桥联吧：“康熙五十一年里人陈永年捐建，光绪二十有三年阖镇士民重建”，上联说了初次建造的出资人，下联介绍是全镇士民合力重建。根据镇志记载，重建主要由张鸣驺、蔡甲先、沈正模三家捐资，再加镇上其他民众的捐献。

有一座桥，虽然偏离市镇中心，时至今日也已改建，但“兄弟桥”这一桥名至今仍然活跃在人们的口头。清代，西杨蟹鱼港有个黄瑛琮，一生务农，他看蟹鱼港上只有一座小木桥，叽叽嘎嘎的，常常发生危险，黄痛感村民的不便，下决心要建造一座石桥。嘉庆2年，已过花甲之年的黄瑛琮倾尽家产请工匠造桥，动工过半时，钱财不够，黄又动员弟弟出资，最后终于圆满落成。村民们有感于黄家兄弟的功德，最后将桥名定为“兄弟桥”。

黎里流传着造桥的老话，“烧香拜佛一场空，建桥铺路大有功”，早在明代嘉靖年间，有一位从秀水（嘉兴）嫁到黎里王家的姓史的女子，丈夫王同化早亡，没有子息，她不象一般烈女那样为夫殉节，争什么烈女牌坊，而是守着田产，节衣缩食，积攒银子。嘉靖42年，她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罄其所有，为黎里镇建造了接贵和通秀两座石桥，一梁式一拱型，至今传为美谈。

也有官倡民办的，明月桥和里仁桥，建于元明时代，清嘉庆年间两桥已近坍塌，嘉庆20年，分湖巡检锺清源首先拿出俸银，又率黎里百姓合力重建。

桥的功能

江南水乡，无桥路不通。黎里的桥，首要功用当然是连接道路和贯通街市。作为吴江巨镇，黎里宋元以来就是商业的中心，桥的作用非常重要。

桥的旁边一般总有店铺，这里大多是道路的交汇处，或十字交叉，或三叉路口，闹猛得很，店铺的生意特别兴旺。桥头总是重要市场，茶馆、酒楼、酱园大多傍桥而设，黎里镇独具风情的“上岸”“下岸”和“横街”哪一条不是因桥成市？

建于镇四周的石桥，还负有护卫全镇的功能。镇东的青龙桥，镇西的子来桥，南边的通秀桥和道南桥，还有北边的望恩桥，明清时代，都用整根的木头加上铁链组成水栅，由专人管理，晨启暮闭，外来船只没有允许不得入内。明清时期，除了船运还是船运，就是到了民国，黎里的交通运输依仗的仍然是船。抗日战争时期，小日本面对黎里石桥的水栅，望而生畏，不敢贸然进入。

黎里镇四围的石桥，古人认为可以锁住祥瑞之气。请看青龙桥的东侧桥联：

长虹高挂千门月，巨锁遥连万顷云。

青龙桥真如一把巨锁，不但锁得日本鬼子胆战心惊，而且还锁住了黎里的文运。黎里的先祖认定市河就是龙脉，风水佳，文气足，应考科举晋身仕途的官员，不会少于三斗三升。传说明初善看风水的刘伯温来到黎里，他一看黎里的市河，断言凭这龙脉，本地以科举入仕者将与三斗三升芝麻绿豆的数量相仿。为了不让文气外泄，黎里在镇四围建起了石桥，而且还设下了栅栏。

石桥还是观景的好场所，黎里镇西头有座梁式桥，高踞河上，登高西望，眼空无物，视野开阔，邻镇平望就在眼前，故而取名“望

平桥”。不仅是望平桥，镇四周的石桥都能观景，每当晴日，天朗气清，各种景物尽收眼底，向北可以望见苏州七子山、上方山和虎丘山，令人心旷神怡。

石桥又是休闲的好处所。桥栏一般不高，总在40至50厘米，宽20厘米左右，相当于一条石凳。望恩桥上建有亭子，那里的桥栏更是考究，两排舒适的“美人靠”。

夏天，石桥是纳凉聚谈的好去处，黎里素有点桥灯的习俗。每年夏季，太平桥、相家桥、汝家桥、夏家桥、庙桥、杨家桥、亭子桥等十余座桥上都要点桥灯。先在桥的四周立下四根木柱，上架横木，每根横木上每隔二至三尺下垂一只铁钩。木柱的中心直竖一根旗杆状的立柱，上面吊一滑轮，生一根长绳。灯分三种型号，立柱四角的灯最大，一般高40厘米上下，圆径大约30厘米;横木上的其次，高约30厘米，圆径约20厘米。天灯最小，高不超过15厘米，不是一盏，而是一串9盏，颜色各各不同。四角的灯和横木上的灯，全是白色，书有隶书或宋体的毛笔字。写的全是佛道神灵，关帝圣君、茅山应化真君、元始天尊、太上老君、文昌帝君、雷祖大帝、正乙玄坛、五福昌王、文殊普贤等等。负责桥灯制作费用的一般是就近的店铺，每晚店铺内的伙计按时点灯。每年7月初1开始，为期一月，到7月30日点地藏香之日结束。

没有电灯的时代，夏天人们需要纳凉，也需要交往、交流，点上桥灯，方便人们聚会。一闪一闪的桥灯，照亮了潺潺流淌的市河，成为黎里夏夜一景。淳朴的灯景，一直延续到民国后期，直到黎里全镇都安上了电灯之后，桥灯才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最早的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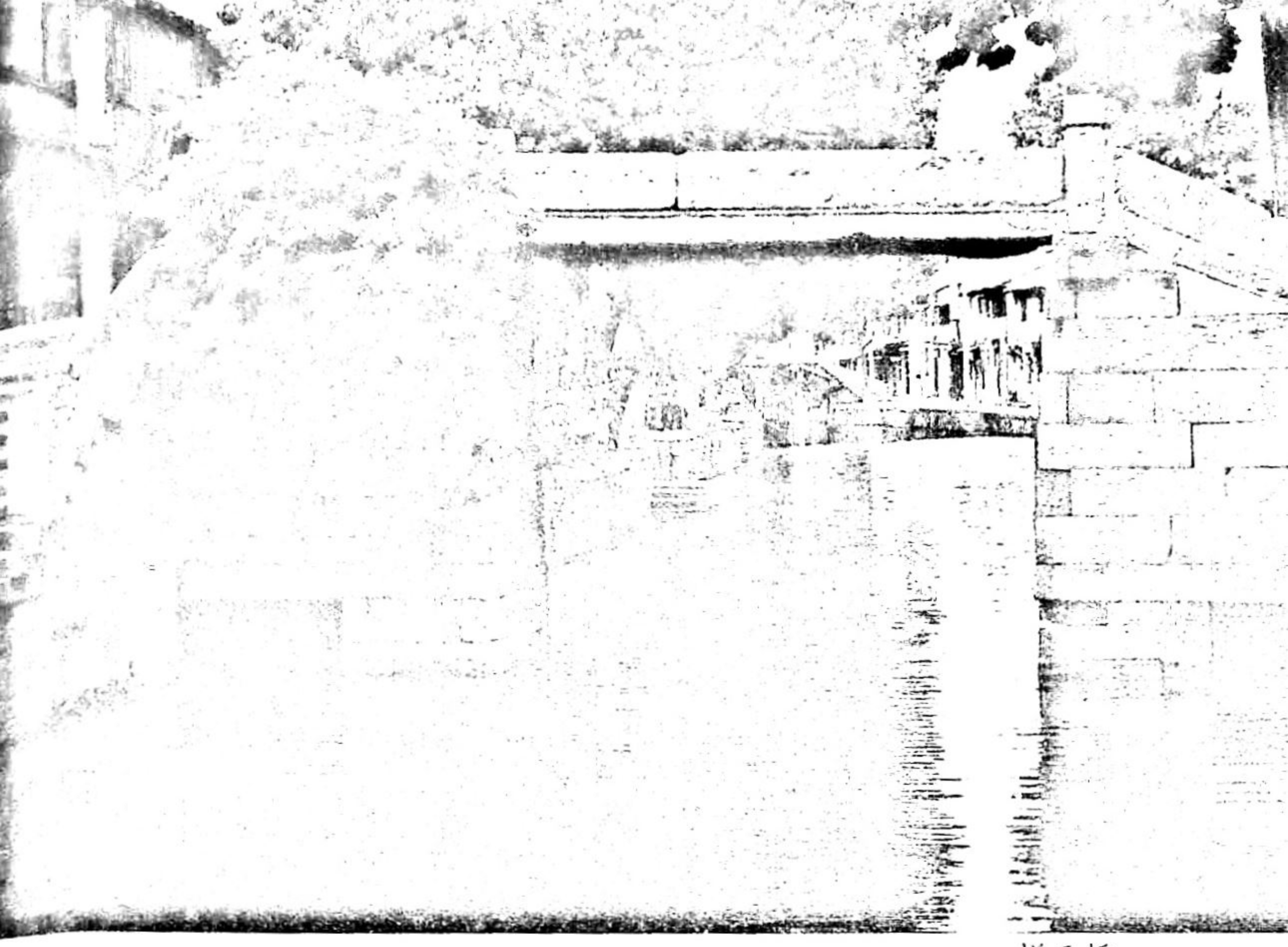
黎里每座桥都有历史，都有故事。

黎里最早建造的桥是宋桥，主要有两座，明月桥和大陵桥。明月桥，俗称“杨家桥”。《黎里志》记载说“初建无考，元大德3年游方僧再建”。大德3年，公元1299年。《黎里志》问世于公元1805年，编撰者徐达源属于私家修志，限于种种条件，徐氏难于确定初建年份，明月桥的初建年份肯定还要早些。一座桥建成到再建，一般总要上百年，至少得五、六十年。大德3年推前50年是1249年，那么是南宋淳佑9年。难于确定初建年份的还有好多座，梯云桥、进登桥、清风桥和大陵桥都是。

我们再看看大陵桥，《黎里志》:“大陵桥，跨作字染字两圩，初建无考，明成化13年（公元1477年）道士吴云山重建。”现在根据专家学者考证，大陵桥可以确定初建于南宋。首先，从现存的石质来看，目前的大陵桥是梁式桥，由五块长条石组成，最西边的条石长5米有余，宽约1米，标准的武康石。江南水乡，尤其是苏州四乡的市镇，南宋时期建桥，几乎全用武康石。江南古镇专家、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来到黎里，基本确定该桥始建的年代为南宋。其次，大陵桥，俗称“庙桥”，一桥挑二庙，它的南岸是财神庙，北岸是全真道院，黎里最大也是最早的一所道院，所以黎里人称全真道院为“大庙”。此庙始建于南宋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建庙往往同建桥同时并进，至今江南流传着所谓“庙庙有桥，桥桥有庙”的谚语。因此，大陵桥与全真道院建于南宋。大陵桥与明月桥是黎里最早的桥。

最窄的桥

黎里最窄的桥是梯云桥，俗呼唐桥。此桥《黎里续志》有记载:初建无考，清乾隆和光绪分别重建。民国二年（1913年）再建。民国再建时，桥孔的宽度有变，上宽3.9米，下宽3.7米，成为倒梯



梯云桥

形，留下了一段真实的故事。

黎里，一条三里长的市河由西而东把全镇隔成两半，全仗市河上那十座石桥，沟通南北，方便两岸民众。十座桥九座是丈三以上开阔，独有镇中心的唐桥最最狭窄，只有丈一，把个黎里市河卡成亚腰葫芦似的。

唐桥只有丈一的情委理曲说来话长。事情发生在民国二年，那是老船爷华之洞与新船爷陶二斗法的产物。

华之洞是黎里镇的船爷，拥有良田千亩，打造了两条梭飞船，一名华新，一名华兴，备有“拨倒厅”和“茶酒担”，成龙配套出租给婚丧喜事的人家，独行生意，财源滚滚，一家老少活得悠哉游哉。

不料乡下有个财主陶二，竟然想同华船爷别别苗头，他打造了两条更大更气派的梭飞船，外加买了两条小舢舨，也备了拨倒厅和

茶酒担，大有压倒华之洞的架势。

江南水乡遇到红白喜事都要租用梭飞船，这种船二篷两橹双篙，雇佣的水手又都是好把式，据说这种船象梭子一样来往如飞，因此称为梭飞船。拨倒厅是一种可以临时装拆的简易廊棚，一般用红松做架子，上面盖上抹过桐油的竹榻子，晴雨两用。茶酒担就是茶壶酒壶盆盘碗筷，有时还兼带拆卸八仙桌和长凳椅子。遇到红事白事的人家拖不开场子，就租用拨倒厅茶酒担在空地上设宴办酒。

民国二年初夏，下丝村的王老头死了，儿孙们决定让王老头风光风光，向新船爷陶二租了一大二小三条船游丧。游丧线路，由西向东穿过三里长的市河，绕过镇东的北角亭再向北沿后长荡回村安葬。新船爷的两条翘头小舢舨在前，一条开道，一条放铳，那条新打的梭飞船，全船朱漆金光雕花画彩，当中两条舱跳，二尺阔半尺厚，从船头直通到船梢。灵柩就安放在船正中，下垫红毡毯，上放万年兴。两旁挤满了披麻戴孝的儿孙。后面六只乡下赤膊船，坐的全是功服、缌麻的小辈。

游丧船摆开 一字长蛇阵，顺风顺水直穿市河而来。锽——锽——锽，通——通——通，小舢舨上锣声铳声响了起来。梭飞船上的水手身手矫健，上身白竹布紧身马甲，九档头排纽，下身玄色灯笼裤，脚穿黑色步云鞋，一样的打扮一样的健壮，动作干脆利落，步伐矫健有力，步云鞋上那一对蓝色绒花更使脚下生风。双橹两篙，合着号子一齐发力，激得船头的水声呼啦呼啦作响，梭飞船箭一样地射向镇中心的唐桥。

新船爷陶二缓步从茶馆里踱出来，黑胖的脸上那一双肉里眼高兴得只留下一条细缝，左手托着紫砂茶壶，右手捻着下巴上稀稀拉拉的几根胡须。借着锣声合着铳声，两只小舢舨直冲唐桥，梭飞船载着一船哭声犹如一把巨大的梭子飞了过来。轰—— 一声巨响，震得地动山摇，震得船上噎住了哭声，震得两岸看热闹的人大惊失色。

唐桥抖了三抖，剧烈的磨擦使船舷冒出了阵阵青烟，拼命往前窜的梭飞船痉挛着，被两个桥墩牢牢地卡住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船头刚过桥洞，前舱的船舷就被死死的卡住了，丈二的船竟然被丈三的桥洞卡死了。

满心欢喜的陶二足足三分钟没有回过神来，只见他气急败坏地奔到河埠头，声嘶力竭地命令："退船，退船，快退船！"可是，丧家坚决不肯，自古以来，只有送丧的规矩，没有退丧的道理，退丧是要触霉头的！唐桥咬死了梭飞船，立时招来了全镇百姓，人声鼎沸，舆论哗然。几个有头脸的人物最后定了调子：退丧是不行的，黎里不能破这个规矩！

陶二满脸通红满头大汗，沙哑着嗓子，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砍砍……砍掉船舷子……"两个水手跳上岸，从棺材店里借了两把大斧，乒乒啪啪一阵子，船舷子变成了碎木片掉到了河里，随着旋涡转走了，砍了船舷的梭飞船，赤膊鸡似的灰溜溜地向东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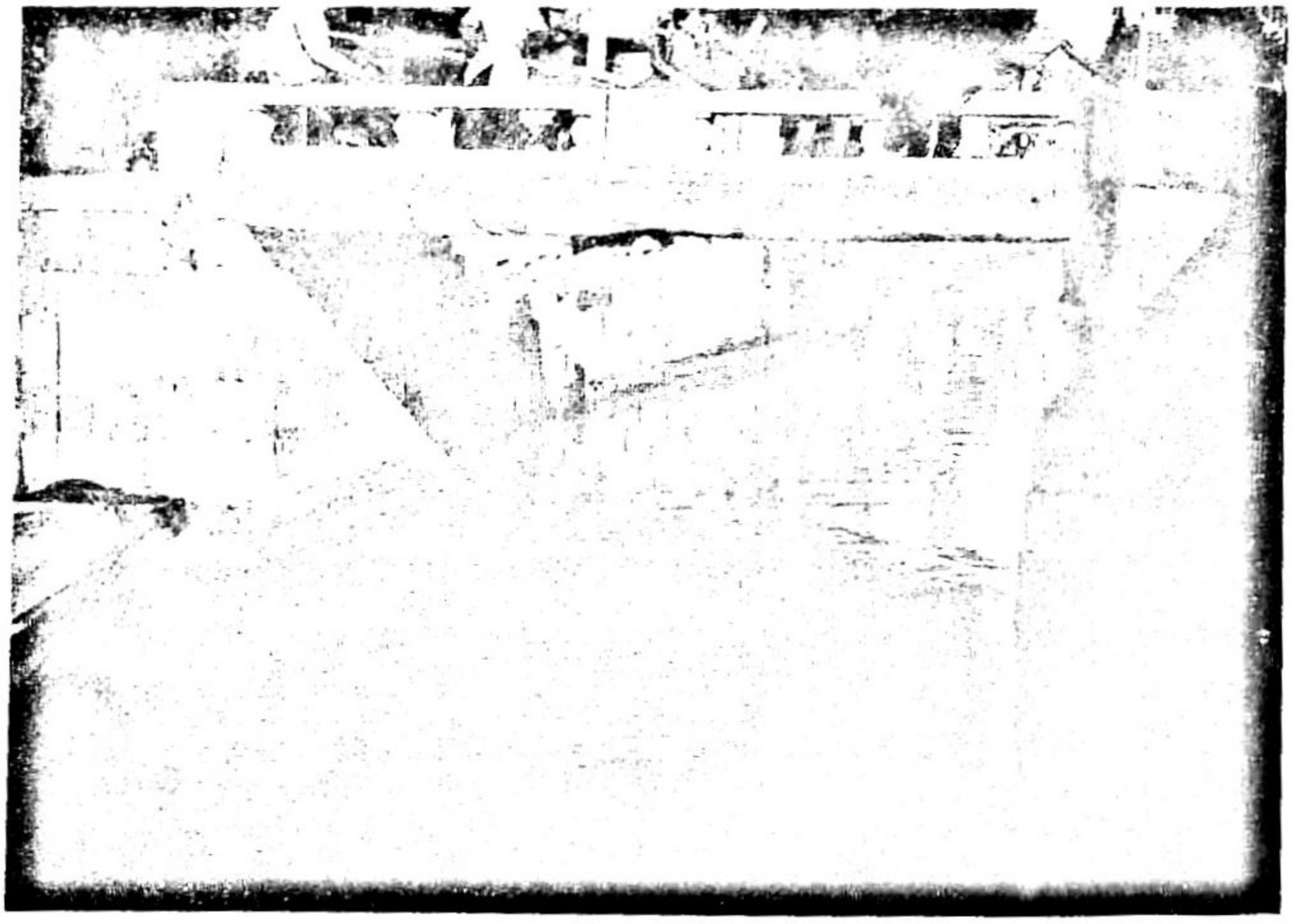
这场好戏的导演就是老船爷华之洞。想当初陶二在乡下打造梭飞船，华之洞又气又急，恨不得立马宰了陶二这只田墩狗。也不知是哪位菩萨显的灵，黎里镇中心的唐桥正好重建。横跨市河的石桥共计10座，每座的宽度都超过丈三，照老例重建的唐桥也应当是这个尺码。阿弥陀佛，华之洞突然心生一计，马上化钱雇了一个江北小叫化子到陶二家去。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叫化子来讨几个小钱要几口冷饭，丝毫没有引起陶二的注意。不过，傍晚时分，华之洞已经知道了陶二的梭飞船长三丈六，阔一丈二。

接下来，华之洞成竹在胸，登门造访了桥把头，到底送了多少银元，至今谁也闹不清了，反正唐桥，也就是梯云桥的两个桥墩成了升箩形，上面宽丈二，下面宽丈一。解放后，这座梁式单孔石桥，作为文物保护至今，完好无损。每当水浅时，老一辈总要指着倒梯形的桥墩说起华之洞和陶二的那段历史。

“道儒拙演”的桥

都说道家清心寡欲，儒生清高孤傲，却不料，为了钱财，在庙桥两边，演出了一场滑稽戏。至今黎里的百姓有句口头禅：“道儒拙演在庙桥”。

大陵桥



话说大庙全真道院，天天香烟缭绕，香客们随愿乐助，功德箱内捐钱捐银，财源滚滚。

晚清时间，黎里有几个秀才，不肯苦心勤读，中举无望，于是缠在一起，竟然打起了大庙的歪主意来。他们凑了几十亩田地，放出风声要捐给全真道院作庙产，公推张秀才为头头，目标是当庙董控制道院的财产。大庙的道长，也非等闲之辈，素与苏州玄妙观有

联系，嗅出味道不对，专程赴苏州到观前街一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作了禀告。在玄妙观道长的支持下，大庙不理不睬，秀才们所谓的捐赠不予接收。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秀才们购买了对岸庙桥弄弄堂口的几间店面，建起了三楼三底的财神庙，当中一间建作跨街楼。财神菩萨又叫路头菩萨，因此财神庙又叫“路头堂”，又因为同大庙相对，就称之为小庙。明朝以来，庙桥弄就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商家店铺满满档档，人气非常旺盛。秀才们一手拿如意一手打算盘，自认为财神庙一建，所有祈求发财的男女老少，肯定前来烧香。

可是黎里的香客毕竟有限，再说人也不可能天天烧香。为了发财，一大一小两座庙，纷纷施出浑身架数，争夺起香客来了。大庙的道长，派出了小道士在庙桥上，上岸和下岸的街道上拉客。路头堂里的秀才们同样也派人四出拉客。一旦有客人进庙，他们就千方百计地要人“随愿乐助”，本来功德箱内捐铜钿，全凭自愿。可这“随愿乐助”在他们嘴里一遍遍地重复，一遍遍地唠叨，不知怎么的就变了味儿。对此，黎里以及四乡民众，日益反感。道家本应倡导清静无为，儒家历来以清高为本，竟都染上了铜臭。于是“道儒拙演在庙桥！”一语出在众人的口中，流传至今。

“厚脂纳得”的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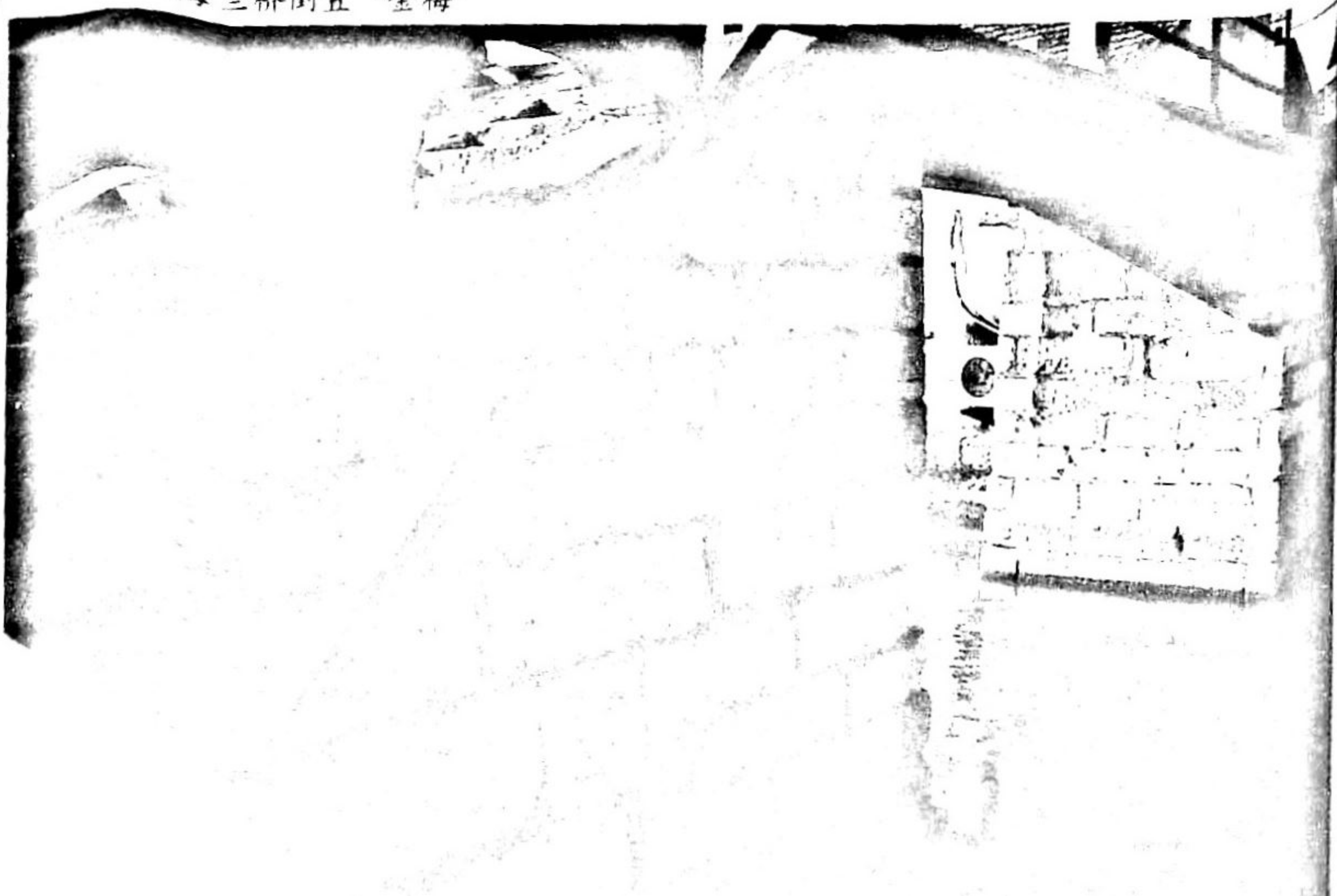
黎里镇东九成湾，有座民国年间建造的梅兰桥，沟通南北两岸，镇上老人往往在桥名前加上“厚脂纳得”（黎里土话，就是涂脂抹粉的意思）四字。原来，这里有一段真实的故事。

黎里镇九成湾是个热闹地段，南边连接着好几个相当规模的村落，最大的村叫荡上，村民成百家，再加临近的浙江南湾、廊下、田乐等乡村，那里的村民购物办事到黎里上街，走九成湾最为便捷。可

是，从荡上到镇东头，隔着两条河，都只有一只曳渡船，靠行人自己曳船过河。两条河水流又急又深，一到发水时节，更是湍急无比，经常有人落水，每年总有人在这里溺水身亡。因此，大家都希望这里能够造石桥。

民国18年，荡上到黎里九成湾建起了第一座石桥。说起建桥的起因，倒也算趣事一桩。黎里有两个生意人，诸葛储南和汪星伯，他们喜听评弹《杨乃武与小白菜》，听说小白菜毕秀姑在浙江苍前镇的尼姑庵内当尼姑，决意要见一见小白菜。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向尼姑庵的师太说了一大堆好话，答应不谈往事不提问题，又捐了8块大洋，才到得庵内见到了小白菜。尼姑庵内，一位年逾古稀又饱经风霜的老尼姑，对着两个年近不惑的商人进行了一番絮絮不休的告诫，其核心不外四个字："多做善事"！不久，诸葛储南和汪星伯

梅兰桥倒置"金梅"



合力在荡上到黎里九成湾之间的小河上造了一座石桥，从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定为“南星桥”。受到合镇百姓和四乡农民的称赞，黎里镇上20多位头面人物与诸葛储南和汪星伯在桥上合影留念。

可是荡上到镇上，还有一条河，就在九成湾，湍急的水流使曳渡船时不时发生险情。南星桥落成后的1931年，有个姓金的商家愿意独资造桥。金家在清末民初经商得法，乡下有好几百亩良田，镇上开有米行、酱园、油厂和南货店，还经营着黎里镇明星发电厂，财源滚滚，很快就富甲一方了。在九成湾建桥，这是造福当地的大好事，人人赞成。桥址选择恰到好处，南面是糖坊，桥北左右分别是王宝和豆腐店和东莱阁茶馆。建桥非常顺利地进行着，不料，在桥即将建成的当儿，桥联，特别是桥名，遭到了众人的非议。先看桥联：

朝东的一联是：新建设，遥接揽胜；利交通，近接南星。

朝西的一联是：万人殷响，功比慈航普渡；两岸钩连，德存众口成碑。

前一联，镶嵌了两个桥名，东边是黎里著名的八景之一的揽胜桥，南边就是诸葛储南与汪星伯斥资所建的南星桥；后一联，把造桥的功德与观世音并提，吃定众人有口皆碑，不由人产生了某些反感。

最难接受的是桥名。捐资者丈夫叫金梅钦，妻子叫沈兰芬，他们效法“南星桥”的取名，先在名字中各取一字，忽发异想的是还要在前面加上姓氏“金”，定名为“金梅兰桥”。消息一出，连日来东莱阁茶馆里，座无虚席，沸翻盈天，大家都在议论桥名的事。修桥铺路本是行善积德之举，现在变成勒石留名的举措，多数茶客认为金家的脸皮确实够“厚脂纳得”的了。众人的议论归议论，可金家照样把桥名刻上了石碑，这一下可动了众怒。

再说，九成湾附近的房子及道路，大半属于镇另一富户周湛伯

的，周决定出面交涉，因为桥北堍五福居和东莱阁茶馆都是周家的房地产，两开店面之间的道路当然属于周家，于是周氏提出，如果金家执意让桥姓金，那么桥北堍的地面将不让姓金的通过。

当时，民事纠纷大多在茶馆里让众人评说，俗称“吃讲茶”。周家扬言同金家在东莱阁茶馆吃一回讲茶，让黎里的父老乡亲评出个长短来。金梅钦总算还点儿自知之明，知道东莱阁茶馆里的舆论对自己不利。于是决定让步，去掉“金”字，改刻成“梅兰桥”。又几经周折，才勉强获得众人的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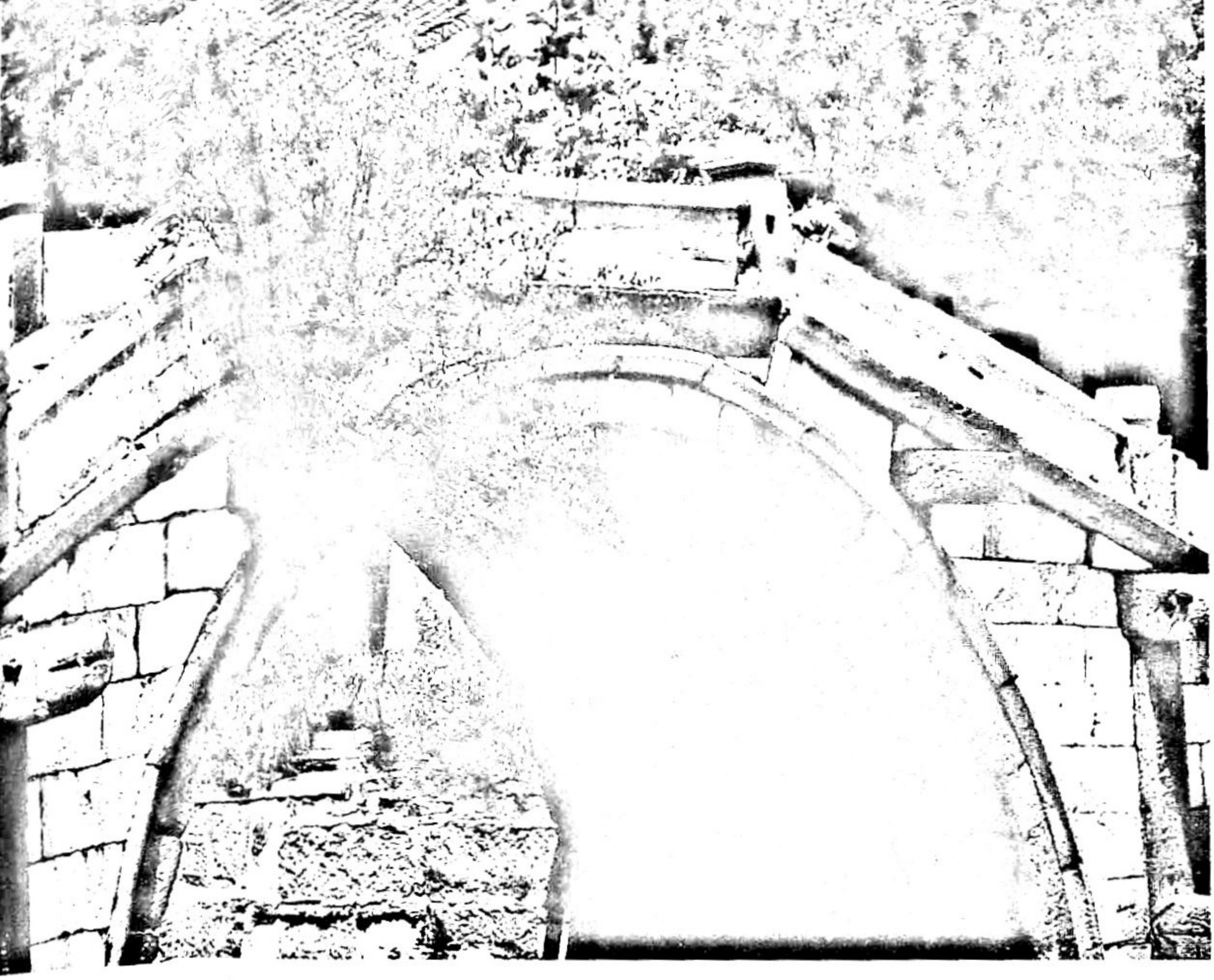
20余年后，梅兰桥重建，人们撤掉了两副桥联，又有人找来了那废弃的“金梅兰桥”条石，一劈为二，倒置着嵌在南侧的桥基上。70多年后的今天，梅兰桥上仍然可以看到那两块石碑，一块是“金梅”二字，另一块是“兰桥”二字，仍然倒置着。黎里的老前辈，过桥时，大多会指着倒置的这四个字，说起那一桩“厚脂纳得”的前因后果。

桥的传说

上面写到的几个有关桥的故事，全是真实的历史。除此之外，黎里的桥还有不少传说，太平桥、秋禊桥和青龙桥都有。下面，说一个“青龙压倒大蛇”的故事。

清朝中期，黎里的当铺多，油车（榨油的作坊）更多，素有“九当十三车”之说。黎里的南港集中了一批油车，打油要用牛，每个油车都养牛。每天，养牛人都要牵着牛到南漾里去吃蒿草。

一天傍晚，一位榨油师傅引着一头大牯牛，来到南漾的蒿草边，牛吃饱了，正卧在水里静静地养神，突然，牛好象受到什么惊吓，直往岸上窜。放牛师傅眼尖，瞥见一条大蛇，一条碗口粗的大蛇在牛蹄上冒了一下。不到半天，这个惊人的发现一传十，十传百，全镇



的老百姓都知道了，南漾里有一条大蛇，碗口来粗，一丈有余。

再说，又有一个养鸭人，说他天天在南漾放鸭，鸭子越放越少，每天总是少一只，真莫名其妙。现在恍然大悟了，原来竟是这条害人精的大蛇。

黎里合镇都想除掉大蛇，镇上几个头面人物终于请到了一个善于捉蛇的叫花子。叫花子先到南漾里四处转悠，整整一个礼拜，认准了大蛇的洞穴，接着他四处采集蛇草，采了整整一筐。可是他仍然不称心，继续寻寻觅觅的，最后在青龙桥上找到了一棵特大的蛇草。由于青龙桥边上有一只小庙，香火旺盛，天天不断，那蛇草一年四季受到香火的缭绕，感应到了灵气，生长10多年了。叫花子一看高兴啊，对啊，只有青龙才可以压倒地头蛇呀！叫花子把自己采集到那筐药草全部捣碎，放在一只七石缸里，请全镇老百姓每人往

缸里吐一口涎沫，叫花子跳进缸里，虔诚地沐了一个浴。取出那颗青龙蛇草，搓揉之后，全部服下，立即窜入水中，探准了大蛇的洞穴，生擒了大蛇。

桥的雕刻

黎里石桥的雕刻纹饰十分丰富。青龙桥有龙头、覆莲，望恩桥、秋禊桥有轮回，道南桥有二龙抢珠、五蝠捧寿等等。

青龙桥的龙头左右两侧一共8颗，两两对衬，4颗武康石，4颗花岗岩，龙头伸出桥身，居高临下，针对滔滔的东流水，似乎一定要河水安静服贴，不得兴风作浪，保障合镇平安。龙头雕出了黎里百姓美化石桥的艺术，更映现了百姓们镇压水患的迫切需求。

青龙桥的青石望柱上，雕刻着美丽的覆莲。我国自古喜爱莲花，多少文人墨客对它歌咏赞叹，抒怀寄志。屈原的《离骚》就有“集芙蓉以为裳”的高洁追求，唐代大诗人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佳句，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更是千古绝唱，不仅赞美了莲花亭亭玉立的绰约风姿，更赞美了她“出汙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圣洁本性。由于佛教的传入，人们又把莲花与佛教联系起来，在虔诚的佛教信徒心中，佛即是莲，莲即是佛。

黎里相当多的百姓崇信佛教，除了覆莲，青龙桥与望恩桥、秋禊桥的轮回也是百姓们信佛留下的印记。

佛教宣扬因果报应，认为人的生死祸福、富贵贫贱都由前生注定，消极作用十分明显。不过，造桥人把轮回图案刻在桥中心，让过桥的人天天踩它看它，也的确存在着一定的教化效用。轮回本出于佛国，非常玄妙，不过佛教传到中国，大多被吸收被汉化，且看一看汉化了的轮回吧。

神魔小说《西游记》第11回“游地府太宗回魂”：前进多时，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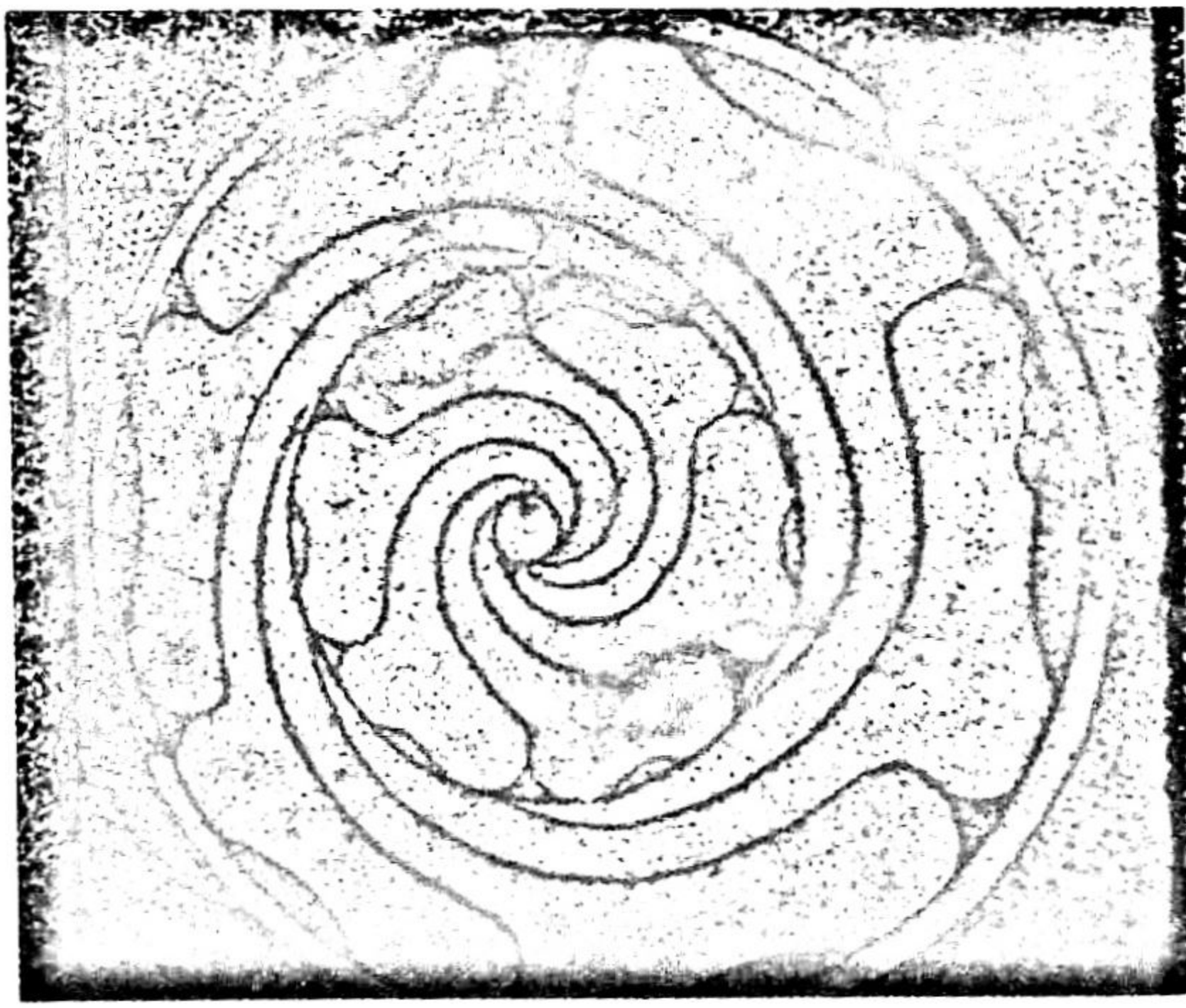
来到“六道轮回”之所，又见那腾云的，身披霞披；受禄的，腰挂金鱼；僧尼道俗，走兽飞禽，魍魉魍魉，滔滔奔走轮回之下，各进其道。唐王问曰：“此意何如？”判官道：“陛下明心见性，是必记了，传与阳间人知，这唤做‘六道轮回’，那行善的，昇化仙道；慈忠的，超生贵道；行孝的，再生福道；公平的，还生人道；积德的，转生富道；恶毒的，沉沦鬼道。”不可否认有人的确由此广积功德，也有人由此而改恶从善。



道南桥石刻二龙抢珠

道南桥有二龙抢珠和五蝠捧寿，前者桥上较多见，后者则较为罕见。五蝠捧寿是民间流传的吉祥纹饰，寓意万福万寿，

青龙桥轮回



桥面正中刻寿字，四周匀称地分布着状似云彩的五只蝙蝠。照例蝙蝠的形象算不上如何的美丽，不过老百姓以他们丰富的想象，通过大胆的变形移情手法，把蝙蝠描摹得翅卷翔云，风度翩翩，真是值得骄傲的创造。蝠与福谐音，五只蝙蝠即五福，说法不一，但大同而小异，主要是寿、福、康宁、攸好德、考终命。通俗地说就是:一求长命百岁、二求荣华富贵，三求吉祥平安，四求行善积德，五求人老善终。

走桥风俗

吴地的走桥遗风已有千年之久。据说走三桥能治百病，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妇女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走过三桥就可以祛病消灾。吴地一向流传着“行过三座桥，一年病灾消”的俗语。明代太仓秀才陆伸有《走三桥》诗:“细娘吩咐后庭鸡，不到天明莫浪啼。走遍三桥灯已落，却嫌罗袜污春泥。”

其实在吴地走二桥走一桥都是可以的，黎里自古就有走一桥、走二桥求子得子的习俗。

传说明朝洪武年间，镇西横街南头有家姓沈的乡绅，因没有儿子传代，天天走过一座小木桥到镇北的罗汉寺去烧香求子，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赤诚之心终于感动了黎川桥神，桥神向玉帝禀告，玉帝命观音娘娘赐予沈家一子。沈家得子后，将天天走过的木桥改建成石桥，取名“子来桥”。从此后，走子来桥求子成为黎里的风俗。

子来桥边上还有一座名叫“里仁桥”的石桥，因年久失修而残破不堪。俗话说“烧香念佛图自身，修桥铺路利子孙”。边上居住的鲍家聚族商议决定拿出银两重建里仁桥，桥名“里仁”，出于《论语·里仁》篇“里仁为美”之句，就是要将爱心施于邻里街坊，惠及乡里。桥建成后，百姓们都叫里仁桥为“鲍家桥”。鲍家桥与子来桥是

一对钥匙桥，“鲍”与“抱”谐音，想想也在理，一个大胖小子来了，自然一家子争着要抱啰！从此，黎里镇上大凡嫁女，必定经过子来桥与抱家桥，以求早生贵子。

桥名与桥联

先看桥名，古人为桥取名颇能显现那个时代的心理追求。上文说到的“子来桥”“鲍（抱）家桥”，反映了多子多福的心态。

太平桥、万安桥，祈求平安。新丰桥、鼎丰桥，祈求农田丰收，明清两代的黎里镇，是个粮食专业的市镇，农业收成的好坏，与全镇百姓休戚相关。

最典型的要数梯云桥了，至今的老人还能回忆起前人吟诵的一首七言绝句：“三寸舌是安国剑，五言诗作上天梯。青云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梯云桥，处于黎里镇的中心地段，可以说是最高的桥，与梯云桥形制上堪称兄弟的是进登桥，还有迎祥桥、登瀛桥，逢年过节读书人都要去走一走，以求迎来祥瑞，有朝一日名字进登金榜之首，“英雄三百辈，随我步瀛州”，那全是祈求科举发达的桥。

再说桥联。黎里的桥大多镌有桥联，内容丰富，涉及到经济、地域、风景名胜、好客胸怀以及心理需求。

青龙桥西侧桥联：物华天宝日，人杰地灵时。

显然根据初唐四杰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化写而成。赞扬了黎里是块宝地，人才辈出。看得出来，黎里人自古以来都是那么地热爱家乡，热爱生活，充溢着自信，更不乏自傲。

清风桥桥联：庚午重逢悦新盛，仲秋载造东丰盈。

清秀一川星可望，风高千古月分明。

清风桥又名新丰桥。第一联就运用了鹤膝格，将“新丰”二字镶嵌其间。第二联运用了鹤顶格，将“清风”桥名隐藏在联语内。联

语不但描述了明净的景色，交待了重建石桥的时间，还隐含着对农业丰收的祈盼。

万隆桥镌刻的两联另有特色，将界划交待得一清二楚：

越角吴根云横跨，左萦右带水交流。

水流直达黎兼盛，界划始分浙与苏。

万隆桥初建无考，清乾隆年间重建，位于黎里镇西郊，春秋战国时期，黎里位于吴越相间之处，所以称“越角吴根”；“浙与苏”，同“越角吴根”一样，这里是吴、越或者说苏、浙两省的交界之地，“黎兼盛”，黎里与盛泽两地，两镇在明清两代都属于巨镇、名镇。

太平桥桥联：西北珠渊涵福地，东南宝阁峙文峰。

这一联把周边的风景与名胜尽收笔底，珠渊，蜘蛛潭，在镇西北；宝阁，中立阁，又称八角亭，阁高三层有石桥与岸相连，八角亭当时是黎里镇的镇标，上面的铜葫芦高1丈2尺，清代黎里镇的栅栏就曾东移到此。

迎祥桥联：日色照临迎百福，风光会合集千祥。

东西迎接川流水，南北常通行旅人。

第一联较为常见，祈福求祥。第二联，写出了黎里的繁盛，好客，有文化，有教养。

打桩歌

古代造桥，在建造桥墩的时候需要打桩。那是非常吃力的繁重劳动，必须多人通力合作，为了统一步调，石工们发明了打桩歌。下面引录一首黎里造桥工人打桩时唱的夯歌。它也是一种民歌或者说是谚语，里边尽是本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还有当地的典故、传说等等。一人主唱，众人和唱，主唱者即兴发挥，将眼前的事物一一唱来，一首夯歌，几乎把黎里的桥梁全唱了进去。黎里镇上的桥

本有30余座，再加上近郊的，超过50座，每座桥，又不止一个名字，下面引录的打桩歌正是这样。

支支格格，哼唷！茅竹桥呀，哼唷！

一摇一晃，哼唷！独木桥呀，哼唷！

弯来弯去，哼唷！九曲桥呀，哼唷！

三步跨过，哼唷！两座桥呀，哼唷！（以上起兴阶段，没有具体说到黎里的桥名）

阴凉舒坦，哼唷！清风桥呀，哼唷！

中秋团圆，哼唷！明月桥呀，哼唷！（清风、明月连续出现）

步步登高；哼唷！梯云桥呀，哼唷！

鱼跳龙门，哼唷！进登桥呀，哼唷！

平步青云，哼唷！登瀛桥呀，哼唷！

连中三元，哼唷！接贵桥呀，哼唷！（以上四桥，专唱黎里读书考科举之风）

三石一亩，哼唷！新丰桥呀，哼唷！

秤平斗满，哼唷！鼎丰桥呀，哼唷！（以上二桥祈求农业丰收）

阿弥陀佛，哼唷！迎祥桥呀，哼唷！

南斗翻身，哼唷！鼎新桥呀，哼唷！（新谐音星）

厚脂纳得，哼唷！梅兰桥呀，哼唷！

道儒拙演，哼唷！大陵桥呀，哼唷！（以上两桥专唱黎里与桥相关的典故）

安安逸逸，哼唷！太平桥呀，哼唷！

热热闹闹，哼唷！浒泾桥呀，哼唷！

要讨老婆，哼唷！通秀桥呀，哼唷！（娶老婆先须通信，通秀谐音通信）

早生贵子，哼唷！子来桥呀，哼唷！

要抱孙子，哼唷！鲍家桥呀，哼唷！（抱与鲍谐音）

要吃奶奶，哼唷！汝家桥呀，哼唷！（汝与乳谐音）（以上四桥与婚嫁生子有关）

龌里龌龊，哼唷！道南桥呀，哼唷！（道南桥附近多油车，牛过桥常常拉屎）

咸咸哉哉，哼唷！相家桥呀，哼唷！（相谐音鲞，咸鲞，既咸又鲜的一种腌鱼）

甜甜蜜蜜，哼唷！过唐桥呀，哼唷！（唐谐音糖）

勿停勿歇，哼唷！叽咯桥呀，哼唷！

到此为止，哼唷！亭子桥呀，哼唷！（亭子，谐音停止，休息）

四、民居

黎里民居，明清建筑多，八大姓的多，名人故居多，大门绝大多数朝向市河，沿着街面。门面一般并不张扬，甚至很不气派，然而里面却层层进深，真可谓“庭院深深深几许”。几乎所有的门面房，都辟作商铺，就连官僚大员的私邸也是如此。中小住宅，更是下店上宅，前店后坊的布局，因为沿街的房子实在紧俏，所以几乎都融商业、居住、生产为一体，房屋不怎么高大，通常只二层。商店毗邻，货物满架，人流如织。街市顶多四五米宽，大多三四米。路面由石板或石子铺成，下面是排水的阴沟。店面，只有当铺、金银饰品店是封闭的，坚实的石库门内只有一个大门，大门内立着高高的柜台，其他的店面全是敞开式的，一式装卸的木排门板。早晨开店卸去排门板，柜台沿街而立，来来往往的顾客，一伸手就够到了货物。那些茶楼、酒肆，客人在品茗、小酌的同时，可以欣赏熙熙攘攘的街景。街道两侧的店铺，店主总是喜欢将货物摊到街道上，行人走走停停，满眼是琳琅的商品，磕磕碰碰的，逼仄是逼仄了点儿，可就是繁盛，就是闹猛，更不乏祥和。

黎里在明清两代，没有什么工业，顶多有点儿手工作坊，因此民居与商业分不开。本节将从民居的布局、结构、装饰和环境几方面作出介绍。

布局亲水

黎里的民居，大门几乎无一例外的朝着市河，这种刻意的亲水性，同时又显示着浓厚的中轴线意识。推本溯源，中轴线意识源于“中国”理念这个美学思想。

我们的祖先周人就开始崇奉“择中论”，择中是我国奴隶社会选择国都位置的理论规划，认为择天之中建王“国”（国都），便于四方岁岁来朝年年进贡，更有利于对四方的控制。（《史记·周本纪》）《周礼·大司徒》对此有过系统的论述，认为择地中，即国土之中建国，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最有利的位置。不仅如此，择国土之中建王都，择都城之中建王宫，在古人的观念里，中央这个方位最尊，一种最有统治权威的象征。

宋代有个叫石介的在他的文集中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0《中国论》）石介认定，我国居天下之正中，得天独厚，这是天经地义、不容颠倒的宇宙人际秩序。“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战国策·赵策》）《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是我国古人头脑中的文化偶像，刻骨铭心的文化命脉。

考察一下，我国各地重要的主题建筑，无一例外的居中，其中心之所在，就是中轴线之所在，两侧对称排列着建筑群的其他副题建筑。江南古镇的建筑，不管是群体的，还是单体的，大凡两侧诸多建筑都是左右对称的布局，最重要的建筑必定设置在中心位置，而且总是在一条纵向的直线之上，强调、突现着中轴线。

中国古代建筑崇尚的，与中轴线联系的纵深空间意识，文学笔触不时涉及，所谓深宅大院，侯门深似海，这里的美似乎都在一个“深”字上，中国人的空间观念崇尚这个“深”字。关于中轴线的建筑文化性格，可以说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对中轴线的建筑文化性格与美学追求如此热衷，如此执着。

黎里的古建筑就是如此强烈地突现了中轴线。黎里主要的三条街道，上岸、下岸和横街，所有的建筑，大门一律面向街道和市河，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上岸朝南向阳，都是官僚士大夫和富商豪绅之家，下岸和横街则以普通市民的居室为多。上岸的房屋纵深少则五进，一般都在六七进，多的可达九进。最气派的大户人家，面阔可达七开间，比如八大姓的周家赐福堂、蒯家树滋堂，还有汝家进士第都是整整一溜七开间门面。八大姓的其余几姓则五开间门面。江南古建筑，纵深称进，横向称落（或者称路），这些大户的住宅往往不止一落，像第二大姓的陈家就多达三落。下岸和横街，大多在四五进进深，没有边落。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对房屋建筑有明确的规定，一般平民住宅不得大于三间，高度也不得超过二层，甚至连屋脊样式也有规定，因此特大的深宅大院是三品以上的官吏或特许的。偶尔出现例外，那是因为清王朝后期洋人入侵，王朝衰落，法纪松懈而建起来的。

黎里的豪门大宅也好，普通民居也好。大多有一个双落水的河埠头，河埠的宽度，由房屋的开间所决定。一般先安排三至四级淌水式石阶，再接外八字双落水。以三开间门面为例，河埠中间的平板大方石，约三尺来宽，算上两侧的双落水石级，总体宽度不过一丈五尺左右。上岸那些五开间、七开间的大户人家，他们的河埠头宽绰得多，通常在三尺见方的石板两头各铺一块条石，形成五尺宽的平台，再气派一点，两边再各加等量的条石，平台增宽到七尺或七尺以上。



河埠的平台严格地座落在中轴线上，条石、平台的线缝都与建筑中轴线平行。缆船石的安排也严格讲究中轴线。凡是三开间门面，必定拥有一座双落水河埠头，缆船石的位置自有一定成规，河埠的座身上沿中轴线对称安排两个，河埠两头的驳岸上再两个，一共四个。

黎里的大宅平面布局，正门总是面河而建，宅院规矩方正，进落有序。大宅的主落上，依次由门厅（沿街，有的带楼）、轿厅（也称茶厅，停放轿子或供来访者喝茶等待主人接见）、正厅（接待主要宾客，举行婚丧礼仪）、女厅（也称楼厅、堂楼，主要居住房，可以增加进数，一般是两进，两侧增建厢楼，构成宽可走马的走马堂楼），有的后面再加下房（厨房或者供仆役居住）。

黎里古镇，明清时期的住宅后面大多建有园林。赐福堂六进之后有后河，一座九曲桥直通五亩园，占地3500多平方米。陈家有端本园，邱家有五峰园，还有七峰园、且园、王氏园以及紫藤花馆等等。时至今日只有陈家的端本园，还基本保留。

不少大宅多有边落，正落与边落之间设有备弄，既分开了主仆的交通路线，又增强了内宅的私密性，有利于隔音、防火及防盗。普通宅院形式上与大宅相仿，只是进数较少而已。

黎里第三大姓李姓，有座“传经堂”，颇为典型。坐北朝南五开间，沿市河一座双落水河埠，沿街的墙门并不起眼，内部接连九进，进深达135.7米，气势非凡。从房屋结构看，门面不事铺排，起到了欲扬先抑的效果，房屋高低错落，有节奏有韵律。

从地基看，后一进总比前一进为高，层次分明，次第抬高。这正合了民间口彩“步步高”。不过，步步高主要是为了泄水的需要。江南水乡，地下水位高，排水十分要紧，建房打地基，首要考虑的是泄水畅快。地基逐步抬高，阴沟排水通畅。每当雨季，特别是暴雨、雷雨，河埠上、驳岸旁的泄水孔哗哗地冒水，这就是步步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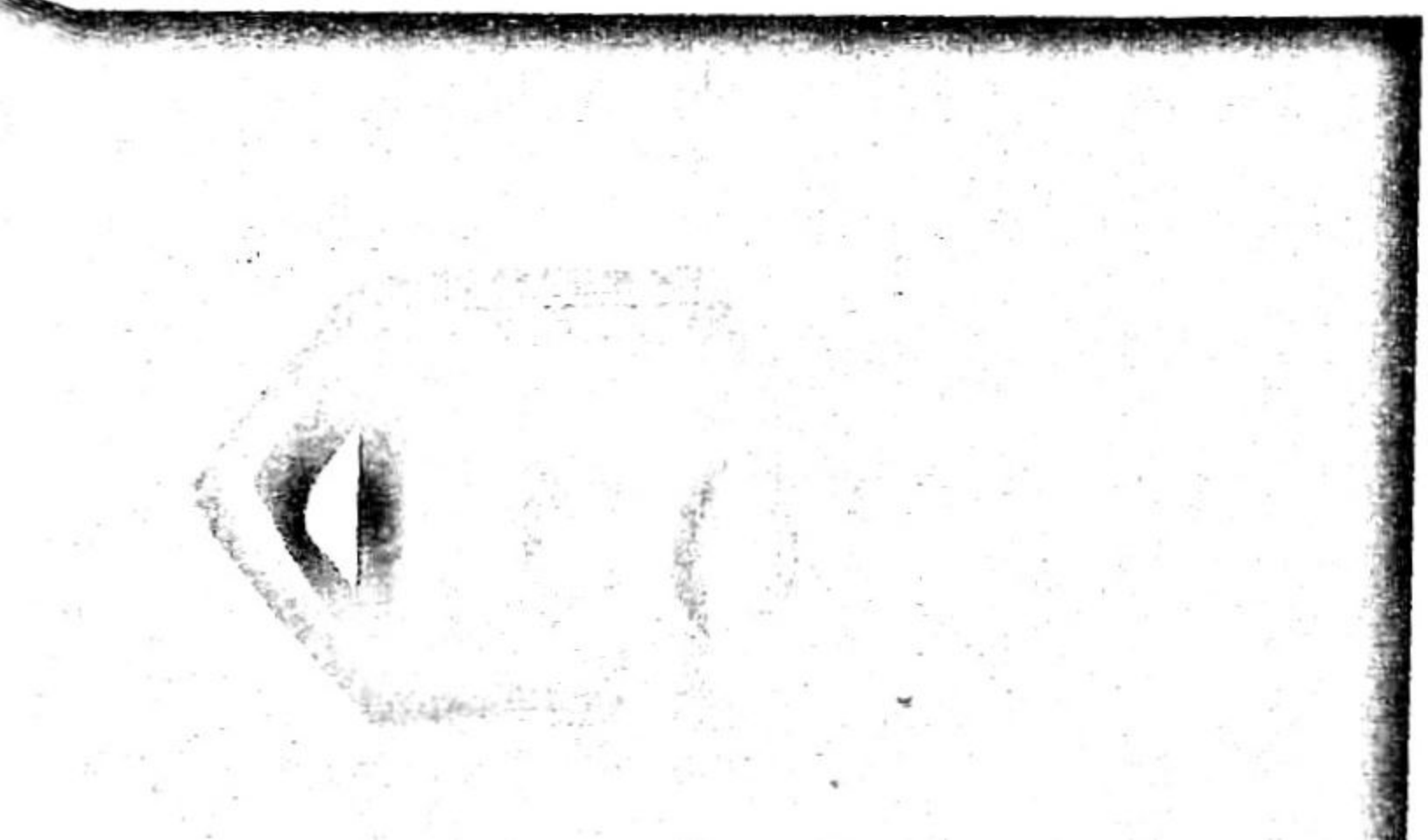
功效。这样的设计，既科学合理，又符合民俗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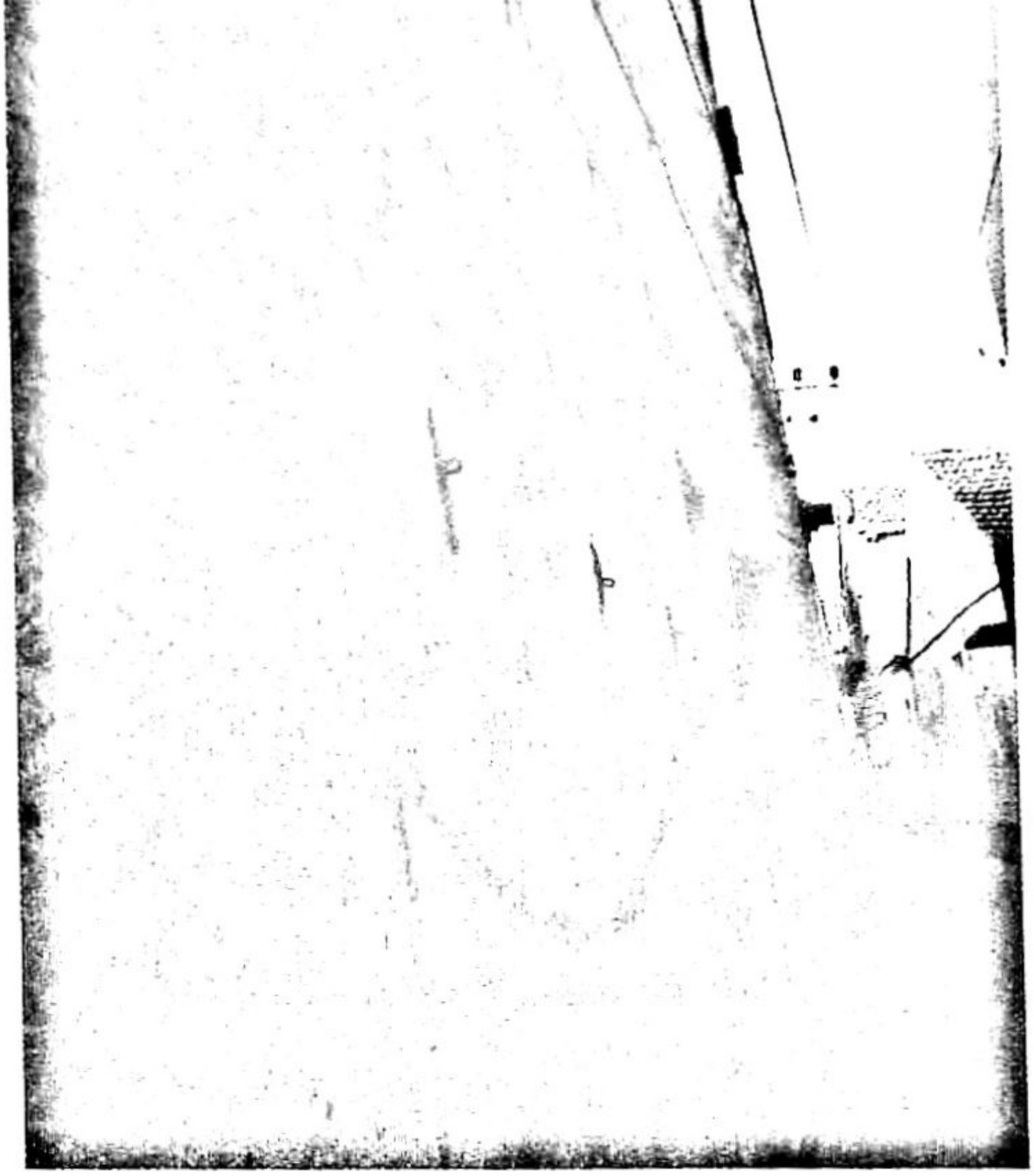
结构合理

黎里明清两代的建筑，功能分明，布局合理，准确的说，应是符合封建的伦理。门厅、正厅、堂楼、花厅、厢房、偏房等建筑单元都遵循传统规矩。一般说主要遵循如下三项原则：前公后私，前三厅具有公开性，堂楼、厢房或偏房是主人生活起居的地方，具有私密性。男女有别，专为小姐女眷建筑的堂楼或阁楼，隐私性很强，外人一般不能涉足。尊卑原则，主人居正屋，下人仆役一般住厢房或偏房。

黎里民居坚固而实用。建筑采用建材本色，清一色白墙、灰砖、黑瓦，外简而内丽。建筑宅基全部使用条石，上部承重柱、梁、檩、椽以及板壁门窗均用木材。墙基部为踏扁砌的实墙，上部才开斗砌，多数人家斗墙中间用碎砖填充结实，屋顶为望砖、土瓦。整座住宅，以坐南朝北为例，必定在东、西、北三面围以封火墙，厚度不会少于50厘米，尤其是东西两侧，远远望去，两垛高高的观音兜，帽兜般的曲线，与天际线相映衬，优美、柔和却又不乏气势。黎里偶尔也能见到马头墙，直线型的，阶梯状叠落，那是有些人家仿制的徽派建筑，不多。有了封火墙，一旦邻家失火，可以免受连带遭殃。为了安全，封火墙一般不开窗户，偶然在高处设有圆形的小洞，顶多三四十厘米直径，到里边

水磨砖象鼻式壁窗




封火墙

一看，小圆窗内安置着一块水磨砖，雕着一个象鼻眼，一伸手就可以随意移动。原来那是瞭望孔，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主人家凭此可以观察外边的动静。

同一座民居中，由院落和天井分隔成一进又一进，每一进都有一道双扇门，左右两边开有门栓洞，白天开门，右边的洞内就藏进门栓，晚上关门，抽出门栓两头一架。为了坚固，有的人家门后安置两根门栓，或者有再加一根竖撑。更有人家，在门上镶嵌水磨砖，用铜钉或者铁钉铆紧，这样的门坚固之极，既防盗又防火。

民居的每进之间都有封火墙，高高大大的，与中轴线相垂直。万一某一进失火，也不会殃及另一进，至少可以延缓火势，争得救火时间。

紧靠每一进封火墙都有一个小小的天井，黎里人俗称“眉毛天井”，因为狭狭长长的，又两两对称，称之为“眉毛天井”真形象之极。有些人家这种小天井，因地制宜做成方形，黎里人称之为“蟹眼天井”。这种天井不仅采光、通风，调节室内的小气候，还是雨水排泄的重要通道。眉毛、蟹眼虽小，作用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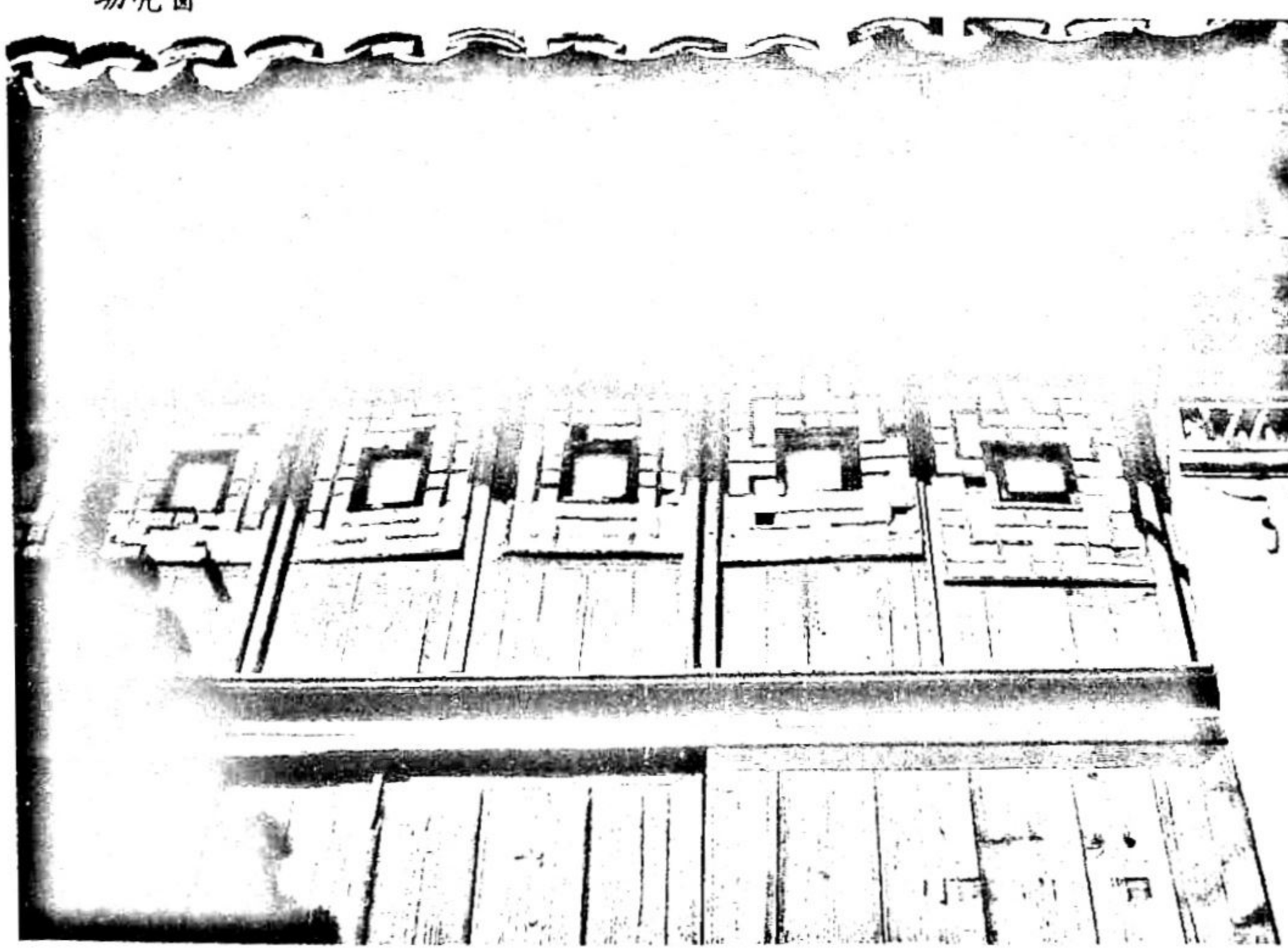
住宅内部，每进都有院落状天井，第三进大厅前的天井，最为宽阔，黎里人往往专门称之为庭院。天井也好，庭院也好，四周檐

口专用一种滴水瓦片，俗称花边滴水，雕有种种花纹，周家的赐福堂甚至出现龙凤图案，那是太平天国时期，一位封了王的将军在此驻扎，维修时留下的印记。天井四面的雨水，沿着水落管顺流而下，汇集到天井一侧的阴沟内。这有讲究，叫做“四水归堂”，含有“肥水不外流”的意思。天井多数有石板铺地，也有卵石、瓦片、陶片、瓷片或砖头的，如果是后者铺地，往往铺出种种图案，有12生肖，有瓶生三戟、也有梅兰竹菊。

黎里民居的窗户分落地长窗、半窗和八角窗多种，既讲究舒适又富于情趣，窗格棂大多使用明瓦，一种磨成薄片的蛎壳，透光而不透明，既能采到光线，又不让外边窥视内里的一切。清末逐渐改用玻璃，不过蛎壳窗至今还有相当的留存。

室内底层厅堂部分用方砖铺地，两侧厢房铺木地板。楼面也是

蛎壳窗



木地板，考究一点的也有在木地板上铺以瓦钵，架空后再铺方砖的做法，这样做可以隔去不少噪音，楼上楼下互不干扰。铺地用方砖，或者使用其他砖块，可以调节室内的干湿度。每当潮湿的雨季，方砖细微的孔隙会自动吸收空气中的水汽，以降低湿度，干燥的日子，方砖又会释放出贮存在里面的水份，增加空气的滋润度。一些考究的厅堂，周边的墙裙也镶有水磨砖，雕有种种花纹，不仅美化了居室的环境，更增强了空气调节的功能。居住在这样的空间之中，大大有利于身心健康。现在多数人家铺地使用地砖和磁砖，地砖磁砖不吸水，又容易打滑，远不及传统的方砖。

方砖的铺法还有讲究，文官和武官就有所不同。明清时期，黎里人好读书，重文较武，八大家中走出来的大多数是文官，他们住宅的方砖，沿中轴线纵横铺就，而新蒯家弄底的“退一步处”船厅，是抗击沙俄的著名将领张曜所建，那里铺地的方砖就呈菱形。

装饰考究

黎里民居的装饰比较考究，官宦绅士之家则非常考究。门厅有门厅的装饰，正厅有正厅的装饰，天井院落、栋梁、花厅、书房乃至辅助性的建筑，无一例外都有种种装饰。

先说门厅。大门的正上方有门额，张挂匾额的地方。主家往往请名人题写，以示荣耀。黎里请得的名人自明至清，至少有董其昌、文徵明、朱彝尊、袁枚、王鸣盛等等。八大姓之一的蒯家，老蒯家弄朝南面街一落五开间，门额“中宪第”；南蒯家弄，五进五开间，匾额“荣禄第”；新蒯家弄，一落七开间，门厅高悬“大夫第”匾额。大门两边有抱鼓石，还配上一对石狮子。

再说厅堂，正厅尤其突出，往往张挂中堂字画。这里且以赐福堂为例说一说楹联。

赐福堂本清乾隆时期工部尚书周元理的私邸，那气势恢宏的第三厅上，有无锡籍大学士嵇璜赠予的“赐福堂”匾额。两边有两副楹联，录如下：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彩霞。

积善余庆，百代云仍承燕翼；蒙恩受福，九如天保答龙光。

联语写得很好，切情切景更切合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其拥有的荣耀。

第一联，“座上珠玑昭日月”，珠玑，圆形而有光泽者为珠，不圆者为玑，这前句说周氏一家拥有珍物；“堂前黼黻焕彩霞”，黼黻，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这后句喻周家来来往往的全是有身价的人物。

赐福堂上的第二副楹联中的“蒙恩受福，九如天保答龙光”，充分表达了他们周家多次得到乾隆赐福的荣宠。九如天保，即“天保九如”，《诗·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诗名《天保》，篇中连用九个“如”字，集中了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周家将世世铭记龙泽，代代不忘回报皇恩。

再看第二联中的“积善余庆，百代云仍承燕翼”。《易·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余庆，指先代遗泽。云仍，云孙与仍孙的略称，云孙是从本身算起至第九代孙儿，《尔雅·释亲》：“仍孙之子为云孙”，仍孙是从本身算起至第八世孙儿。《尔雅·释亲》：“昆孙之子为仍孙”。这里的云孙和仍孙泛指远代的子孙。燕翼，《诗·大雅·文王有声》：“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毛传：“燕，安；翼，敬也”，陈奂传疏：“言武王以安敬之谋遗其子孙也”，引申为善于为子孙计谋。看来，这第二联应当是周元理的后裔撰写的。

撰写得巧妙的楹联，原本很多，现在能够保存下来的了了无几。一些别出心裁的佳构，尽管已经不存，但依然烂熟于人们口头。比

如下面一联：

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嗜虧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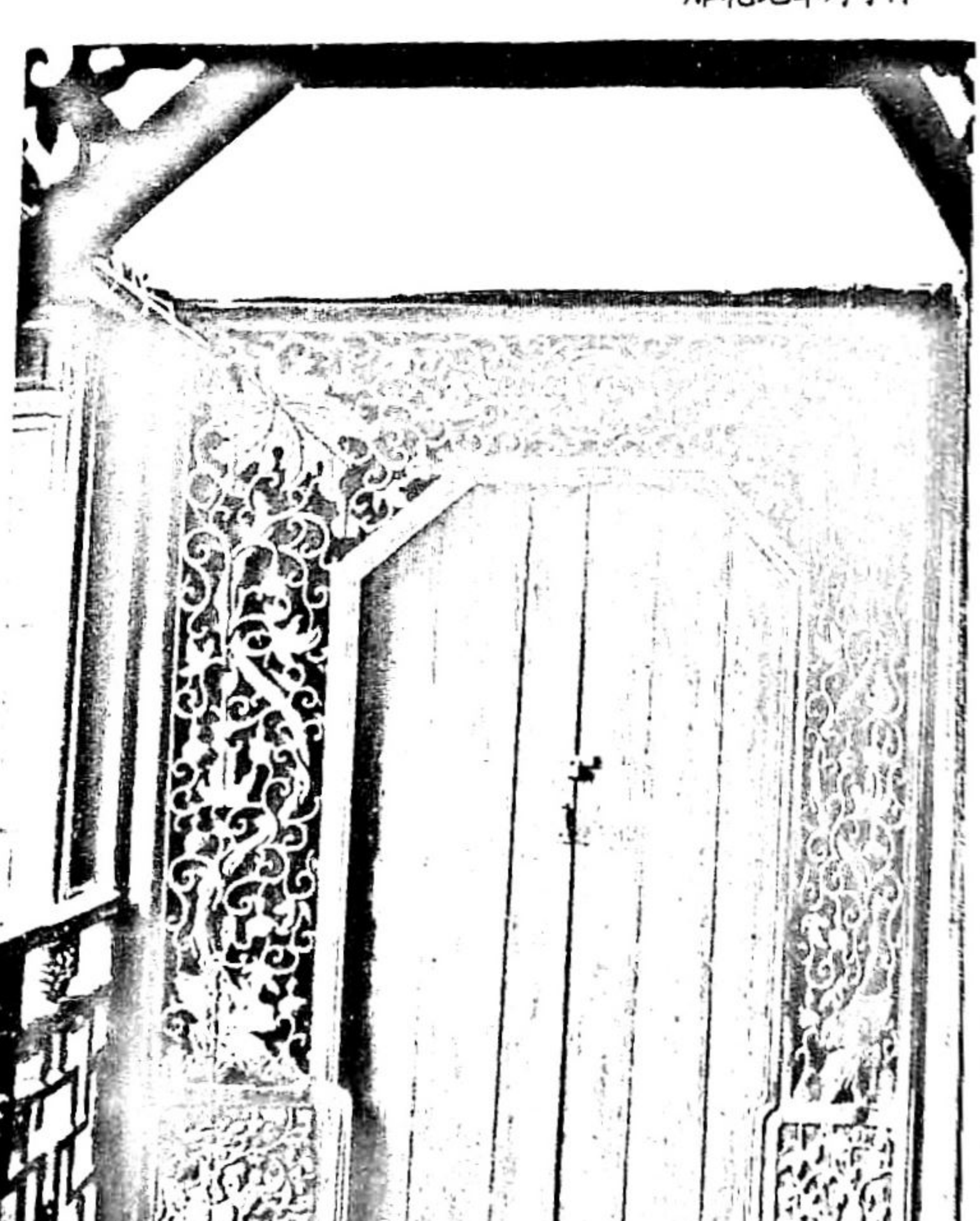
这一幅楹联很有意思，书写者特意将“辛”字多加一横，“虧”字多添一点。寓意多一份辛苦，必能换得众多快乐，多吃一点小虧，终生算来必得便宜。

室内的装修，除了上文提到的，还有做轩的艺术。轩实际就是再加一个室内天花，使屋顶增加一个空气保温层，大宅的轩装饰十分讲究，木雕精良，有各种做法如船篷轩、鹤顶轩、花篮轩等，有的木梁上还有彩绘，画栋雕梁，富丽而又堂皇。

木雕、石雕和砖雕在装饰中最多。

宅第木雕取材柏、楠、椿、银杏、杉木、柚松为主，题材以民间吉祥图案、宗教人物、戏曲故事，山水、花鸟虫鱼为多，采取浮雕、平雕、镂空雕（透雕）等手法。黎里的木雕则以鸿寿堂为最，那里一套24孝，十分完整，工艺精湛。还有彭宅，梁架上八仙过海、梅兰竹菊等木雕，宽宽窄窄、凹凹

雕花地罩对子门



凸凸，虚虚实实，层层相叠，连软挑头的斜撑上，也独具匠心地悬以盛放的花卉和花篮。



民居木雕

石雕题材，上文提到过抱鼓石和石狮子，更多的以吉祥图案、人物故事、山水花鸟为主，有门罩、天井、柱础，庭院的石桌、石凳等等。

砖雕，黎里以砖雕门楼为多，至今还有20来座。

砖雕门楼，是多种艺术的结合体，有浮雕、深雕、透雕等手法。灵巧的工匠们在仅仅三寸厚的青砖上，竟然能从浅到深，雕刻出七、八个层次。保存最为完好的目前要数赐福堂的三座砖雕了，那真是绘画与书法的高度综合。第一座砖雕门楼雕刻了种种花纹，上方是回字纹饰，下方是菱形，托有两朵硕大的牡丹，左右各有两块人物浮雕，一人骑牛一人骑马，仙风道骨，气度非常。第二座最高大气派，哺鸡正脊踞于顶端，檐牙高啄，筒瓦密布，龙凤瓦当间以寿字花纹，高高的发戗之下，饰以各种艺术造型的水磨砖，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由下往上望，齐平的檐口高耸入云。门楼上部是百鸟朝凤，饰有春桃、夏莲、秋菊、冬梅四季花卉，下部水族龙宫，螃蟹、水兽、鲤鱼，还有各种水下珍奇，水波正中隐隐露出一角龙宫，几条鲤鱼争相跳跃，一条苍龙沉浮其间。左右两侧各有一块浮雕，蓝天白云，树木花草，车马桥子，各类人物栩栩如生，特别是人物的衣褶线条生动流畅，抬腿举手，呼之欲出。第三座砖雕的上方饰以“凤穿牡丹”，下方是“狮子滚绣球”，左右两边是浮雕，左边是相府，右

边为帅府，文臣武将出入其间。

黎里的大户人家，砖雕门楼往往不止一座。多座砖雕中，一般第三进正厅前面的那一座堪称主题，各家凭此争奇斗胜。八大姓的汝家，瑞文堂前的砖雕门楼堪称黎里一绝，详见本书人物篇的八大姓一节。鲍家树滋堂的正厅前安排着一座双面砖雕，由吴中著名人物文徵明题词。前些年翻建房屋时被拆毁了，好在黎里文保所的工作人员，化了力气，把所有的构件集中保存了起来，有待日后重建。可惜的是周家的第三厅前的“竹林七贤”砖雕门楼，是吴中数一数二的精品，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为南京博物院拆去，至今存放在地下室内。

砖雕门楼的题词，非常有讲究。封建社会，最看重门第，因此砖雕门楼上往往打出祖先的旗帜。比如八大家之第六位的陆家，砖雕上就是“怀桔清芬”四字，用了江南老祖宗陆绩的典故，详见人物篇八大姓介绍。黎里的王氏家族，尽管排不进八大姓，但他们自恃门第高贵，现在王家的砖雕门楼上留有“槐荫庭留”四字，就是后裔们以簪缨世族自居的明证。这“槐荫”，有分晓，槐树在古代留下了许多史实，这里想多写一笔。

槐树生长十分缓慢，俗语云：“千年松，万年柏，顶不上槐树歇一歇”，一株老槐树，歇上一歇，据说就是百儿八十年。《周礼·秋官》云：“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宫位焉。”注解说：“槐之言怀也，怀来远人于此，欲与之谋。”《春秋》里也有“树槐听讼其下”的记载。可见，古时候栽种槐树是和朝政、司法联系在一起的。

《宋史·王旦传》有记，王旦的父亲曾经亲手在院子里栽种了三株槐树，自信地说：我的后代一定有作三公的，种上这三株槐树作个标志。王旦出生后，好学有文思，父亲更自信了，到真宗时王旦果然作了公相。苏轼特为此事，写了一篇《三槐堂铭》，流传至今。

从周朝到宋朝，从公元前三四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一千三四百

年间，槐树故事一直是和大官有着密切联系的。不但姓王的人家都以“三槐”名堂，不少文人学子，都爱以三槐名堂名室。宋朝都城学士院第三厅，院子里有一株古槐，称为“槐厅”，传说读书学子只要在此厅呆过的，就可以入相，因而许多读书人竟把别人的行李扔出去，自己抢占居住，希望以后能够入相。古代人们多种槐，所以有槐里、槐市、槐衙的说法，而且槐树又名守宫槐，从古以来，人家均爱在庭院中种植，首先取它的叶密阴浓，第二取它象征吉兆。汉唐以来，都城学宫有很多槐树。俗语“槐花黄，举子忙”，当时考科举的盛况可以凭此而想见。槐荫庭留，显现了王氏家族的骄傲，也表达他们祈求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的心态。

周氏的子孙总以先祖周元理为荣，他们请了清代著名书法圣手许汝霖书写了“天锡纯嘏”四字。这四字出自《诗经·鲁颂·閟宫》：“天锡公纯嘏”。天，毛传解释为君，锡，通赐，公指鲁僖公，鲁僖公曾派兵征伐淮夷，取得胜利，依古礼须将战功告祭祖庙，鲁臣作此乐歌，在告祭时歌唱。纯，大；嘏，有两读，GU，JIA，受福曰嘏，因此天锡纯嘏意即君王赐给了洪大的幸福。周元理为官勤谨，深得乾隆皇帝的宠爱，多次受赐上方珍物和御笔书就的“福”字。砖雕上的字，是周氏子孙对这位黎里始祖的称颂。

砖雕门楼的题刻，往往意味深长，多警策的词句，总括起来看，首先是庭训和警省之语。

赐福堂第一座砖雕门楼镌刻着“勗虔介祉”一语，此语古朴深奥，勗音XU，勉力的样子；虔，诚敬，虔诚；介，引申为传递、传播；祉，音ZHI，幸福。很明显周家谆谆教导后生们：必须勉力而虔敬地为子孙后代，当然也不排斥为他人，造福。八大姓的第七姓徐，他们的砖雕有“观国之光”一语。此四字出于《易·观》，对此注家的解释是“明习国之礼仪”，这是徐氏对后裔的告诫。再如“世德作求”和“怀铅提椠”二语，前者出于《诗·大雅》，郑玄的笺注是：求，终

也，以其世世积德，庶为终成其大功；后者的“铅”与“椠”都是古代的书写工具，教导后代子孙必须读书奋进。

其次，砖雕的题词有较多的口彩与祝颂。位列八大姓第二的陈家，他们仅存的一座砖雕上镌刻的是“奎壁凝祥”，奎与壁，都是28宿中的星宿，显然祝愿陈氏一脉始终成为人才汇聚的家族。位列八大姓第四姓的蒯家，有“芝蘭毓秀”，芝和蘭，比喻美质，口彩一句，蒯氏家族祈愿培育出众多优秀人才。位列八大姓的第七姓的徐家，目前保留下来的砖雕门楼四座，其中一座是“五凤名裔”一语。据《小学绀珠》：“五凤，赤者凤，黄者鹓雏，青者鸾，紫者鹙，白者鹄”，宋代孔平仲《谈苑》卷三：“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拜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诗云：五凤齐飞入翰林”。徐达源曾是翰林院待诏，属于五凤，“五凤名裔”既是徐氏后裔因祖上出了翰林而骄傲，又希望徐氏后裔中能够多出名家。

砖雕上的用语，大多脱不了上述范围。黎里汝家，还有“锡光笃庆”一语，锡通赐；光，荣光；笃：《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由此生发了“笃志”一词，指志向专一不变；庆，福运。俗话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后人享受祖上恩泽的同时，必须要为下一代，下下一代造就福泽。那是庭训与告诫兼而有之了。周家和汝家，他们在砖雕上都采用“诒厥燕翼”一语，也是警省与祝愿兼而有之的好句。

环境优雅

上文谈到大户人家总要在住宅后面建造园林，不但如此，他们还要在庭院中，天井里，种上各种花木，乃至奇花异草。最多的是桂树，金桂、银桂、四季桂，往往把院门构建成月洞，那是“蟾宫折桂”的祈望。其次是腊梅，每年的冬春二季，暗香浮动，沁人心



私家庭院

脾。种得较多的是落叶乔木，夏日可以减少太阳的照射，冬天又便于接受阳光的温暖，诸如白玉兰、山茶花，也种黄杨、寒笑、石榴。还有一些没有条件建造园林的人家，他们也有许多别出心裁的佳构，天井里，垒几块太湖石，种几枝天竺、巴蕉，养几颗盆景，至于培植紫藤和葡萄那就更多了，草花不名贵，菊花、月季更是不消说得了。再安排一个方形或者圆形的石桌，桌上再画它几种棋盘，排上几个石凳，聪明的黎里人，营造起一方小小的洞天。常邀请二三知己围坐，或者谈诗论文，或者铿然啄剥，贤主嘉宾，良辰美景，更添情怀，倍增逸兴，那是情的交流，景的欣赏，美的享受。

在蒯宅和蔡宅，至今还能找到琴砖，黎里人对国乐有着特殊的爱好，古琴、二胡、琵琶、三弦、笛子、洞箫，应有尽有。这里且附记一段与音乐有关的故事。晚清时期，有个叫蒯秉权的，善吹洞箫，名振吴下，同镇还有一个朱履云，擅长演奏古琴。二人经常合奏，远近啧啧称道。一次中秋佳节，二人相约同赴苏州虎丘，雇船前往，已是三更时分，登上千人石合奏雅乐，碧云为之不流，宿鸟自巢中飞出，徜徉不去。惊动了四围，寻声而至的人越聚越多，其中有一名大商贾，愿以厚礼前来相聘，蒯、朱二人兴致正浓，回答

天明再说。天将拂晓，二人返棹而回。有人不解，二人却说他们本乘兴而来，兴尽当归。

黎里保护环境的小品不少，既有实用价值，又不乏艺术，可谓雅俗共赏。比如荷花缸、老井和金砖等等。



庭院石鼓墩

荷花缸，安置在天井里，常常养上种种莲花，富有观赏价值。不过这荷花缸，说到底并非为养花而设，它主要的功能是防火。黎里的大宅，庭院深深，一进又一进，要到市河取水，决不是易事，一旦有火，这里的水至少可以派上一点用场。看是养花，原来是古代的小型灭火器。

荷花缸是灭火器，老井则是古代的消防栓，当然还有多种用途。明清两代的黎里，深宅大院之内，在前进与后进之间的院落里、天井内，必定挖有一口水井。原先的水井是非常多的，现在家家用上了自来水，多数水井在翻建房屋时填掉了，留下来的老井已经不多。目前保留的老井，要数黎里镇西的彭宅，第四进的那口宋井，还有洛雅草堂一口元代老井。

原来，江南风俗，买下他人房产的主家，在翻建新宅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保留风水，对于老井，黎里有着好多口彩："泉源滚滚"、"有井水"，讨吉利的谐音"钱源滚滚""有进水"、"有进势"，因此，封建社会重建房屋的时候，老井一般都完整地保存原处。

当然，在古代，后人保留老井图口彩只是一个方面，或者可以说是次要的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挖一口井在那时是一项花钱费时非常艰辛的工程。清代，黎里已经有了揿龙，一种用人力汲水的消防器械，一旦发生火患，只要将揿龙的龙带往井里一挂，凭人力也可以喷水救一下火。

再说使用井水有好多方便。一个深宅大院，取水洗涮假如都要到河埠头去，着实也是一件吃力的事。井水冬暖夏凉，经常汲取，清沏甘甜，洗涤也好饮用也好，方便、经济而又卫生。

水井，在空调发明之前，还是黎里人的冰箱呢。

古井当冰箱，最明显的要数洛雅草堂的那一口了，那老井处在廊檐东侧的拐角处，粗粗看去，只是一块圆形的青石，上面琢着两个月牙形的凹口，刚好形成一个抓手，圆形青石与地面平齐，很隐



落雅草堂古井

敞的，不仔细瞧，根本不会知道下面是一口井。用直的萧芳芳艺术馆第三进大厅里，右侧的柱子旁边，也有一口老井，设计别具匠心，没有井圈，安排着两重正方形的青石盖板，与地面平齐，中间的小盖板约15厘米见方，上面雕一个小小的把手，稍大的盖板约45厘米见方。这种室内水井，不为洗涤，也不是为了取水饮用，它的主要用场是存放食品。春夏秋三季，人们往往把食物用网兜、罩篮吊到井里，可以保鲜更可以防馊。尤其是夏天，把西瓜吊在水井里，凉丝丝，甜蜜蜜，那个味道真是好极了。

最后说说黎里民众家里另一种点缀性的小品：金砖。

苏州地处太湖之畔，土质细腻，含有多量的胶体物质，可塑性大，制成的砖头质量上佳。金砖是最为精致的一种地面砖，尺寸多为1.7尺或2尺见方，最大的为2.2尺见方，3寸左右厚度。苏州北郊的陆墓及昆山的陈墓（现名锦溪），那里的泥土没有沙粒，富有粘性，所制的砖最为上乘。朝廷确定苏州作为御窑所在地，专为宫殿烧制金砖。据史书记载，明代朝廷派出了专职官员常驻苏州，监督制砖，清代不再派出专职官员，改由苏州知府及知事亲自督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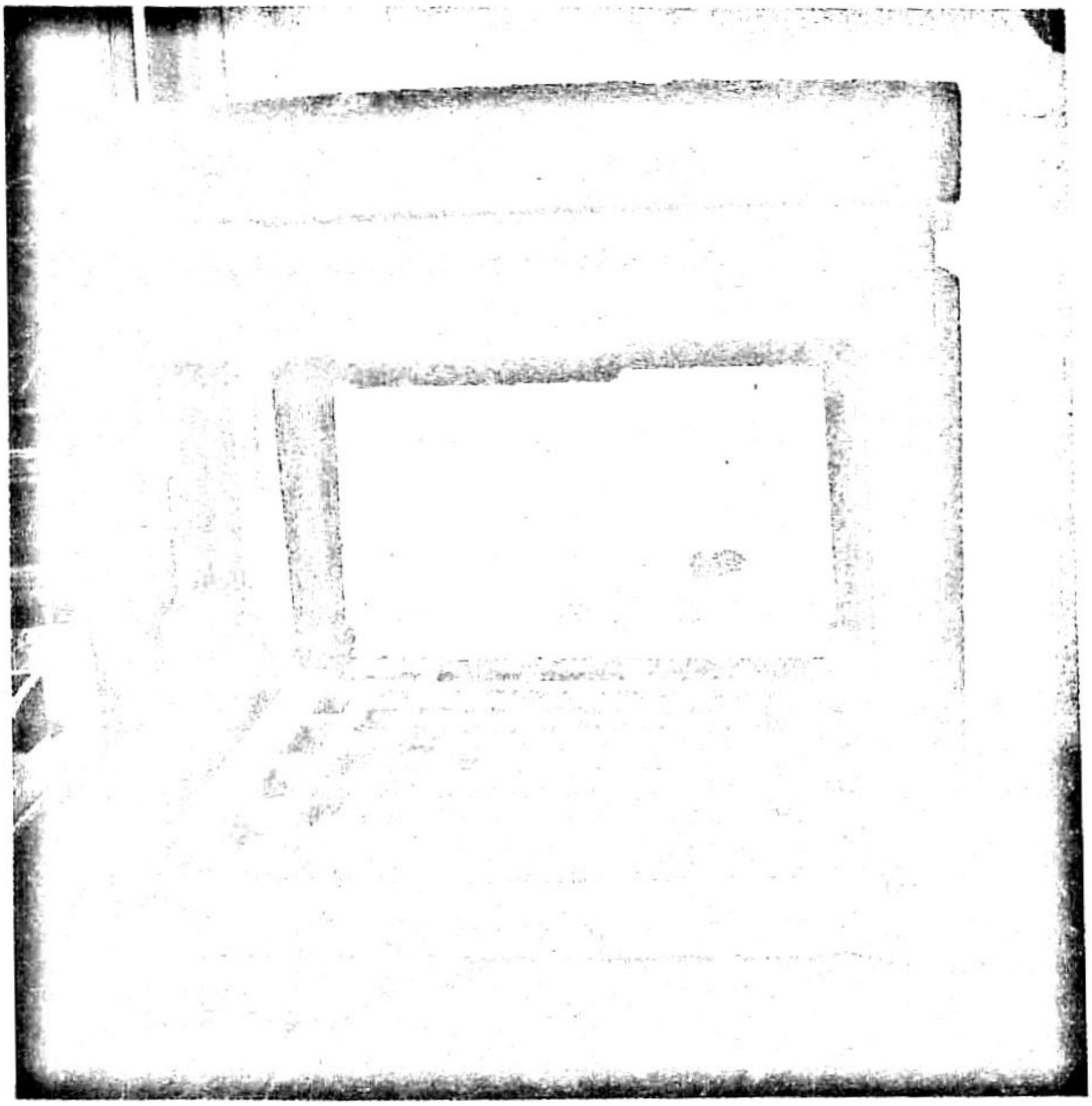
供奉金砖，皇命在身，陆墓、陈墓两地的窑厂自然不敢怠慢，尽心尽力，精工而细作。制成的金砖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京仓”暂时储存，等待运进宫殿铺地，因此有了“京砖”之名。又因为这种砖质地密实，敲起来有金石之声，京砖与金砖同音，后来人们的笔下就写作了“金砖”。为了明确责任，督造地的地方官员和具体制砖工匠的姓名都要明明白白的刻在砖上。

不过，金砖铺墁时，工艺要求非常严格。先要砍磨加工，务使砖与砖之间严丝合缝，当时有专门术语叫“磨砖对缝”。一块砖有六个面，一般的方砖需要加工五个面，称为“五扒皮”，而金砖的六个面全部需要加工。至此，那些出力流汗的窑工乃至督造者们的名字全被磨去。前几年，国家文物局《文物天地》杂志，要发一篇关于

金砖的稿子，主编为了配发金砖的图片，派记者四处寻找，想不到若大一个北京城硬是找不出一块留有督造官员及窑工名字的金砖来，在京师皇城，帝王怎肯让他人千古留名呢？哪怕在砖缝之中，也不会留有丝丝余地。

金砖是皇家专用，平民百姓不能用，就是达官贵人也不敢用。出在我们地区的东西，我们却无福消受。然而聪明人总有办法，铺地不行，那么就留下几块另作他用吧。于是，一块金砖下面安上几个

金砖桌



脚，就成了耐用的洗衣板。一块金砖安置在一张专门制作的小桌上，小桌的抽屉里放上毛笔、水盂和字帖，毛笔沾了水在金砖上临帖，写

了就干，干了再写，经济而实惠。金砖厚度大，吸水性强，质地冰凉，盛夏时节更有降温的奇效。黎里寻常百姓之家，专门制做一个小方桌，金砖罩在上面，成为金砖桌，夏季，吃不光的饭菜就放在金砖桌上，罩上纱罩，放它一夜半天的，不会发馊，俨然天然的冰箱。

这样的金砖，那上面的种种印迹，倒全部保留了下来。试着看一下其中的一块吧：正方形，每边长72厘米，厚9.8厘米，侧面有三方硬印：“嘉庆肆年成造细料二尺二寸金砖”，“江南苏州知府任兆炯知事张虎文管造”，“大三甲袁彩彰造”。第三印的“大三甲”三字横排，并小于其他字体，那是砖的型号。

黎里的民居，是建筑，更是艺术。

五、弄堂

赵构南渡，偏安一隅，建都于临安，历来史家的评价都不高。其实，赵宋南迁，北方上至王公贵族，富家大姓，下至平民村氓，不断涌向南国，给江南地区增加了百万以上的劳动力，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更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一百多年后，孛儿只斤氏建立元朝，北方战乱频仍，人口与财富继续南移，使本来沉睡未醒的众多村落，迅速跃起，由村庄变成集市，进而升格为市镇、巨镇。黎里，还有周边的同里、周庄、锦溪、甪直、西塘、南浔、乌镇、朱家角、金泽等等，它们的崛起全都可以追溯到南宋迁都和元代的动荡。

黎里人为了适应江南气候，他们的住宅布局多穿堂、天井和院落，结构多是瓦顶、空斗墙、观音兜山脊或马头墙，建筑呈现高低错落、粉墙黛瓦、庭院深邃的群体风貌。江南多水，又形成了一整套富有特色的建筑小品，其中颇有特色的就是弄堂。

弄堂，是江南市镇人民特殊生存体验的遗存。本节介绍弄堂的种类、成因、功能和文化。

黎里的弄堂

黎里的弄堂，1988年统计弄堂有115条，经过多次建设性的拆

毁，现在全镇尚存85条。江南其他古镇同样也多弄堂，比如西塘，多达百条，主要的有16条，仅此16条就已长达2000米。西塘最吸引人的弄堂是明弄，最著名的计家弄与石皮弄都是明弄，黎里则以暗弄为多，全镇的暗弄至今仍有70条，占总数的82%。

弄堂的名称极富民间色彩，一般称“某家弄”。西塘百米以上的弄堂有5条，其中以姓氏命名的就有4条。大户人家建造房屋，总是一进一进地造。某家始祖先造个三到四进，随着子孙的繁衍，逐渐增加进数，五进六进的接下去。很自然的，串连各进的备弄就以这一家的姓氏命名了。黎里镇“周、陈、李、蒯、汝、陆、徐、蔡”八大姓，每个姓都有弄堂。周家有周赐福弄，陈有陈家湾堂弄，李有李厅弄，蒯家弄有三条，汝家弄有四条，陆家有陆家弄，徐家弄有三条，最多的要数蔡家弄了，有东蔡家弄、西蔡家弄、中蔡家弄、南蔡家弄、北蔡家弄，达五条之多。以姓氏命名的弄堂共计62条，占总数的73%。

宽1.6米的东蔡家弄



除姓氏外，弄旁富有特色的建筑，也是取名的原由。黎里镇西有一条连通大陵桥的庙桥弄，因为大陵桥一桥挑二庙，它的南北各有一座香火旺盛的庙宇，所以大陵桥俗称庙桥，处于庙桥南面的那条石板弄就习称为庙桥弄了。弄边较有名气的店铺也可以作为取名的来源，

恒丰泰弄、祥和弄就是，恒丰泰和祥和都是百年老店。弄内的作坊也可作为取名的依据，如油车弄、花车大兴弄、哺坊弄、染坊弄都是。还有一条石皮弄，那是根据弄堂特征取的名。

西塘也有石皮弄，而且非常有名，石皮弄南北走向，西面是冯姓大宅，东面是王家大宅，两边都是高房子，上面一道狭长的天空，地下是能让全弄雨天不积水的下水道。石皮弄总长68米，最宽处1米，多数地段只有0.8米，由166块条石铺就，这些条石宽0.3至0.4米，长0.8米至1米，厚度仅0.3厘米，称为石皮弄真是最最贴切不过了。

黎里目前保有三条石板明弄，最有名的要数庙桥弄，宽2米有余，长83米，全由条石铺就。明清两代这里是一条热闹非凡的商业街。商业街条石下的阴沟泄水畅快，大雨刚刚下过，穿着布鞋尽走不妨。每隔寻丈，总会找得一块两头凿有“象鼻眼”(黎里人的专称，也叫牛鼻子)的条石，那是古代的窨井盖，有了它，阴沟至今畅通。

庙桥弄



黎里最长的弄堂是李厅弄，长135.7米;最

宽的弄是庙桥弄，宽达2米；最狭的弄，恒丰泰弄和范家弄，只有0.7米。

除了明弄与暗弄，还有一种沟通水陆两路的通道，姑且叫它“水弄”吧。黎里的水弄所剩无几，西塘的水弄保留较多，有明弄也有暗弄。水弄稍宽，坐船的人要上街，包括摇船的农民，他们往往经过水弄到街上来。商店用船运送货物，总选最近的水弄停船。镇上有些人家只有沿街的房屋却没有后河，他们只能通过水弄到河里汲水或者洗涮，水弄就成为用水人家的通道了。这种水弄很重要，万一失火，这里就是取水救火的水源了。

弄堂的成因

弄堂，最早时作“弄唐”，见于明代祝允明所著的《前闻记》。祝允明在书中解释说：“今人呼屋下小巷为弄”，又说，小巷称作弄唐，唐就是路。凡屋边的备弄或街路的支巷都称为弄唐，后来写成“弄堂”。

黎里的民居与江南水乡众多的民居一样，单体以木构一层、二层厅堂式住宅为多。弄堂就在这些住宅中形成。一家一户内部的通道，户与户之间的界线，都是弄堂。

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工商繁盛，人才荟萃，水乡城镇的住户又多诗书之家。江南古镇更是官宦退隐、富户别墅、学士散居之地。文化人总喜欢精心营造房舍，那些富商大贾也跟风上，聘请一邦文人帮助筹划，所以黎里镇区留下了不少精美的宅院。

江南民宅的规模可以分为大宅、中宅和小宅三类。大宅是富商、官宦的宅第。大宅少则四进，多则可达九进；少则一落，多的三落五落甚至达到七落。黎里的周赐福堂纵深六进，东面陈鹤鸣的住宅，横向就有三落。

大宅的平面布局，都有严格的轴线，正门朝南或朝东，宅院规矩方正，进落有序。大宅主落一般都有五进，多的有九进十进的。中宅形式上看与大宅相仿，进数较少，一般少于四进，大多没有边落，内部空间也没有大宅考究。小宅，平民的住宅，规模小，占地少，没有严格的轴线，一般只有两进，面宽多在一到三间，形式自由，因地制宜，空间利用合理，私密性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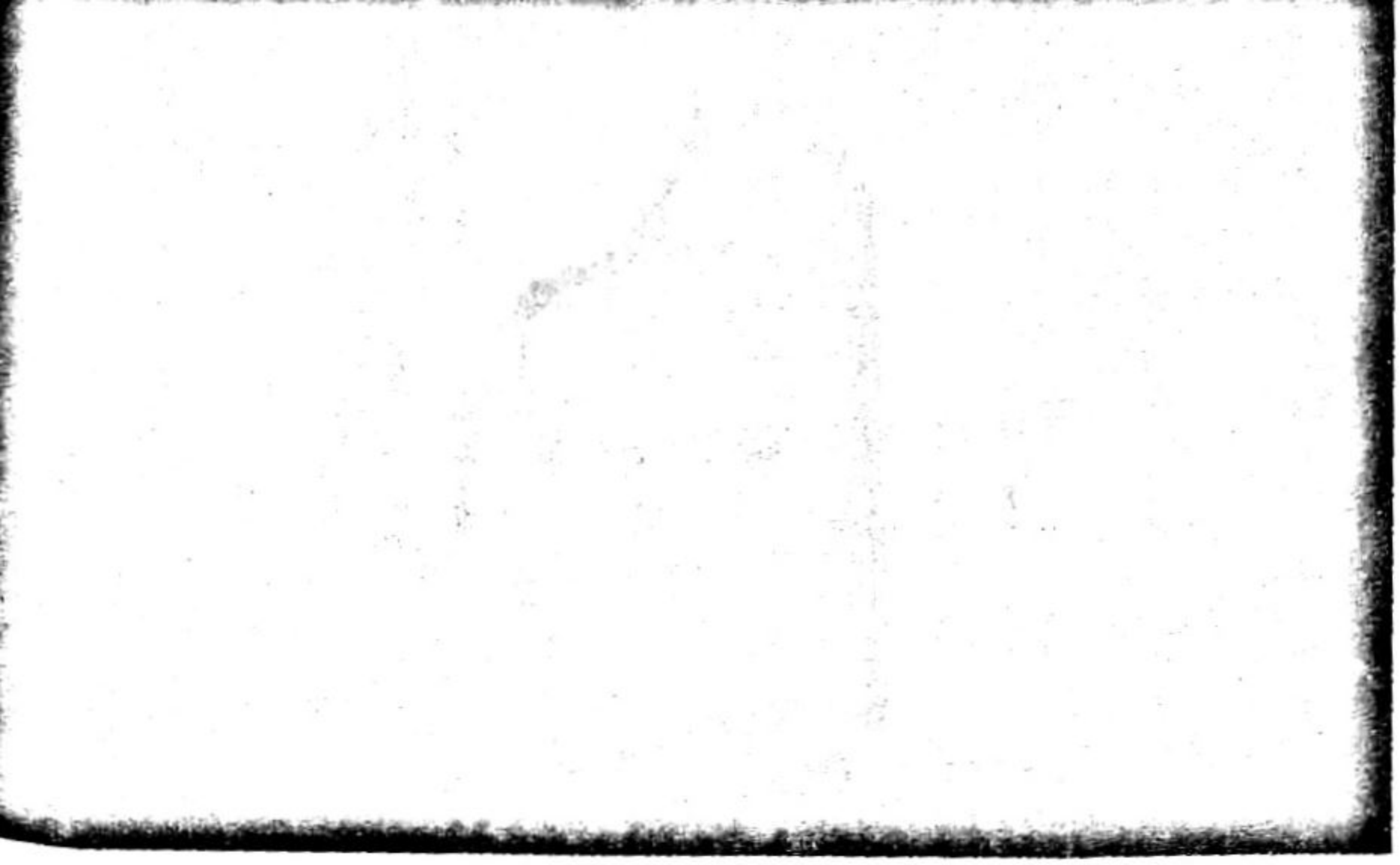
备弄主要出现在大宅与中宅之中。大宅庭院深深，门槛特高，天天进进出出，实在有点吃力。聪明的江南人设计出了备弄，凡朝南的住宅，备弄就置在东侧，朝东的宅子，备弄安排在北侧。平时进出，不必打开一进进的双扇大门，径走备弄。中宅，进数也不算少，大多也有备弄。那些有好几落的大宅子，落与落之间必定安排有备弄，似隔而不隔，空间既分割又相通。这种备弄上面都覆盖屋面，所以全是暗弄堂。

黎里的民居，明清时期一律沿河而建，正门面对河道。宅与宅之间，留有一定的通道，这种通道大多不盖屋面，就成为了明弄堂。乾隆时期黎里的工部尚书周元理，建有六进大宅，再加后花园，非常气派，不过周宅仅仅一落，当中一条备弄，与东边陈鹤鸣的豪宅相邻。周、陈两姓，最早是外甥和舅父的关系，中间的备弄，现称“周赐福弄”，建成暗弄。陈宅自西向东，占地64米，面阔15间，到东边建一条明弄，现在叫做“大观弄”，与徐姓相隔。

明弄和暗弄略有区别，明弄，不同人家的分界线；暗弄，也叫备弄，一般说是一家一户所用，少数设在二姓之间，像上面看提到的周、陈两家之间的周赐福弄。

弄堂的功能

弄堂不是居室，属于线形建筑物，造型狭长，有的长达一二百



备弄灯龛

米。从建筑实用功能看，弄堂是人在建筑环境中的一种行道路线，上面盖了顶的道路，遮阳、挡风、避雨，有了弄堂就可“雨天不湿鞋”。弄堂又是建筑空间环境的一种组织手段，中国建筑环境都是群体组合，由若干单元组成，这些单元与单元就靠弄堂串连与组织。要到某一进办什么事，径直穿弄堂走边门就行。平时一家老少，不走正门而在弄堂出入，简便随意。遇到红白喜事，贵人临门，才郑重地大开正门，往里迎接。当然，也有例外，有的人前来拜访，不愿声张，请来人由备弄出入，隐秘安然避开了不少耳目。

备弄，不见阳光，很少窗户，总是黑古龙冬的，不说黑夜，就是白天也最好点上蜡烛。所以备弄的墙壁上每隔一二丈总要开一个灯龛，呈“介”字形或者像桃子形状，点上灯盏或蜡烛，用以照明。古人相信“银不露白，暗可藏财”。江南地区不仅仅弄堂，几乎所有的卧室都以暗为安，这早已是一种风俗了。想一下，也有它的必然性。动荡的社会，常常有小偷甚至强盗光顾，敞亮的房屋，内部的结构路径、进出的通道，以及主人家拥有的器用财物等等都将暴露，遭遇失财还是小事，身家性命都将发生危险。

弄堂，总是步步高。第一进的备弄最低，第二进稍高，以后次第升高。这是实用的需要，也是一种口彩。江南水乡，泄水非常重要，每当黄梅天或雷阵雨，阴沟排水的畅与不畅，直接影响到人们



备弄步步高

的生活质量。备弄步步高，下面的阴沟也步步高，泄水就畅快。建筑群落如果单面向水，那么备弄，包括整个建筑的地基一律逐步增高。有的建筑群落前后都有河道，那么备弄步步升高到一定地段，后面一段备弄渐次降低。黎里周赐福弄，南北临河，全长92米，前后低中间高，形成南北两个步步高。南面一到五进的备弄70余米，由南向北步步增高，北面第六进是下房，下人的居室，备弄20来米，地基就此降低，不过，假如由后门作为起点，也还是一个步步高。

大多数的弄堂总要拐上几个弯，而且是直角转弯。江南有句老古话，“两头直通，人财两空”，仔细想去，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一条弄堂假如直通通的，前后门一开，风就来了，那风是阴风，扑面直啸，伤人是必然的。最要命的是两头直通，在社会治安不大安宁的社会，着实让人捏一

备弄的直角拐弯



把汗，小偷强盗冲破前门或后门，就可以直闯进来。于是让弄堂多转几个弯，转弯处再设石库门，大块的麻石制作门框，安上一块厚厚的门板，俗称“健门”，大约因非常坚固而得此名称吧。健门后面墙壁的左右各设一个门栓洞，右边的洞非常深，整条门栓塞捅在里面，用时拉出来，横架在两洞之间，紧紧地挨着健门。一般的一个健门后面有两条门栓，有的后面还加一个“撑”，又相当于一条门栓。弄堂的健门，除了前门和后门，当中每一进都安排一道，存心不良者面对这一个个关卡，只能望而却步。抗日战争那年头，日本鬼子来到黎里，看见弄堂，黑古隆冬的深不可测，这，同北方的地道差不多，也许里面设有陷阱，藏有埋伏，战战兢兢的都不敢贸然入内。

弄堂除了防偷防盗之外，还有隔音、防火的作用。两落之间有了弄堂，互相间就少了干扰。两姓之间设的弄堂，介于高高的风火墙当中，一方失火，不会殃及邻家。

弄堂的文化

江南古镇的弄堂，问世于南宋，民国年间逐渐收住脚步，多数是明清两代的产物。而今弄堂已经是一种文物了，必须好好保护下去。

弄堂，明清时代重要的产儿，明显地带着它与生俱来的印记，除了“步步高”之类的口彩，更有封建等级的色彩。

处于两落之间的弄堂，一般写成“备弄”，也有写成“背弄”、“陪弄”。背弄，后面的或旁边的弄堂。备，弄堂的确是作为备用的建筑，备，在古代可作后墙解释，备弄就是辅助建筑了。陪弄，陪衬的建筑，仍然是辅助建筑的意思。住房用于居住，弄堂不住人用作通道，当然是辅助建筑，这好理解。可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中国建筑史》一书，竟然写成“避弄”。初看不知所云，思虑再三，大抵会

恍然大悟的。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特别森严，奴仆不得走正门登堂入室，尤其是主家有红白喜庆，登堂入室的只有主人一家或者尊贵的客人，奴仆们只能穿备弄。因此，一个“避”字，道出了主仆分道、贵贱有别的封建礼教。

弄堂，划分出的空间环境，不仅显示出尊卑，更显现着亲疏。两姓之间多设明弄，一条明显的隔离带。同姓或者一姓内部的两落之间，大多设为暗弄，既间隔又联系。

弄堂，好比一根线，这根线将建筑群落上的颗颗明珠串连起来。顺着弄堂，可以访问每一进空间。从暗弄堂突然推开侧门，一束强光猛的扑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总是院子或天井，点缀着老树、巴蕉、梅花、山石，别有洞天，赏心而又悦目。

黎里的备弄，大多非常幽深，中国古代建筑崇尚的空间意识往往在于一个“深”字。所谓深宅大院。“侯门深似海”，这里的美就美在“深”。黎里古镇的弄堂，超过百米的就有5条之多。

进入狭长的备弄，空间感受倒也并不单调，屋顶变化丰富而有规律，那变化同备弄穿过的建筑关系密切。头顶界面是木质的平顶，穿过的是楼房；是单坡，穿越的则是厢廊。一段一段地走，石库门一个一个地来，每个石库门标示着一进房屋，石库门的个数就是建筑的进数。根据头顶界面的建筑形式，根据石库门的个数，可以知道自身所处的空间位置。在备弄停一停神，眼睛适应了，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光，大有莫测的变幻。备弄两侧的墙面总有曲折，每家入户的门都要凹进墙面，一抹浓重的阴影；单坡屋面，头顶上就亮着小小的天窗，投射着一方明亮；院墙上必有漏窗的花纹，洒进了点点光斑；偶尔也有一段天井或小院，阳光普照，那真叫豁然开朗。

备弄幽深、幽暗又幽静，隐隐然江南人性格的一个侧面，内向、秘密，或多或少藏有隐私。弄堂，线型的狭长建筑，近于封闭，隐而不露，正是水乡人的性格在建筑中的映现。

历史的车轮滚动到了今天，黎里镇的居民平均每家已经拥有一辆摩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小汽车已经来到富起来的家庭，很快就将开进每家每户。现代的江南水乡，需要的不再是弄，而是宽畅的路。黎里的弄堂，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完整地承载着历史的信息，映现着水乡人民的建筑实践，折射出水乡人民独到的生活体验。

六、廊棚

明初江南形成丝绸、棉花、粮食三大专业板块，各大市镇都建起了一条或数条商业街。黎里属于粮食专业镇，不过各专业市镇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黎里也有店铺加工棉花、买卖丝绸，商业街出现了，尤其是“上岸”，那是最最热闹的地段，为了聚人，为了生意，廊棚应运而生。

本节试就廊棚的形成、种类、功能和文化，作出介绍。

廊棚的形成

三里长的黎里古镇，上岸与下岸，自东向西一式搭建了廊棚，就连镇西头的横街，也全是廊棚，晴天不打伞，雨天不湿鞋。在黎里老百姓口头，流传着多个关于廊棚起源的传说。其中一个最为有趣，说从前某店家有位小姐，自恃美貌有文才，要找一个相貌堂堂也有相应肚才的郎君。于是小姐拟写了一副对联的上联，让伙计贴到店门外的排门板上，征求下联，从中选择如意郎。可是一连贴了几次，夜间不是被风吹落就是被雨打烂。后来搭建了廊棚，才把上联保存了下来，几个月后，终于觅得了一位称心如意的丈夫。自从小姐家

搭了廊棚，生意出奇的好。廊棚可以聚人，有廊棚比没有廊棚生意要好，因此家家搭建，户户相连，全镇“长廊三里覆，无须垫角巾”（袁枚《黎里行》诗）。

传说毕竟是传说，实在廊棚的搭建势在必然。元明以来，黎里上下两岸和横街都是商铺。江南的气候四季分明，黄梅时节多雨，夏季台风经常侵袭，盛夏的太阳热辣辣地炙烤，冬天的西北风老是挟裹着冰珠雪花，聪明的黎里人搭建廊棚，让过往行人避风挡雨遮太



廊棚一

阳。

当然，黎里镇的沿河长廊并非一步到位，先是沿河的商店在门前各自搭建，因为店与店你挨着我，我靠着你，各家的廊棚也就连成了系统。万一某店生意不好而歇业，或者搬迁了，黎里镇上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一定将廊棚原封不动地留下，廊棚构架简单，木柱、木梁、木椽，上覆网砖与青瓦，造价不高，留给后来的店铺，于已没有多大损伤，对人则是一桩善事。



黎里的商店，清一色的沿河，采光条件特别优越，不像两面有建筑物的普通小街那样暗。街道都不宽，多数只有三五米，狭窄的地段只有二米上下。明清两代，街道上来往只有行人，顶多挑一副担子，不像北方驴啊马的，时不时来一辆高大的马车。廊棚尽管低矮，又狭长得如同一条长带子，而对于古镇来说，尽够足用，堪称一桩创造性的防护工程。

古镇的廊棚，介于店堂与市河之间，行人可行也可停，不是固定的活动场所，在生意场中的意义却又非同小可。这空间，近代建筑学家称为“灰空间”。其实灰空间，并不灰暗，它长长的，弯弯的，起伏，蜿蜒，美人靠和亭廊点缀其间，打破了长廊线性的

单调。

昔日黎里镇的夜晚，安逸而又宁静，平日里多数的店铺不开夜市，不过他们总在廊下挂一盏灯，为过路人，也为市河里的行船照明。至今还能寻觅到不少灯柱石，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多数是青石的，也有麻石的。每当逢年过节，尤其是八月半，各家店铺张灯结彩，街道上闪耀着一排排宫灯，市河里对称地闪亮着同样的宫灯，数千灯火，透迤有致，纵横交错的灯火长龙，撑持出“丁”字形的亮丽空间，煞是壮观！

廊棚的种类

黎里古镇的廊棚，建造形式多样，有披檐式、人字式、骑楼式，

廊棚二



再加过街楼等样式。

披檐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在店铺门前加建简易的廊棚，斜斜的一披势，一般宽2到4米，沿市河一侧立有廊柱。第二类更简单，只在店铺门前，悬挑或者用斜撑建成一披势，另一侧不用落地木柱，这种披檐不会超过2米。

人字式，披檐式是单坡形，人字式则是双坡形，沿市河一侧落有柱子，坡面一般要比披檐式为宽，多数在3米到5米之间。

骑楼式，廊棚建成人字式屋面，再在人字式屋面上骑建楼房，有的骑建三分之一，有的骑建一半或者更多。

过街楼式，主要有二种类型。第一种，街道两侧的房屋通过二层的连廊互相连通，底层中间为街，两侧是店面房，周庄镇的城隍埭过街楼就是如此，习称的“街从宅中过”。第二种，上面为楼房，下面靠市河一侧立柱支撑，立柱四围砌砖加固，楼房下形成的空间作为街道。可惜黎里镇上的过街楼在前几年建设性破坏中已经拆毁，目前正在恢复之中。

披檐式和人字式最为简易，明清两代黎里古镇多的是这类廊棚，至今保留得最多的也是这一类。

骑楼式和过街楼，主要同江南古镇人口密度有关。黎里的街市，可真是寸金之地，说一寸土地一寸金，并非夸张之辞。早在唐代，杜荀鹤就有一首《送人游吴》诗，“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乡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渔歌。”唐和北宋以前，苏州府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65人，杜荀鹤已经说姑苏的“闲地少”了，到明代，苏州府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已经超过300人，清乾隆年间则猛增为每平方公里1100人以上。黎里镇的人口密度没有确切的数字，想来不会少于苏州府的平均密度吧。正由于人烟稠密，精明的黎里人才建起了骑楼式和过街楼，这样既增加了生活起居的空间，又不妨碍街道的通畅，一

种占天不占地的好方法。

两侧都是楼房的过街楼，下面的街道较为封闭，大多光线不足，好在黎里古镇这种地段不多。多的是披檐式、人字式和骑楼式三种形态，临河一侧宽敞开放，光线充足视野开阔。

廊棚的功能

黎里的廊棚，一种特殊的建筑，带有覆盖物的道路，线形，狭长，长达数百米上千米，称为长廊恰如其分。廊棚是实用而又实惠的行道路线，行人购物逛街，夏天不受太阳暴晒，雨天不必打伞，还能抵风挡雪。

廊棚将各个地段的建筑物串连起来，成为引导人们行进的线路。凡有廊棚的地段，多数开设店铺，宽阔的地段，尤其是建有美人靠和亭廊的地段，大多是商业中心，必定热闹。廊棚俨然变成一种组织手段，好似一根红线，将颗颗明珠串连一起，形成一个起伏蜿蜒的有机整体。

黎里古镇廊街的宽度依照河道而变化，顺着街道的走向而逶迤，参差有致。上岸和下岸的廊街，风格和谐一致，空间尺度宜人，两岸的视线没有阻隔，人在廊街下行走，对岸廊街的景致尽收眼底，不需高声，就可直接对话。河道整体感强烈，犹如一座长长的水上戏台，演绎着人生一幕幕戏剧。廊街是交通要道，也是居民日常家务、邻里交往、休息娱乐的地方。廊棚，古镇的公共起居室。

廊棚下常有上街卖蔬菜的菜农，出卖时鲜的果农，市河中不时响起悠长动听的卖鱼声，更有那粜米、掏粪的田装船。热闹、热烈也不乏热情。

廊棚下的街道是一种典型的复合空间，它不仅具有街道的功能和意义，而且还蕴含了民居入口的门廊性质。有的店家沿市河一侧

做上一排美人靠，讲究一点的，中间再搭建一个亭廊，安上一张石桌几方石凳。引来了左邻右舍，特别是一群老翁，围坐、喝茶、下棋、聊天，也引来了顾客驻足逗留，人气一旺，生意当然热闹。

更多的地段，没有考究的亭子与美人靠，只在沿河一侧安排长石，既是公用的空间，又可以私用，充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舒适而又亲切。

黎里镇中心沿街房屋十分紧俏，“七世修来街面屋”，在那热闹繁华的去处，能够拥有一间店面，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假如占有三个门面，那简直就是日进斗金的聚宝盆了。五开间七开间的门面，平民百姓无法祈求，就是中等之家也不敢奢望，只有名门望族、富商巨贾才能气派地占有。江南古镇最常见的，“下店上宅”、“前店后宅”或“前店后坊（宅）”，融商业、居住、生产为一体的建筑形式，尺度并不高大，空间面积利用率极高。黎里镇正是如此富庶和繁盛的铺排，商店毗邻，货物满架，人流如织。廊棚下的路面大多碎石子或石板铺成，下面安排着雨天排水的阴沟。市镇的店面，全敞开着，一式装卸的木排门板，早晨开店卸去门板，柜台沿街而立，走在街道上的顾客，一伸手就够到了货物。如果是茶楼、酒肆，客人可以在品茗、小酌的同时，欣赏熙熙攘攘的街景。因为有了廊棚，店主都喜欢把货物摊出店面，摊到街道上，行人走走停停，满眼是琳琅的商品，磕磕碰碰的。逼仄是逼仄了点儿，可就是繁盛，闹猛，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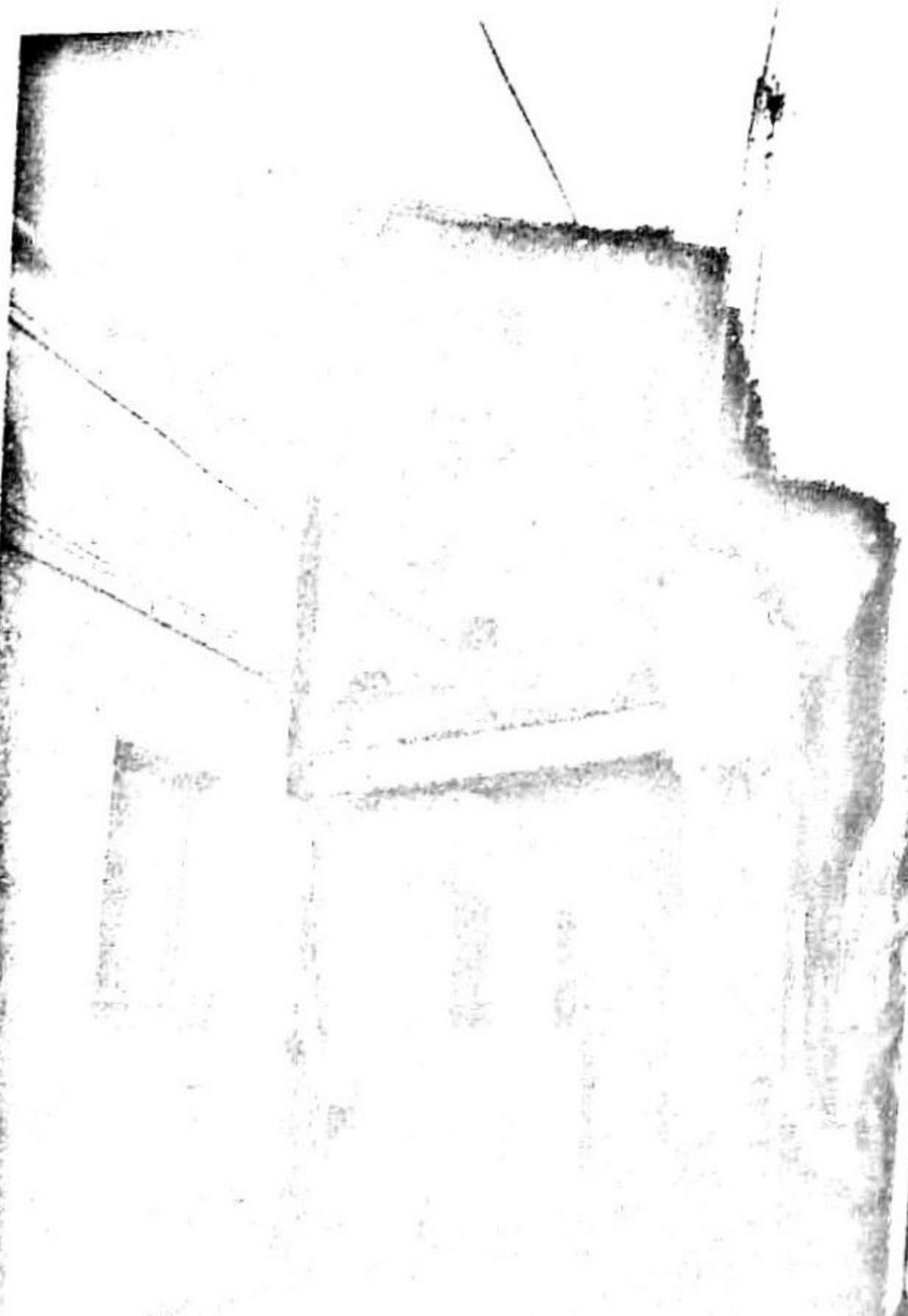
廊棚的文化

黎里的廊棚，是一种建筑文化，更是商业文化和民俗文化。前文引录过一个廊棚起源的故事，其实这类故事很多，不仅是黎里的，更有姐妹镇的。

最为传神的要数下面这个了：明朝洪武初年，一个下雨天的傍晚，一家南货店门前来了个叫花子，在店前的屋檐下避雨，店主看了，给了一些吃食，还让他进屋里来，叫花子讨乞也有行轨，不能随便进人家屋门，要关店了，好心的店主拿了一番草荐，连在屋檐下，又在另一端竖了几根木杆，为叫花子临时搭起了一个小棚棚，让他暂时栖身。第二天，叫花子不见了，店铺的排门板上，留下了用剥落的石灰写的几个字："搭建廊棚遮风雨，积善人家来财运"。从那以后，原本生意清淡的南货店，顾客盈门。原来这叫花子是仙人，他是来试探人心的。为了感谢这位仙家的恩德，店主用砖瓦、木架构建了廊棚，跨过小街直到河埠头。这样一来，南货店的生意更加兴旺，财源滚滚而来。其他商贾见了，纷纷效仿，黎里镇就此形成了长长的廊棚。西塘也有类似故事，传说一位老人看到船工们实在太辛苦，被太阳毒辣辣地晒着，就用木头、瓦片搭建了一个廊棚。

这种传说，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体现出了传统的与人为善

骑楼式廊棚



的思想，与温柔的江南人的主导性格一脉相承。

长廊护街，富有浪漫情趣，这种浪漫情趣延伸到了石桥之上，明清两代，黎里的多座石桥都建有亭子，镇西头望恩桥的俗称“亭子桥”，就由此而得。

黎里古镇的长廊最长，上岸、下岸和横街，有1900来米。明清两代，逢年过节，各店各铺挂出宫灯，好一道时而笔直时而逶迤的风景线。

黎里的廊棚，全都是水廊，与水相临，与水相亲。市河中的一条条小船，商船，来来往往，河对岸的河埠头上，人们三三两两在洗菜、洗衣，互相答话，你一言我一语的。再加美人靠上，亭廊之中的老翁及歇脚的顾客，或围坐或娱乐，多么惬意，多么清闲。市河的对岸，一簇簇高翘的马头墙，一家家临河踏级入水的河埠头，同廊棚相应，一高一低，一黑一白，打理得虚实相间，刚柔并济。市河把上岸与下岸又联系又分隔，小船在游弋，橹声欸乃。静的与动的，轻的和重的，那样的和谐，静谧。

黎里的廊棚，各个细部不尽相同，有高有低，宽窄不定，灵活多变，富有韵律感，布局随意精练，造型轻巧简洁，轮廓柔和而又美观，风姿绰约，仿佛苏州园林中一道贴水长廊，又如一曲跌宕起伏的江南丝竹，古镇凭此增添了几许古韵雅意。

黎里的长廊蕴含着审美趣味。漫步廊下，眼前的空间豁然开朗，视野相对开阔，移步换景，就像观看一轴水乡长卷，又如一溜民俗风情画廊。

七、厅堂

一个古代建筑群体中，必定有一座主体建筑，就是通常说的正屋。这座正屋，在宫殿、陵寝还有宗教建筑中称殿，在民居，包括官邸、园林等群体之中就是厅或堂。汉代以前，厅与堂有一定的差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东厅壁记》中说“凡视事之所皆曰厅”;堂，《说文解字》:“堂，当也，正当向阳之屋”。厅与堂，在形制、功能、文化属性等等方面，基本相同，汉以后厅堂连用成为一个专门建筑用语。

本节拟对厅堂的堂名、类别、功能以及厅堂文化，逐一作出介绍。

厅堂的堂名

古代没有门牌号码，大户人家往往取一个堂名作为标志，以示与其他家族的区别。最早为自家取堂名的是唐代的宰相裴度，所取的堂名叫“绿野堂”。社会交往中经常需要使用堂名，比如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交往、信只物件的寄送投递，有了堂名就方便多了。还有造屋、建楼、修坟、划界等等，那时都需要将堂名刻在石碑上。堂

名是一个家族的番号，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传统的儒学图腾，历史上那些富家大户，无一例外都有自家的堂名。

黎里古镇，始自宋元，繁盛于明清，居民上万，殷实之家众多，他们大多取有堂名，那号称八大家的“周陈李蒯汝陆徐蔡”，家家都有响当当的堂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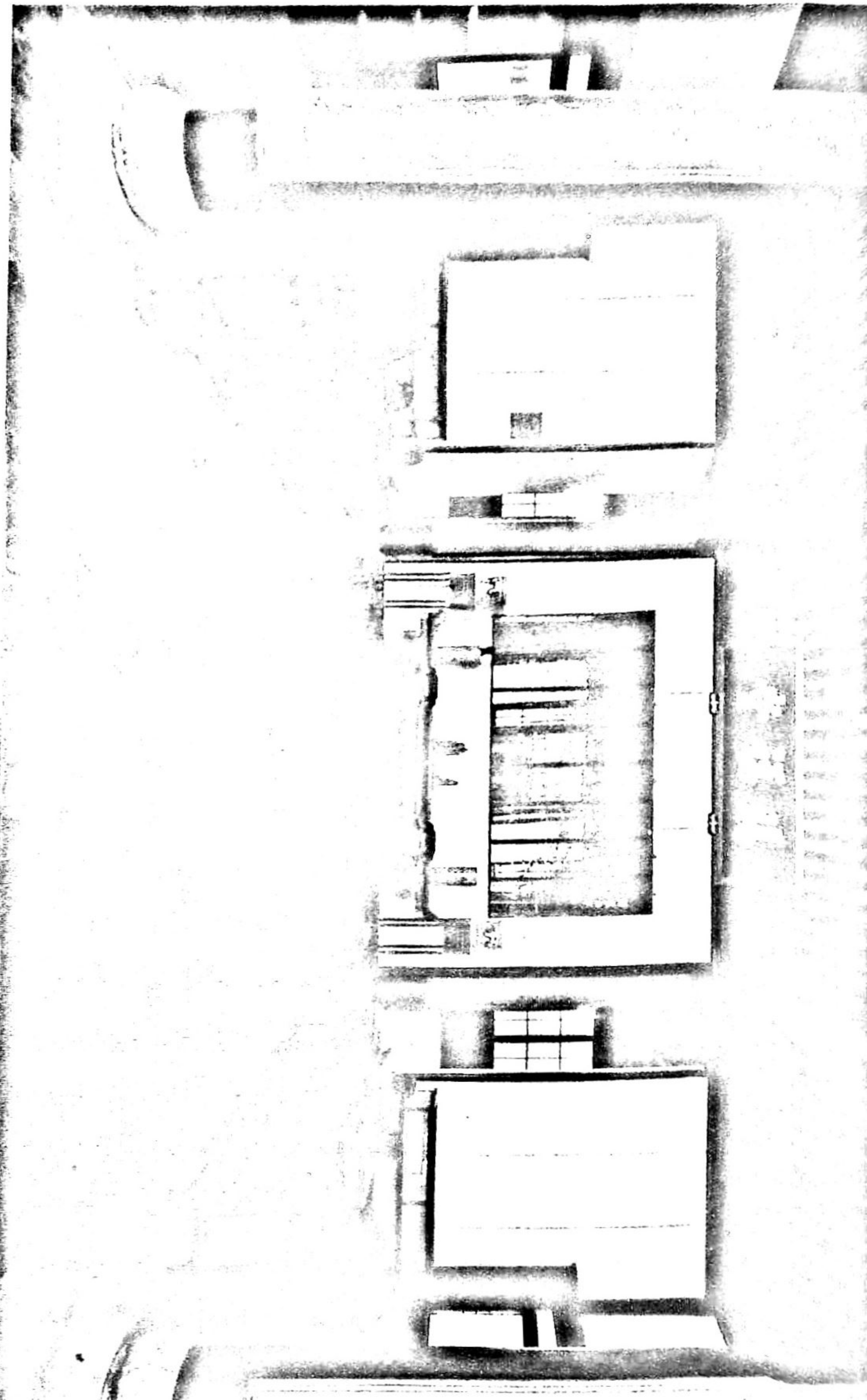
统观黎里古镇的堂名，有标示祖上籍贯、荣耀及发迹渊源的，有显示自身品德操守的，更多的则是为激励家族兴旺而发，也有追求平安，乃至回归自然平淡的。

黎里，同其他江南古镇一样，人口多数是南宋以及元代从北方迁徙过来的。南迁移民为了铭记祖先，他们所取的堂名好多同籍贯相关。黎里蒯氏一族，从湖北襄阳迁来，堂名就叫“襄阳堂”。

黎里的王家虽然排不进八大姓，但是他们的堂名“三槐堂”，则是在全国也是排得上号的，典出北宋王祐家。《宋史·王旦传》有记，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祐，以文章著称，政绩也十分卓著，他相信王家的后代必定显达，根据《周礼·秋官·朝士》有“面三槐，三公位焉”的记载，亲手在院子里栽种了三株槐树，认定自己的后代一定有位居三公的，种上这三株槐树作为标志。王旦出生后，好学有文思，王祐更自信了，后来到真宗时王旦果然作了公相，三槐堂是王氏一姓的荣耀。大文豪苏轼特地为此写过一篇《三槐堂铭》，后来收进《古文观止》，广为流传，因而尽人皆知。

黎里八大姓之首的周家，始祖周元理，原先的私宅在黎里浒泾弄西侧，五开间五进，堂名“寿恩堂”，据柳亚子回忆此堂匾额后来由乾隆皇帝御笔亲题。周元理为官勤谨，最后升任工部尚书，多次得到乾隆赐写的“福”字，告老回乡前，周家建造了一座横七开间纵六进的新宅，取名“赐福堂”，从此赐福堂遐迩闻名，一直是周氏一脉的荣耀。

黎里的殷家，有堂名“闻诗堂”。清道光年间，黎里乡下长田人



殷寿彭、殷寿臻兄弟在此读书应考，殷寿彭道光20年考得二甲一名进士，俗称“传胪”，弟弟殷寿臻道光24年也得中进士。兄弟俩双双身登龙门，黎里镇上一时传为佳话。殷氏后裔为铭记祖宗发迹的渊源，更无法忘怀殷寿彭、殷寿臻兄弟在此声震瓦屋的苦读，于是翻修宅第后，将厅堂取名为“闻诗堂”。

随着子孙的繁衍，家庭逐渐兴旺，家族日益扩张。黎里镇的几个大族，出现了分支，兄弟间自立门户，分堂安居。前面说到的蒯氏，由襄阳堂，派生出了“礼耕堂”和“树滋堂”。

也有由于意外变故而更改堂名的。位于黎里八大姓第三的李姓，他们堂名本来是“传经堂”。自明至清，传至李璜，乾隆间官广东韶州知府。一次李璜路过丹霞寺，发现了明朝末年该寺主事和尚澄归的一本《遍行堂集》，一读，发现尽是对满清的毁谤语。李璜及长子大翰向上奏告，最后朝廷下达了焚寺磨骸之令，一桩冤案就此酿成，丹霞寺被血洗，五百和尚为护卫寺庙而身首异处。李璜父子以鲜血染红了顶子，可是李璜在进京朝觐时病死，儿子李大翰擢升湖北汉阳府，赴任路上，遇见一名和尚，一身红袈裟，登舟合掌，前来募化，次日，大翰竟莫名其妙地死去。据说，自此以后，李氏子孙稍有得意，必见和尚，见则必死。自此之后，李氏后裔再也不求仕途腾达，但求平安处世，于是将传经堂改名为“易安堂”。

有追求飞黄腾达的，也有希冀避世的。避世者们的正厅，往往称为“草堂”，工部尚书周元理的后裔中，固然不乏走科举之路者，却也出现反其道而行之的，他们只想平平安安了却一生，周氏的孙儿们，就筑有“开鉴草堂”、“洛雅草堂”，时至今日洛雅草堂仍在。

堂名，肃穆，庄严，理性的思考里也寄寓着异常复杂的情感。

厅堂的类别

黎里虽说也是京杭大运河上的古镇，但是地理位置相对说偏于一侧，历来较少遭受兵祸战火，镇上的殷实之家最多。他们的建筑纵深达五进、七进、九进甚至更多进，各进房屋一般为三到五开间，也有七开间的，大门一般都对着街市，在轴线上依次排列着：大门、轿厅、正厅、正房（属于内室，又称女厅，非请莫入，多数为楼房，且不止一进，形成走马堂楼）、下房。

轿厅，大多敞开着，不安置门窗，主要供来宾停放轿子之用。轿厅又称茶厅，安排几张简单的桌椅，让来客稍事歇息，以等待主人接见。

正厅一般座落于第三进，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利于采收日光，其他朝向的厅堂很少见。正厅习惯上叫做大厅，尺度相对高大，《释名·释宫室》：“堂，犹堂堂，高显貌也。”正厅的高度、体制都超过其他建筑，就是地基也要高一些。拿周家的赐福堂来说吧，在江南属于数得着的著名厅堂，一则与乾隆皇帝和大学士嵇璜二位名人有关，再则是因为此厅规格、结构和工艺，颇有不同凡响之处。赐福堂，面阔13.7米，进深15.95米，面积达218平方有余，高达8.95米。屋瓦密布，哺鸡筒瓦脊顶，下有飞椽，外观高大轩敞，气势雄伟。这么高敞，身处厅堂内却不会感到空广。原来是设计巧妙，采用了覆水椽及轩，建成双层屋面。高大的屋面下，在南坡又安排了一个人字形屋面，再加接一个船篷轩，这样，就降低了厅内的净高。双层屋面将整个大厅划分成三个空间，内部人字形屋面及船篷轩覆盖下的属于大厅的中央部分；船篷轩南安排14扇落地长窗，分割出2.6米宽的走廊；北面沿金柱一线一排屏门，屏门后面的空间，就成了黎里俗称的“退堂”。双层屋面，具有隔热作用，冬暖夏凉，

尤其是夏季凉爽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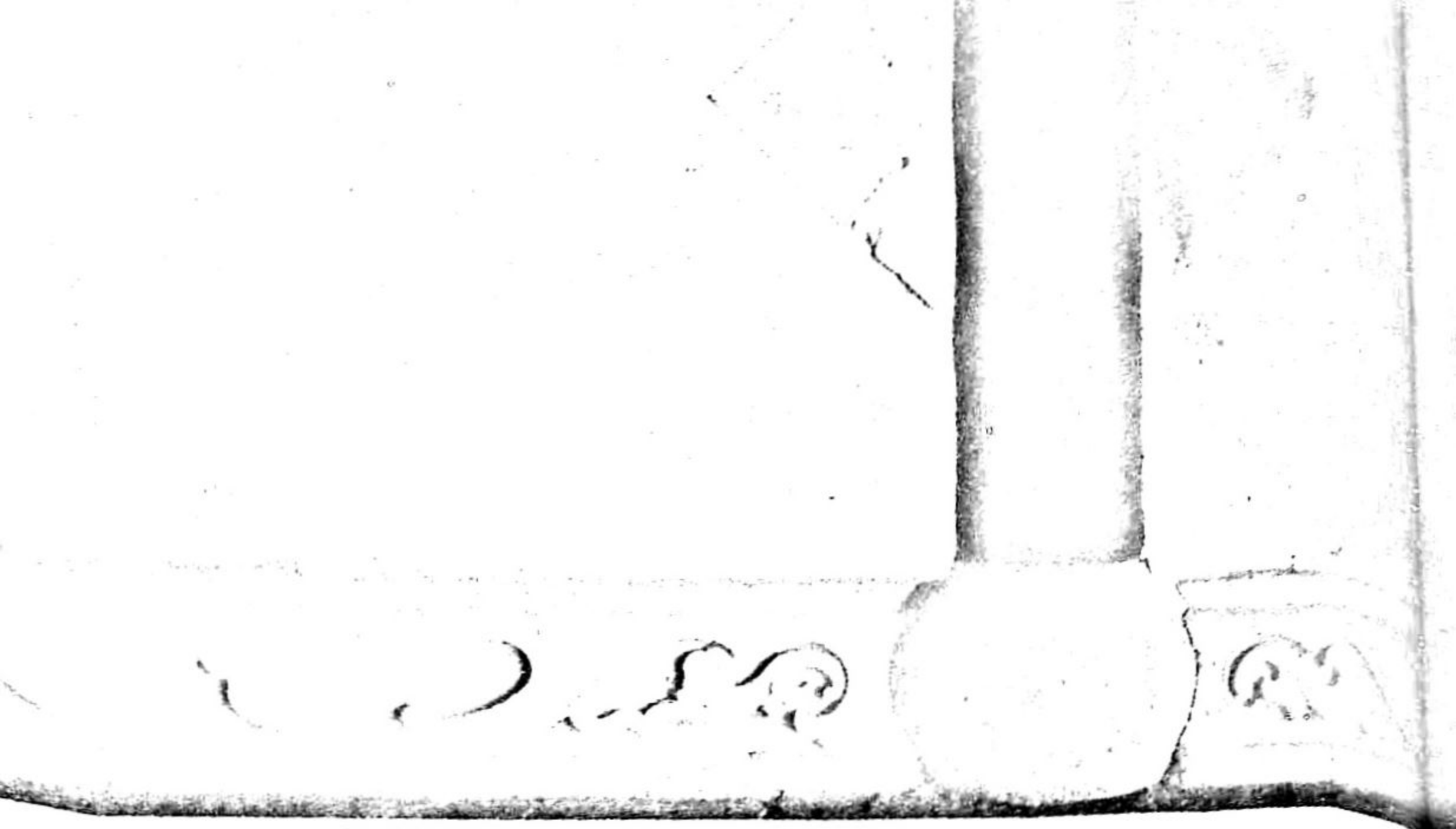
前文说到的几个厅堂，比如“树滋堂”、“三槐堂”等等，都是中轴线上的正厅。赐福堂利用了“轩”的艺术，树滋堂和其他厅堂多半也使用了“轩”，有弓形轩、菱角轩、一枝香轩及茶壶档轩等等，厅堂的造型十分丰富，光听听这些轩的名称，已经大致可以想像出厅堂天花造型之美了。

大宅往往不只一落，中轴线两侧还有边落，有二落的，也有三落的。边落的厅堂称为“花厅”，这种厅的前后，叠有假山，植有花木，置放盆景，幽静而雅致。花厅有单一的，也有两两对置的，或东西相对，或南北对照。花厅的形式自由而多样，各家争奇斗艳的，最富生趣。

有一种名为鸳鸯厅的花厅，一厅分为南北两个独立成局的厅，中间脊柱落地，脊柱间用屏风、地罩、纱橱之类分隔开来，多数鸳鸯厅的梁架制作，一半扁作，一半圆作，艺术地作出区别。黎里沈宅就有一座颇有特色的鸳鸯厅，宽敞明亮，装饰讲究。整个厅堂八大间，厅中央脊柱用地罩、橱扇、折板隔成南北两厅，配以花木、盆景、字画及诗文等装饰，南厅适宜冬季，北厅主要用于夏季。

有的花厅，四周没有墙壁，一连串的长窗安装在步柱之间，外侧回廊环绕，廊柱的檐枋下饰以挂落，下部安排半栏或半槛，供人坐憩、眺望，这种开敞性的花厅叫四面厅。四面厅通常座落于园林或者园林某一局部的中心，便于将四面景色尽收窗内。黎里赐福堂的后花院五亩园，原有一座四面厅，前些年已经毁坏，目前正拟重建。兄弟古镇震泽的师俭堂鉏经园内，有一座四面厅，只有丈二见方，小巧而玲珑。

有的花厅，只在一端开门，这种厅堂称为“船厅”。船是古代江南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由此而彼可以到达预期的目的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诗）。那些仕途失意者，官场搏击



厅堂的墙裙

而黜落者，以及不求闻达的文人学士，往往建造船厅，入船厅犹如登舟，寻求脱离宦海远离尘嚣，达到心灵栖息的彼岸。黎里抗击沙俄、平定新疆的名将张曜，一度退隐，居家养晦，建造过这么一座船厅，取名“退一步处”，此厅至今仍然完整保存着。

敞厅，前面说到的轿厅属于敞厅的一种，还有一类敞厅，四周不砌墙壁，甚至没有门窗，只有立柱。黎里的赐福堂右侧边落，第二进就有这样的敞厅。周家西侧边落的第三进，过去设立家塾，周家的儿孙们在这里读书，第二进的敞厅及前后的庭院，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场所。一般说，敞厅都不是主厅，唯一例外的是震泽镇的师俭堂，它是正厅，破例不设门槛，不用落地长窗，那是经营丝绸的徐家展示了他们敞开胸怀迎接各路丝绸客商的诚意。

厅堂的功能

正厅，是迎宾会客、商议家政、安排红白喜庆、进行宗教祭祀等等重大活动的场所。正厅与其它建筑一起组成一个聚合性的整体，

高大的封火墙把所有的房舍封闭起来。每进可以自成一体，闭则自成段落，开则进进贯通。重大活动虽说在大厅上举行，不过大半需要打开所有屏门，使各进畅通，那排场，壮阔！那气势，非凡！铺排得开，也挥洒自如。

正厅，有宾客来，这里就是客堂；办婚事或者丧事，这里就是礼堂；逢节庆或喜事，请戏班子来唱戏、说书，这里又是演出厅；也有的人家在厅堂上设家塾，那这里就是讲堂、课堂。

大厅正中悬挂匾额，屏门中间挂有中堂。厅堂正中紧靠屏门专放“天然几”长台的地方，天然几前置“供桌”，一种长方形的桌子，黎里民居中大多是八仙桌。八仙桌东西头各安一把椅子，厅堂中间通常分左右排着四个茶几六把椅子。这是最基本的设置。主人家往往在东西两侧还要安罗汉榻或八仙桌，配上椅子或杌子凳，再加上花几、瓶花、各种屏风和中堂对联。堂庑中显现厚重，富丽处不乏优雅。宾客光临，素有礼仪之邦的江南古镇，对主家和客人的座位颇有讲究，主家坐东边，宾客坐西边。主人坐八仙桌东首的椅子，首席客人坐于八仙桌西边的椅子。其余的主人和客人也分东西两边落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主人往往称为“东家”，请客称作“作东”，客人则称为西席。

每逢节庆或喜事，主人家往往请梨园前来唱戏，有时是一家一户出资，更多的是合族中几个支族一起负担。那些支族，多数自取了堂号，他们点戏，不具真名，只写上自家的堂名。梨园早早把所唱的戏单子写成大字张挂出来，每唱一出一折，就翻过一张单子，翻单子者必定要高声报出某某堂点的某某曲，时间一长，人们就把民间卖唱的叫做“翻堂名”，简称“堂名”。久而久之，苏杭一带的乐班，自身就以某某堂作为标记命名，比如“福寿堂”“荣华堂”等等。

除了唱戏就是说书，黎里镇对苏州评弹最最欢迎。蒯家的树滋

堂，俗称“厢厅”，因为音响效果特别好，所以评弹艺人喜欢前来献艺。还有由传经堂改名为“易安堂”的李厅，清代也是黎里有名的书场，评弹艺人一个个地来，一直热闹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电视机进入寻常百姓之家，苏州开设了电视书场，易安书场才关门歇业。

花厅一般处于边落，规模比正厅略小，形式精巧，布置自由，尽显主人个性与喜好。花厅虽说也叫厅，不过使用起来随意得多，主家或作书、绘画，或听曲、操琴，或会友、宴客，或与友人清谈、对弈，以休闲娱乐为主。

明清两代，没有学校，只有私塾，大户人家则设家塾。请一老秀才前来坐馆，对儿孙们进行启蒙教学，家塾大多设在花厅。花厅前后都有庭院，植有花木，叠有假山，孩子们读书间隙，可以嬉戏玩耍，得到放松。

厅堂的文化

厅，最早写作繁体字“聽”，魏晋时期演变为“廳”，加了一个“广”字头。古人说，厅者，从耳，聽也，指堂屋。古代理政的场所称为“聽事”，简称“聽”。魏晋之后，官邸与民居等堂屋，通称为廳。

中国传统的民居，总体来看，深宅大院总以高高的围墙统一环绕，形成一个封闭性的整体，内部除亭台与走廊这些辅助建筑较为开敞外，一般均较封闭、内向，强调私秘性。唯有厅堂特殊，厅堂在建筑群体中，最少私秘性，最为明亮，也最为开敞。

在中国古代，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识分子要想有所作为，必得从修身齐家开始。齐家就是处理家政，这是在小范围内进行施政实践，锻炼政治才干。那些豪门大宅，人口多达数百，处理起事务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红楼梦》第13至15回中，

描写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十分干练。细细想来，能够治理好这么一个大家庭，推而广之，那么大致能够胜任治理一方国土了。

古代厅堂是议事的场所，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所议之事不少。为了公平、公正，当然需要一定的透明度，乃至把一切都摊到台面上来，公开商议。至于齐家之后治国，也就是说治理某一地方的政治，更应当拿到厅堂上来公开议事了。厅堂，议事的场所，这是封建时代的一种制度，渐渐约定俗成变作一种规矩，天经地义的。

颇有趣味的是，黎里人习惯上把厅堂屏门后面的空间叫做“退堂”、“退堂背后”、“后退堂”。不难想见，厅堂是议事的场所，正而八经的事情办理完毕，回到后面去，进入内室休息，就“退堂”了。官府要退堂，家庭也退堂，饱含着特定社会意识的词语，形象之极！

厅堂，本身是一种文化，由厅堂，让人联想到了好些其他相关的文化属性。

在伦理方面，叔伯间的兄弟姐妹前面冠以“堂”字，就源于堂名。比如黎里创设“树滋堂”的蒯嘉珍，育有三子九孙，这九个孙儿同用树滋堂这个堂名，他们就是同堂兄弟，简称堂兄弟，还有孙女，就是堂姐妹。这就是“异姓称表，同姓为堂”的渊源了。

厅堂是木构土筑的人工器物，凡是厅堂用材最精，尺度最大，位居中央，装饰最为华丽，它的宏敞，可以说富丽堂皇。于是诱发了人们丰富的人格联想，由厅堂想到人格的雄伟、崇高、正大光明。人们常说，做人须堂堂正正，这是从厅堂的方正、高显的空间形象而获得的人格比拟。厅堂的建筑环境宏伟敞达，位居中央，装饰最为华丽，都衍变成为人格崇高的象征。在方正、高敞的厅堂上，家庭或家族处理内政，官府听事、理政，不同于在室内与房间的私语，这里是“公共空间”，具有充分的外向性，因为公共、公开，处理起来容易公平合理，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一语就由此引申而出。

厅堂与其他建筑一起，体现了封建社会严格的尊卑位序的观念。



大厅称为正厅，建筑中最为稳重严肃的作品，这里是议事的地方，空间也显得较为庄严；花厅，还有后厅都是偏厅，建筑与布置着重于秀美和宽松，相对来说较为随意。这是正偏有别。正厅，男人们议事的时候，妇女不得随便进入，仆役更不能进入，这是尊卑有别。

厅堂与内室，男人们活动的空间重在厅堂，女眷们生活的空间称为上房，一般为楼房，再加厢房，往往不止一进，组成走马堂楼，这就是内室，具有较多的私秘性，外人不能随便进入，尤其是别家的男人，这是男女有别。

厅堂，包容着封建社会众多的信息。

八、碑坊

牌坊，又叫牌楼，是由并列的几根柱子构成的像门形的装饰性建筑，按建筑材料分，有木、石、砖石和琉璃几种。牌坊和牌楼仔细分起来，仍有一定的区别，一般说柱子上有屋顶的称牌楼，没有屋顶就叫牌坊。

牌坊发端于棂星门。棂星，本作灵星，汉高祖刘邦祭天时规定，祭天先祭灵星。这一规定成为皇家习俗。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在郊外筑台祭天，建筑的外垣专门设置了灵星门，后来又设于孔庙，用祭天的礼仪来祀孔，因为灵星门犹如窗棂，所以灵星为人改作棂星。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这种建筑设施不仅用来祭天、祀孔，还建在庙宇、道观、陵墓、祠堂、衙署、街道、里前、路口和园林的门面之前。此时的棂星门已经演变成为了牌坊。

黎里保留着棂星门的石柱一对，牌坊一座，正好是演变前后的两种标志性建筑。

先说棂星门及石柱。皇家祭天之所有棂星门，孔庙大门也称为棂星门，古代传说棂是天上的文星，以此名门，有祈求人才辈出的意思。后来道观门前也设棂星门，长篇小说《金瓶梅》第39回，就写到道观门前建有棂星门牌楼一节。苏州的老前辈都见过玄妙观前

的棂星门，现在重建，非常有气势。

黎里镇的全真道院，据《黎里志》记载建于元至元二年，其实准确的说法应是南宋咸淳元年，即公元1265年，距元始祖忽必烈统一中国还有14年，黎里是最后被孛儿只斤氏归入元朝版图的江南大镇之一。历史的烟云飘然而过，道观已经荡然无存。追寻遗址，寻到了几块70厘米见方的大青石，厚度22厘米，中间承载柱础的圆盘直径53厘米，由此可以推想全真道院当年雄伟的气势。

最为惹眼的是全真道院残存的两根石柱，至今还坚挺在老街一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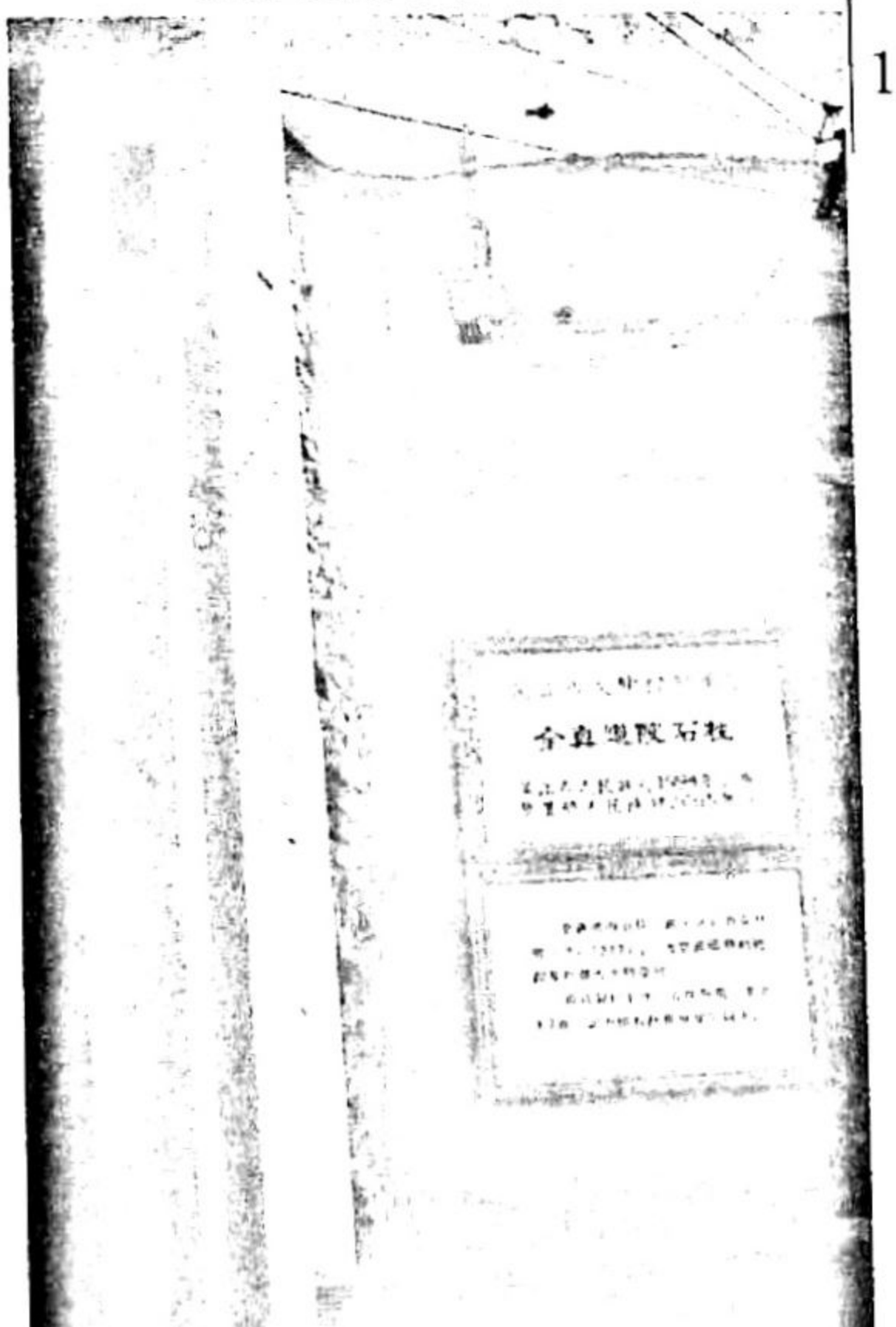
两根石柱，青石质地，高3.7米，直径0.44米，柱呈方形，柱内侧凿石榫，本来与山门镶接的。东侧青石柱内侧有三行正楷小字，除一行已模糊外，两行刻的是“癸酉至顺闰三月吉日”，“干缘蒋达胜，工匠韩文显立”。癸酉至顺，公元1333年，看来68年之后全真道院扩建了棂星门。现在这是黎里古镇有明确年代可稽的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这残存的两根青石石柱，可以说是石碑坊，不过，确切一点说，碑坊是明清两代的特殊建筑，元朝时还没有正式成型，所以这两根石柱，准确地说应当是碑坊的雏形。

在《黎里志》和《黎里续志》上，清楚地记载着明清两代牌坊29座，其中明代6座，清代23座。略分一下，可以分成“科第坊”、“标志坊”、“旌表坊”三大类。

属于科第坊的有状元坊、冲云

全真道院石柱（133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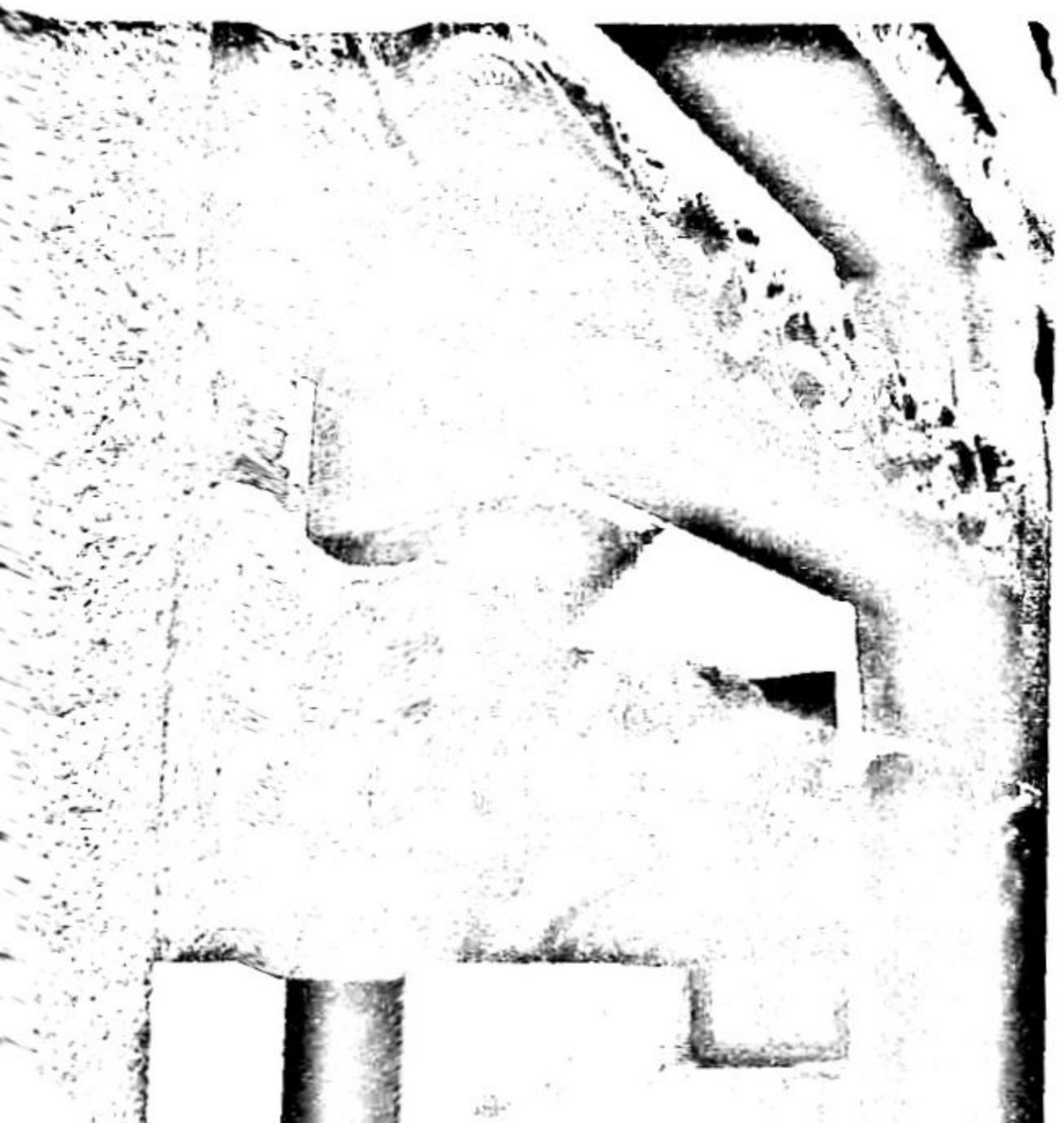
坊、攀桂坊和登科坊四座。状元坊，可以参见本书《特奏名状元魏汝贤》一节。黎里自宋至清，出了特奏名状元1名，进士26人，举人61名，贡生43名，秀才更多。这里的冲云坊、攀桂坊和登科坊，就是考得举人和进士，家族或官府为示荣耀而建立的牌坊。

标志坊有两座，乾隆和嘉庆年间分别出现了两位百岁老翁，古代凡出现百岁老人，称为“人瑞”，于是竖立起两个“昇平人瑞坊”，歌舞昇平，颂扬统治者的德政。

最多的要数旌表坊了，多达23座。旌表孝子、良母和乐善好施表坊各一座，其余20座全部是列女。

29座表坊有27座为吴江知县所立，只有两座例外，其中“乐善好施坊”，旌表的是周元理的孙子周光纬。周光纬贡生出身，家道殷实，常怀一片恤人之心。道光三年（1823年）吴地水灾，光纬广设粥厂，输粟赈饥，深得家乡父老赞誉。晚年鉴于族中穷苦者与日俱增，决定捐田设立义田，捐屋设立义庄。道光九年（1829年）江苏巡抚陶澍奏请皇帝之后为他树立了这道“乐善好施坊”。

这么多的牌坊，现在几乎全被拆毁。只在镇东头何家浜东侧的民房背后，紧贴着屋檐，还存在着一座由花岗岩榫铆结构的牌坊。粗壮的双柱，4米高，3.6米开阔，0.4米见方，中间三根横梁，都有0.35米见方。柱上依稀可见文字，可惜已经漫漶不清。最上层的横梁雕有纹饰，中间那根横梁朝南一面是“二龙抢珠”，神态栩栩如生，第三条横梁朝南一面是“双狮滚绣球”，两边各有一个含珠的龙



心迹双清坊

头。朝北一面，横梁上尽是缠枝花草，在第三横梁上清晰地雕有一个篆体“孝”字。

据镇上耆宿口耳相传，这是旌表坊，原属黎里八大姓之一的汝姓，是乾隆年间吴江知县为汝某之妻所立。牌坊上本有坊名、年代等横条，可是年深月久已经无法释读，双柱下伏有一对石狮，一直气派地守卫着牌坊，可是也被人喝令到其他地方去守门了。

这是黎里仅存的真正意义上的石碑坊了。经核实，原来它就是《黎里志》卷三表坊中记载的“心迹双清坊”。原记载：“心迹双清坊，在发字圩，乾隆十年为府学生员汝殿邦妻朱氏立。知县邹玉章详请题旌”。那时汝殿邦妻朱氏殉节，由于知县邹玉章的鼓动，酿成轰动一方的大事，众多的文人墨客纷纷题咏，所以《黎里志》附录了名叫张源溶的一首七律《汝烈妇诗》：

结褵四载共吹箫，才隔幽明路未迢。自谓微躯完白璧，非缘薄命付红绡。

人间快筑鸳鸯塚，天上惊翻乌鹊桥。每痛寒家邱嫂跼，于今有伴与逍遥。

《黎里志》卷之一《列女》有记：

朱氏，生员梦麟女，适府学生员汝殿邦，四载，殿邦卒。氏年二十九，誓以身殉。乾隆十年七月初七夜，乘间自缢死。里人艳传其事，皆有咏歌。同邑沈进士祖惠作传，即于是年旌。

“心迹双清”，看来，汝氏为丈夫自缢所以成为烈妇，这大约可以算作一清；另一清则应当出在那个“孝”字了，结婚四年中，肯定服侍公婆尽心尽力，极尽孝道。

可叹，可叹！明清两代29座牌坊，竟有20座是为那些节妇所建。这些节妇，大半以身殉节，于是封建士大夫们为她们树立起一座座贞节牌坊，看看上面所刻的文字，不外乎“为某某某（丈夫的姓名）之妻某氏立”。这些受尽精神奴役的女人啊，坚持守节，甚至

身殉，可是连个姓名都不存。她们的血泪与性命换来的只是一座座冷冰冰的石头建筑，如此而已。

再翻一下《黎里续志》的《人物》卷，介绍了有姓名有脸面的人物，计154名，而在《列女》一卷中，小小一个镇，竟列出了269人之数，大大超过了那些所谓的人物。这些列女，在志书上只以“张氏”、“王氏”一书了事。随手一翻，不外乎“夫亡，守节30年，某某年旌”字样。还有一些出身贫寒的女子，被富家大户纳为小妾，夫妇俩年龄悬殊，夫死之后守节的年份更长，最长的竟超过了60年，一个甲子还有余。按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说，她们还够不上树立牌坊，只能在志书中旌表一笔。

黎里古镇，清朝前期有个寡妇，发明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游戏，每天日落以后，紧闭房门，在漆黑的房间里将一百枚铜钱随手抛洒，然后在暗中摸索，一枚枚地搜寻，待到铜钱全部回笼，必定夜阑人静，筋疲而力尽。这个游戏，简单而又实用，在黎里的坚守贞节的寡妇中悄悄流传，竟被喻为最最适宜的秘方。

士大夫们操起封建纲常的大棒，将一批批的弱女子赶上阎王路，由明至清愈演愈烈。黎里两部志书上记载的29座牌坊，建于明代的6座，建于清代的23座。明代6座牌坊中，只有一座为列女坊，而清代的23座中列女坊竟然多达19座。那个为汝殿邦妻朱氏树立牌坊的知县邹玉章，他在乾隆10年一下子旌表了三位节妇，每位都由他赋予了美名：“一片冰心坊，在大洛圩，乾隆十年，为黄秀章妻李氏立”；“志烈秋霜坊，在大洛圩，乾隆十年，为黄在昇妻唐氏立”。在这个邹玉章的倡导之下，三位节妇，至少有二位以身殉节。

时代前进了，陈旧的道德标准早被人们彻底抛弃到了历史的垃圾桶里了。为节妇们建造牌坊业已成为了历史陈迹。牌坊结构坚固，造型美观，今天我们时不时也要建造牌坊，不过牌坊的功能有所变化，建于街道、陵墓、园林的牌楼，已经不再为宣扬封建礼教和标

榜功德，它们自有各各不同的功用。

设于陵墓的牌坊，比如南京中山陵的“博爱坊”，不仅是精致的艺术品，供人观赏，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庄严肃穆的气氛。封建时代，牌坊下不准平民百姓疾驰而过，有的在牌坊前还立有一块石碑，刻着“官员人等到此俱下车马”，以警示行人，否则就要遭到惩办。

今天的牌坊，特别是建于园林的牌坊，能点缀景色，美化山林，丰富园林内容，招徕游客，助人游兴，悦人耳目；现在古镇同里和周庄，都在街道上增建了牌坊，黎里正拟在古镇的入镇口建造一座石牌坊，它将提示人们，这里是新镇区与古镇区的分界线。再则，起到分割道路，美化街景等多种功用。还将配上坊额、对联和题词，既有描绘湖光水色的妙语，又有介绍人文景观的好词，务必使身临其境者领略到黎里深厚的文化积淀。

第二章 人物篇

黎里镇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人才辈出。民间一向称誉的“黎里八大姓”，在明清两代，为家乡，更为社会贡献了许多人才，超过了黎里人才总数之半。在封建社会，客观条件只允许少数人接受文化教育。那些富家大族，具备较优厚的物质与精神条件，他们的子女可以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一个家族文化的提高，不是一下子就达到先进水平的，它需要一个基础，一个过程，一个逐级堆垒的过程。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人民，生活在金陵宝塔的最底层，为了温饱，奋力劳作，根本没有经济能力让子女接受文化教育，再说父辈自己没有文化，如何培养和要求子女朝什么方向发展，尤如空中楼阁无从着手。儿童智力的发展与遗传有关，与营养有关，更与家族文化的熏陶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宋以后，经济文化的重心转移到了南中国，江南地区是南国的重心，吴中更是重中之重。处在重中之重的黎里，历史地成为了贡献人才的重地。这里的富家望族，长于经济，重视文化，留下了种种诗文著作、书法丹青，也传承了音乐、武术、园艺乃至弈林趣闻。

历史上，黎里出过特奏名状元1人，进士26人，举人61人，贡生43名（这个数字不包括新合并的北厍社区，北厍有进士14名，举人24人）。特奏名状元也参加廷试，也称状元，实在只是安慰性的。要说吴江进士名次最高的是黎里闻诗堂的殷家，清道光年间，黎里长田村的殷寿彭、殷寿臻兄弟俩双双得中进士。兄长殷寿彭道光20年二甲一名进士，仅次于三鼎甲状元、榜眼和探花，是进士的第4名，俗称“传胪”，后来入翰林，出任编修、学政等官。

黎里历史上的名人众多。南宋时有赵磻老、魏宪，至今留存的东圣堂就为纪念赵磻老而建。明代有太常寺少卿凌信，出使安南凭外交安抚了安南国王，清代的左宗棠对凌信异常佩服，特地撰写了对联“文高九能道重三物，风宣八节气备四时”，可谓推崇备至。

清代有位居工部尚书的周元理，浙江布政使蒯士芗，抗击沙俄建立战功的爱国将领张曜，徐达源、吴珊珊夫妇以诗文著称，徐达源编撰了第一部《黎里志》，蔡丙圻编撰了《黎里续志》，沈毓桂向国人积极介绍

西学，1903年，倪为芝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学校，开一代学风。辛亥革命后，涌现的名人更多，袁世凯复辟时宣布吴江独立讨袁的殷佩六、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女革命家张应春、斐声画坛的陈松夫等。还有南社、新南社的人物，较为著名的有：蔡寅、朱剑芒、毛啸岑等20多人。名医金一新、朱连航、金通尹。当代名人有，中国第一代影星殷明珠、组织黎氏文艺研究社的丁锌、国际大法官倪正茂、水利专家汝贤、翻译家出版家荆斯曦、农学家倪慰农、世界著名教育家柳无忘、竹刻家徐孝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汝信等等。

本章首先介绍黎里八大姓，还兼及他们在黎里的历史遗存。对在黎里或我国历史上留下突出贡献的人物，分节专门予以叙述。

本章有两个附录，一是黎里籍的南社社员；二是《杨毕兖案真相及其创作》，因为在介绍新荆家弄荆厅时，提到蔡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为了让读者了解杨毕兖案的来龙去脉，增加对荆贺邨其人的认识，所以特地横生了这一枝节。

一、八大姓

吴江各大镇，明清时期都有富家望族，民间往往有“几大姓”的说法。

同里镇四大姓：“王、金、范、任”；平望镇四大姓：“殷、凌、黄、唐”。

能够排入大姓，财富当然是必要条件，不过除财富外，还须在政治上或者社会上享有相当的声望。这并不由官家硬性规定，事实上官家也无法规定，它纯粹出自老百姓之口，因此一般镇志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例外的是盛泽的“老八姓”，有《盛湖志》明确记载，确定于明末清初，排出了盛泽最早的八个姓氏：“许、仲、沈、归、吴、卜、汤、王”。

震泽镇也是四大姓，“周、龚、施、徐”。震泽镇民众对各家都编了一句顺口溜：“周家的顶子”，周家子孙由科举入仕的较多；“龚家的儿子”，龚家人丁兴旺，子孙满堂；“施家的面子”，施家晚清及民国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民国时期还出了一位外交官施肇曾，镇上俗称“三先生”，但凡出现难办的纠葛，只要施家一出面，必定迎刃而解；“徐家的房子”，徐家建筑特别多，号称“徐半镇”，现在保

存完好的江南古建筑“师俭堂”就是徐家的。

江南大镇大多有这样的排位方式。浙江湖州的南浔是丝绸重镇，富甲天下，在老百姓口头流传着“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的俗话，人们形象地将拥有巨额财产的大户比喻作“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南浔与震泽十分接近，二者为大姓所编的顺口溜也非常相似。四象指刘、顾、张、庞四大家，南浔老百姓的顺口溜是“刘家的银子”，“顾家的房子”，“张家的才子”和“庞家的面子”四句。

黎里定有八大姓：“周、陈、李、蒯、汝、陆、徐、蔡”，乾隆年间开始活跃在老百姓口头，嘉庆年间逐渐定型。

下面将八大姓的有关情况及其在黎里镇的历史遗存简要作出介绍。

周

黎里八大姓，周氏居首，座次以周元理的名望地位而排定。周氏原籍浙江仁和（杭州），周元理的父亲周昂娶黎里陈氏，生下元理仅只9年就弃世，陈氏携带着儿子元理回归母家。陈氏的兄长陈鹤鸣教子有方，于清照楼设家塾。周元理就寄居舅舅家读书考科举，累迁至从一品，官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工部尚书诸职。

周元理（1706－1782），字秉衷，19岁进学成为秀才，乾隆3年（1738年）中举，三次会试不中。乾隆初年试行“举人大挑”，拣选三次会试落第的举人任官，由礼部造册送吏部，派遣王公大臣共同挑选，入一等的以知县试用，入二等的以教职铨补（乾隆17年大挑正式成为定例）。乾隆11年，周元理大挑列入一等而出任知县，拣发直隶，补蠡县知县，又调任清苑县，由于谨勤办事，深受总督方观承的赏识，本拟提升广东万州知州，正值清苑修城没有竣工，上方有令留任清苑。在任期间，周元理洞察出作奸犯科的部胥，努力

使工程有条不紊地按期完成。清苑是京畿重地，乾隆知道了周元理的才能，后调易州，不久即晋升宣化知府。母亲去世，元理按例守制3年。乾隆喜好出巡，畿辅是出巡的必经之路，可是宫馆、驿传、车马、刍牧等役，主办者不到位不算，往往还要生事扰民，正好周元理母忧起复，就让他总董其事，此后，乾隆出巡，一切妥帖。周元理也因此擢升按察使，再迁布政使。乾隆36年（1771年），命元理随尚书裘曰修、总督杨廷璋治理河患，元理任劳任怨，深入民间调查研究，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拟定了许多对症下药的治河措施，因功授山东巡抚。不到半载，又擢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任上，元理继续将治理河患作为首要大事，在他的指挥下，修筑津门五闸，疏浚天津子牙河、永定河。可是，这年年末，下属雄县有人起诉知县锡瑛私鬻仓谷，乾隆命尚书裘曰修会同侍郎英廉查证，结果所告属实。上谕有云："直隶治赈，周元理奏言有司科理妥实。今有雄县事，所称妥实者安在？"有诏下吏部议治，吏部复命夺官，乾隆有令革职留任，一年以后，官复原职，加太子少保衔。

乾隆39年8月，山东寿张王伦聚众造反，周元理督师平定后，与侍郎兼顺天府尹蒋赐棨勘察八旗在官荒地，招募佃户耕种，明令8年后起租，京畿逐渐为之富足。

周元理一生谨慎，可是仍然二次遭受贬官。第一次已如上述，第二次在乾隆44年，周元理由于失察而被革职。

1778年，井径知县周尚亲勒索乡里，金良庄的绅士几经交涉，没有结果。乡绅恳请梁绿野出面伸张正义。梁一口答应说："为民请命，虽死不辞！"第二年二月，梁联合李望春、梁进文、李馥等人，到正定

周元理



府控告周尚亲，知府方立经袒护知县，反诬梁绿野“挟嫌滋事，敛钱抗官”，上报直隶总督，周元理没有认真查实，按知府报告上奏朝廷。绿野闻讯，立即奔赴京城告御状。开始，乾隆偏信奏报，下诏拘捕梁绿野等人。梁绿野备受酷刑，不为所动，仍然冒死控告。乾隆派侍郎喀宁阿、钱汝诚，尚书福隆安仔细核查，三人查得实据后据实上奏。最后乾隆降谕裁定：井径知县周尚亲处绞刑；知府方立经袒护劣员，曲为开脱，革职；梁绿野等一干人，因为“哄诱村人，敛财聚众，抗官殴差”，全部斩首示众。周元理查事不实，谎报案情，革去总督之职，予三品衔到正定修筑隆闪寺以赎罪。周元理诚惶诚恐，兢兢业业地以付出心力以赎罪，寺成后授左副都御史，仍署直隶总督。

乾隆45年（1780），迁兵部左侍郎，再擢工部尚书。由于周元理劳苦功高，乾隆除多次赐写福字外，特赐众多上方珍物，许予紫禁城骑马的殊荣。任工部尚书一年余，于1782春引疾乞休，回到黎里刚好过端午节，同年入冬病逝。乾隆闻讯，深为痛惜，令江苏布政使致祭。

乾隆47年皇帝上谕：原任工部尚书周元理，前任直隶总督，老成勤慎宣力有年，嗣后加恩内用，洊擢尚书。后因老病乞休，特加太子少府，以示优眷。兹闻在籍溘逝，深为轸恻，着加恩令江苏布政使司前往赐祭一坛，钦此。

谕祭文：皇帝谕祭病故原任工部尚书周元理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卹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周元理性行纯良，才能称职。方冀遐龄，忽闻长逝，朕用悼焉。特颁祭典，以慰幽魂，呜呼！宠锡重墟，庶沐匪躬之报，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荣。尔如有知，尚克歆享。

乾隆60年（1795年）周氏后裔建起了周家祠堂，黎里习称“周宫傅祠”，位于黎里镇南新街，镇染字圩。原祠房屋六进，第四进为

祭厅。周家祠堂不仅是周氏祭祖的地方，还是黎里祭孔的场所。江南不乏祭孔之所，以家祠而祭孔却少有。这对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对研究我国古代祭孔、祭祖礼仪，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乾隆祭文御碑原由石龟背驮，文革中被砸，分为二段，祭文已经残损，不过尚能阅读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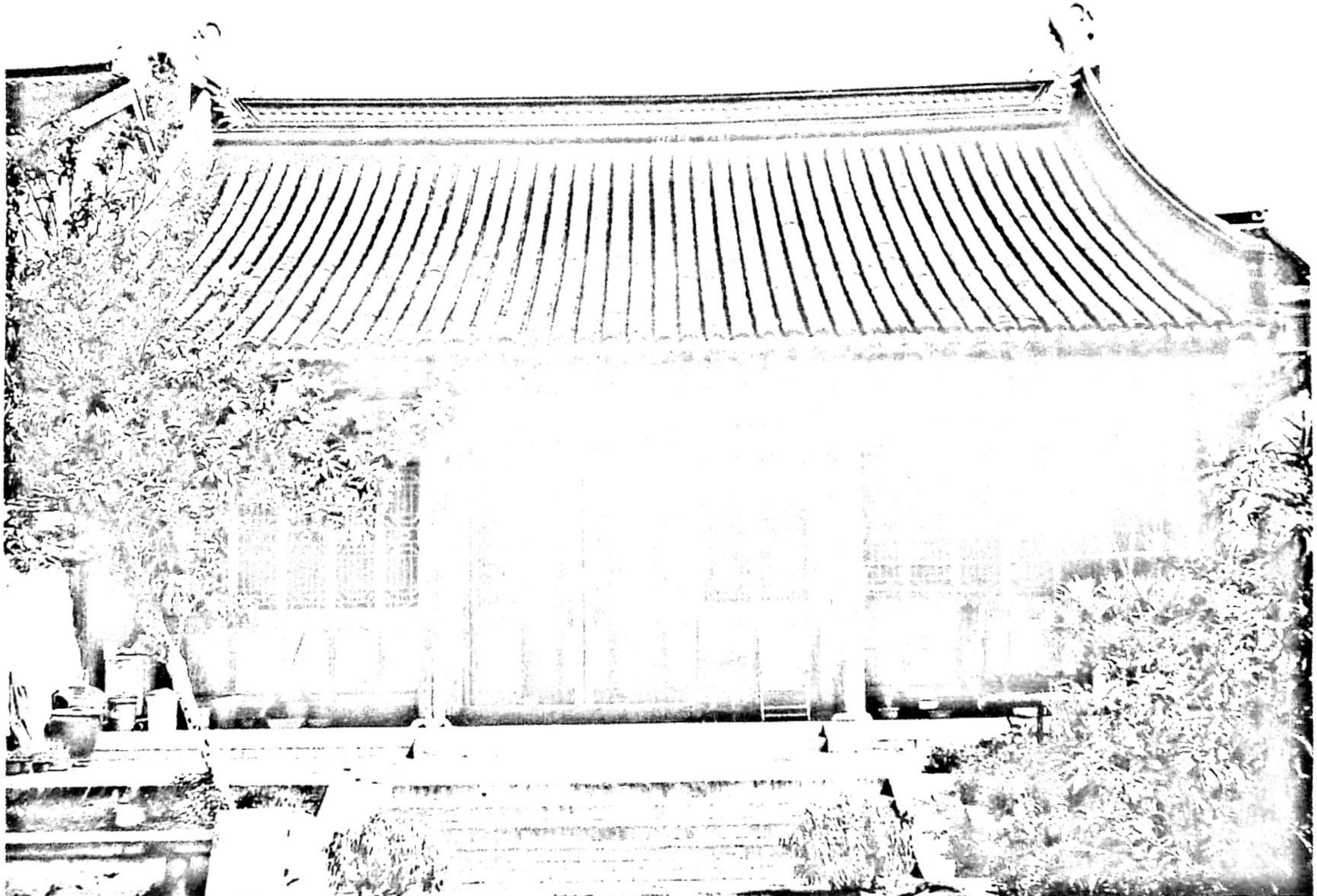
周元理留在黎里有名的建筑，除上述祠堂外，还有两处，分属省级和市级文保单位。

市级文保单位寿恩堂，是周元理在直隶总督任上所建，五开间五进，第三进大厅有一块颇有名气的匾额，上面“寿恩堂”三个大字是清乾隆御笔，左下方有“赐直隶总督臣周元理”一行小字。省级文保单位赐福堂，周元理告老回乡之前所建，前后六进，占地3513平方，高大轩敞，第三进大厅，更是气派。周元理改寿恩堂为赐福堂，自有来由。乾隆皇帝的书法颇有造诣，每年12月初1他在漱芳斋升座，将爱臣宠臣有功之臣传入，“亲挥宸翰，书福龙笺”，亲笔在斗方上书写“福”字，一一赐予。周元理为官一生，兢兢业业，毫不懈怠，深受乾隆皇帝的喜爱，连续得到御赐“福”字13个，告老回乡后，周选出了八个“福”字，制成八块匾额，悬挂在正厅上。无锡籍大学士嵇璜（1711-1794），与周元理相交相知，特地书写了“赐福堂”三字制成匾额，中间的“福”字，特地仿用了乾隆的手笔，送到周家悬挂起来。周元理就把这座大厅命名为“赐福堂”。乾隆赐予的八个“福”字，再加嵇璜“赐福堂”中的一个“福”字，共计9个“福”，所以此厅又称“九福厅”。

正厅赐福堂在江南属于数得着的著名厅堂，除了与乾隆和嵇璜有关，还因为此厅堂规格、结构和工艺，颇有不同凡响之处。

赐福堂，面阔13.7米，进深15.9米，高8.95米，东侧紧接一楼一底厢楼，西侧建有三楼三底，七开间门面一字儿排开，屋瓦密布，哺鸡筒瓦脊顶，下有飞椽，外观高大轩敞，气势雄伟。这么

周宮傅祠堂



一座与厢楼等高的厅堂，厅内却没有让人因为过于高大而产生空旷的感觉。原因是设计巧妙，采用了覆水椽及轩，也就是建造成双层屋面。正厅赐福堂在高大的屋面之下又安排了一个人字形屋面，外加接上一个船篷轩，以降低厅内的净高，梁架上的纹饰，脊桁上的彩绘双凤及花卉也让人一一可以观赏。双层屋面将整个大厅划分成三个空间。内部人字形屋面及船篷轩正好是大厅的中央部分；船篷轩南安排落地长窗，分割出2.6米宽的走廊；北面沿金柱一线一排屏门，上悬匾额，下挂中堂，屏门后面的空间，吴地俗称“退堂”。双层屋面，具有隔热作用，冬暖夏凉，尤其是夏季凉爽宜人。

周氏这两处建筑，后来都与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有关。柳亚子出生于黎里乡下大胜村，1898年，柳亚子年仅12岁，跟随父亲迁居黎里镇，租赁了周氏的寿恩堂。1909年，柳亚子发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南社，在寿恩堂，柳亚子编辑《南社丛刻》，寿恩堂成为南社成员集结的中心。现在寿恩堂作为南社通讯旧址，列入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2年，柳亚子迁居赐福堂，赐福堂又成为南社成员汇聚之所，共商国事，撰作诗词。1981年，赐福堂成立了柳亚子故居，1987年，柳亚子100周年诞辰之际，在赐福堂成立柳亚子纪念馆。

周元理在书法方面非常有造诣，公务之余，喜好欣赏法书名画。唐伯虎的寄托身世之作《双雀图》就是周元理从民间花重金觅得的，一直由长子长孙嫡传。此画目前完好珍藏在吴江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藏品。

周元理的这种喜好也熏陶了他的子子孙孙。元理的儿子名士升，字有阶，号望山，官居工部营缮司主事，周家后裔尊称为望山公，孙子周光纬，字焕文，号蓉裳。他们都爱好读书，喜好法书名画。望山公爱读《庄子》，每每背诵全卷不遗一字，又工楷法，收藏了许多名迹。孙子周光纬自幼聪明端庄，十二三岁时写文章下笔就有奇气，

继续搜集宋元明诸多名家书画，汇刻成“红蕉馆帖”。有些大幅书法，难以割截，周光纬就勒石，成“红蕉馆藏真”以广流传。时至今日，留存于赐福堂内最大的法书，要数董其昌临颜真卿赠裴将军诗条石。

此后，周家一直是书香门第，他们的子孙多半爱好书画，擅长书画。前不久，上海有位收藏家收藏到了周家第十代孙女周莲的18幅花鸟画，神韵毕具，真大家风范。

周氏传至今日，已传到十四五代，有仍旧在家乡黎里的，有迁居苏州或上海的，也有旅居海外的，一位年近不惑的15代孙儿，绘画技法出众，侨居瑞典，他的中国画广受欢迎。

陈

黎里第二大姓始祖陈鹤鸣，字敬业，凭监生资格出任天津长芦运判，历任嘉湖宁波府同知，乾隆12年（1747年）晋迁宁波府知府。陈鹤鸣为人洒脱，胸怀宽广。嫁给仁和周家的妹妹新寡，携儿子元理归来，鹤鸣妥为安顿。又在他自己早年刻苦攻读的清照楼内设下书塾，为外甥周元理，还有自家藻文、绚文、鸿文三子，及侄子炳文、龙文延聘学有素养的儒士执教。周元理日后晋身事略已经见述，五名子侄也都由科举出身，家乡盛赞陈家“五子登科”。

“豪气元龙俦”（邱璋《端本园》诗句，下面引录的诗句同）的陈鹤鸣，气度禀性与三国时的陈登相仿，“壮年匹马驰沧州”，鹤鸣出外宦游做官。人到中年，陈家五子登科，陈鹤鸣就急流勇退。“燕台酒累杯中月，笠泽莼香梦里秋”，一天，他在月下喝酒，醉梦中闻到了家乡莼菜的馨香，决意效法家乡先贤西晋的张翰，弃官归里。父子多人常年在外，家乡老宅一片荒凉，陈鹤鸣回家后整建家宅，三落五进，气派非凡，正厅“鹤寿堂”，陈家的标识，远近闻名；又凿池叠石植树养花，拓建后院“端本园”，三亩有余。“昼锦堂高介眉



寿，纱帽隐窭坐清昼”。黎里大宅，邑中名园，从此陈家天天高朋满座。

陈家的大儿子陈藻文，字明绣，由监生而出仕，直录宣化府通判，最后迁升至河南归德知府，在任时劳绩卓著，受百姓好评。

鹤寿堂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称为“郡马府”。原来，陈鹤鸣的二儿子绚文，字素行，才学品行与名与字相吻，文才出众，谨勤实干，不事张扬。满洲正白旗副都统永豪杰欣赏他的才干，决定把女儿嫁给他。永豪杰属于清宗室意新觉罗氏，习称郡王，因此陈绚文被称为郡王驸马。当时满清王朝明文规定，满汉不得通婚。满族只有几百万人口，清王朝知道，一旦允许通婚，满族必将迅速归化，融化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永豪杰违反大清规定，暗中将女儿嫁给了汉人，深怕贾祸，所以明言两家不得往来。后来，陈绚文有个儿子，名诗，字韵林，他知道清廷惯例，意新觉罗氏的妇女具备一

定资格的可予以旌表，韵林认为母亲实是旗人，且具备节孝旌表资格，母亲去世之后，他专程赶赴京城，具呈都察院，提出要求。都察院认为与规定扞格，不准。事实上，清朝前期对满汉通婚的确严厉制裁，陈绚文娶满族女子为妻，在当时也许属于个案，郡马府对于满汉相斥与相融的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陈鹤鸣的第三子陈鸿文，豪放不拘，失于检点，结果自己身首异处不算，还殃及父兄。先引录《黎里志》上的一段文字："鸿文字健冲，性磊落多豪气，亦由太学授甘肃平番知县。有前任某亏项若干，鸿文身任之，后卒以此获咎。临刑慨然无一语，有从姪垛挥泪送之，鸿文曰：'此余罪也，尔何悲。'"志书上也许是为陈家之讳，略加伪饰。据家乡父老口耳相传，陈鸿文，亏空挪用公家款项，缺额较大，一时无法填补，最终落入法网。陈鸿文囚禁之后，官府认定陈鹤鸣在家乡起造鹤寿堂、扩建端本园，肯定有他三小子的赃款，于是派官兵逮捕了陈鹤鸣。关于此一情节，不见于志书，与陈家紧邻的儒生邱璋，专门写有一首排律《端本园》，诗中兼带描述了陈氏一家的盛衰，读此诗，可知民间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秋蟀春庚泡影过，无端宦海起风波。

鸟鼠山头乡信断，脊令原上泪痕多。

琅珰声急官符紧，虎卫周环阁吏窘。

捕车克日拥黄门，粧楼竟夜啼红粉。

箧倒筐倾玉石俱，县官籍没更无余。

珊瑚树碎惊盈尺，薏苡装轻载满车。

山丘华屋愁无奈，门帖萧条发官卖。

燠官凉亭蚁穴营，雕甍绣闼珠丝挂。

朝廷千里迢迢派快马飞捕，将已经告老回乡的陈鹤鸣抓捕入狱，金银细软等家产悉数抄没，押送京城，房屋、园林由官府出面卖给他人，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陈家只剩下一片妇女的啼哭之声。

后来，由于查无实据，“恩诏黄封下九天，同根其豆免牵连”，一年之后，陈鹤鸣终于被释回家。然而，这时陈家的田地房屋几乎全部属于他姓所有。陈鹤鸣在藻文、炳文等子侄的支持下，将田地房屋逐步赎回，“陆家许赎三间屋，卜氏区分二顷田”。为了重建家园，陈鹤鸣拼尽残年余力，使鹤寿堂与端本园一步步恢复了昔日的风采。

历史的烟云飘然而过，而今陈氏宅第大半已经被改建，只留存门厅和一座砖刻门楼。那砖雕门楼上“奎辟凝祥”，四字仿佛依然在告诉人们曾经的辉煌。端本园被蚕食、改建，面积也缩小了许多，现在作为市级重点文物单位，妥加保护。假如身临端本园其境，仔细寻觅，“新涨闲看水上凫，破巢细认梁间燕”，园内景物依然玲珑姣好，令人心旷神怡。园子中央，一座轩月亭，犹如燕子展翅欲飞，亭内置有石桌石凳，亭西山石林立，边上挺立着一株木樨树，亭东侧假山嶙峋，假山下有一山洞，洞口凉气逼人，山上绿藤缠绕，山旁一丛古树。园子的南部有双桂楼、轩月廊，四周是曲折的回廊，那水磨砖上的“抱绿”、“琅嬛”的书法，令人神思飞越，浮想联翩。双桂楼两侧原有两株桂花树，一株金桂一株银桂，双桂楼前还有荷花池，有九曲桥宛转相通。现在园子里，四季花卉不断，有菊花、石榴、柑桔、仙人掌各式兰花，给古园增添了无限生机。

李

黎里的第三大姓，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族，能够排名第三，主要由于乾隆时期官居南韶连兵备道的李璜。

李氏一族，据李璜所撰的《宗祠碑记》，从明代成化年间李氏宗茂、宗元、宗盛三兄弟自北方迁居浙江秀水（今嘉兴），绵延十余代，人口繁衍，不下数百，都是普通老百姓，耕耘自给。李璜的曾祖父李元绅始迁吴江黎里镇，依然安分守纪不出乡里，逐渐由耕织走向

经商，家庭生活日益富庶。黎里镇儒家传统极盛，读书风气极好，李元绅让儿孙们攻读四书五经，准备应考科举，以求进身。李璜，字方玉，从小聪慧过人，博闻强记，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少年时代的李方玉读书修身，品行为长者称道，处事治家，公平合理，崭露出峥嵘的头角。乾隆4年（1739年）由国学授州同知，捡发淮扬河工，治河期间，不辞劳苦，充分施展出仓卒应变的才干，为了治河，他不惜赔上薪俸，甚至让夫人拿出历年积蓄，上司非常器重他赏识他。不久晋升广东南雄府倅，任上，李璜修造桥梁，建立孤贫养济院，救助穷困。后来又因为“卓异”授南韶连兵备道，有诏入京师觐见皇帝，结果病死于北京。李璜归葬浙江秀水县小咸圩，大学士李侍尧撰写了神道碑，同镇工部尚书周元理写了墓碑和墓志铭。

李璜的这个“卓异”，既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痛苦。李璜的“卓异”，也是笼罩在李氏一脉的无尽阴霾。这“卓异”，与一本名叫《遍行堂集》的书有关。

《遍行堂集》的作者，是广东丹霞山别传寺的开山祖师澹归和尚，此人俗名金堡，浙江仁和人氏，明崇祯13年（1640年）进士，官山东临清知州。明末清初，朱由榔在肇庆建立南明政权，金堡以梗直诤言、力抨朝政、不畏权奸而授官兵科给事中。南明灭亡后，金堡削发为僧，取法号澹归。转蓬似地辗转，先在广州云海寺当碗头僧（专门洗碗的小和尚），康熙元年（1622年），澹归为原明朝赣州巡抚后任丹霞山主的李充茂聘请建寺，经过数年惨淡经营，别传寺建成，规模日益扩大，俨然粤北一大名刹。澹归和尚成为别传寺的第一任住持。

丹霞山别传寺的一应僧众，除了李巡抚的旧部亲信及官兵之外，就是南明遗老遗少，反清复明的心志时刻系念于深处。澹归身为亡明遗臣，“哭尽冬青徒有泪”、“故陵麦饭谁浇奠”的隐痛处处反映在

他的诗文之中。《遍行堂集》是澹归平生鉴古察今、修身立志的力作。《遍行堂集》共分前后两集，比较而言，前集佛儒交融，以“菩萨心、孔孟心言理言学，写情写性”，文风清丽而缊蓄；后集则是明清交替之际撰写，故国故园犹在眼前，可是亡国之痛萦绕心头，忧愤交加，忽忽如狂，怀旧复明之志溢于言表。

一天，李璜偶然路过丹霞山别传寺，发现殿后有一柜子，封锁得特别严实。李璜就问住持和尚内装何物，住持回答说，自从康熙至今，本寺换一住持加一封条，不知内中何物。也是心血来潮，一向宽厚的李璜却命令住持开启柜子，于是一部《遍行堂集》现于众目睽睽之下。李璜带回衙门一看，顿时进退两难，懊悔不已。书中诗词充满了反清复明的意向，眼下正是文字狱大兴的时期，看来圆寂了96年的澹归和尚的尸骨，仍将在劫难逃，还有别传寺的住持以及众多的和尚，都将不得善终。李璜长子李大翰，看父亲进退两难，思虑再三后认为，假如没有见到此集，那么没有责任，现在既然已经见到，隐匿不报，当属欺君之罪，必将留下无穷后患。李璜听完，不再犹豫，上报督抚，督抚认为事关重大，以“语多悖逆，图谋不规”上奏朝廷，朝廷下达了焚寺磨骸之诏。乾隆40年（1775年），别传寺因《遍行堂集》一案惨遭血洗，僧众五百余名尽数屠戮，丹霞山的骨塔、碑志悉数铲平、毁弃。可怜佛门清静之地，就为了这一部《遍行堂集》，鸟兽噤声，草木无华。澹归的一切遗著、墨迹，包括他为别人所作的序言、跋文全部销毁，不留片纸只字，胆敢私藏者从严治罪。现在丹霞山山麓石岩坊附近，有个地名叫“埋人坑”，就是当年众僧丛葬之处。

李璜因“卓异”，而晋升南韶连兵备道，皇帝下达诏令，命李璜与大翰父子速速进京入觐，刚到北京，李璜就死于客舍，李大翰有旨敕留京城晋升刑部郎中。李璜有六子二女，六子中有五子进入仕途。除了长子李大翰外，次子大恒也官至刑部主事，其余各子，除

第八子早矢外，都谋得一官半职。由此，李氏一族在黎里成为令人瞩目的世家。

李璜第八子，名大升，自幼受家庭读书氛围的熏陶，好学上进，刻苦非常。可是身体羸弱，长年疾患不断，年仅23岁夭亡。大升所配浙江海盐陈方伯的女儿，大升去世时此女随父在云南，得到噩耗，不远千里前来奔丧，并抱主成婚，立誓守贞。嘉庆23年亡，次年受到吴江县县令的旌表。海盐陈家也并不是寻常百姓，听从女儿抱牌位成亲，终生守寡，其主要原因当然是受到封建礼教的蛊惑，不过，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李家的名望和财产。

因为“卓异”，李璜入京，可是还没有等到皇帝召见，突患重病，他自知即将弃世，也许他心怀隐忧，弥留之际把早已撰写定当的《宗祠碑记》、《义庄弁言》及其条例交予长子李大翰说：“此吾未了事也，尔兄弟勉成之。”要儿子了却自己捐田产、建宗祠、设义庄的心愿。《宗祠碑记》和《义庄弁言》洋洋洒洒1200余言，历述了李家的历史沿革，他自身的为人与奋斗，特别在义庄弁言内，他说到自己将田产大半捐出，又借别人与他问答之词，写了一段话留给子孙：“或有笑余者曰：子即不为身计，独不为子孙计耶？然余思贫富命也，盛衰理也。余叨先人福祐得克家子六人，若能勤俭成家，即除设立义田之数，以分给之，亦稍可自立，倘不知稼穑艰难，虽尽与之无益也。矧古人有言，贤而多财则损其智，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余岂愿若辈损智而益过乎？”既回答了他人的疑问，也明示子孙自己的深长之思，由此，也可想见李璜其人。

李大翰在京不半年，有诏出任湖北汉阳知府。大翰不敢怠慢，雇佣官船兼程赴任。到达麻城，正值傍晚，停船歇息，忽然有一和尚，裹着一袭红色袈裟，浑身血红，没有一声言语，登舟合掌募化。次日清晨，李大翰猝死在船上。从此以后，李氏子孙，只要稍微得意，必见和尚，见则必死。对此，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

领域的人自有不同解释。有说那是报应，有说那是和尚们的报复，也有说是李氏子孙心理压力使然。基本史实如此，见仁见智，任由后人评说。

就资料所及，下面李氏后裔中的二人，就因为稍微得意而夭亡，据说在临死前都曾见到红衣和尚。

李璜第四代孙李士龙，字葛庵号一山，进学成秀才，选为贡生。士龙娘家亲戚刘德六（1806－1875），是著名画家。士龙拜刘为师学写生秘诀，不出10年，运笔纵横矫健，描摹点染不落时蹊，沉厚遒媚，时人有出蓝之誉。后游览天下名山大川，胸次宽广，山水设色渐臻于妙境，丹青之技名噪当时。后来援例授县丞，入都谒选前夜，宿于吴江松陵的垂虹客馆，次日身亡，也不知患何疾病，艺林为之痛惜。

士龙早逝，留下一子名嗣泌字芋香，由叔父继蟠抚养。嗣泌10岁即下笔成章，但他不愿走科举作晋身之阶。年方弱冠凭着文学功底为官府聘请，沈文肃公葆桢总督两江，延请为上客，凡用人理财养兵诸多大事，嗣泌各体皆备用语通达，一手书法，虽不属名家，却也潇洒灵动，令人赏心悦目。再加为人诚恪谦抑，从来不作妄语，一时当代有名公卿都以礼相待。年近不惑，曾襄公国荃、左文公宗棠、刘制军坤一都争相延聘，不料，就在那年突然得病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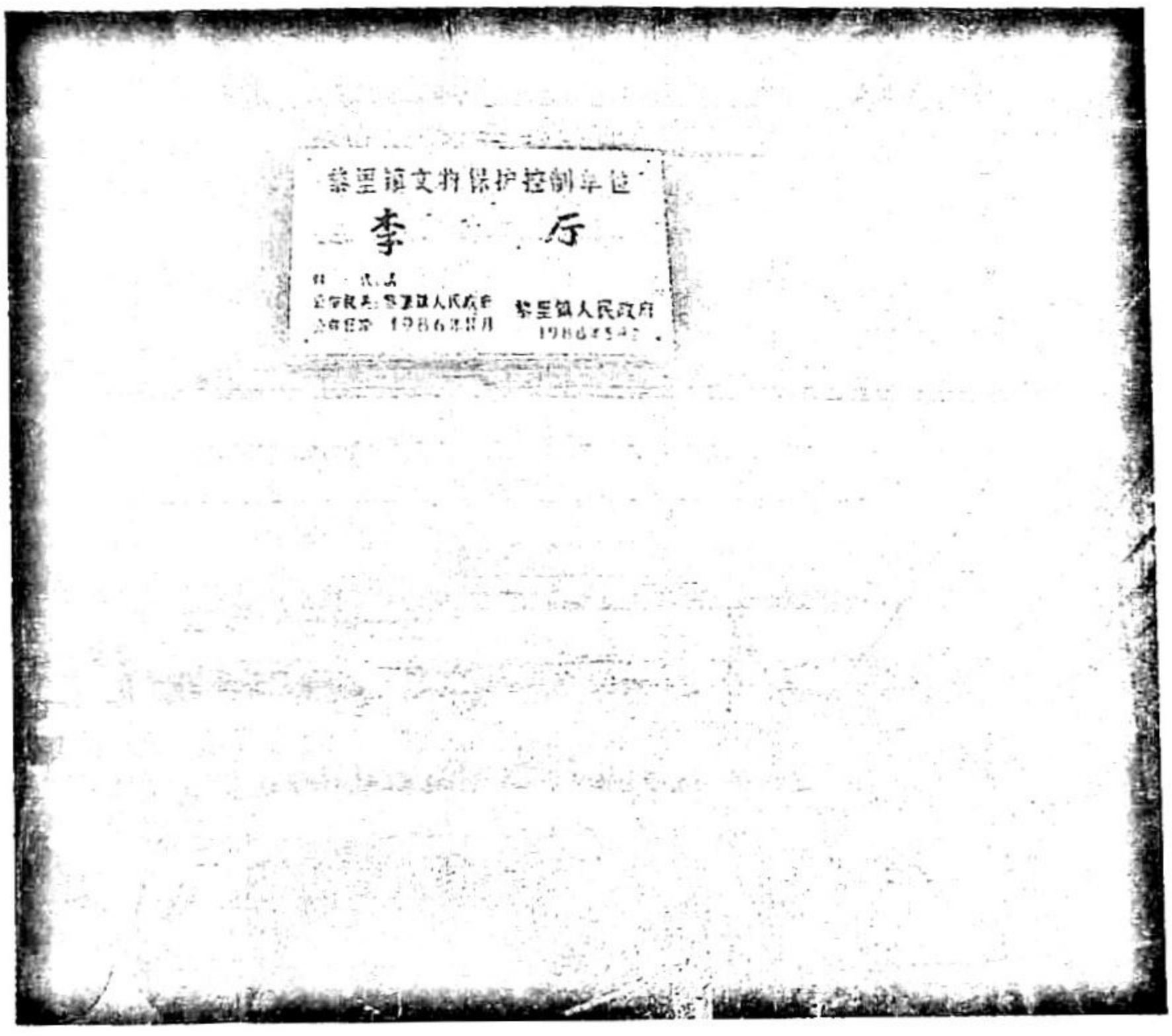
下面二位因为甘于平淡，得以善终。

李璜第四代孙李继蟠字挹仙，从小敏慧，考得秀才后，参加过一次乡试，不中，就此绝意科名，游学江淮之间。精通刑律，官府争相延聘。许观察道身、沈中丞秉成先后备兵常镇、通海，相继聘请继蟠主持幕府内务。年过40尚无子息，有人说："掌刑者艰于嗣。"继蟠回答说："儒生无尺寸权可以活人，吾正欲佐人于刑中求嗣也。"因此他处理刑治，以仁辅义，能够保全者他想方设法保全。同治初年，各国开始进入长江贸易，产生了诸多中外交涉事项，继蟠精通

英语及西方习俗，寓尊攘之义于怀柔之中，30余年，处事令中夷诸人心悦诚服。为人敦厚，乐于助人之急，馆谷所入往往分给贫困的亲戚与族人，享年68岁无疾而终。

李璜第五代孙李懋勤字绩宣号敏盦，不走科举之路，致力于丹青，努力学习曾鲸技法，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能，神妙独到，年逾古稀无疾而终。

李厅



李氏的故居在黎里镇梨花街，黎里百姓俗称“李厅”，面阔五开间，九进纵深，东边的备弄长达135.7米，李厅弄民居是一个清代前期建筑的群落，目前是市级文物控制单位。

第三进大厅前有一砖刻门楼，上书“康熙癸未仲冬立”，据此李厅始建于康熙年间，后来再由李璜及其子孙们续建翻建。李璜在第

六进辟有“岭云书屋”，那是他用功读书，教育子侄们的地方。

第三进大厅原有“传经堂”匾额，整个李厅也就称为“传经堂”。自从《遍行堂集》事件发生，李氏一脉的心总是悬着，不得安宁。同治年间，李氏后裔决定更换堂名为“易安堂”，不求飞黄腾达，但求随遇而安，不求大富大贵，只要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

晚清同光年间，苏州评弹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黎里人喜欢评弹，三里长街的书场多达十多家。李厅的易安堂也辟为“易安书场”，聘请响档演说苏州评弹，既开书又卖茶，十分受欢迎。易安书场一直开到1984年，因为电视机普及，有了电视书场才关门。

蒯

黎里的第三大姓“蒯”，本出湖北襄阳。明代中期，蒯氏的一支来到黎里镇定居，繁衍到清乾隆时期，排进了黎里八大姓之中。黎里蒯氏最早安居在泝泾桥东侧，那条蒯家弄，习惯上称为“老蒯街弄”。家大业大，子孙繁衍，又派生出了南蒯家弄和新蒯家弄。三条蒯家弄，建筑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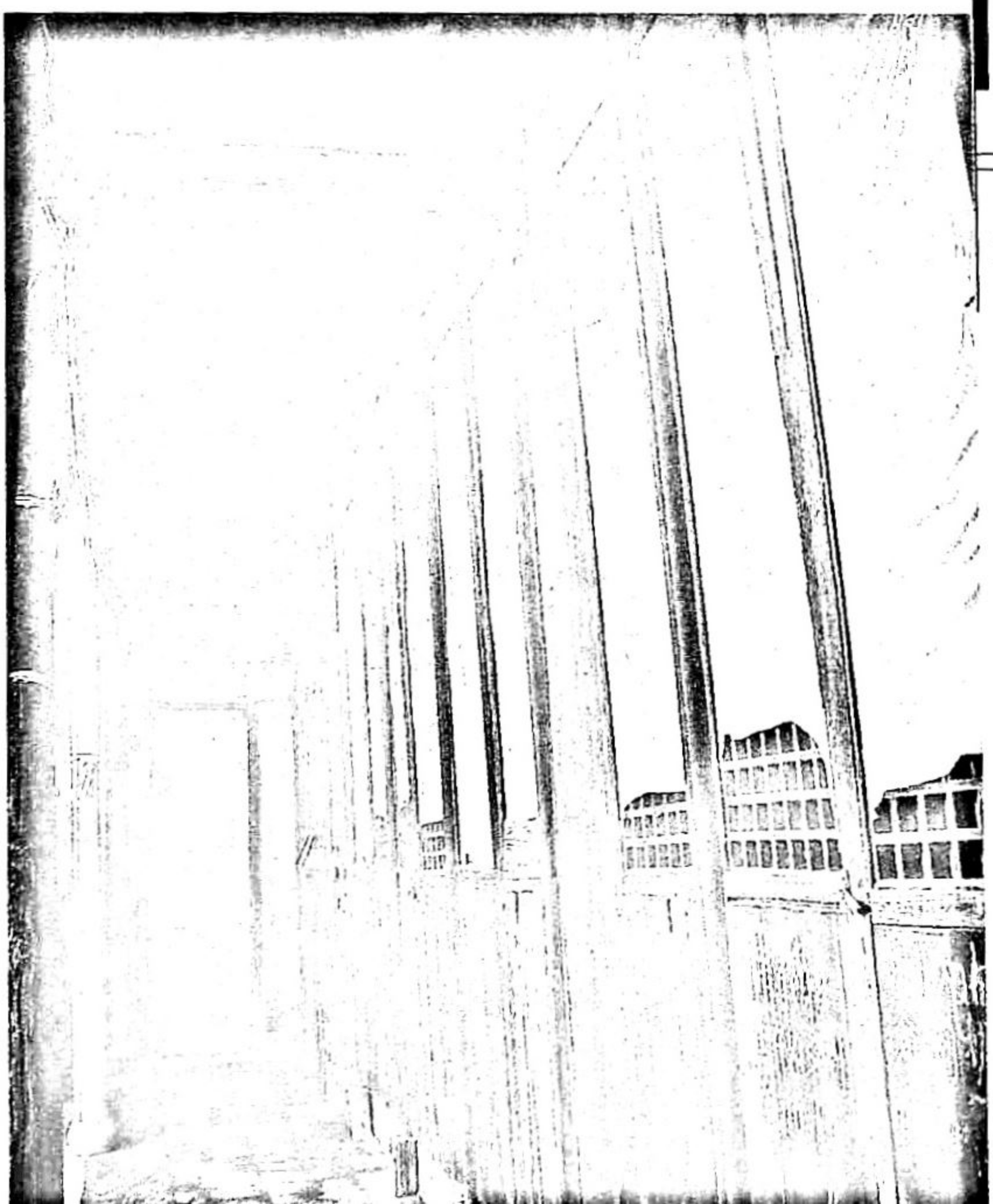
老蒯家弄，朝南面街一落五开间，纵深七进，之后沿后河横向发展，组成四落四进的方阵，门厅匾额“中宪第”，堂名“鄂桂堂”；南蒯家弄，在黎里镇市河南岸，五开间五进，匾额“荣禄第”，堂名“礼耕堂”。

新蒯家弄最晚，创建人蒯嘉珍，字荫雏，太学贡生出身，道光年间署山东曹州同知，嘉珍在距离老蒯家弄东50余米的地方购地筑室，一落七开间，纵深七进，建筑面积1140多平方米，门厅高悬“大夫第”匾额。正厅取堂号“树滋堂”，外观高大雄伟，十分气派，面积163平方米。这座厅堂极有特色，一是相亲的绝妙场所，千万别小看了这相亲一节，它可关系到夫唱妇随，家庭和睦、家族

兴盛的大事。二是说书的好去处，来此说书的响档更响。晚清及民国年间，来此说书的名角儿很多，听客场场爆满。黎里民众习惯上不叫树滋堂，叫“蒯厅”。

蒯厅正厅三间，两边各有二楼二底厢楼。就而今保存完好的东边厢楼来看，楼上有特制的格窗，状如抽屉，因此又称“抽屉窗”。厢楼上光线较暗，从抽屉望到敞亮的厅堂，清清楚楚，厅堂上的人却无法看到小楼上的动静。

蒯嘉珍工书善画，妻子钱与龄浙江秀水人，少女时期禀承曾祖母南楼老人陈书家学，擅书能画。婚后，夫唱妇随，书画诗词自娱（蒯、钱二人《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传）。更可贵的是，开明的蒯氏夫妇利用蒯厅的特殊构造，决定为女儿们选择乘龙快婿。大凡有公卿弟子进谒，蒯嘉珍总是热情地与他们品茗叙谈，这时女眷们在抽屉窗后仔细观察，小伙子的身材相貌，神情举止，甚至出言吐语都一清二楚，就这样蒯家的姑娘们一个个都觅得了如意郎君，为她们相夫教子奠定了感情



蒯厅

基础。

这个特殊佳构，也为胊氏男子相亲提供了方便。每当年节佳日，女眷们当然也要走动走动，那时，与龄夫人带领小姐来到厅堂上，与前来造访的女宾叙谈，胊家的少爷就在抽屉窗后仔细端详，觅取佳述。清朝政府规定，士子可以一妻一妾。胊嘉珍在儿孙的婚姻方面，订有严格家规，他认为“娶妻娶德，取妾取色”，男子成家之后应当致力建功立业，不能沉溺于儿女情怀，更不能随便讨小。只有年过不惑，没有儿子，才可以取妾。在封建社会，男女结婚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自身很难有选择的余地。胊嘉珍独辟蹊径，让儿子们选到了中意的妻子，为他们日后奋发找得了贤内助。

胊嘉珍夫妇育有三子，他们深信“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积极延师教育，督促儿子们走科举之路，以安身立命，为国效力。儿子们都很争气，“学而优则仕”，个个都从四书五经起步，踏上了仕途。特别是第三子关保，更能承继父母爱好，诗词娴熟，且擅长丹青、汉隶和篆刻，也从太学出身，先补浙江温州府经历，后出任知县。

由于治家严谨，儿孙奋发，树滋堂到第三代终于达到了兴盛的高峰。胊关保的儿子贺荪（1807-1876），字士芗，最能吃苦耐劳，道光24年（公元1844年）恩科中举人，由实录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河南永宁，一度参与林则徐幕府，熟读兵书，锻炼了军事才能。后任固始知县，拔擢直隶州知州。固始任上，捻军啸聚，更有一些杆子，时而为民，时而为匪，盘踞于光汝之间，烧杀抢掠，蹂躏百姓，贺荪奉旨征剿，带兵一一肃清。又两次上书大府，为光汝间百姓请求减征钱粮，情词恺恻，读之令人声泪俱下，经奏报回文曰可，老百姓感恩戴德，一时“胊阿母，来何暮”的民谣响彻光汝。此后，多次在河南河北进剿捻军，父母双亲亡故时，有旨两次夺情。奉旨赏布政使，不久迁浙江按察使。

蒯厅的第二个特点，音响效果特别好。厅堂蒙砖密布，屋瓦密集，墙壁平整，梁架椽子用料考究，加工精致，油漆光洁，一堂屏门齐齐整整，关闭后看不出门缝。光线明亮，冬暖而夏凉。空屋子中，高声说话，嗡嗡有回声。晚清年间，苏州一带盛行评弹，黎里镇有十来家书场，大多设在茶馆里，设在大户人家的厅堂里的只有两家，一是传经堂，习称“李厅”，后来改名易安书场，再就是蒯厅，由于蒯厅的音响效果，评弹艺人都喜欢到这座厅堂来献艺。蒯厅还是黎里镇最早放映无声电影的场所。

蒯厅书场布置，与一般茶馆不同。靠厅堂屏门正上方悬挂着“恕不迎送”四字匾额。据说这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特赐给评弹艺人的，评弹艺人不必对听客低三下四地作揖迎送，这对说书人是一种礼遇。匾额下设书坛，高出地面约三个台阶，所占面积不大，上面安放一张半桌，系上桌围。如果说大书或单档，半桌就横放，说书人坐在桌后，如果是三档小书，有三位说书人，一人居中，左右两边各坐一人。蒯厅邀请的多数是双档小书，半桌直放，说书人上手在左边，下手在右边。桌上放三弦、琵琶、茶壶、醒木、折扇之类的道具。书场中央，竖直安置二排条形长桌，左右两边横放双人长凳，很像“非”字的形状，这些座位处于中心位置，叫“头台”，黎里称为“状元台”，坐这样的位置，说、噱、弹、唱听得清清楚楚，就连说书人的举手投足，眼神表情，一一尽收眼底，一般这是有身价的老听客的专座。四周安排长条靠椅，椅背后特制一长溜雕有圆孔的木板，每个圆孔可以装一个茶杯，购票入场，堂倌就会捧上一杯茶，红茶绿茶任凭听客自点，夏季还有菊花茶供人享用。堂倌不时为听客添茶加水，他们手拎铜壶，隔老远也能够把水准确地冲进杯子。

苏州评弹名家的到来，使蒯厅场场爆满，客厅内挤不下，场主打开落地长窗，在走廊上安置听客，一场书可以卖出二百来根筹码。可是，来得晚的人还是进不了书场，只能靠在院墙上听“戤壁书”，



晚清说书场景 录自《申江胜景图》

有的时候台阶上、院子中央都站满了人。

胰厅立有一个规矩，其他书但说无妨，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不准说。原来，这是因为新胰家弄的掌门人胰贺荪，一生仕途顺利，想不到年及古稀，竟为了杨乃武一案不得善终。

前文说到，胰贺荪曾为民请命，百姓感恩戴德，称他为“胰阿母”。贺荪为人真诚爽直，胸怀坦荡，亲朋邻里同僚有急难，总是尽力周济，一生廉洁奉公，不留余财。追随林则徐的时候，林大人为他的书房题名为“求是斋”。任浙江按察使期间，他多次瞻仰岳王墓，决心效法岳飞，忠君为国，赢得身前身后名。他曾经专为岳飞庙题有这么一副对联：“晚受国恩封，花诰春深，已见东窗事发；早蒙家难死，寒泉秋碧，好同西市魂归。”总观胰贺荪的一生，除“杨毕案件”外，他为人处事，一贯实事求是，立志为国为民奉献自身，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好官，清官。

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就在胰贺荪的任上，余杭县出了“杨毕案件”。据此创作的话本、小说、演义、戏曲众多，进行了许多的艺术加工。这里把真实的案情概述如下：同治11年（1872年）春，余杭豆腐师傅葛品莲娶了毕秀姑为妻，秀姑容貌清秀，喜穿绿色衣服，系白色围裙，外号小白菜。葛家与举人杨乃武比邻而居，两家日逐来往，亲密无间。不久，葛怀疑妻子与杨乃武有染，葛母喻氏从中拨弄，但无实据。次年初，葛品莲突然暴病身亡，葛喻氏立即向余杭县控告小白菜与杨乃武合谋毒杀亲夫。县令得状，轻信浮言，在仵作草率验尸之后，臆断葛品莲中毒身亡，将小白菜押衙刑讯，由于不堪捶楚之苦，伪供与杨早有奸情，合谋杀夫。于是杨被拘捕到堂，县令施以酷刑，杨屈打成招。此案上报杭州府，府又报省，经县、府、省三级七审，最后判定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首示众。杨的姐姐杨菊贞决心为弟鸣冤，二上北京告御状，浙籍京官夏同善等28人联名上书，请求刑部复查，此事惊动了西太后。光绪元年

（1875年）西太后下令，刑部移棺京师，当众开棺验尸，最终证明葛品莲并非中毒，实系病亡，案件才真相大白。此案历时三年，惊动朝野。

蒯贺荪身为按察使，职责就是审案。案件到得蒯的手里，业已经过了县、府二级审理，牵涉的官员不下数十人。再说，顶头上司巡抚杨昌浚也认定杨乃武与葛毕氏有奸情。蒯贺荪经过调查勘察，心里明白杨乃武是冤枉的，可是，一旦翻案，数十名官员将遭殃，斩首，充军，革职，这些官员的家属也将蒙难。二者相权取其轻，只能违心地错杀杨乃武与葛毕氏二人了，所以，蒯贺荪维持原判。后来，刑部将一干人犯尽数移解京师，冤案得以平反。蒯贺荪先期得知消息，吞金自杀，那年正好70岁，正是即将告老回乡的年龄。

评弹艺人，在杨毕案件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随着历史的推移，版本日多，艺术加工更多，深受听众欢迎。

蒯氏后裔，对于“杨毕案件”讳莫如深，岂肯轻易提起。对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蒯氏一族视为奇耻大辱，当然严禁在蒯厅上演说。直至民国，蒯家遵祖训，把禁说此书的规矩明文刻在大厅进门处的石碑上。关于杨毕冤案的真相，本章将在附录里作一介绍。

1875年，树滋堂，也是整个蒯氏家族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蒯贺荪兢兢业业地供职，到头来却不得善终，蒯氏后裔觉得宦海险恶。他们不想再习举业读书做官，也不愿再参军建功甚或镇压义军以染红顶子。那时期，满清王朝大厦将倾，官场腐败成风，蒯氏片面接受教训，既然不想达则兼济天下，那就独善自身吧。于是蒯氏一族，都将儿孙们圈在家里，不再死啃那四书五经，写什么八股策论，一味陶醉于琴、棋、书、画。对于幼儿的启蒙教育，也只是请几位私塾先生前来坐馆，只求识几个字，能够读读闲书，写写书信。少年人好动，总有几个在家呆不住，家长们左思右想，终于有了妙计，诱使他们吸食鸦片，美其名曰“福寿膏”，祈求吸食之后添福上寿。实

在蒯家就要子孙们一个个上瘾，使他们无法远离蒯厅这个窝窠，只能乖乖地呆着。至于生活么，不成问题，祖上传下良田千亩，一切地租收入、财产管理，悉数托付给帐房先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悠哉优哉。

以琴棋书画而自鸣高雅的蒯氏后裔，后来玩起了评弹和昆曲，亲朋好友一拨拨地前来，蒯厅开设书场，卖票营业，也由此开始。可听听唱唱之间，又白相起戏子来了。再后来，掺杂进了许多嗜好，搓麻将、摊牌九、斗蟋蟀、发酒疯、逛窑子，醉生梦死，纯粹一个寄生的家族。

杨毕案件之后，树滋堂再也没有出过正而八经的官员及儒生。倒是在斗蟋蟀方面，出过一位畸形的人才。那就是蒯贺荪的曾孙蒯竹生，此人酷嗜蟋蟀，从小练就一手绝技。他手里的一根须草，最能逗引蟋蟀，经他的须草一撩拨，哪怕最疲惫的虫儿，也会兴奋异常，立马变得骁勇善战，更别说其他了。虫儿玩多了，蒯竹生肚里就存有了一本蟋蟀经，哪一类犹如程咬金只有三板斧，哪一类善于后发制人;什么地方的蟋蟀骁勇善战，什么地方的中看不中用，等等，等等，都烂熟于胸。特别令人叫绝的是，两头将要下笼或入盆打斗的小虫，蒯竹生只要须草一拨一逗，孰胜孰负已经心知肚明。还有更绝的，两头旗鼓相当的小虫，本来势均力敌，蒯竹生有本事，当众舞弊，在牵草时他暗使手脚，让其中一头小虫开不了牙钳而落败。晚清及民国年间，斗蟋蟀成风，输赢动不动成百上千。畸形的人才成了蒯家的宝，一年一度秋虫鸣叫，蒯竹生这家请那个邀，俨然黎里镇上的大忙人。

一大群纨绔子弟，坐吃山空海要干，蒯姓家族从官僚士大夫的大家庭，一步一步沦落为普通地主，进而变成破落地主，兴盛百来年的树滋堂衰落了。解放前夕，田产所剩无几，佃户大减，民怨倒也不多，土改、镇反等等都安然度过。但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的蒯氏子孙，在新中国的号角声中，要想脱胎换骨谈何容易？有的卖油条，有的拣破烂，乞丐似地活着。



蒯斯曛

时代毕竟在前进，蒯氏一族的儿孙们不可能个个都禁锢在蒯家弄内。辛亥革命隆隆的炮声震惊了树滋堂，蒯家弄东隔壁站起了爱国民主主义战士柳亚子，他创建南社创办刊物，配合同盟会推翻了满清王朝，又反袁世凯反张勋反段祺瑞。蒯贺荪第四代长房长孙蒯斯曛，自1906年呱呱堕地，迈出门槛之后就接受了新思想，紧跟南社领袖柳亚子的步伐，踏上了背叛封建家庭的道路。

1924年，蒯斯曛跳出了蒯氏老窠，考入复旦大学，如饥似渴地吸纳新思潮、新文化。1932年，参加柳亚子先生主持的《上海通志》的编纂，撰写出了诸如《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等一批颇有价值的史料性文章。1940年参加共产党，赴苏中抗日根据地从事宣传工作。后来，担任粟裕将军的秘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蒯斯曛从小学习刻苦，精通数国语言，1954年转业到上海，出任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积极为新中国贡献才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许多精神食粮，工作之余，从事创作和翻译，著作等身。蒯斯曛孜孜不倦，富有事业心、责任心，继承了乃祖优良的作风，1986年，那是他去世之前的一年，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仍然咬紧牙关，坚持不懈地工作，翻译并出版了萧伯纳的小说《不合理的结合》。

蒯氏后裔日暮途穷，固然是树滋堂的衰落；蒯斯曛背弃封建家族，获得了生命的价值，这更是树滋堂的衰落，同时，蒯斯曛成为了蒯氏家族走向新生的领衔人。新中国成立后，从蒯厅里走出了众多的医师、画家、教授、工程师乃至企业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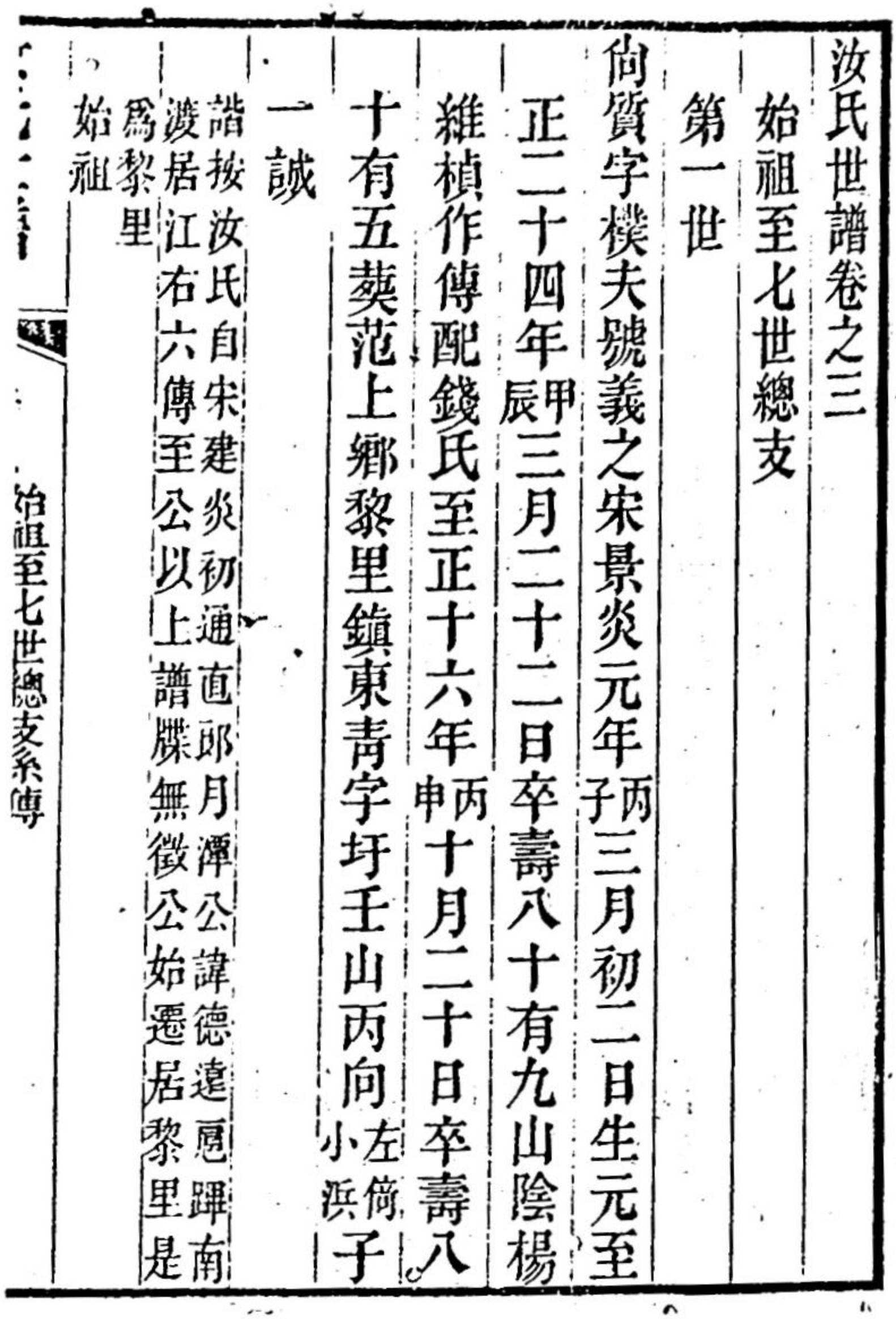
纵观树滋堂蒯氏一支，从嘉道年间开始崛起，经三代的接力达到鼎盛。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尤其是满清王朝走向没落的时代，蒯氏盛极必衰在所必然。蒯氏家族的兴衰深深打上了历史的印记，堪称黎里的一部《红楼梦》。

汝

黎里第五大姓“汝”，他们的始祖名尚质，字朴夫，号义之。汝本是河南汝宁府著名大姓，建炎初年（1127）赵宋南渡，当时任通直郎被汝氏尊称为月潭公的汝德远追随赵构，来到南方，定居在江西省。六传到汝尚质（1276－1364），尚质出生于南宋景炎元年，自小慷慨好义，有胆略更有智谋，擅长武术。汝尚质4岁那年，南宋为北元所灭，尚质长大成年虽然满腹经纶，但是决计不肯为孛儿只斤氏效力。一生喜爱游览名山大川，延佑元年（1314），携带资财渡过长江，来到金陵凭吊六朝古迹，过京口至姑苏，这次游览汝尚质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借游览之机为了选地卜居，为子孙后代寻找一方托身石。一天，乘船穿过吴江城，经45里水路到来了黎里镇，他觉得这里的风土物产着实可喜，这里的人物文章更令人喜爱。尚质兴奋地说：“所为源远流长者此也，我可家焉，以启子孙矣。”于是举家定居黎里，汝尚质是黎里的始祖。

汝氏来黎里后堪称甲于一邑的富户。邻里有急，尚质每每予以借贷，假如乡亲们无法偿还，就将借券一焚了之。乡里遇到繁难事紧急事，尚质总是挺身而出，慨然承担。至正辛卯（1351）严重水灾，田地颗粒无收，乡里一片饥荒。那时，尚质年已76岁，然而豪气不减当年，拿出家中粮食，倾尽全力设粥厂施粥。当时颍川刘福通、蕲州徐寿辉红巾起义震动朝野。一拨拨土匪纠结一气，招集亡命之徒，冒红巾军之名，在淀山湖、太湖设立巢穴，攻镇略城。四

汝氏世譜卷之三



始祖至七世總支

第一世

尚質字樸夫號義之宋景炎元年丙子三月初二日生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三月二十二日卒壽八十有九山陰楊維楨作傳配錢氏至正十六年丙申十月二十日卒壽八十有五葬范上鄉黎里鎮東青字圩壬山丙向左倚小浜子一誠

諧按汝氏自宋建炎初通直郎月潭公諱德遠扈蹕南渡居江右六傳至公以上譜牒無徵公始遷居黎里是爲黎里

始祖

始祖至七世總支系傳

围集镇的居民望风远避，弃家离散不可数计。汝尚质决意在黎里镇成立义勇借以自保。征得吴江知县的首肯之后，尚质凭借他的声望和能力，与儿孙们全力以赴，积极筹备。陆路凭陵为庇，水上恃湖为阻，设栅断路，约束里中青壮年，教以攻守之法。健壮者在水上巡逻，昼夜提防；老弱妇女，有的收聚砖石，有的罱河泥，作为特殊武器。强盗来袭，汝尚质率领乡兵用砖石投击，使强盗前进不得。一旦强盗斩栅偷入，就投掷河泥，蒙住强盗的耳朵和眼睛，使他们抓额挠腮无法施威，进而擒捉。在镇四周东南西北四栅的河底，遍设机械，贼船开得越快，越是容易被器械刺穿，船底漏水，强盗就不

战而先自溃乱。就这样屡屡获胜，捕获强盗多名，缴获船只、器械更多。周边乡镇，仰慕而来投奔的络绎不绝。初来乍到者，尚质还专门供给衣食。因此一镇保全，人心平安。黎里的百姓，感激莫名，称颂尚质为“义之尽者”，简称“义之”，时间一长，汝尚质径将“义之”作为自己的别号。汝尚质身体素质好，心理素质更好，不慕名不爱利，一心以服务家乡为宗旨。享年89岁无疾而终，他的夫人也是高寿，85岁病逝。

汝尚质的第二世和第三世仍都处于元朝的野蛮统治之下，只能穷则独善其身。元朝不重视科举，孛儿只斤氏在公元1234年灭金，统治北中国长达80年，不开科举，统一全国以后，延宕到1314年才勉强开科取士，可是又把乡试录取的名额限定在300人，规定蒙古人和色目人150，汉人和南人150，进士录取全国定额100名，分左右榜，右榜蒙古人和色目人各25名，左榜汉人和南人各25名。蒙古人和色目人不重视读书，参试者寥寥无几，举人、进士无法凑数，为了对等，统治者就相应减少汉人和南人的录取名额。因此汝尚质儿子和孙子他们都没有考过科举。儿子汝诚，一度到福建市舶司出任提举，谈不上什么官，只是一介小吏而已，由于世事日非，没多久汝诚就弃官归养，淡泊而终。孙子汝琪读书只是为了自娱，毫无功利之心。元末，张士诚据有江南，多方罗致人才，知道了汝琪，委派专使厚赠金帛，意欲聘请辅佐，汝琪避而不见。

到第四世汝氏人丁逐渐兴旺，有孙文璿、文玑、文焕、文璧4人，单看看名字“文”，就可以想见汝家对读书的重视了。前二人因为年龄的关系，没有打下应考科举的基础，三弟四弟少年时期已是洪武的天下，分别由考科举而成为邑庠生和禀膳生员。

到第五世，汝氏家大业大，根据《黎里志》等典籍，兄弟六人都考过科举，大半进学成为秀才。在太平年代，汝氏一脉有意通过科举道路，踏上仕途。

到第六世，汝家兄弟十多人，其中最出名的是汝讷，举人出身。第七代和第八代，分别出了两名进士。汝泰，明弘治9年（1496）进士；汝齐贤，明嘉靖17年（1538）进士。

据《汝氏世谱》卷四，汝氏一族总共出进士4名，其中2名文进士已如上述，还有汝先标、汝钦龙2名武进士。举人5名，贡生8名，秀才极多。

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汝氏子孙主要是第五世的汝思聪和第六世的汝讷。

汝思聪，谱名昺，字彦明，性情豪迈，智慧过人，永乐中任南城县沪溪巡检。当时有巨盗胡志生、富达等千余人盘据康郎溪山，在鄱阳湖一带出没，抢掠骚扰，觊觎州县，官兵畏惧不敢出兵剿捕。忽然督抚有令，命思聪进剿。思聪深思熟虑后说道："擒贼易耳，但不以期限。"督抚答应不限时日。思聪受令后，每天会同手下大吃鹅蛋，命令手下把蛋壳积聚起来，说以后自会派上用场。每天的训练课，不外骑马跳跃，甩掷石块，再就是喝老酒，好象并不把进剿事放在心上。突然有一日，思聪带领心腹二人，直驰进入强盗营寨。当时正值中秋，强盗宰杀了肥牛正在大吃大嚼，见了来人惊问原故。思聪假称也是同辈中人，一向在湖北操业，这次因为追逐客船，反倒受窘，特来投奔麾下求援。强盗请思聪等运槊，结果思聪等人持器械旋舞如飞。强盗大喜，就让三人一起吃喝，一留数日，思聪等人尽识强盗窝的险易虚实。思聪假说还有同辈数十人，也想招来这里，于是金蝉脱壳而归。三天后，率领部下乘夜直捣康郎溪山，思聪扬声大呼："三司官兵在此，降即免死！"强盗从梦中惊醒，看到火光冲天，满山炮石声振林谷，心胆俱裂，不敢应战，皆伏地乞求饶命。原来思聪的所谓炮石，是鹅卵壳充实火药制成的，四周的山树上遍插火炬，这就是炮火。官兵以少胜多，百余人竟然将数十年的积寇尽数降服。

思聪因功晋升兵马副指挥，巡城守卫丝毫不敢怠慢，有违法乱纪者必定以法惩治，不避权贵。一次，御前武士殷隆等人触犯禁例，思聪照样惩处。英宗将思聪召至大内责问为什么杖我武士，侍于一侧的殷隆也从旁申诉。思聪厉声说道："我为天了巡城，笞汝倖臣，亦何罪？"英宗大怒，命廷杖思聪。杖过之后，思聪任职如故。数月之后，思聪以其他事由晋见皇上，英宗正好在练习弓箭，也许忆及前事，竟弯弓搭箭，似乎要向思聪射来。思聪大声说："皇帝故杀直臣，如史书何？"英宗大笑着将弓掷到地上，升思聪为南城兵马正指挥使。任职期间，一次偶然从老百姓所输课钞中拣得黄金百余两，思聪多方想法，最后物归原主。

后来，王振擅权，思聪同僚约他一起行贿以求升迁，思聪回家与妻子徐孺人说起此事，徐孺人坚决认为不可。同僚行贿而得到升迁，不久王振下台，同僚们有的遭籍没，有的被谪戍。洁身自好的思聪居官至古稀之年才告老回乡。

汝讷，字行敏，父亲思远掌田赋于黎里乡，家道殷富，可惜父亲早丧，汝讷全靠祖母吕氏抚育成长。汝讷读书，好学深思，13岁补诸生，18岁登景泰癸酉科举人，可是四试礼部都名落孙山。汝讷自小善书，正好朝廷修纂《英宗实录》，就选入史馆，授中书舍人，汝讷精勤明敏，十分敬业，深受同僚好评。一次皇上下令汝讷等人书写佛经，汝讷竟和李应祯等上疏说："臣闻天下国家有九经，不闻有佛经也。"引得皇上恨恨不已，但也没奈何。秩满后汝讷被提为南京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再迁郎中。汝讷书法得晋人笔意，小楷尤其遒美可爱。一时朝臣大多希望得到汝讷墨宝，请书者不绝于门，汝讷不辞辛劳，挥毫不辍。对于他人酬谢的润笔费，一次也不曾笑纳。后出任汀州知府，不久，母亲去世，回家守孝。孝期后，时任兵部尚书的王恕拟汝讷补南安，转而想到南安地瘠民贫，讼诉特多，考虑更择他郡。汝讷知道了，不求更改。汝讷到达南安后，经调查得

知，南安是海南货物的输送要道，一般百姓全仗输货为生，可是富家大姓屯积居奇，往往引发争讼，富家以钱财贿赂官吏，官司多数不得公平。汝讷来到南安，坚决打击犯禁的豪强，对于普通百姓则着意抚恤，必不得已，才施以鞭挞。恩威并用，期年之后，无论豪强还是平头百姓，无不惴惴奉法，任期届满以常调罢归时，南安上下人人惋惜。

汝讷为人坦易，喜欢奖掖后进，长洲有个叫顾景祥的，家景贫穷而专心嗜学，但是此人性情过于鲁莽，教者大多不肯接纳，汝讷知道后悉心教授，最终顾景祥于成化辛丑得中进士。一次，有人鬻田，汝讷付了定金，可那人却又背约不卖了，汝讷也不作追究。有人笑他迂腐，汝讷只轻轻说了一句："与小人较自失多矣"，就一笑了之。平时居家喜欢与人谈诗论文，所作诗文，格韵平暢，著有《学鸣集》、《北游稿》等。

汝氏一族，在历史上留下名声的还有不少，文治武功之外，还有种种技艺，如书法、绘画、棋艺、音乐等等。

汝讷之名，入载《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第七世孙身登进士第的汝泰，也工于书法。下面再介绍几位具备突出技艺的汝家后裔。

汝祖霖字不盈，早年考上秀才，中年后弃科举不顾，每天穿着犊鼻裈，在市场上做杂活以谋生。平生没有其他爱好，只嗜弈如命，棋道高超。有一次，他去邻城访友，回来时乘错了航船，一上船就齁齁入睡，等到航船靠岸，才知道南辕北辙，可是为时已晚。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岸再说，信步徘徊间，发现一处庙宇，有几个人正在手谈，祖霖不禁技痒难熬。他看到其中一人败势已现，就指点起来，几着之后，竟然转败为胜。那个对手本来是此地的常胜将军，现在居然失了风，恼怒地厉声道："常言说得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敢同我对局吗？"祖霖反正没事，就坐了下来，开始祖霖略胜数子，对手不罢休，饶先之后再饶子，不吃不喝，连续下了

五六局，饶子也渐渐增加到五六子，对手就是输棋。最后对手仔细审视起祖霖的面相来，发觉他骨格清奇，怀疑是仙人下凡，急起大呼“大仙度我，大仙度我！”，抓住祖霖的袖子不放，惟恐化去。祖霖没法，详详细细地告诉他自己的情况，对手始终将信将疑，后来祖霖雇船邀他一起来到黎里，遍访邻人，对手才拜师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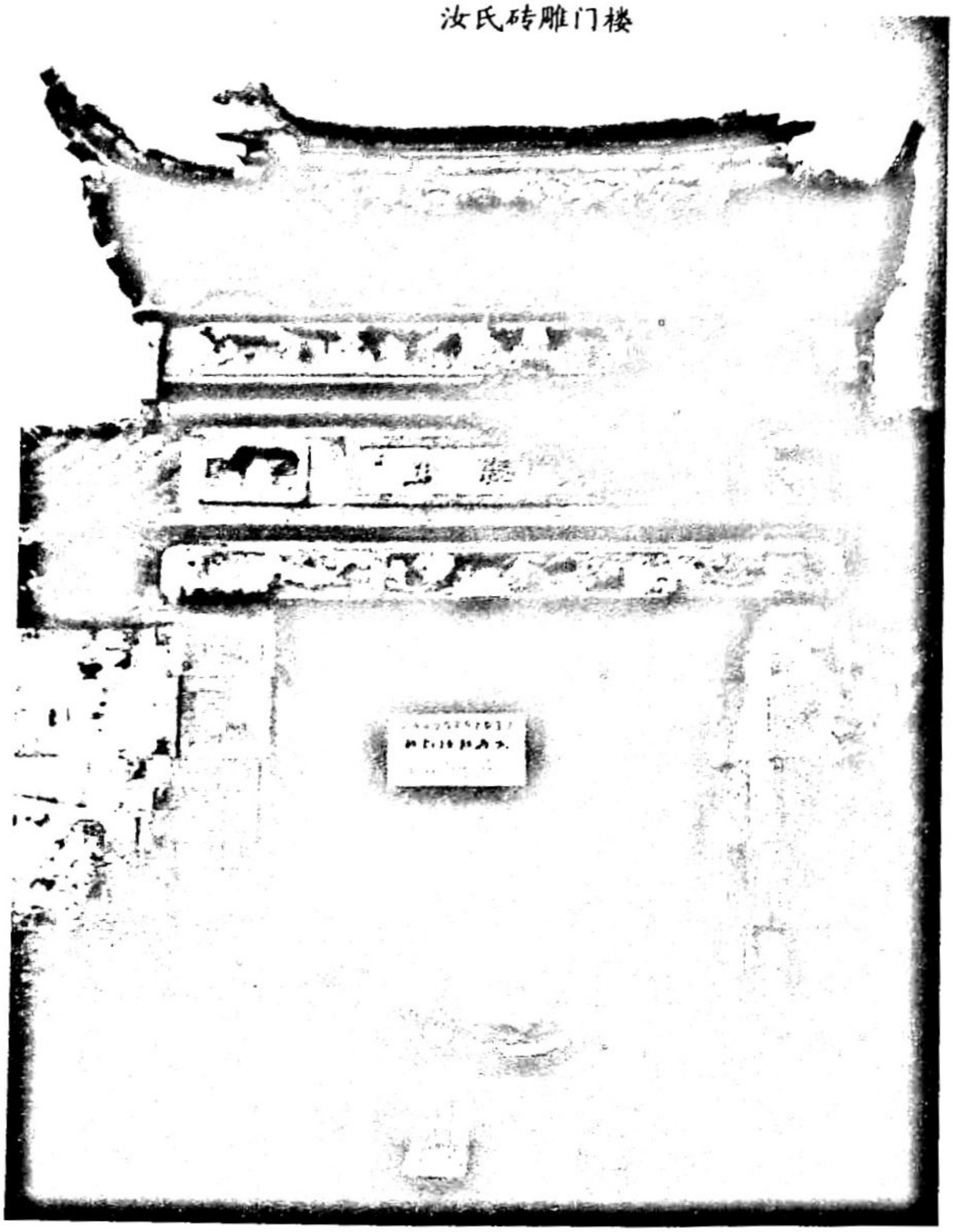
汝文淑，号蕙香居士夫人，一手丹青可谓出神入化，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臻于妙境。行家们赞美她的画说“三百年中大方名家，可与颉颃者不过二三而已”。她嫁于同镇毛以燧，夫妻俩常常合作扇面，丈夫工诗也善书，文淑每作一画，以燧必题诗句，时人盛赞为“以燧诗中有画，文淑画中有诗”。2005年春，中央电视台4套节目介绍，汝文淑有18幅扇面，流于海外，我炎黄子孙出价200万购归。据志书记载，汝文淑还有一幅《明妃出塞图》，较陈居中、周文矩的“明妃图”更为出色，称此图忠于史实，格调高古。可惜至今下落不明，有待有心有识之大家。

汝氏是黎里大族，光弄堂就有4条之多，汝家弄、汝家湾堂弄、中汝家弄和汝家桥弄，经初步考察，至少前三条弄堂是由于汝氏子孙繁衍留下的历史印记。

汝氏又是黎里望族，镇东的迎祥桥，俗称“汝家桥”，一般人只知俗称而不知道正式名称迎祥桥。桥堍原有石牌坊一座，旗杆8根，现在已经不存，但中汝家弄口还能找到当年的旗杆石。楼下浜东侧，有市级文物控制单位“进士第”，原本由南至北，从街面到后河，房屋七开间九进，门口有石狮子护卫，门楣上有“进士第”匾额。经过多次改建，目前只剩下平厅一座。从建筑用料、营造法式来看，当属明代基础，清代重建。仔细观察，东侧的柱础是木础，江南古建筑中，木础自元代问世至明代截止，因此进士第的初建年代属于明代，不必怀疑。

最能显示汝家荣耀的，当属瑞文堂前的砖雕门楼了。砖雕门楼

汝氏砖雕门楼



在汝家墙门内宅，第三进瑞文堂天井的仪门上，建于清乾隆年间，细砖雕刻，工艺精湛。最上层雕有各具情态的“八仙”，第二层是栩栩如生的“三英战吕布”，下部是象征热闹祥瑞的“狮子滚绣球”等图案。正中间刻“贻谋燕翼”四字，语出《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原句歌颂的是周武王迁都镐京，使周朝王业迅速发展。诒，通贻，遗留；孙，相当于远；燕，安；翼，覆盖，遮护。原诗的意思是：武王留下了远大的谋猷，用来安定保护他的子孙后代。对于汝家的子孙来说，既是对祖先的称颂，称颂他们造福

子孙，遗泽身后；又是对自身的勉励，应当奋力奉献，多作善举，为后代酿造幸福。

陆

陆氏本是吴门大姓，早在三国时期江南就非常著名。排入黎里八大姓，不足为奇。可是黎里陆姓，留下的资料实在不多。

据陆氏后裔口耳相传，他们是陆绩的后裔。陆绩在《三国志·吴书》中有传，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陆绩6岁那年，在九江拜见袁术，袁术拿出几枚上好桔子招待，陆绩吃了几枚小的，暗中把三枚大桔放在怀内。告辞时行跪拜礼，桔子从怀中滚落地下。袁术笑着调侃说："陆郎来作宾客，把桔子放到怀里吗？"陆绩没有起来长跽着回答说，这么好的桔子，我很想让母亲也尝尝。袁术听了感到非常惊奇。从此，人们就将"陆绩桔"或"陆氏桔"作为孝敬父母的典故。

现在镇东头有陆家墙门，五开间八进，第三进宽大的庭院前，有一个砖雕门楼，最为醒目的就是"怀桔清芬"四字。陆氏世世代代，将此典故作为庭训，教育后裔孝敬



陆氏"怀桔清芬"砖雕门楼

父母。他们认为能尽孝者，必能尽忠，在家为孝，在朝为忠。

道光年间，陆家墙门内居住着兄弟三人，兄长名炳堃，字焕如，号蔼春，好读书，博学多才，应了几次童子试，可是都没有考得秀才，为了谋得功名，他纳粟入监，想到京城读几年再应试，由于母亲多病，放心不下，难于成行。每当读书读到忠孝大节的段落，炳堃常常掩卷唏叹："大丈夫当如是矣！位有贵贱，纲常名教无贵贱，庶几于此身无负耳。"

咸丰10年，社会动乱，盗贼蜂起。黎里镇屡遭盗贼劫掠，陆炳堃与两个弟弟桂林、正钧劝母亲外出躲避一些时日，无奈母亲坚决不肯。兄弟三人也就没有一个离开，决定留下来侍奉母亲。一天，一群盗贼涌进黎里镇，直闯陆家墙门。炳堃一听来者不善，当即手执钢刀，守卫自家门户。盗贼涌来，团团围住了炳堃，其中一贼从旁挥九猛砍，炳堃的肚子上中了一刀，肠子直穿而出，血流如注。炳堃镇静自若，从容面对，他从身上撕下一长条绸帛，缠绕在自己的腹部，然后扬起大刀，呼叫着跃入贼群，最终力竭而死。两个弟弟闻讯赶来，二弟正钧赤手空拳与贼人搏斗，夺得了一把大刀，三弟桂林，拿起一个酒瓮，拼尽全力向盗贼砸去，一连砸死了好几个盗贼。终因寡不敌众，二人也都惨遭杀害，房屋被焚烧，老母亲也葬身火海。

炳堃的族弟陆寿民，字立人，号仲山。特别爱诗词，初学昌黎、长吉，逐渐兼取唐宋诸家，为文深沉，富有禅理。由于他不喜八股时文，所以直到30多岁方得进学成为秀才。寿民非常孝顺，母亲患有沉疴，辗转求医，每次抓药后就与夫人吴氏仔细煎煮，昼夜轮班服侍。可是，药石并不见效，寿民与吴氏决定轮番自割臂上肉，放入煎药内（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种治疗方法，很不科学，而那时的孝子往往这样做），以求母亲早日康复。

陆氏一族，连出二桩令人泣下的事迹，合镇民众感动不已。陆

正钧与桂林的儿子陆传纶和陆淇生，受到袭荫，都以八品职衔承袭云骑都尉世职。袭阴固然好，不过，陆家认为，应当靠自身的努力，考得功名。因此陆氏后人，谆谆教育子孙，认真读书，祖宗有灵，当能保佑科举高第，步步晋升。同治三年，寿民儿子蕃伯，不负众望，年方而立，就得中举人，著有《闻樨堂稿》。

陆家墙门，最气派的第三厅，本名“闻樨堂”，庭院中有金桂银桂各一，还有一棵四季桂，一年四季花开不断，犹如陆氏儿孙的美好名声一样，馨香四溢，无论远近都能闻得清香。

徐

“徐”，排入黎里第七大姓，主要源于黎里第一部镇志的编写者徐达源。

徐达源（1767－1846），字岷江，一字无际，号山民，别号小峨山人。达源的族祖父徐电发，康熙时曾任翰林院检讨，富有名望。徐达源而立之年后，由太学候选布政使理问，不久又选入翰林院待诏。所谓待诏，就是具备一技之长等待皇帝随时诏问的人。汉代，征召学有各项专长者入京，陪侍于皇帝身边，不属正

徐达源墨梅



式官员。唐初设翰林学士院，将拥有文学、图画、棋艺、医学、相卜等专长者召入，随时准备皇帝询问，称入值翰林院，唐玄宗时始以待诏命官，相当于秘书性质的官。明清沿袭设置翰林院待诏，不属正官，无具体执掌，相当于顾问。达源豁达冲淡，心轻仕途。他赴京任翰林院待诏，颇不适应，仅仅一年就返回家乡。要说京城一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一批知名的读书人。回黎后，闭门著述，达源素来工于诗文，常与宾朋，特别是与当时的知名文人袁枚、洪亮吉、阮元、吴锡麒、王文治、赵翼、王鸣盛、伊秉绶、梁同书等人时时诗词唱和。达源又擅长绘画，所画墨梅，简老疏古，山水小幅也具独特风格。

徐达源夫人吴琼仙（1768－1803），字子佩，号珊珊，出生平望镇，幼年在家塾读书，爱好诗文，20岁与达源结为连理，孝敬公婆，夫妻感情弥笃。珊珊的诗别具一格，泠泠清清，若明漪见底，平日喜爱绘花画鸟，曾自绘小像，勒成石碑。夫妻俩相敬如宾，夫唱妇随。乾隆50年（1785），当时著名文学家袁枚来徐家小住，盛赞徐、吴夫妇“天机清妙”，当即收二人为学生。

袁枚的《随园诗话》中特别提到黎里，引录如下：

余过吴江黎里，爱其风俗醇美。家无司阍，以路无乞丐也；夜户不闭，以邻无盗贼也；行者不乘车不着屐，以左右皆长廊也。士大夫互结婚姻，丝萝不断。家制小舟，荡摇自便，有古桃源风。

袁枚还作有一首排律长达32句，录如下：

《黎里行·吴江三十里地号梨花村》

我似捕鱼翁，来问桃源津。花草有静态，鸟雀亦驯驯。从无夜吠犬，门不设司阍。

长廊三里覆，无须垫角巾。家家掉小舟，目不识车轮。勾栏无处访，椰蒲声不闻。

丝萝不外附，重垒为婚姻。不知何氏富，不知谁家贫。更有奇女子，嫁与贤郎君（谓徐山民及珊珊夫人）。

双双来执贽，宾宾拜起频。留住小眠斋，款如骨肉亲。我喜风俗美，更感古谊敦。

逝将去故土，十万来买邻。非徒结张邴，兼且联朱陈（谓秋史）。

有女此地嫁，有男此地婚。庶几子与孙，永作羲轩民。

从袁枚的文章和诗歌，可知乾嘉期间黎里的风土、景色和人情，平静、殷实，令人留恋。

黎里镇人烟稠密，文化氛围浓烈，再加有了多才多艺的徐达源夫妇，引来了众多的文人墨客。除了袁子才，王鸣盛、吴锡麒、洪亮吉等人也都到过黎里，有的还不止一次，像洪亮吉堪称徐达源的莫逆。他们之间的投赠篇章、唱和诗词、尺牍信札为数着实可观。嘉庆16年（1811）秋，徐达源从中选择了一部分，主要选了刘墉、法式善、王鸣盛、袁枚、梁同书、王文治、赵翼、洪亮吉、余集、陆开荣、吴锡麒、阮元、伊秉绶、洪亮吉、唐仲冕等二十余位学士的手迹，计有手札23通，序、题跋12篇，诗词6首，摹写法帖2幅，篆联1副，勒成31方藏石，保藏在他家的“紫藤花馆”内，堪称史料与艺术兼备的珍品。达源又亲自拓成《紫藤花馆藏帖》，分赠四方同好。真可谓诸家之法帖，蔚为大观，书法遒劲，文采飞扬，真、草、隶、篆各体之神韵都能从中领略，书法与文采相辉映，刻工精妙，刀走蛇龙，飞白毕现，成为一时的名帖。日本书家熊阪秀、冈部与梅谷十时顺得到了拓本，击节赞赏，他们作了题识，带回日本，藏到肥州孔圣庙中，至今日本视为国宝。

紫藤花馆的藏石，至今完好保存在浙江南浔小莲庄的碑廊内。徐达源逝世26年后，藏石为同镇一名古董商购得，同治11年(1872)，南浔富商周昌富途经黎里，从古董商手中以重金觅得，带

回南浔，周氏晚年，这批石刻又归南浔刘镛所有，刘氏特地在小莲庄建制长廊，将藏石镶嵌墙壁间，供人观赏。

徐达源正楷“归去来辞”



徐达源南来北往的客特别多，天天高朋满座，谈诗论文，绘画书法，互相切磋，因此徐氏不仅住宅宽敞，而且有花园、别墅，除了居室之外，还有紫藤花馆和南溪老屋。紫藤花馆是花园，内有亭台楼阁、水榭荷池和曲屈的长廊，可惜与南溪老屋一样已经不存。只有五开间八进深的居室，现在以徐达源故居作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妥为保存。

徐达源故居建筑面积2018平方，东侧的备弄长108米。故居

第三进是一座五开间的楼厅，楼下大厅正中有“孚远堂”匾额，孚远堂是徐家叫得响的堂名。楼厅高爽明亮，原本前面有砖雕门楼和花台，现在只有一株百龄以上的桂花树，依然散发着珊珊夫人在日的清香。楼上是珊珊夫人的书房“写韵楼”，在这座楼上，年仅36岁就英年早逝的吴珊珊留下了《写韵楼诗集》和《双巢翡翠阁小札》两本集子。

故居的第五进，也是五开间的楼厅，就是遐尔闻名的“新咏楼”，徐达源的书房。想当年，袁枚等人到黎里作客，曾在此地与徐达源探讨过诗文。在新咏楼内，徐达源完成了《吴郡甫里人物考》22卷、《黎里志》16卷、《涧上草堂纪略》1卷、《修养杂录》2卷、《水利节略》1卷、《禊湖文拾》2卷、《南北朝文钞》1卷、《禊湖诗拾》8卷、《紫藤花馆文钞》3卷、《新咏楼诗集》21卷和《无隐庵笔记》10卷。徐达源晚年一度移居角直，因此后来还编辑了《吴郡甫里诗编》12卷和《国朝吴郡甫里诗编》8卷。黎里人都说徐达源“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一点也不为过。

徐达源故居新咏楼砖雕门楼及厢楼



吴琼仙生有一子名晋鎔，去世后达源续弦严氏，又生女儿丸如和儿子晋铭。徐达源的子女们读书用功，都有乃父遗风，可惜他们不大接触社会，大多闭门造车，终致难以望其父亲的项背。

女儿丸如能诗，可是丈夫不是广泛交接高朋的文人，她的三寸金莲又不能随便走向民间，只能相夫教子，作一贤妻良母终其一生。

大儿子晋鎔，早岁立志秉承家学，弱冠之后得中秀才，提笔为文常常洋洋洒洒，他特别爱诗，长于五七言。父亲让他拜他的知交顾侍讲元熙为师，一度随顾师游览广东，晋鎔将粤地山川风土一一系之以诗，成《岭海纪游集》一册，此册尚有内容。顾师卒于任，晋鎔护丧以归，从此足不出户，专力撰诗，另有《忘忧草庐诗集》、《金粟斋诗赋钞》二册诗集，格律当属老成，但是从他书偶尔引录的一麟半爪来看，内容终究贫乏。

小儿子晋铭，教几个蒙童度日。此人极怪，成婚后夫妇异居，他亲执釜炊，黎明汲水析薪之后，就闭户不出，就连隔壁邻舍都难见面。夫妇之间，只在除夕一见，相敬如宾，初一早晨祭神之后，二人就拱手相别，终年不再相会。馆谷所入一旦稍有余裕，就遣去学生，专力读书为诗，多数时日枯坐一室，冥思苦想。

徐达源的第二代遗传基因不能说不好，智商也不能说不高，可是他们的方式方法不当，导致徐氏的衰落，新咏楼与写韵楼易姓，紫藤花馆藏石为古董商购去等等，看来事出必然。

蔡

“蔡”，作为黎里第八大姓，确立得最晚，迟至嘉庆年间。

根据《蔡氏支谱序》等资料，蔡氏本是北方望族，南宋时有位焕章阁学士，在建炎初，追随赵构南渡至浙江，可是这位焕章阁学士的名号不详，以后也没有看到什么记载。到明嘉靖初，约1523年，

有一位蔡槐号湖隐的人，举家从德清迁移至黎里。此后，蔡家好几代平凡居家，默默无闻。

清嘉庆年间，蔡家子孙繁衍，家道小康，子孙读书应考科举，有蔡湘、蔡淇、蔡鸿、蔡澣弟兄四人进学成为秀才。嘉庆15年（1810），蔡淇乡试中举，次年授太常寺博士，他的兄长蔡湘以南监监生的资格，候选布政司经历。蔡家逐渐有了名望，兄弟二人的父亲蔡懿德、祖父及族祖蔡宏禧、蔡宏裕，也因为儿孙而受到封赠，载入志书。蔡懿德只是一名普通秀才，靠开米行为生。嘉庆甲子（1804年）和甲戌（1814年）黎里遭受水灾，懿德首先降价售米，对实在贫寒的乡亲，还适时送一些米面。有善举，又因两个儿子晋身仕途，蔡懿德被封为儒林郎，生平事迹列入《黎里续志》。

此后，蔡氏一族，一般都进学成为诸生，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蔡宏禧到蔡丙圻共计六代，后四代至少出了三名贡生，四名举人，谋得一官半职的更多。

除了做官，具备一技之长者也多，别的不说，单说说蔡湘的三个儿子吧。

蔡湘长子禹松，喜爱搜集古器碑版，收藏了一批汉铜印和大量古钱币。因为经常拓印，所以掌握了一手绝活，能够将古玩器皿，一一拓出，阴阳虚实无不逼真。对于古钱币鉴赏精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地，有专门著作《荣肇堂钱录》两卷传世。

蔡湘次子文朴，弱冠以前进学成为秀才，24岁那年妻子去世，因儿子太小，担心续弦使幼子受苦，发誓此生不再续娶。平居钻研算术与歧黄之术，喜欢下棋，一册棋谱在手，往往忘记时日。棋艺日进，镇上已经没有敌手，远近高手，闻名前来一决高低，尽皆披靡。留下《泠善草堂弈谱》一册。

蔡湘季子傅梅，性情畅达，博览群籍，长于诗文。道光17年（1837）拔贡，道光20年顺天府举人，二次参加礼部试不中，经大

挑而出任知县。喜爱金石文字，经常搜罗晋唐碑帖及名人尺牍，善于鉴赏，擅长书法，分行布白，疏宕秀逸，尤其是一手小楷，几疑董其昌转世。著作有《思无邪居诗文集》和《香诗余》。

还是蔡湘，他的孙子玄孙辈也都具有一技之长。

孙子以焜，擅长医术。青年时期，以焜从苏州跨塘顾氏舅家得秘方，接着孜孜攻读张仲景医书，兼通内外二科，善于切脉，治疗效果明显，多数一二剂就痊愈。他开出的药方，全部录下底稿，又一定将病家癒后情况一一摸清，记录在案。数年后，积录药方二百余卷，临床经验日益丰富，许多疑难杂症，尤其是有些病家辗转找郎中，得不到有效的疗治，但只要到得以焜手里，不消多少时日就会药到病除，名声因而大噪，四乡八落都来就医。一人忙不过来，好在儿子增祥年已弱冠，继承父业。

玄孙丙圻，十多岁即入学成秀才，同治12年（1873）入南监读书，不久以候选县丞资格随张曜嵩武军出战，克复肃州省城有功，授分省候补知县。不惑之后，在家乡黎里诗书自娱。也许是参与了攻城略地的战事，回到家乡喜欢观察地形、河流、疆域，考证政治、经济与社会，褒贬人物、风俗及忠孝节义等等，丙圻花费近十年的时间，于光绪23年（1897）终于完成了整整16卷的《黎里续志》，记录了黎里近百年的历史。

蔡鸿、蔡澣兄弟二人，也都致力读书，善于书法。他们的儿孙同样走科举之路，考秀才成贡生或中举人，自立门户。

蔡鸿的长子尧栋，自小聪明，性格豪爽，严于律己，治学长于治史。咸丰二年（1852）中举，出任国子监助教，远近仰慕他的品行，追随他学习的弟子很多。所作文章扫除陈见俗谛，卓然独立，常常以孝弟忠信及古人敦睦教育弟子。咸丰丁巳（1857）有奸民结党横行，聚赌害人，一般人畏于奸民恶势不敢揭发。尧栋挺身而出，不仅向官府告发，而且主动请缨参与擒捕，终于将这股邪恶势力尽数

剿灭。尧栋有宝琨、鲁琛二子，二子均用功勤读，前者光绪12年（1896）选为贡生，后者同治3年（1877）得中举人。

蔡鸿的次儿子召棠，20岁中秀才，赴乡试不得志，道光庚戌（1850）以岁贡入成均。致力于诗，所感所遇都系之于诗。黎里北长田传胪殷寿彭视学山东、广东，将召棠招进幕府，前后九年，召棠留下了诸多诗作，游山东山水作《海岱游草》，入粤作《岭南游草》。光绪5年（1879），选授泰兴训导，以目疾辞不赴。召棠以善书负盛名，初学二王，参以隶法，劲险刻厉，于平正中现险绝，酷似欧阳询。中年以后学赵文敏，书体妩媚可爱，年逾古稀还能作蝇头小楷。他的墨迹，得到者都妥为珍藏。

蔡澣的孙子毓琛，也由秀才而贡生，光绪20年（1894）直隶试用布政司经历监督海运南漕授补用知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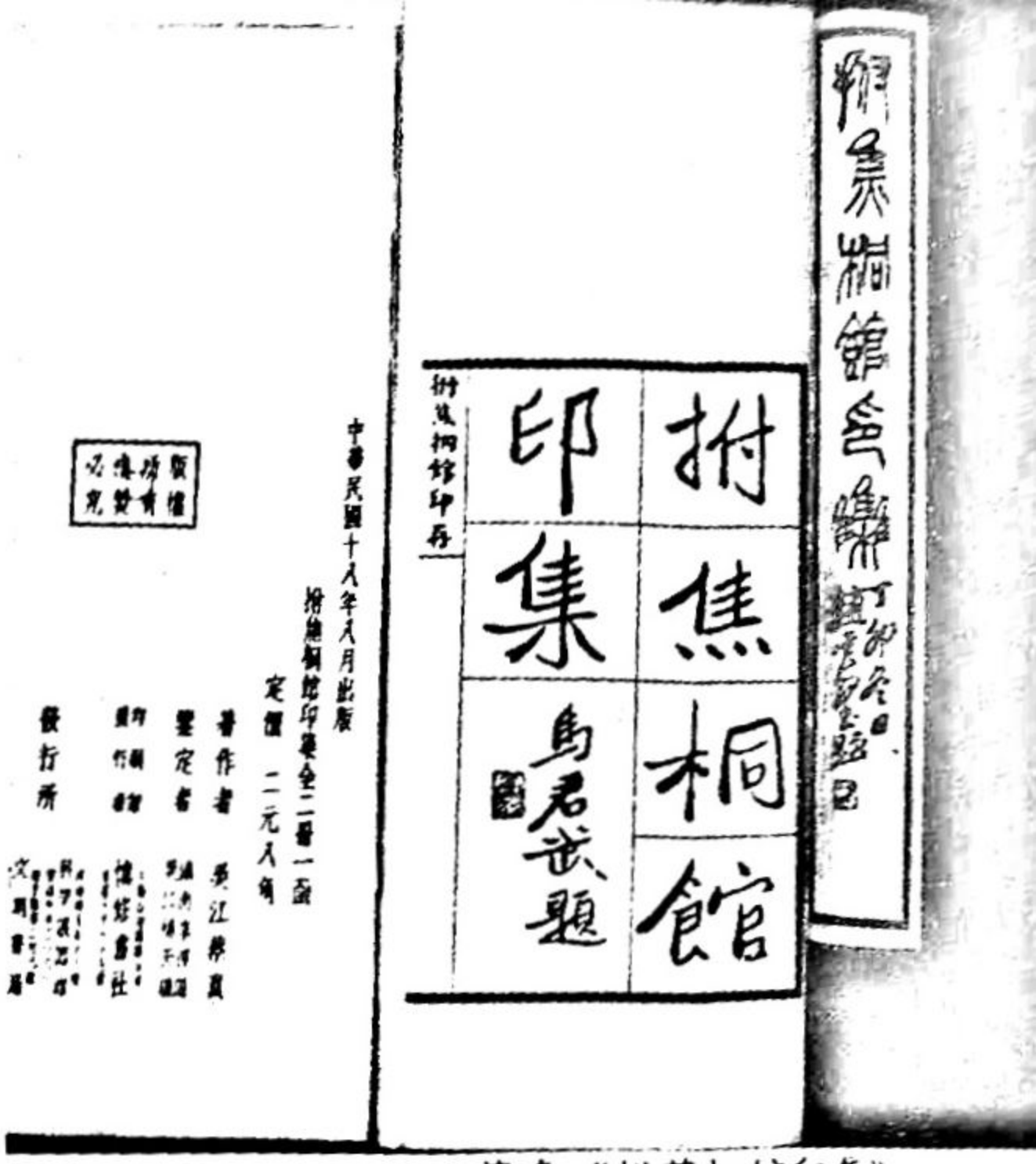
蔡氏一族人丁兴旺，家大业大，分门立户，黎里镇至今尚完好保有5条以蔡姓为名的弄堂，东南西北中各一条。他们各以一个堂号为标志，南蔡家弄是承裕堂，北蔡家弄是执经堂，中蔡家弄德星堂，西蔡家弄荣肇堂，东蔡家弄正义堂。

正义堂东蔡家弄属于后起之秀，那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始建于晚清，改建于民国，面阔五开间，纵深达八进之多，占地面积1780余平方米，典型的江南水乡绅士宅第。那深达80余米的陪弄特别气派，黎里镇上的陪弄一般宽1米左右，可东蔡家弄宽1.6米，为的是让轿子直接抬进抬出。

东蔡家弄正义堂民国时期的主人是蔡真（1900－1938），字冠雄，室名拊蕉桐馆。东蔡正义堂民国年间有子女7人，只有蔡真为男性。冠雄自小聪明伶俐，性情恬静，酷爱读书，深得东蔡族人的厚望。正义堂就在著名的黎川八景

蔡真





蔡真《拊蕉桐馆印集》

“中立晚眺”附近，这里的市河最为宽阔，东蔡弄一侧的河岸称为“官塘上”，黎里镇上达官贵人和宦游回乡者无论走水路还是走陆路，这里都是必经之路。蔡真耳濡目染，颇有干一番事业的勃勃雄心。民国时期黎里一度分为黎东镇和黎西镇，1929年至1934年，冠雄出任黎东镇镇长。在任期间，他组织开挖官塘上一段市河，赢得了众人的好评，黎里几个头面人物，专门制作了“正义堂”匾额敲锣打鼓送到蔡宅。

蔡冠雄酷爱书画金石，一手十七帖写得出神入化。诗文书法都有造诣，笃嗜印人之术，能以当时名家黄、陈、邓、赵为阶梯，追摩秦汉融汇金文。青年时期的蔡冠雄追随家乡前辈、爱国诗人柳亚子，加入南社湖南分社，于1929年出版了印集《拊蕉桐馆印存》上下二册，柳亚子、金松岑、胡适、李根源、郑逸梅等人作序作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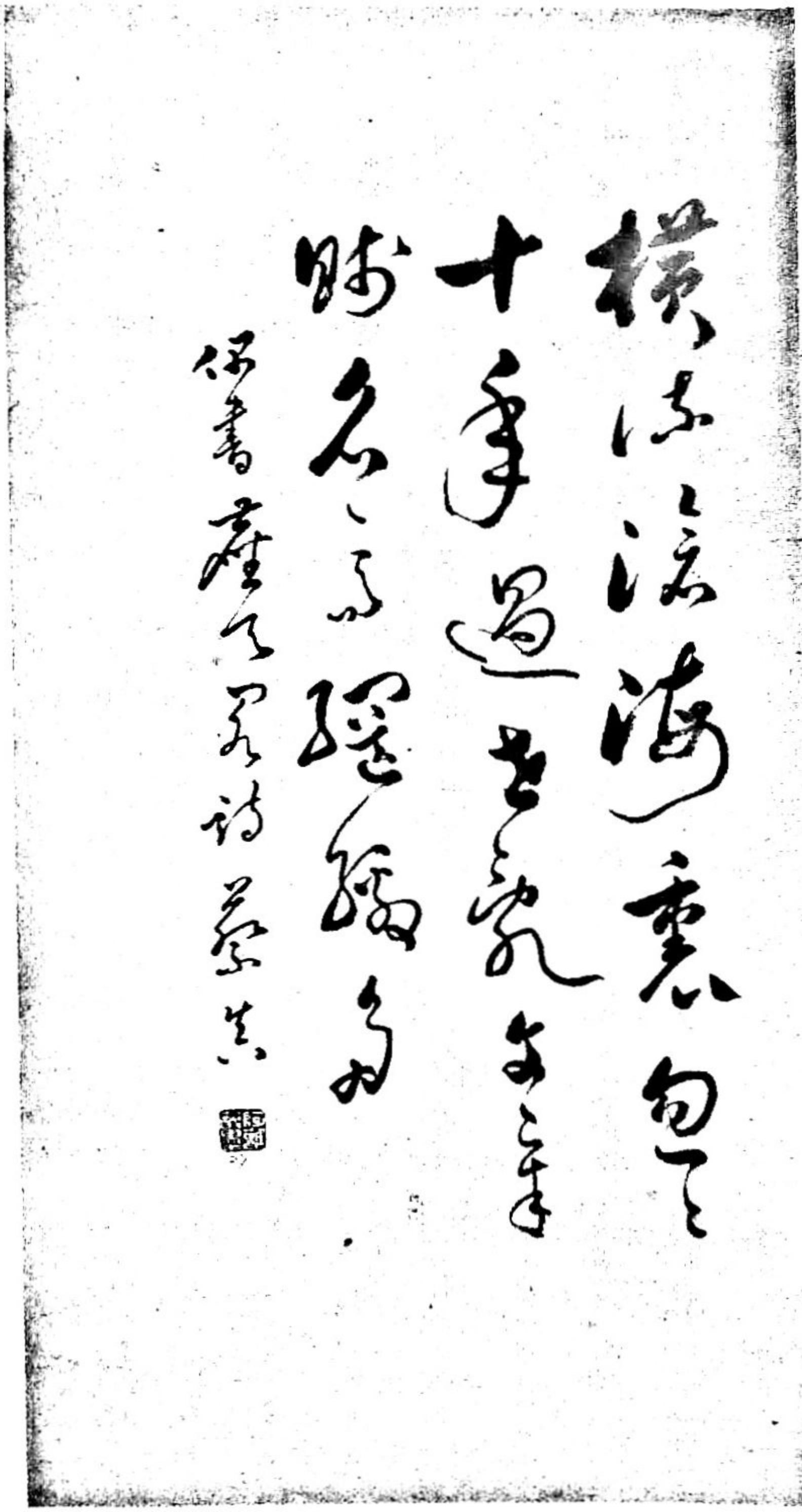
印谱一出，蔡冠雄踌躇满志，好评如潮，众多的文人墨客都争着一睹为快，有了名望，也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这时天天高朋满座，四方客人闻风而来拜访。可是繁盛的表象之下，阵阵的喝彩声中，蔡氏的内囊也全部拿出来了，这应了当地的一句俗话:“空芯罗卜皮好看”。1934年底，因为地方势力的倾轧，蔡冠雄卸去了镇长之职，二年后，抗战爆发，地方治安不宁，债台高筑的蔡冠雄不时为各种债主催逼。国事家事都无可为，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最后冠雄自杀身亡，年仅3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光。

蔡氏一族走出来的人才，近现代着实不少，蔡寅，柳亚子的姨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详见本书《壮怀激烈的蔡寅》一节。还有分布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学者、教授、工程师、书画家，这里不再赘述。

上面介绍了乾嘉时期定名的八大姓。历史地来看，八大姓中有些姓，像陆姓，随着历史潮流的激荡，实在是落伍了，淘汰了。清末至民国，黎里有些不见经传的家族迅速崛起，比如金、鲍、倪等，有待于以后撰写续篇。

蔡真“名高纲缴多”立轴



二、特奏名状元魏汝贤

吴江历史上没有真正的状元，只在南宋时出了一个“特奏名”状元魏汝贤，对此，吴江各方面都非常重视，清代的《黎里志》、《黎里续志》、《同里志》和《吴江县志》都作了记载，1998年吴江市档案局出版的《吴江札记》明确说魏汝贤是榜眼，“宋淳佑四年甲辰科（1244年）魏汝贤是特奏状元，实是第二名，即榜眼。”吴江市宣传部的徐宏慧同志撰写了《吴江状元魏汝贤》，作过多方调查，撰写得更为周详。

不过，对魏汝贤，仍有许多疑问，比如：什么叫“特奏名”？魏汝贤的次榜是不是榜眼？魏到底是哪里人？魏的举人和明清两代的举人是否同等资格？魏汝贤参加会试需要多大数目的车旅费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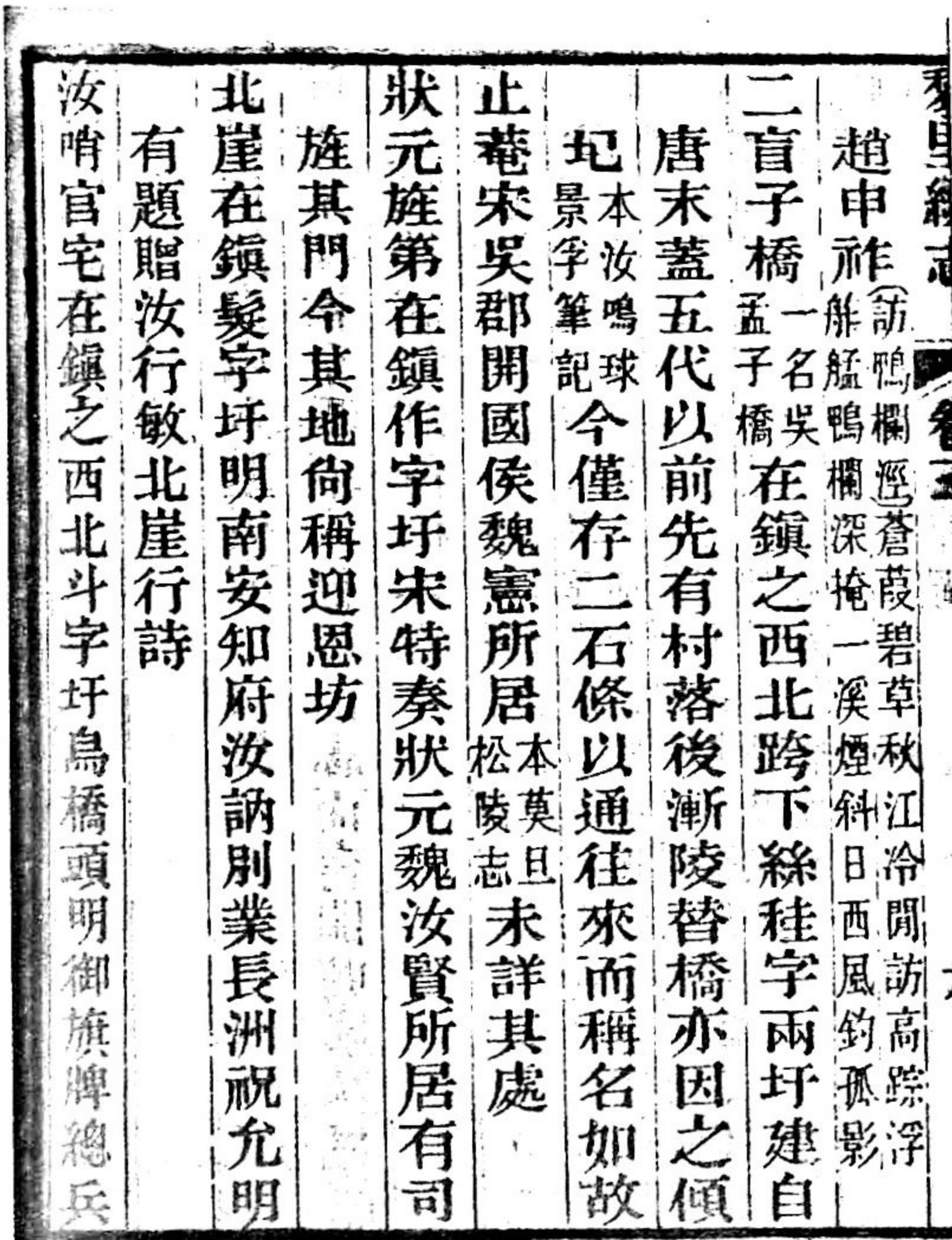
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科举考试的沿革，尤其是宋代的科举制度。

隋朝草创科举，唐代正式推行，证实是选择人才的一项重要手段。唐代的科举考试，通常分州、县地方预试，尚书省礼部负责省试，最后必须经过吏部的铨试，其中有“身、言、书、判”四条标准，再参以德行、才能和资历等因素，凡是通过这三关考试的士子，才是真正的进士，开始授官，人称“三考里出身”。

宋承唐制，略有变化，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宋初，科举年年举行，每年的10月份先在州内预试。当时全国分为15路，路下设州。州试，相当于明清二代的“乡试”，州试由通判，州的副行政长官主持。州试取中的考生，集中起来，随地方向京师进贡的粮税物品等特产一起解赴朝廷，参加礼部的省试（宋代的“省试”，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会试”）。所解物品与士子限定时日必须到达京师，那时的交通工具再加那时的路况，路途上的艰难可想而知。因此出现了一句俗语：“天要落雨粮要解”，至今依然活在人们口头，只不过一般人不明出典，错讹成“天要落雨娘要嫁”。

州试俗称“发解试”，录取的考生称“举人”，也叫“举子”、“贡

《黎里续志》记载魏汝贤



黎里續志 卷五

趙申祚（訪鴨欄涇）蒼葭碧草秋江冷閒訪高踪浮舴艋鴨欄深掩一溪煙斜日西風釣孤影

二盲子橋一名吳孟子橋在鎮之西北跨下絲秷字兩圩建自唐末蓋五代以前先有村落後漸陵替橋亦因之傾圮本汝鳴球景孚筆記今僅存二石條以通往來而稱名如故

止菴宋吳郡開國侯魏憲所居本莫旦松陵志未詳其處

狀元旌第在鎮作字圩宋特奏狀元魏汝賢所居有司旌其門今其地尚稱迎恩坊

北崖在鎮髮字圩明南安知府汝訥別業長洲祝允明有題贈汝行敏北崖行詩

汝哨官宅在鎮之西北斗字圩烏橋頭明御旗牌總兵

生”，说白了就是贡献给皇帝的人才，因为“元”有第一的意思，所以发解试的第一名就称“解元”。礼部的省试次年春季举行，主考由皇帝钦点，省试的试卷经过糊名、誊录、弥封再加盖印章后，送考官评阅。为了杜绝营私舞弊，宋太祖赵匡胤取消了始于唐代的吏部的铨试，改为殿试，亲任主考。

宋代的举人与明清两代有别，明清的士人通过县、州、府的考试，就算进了学成为生员，俗称秀才，通过了乡试就是举人。这秀才与举人的资格终身有效，而且明确规定秀才和举人都拥有一定的特权。宋代参加发解试，成为举人，只适用于当届的考试，如果礼部的省试没有通过，或者通过省试而最后一关殿试被黜落，那么以后仍然得从发解试考起。

在宋代，不少人考，考，考，好不容易考到了皇帝面前参加殿试，到最后还是被刷下来了，依然是个白衣人。据宋人的《邵氏见闻录》与《燕翼贻谋录》等书记载，“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这就酿成了严重的问题，既然皇帝用殿试取黜读书人，那么落第者的怨愤必定直接指向皇帝。当时有个张元，多次殿试多次遭黜，他一怒之下投奔了西夏，为西夏出谋划策，引领夏军连年侵宋，致使宋军迭遭惨败，闹得在朝在野都惶惶不安。科举考试原本是为让“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太宗语），实在不该把多次要求入彀的士人拒之门外。于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正式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此后廷试成绩基本上只作排名的依据。当然根据实际情况，比如人数实在太多，以后在廷试中仍旧存在少量的黜落。

廷试者的问题解决了，但是那过了发解试而没能过礼部省试的举人仍旧成为问题，从人数来看，远比会试落第者多，这就成了严重问题，这些人回去都是白衣之身！据史料记载，当时滞留在开封的落第举子少则六七千，多则万余人。遇到国家有事，比如边境不

宁、遭遇战争、灾荒等意外，朝廷不能正常举行科举考试，这成千上万的士子因耽搁而找不到出路，往往酿成考生事件。可怕的是不仅出了一个张元，后来还出现了李元、王元乃至赵元一类的人物。于是，朝廷的对策是，一则是扩大礼部省试录取的名额，据史料记载，每次礼部省试录取多达五六百人，通常不少于四百；再则就是“特奏名”，开宝年间，太宗向礼部下诏，规定考进士15次且终场者，赐予进士出身，谓之恩科。到宋真宗（908-1022年），凡通过5次发解试而黜于礼部省试的举人，另立名册上报皇帝，由皇帝决定给予进士出身。因为上报皇帝，所以就有了“特奏名”的名称。皇帝准许将这些考生另立名册同已经取中的考生一起参加殿试，称为“附试”。好多时候，特奏名参加殿试的人数比正式考生还多，咸平三年殿试者1700余名，其中正考生840名（那一年殿试仍有少量黜落），附试生竟多至900余名。附试者的录取另立一榜，这就是“次榜”的来历，为示恩宠，第一名也称状元。

魏汝贤的特奏名状元就是这样考得的，他是次榜的第一名，名次应当处于正榜的四百名之后。《吴江札记》等认为魏汝贤考得的是榜眼，进士的第二名，显然不准确。

接着谈谈魏汝贤的籍贯。清《吴江县志》卷24科第：魏汝贤，志四世孙，状元，莫志（按：莫旦编撰的另一部《吴江县志》）云宋有正奏有特奏，是科正奏状元留炳炎，特奏状元则次榜也。据黎里老一辈口耳相传，说魏是黎里人，一度移居同里，后来身体有病，仍归黎里终老。县志上没有写明魏汝贤是何地人氏，口耳相传又不足为凭，查一下镇志吧。

撰于嘉庆16年（1811年）的《同里志卷之五·建志下》古迹：“状元街，在冷家浜南，南至富观桥，为宋魏汝贤里居，有状元坊，今祀，人称状元街。”《同里志卷之九·科第》：“理宗淳祐四年甲辰（1244年）科特奏名魏汝贤。”

撰于嘉庆乙丑年（1805年）的《黎里志卷三·表坊》:“状元坊，在学宫左，明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孔克中为宋淳祐四年甲辰榜特奏状元魏汝贤立。”《黎里续志·卷三古迹》:“状元旌第，在镇作字圩，宋特奏状元魏汝贤所居。有司旌其门，今其地尚称迎恩坊。”《黎里志》的编撰者徐达源有云:“凡在黎里与黎里人而别建于他处者亦并登载”，状元坊建于县学宫左旁，为黎里人别建于他处，徐氏将它载入志书。而《黎里续志》登录的迎恩坊，则明明白白写清是在黎里作字圩。

同里与黎里两镇志都明确记载着魏汝贤的居住地，看来魏汝贤两个地方都曾居住过。再查《黎里志·卷七人物一》，详细记载着黎里魏氏一族四代的脉络，为慎重起见，特引录其中一节如下:

魏宪字令则，绍圣丁丑进士，与弟志俱有声太学，号熙丰人才，宪累迁国子司业。亲丧三年，不御酒肉，庐于墓侧。再为司业，以学行见推，遍历中外，师儒之选，寻兼太子舍人，迁中书舍人给事中，入侍经幄，论思献纳为多，又代言西掖，得温厚雅正之体。宣和二年，以直龙图阁知常州三年，除太常少卿，历显谟阁学士，知明州。建炎二年，为吏部侍郎，时车驾南迁，案牍散佚，吏缘为奸，有伪名寄贯之弊，宪请严保任开告赏急期会，以杜其弊。又言古未有背天险以为都者，今京师北有长江，敌骑由京西不四五日可至淮泗，宜有以待之。久之，以直学士左太中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进吴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致仕归，所居曰止庵。学者称为止庵先生，年73无疾卒，今列乡贤祠。弟志，字几道，元祐辛未进士，贲政和丁酉进士，志四世孙汝贤，淳祐甲辰特奏名状元。

再对照镇志等其他资料，简言之。魏汝贤曾祖魏宪、魏志，分别于绍圣丁丑（1097年）与元祐辛未（1091年）得中进士，祖父魏贲政和丁酉科（1117年）进士登第。魏汝贤的父亲身处赵宋南渡

乱世，科举不第，直到魏汝贤蒙恩于公元1244年赐得特奏名状元。由此可知，魏汝贤世居黎里，同里只是他寓居之地。

最后，再说一下魏汝贤的举人资格以及赴考盘缠等问题。

按照宋代规定，魏汝贤至少5次通过了举人考试，举人赴京城参加礼部的省试，随贡品一起发解，沿途由驿站供给食宿。这一规定沿袭到明清两代。大家都会记得，1895年，康有为联合了全国各省在京举人1300余名，共同签名上书，反对李鸿章去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世称“公车上书”。公车，举人参加会试（明清两朝礼部省试改称会试）不需自掏腰包，乘坐的是公车。至于少数有钱的士子，他们自己愿出车马费，又当别论。比如徐霞客的祖父徐经，他是江阴首富，赴京应试自备画舫，带上一大帮男佣女仆，请了吴中名士唐伯虎作陪，气派地驶往北京。魏汝贤的祖上赴全国性的科举考试，京城在开封，即使公车，自己毕竟也需要一笔花销，而魏汝贤赴试，赵宋已经南渡，京城在临安（杭州），黎里也好，同里也好，陆路也好，乘船也好，不超过100公里，即使需要一点费用，应当不会是太大的数字。

前不久，据撰写“同里历代名人”的徐宏慧同志说起，昆山陈墓镇（现在改名为“锦溪”）有个名叫陆正乾的，因重修家谱，来到吴江同里，向有关人士介绍，说是他的先祖陆澔资助了魏汝贤赴京城会试的盘缠等费用，才使魏汝贤得了状元。理宗皇帝给魏汝贤下了一道圣旨，还御笔赐予“状元厅”三字，令魏汝贤建造一座状元厅。据陆正乾说，当时魏汝贤已经患上了肺病，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魏就让陆澔把御笔“状元厅”制成匾额，在陈墓的周家浜造起了状元厅，府邸再加园林，占地45亩。徐宏慧同志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吴江状元魏汝贤》一文，不过，编写家谱的陆正乾却没能说出资助魏状元的那位先祖的名和号，于是徐的《吴江状元魏汝贤》附注了一语“文中陆澔为化名”。

综上所述，特奏名是赵宋王朝笼络读书人的一种手段，魏汝贤的状元只是朝廷示以恩宠的产物，与真正平升三级而得的状元大有差距；魏汝贤的举人，也大大不同于明清两朝的举人出身。编写家谱应当实事求是，不能随便攀附名人或大家，包括拔高历史上的某些人物，再作攀附；撰写地方史稿，是严肃的事业，应当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史料。当然，如果撰写小说或者民间传说，自可驰骋想像，进行艺术加工，那又当别论。

三、爱国将领张曜

张曜（1832-1891），字朗斋，号亮臣，谥号勤果，原籍浙江钱塘，寄籍顺天大兴，少年时代寓居吴江县黎里镇，自立后在黎里建造了退一步处。张曜出身于官宦之家，青年时期，出于历史的局限，投身团练，参加镇压捻军，接着，跟随左宗棠进军新疆抗击沙俄，收复了伊犁，粉碎了回疆地区割据独立的阴谋，终成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曜一生经历大小战斗数以百计，青少年时期他不好读书，中年开始发愤向学，最终诗词、书法、



张曜

丹青、音乐样样精通，有《河声岳色楼集》传世。更可贵的是，他致力于治水，晚年为治理黄河水患常年奔走，鞠躬尽瘁，为黎民造福。

鄙文尚武，一事无成

张曜乳名阿牛，自小长得楞头楞脑，腰圆膀阔，常常与伙伴们扳跟头，别说一对一，就二对一，三对一，阿牛都是赢家。父母让阿牛读书，什么三字经、千字文，他一看就头痛，不肯朗读更不肯抄写。眼看长到10岁了，肚里还是一点墨水都没有。父母觉得自己没法管教了，想到阿牛的姑夫蒯贺荪。蒯家居于吴江县黎里镇，那是一个有名的文化古镇，读书风气最醇，东西两条长街书声琅琅，彻夜不绝，自宋以来，涌现出了无数文人墨客，进士、举人，名医、画家多不胜数，这不俏儿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或许孺子可教。于是就将阿牛送到了黎里，让姑夫蒯贺荪调教。

到得黎里，进了私塾，可是阿牛仍旧是蛮牛一头，书读不进，字写不好，最最喜欢的就是跌跤打滚，杜撰戏文，摹仿军事训练。常常纠集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分成两队，俨然两军对垒，在阿牛指挥下开战。先用向日葵杆，转而使用竹竿、木棒，再后来用杂木制作长矛、大刀、狼牙棒以及盾牌等等，作战的地盘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扩大，从后场空地到荒坟乱岗，从陆地到河湖港汊，从专斗体力到斗智斗勇。16岁那年，阿牛已经长成一条威猛的大汉，魁梧的身坯结结实实，浑身的肌肉疙瘩黑黑楞楞。四乡远近的壮汉闻名前来比试，石锁、石担，扳手腕、摔跟斗，根本不是对手。除此之外，阿牛别无所好。好不容易托人介绍，到黎里镇东头桥后底的裕康米行为人舂米糊口，干活倒是一把好手，人家两人扛一个米包子，顶多百五十斤，阿牛一人掮二个包子，照样行走如飞，好几次掮着米包

子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惊吓得行人纷纷避让。可惜又染上了赌瘾，手里一有钱，就往赌场跑，后来干脆泡在赌场内。一天，阿牛弄到了几个小钱，可一到赌场三下五除二的，钱就没了，阿牛不买帐，非翻本不可。这时，阿牛的一个姓陈的亲戚跑上前，抡起巴掌，抽了阿牛一个亮生生的耳刮子，“什么混帐东西，输了就服输，没钱硬撑，借钱又赖账，还充什么汉子！”接着是一番高论：“常言说得好，愿赌服输，赌钱不隔夜，隔了夜你就赖……”一时之间，赌场里所有的人都盯着阿牛看热闹瞎起哄，讥笑的、嗤鼻的、叹气的、摇头的、说风凉话的应有尽有。一向不晓得难为情的阿牛这一次竟然羞红了脸，低着头默默地退了出去。古语云“知耻近乎勇”，阿牛思前想后，大为悔恨，决心远走高飞。再说，姑夫蒯贺荪这时正在河南固始县任县令，那就到固始去干出点名堂出来，否则没脸见人了。

投身团练，青云直上

咸丰3年冬天（1853年），张曜来到了固始县，求姑夫弄个差使干干。当时，蒯贺荪正为捻军弄得焦头烂额，捻军多的是马队，来去迅捷，而固始县城内的团练毫无战斗力，多次受到上峰的警告。现在一看张曜，一头蛮牛，有的是力气，干别的不行，打仗或许倒是块料。于是命张曜充任团董，训练三百名团练。张曜一听十分得劲，拉开他的大嗓门，一声声地高吼，队列、操练，防守、进攻，运用各种兵器，利用种种地理，倒着实一套一套的。张曜暗自喃喃：“非混出个人样儿来不可！”一天凌晨，张曜照例又内急了，拿起他的那根旱烟杆就出来蹲坑，完事后又习惯性地到城头上巡视一番，几个兵丁睡眼朦胧的，连团董的到来都浑然没有察觉。张曜正要说话，突然发觉城外黑压压的一片，正朝这里涌来，黑暗中看不真切，但俗话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来的不是捻子就是杆子（土匪）。近

了，近了，有步兵更有马队，竟然还有几架攻城的云梯。张曜立马点上旱烟杆，凑近城头上的十来门土炮，逐个点燃，轰！轰！轰……一声又一声巨响，惊得城外偷袭者仓皇逃命，丢下了云梯也丢下了十多具尸体。城内团练尽数涌上城头，县令蒯贺荪大喜过望，张曜这小子有种，看来选他当团董选对了头。三个月后的一天，蒯县令获得军情，当晚捻军将来攻城。张曜带领团丁伏于固始城外，等待捻军到来，准备打他个出其不意。时至半夜，一股捻军被僧格林沁尾追，奔逃到了固始县城近边，张曜大喝一声，命团丁出击，两相挟击捻军大败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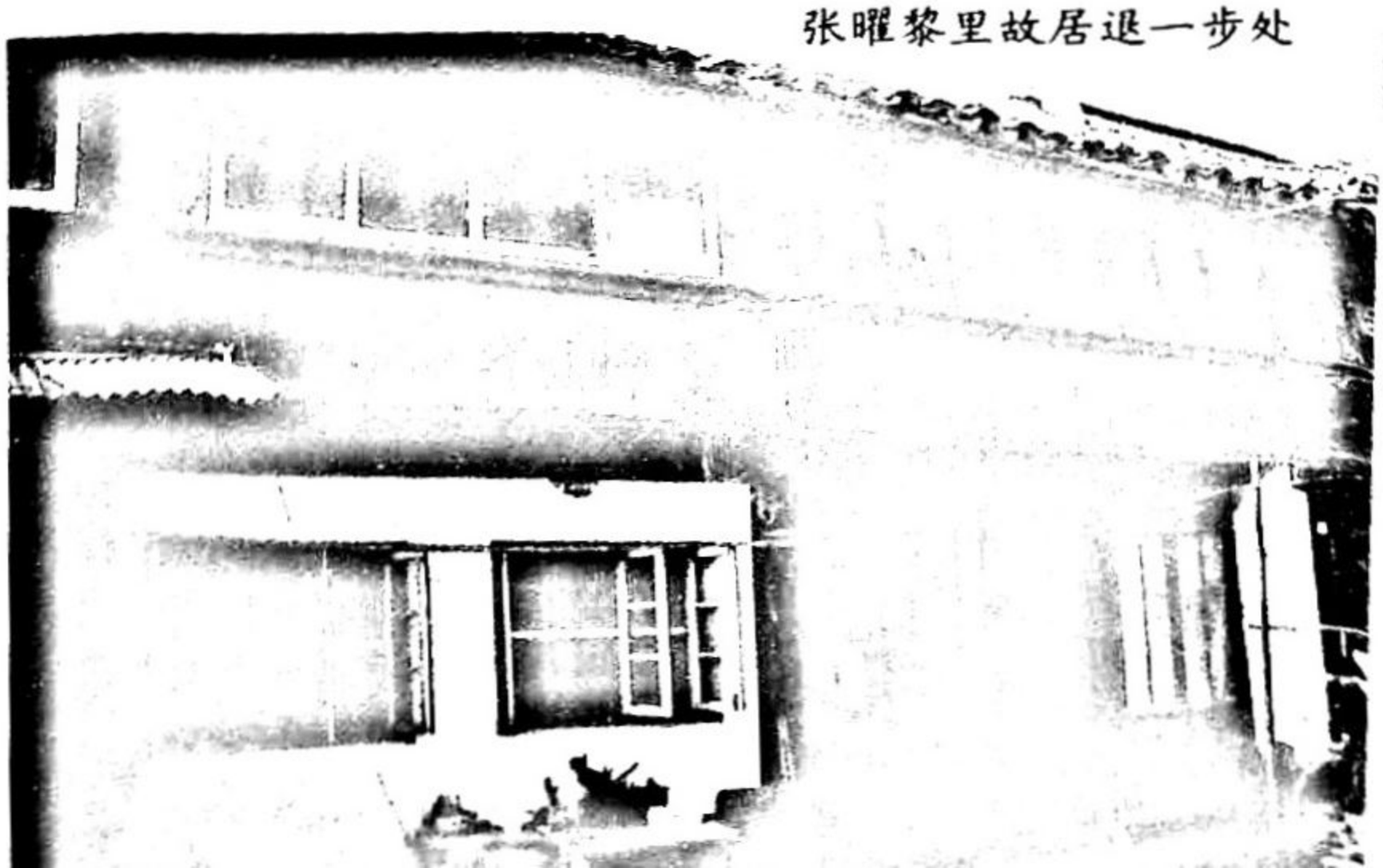
僧格林沁在固始逗留了一个时辰，询知团练在张曜的带领下，战斗力大增，非常赞赏，召见了蒯贺荪，赞扬了一番。临行，命固始县再招募2000人马，归张曜统带，又命随军文案师爷在一张空白告身上填上了张曜的姓名，写明“赏给五品顶戴，以知县候补”，交给张曜收存，这是日后做官的凭证。原来当时军情紧急，天天打仗，朝廷没有那么多的银钱赏赐将士;用官位作奖赏，又没有如许空缺，因此授权统兵大帅，随带空白告身，一场大战下来，凡立功的都填给告身，赏给虚衔，以资奖励。日子久了，告身泛滥，侥幸不死的老兵都成了记名总兵、记名提督，空头告身如同废币，永无得到实缺的可能，品级颇高的提督告身，到后来只能换取几筒鸦片过瘾。不过，张曜却是时来运转，一则有了僧格林沁的赏识，二则河南一带兵力极其薄弱，张曜带兵打仗又有他的一套，因此脱颖而出，后来青云直上。

接连两次建功，蒯贺荪决定亲上加亲，把女儿凤仙许配给张曜。次年，22岁的张曜回黎里与凤仙完婚。这位凤仙，不仅人生得标致，而且聪明能干满腹经纶，日后对张曜的为人、个性和前程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婚后，张曜带着夫人回到固始，继续统带团练。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多次越境作战，一战而复光山，再战克复息县。

僧宫保深赏其才，先下令权息县事，不多时就调张曜为固始知县。

咸丰7年（1857），10余万捻军围攻固始，张曜率团众苦守76日，力保危城不破，僧宫保上奏朝廷，赏霍钦巴图鲁名号，迁光州直隶知州，又擢升知府、道员。咸丰10年，张曜父母先后下世，可是军情紧急，上司奏明朝廷，命夺情留任军中，以素服继续带兵。此后张曜在河南大败陈大喜、张凤林所部捻军，咸丰下诏晋升为河南布政使。布政使，俗称藩台，乃二品大员。清代官制，重文轻武，武将只能做武职官，可当总兵、提督，但不能任文职高官。张曜充当知府、道员，那是战时的权宜之计，藩台是抚台之下管理全省民政与财政的最高官员，岂是一介武夫可以胜任的？当时，官场倾轧异常严重，就有一名姓王的御史因向张曜告贷不成，到京城弹劾，朝廷没有反应，王御史又唆使同僚刘毓楠弹劾，说张曜“目不识丁”，不能担当藩台重任，于是有旨改授总兵。书到用时方恨少，此时的张曜对自己早年不肯好好读书感到万分懊恼，决心发愤图强，即使不求满肚诗书，至少也须粗通文墨。同时，对手下的训练也更加严格了，到同治3年，部勒新旧，练就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号“嵩武军”。

同治5年（1866），张曜乞假归葬双亲，想想自己自幼不争气，让双亲担惊受怕，双亲病笃时自己没能尽一点孝心，亡故后又没能及时安葬，应当补孝三年。又想到宦海险恶，决意引退。在黎里镇新荆家弄东侧建造了一座船厅，自书一匾额“退一步处”。



张曜黎里故居退一步处

每天与众亲友喝酒吟诗，儒雅倜傥，与离开黎里时的阿牛，泾清渭浊，判若两人。

抗击沙俄，平定回疆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内忧外患，新疆的库车、伊利等地相继爆发了反清叛乱事件，天山南北先后建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中亚的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乘虚侵占了我国南疆的全部和北疆的部分地区，于同治6年建立了“哲德莎尔”王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俄国早就窥视我国的西北地区，为了渗透侵略势力，公开支持阿古柏及其割据政权。同治10年3月，沙皇俄国以回民骚扰边境为由，悍然出兵强占了我伊利地区。是战还是不战，到底如何粉碎阿古柏政权，抵抗沙俄的入侵势力，清政府意见分歧，左宗棠认为若不举兵讨伐，“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极力主张收复新疆，清廷终于采纳了左的意见。

同时，捻军又起，河南巡抚李鹤年奏请朝廷，于是朝旨下达授张曜广东陆路提督，后左宗棠又奏请张曜为帮办新疆军务。子欲养而亲不待，树欲静而风不止。朝旨下达，敦促就道，张曜在黎里安居仅一年稍余，重新召集嵩武军旧部，进捣回疆，驻军哈密。

同治8年（1869），左宗棠赴泾州，命张曜从古城西进为后路，军次兰扇，迅速破敌于察漠绰尔，又败之红柳树。张曜一腔热血，身先士卒，策应前敌，及时善后，成为左宗棠的一位得力大将，在收复新疆，巩固并建设西北边陲的阶段，立下了功勋。左宗棠称张曜“器识宏远”“文武兼资”，委任他统带豫军，称嵩武军为“速进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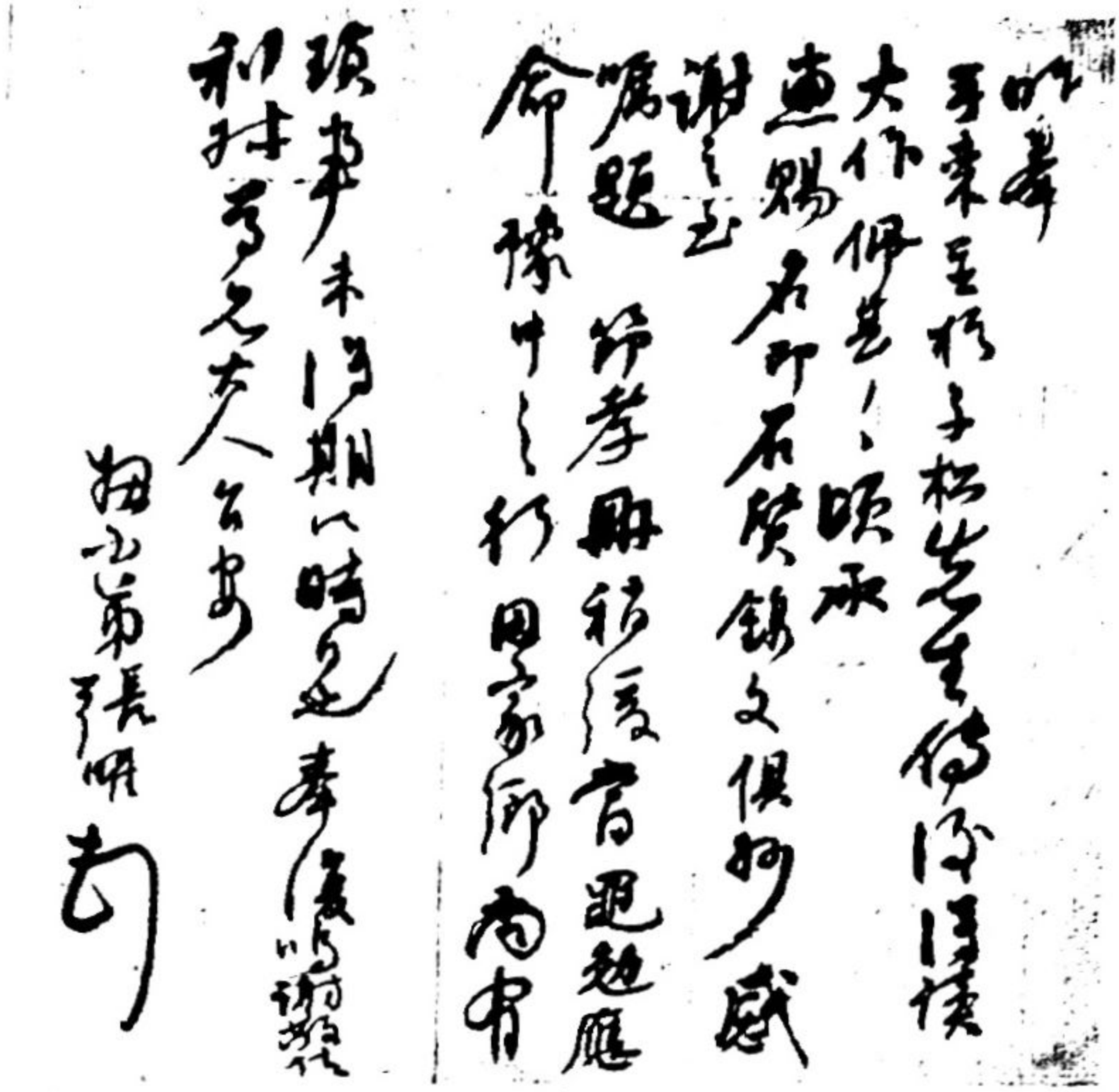
同治10年（1971），白彦虎由英国与沙俄撑腰占据肃州，左宗棠命徐占彪部出击，可是久攻不下，左帅下令张曜部勒嵩武军增援，一举击败白彦虎，白出奔嘉裕关，据有乌鲁木齐，哈密城周边叛军

归受白彦虎。张曜带兵出关，一反往常速战速决的习惯，决定步步为营，徐图进取。当时关外缺乏水草，方圆2000里荒无人烟，粮草装备运输困难重重。于是张曜议立屯田，兴修水利，垦荒二万余亩，每年收获粮食三四万石，军队解除了后顾之忧。有了粮草，左宗棠于光绪2年（1876）抵达肃州，建立了大本营，确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接下来，清军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光绪2年3月，攻克乌鲁木齐，9月攻克玛纳斯南城，次年3月攻下达坂，收复了吐鲁番，收降被迫归附的数万回民，尽数释放回家。阿古柏走投无路，服毒自杀；白彦虎一败再败，先逃库国，再逃阿克苏，最后逃出新疆流窜到喀什噶尔。

光绪4年，沙俄提出了通商、划分国界和索要赔款三项要挟，清廷大员崇厚屈辱地与沙俄签订了条约，朝野为之震惊。左宗棠誓死反对，他的慷慨陈词，大长了朝廷的志气，光绪下令逮捕崇厚，命曾纪泽出使俄国，更改前约。左氏亲自出兵哈密，策划收复伊犁。他命令张曜的嵩武军作为中路，沿特克斯河主攻；金顺和刘锦棠分东西两路协同作战。光绪7年（1881），随着战场上的步步成功，俄国军队慑于清军的威武，沙皇也担心事态发展会引发严重后果，不得不作出让步，正式签署了《中俄归还伊犁条约》，中国收复了伊犁绝大部分的领土。

发愤读书，文理斐然

凤仙夫人知书达礼，自小受到黎里古镇文风的熏陶，熟读四书五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张曜在知县、知府和布政使任上，上级的来文，下级的呈报，张曜难于处理。全仗夫人捉刀，批阅各种禀帖来文，起草奏章。夫人时而手把手地教学，时而面提耳命叮嘱，真正一位贤内助，一位亦师亦友的贤妻，官场上的繁文缛节，礼尚往



张曜手札

来，在夫人的教导下，张曜逐渐走上了正轨，最后终于应付自如了。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文官一支笔，武官投脱力”的俗语，明显瞧不起武官。刘毓楠简单的“目不识丁”一语，就使张曜从河南布政使的高位跌落到南阳总兵位置。从此他决心发愤图强，真恨不得把儒家经书全部吞到肚子里去，每天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捧着颜鲁公的墨宝爱不释手，朗读唐诗宋词，学写诗词，还向夫人学习丹青之技。

张曜将“目不识丁”一语，专门请人镌刻成小印，随身携带，随时钤用，时时激励自己。有一事值得一说，那弹劾张曜的刘毓楠，后来外放知府混得不好被罢了官，生活拮据，也亏他有脸，竟然投函张曜求助，宽厚的张曜不念旧恶，接信后就赠予银两，并附信致候，有趣的是信末除姓名印章之外，还加盖了那方“目不识丁”的闲章。有人说这是张曜的幽默，有人说是讽刺，其实，到得张曜的高度，讥讽实在已经不再需要，相辅固然相成，相反也能相成，张曜能够成为封疆大吏，刘毓楠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在夫人的指导下，张曜从武功走向文治，多年的积极向学，又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驻军宁夏的那几年，他筑了一座书楼，推窗而望，近聆黄河淙淙有声，远望贺兰山雄奇景色，因而自书“河声岳色”四字大匾，悬挂门首。在河声岳色楼上，他日夕吟咏，虽

不能说锦心绣口，至少可以说诗文俱佳，还练就了一手遒劲的书法，绘得一手好画，朋辈相聚，时不时手谈一盘，铿然啄剥，一样的所向披靡。平日宴客，亲自弹奏“都他耳”与宾客同乐。一位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骁将，此时恂恂如儒生，时人把他比作岳飞再世。

不幸的是凤仙夫人在张曜驻军新疆喀什噶尔时病故，从此再没有人能襄助他指点他了。虽然也讨了二房小妾，但她们都只能供人使唤。每每想到贤妻，不禁哀伤痛惜，内心是那样的寂寞。他的属下都劝他确立一名继室，或者来一房知书达礼的续弦，以主持中馈。然而在张曜看来，贤德的凤仙夫人，堪称巾帼英雄，那是中国少有的奇女子，可遇而不可求的，即使再娶一个通晓诗书的姑娘，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书呆子，在闺房中做个摆设罢了，不会有什么用处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夫人的地位，是任何女子都替代不了的。凤仙仙逝，那么夫人的位置只能空缺。

中年以后的张曜深知读书的重要，他看到了文化潜移默化的功效。在山东巡抚任上，曹州一带盗贼横行，他雷厉风行严刑峻法地一一加以处置。不过，他意识到，用刑法只不过是治表，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治本，而提高大众素质的重要手段当推兴学读书。因此他积极兴建书院，他曾斥资在青州建立岱山书院，在曲阜修建洙泗书院，培养了许多有用之才。对办学的人他十分敬重，山东堂邑出了个怪人武训，一个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苦人，吃尽了不识字的苦头，孤身一人20余年靠乞讨攒钱，截至1890年他将所攒的钱在柳林镇和杨二庄办了二所义学，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子弟上学。时人传说纷纭，有说武训疯疯癫癫，患上了“义学症”，有人称他为“武圣人”。张曜听到了武训的义行，当即召见，下令免去义学的徭役，免征义学学田的钱粮，为了帮助武训筹集办学基金，也为了表示对武训的钦敬，他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200两白银捐赠给义学，专门为武训制作了一本黄布面的缘簿，盖上巡抚大印，自

此武训外出劝募不再受到刁难和凌辱，也为义学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后来张曜又上奏朝廷，请封武训为“义学正”，赏穿黄褂，颁给“乐善好施”匾额，光绪帝一一允准。武训其人或许存在着不少争议，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但是张曜帮助武训，捐资助学，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实际效果应当说都是可以肯定的。

大学士左宗棠对张曜十分赏识，收复伊犁时，多次说张曜“文理斐然”，两人谈论屯垦事宜及南疆地势敌情，张曜把握实在，对策正确，在朝廷的奏折中左宗棠说“张曜之器识宏远，文武兼资，实难数遘（遇见）。” 左、张两人名义上是上下级，私交却如莫逆。左宗棠曾亲手书赠张曜一副对联：

负郭无田，几亩荒园都种竹；传家有宝，数间茅屋半藏书。

说到左宗棠的对联，黎里古镇至今还保留着左氏撰写的另一副对联，录如下：

文高九能道重三物，风宣八节气备四时。

落款：左宗棠，钤有二枚印章，阳文：大学士章；阴文：青宫太保 恪靖伯。

左宗棠撰写这副对联，源于张曜推崇的家乡前贤凌信。

凌信（约公元1410-1480年），黎里镇人，字尚义，明宣德以后任太常寺少卿，兼任尚宝卿，掌管皇帝玉玺。当时，东南边陲的安南国王非常自负，经常制造事端，骚扰边境。凌信出使安南，转达了大明皇帝的圣意，分析形势，晓以利害，又赏赐大批彩帛，凭着三寸之舌，终于使安南王诚心归附。由于凌的业绩，加上他的书法、文章等才能，终成一朝名臣。凌信的事迹采收进了《明史·安南列传》，在家乡黎里传为美谈。

平定新疆的左宗棠，与凌信有以类似，外交与军事兼使，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终于为谈判桌上增加了一个个法码。张曜多次提到黎里前贤凌信，左氏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擅长书法

的左宗棠，兴致所至，提笔写下了上述对联。

左宗棠的对联没有签署年月，凭印章:“大学士章”、“青宫太保 骜靖伯”，可以初步判定。同治13年（1873年），左宗棠晋升东阁大学士。光绪3年（1877年）平定南疆，左氏晋升二等骜靖侯。凭印章，对联当作于1873年之后，还有自称“骜靖伯”而不是“骜靖侯”，那么必定在1877年之前。再说，1875年之后，张曜才率领“嵩武军”来到左宗棠麾下，逐渐与左氏相知，看来左宗棠的对联就撰写在1875年至1877年之间。

凌信身故后，族人为他在黎里镇西的上丝圩建造了凌太常祠，张曜又将联语制成楹联悬挂祠中。

《黎里续志》记载:“（张）曜工诗、善画、兼通六法，……著有《河声岳色楼集》。”

张曜的书法和绘画时至今日留存已经不多，前不久，张氏后裔从台湾一位收藏家手中得到了一件张曜的亲笔书信，信手挥洒，确实不同凡响。张曜身后有《河声岳色集》一册存世，可惜一时难以找得。《黎里续志》中引录了张曜的一首七律，那是他寓居黎里而清廷要他重披战袍时所作，录如下：

中原莽莽尚烽烟，乞解征袍仅一年。桑柘未营湖畔宅，琴尊权托米家船。

深悲风木阡才表，促上星轺诏又宣。揽辔澄清诚不易，愿抒丹悃答尧天。

作此诗时，张曜35岁，发愤读书还不到三年时间，谈不上如何高妙，不过言之有物，所感真切，颇有味道。想必后来的诗作当更有水准。

在山东巡抚任上，张曜主编了《山东通志》和《山东军兴纪略》两本重要典籍。光绪16年，张曜决定编纂一部山东通志，因为自雍乾以来，已经150余年，历史变迁，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出现了

众多的文献；山东实为畿辅之地，京师的屏障，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了解山东对大清政府制定大政方针富有借鉴意义。山东历来是礼仪之邦，百多年来发现许多进闻趣事，名臣循吏。于是张曜组织一批饱学之士，酌定体例，撰写了疆域志、职官志、田赋志、学校志、河防志、艺文志、人物志等二百卷重要文献。《山东军兴纪略》记录了1850-1880年之间发生在山东的匪乱、起义等军事活动，是研究近代山东军事的一部专业书籍。

知人善任，周济亲友

《黎里续志》说张曜“好宏奖人物”，颇有依据。

据吴江的《枫江渔唱删存》记载，黎里有个徐世勋（1842-1912），光绪元年（1875）得中举人，可是四上京师会试不第。当时，张朗斋在山东巡抚任上，徐风尘仆仆远道前去拜谒。秋天到得济南，数次赴巡抚衙门，自我介绍说来自黎里故乡，是张巡抚故交。可是，一则因为张曜治河终年待在河上，二则门子没有见面俗礼，就是巡抚在衙也不予通报。如此数月，已是冬天，盘缠耗尽，旅店索要住费，徐没有办法，只好到巡抚衙门立等，从早至晚，一连三天，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拦住了老友的轿子，张曜一看，马上邀请入内，燃起暖锅，摆酒设宴热情招待。徐将自己如何到得济南，如何求见不得等情事一一道来，张曜听了，立即将门子叫来，呵斥有声，继而命门子站立院中，任让大雪直灌脖子。半个时辰过去，徐向张求情，张曜才饶了门子。张曜留徐世勋参与幕府，使用半年之后，张再向吏部作荐，按照规定列入吏部大挑，选为乙等，于庚寅年（1890）安排了丹阳教谕。

张曜宏奖人物，决不盲目，徐世勋是他的老友，张仍旧对他进行了半年的考察，最后才向有司作荐。看看张曜对下面两个人物的

处理，更能体现张曜推举人物、选拔人才的内心。这两个人物不是别人，一个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还有一个就是袁世凯，他俩都曾是山东巡抚的下属。

刘鹗，字铁云，出身官僚家庭，素不喜科场文字，承袭家学，致力于数学、医学和水利诸学，纵览百家，喜欢收藏书画碑帖、金石甲骨，他的《铁云藏龟》是第一本向世人介绍甲骨文的专著。刘鹗后来所作的《老残游记》，其中的庄宫保就是以张曜为原型塑造的，庄宫保时时处处留心治河人才，一次听刘铁云谈治河，颇有见地，庄宫保非常赏识，就邀请铁云搬到巡抚衙门里来居住，“以便随时请教”，却被铁云婉言谢绝。入夜，庄宫保想来想去放不下，马上派一名三品参将把一桌上好酒席送到铁云下榻的高升店，一定要礼聘铁云作幕宾，协助治理黄河。据考证，《老残游记》的描写都有所本，那么这第4回“宫保求贤爱才若渴”写的应当就是张曜礼聘刘鹗。刘鹗入幕以协助治理黄河，果然成效显著，后来张曜保荐他到总理各国衙门，不久，又出任知府。

袁世凯聪明机灵，但他不重视实际学问，野心勃勃一心钻营当大官。在张曜手下，他觉得自己不受重用，铁云倒与巡抚关系密切。于是袁请铁云喝酒，席间道出心中秘密，要求铁云在张巡抚面前多多美言，有个进身之阶，说自己日后决不会忘记铁云兄的恩德。一天，刘鹗与张曜一起巡视堤防，就向巡抚进言。张曜听后反问刘鹗“袁世凯其人到底如何？”问得刘氏一时语塞。接着张曜说了一番话，大意是：人，倒还算能干，有点才气，但是内心让人琢磨不准，要说目下提拔，似乎早了点，过早重用等于害了他。

袁世凯没有得到提拔，暗自怀恨刘鹗。后来，袁世凯入军机处，掌握大权，于光绪34年（1908），罗织罪名，将刘鹗逮捕下狱。因为刘鹗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曾向联军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以赈京城饥困，所以就以“私售仓粟”之罪将刘充军新疆，次年死

于乌鲁木齐，年仅52岁。

张曜宏奖人物颇有眼光，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他真诚地想为国为民选拔真正有用的人才。

《黎里续志》说："（张曜）尤能厚贫交，煦寒有所求，率竭力以应之，戚族之赖以举火者百余家"，可以说毫不夸张。

张曜在日，不事聚财，所得俸禄多半接济亲戚及朋友，至今张氏后裔仍牢记张曜的告诫："凡节前岁末，穷亲友上门，断不可令其空手而返，也不应面有德色，对家养僮婢要及龄择配，如家人求赎身，不可苛计身价，还要酌情给银助娶添妆。"张家的僮仆如果失手打碎盆瓢碗碟，主人总是马上应声说一句"岁岁平安"，使失手人感到宽慰，此风延续至今不衰。

竭尽全力，兴修水利

张曜善于带兵打仗，中年后又善于书法、丹青和诗词，更可贵的是他还善于治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兴修水利，特别是治理黄河，历来是官吏们的重要课题。张曜在这一课题上，奉献了他的智慧和晚年的全部精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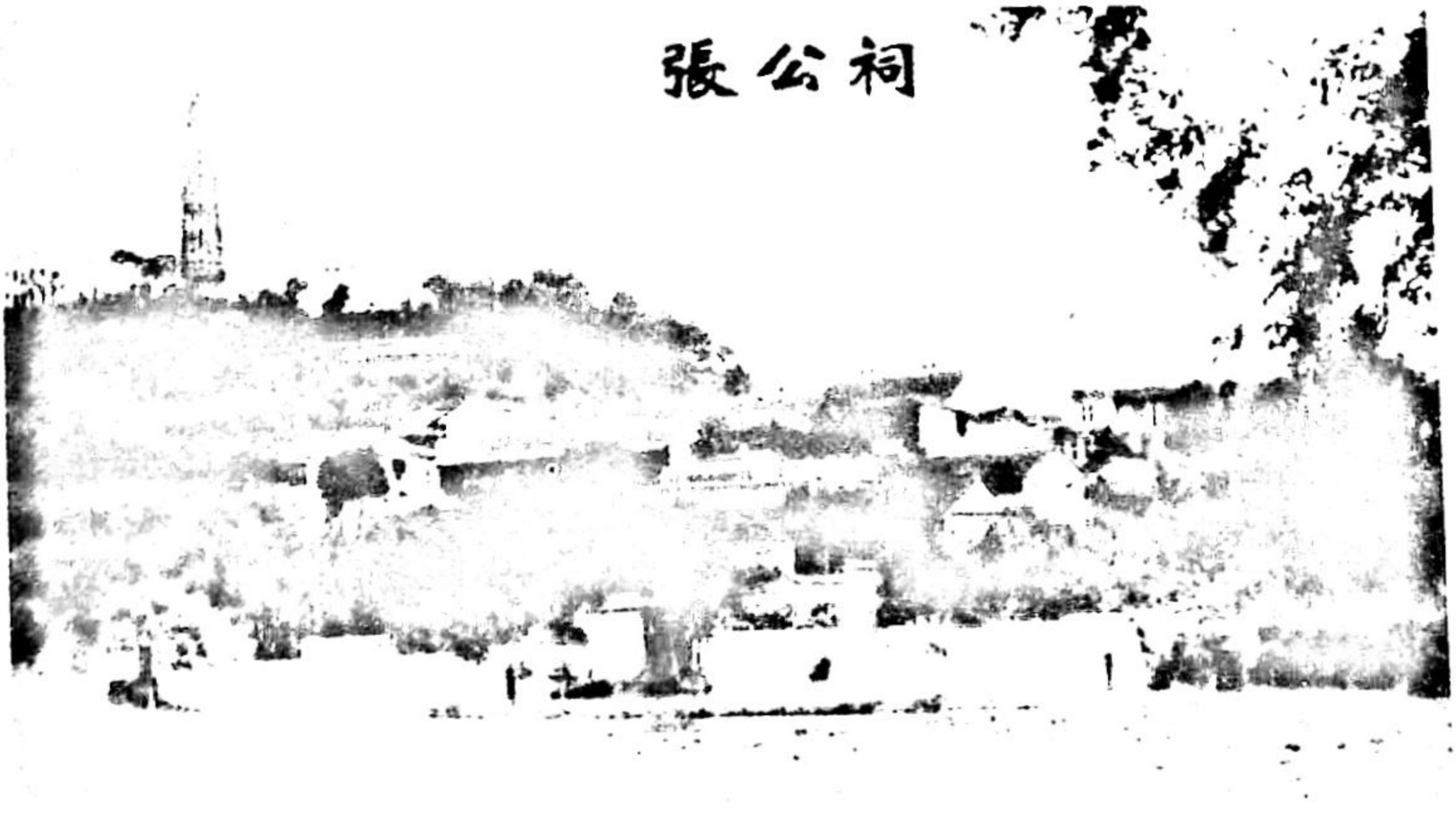
兴修水利一事，张曜早在驻军新疆时就已经注重实行。为了屯田积粮，张曜充分利用了新疆的坎儿井与暗渠这类特殊的灌溉工程。坎儿井源于雪水，是处于山麓砾石层内的伏流形成的暗渠，每隔三四丈向下凿一直井，以通空气和取砂土。张曜所处的哈密一带，属于"沙碛，引水渗漏居多。光绪三年（1877），张勤果（张曜的谥号）令军士开哈密东北石城子渠，引库申图水，用毡单贴地数十里以承流"。据记载当时张曜修筑了20公里的暗渠，十只羊的羊毛才产毡一米，20公里需要20万只羊，毛毡贴地用的时间不能太久，"未久毡腐"，每过三年又要换一次毛毡。为了水，张曜他们绞尽了脑汁，

老百姓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光绪12年（1886），张曜调补山东巡抚。他一到任，就着手对山东黄河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山东河道窄的特点，他加强堤防，又提出了“分”与“疏”的治河主张。认为山东两岸堤工不够坚固，河道又窄，水涨易于漫决为患，必须要有分水的措施，故在齐河赵庄、刘家庙和东阿陶城各建减水闸坝一座，以防异涨。光绪13年郑州十堡决口，山东黄河断流，他抓住时机，对山东河道及时挑淤疏导。光绪15年正月黄河回归故道，正值凌汛时期，由于河道疏通，使冰水顺利入海，断了水患。

鉴于当时黄河从牡蛎口入海不顺，张曜乃因势利导，用机船疏挖，改由韩家墩入海，使河口通畅无阻。他说：“治河如治病，泛滥冲决，此河之病也，淤滩沙嘴，横亘河流，此又致病之由也。”他认定切挖淤滩沙嘴，为治河要务。他调集平头圆船50只，每船16人，带上开挖工具，凡有河中淤滩沙嘴，水浅登滩挑挖，水深则乘船淘爬。再在对岸筑坝挑水，藉水流进行冲刷。培堤取土路途较远，张曜就命令铺设小铁轨，以铁车运土，当时铺就的铁轨达1080丈。

济南大明湖张公祠



为了治河，张曜几乎天天在河堤上踏勘，每到紧急关头，昼夜不息。一年就有300天在河堤上度过。刚上任治黄河那时，他没有经验，误听了幕僚中某些人“不与河争地”的意见，放弃民埝，退守大坝，结果黄河在齐河段决口，损失实多。这次的教训异常深刻，从此，张曜认定只有广泛听取意见，才能集思广益，得出正确的治河措施。只要懂河务的，不管是下级官吏还是老百姓，他都亲自找来请教，唯恐听不到他们的意见。为了保护周边环境，为了防止河堤泥沙走失，张曜下令广植柳树，安排河防营看护。直到现在，济南人民依然爱柳，他们称为“张公柳”。柳树成为济南的市树，它同济南的市花——荷花一起，构成济南一道亮丽的风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那是对泉城最恰当的描述。张曜，济南老百姓心目中的一位治河英雄。

人民的怀念

光绪17年（1891），张曜在河堤上操劳过度，监工时“疽发于背”，回济南不治身亡。张曜任山东巡抚7年，办洋务、治黄河、修铁路、开厂局、办义学、建书院，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时期，竭尽全力保障了山东境内的平安，用自己的忠诚和出色的才干，洗刷了早年“目不识丁”的耻辱，赢得了上下的敬重。噩耗传出，山东官民异常痛惜，张曜的属官、幕僚以及侍从都聚集于巡抚大院失声痛哭，顿足的、捶胸的，哀声直贯长虹，出殡之日，济南百姓热泪滂沱，倾城相送。接张曜后任巡抚的福润评价云：（张朗斋）“宅心精白，笃志中贞。自守极严，而不惜以巨资以养将士。待人极厚，而不屑居积以营身家。察吏则严而不刻，治军则恩威相济，课士讲求实学，临民周悉舆情。频年办赈，全活百万生灵，有古大臣忠纯之谊。”观张曜一生，此话说得十分中肯。

山东人民怀念张曜，他们在济南大明湖畔为张朗斋修建了祠堂，年年供奉，岁岁祭祀。张曜去世不久，山东民间传说他化作了黄河的水神“大（dai）王”。

所谓大王，就是一条小水蛇，传说来到黄河的大王都以水蛇化身，它们身上各有不同的特征，老河工只要见到，就能辨认出来，迎接进大王庙。大王庙原址在济南城县东巷，内祀“金龙四大王”。张曜生前，清朝皇帝赏穿过黄马褂，他背上又生过疮，因此那条上半截黄色、中间有瘤状物的水蛇，就是张曜。

昔日，大凡黄河发生险情，或者抢险堵口成功，人们都要到大王庙中献祭，表达对神的谢意。据说这时往往会有大王现身，可能蜿蜒在泥土上，可能浮游在河水边，甚至可能突现在某个官员的帽顶上。这时人们就会用木盘，铺好红布，众人烧香跪接，那大王呢，自会不慌不忙爬进木盘，盘绕在木盘中央昂着脑袋，听凭虔诚的人们把它送进大王庙供奉，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它又会从木盘里消失。传说张曜成为大王之后，曾经多次变为水蛇出现在黄河上，多次被迎入大王庙，特别是每当黄河险象迭出时，向他祈祷，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民间传说，总是越传越离奇，越传越神秘，与其说它是封建迷信，倒不如看作山东人民对为人民大众作过好事者的怀念。

济南百姓为张曜建了张公祠，曾有人专门撰写了一副对联：“公有功若历山高，我欲琅琊刻石，徂徕摩崖，纂百战空群之伟绩；灵其来兮靡笄下，谁持肥县碧桃，乐陵丹枣，歆九歌传舞以迎神。”张曜祖籍钱塘，因此杭州也建有一祠，那里有一楹联云：“新祠民祭祀；旧债帝偿还。”

张曜性情豪迈，慷慨仗义，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著名的秦腔《镇台读书》，唱的就是张曜。山东民间流传着有关张曜的许多趣事，与包公、海瑞相仿；更有一些小说，将张曜演

绎得有声有色，趣味横生。

在黎里，建于1866年的退一步处，虽经文革的破坏，但基本建筑船厅、庭院、东侧的楼房和南边三间下房都仍旧保存着，现在列为吴江市级文保单位。主体建筑是一座船厅，四楼四底，西面是“船头”，东边是“船艄”，当中两间为“船舱”，船厅南侧是庭院，院内两颗缆船石，硕大显眼，船厅内的方砖铺地，斜斜的呈菱形，这是清代武将独有的特征。正北中间原先挂着“退一步处”四字匾额，可惜在文革中被毁，只剩下挂匾额的两个铜配件。黎里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退一步处现在列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上级政府和黎里文保所拟在保护名人故居的前提下，整修张曜故居，修旧如旧后向社会开放，让后人了解那段历史，了解这位曾经为国为民作出奉献的爱国将领。

四、输财办学的倪寿芝

倪寿芝（1864－1943），字慕欧，出生黎里镇一个书香之家，倪寿芝是黎里镇第一所，也是整个吴江县第一所私立学校的创始人。黎里镇上读书风气极盛，倪寿芝的祖母虽然称不上满腹经纶，倒也能书能文，父亲倪介生一边读书应考科举，一边经商赚钱，养家活口。

在封建社会，黎里镇上多数的读书人应考科举，并非出于飞黄腾达的追求，至少并非纯粹为了追求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集团而作威作福，大半是为了进学，也就是成为秀才，从而摆脱贫困摆脱欺压。按照清朝“训士规定”（清顺治九年颁发），秀才有三大特权：一，免除徭役和赋税，上及父母下及妻儿；二，每年进行“科试”，成绩合格称为“增生”，列入高等的称为“禀生”，二者都由官府供给衣食；三，秀才见知县不必下跪，官员以礼相待，秀才犯法由学校责惩，情节严重的，地方官须先报请学官黜革生员的功名之后才可治罪。因此民间纷纷传说，革去秀才可以抵它个三五年官司。黎里镇上只要读得起书的，都让儿子攻书考科举，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总祈求考出几个秀才来赖以支撑门户，否则赋税徭役肯定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倪家连续几代读书，每一代都出一二个秀才，终于跃入殷



倪寿芝

实之家。倪寿芝就成长在这样一个注重读书的家庭。在祖母与父亲的教育之下，倪寿芝，还有她的弟兄姐妹都受到了良好的文化启蒙及熏陶。

1882年，倪寿芝18岁，嫁于王燮卿，夫唱妇随其乐融融，按照封建时代的习惯，倪寿芝又称为王倪寿芝。至今，黎里中心小学所建的纪念亭，沿用旧称，叫作“王倪寿芝纪念亭”。

本来，这位王倪寿芝也许同普通妇女一样相夫教子，终其天年。可是，好景不长，结婚仅仅三年，丈夫夭折。寡居的倪寿芝时不时回家陪伴母亲，后来母亲年老多病，就长侍病榻之侧。母亲去世后，回到王家，郁郁寡欢，闲来以读书自遣。

1902年，倪寿芝的九弟倪与三，从日本学医毕业回国。九弟在外多年，见了世面，思想新颖。后来中国同盟会成立，倪与三成为黎里最早的会员之一。倪与三的到来为闭塞的江南小镇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弟弟的鼓励下，年已36岁的倪寿芝大胆地走出了小镇，来到上海城东女学堂选科学习，成为杨白民校长最为年长的学生。学习期间，倪寿芝带有明确目的性，除了学习新潮的文化知识之外，她更注重实际，学以致用，决心回家乡后播旧鼎新，在教育方面干一番事业。1903年春，年近不惑的倪寿芝顺利肄业，回到家乡黎里。

当时，废科举兴学校的呼声正盛，存在了1300来年的科举制度已经日薄西山，倪寿芝决定顺应时势，开办一所新式学校，为家乡培养适应时势的人才。她变卖了所有的簪珥首饰，会同四兄倪迪

民和九弟倪与三，还有同镇知识分子中较有见地的王资万和徐帆鸥等人，集资设立了“求我蒙塾”，男女兼收。蒙塾的功课，全部采用新学，设国文、算术、自然、艺术等门类，倪寿芝出任学监，开创了吴江县教育事业之先声。一年以后的1904年，学生数量大增，倪寿芝再次集资，将求我蒙塾更名为“民立小学”。1905年，科举制度寿终正寝，洋学堂更受欢迎，民立小学培养出来的洋学生，比私塾里的文童见识与学识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男学生，朴素天华，有知识有礼貌；女学生勤谨操守，知书达礼，面貌焕然，至于应付家庭信札及帐目往来，更是不在话下，民立小学受到家乡父老的肯定，大家争着送自己的女儿入学。1907年，为了容纳更多的女孩子，倪寿芝决定在自己所居住的王宅内辟一教室。

王宅是建于道光年间的一个建筑群落，三开间开阔七进纵深，当年的教室就设在第三进。三楼三底的一幢楼厅，楼上倪寿芝作卧室，楼下三间，二间作教室，一间作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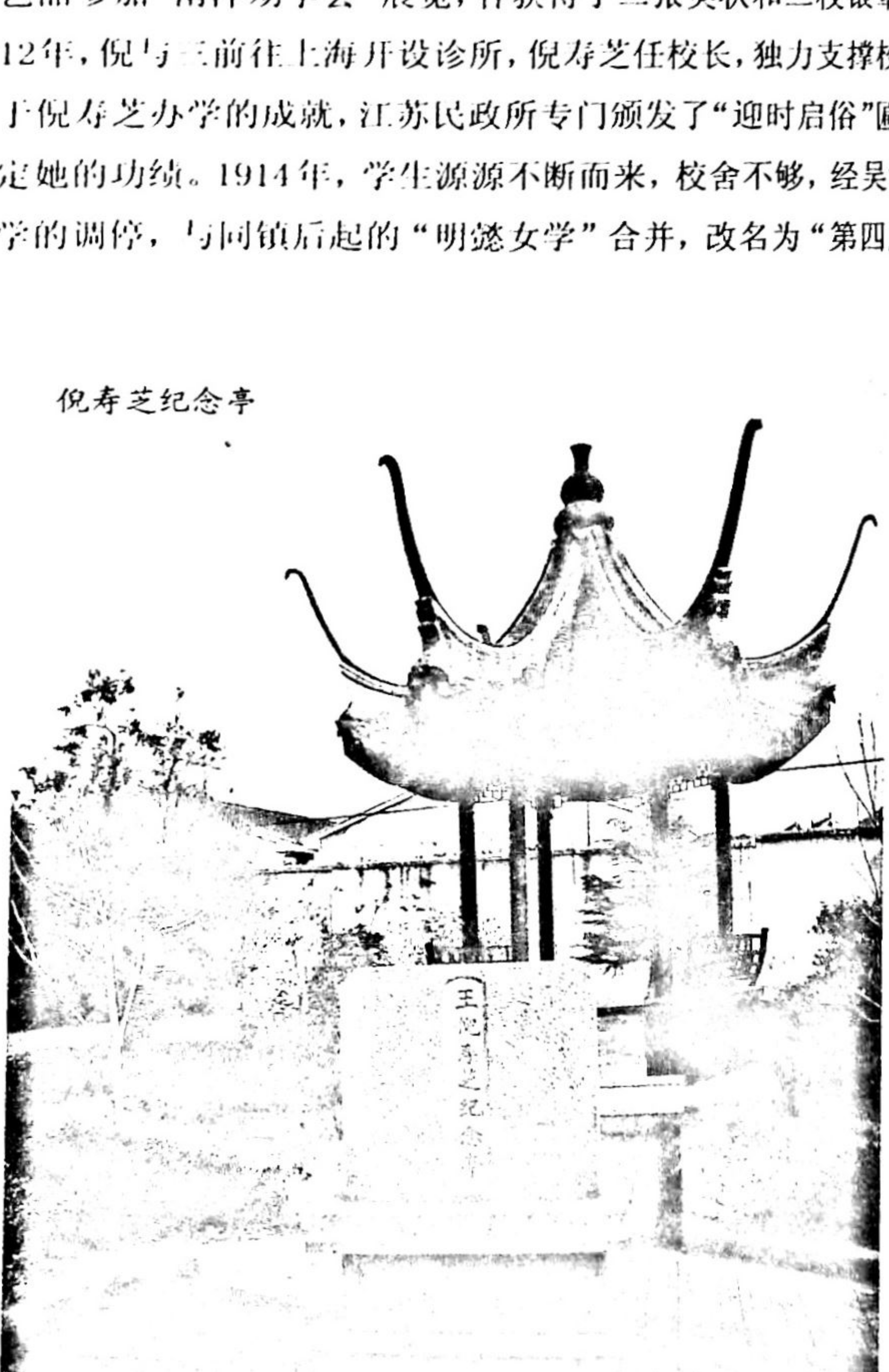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倪寿芝在黎里创立了“女子放足会”，坚决反对女子缠足，提倡天足运动。有时只身一人，有时带着她的一批洋丫头，闯进守旧之家，说服动员，直到那些家长脑筋开了窍才作罢。又成立“嘤鸣手工会”，指导妇女学习刺绣、缝纫、记帐等技能，帮助妇女自力更生，自食其力。

综观倪寿芝的作为，她并不仅仅办学校，她所致力的是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大动作。当然，在新旧交替的时期，各种力量的斗争在所难免。黎里镇上一些守旧的儒生和旧式官吏，他们对倪寿芝的所作所为非常看不顺眼。当倪寿芝的求我蒙塾、民立小学相继出现，当学校设置的科目逸出了传统规范，当洋学堂的学生来来往往，活跃于社会的时候，封建的老顽固们大为震骇，他们不能容忍一介女流，办什么女学，办什么洋学堂，便用“告白”（相当于大字报，即用白纸书写张贴出来）张贴街头，造谣攻击倪寿芝违犯三从四德

人伦道义等等，捏造了众多的莫须有罪名。难能可贵的是，倪寿芝的意志异常坚定，她顶住了压力，坚决以培养新颖的女子，改变黎里的风气为己任。

倪寿芝以学校的实际业绩，以造就的新型人才，一一回敬了封建旧势力的挑战。1907年，民立小学和嘤鸣手工会的学生们制作的工艺品参加"南洋劝学会"展览，各获得了二张奖状和二枚银章奖。1912年，倪与王前往上海开设诊所，倪寿芝任校长，独力支撑校务。鉴于倪寿芝办学的成就，江苏民政所专门颁发了"迎时启俗"匾额，肯定她的功绩。1914年，学生源源不断而来，校舍不够，经吴江县视学的调停，与同镇后起的"明慧女学"合并，改名为"第四区女

倪寿芝纪念亭



子学校”，迁入黎里镇公所内开学，倪寿芝仍任校长。学生数量继续增加，镇公所的房屋再次人满为患。倪寿芝四出奔走，多方筹划，拿出学校几年来积贮的全部资金，建造起一幢新教室，六楼六底，顿时气象为之一新。1924年，倪寿芝年逾花甲，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肺病，申请辞去校长职务。可是上自县局，下至百姓，多方挽留。最后，倪寿芝荐举内侄女倪徵璠为代理校长，才得批准卸任。尽管已经退休，但倪寿芝仍然关心学校，期年之后，倪寿芝慷慨捐出70余亩田产充作学校经费，拆去家中花园、假山作为学校操场，添置了许多体育用品，将自家的假山垒叠在校舍前，美化了学园的环境。

倪寿芝创校以来，20余年如一日，任劳任怨，矢志不渝，学校人才辈出，柳亚子先生的儿子柳无忌就是该校走出来的一位国际上知名的教育家，殷明珠是倪寿芝洋学堂的著名洋丫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为中国第一代影星，还有国际大法官倪徵噢、革命烈士张应春，以及众多的教授、学者、医师、工程师等等。

倪寿芝的办学精神，不断地激励着后人，也让后人深切怀念这位输财办学的老前辈。

附录：

前不久，黎里文保所发现了一块纪念王倪寿芝捐资办学的石碑，可是仅存碑额，碑身和碑座已经毁坏。碑额的篆文是“王燮卿先生暨元配倪寿芝捐资兴学记”。

1948年，倪寿芝逝世五周年纪念，黎里镇走出去的国际大法官的倪徵噢先生，特地撰写了一篇墓志铭，由倪文钊书丹，勒石于倪寿芝的墓前，供后人瞻仰。墓志铭碑文如下：

王太夫人倪寿芝之墓碑

姑母大人安茔纪念

吾姑寿芝毓毓女英幼娴闺仪诚量超群
于归王氏妇道咸钦早丧所天事蓄产勤
矢志兴学立己立人求吾蒙塾创建日新
风气闭塞独立报纷延聘良师输财勿吝
门墙桃李郁郁芬芬惟宏惟毅敏落风成
迎时启俗创立新学急公好义乡里共尊
待人接物亲见精神暮年避难宿疴徒增
秋风陡起遐尔震惊今安窀穸奠祝惟敬

公元一九四八年中秋内侄倪徵暎敬立

1994年，倪徵暎先生缅怀倪寿芝对家乡的贡献，捐资在黎里中心小学建造了一座“王倪寿芝纪念亭”，亲自撰写了亭匾和碑文，全文录如下：

王倪寿芝（1864－1943），黎里镇人，早于前清末年前往上海城东女学求学，开风气之先。旋返黎里，创办“求我蒙塾”，后改名“民立小学”，设在其住宅内。民国初年，小学迁入夏家桥原黎里镇公所旧址，即今黎里中心小学，改为公立，称“吴江县第四区女子学校”，王倪寿芝仍任校长。王倪寿芝办学，前后三十余年，悉心筹划，输财捐产，不遗余力，直至1922年，因积劳成疾退职。门墙桃李，乡里成钦。爰建此亭，以资纪念。

倪徵暎撰一九九四年五月

五、活跃于桑梓的柳亚子

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1887－1958），早期同盟会会员，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实际领导人。柳亚子出生于黎里镇北厍社区的大胜村，12岁那年，跟随父母迁居黎里镇周寿恩堂居住，在黎里生活了整整29年。1927年因为反对蒋介石的分共清共政策，遭到武装通缉，被迫离开黎里。本节将介绍柳亚子先生在家乡黎里的种种活动。

藏书大家

柳亚子终生读书买书写书编书抄书藏书，不知疲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家乡黎里，柳亚

柳亚子



子专门辟有一座藏书楼，满满的五大间房子，收藏了他41岁以前搜罗整理的书籍44000多册。这些藏书，有祖上传下来的，有四出购买的，有亲朋好友馈赠的，有掏钱翻刻的，更有抄录的。

柳亚子先生热衷于藏书，与他渊远的家学有关。

柳亚子出生于书香门第，高祖父柳树芳是柳家第一个饱学之士，中过秀才，一生著作累累，广交文人墨客，自高祖以后，柳氏一脉每一代都出秀才。清代秀才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多种特权，因此柳家摆脱了贫穷摆脱了欺压，边耕边读，成为了殷实人家。高祖是个明智通达的人物，他要求子孙后代认真读书，倒不是为了中举人中进士，飞黄腾达，实在是为了免受剥削压迫。为此高祖刻了好几方有关读书的印章留传后世，其中有三方的印文是："有福读书"、"以书自娱"和"文人多癖"。

前些年，发现了一本线装木刻本的《胜溪竹枝词》，作者胜溪居士不是别人，就是柳亚子的高祖柳树芳。《胜溪竹枝词》共50首，题材涉及风俗习惯、地名桥梁、园林第宅、祠庙墓域、历史人物等等。书上有柳亚子儿童时期的墨迹，主要是顿点断句和一些夹注旁注（那些注已被挖去，成为了长短不一的孔，边上的墨笔痕迹依稀可见），封面和封底有多处字迹："五十首"、"胜溪竹枝词终"、"元孙慰高敬志"、"元孙慰高敬读并志"、"乙未年元孙慰高读"，下面钤有一颗腰圆印章，就是高祖留下来的那颗"文人多癖"。慰高是柳亚子的谱名，乙未年是光绪21年，公元1895年。那时柳亚子仅仅9岁，已经有了文人之癖：爱书！

由于祖上遗风，柳亚子很早就有志于乡邦文献。他在《潘节士田力先生遗诗序》说过："余自束发受书，即有志里中文献，尤喜考求宋明末造忠臣义士、佚民遗老之书，盖当宇宙膻腥，华夷混合，而能艰贞蒙难，舍命不渝，其高风亮节，有非人所能几及者，非徒以文学为枌榆重也，稍长，从陈子巢南游，搜讨益力。"

柳亚子爱书，除了家风的熏陶，也有朋友的影响。上文柳亚子说到的陈子巢南，就是同里的陈去病，后来二人一起创建南社。陈比柳大13岁，搜罗乡邦文献很早。一次，陈去病访得了明末抗清英雄吴日生的遗稿，兴奋地整理成集，定名为《吴长兴伯遗集》。1907年，陈去病在将《吴长兴伯遗集》付印时，驰函柳亚子，索诗作为纪念。柳亚子也很兴奋，撰作了五律四首。从吴长兴伯开始，柳亚子埋头吴江乡前辈诗文集的研读，诸如卜孟硕、王晓庵、吴炎、计改亭、潘次耕、吴兆骞、叶燮等等，掀开了柳亚子乡邦文献的第一页。

柳亚子聚书，从整理家藏开始。1908年，柳亚子把自高祖以来的家庭藏书先行作出整理，计140余种，1400余卷，标成《家藏松陵书目》一卷，并且撰写了一篇叙。

柳亚子认真聚书是在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元旦，柳亚子应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之邀，担任孙中山总统的骈体文秘书，可是主和派包围了孙中山，要孙交出权力，让位给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迫于压力，孙答应虚位以待。柳亚子非常反感，当即托病辞职，来到上海，进《天铎报》社，间日撰写社论，指责主和派，反对袁世凯，预言袁氏他日定然易总统而为皇帝。事实正是如此，袁世凯很快就当上了总统，又很快复辟洪宪皇帝。尽管袁世凯称帝仅仅83天就一命呜呼，但是接下来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国事一天比一天坏下去，柳亚子自感笔墨当不了甲兵，一介书生回天乏力，只好隐居乡里，组织酒社，借酒浇愁，喝醉了长歌当哭。同时，南社内部发生了唐宋诗的争执，柳亚子愤而辞去了南社主任职务。“后来社里起了内讧，我便辞去了主任之职，洗手不干。此时我又在发狂的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代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收藏。”“这样，便花去了一万多块钱，还加上其他的挥霍，渐渐觉得有‘床头金尽’的感慨起来。”（《柳亚子自传》）袁世凯称帝到国共两党合作前夕，柳亚子的政治活动处于低谷时期，而他搜寻乡邦文献的业

绩斐然。这时期，柳亚子刻了“狂胪文献耗中年”、“借琐耗奇”两枚印章，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时发狂似的收购旧书，借这种琐碎之事来消耗掉自己的余生。中年是人生的大好时光，尽管一心以天下为己任，可是有力无处使，只能蛰伏乡里，寄沉痛于逍遥，咀嚼印文的意思，柳亚子有寄托也有自嘲。

41岁之前，柳亚子在吴江，每年为搜罗乡邦文献，花费很多的精力，有时为了买下淘得的旧书，不惜举债。1918年，为购书竟用去了10000多块钱，弄得生活都发生了困难。记得他曾刻过一方闲章“散尽黄金万卷书”，以志纪念。

柳亚子先生的藏书，主要有四多：一是乡邦文献多，凡吴江人的著作，无论古今精粗尽数收罗；二是明末抗清志士的著作多，像夏完淳父子、陈子龙、吴日生等人的文集；三是辛亥革命前后倡导反清革命的刊物多。还有就是抄本多。

藏书中的抄本，最多见的是用《南社丛刻》稿纸抄写的。很多抄本的底本是从友人，特别是南社社友处借抄的。南社中人大多是饱学之士，家中多有藏书，有的人也非常关心乡邦文献。如陈去病，还有芦墟的沈昌眉，他们多年来每每从荒江老屋、冷摊旧肆搜求珍笈，有感于柳亚子的热心，都大力支持，把多年来搜寻所得，无私地提供出来。

柳亚子以他的学识及眼光，凡认定是有价值的书籍，就掏钱请人抄写，柳只在封面上题写书名。有些书缺少序文，柳亚子就动笔撰作。

很多抄本是没有刊刻过的稿本，是朋友们穷年累月抄录下来的，柳亚子认为这种书流传不广，稍有不慎就会毁弃不存，那将是莫大的损失。因此这种未刊稿本，柳都郑重地借抄录副。由于柳亚子的努力而得有副本的，有《蛰庐遗稿》、《待问五十策》、《春晖阁诗草》、《茂塘遗稿》、《屺荪诗钞》、《西郊旅草》、《虞江哀诔文》、《款冬花屋

骈文》、《晚宜楼集》、《薄游小草》等，不下百种。

抄本中有一些出自柳亚子之手，非常珍贵，如《文竹山房集外诗》、《月当楼小稿》、《乐国吟》、《深柳读书堂诗词稿》、《太原闺秀比玉集》、《二张先生词剩》等等。柳亚子写字，大多非常草率，他在公开场合多次说过自己是以劣书劣字出了名的，写字就象是扶乩和画符。有一次他写信给曹聚仁和张天放，信末竟附了一句：你们读不懂的话，隔天见了面，我再读给你们听。一时传为笑话。对柳亚子的书法，南社老友楼辛壶有一句客观的评价，叫“意到笔不到”，柳亚子觉得非常持平。但是，假如看了柳亚子抄写的乡邦文献，我们一定会为字字点画清楚，一笔不容苟简的行书叫好。从中也能看出柳亚子先生对乡邦文献的重视程度。

不仅自己抄，柳亚子还让儿子女儿抄。特别是儿子无忌，那时仅仅十来岁，柳亚子命他抄录了不少，诸如《金苔花馆遗诗》、《剪愁吟》、《占鲸琴馆唱和集》、《敷春草堂倡和诗》、《题焦馆诗稿》、《思孟阁诗稿》等十余种。还有无忌与妹妹无非合抄的《宜雅堂诗二集》等。在《知无涯草庐诗》的跋文中，柳亚子写道：“此册原稿藏梦琴后人祥叔处，余未得见，见陆赓南所写副本，因命儿子无忌重录一通，并志缘起如右云。……分湖柳弃疾记。无忌敬书，时年十二龄。”

对于借抄的书籍，柳亚子多数写有题跋，介绍书的来源、作者、版本等等，那些有价值而一般人不易查找到的书，他运用自己广博的文史知识，详加考证，为后人了解该书提供了必要的材料。一次柳亚子请人抄录了一本书，卷首没有书名和作者姓名，只在封面上题写《绿梅萼诗》。柳亚子读了一遍，从“八月初七返松陵”一诗，断定作者是吴江人；又从“浮王洲鸭漪亭诸胜”，认定作者家居松陵；书中有位倪青斋撰《白菊原韵诗》，有“君家佳卉”一语，判定作者姓陶；又根据《庚午元旦联句》一诗，庚午是嘉庆十五年，作者大体的年代也就可以推断了。后来柳亚子把它改题为《绿萼吟》。

柳亚子聚书，遐迩闻名。近据柳亚子老家人之子说起，辛亥革命前夕，有一本杂志《湖北学生界》，是湖北留日学生在日本出版的。柳亚子缺了一期，他四处发信，希望补齐，可是没有结果。这件事惊动了许多人，不久有书商拿着那本杂志，认为奇货可居，找到柳亚子的好友沈昌眉，请沈转告。柳亚子得到消息，马上派出书僮以200元的代价买了回来。这犹如历史上的燕昭王，五百金买回了一副千里马的骨头，结果千里马源源不断而来。

柳亚子这一举措感动了家乡父老，大家纷纷把家里的藏本断编残简接连不断地拿来献给柳亚子先生。有根有据的至少有如下一些：陈去病赠了《竹友轩吟》，顾悼秋赠《琴余诗》，陈祥叔赠《博山诗草》、《云巢诗钞》。好友沈昌眉赠得最多，沈氏有言："余家旧藏莺湖吴金寿所刊叶天士《医效秘传》，亚子索之，谓乡先哲手刊本，亦在所求中也。余已于去夏赠之。今检旧箧，复得《三家医案》、《温热赘言》二书，亦为金寿所刊，且与《医效秘传》同一版本者，因归之亚子，以副其网罗文献之雅意。是数种者，未得谓人间珍本，唯是一规一点，悉经先父丹黄，具见平日旁及于此者。"

为了乡邦文献，柳亚子呕心沥血在所不计。只要有一丁点线索，他或派人或发函联系，有时亲自出马。在大户人家的家谱、族谱中，往往收入不少艺文资料。而家谱、族谱一般不肯轻易外借。柳亚子凭着他的为人，凭着他的钻劲，更凭着他的韧劲，从中辑得了不少艺文资料，比如他从同里《顾氏族谱》里摘录了明代吴江顾曾唯的《闽粤杂咏》、顾宽的《哀母吟》。

凡抄录的稿本，柳亚子多数写有题跋。这些题跋，有的记述稿本来源，流传始末，收集经过；有的涉及撰作年代、作者、编辑者以及收藏者的情况；有的交代校勘、增补参订缘起；也有的写明各种版本、抄本的异同。这类题跋有270余则，总计60000多字。1993年上海图书馆的沈津先生经过整理，冠以《磨剑室钞存乡先辈已刊

未刊稿本题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安排在《柳亚子文集·磨剑室文录》中出版。这些题记使研究吴江地方文献的学者得益匪浅。柳亚子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他们的副研究员李展多次说起，他由于通读了柳亚子撰作的这些题记，许多涉及吴江文史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至于获得线索及启发的则更多。

对于吴江乡邦文献中地方志部分，柳亚子尤其重视。《吴江县志》、《吴江县续志》、《震泽县志》、《同里志》、《平望志》、《平望续志》、《黎里志》、《黎里续志》等等，都作过考订或翻刻工作。

为了使乡邦文献能够广为流传，柳亚子拿出资金，重印、辑印了多种颇有价值的吴江文献，单在1920年就有六种，提要如下：

《松陵文录》24卷，凌退修和凌莘庐辑，原本刊刻于同治年间，版木已经遗失，柳亚子发觉曾祖柳兆薰辑有二凌姓氏考，于是专门撰作了一篇后记，合并重印。

徐山民是袁枚的高足，清中期颇为知名的文学家，著作累累，关于桑梓的有《黎里志》16卷、《禊湖文拾》2卷、《禊湖诗拾》8卷。其中《黎里志》版木颇多缺损，柳亚子捐资补刻，《禊湖诗拾》版木柳亚子从盛泽觅得，增刻了一篇后记，重印了一百部。

王旭楼《话雨楼碑帖目录》，深受海内外鉴赏家注目，百年以来已成绝版，柳亚子四处寻觅，终于从盛泽王氏后人处求得了部分版木，补正缺失，也重印了一百部。

许竹溪《梦鸥阁诗钞》，柳亚子藏有旧印本，但残缺不全，而邻邑柳公望从许氏后人处得到了全本的版木，二柳愉快合作，校勘后重印。

还有范永绥的《梦余赘笔》，陆达卿的《陆湖遗集》，都因柳亚子印行而广泛流传。

搜集书籍困难，保藏书籍更加困难。

1918年冬，柳亚子聚集了有志于保存乡里文献的同仁，成立了

“松陵文献保存会”。柳亚子与薛凤昌合作编辑了《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首次油印了四卷，并有沈昌直序言一篇，历述吴江藏书及保存文献故事。保存会的同仁，大家互通有无，积极交流。柳亚子、薛凤昌与吴江地区另外10位藏书家联合起来，由柳亚子拟定12个字，“文献流传，后生之责，维桑与梓”，一人取一字作代号。具体代号和姓名是：文（柳亚子）、献（费伯缘）、流（沈颖若）、传（金眼初）、后（薛公侠）、生（范烟桥）、之（叶叩濂）、责（沈丹忱）、维（周嘉林）、桑（陆赓南）、与（顾悼秋）、梓（黄病蝶）。共计收入吴江人各类著作740多种，柳亚子“文”字号的款目多达650余种，是各家之冠。故吴地有“松陵文献，尽在柳氏”之称。

柳亚子“文”字号的书籍，大多钤有印章。如：“柳弃疾印”、“松陵柳弃疾藏书之印”（当时柳亚子改名弃疾）、“磨剑室”（柳的书斋名）、“太平庄”、“养余斋”（两个都是柳家祖上的书斋名，这类书籍是家藏旧籍）、“安如”（柳亚子的字）、“金镜湖寓公”（金镜湖在黎里，此印含有愤慨自嘲之意）、“柳弃疾郑瑛夫妇合印”、“安如佩宜”（柳亚子夫人姓郑名瑛字佩宜）、“柳亚子藏书”等印章。那些柳亚子亲手抄录的书籍大多钤上“安如手墨”一印。

最最奇怪的是，有些书上钤了“红梨饭”一印，乍一看去，令人不知所云。原来，柳亚子在1919年至1922年间，先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红梨阁”，后来随着书籍的增多改称“红梨馆”。“红梨饭”，当是柳亚子书斋中的精神食粮而已。

柳亚子研读过的书籍，不少盖上了“亚子过目”、“曾经分湖柳弃疾过眼”或“曾经柳亚子披览”的印章。对那些珍贵的版本、孤本善本，他连印章都舍不得钤。

柳亚子先生的藏书与封建社会的藏书家不同，封建朝代的多数藏家总是搜奇猎艳，追求“百宋”、“千元”、“百靖”之类的版本，屯积居奇，或藉以炫耀，或待价而贾。照柳亚子先生当时的经济及声

望，他是能够搜罗到宋元秘笈、名家手本的，但是柳亚子先生的目的在于保存乡邦文献，广为流传，造福乡梓，无意于版本，更不求名声和价格。因此，一般藏书家与柳亚子先生不可同日而语。

1922年以后，柳亚子又构思出一个乡邦文献方面的宏大规划，或者叫“大分湖”计划。拟编纂《分湖全志》和《分湖诗征》、《分湖词征》、《分湖文征》。柳亚子拟定的“大分湖”局面，东起青浦县（今属上海市）的金泽，西至吴江县的黎里，南尽嘉善县（属浙江省）的西塘，北尽吴县（今属昆山市）的周庄。芦墟、北厍、莘塔、陶庄等均在范围之内。柳亚子拟定了分工，请南社友人一起协调完成。陶庄属周芷畦，西塘属蔡韶声，周庄属王大觉，芦墟属沈昌眉，莘塔属凌莘子，黎里属顾悼秋，金泽属陆明桓，北厍属柳鸣鸿。由于工程浩大，议决先撰芦墟、莘塔、北厍三小志。

分工定当，在柳亚子的主持下，各地友人纷纷征访乡里文献，辑录前辈诗文，详记名胜古迹、方言物产，收获累累。芦墟沈昌眉搜得《茶余话异》、《盍簪书屋诗》等；顾悼秋辑成了《禊湖诗拾续编》、《笠泽词征补编》；周芷畦辑录了《柳溪诗征》。这个工程启动不久，情况有变，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柳亚子积极投身到繁忙的政治活动中去了，“大分湖”工作最终没有完成，柳亚子不无遗憾。不过，分湖流域各地区还是采辑了一批颇有价值的乡邦文献。

1950年冬，柳亚子先生把黎里藏书分装成300余箱，全部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还有沪寓藏书、香港藏书和北京北长街藏书，也都分别捐赠给了国家各级图书馆。这些凝聚着柳亚子先生无数心血的藏书，今天，都是我们的知识财富。

创建南社

1903年过后，柳亚子经常奔走于黎里和上海，先是进爱国学社

读书，后来受健行公学礼聘成为国文教员，他与上海市金山县的高天梅和松江的陈陶遗三人合租了一套房子，称为“夏寓”。高天梅是同盟会江苏分会的负责人，1906年初夏的一天，高天梅引领柳亚子在沪淞口的海轮上秘密地谒见了孙中山先生，之后柳亚子就填表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为了配合同盟会的革命行动，柳亚子酝酿成立一个文的团体，与同盟会互为掎角，一文一武共襄国民革命成功。

经过二年的准备，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山正式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柳亚子、陈去病和高天梅是南社的三个主要发起人，他们对南社成立的宗旨，都有一段解释：柳亚子说：“它的宗旨是反抗满清，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旗帜了。”陈去病说：“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高天梅则说：“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于东南之谓。”看来，三位南社的发起者，柳和陈的解释最为相近，也最能揭示南社的本质。

辛亥革命前后，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都紧紧环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保清保皇保封建还是反清反皇进行民主革命。南社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必然打上时代的阶级的烙印，它树起民主革命的旗帜，把推翻封建皇朝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南社与同盟会相呼应，同心协力同仇敌忾，推翻了满清皇朝的统治之后，大多数的成员还进行了反袁讨袁的斗争。

由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南社有不少社友逐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成为落伍者。1923年，柳亚子又创建了新南社，柳亚子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说：“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继新南社之后，1935年又成立了南社纪念会。

南社从1909年虎丘第一次雅集到1922年，一共举行了18次雅集，人数由17人发展到1182人。在清末民初，读书人很少，而且参加南社必须具备一技之长，比如文章诗词写得好，或者善于书



南社首次雅集 前排坐者右起第二人为柳亚子

法、绘画、篆刻等，因此，当时的南社可以说囊括了大半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精英。再说南社还有许多分社，广东有粤社，苏北有淮南社，湖南有湘社，东北有辽社，浙江有越社，鲁迅先生也曾参加过南社的分社越社。如果把各分社也算上，那么总人数将超过三千人。

黎里柳亚子的家，俨然南社的大本营，南社成员络绎不绝地来往，他们针砭时弊，褒贬人物，共商国事，柳亚子出钱出力，积极编辑《南社丛刻》。

从南社的前身1907年“神交社”开始，到1935年南社纪念会结束，南社存在了28年，柳亚子领导南社28年，不断前进不断战斗。南社共出版《南社丛刻》22集23册，其中第3到7集，第9到20集都由柳亚子一人所编订印行。因此，柳亚子被誉为南社的主帅南社的盟主，有人说“没有柳亚子就没有南社”，假如仔细研究一下南社的历史，就会承认此话并不过头。

组织酒社

柳亚子先生曾在家乡黎里创建南社支社“酒社”，自1915到1923年，每年秋天都有集会，活动地点大多数在镇西头的金镜湖上，少数在酒社社友家里。中间1921年因故停聚，酒社聚会了八年，存在了九年。这九年，是辛亥革命失败后柳亚子苦闷彷徨而又奋起前进的九年。在酒社期间，柳亚子先后刻印过五方印章：酒社长之玺——词客有灵 籁才无主——金镜湖寓公——江左夷吾——李宁私淑弟子。下面就从这些印文分析一下柳亚子酒社期间的思想轨迹。

酒社长之玺：由周庄籍的南社社友“一瓢”，即费公直所治。1915年，袁世凯为了登上洪宪皇帝的宝座，不惜出卖主权，于五月九日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更黑暗的深渊。这天正好是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十二次雅集，与会42人，祖国恨民族仇，人人义愤填膺。五月十四日，社友们到杭州泛舟西湖，柳亚子饮得酩酊大醉，家事国事涌上心头，狂态毕露，先是抚膺恸哭，襟袖俱湿，继而要跃入西湖，效屈原自尽汨罗。社友们拉住亚子，也都潸然泪下。早在1912年1月19日至2月28日，柳亚子就在上海《天铎报》连续发表了24篇文章，反对向袁世凯妥协。其中《答某君书》写道：“俾虏酋退位与南都临时政府取销同时并行，彼得坐收渔人之利，由大总统而进为皇帝，此袁氏之夙愿，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在当时，柳亚子可说是少有的清醒者，可是文字无灵，回天乏力。

柳亚子回到家乡，多次对乡梓社友说：“这是光复以来第一次的国耻，民气沸腾，达于极点。可怜我是手无寸铁的书呆，只好抱着满腔孤愤，寄沉痛以逍遥。”就在这年八月，他与南社社友顾悼秋、沈剑双、朱剑芒、周云、王大觉等人结酒社，天天狂歌痛饮，借酒浇愁以泄满腔郁愤。酒社从1915年开始到1923 年结束，中间1921

年一则淫雨为灾，二则亚子的二妹去世，所以暂废酒社之聚。酒社的人员，据1919年柳亚子的《〈酒社点将录〉叙》:“余既于数年前与同人结为酒社，复戏取舒氏之作仿而行之，名曰《酒社点将录》，以社中人数少，乃悉去地煞，而独取天罡，仍依旧例增晁盖一人，共为数三十有七。”现在根据资料，可以查到有名有姓者共31人；吴江18人，其中黎里13人，吴县6人，嘉善5人，昆山和青浦各1人。

酒社雅集（1917年）



词客有灵 霸才无主　这枚闲章柳亚子请费公直所刻。由唐温庭筠《过陈琳墓》“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节缩而来。词客，指文士陈琳。陈是“建安七子”之一，长于章表书檄也善诗，可是有才却无法施展。霸才，指有杰出才能的人。这二句从修辞手法看又属互文，即还可理解成“霸才有灵应识我，词客无主始怜君”。温

与陈都自命是经世之才而无所依托，所以温庭筠一则吊唁陈琳，二则也用以自悼。而柳亚子刻此闲章实在是寄寓着异代而同心的感慨。

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柳亚子，此时在政治上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失落感。柳亚子加入同盟会，创建南社，追随孙中山先生，决心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可是孙中山仅仅在职90天便让位于袁世凯，从事铁路建设去了。孙中山一卸任，柳亚子觉得少了一面帅旗，革命的理想难以实现。“词客有灵霸才无主”，实在是柳亚子苦闷愤怒而又彷徨无主的心态的写照。

金镜湖寓公　此印是柳亚子请当地一位名叫王思号长楚的刻手所治。寓公，本指失却领地寄居异国的贵族。这里柳亚子用以自嘲，感叹自己失却了主帅，寄迹于金镜湖的湖光水色，成为闲客。

金镜湖，在黎里镇西郊，本名禊湖，因状如一面巨大的青铜镜，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故又有金镜湖的雅称。从明朝以来，每年秋季，黎里百姓都要到这里游湖赏月。特别是中秋前后的三天，三里长街灯火辉煌，金镜湖上游船穿梭。湖中心的绿洲上有城隍庙，传说八月十五是城隍菩萨生日，次日是城隍夫人生日，按黎里的风俗，全镇要为二位菩萨出盛大的庙会。

柳亚子的酒社主要设在金镜湖上。1915年秋，连续集会十三次，每次都喝酒吟诗，中秋前后竟在舟中轰饮三昼夜，“意在效信陵祈死耳”，喝醉了便在堆满瓦砾的空场上乱跳乱滚，结果腿部的筋骨受了暗伤，无法动弹，只得卧床休息，“不能赴十月十七日南社第十三次雅集。”柳亚子他们流连金镜湖，在良辰美景中多的是愤激之语：“谁使英雄无用武，翻投酒国作宾氓。”“疏狂便合称名士，慷慨何由老霸才。”1919年中秋的酒会最为盛大。当时黄娄生在北京，柳亚子飞简相招，黄涉跋三千里赴邀。十三人在舟中狂吟闹酒三昼夜，作诗词五十余首，后由黄娄生汇印成《闹红集》一册。柳亚子尽管自号“金镜湖寓公”，在自嘲中还寓有自愤，他并没有一味地借酒浇愁。

且看他1915年写的《孤愤》诗:“孤愤真防决地维，忍抬醒眼看群尸。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孤愤，典出《韩非子》一书，指正直有才能者不见容于世而满腹愤怒，诗中柳亚子期待着在沉寂中爆发惊雷。

江左夷吾　这是王思刻了送给柳亚子的。酒社作为南社支社，是革命形势发展到低谷时的产物，难免有人意志消沉，以纵酒拼酒而消磨生命消耗精力。别人且不说，单说入社很早的顾悼秋（入社号为161 ），他写了一篇《酒社小启》:“风景不殊，河山已异，腐鼠沐猴，滔滔皆是。洁身自好之士，辄欲遁迹糟窟，以雪奇恨，此酒社之所以作也。时维中秋佳节，丹桂香飘，招集鸥盟，觞于吾里，踏灯秋禊桥畔，泛月金镜湖头，结一段因缘，留他年佳话。同心可证，芳躅非遥已。此启。”小启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忧思，也有对袁世凯和劝进派的讽刺，可是却把组织酒社的目的最后归结为“结一段因缘，留他年佳话”，态度显然是消极的，只想借酒浇愁回避现实斗争。顾悼秋自号“神州酒帝”，以海量自诩。酒社中人多有别号，周云号“酒痴”，王大觉号“酒龙”，还有什么“酒人之酒”、“诗人之酒”、“狂人之酒”的品评。顾悼秋自评属“狂人之酒”，一次他以“神州酒帝”的身分赴上海，在沪社友请他到“马上侯”酒家赴宴。顾回答说自己不愿封侯拜相只愿在酒国称帝，坚决不肯赴席。又一次，酒席间与吴兴社友赵苕狂相遇。“吴兴赵苕狂，性抗直，饮酒极豪，狂人之酒也。甫入座即欲开战，且闻余有酒帝之号，乃树帜革命。余告以甲子逊位之诏，苕狂不信，已张拳作战状，而余亦雄心忽起，先浮六大白以应之，既而苕狂果降服矣。且曰:愿受册封，乃予赵王之爵，一时豪兴，更可备他年拊掌。”这些顾氏都把它写进了他的《服媚室酒话》。还有那条“酒龙”王大觉闹酒也十分厉害。一次在闹红舸上，王大觉一面饮酒一面做诗，濡笔淋漓，累累地写了

好多张纸，不意一举手碰翻了酒杯，纸被酒打湿了，漫漶不能辨字。悼秋正好和大觉并坐，悼秋穿着白袷衣，大觉乘悼秋不备，扯了白袷衣就代纸书写。

酒社集会常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新亭对泣。而柳亚子不愿长歌当哭一味悲伤，尤其是酒社后期，他常常愀然变色反对楚囚相对，时时关心国家大事。他歌颂蔡锷的讨袁义师，痛哭为袁逆杀害的革命烈士，批判变诈无常的梁启超，痛斥倒行逆施的张勋。他的喜怒哀乐决不落于小处，都是博大胸襟。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积极准备北伐。消息传来，柳亚子振奋异常，写下了《五月五日纪事》格调欢快的诗篇：“十年三乱究何成？喜见南天壁垒更。率土自应尊国父，斯人不出奈苍生。白宫北美推华盛，赤帜西俄拥列宁。我亦雄心犹健在，梦中无路请长缨。”柳亚子终于看到了救国的大旗，他把孙中山与华盛顿、列宁并举，对孙中山先生作出了高度评价，对中国的前途抱有极大的希望，自己连做梦都想奔赴前线以建功立业。

李宁私淑弟子　1922年柳亚子请南社社友费公直镌刻。李宁，就是苏维埃的领袖，一般译作列宁。在古代，对自己所敬仰而无法直接聆听其教诲的前辈，只能从他的著作中吸取营养，就自称“私淑弟子”。酒社成立，袁氏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国势每况愈下。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澎湃于全中国，柳亚子虽然身居家乡但一直关心着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在他手中，《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共产党主办的《响导》、孙中山把舵的《建设》等刊物，可以说一期不肯脱。在这些进步的读物中，柳亚子吸收了新思想新观点。就像在茫茫暗夜之中摸索了好久好久的人，突然发现了光明。柳亚子敏锐地感觉到列宁的思想学说将是中国的希望，于是他决意步列宁后尘。1922年柳亚子编成了诗集《乐国吟》，在所撰的《乐国吟后序》末尾：“中华民国十一年岁不尽七日，将刊成，李宁私淑

弟子柳弃疾自叙”，接着就刻成了印章。南社成立以来，经过反清反袁和“五·四”运动，少数南社社友态度消极甚至走向反面，柳亚子决定组织新南社。 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他说：“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是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1923年10月14日，新南社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酒社宣告解散，其中大部分的成员加入了新南社。

创办《新黎里》

1923年，柳亚子先生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会同黎里区教育会、县立第四高等小学等九个团体，团结了64位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成立了《新黎里》报社。柳亚子自任总编辑，毛啸岑任副总编辑。经过二个多月筹备，于4月1日正式发刊。《新黎里》报四开四版，每月1号16号发行。初期每刊600份，中期达1000份，最多达1120份。发行范围颇广，国内遍布所有行省，国外发到南洋和美国。创刊伊始，《新黎里》气势凌厉，连续推出旅大问题、婚姻问题、劳动纪念等特刊。在担任繁重的总编工作之余，柳亚子撰写了一篇篇泼辣锐进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的劳工问题。《新黎里》报以它崭新的面貌登上舞台，就被家乡父老誉为“地方福音”“时代明灯”。然而，这盏高高挑起在金镜湖畔的时代明灯，很快就触怒了横行桑梓的黑暗势力。邻镇芦墟有土豪陆氏父子三人猖狂进攻，妄图置柳亚子于死地，扼杀《新黎里》在襁褓之中。

这场较量的导火线是分湖先哲寺。1923年4月9日，《新黎里》正常出刊后，柳亚子与二三好友前往芦墟，意欲恭谒杨公祠。杨公即杨廷枢，字维斗，明末反清义士，清初为巡抚土国宝杀害，乾隆十年在杨公殉义处建祠。可是祠门紧锁无法入内，这已经是第三次

吃闭门羹了。记得1920年11月30日，柳亚子与陈去病等人大游分湖，一行人前来拜谒，可是杨公祠门锁紧闭，找不到钥匙而无法入内。在芦墟过了一夜，12月1日，柳亚子与友人先拜谒了“分湖先哲祠”，再访杨公祠，依然不得入内，天又下起雨来，众人冒雨侍立祠外，好久不见雨停，怏怏不乐，只得折入附近的泗洲寺，遇到了叶小鸾的一名后裔，柳亚子愤愤提笔写道“不见杨维斗，偏逢叶小鸾！”事后知道，钥匙本在寺僧手中，可陆氏父子借口寺僧启闭无常而收了回去。现在第三次被屏于门外，只好在杨公祠外徘徊，忽然柳亚子发现祠侧别建了一座“先哲祠”。经过打听，知道又是陆氏父子所为。陆氏是芦墟巨富，陆荣光偕其两个儿子陆树棠、陆陛云，拥有良田千亩，且开设米行，平时依仗财势横行乡里。上年，陆氏父子从地方贿选中捞到巨款，从中取出一份，建此伪寺，擅自将原分湖先哲寺中八位先哲的木主神位移到这里。此寺没有正门可入，墙上嵌一石额“先哲祠”，丢掉了“分湖”二字；落款“后学陆荣光捐建”，时间署为“民国壬戌清和”。对于陆氏这

《新黎里》报


新黎里

第廿一期

本期因經濟公開欄稿擠增刊一張共兩大張

基本社員公鑒

周年紀念刊徵文

特告

本社誌謝

沈煌啓事

本報啓事

王意亭啓事

建隆行啓事

朱輔成大律師代表陳秀華聲明離婚

徐樹德堂啓事

本報徵求

柳亞子徵求

預防天花快來種痘

陸頌英兼種牛痘

松夫陳嶺秀畫例

金石家問世

沈劍雙鸞刻

功成戒烟醫院佈告

沈頌屏大律師

种伎俩，芦墟镇上早就舆论哗然，只是无人敢于出面抗争。柳亚子见了非常反感。早在1917年6月20日，杨廷枢殉国270周年忌辰，柳亚子曾偕吴江县令李畴庐前往杨公祠致祭，席间，柳亚子与芦墟陆欧安、沈长公等提议，在南栅切问书院旧址改建“分湖先哲祠”，祀奉分湖流域陆大猷、陆行直、袁黄、叶绍袁、洪祖烈、李枝芳、陆耀、郭频伽等八位先哲，春秋致祭，供人钦仰。该年年底，分湖先哲祠落成，柳亚子参加首次祀典。现在，杨公祠进不去，分湖先哲祠又被弄得面目全非。次日，柳亚子致信陆氏长子陆树棠，提出重辟新门和恢复分湖先哲祠旧额两项要求，“如足下不以为然，仆当纠集同人，迎先哲神位，重归切问书院，诸先哲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定不以为仆好事也。何去何从，希即复为幸。”然而，陆氏态度蛮横，复信指责柳亚子“以区区细故，而以咬文嚼字之见掀风作浪，故意非难”，“使酒骂座，大逞狂奴故态，在弟视之，只可付之一笑，实无置辩之价值。”接下来，柳亚子又以2500言长书淋漓恣肆予以驳斥，陆氏仍强词夺理，极尽辩解反诬之能事。柳亚子迅即在《新黎里》推出“分湖先哲祠正名纪事”附刊两期，把事实真相公布于众，让父老乡亲评判。结果，陆氏行径，激起吴江和邻县地方人士的公愤。

与此同时，《新黎里》报劳动纪念特刊出版。陆氏父子经过仔细策划，由三小子陆陛云发函密告江苏省省长韩国钧，诬告柳亚子为“过激党”，经常“奔走滇越，潜蓄异谋”，“鼓吹其劳农劳工主张，专以煽惑农工各界，希图推翻资本阶级，实行共产主义。”并以柳亚子《〈乐国吟〉后序》自署“李（列）宁私淑弟子”和《新黎里．劳动纪念特刊》为证。6月初，吴江县署奉省长公署之命，勒令《新黎里》报停刊，指令县警察所对柳亚子和《新黎里》报从速调查。陆氏的阴谋得逞，叫嚣“折柳吹毛”，扬言要杀七个半头，头三名就是柳亚子、毛啸岑和沈长公。

面对压城的黑云，柳亚子镇定自若，他一面与沈长公等据理力

争，一面吩咐毛啸岑遍游吴江18乡镇，向各界人士说明事实真相，请各界地方人士联名具保让《新黎里》复刊。吴江县警察所命警佐李涤负责调查《新黎里》报一案。李涤字汝航，喜欢吟诗作画结交文人墨客，也是南社社友，一向敬仰柳亚子为人。李涤深入调查，主持正义，返回县警所后如实汇报。同时，吴江18乡镇各界为柳亚子抗诬，请求继续发行《新黎里》报的函件犹如雪片似的飞进吴江县署，飞到江苏省长公署。

显然，情况对柳亚子与《新黎里》大为有利。陆氏父子再次密谋，派陆陛云赶赴北京，7月16日密告北洋政府内务部，呈上文本云："窃本省吴江县属黎里市，有自称'李宁私淑弟子'之柳亚子(有伊所刻《乐国吟序文》为凭）及毛啸岑等发起《新黎里报》，鼓吹其劳农劳工等主张，专以煽惑农工各界，希图推翻资本阶级，实行共产主义。本年五月一日特刊劳动附张，措辞尤为激烈。值此乱机四伏，人心浮动之秋，地方士绅，无不震骇万状。""现在该报虽经停刊，而柳亚子等私党多人，野心未已，意图死灰复燃。……查内地民智向不开通，一经被其鼓惑，难保不蠢蠢欲动。万一发生罢工、要挟等风潮，实于地方治安大有妨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柳亚子等所办〈新黎里报〉被控案．陆陛云致内务部呈》，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四期）

8月13日，内务部行文江苏省长公署时，《新黎里》报已于8月 1 日获准复刊。作了一些策略性的调整，总编辑名义上改由毛啸岑担任，柳亚子发表文章改用"重瞳""ＹＴ"等化名。因此，8月20日，江苏省长公署向内务部呈报了查处情况云："迭据该县各公团、各绅民先后来呈：柳亚子闭户读书，万无过激思想，系被陆陛云挟嫌朦控"，"嗣据该县知事刘式巽查明呈复前来，当以柳亚子等发行《新黎里》报纸，既据一再饬查，确为公正言论机关，并由各公团等证明，以后决不至有轨外言论发生，所请准于继续发行之处，

姑准照办。”“至分湖先哲祠争执一案，并应督饬从速理结，勿任宕延，致生枝节。”（同前引）

《新黎里》复刊后，实际的主持者仍然是柳亚子，顽强的战斗精神丝毫未减。正如柳亚子在《对于本报复活周年纪念底感想》中所说:“封得住的是报馆，封不住的是我们的嘴巴。吾们一息尚存，定要和恶魔奋斗，所以复活不复活，倒也不成问题。所可怕者，复活以后，因摧残而有戒心，因瞻徇而留情面，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到那个时候，复活者只是残余的躯壳，不复活者却是贵重的灵魂，这才是我们底奇耻大辱哩！”

事后，分湖先哲祠奉县署之令迁还切问书院，同年9月20日，吴江县知事刘式巽前往致祭。由芦墟籍南社社友沈长公当众诵读祭文，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文笔出于柳亚子之手，士论大悦。

1924年，柳亚子加入了改组以后的中国国民党，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由于党务工作繁忙，特别是1926年2月，柳亚子赴上海主持江苏省的党务工作，《新黎里》报宣布停刊。

1926年，柳亚子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赴广州参加5月15 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排斥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柳亚子与蒋介石面对面地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又在全会表决时公开投了反对票。会议没有开完，柳亚子就拂袖归家。自此，杜门不出，全力以赴研究苏曼殊。

不料，陆氏父子耿耿于怀，时时刻刻窥视着柳亚子的一举一动，伺机置柳亚子于死地。柳亚子与蒋介石斗争拂袖而返一事，陆氏父子有所耳闻，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于是陆氏父子三人拿出《新黎里》报，挑出他们所谓的过激词句，用红笔圈点边上加注，诸如:“此句宣传共产”，“此句骂大帅”等等，三小子陆陛云再次出动，向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军阀孙传芳告密。10月10日，孙传芳密令吴江县署立即逮捕柳亚子和毛啸岑，有“严拿究办以正纲法”等语。吴

江县署文书陆白铭知道这一消息，连夜遣人报信。毛啸岑远去嘉善西塘，柳亚子走避邻镇平望，隐藏在姨妹的好友唐蕴玉女士家中，化名唐隐芝，与唐蕴玉兄妹相称。稍后，唐女士要赴上海学绘画，柳亚子与夫人郑佩宜跟随一起赴沪，卜居法租界贝勒路恒庆里。安顿下来后，柳亚子深居简出，继续他苏曼殊全集的编纂工作。

《新黎里》报存在了三年，发行了82期，影响巨大。由于《新黎里》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吴江及邻县闻风而动，新字号的报纸像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1923年5月，《新震泽》创刊；7月，《新盛泽》诞生；11月，《新莘塔》和《新吴江》相继问世；10月，已经停刊的吴县《新周庄》复刊，同月又有《新严墓》开始发行。这些新字号的报纸都奋力地宣传新思潮宣传新文化，为革命推波助澜。1923年10月，由柳亚子发起，《新黎里》和《新盛泽》、《新周庄》三家报社在苏州召开会议，联合结成"三新公司"。1926年元旦，吴江11家"新"字号的报纸在平望镇召开联欢会，公推柳亚子为主席，决议组织通讯社和报界联合会。柳亚子创办的《新黎里》报，不愧为"时代明灯"、"地方福音"。

复壁脱险

1926年4月底，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和江苏省党部代表侯绍裘风尘仆仆赶赴广州，准备参加5月15日开幕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柳亚子提前半个月前往羊城是想解开心中的疑团。去年8月廖仲恺先生在羊城遇刺身亡，今年3月20日，蒋介石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由，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紧急戒严，逮捕了海军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扣押中山舰，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制造了震惊海内外的"中山舰事件"。来到广州一个星期，柳亚子马不停蹄四出奔走，耳

闻目睹，综合各种信息，他发觉原先认为蒋介石是中了孙文主义学会某些人的离间计，想通过努力使“蒋能彻底觉悟”实在是太皮相太幼稚了。“中山舰事件”的主谋正是蒋介石，这是蒋政治野心的一次大暴露。他意识到革命阵营内部已经潜伏着深重的危机。

5月7日，柳亚子赶赴黄花岗，步履沉重地来到廖仲恺先生墓前。此时此刻柳亚子百感交集，低首徘徊，情不自禁地对老朋友倾吐了满腹隐忧：

乱草斜阳哭墓门，从知人世有烦冤。

风云已尽年时气，涕泪难干袖底痕。

何止成名嗤阮籍，最怜作贼是王敦。

匹夫横议谁能谅，地下应招未死魂。

国民革命军已经组成，行将出师北伐，可是即将就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是个王敦式的人物，一旦大权在握，他就会称王称霸断送革命大业。这种直觉这种担心，除了长眠地下不肯瞑目的廖先生，能有几人可以理解可以赞同呢？

尽管柳亚子已经认识蒋介石的真面目，但是他还想作一番努力。柳亚子偕同中央执行委员朱季恂、侯绍裘一起会晤蒋介石，以商讨时局的口吻提出了一些意见，可是蒋介石无法听进一言半语。柳亚子就“很不客气的教训了他一顿”。（关于柳亚子与蒋介石当面斗争的情况，转引自《答客难》，见柳亚子《磨剑室文录》）柳亚子责问蒋：“到底是总理的信徒，还是总理的叛徒？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就应当切实地执行三大政策！”蒋介石狡辩道：“政策和主义不同，主义亘古不变，政策不妨变通一下。”柳亚子再也压不住满腔怒火，大声斥责道：“你不懂得政策和政略的分别。政略是可以随时变换的，政策就不应该轻易放弃。就以政略而论，必须环境变化，才有变通的必要。总理生前，为了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所以定下了伟大的三大政策。现在，帝国主义嚣张犹昔，北洋军阀虎负如前，而

买办资产阶级，以广州而论，就曾挑起商团之变。这些都是事实胜于雄辩，难道你身负党国重任，还能瞠目不睹吗？”蒋满面通红，默然不语。柳亚子等三人拂袖而去。

在斥责蒋介石的那天晚上，柳亚子叩开了恽代英的寓所。恽代英在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兼军校中共党团书记，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柳亚子告诉恽代英，蒋介石肯定是陈炯明第二，而且蒋的乱子闹起来一定比陈炯明更大，建议恽代英采用紧急手段，派人刺杀蒋介石。恽代英听了表示不能赞同，说：“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过激呢！”（柳亚子与恽代英的谈话，转引自柳无忌《柳亚子年谱》第74页）柳亚子是急性子也是直性子，他站起来拉着恽代英的手，说：“吾谋适不用，勿谓秦无人。我们好朋友好同志，玩笑是玩笑，正经是正经，你今天不赞成杀蒋介石，怕蒋介石将来会杀你呢！”说着说着，眼泪都流下来了。显然，恽代英被柳亚子的真诚直率感动了，他说此事关系重大，自己不能擅自作主，“我们好好的考虑一下吧！”不幸的是此事竟被柳亚子言中，五年后恽代英被蒋杀害于南京。柳亚子的悼诗云：“百粤重逢日，轩然起大波。我谋嗟不用，君意定如何？矢日盟犹在，回天事已讹。苍茫挥手别，生死两蹉跎。”自注：“余在广州，曾建议非常骇人之事，君不能用。”（《有悼五首，二十年七月三十日补作》之四，见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第668页）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夕，柳亚子和毛泽东在珠江畔的茶楼上相叙。两人一见如故，品茗叙谈，纵论天下大事。在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右派等方面，柳亚子和毛泽东很有共同语言。随着交谈的深入，柳亚子再次提出倒蒋建议，毛泽东和恽代英观点相同，认为这样作会损害国共合作。柳亚子深感忧虑，他感叹说：“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要上当的。”（柳亚子与毛泽东的谈话，据陈迩东《一

代风骚》，见《人民日报》1987年5月28日）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开幕，蒋介石主特会议，他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整理党务案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交两党联席会议讨论。

对于这一提案，出席全会的中共党团内部曾有过激烈争论。毛泽东主张坚决顶住，但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事前同陈独秀商量过让步方针，命令大家接受。

5月17日，二届二中全会表决通过“整理党务案”。只有三个人反对，一是柳亚子，二是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三是国民党海外部长彭泽民。三个人奋起抗争当然无效，提案通过了。何香凝慷慨激昂，一边抗议一边顿足。柳亚子气愤之极，因为口吃半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连连拍掌赞成香凝夫人的讲话。彭泽民当场气得手足发抖，散会后对着总理遗像号啕大哭。“何香凝顿足，柳亚子拍掌，彭泽民痛哭，传为二中全会的痛史。”（《八年回忆》，柳亚子《自传. 年谱. 日记》第226页）18日，柳亚子拒绝出席会议以示抗议，不待大会闭幕，托辞得家电母亲病重促归，拂袖返回黎里。蒋介石闻报异常震怒，有意下达通缉令，后因于右任等一些国民党元老劝阻，蒋才恨恨作罢。

按照二届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规定，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包括组织部长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伯渠，和中央党部秘书杨匏安等被全部撤换。改由叶楚伧任中央党部秘书长，顾孟余任宣传部长，邵元冲任青年部长，甘乃光任农民部长，蒋介石任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二中全会上新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原定由蒋介石担任，

后由张静江代理。谭组安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就这样，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实际上都落在了蒋介石的手中。

1926年7月，国民党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战争波澜壮阔节节胜利。1927年初，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蒋介石坚决反对，他在南昌另树一帜，与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对抗，迁都之争愈演愈烈。武汉国民政府选柳亚子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以蒋介石为首的南昌行营也想以软的一手拢络柳亚子，以江苏省政务委员兼上海政治分会委员相属。柳亚子都不予理睬。

软的一手未成，蒋随即施出了他强硬的杀手锏。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抵达上海，立即召开了国民党中监委常委会议，通过吴稚晖提出的《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4月2日又召开国民党中监委全体紧急会议，通过吴稚晖提出的《请查办共产党》的呈文，会议确定197名“应先看管者名单”，柳亚子列名23。（高晓星《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和部分重要会议简况》，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61页）紧接着“四·一二”政变发生，大批革命志士被捕被杀，白色恐怖顿时笼罩了东南各省。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发布了秘字第一号令，令称：“共产党图谋倾覆本党，逆迹昭著，中央监察委员举发，并致训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于短期亟清叛乱。”“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着国民革命总司令、各军长官、各省政府通令所属一体严缉，各获归案重办。”通缉令开列中共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共193人，柳亚子列名21。（沈卫威《新发现国民党南京政府1927年通缉沈雁冰（茅盾）、郭沫若的原件抄本》，见《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四期第221-222页）

1927年5月8日深夜，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的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陈群，指令驻苏州第十独立旅旅长张镇，派出一

小股军警直扑古镇黎里，把柳亚子故居团团包围，然后敲门，他们用拳捶脚踢枪托砸。柳亚子从梦中惊醒，这敲门声异乎寻常，知道来者不善。柳亚子夫妇的卧室在故居第四进楼上最西头的一间。柳亚子马上穿过厢楼来到第五进楼上最西边的箱橱间里。箱橱间有一特殊建筑叫“复壁”，柳亚子马上钻到里面去藏身，夫人郑佩宜与女佣阿吟将边上两个矮橱一摞箱子移过来把复壁门挡住，然后镇定地叫佣人去开门。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军警穷凶极恶地闯进来，打着手电，拿了柳亚子的一张相片，到处搜查。有的盘问佣人，有的威胁柳夫人和女儿，有的爬上屋顶用电筒四处照射。柳亚子故居占地面积3513平方米，101个自然间，当时镇上还没有电灯，照灯瞎火的，军警们一时没能找到。

柳亚子藏身的复壁是暗室的一种。我国西汉年间开始出现此类特殊建筑，一般是两堵墙中间空，用以藏人的。是富家大户为了防备强盗或意外而设计的，一旦遇到变故，主人就携带金银细软暂时栖身。柳亚子故居的复壁比较简易，西面是墙，东面和南北两头都是木板，装有一扇小门，只有2.4个平方。

柳亚子在复壁内，外面的叫声骂声杂沓声，声声钻入耳朵；胸中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涌上心头。尽管藏得隐蔽，但依然是凶多吉少，于是他口占《绝命词》28字：

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

长啸一声归去矣，世间竖子竟成名。

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因功封中郎将平通侯，后以过失免为庶人，在《报孙会宗书》中表示不满，汉宣帝龙颜大怒，处杨恽以腰斩极刑。祢衡，汉末文学家，少有才辩，长于笔札，曹操要见他而不得，后终于召为鼓史，在大会宾客时欲当众羞辱他，结果反被祢衡所辱，曹操大怒，用借刀杀人计将祢衡除掉。杨恽和祢衡都因摇笔杆动嘴巴得罪上司而遭到杀身之祸，不过他们两人在世上还享受

了荣华富贵，柳亚子自问没有此等福份，而说话写文章得罪上司遭到杀身之祸却一般模样。晋朝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在刘邦和项羽争霸的战场上感叹道："世无英雄，竖子成名！"竖子，小子，阮籍指的是刘邦，柳亚子借以指称蒋介石。俗话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柳亚子长啸一声回了老家，让你小子蒋介石成名去吧！吟罢《绝命词》，柳亚子瞑目待尽。

再说外面的军警找来找去，要么是女的，要么是男佣人，一看那样子就不像是喝墨水的。也是凑巧，那天柳亚子的妹婿从40里外的莘塔镇前来作客，安歇在客房里。一个军警在楼下的天井角落里找到了穿长衫的妹婿凌光谦，以为大功告成，高声叫道"柳亚子在这里！"所有的军警都围了上来，拿出相片对将起来。相片是几年前的，有的说像有的说不像，为首的军警喝问："你是柳亚子？"凌光谦先是一惊，期期艾艾想开口，忽而一想，今天反正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假如说是，冒名顶替到时要被处罪；假如说不是，明白告诉军警自己的身份，那么军警无法交差还得找，找到天亮，像篦头发那么篦下来，柳亚子藏得最好也会搜出来。因此索性闭着嘴巴不说话。军警们见他不说话，倒犯了难。其中一个小兵灵机一动说："不错，就是他！这家伙不会说话，哑（亚）子，哑（亚）子，柳哑（亚）子！"其他的军警一听说得有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凌光谦五花大绑带走了。三天以后发觉抓错了人，找人保释出来，这是后话。

吟了《绝命词》的柳亚子命不该绝。军警抓错了人，说不定会杀回马枪，柳亚子从复壁出来马上化装，穿上当地渔民常穿的竹裙，雇了一条丝网船，天色未明就启程，摇了三天三夜来到上海。

这时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过《清党原则》，组成中央清党委员会，连续召开会议，制订《中央清党委员会组织大纲》和《清党条例》。蒋介石又接连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谨告全国民众书》，竭力鼓吹

反共清党，一场更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正在全面展开，上海首当其冲。在国内柳亚子已经无法立足了。正好，在上海美专习画的唐蕴玉女士受到日本举办画展的业师王济远的邀请，欲赴日本深造。柳亚子征得唐蕴玉女士的支持，决定再次以兄妹相称，同赴东瀛。柳亚子隐姓埋名改作唐隐芝，从黎里赶来的郑佩宜夫人改名郑佩平，女儿柳无非改名唐婉仪。5月15日早晨， 柳亚子一行登上上海丸轮。海轮驶出吴淞口，风急浪高涛声阵阵，柳亚子思潮起伏，提笔写了《东渡舟中即事》：

万里蓬山一发青， 自携琴剑涉沧溟。

年时无复飞腾意， 愁听鱼龙怒吼声 。

在日本生活了将近一年，柳亚子终于回到祖国，开始走南闯北，辗转迁徙，一直想回他朝思暮想的家乡，可是竟然直到逝世也未能成行，成为他终身的遗憾。

柳亚子郑佩宜及女儿等东渡日本留影



六、壮怀激烈的蔡寅

黎里古镇自晚清至民国年间，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名人志士，蔡寅就是其中十分有名的一位。蔡寅（1874-1934），字清任，一号青纯，又号冶民，别号壮怀、怀庐、平江遗民等。

蔡寅自幼聪明好学，读书一目十行，有“神童”之誉。12岁就能书写径尺大字，16岁离家赴同里等地求学，苦读勤练，无论是炎热的夏夜还是严寒的冬夜，照样勤奋不寐。17岁进学成为秀才，黎里又一匹骏马将扬蹄奋进，跃上广阔的社会舞台。雄心勃勃的蔡寅赋诗明志，“石性坚而贞，石灵神且异”，“攻错得石友，磨砺资国器”，他希冀自己如磐石一样坚贞，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蔡寅肚才极好，相貌堂堂，又富有政治头脑。柳家看中了这位奇男子，就把二女儿玉英许配给了他。这柳玉英不是别人，正是柳亚子的二姑母，从此蔡寅就成了柳亚子的姑夫。可是，结婚不到三年，1898年夏，玉英突患时疫不治身亡。后来蔡寅再娶，仍然以女婿的身份，偕同那位续弦与柳家来往，终其一生从不间断。当时柳亚子才十二三岁，诙谐地说自己有一位“真姑夫”，还有一个“假姑姑”。柳亚子是早熟的才子，与这位“真姑夫”非常谈得来，政治倾向相同，忧国忧民的思想更是一致。他俩是两辈人，由于志同道合，

所以朋友似地相处。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外患丛生，民不聊生。1897年，蔡寅与同里镇的金松岑、陈去病三人，效法“桃园三结义”，义结金兰，将以有为。金松岑（1873-1947）最长，取号壮游，陈去病（1874-1933）为老二，取号壮图，蔡寅与陈去病同庚，出生月份小于陈，排行老三，取号壮怀。三人在同里组织了雪耻学会，呼吁救国图存。



蔡寅

天下兴亡，匹夫有职。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蔡寅觉得自己缺乏救国救民的真本领，必须不断学习进取。1903年，蔡寅与表弟陶佐虞还有柳亚子一同来到上海，进入爱国学社读书。原先蔡寅和柳亚子等人的思想，倾向改良主义，希望中国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走君主立宪之路。来到爱国学社，结识了蔡元培、章太炎和邹容等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之后，蔡寅和柳亚子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认识到改良主义的道路行不通，要救中国只有起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

在爱国学社，蔡寅与柳亚子读到了邹容随身携带的书稿《革命军》，不禁击节赞赏，于是蔡、柳等人出资印行出版，为革命制造舆论。就这一本薄薄的二万余言的《革命军》，犹如一颗响雷，振聋而发聩，一时之间《革命军》风行海内外，一版再版。

蔡寅与邹容非常相得，他们的思想经历也非常类似。苏州博物馆有蔡寅后裔捐赠的一个扇面，上面是邹容题写的七个篆书：“保罗心事卢梭书”，落款“邹容为吴江壮怀画像”，下钤“威丹”一印。

保罗和卢梭都实有其人。保罗，也译作保禄，初期教会主要领袖之一。据《新约全书》载，他起初迫害耶稣门徒，后相信耶稣，将基督教传至小亚细亚和希腊罗马等地，最后在耶路撒冷被捕，解往罗马，被杀。《圣经》中《罗马人书》、《哥林多人书》等是他所撰写。卢梭，全名让·雅克·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强调人民有权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建立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理性王国。主要著作有《民约论》、《忏悔录》等。

“保罗心事卢梭书”使用了互文手法，完整的理解应该是：保罗的思想及著作和卢梭的思想及著作。邹容以这种文省而意存的修辞手段，为壮怀激烈的蔡寅画了像。确实，蔡寅和柳亚子他们早年考科举，支持光绪皇帝，反对那拉氏，进了爱国学社后，认识到改良之路行不通，只有革命，才是救国救民的康庄大道。邹容短短七字就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蔡寅，当然也包括柳亚子的思想历程。

可是，就在这一年的6月，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发生了，章太炎和邹容陷于牢狱，蔡寅四出奔走，积极营救，与金松岑、柳亚子、陶佐虞一起出钱聘请英国律师琼斯为章、邹二人辩护，又密写书札托金松岑带入狱中，致意章、邹二人。营救最终劳而无功，蔡寅带着痛苦的心情，离开上海，返回家乡。

半年后，蔡寅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蔡寅身在日本，心系华夏，随时随地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留日期间，他结识了民主志士陈英士，又在陈英士的引见下，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和黄兴，欣然加入了同盟会。学业完成回国，蔡被派往宁波任地方检察厅检察官，他充分看到当时官场的腐败，立志公正行事，专门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四铁斋”，这四铁是铁肩、铁面、铁骨和铁笔。他曾向结义兄长壮游解释过：“惟铁肩能担责任，惟铁面能杜阿谀，惟铁骨能矫脂韦，惟铁笔能公是非！”（金松岑《为蔡冶民题四铁斋读律图序》）1911年10月，革命军首先在武昌起义，各地革命党人

纷纷响应。11月初，陈其美在上海率军队攻占了上海制造局，设立了沪军都督府，举为都督。陈其美深知蔡寅的才能与志向，委任他为都督府军法司长。

蔡寅一心主持正义，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当时南社社友周实丹、阮梦桃在淮南起义，被山阳县令姚荣泽设计诱杀。此案激怒了全国民众，人人切齿个个扼腕。可是姚荣泽由于托庇于反动势力，依然优哉游哉。嫉恶如仇的南社主帅柳亚子急速赶赴上海，直闯沪军都督府，找到蔡寅，再找陈其美，誓死要为周、阮二烈士报仇雪恨。蔡寅力促陈其美致电南京政府逮捕姚荣泽，绳之以法，得到陈其美的首肯。于是蔡寅让柳亚子起草电报稿，拍发到南京总统府，终于将姚荣泽捉拿归案。可是没有多久，袁世凯窃取了总统大权，陈其美的都督府被撤销，袁大总统下了一纸特赦令就将姚荣泽赦免了。

袁大总统一上台，蔡寅愤恨得无可名状。1913年3月20日，又一噩耗传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延至22日身亡。侦查的结果表明此案实际的指使者不是别人，就是袁世凯。狠毒阴险的袁氏指使总理赵秉钧授意爪牙洪述祖，密令沪上应夔丞收买流氓杀手所为。“宋案”真相披露，全国舆论大哗，群情激愤。蔡寅四出奔走，力促时任上海地方检察厅长的陈英士签发传票，令袁世凯和赵秉钧到上海候审，同时悬赏缉拿洪述祖和应夔丞。恼羞成怒的袁世凯，下令裁撤江苏各级审检厅，另派张一鹏担任江苏司法筹备处长。蔡寅赶赴北京，面见司法总长许世英，陈述保留各级审检厅的理由，但是许世英顶不住压力，不敢同意。蔡寅愤慨之极而辞职。面对压城的黑云，蔡寅毫不畏惧，到处发表演说揭露袁氏的狼子野心。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势力支持下，凶相毕露，有恃无恐，使出专制手段扑灭民主势力，实现他的军事独裁。1913年6月，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被袁下令免职，国人大愤。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组织讨袁军，

发表讨袁通电。二次革命暴发了，黄兴领兵进驻南京，亲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逼使江苏都督程德全于7月15日宣布独立，不久程德全临阵退却，托病躲入上海租界。嗣后江苏民政长官应德闳也逃离南京，江苏一时无主，各方推举蔡寅。蔡寅当仁不让，奉孙中山、黄兴之命毅然进驻南京，主持江苏政局。他首先电告全省父老兄弟：讨袁是大势所趋，民主所向。勉励各地搞好治安，惩治坏人，保持社会安定。同时向社会各界筹集军饷，在军队中选任贤能，整顿纪律，动员和激励全体将士奋起讨袁。在讨袁军屡遭失利，袁军冯国璋、张勋两部直扑南京的危急关头，蔡寅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他带队来到南京的屏障钟山天堡城，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20多天，天保城五得五失，枪炮声、呐喊声，震动了整个南京城。可是讨袁义军终因力量单薄，后援不继而失利，蔡寅只得随黄兴撤走上海。二次革命失败，蔡寅惚惚如狂，为避袁氏爪牙的窥视，无奈只能暂时隐居。

蔡寅于辛亥年参加南社，入社号为204。1914年5月南社在上海愚园云起楼举行临时雅集，蔡寅到会并即席口占七绝一首：肺腑枒叉方蓊勃，幕天席地无余物。东南坛坫是千秋，中有佳人未死魂。表现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南社的希望。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1917年陈其美灵柩归葬湖州碧浪湖畔，此时袁世凯已亡，蔡寅在北京从事法律编查工作，不及参加陈的葬礼，他追思故人，眼观时局，不胜悲痛，遥赋二首以奠忠魂。其一云：伤心芳草又天涯，往事重担泪眼赊。一代英雄终蚁蝼，万方多难郁龙蛇。沉冤终古埋苌叔，弥恨何年问女娲。歇浦涛声犹似昔，故人腹痛口回车。在北京期间，蔡寅工作极其负责，适逢考核，获得二等嘉禾章和二等文虎章，并被派往广西代理内阁总理。黄郛在陈其美沪军都督府时，曾同他结为昆弟，这时就引荐他担任法律馆副总裁。当时正值直奉战争爆发，军阀纷争又起。蔡寅决意再回上海投奔孙中山参加北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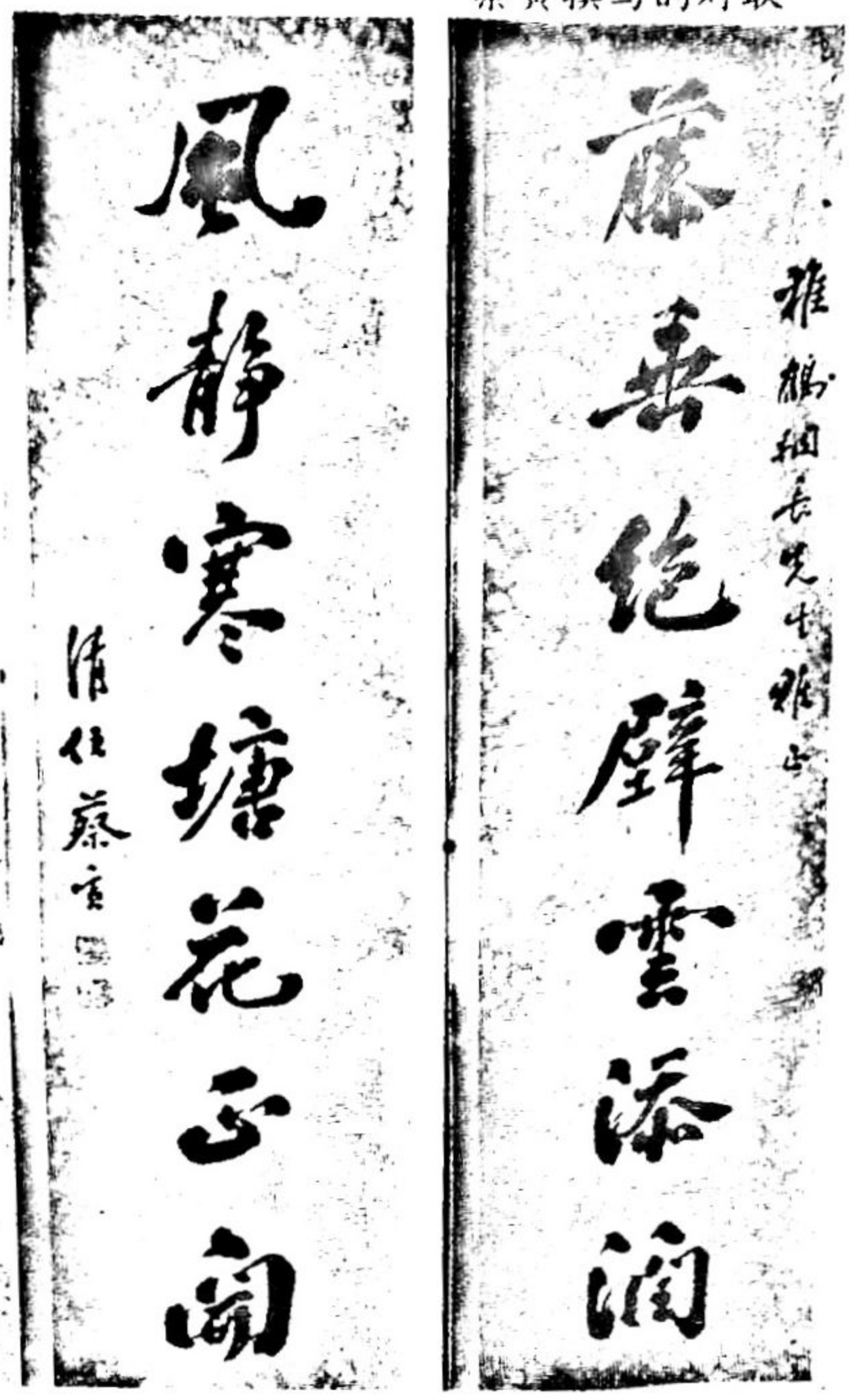
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商谈国事，蔡寅兴奋异常，追随孙中山北上准备大干一番。可是天不假年，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病逝世，消息传来，蔡寅终日痛哭流涕，想到自己壮志未酬，济世无力，挥泪离京南返，到达浦口的时候，他对江发誓：终身不复北辙！

1927年，北伐军攻占沪、宁，建起了国民政府。蔡被派往温州浙江高等法院任院长。温州山清水秀，蔡寅公务之余常常游览于山水林石之间，以消除胸中烦闷。在登屿拜谒文天祥祠时，吊古兴怀而题诗云：尚余正气镇东瓯，忍使江山付浊流。淘尽英雄存砥柱，要回天地入扁舟。盟心日月今犹炳，落照桑榆不可收。孤屿千秋遗大节，陆沉何以挽神州。

蔡寅才华出众，于学无所不窥，柳亚子主持南社文坛的时候，把蔡寅推为巨擘。蔡对诗学很有研究，善于作诗，他外出求学、游览和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写了大量的诗词，大多已经散佚，他的儿子孝宽后来收集遗稿辑成《怀庐诗钞》一册手抄本，金松岑为之作序，称“冶民与余年少共为诗，”“今展读冶民诗，乃洒落有风度，盖无意于崇唐揖宋，而自选乎诗人之庭。与山民父子（徐山民，即徐达源，参见“黎里八大姓”徐姓一节）相抗手也。”高度评价了他的诗。郑逸梅在《南社丛谈》中，对蔡寅的诗有这样的评述：“他工诗，对诗学，有他一套理论：诗也者，乃本无心之倾吐，亦有为而寄托，一人有一人之诗，一时有一时之诗，一境有一境之诗，有真性情之流露，斯有真实之证照。”

蔡寅擅长书法，12岁就能对客挥毫，写擘窠大字，长辈们都很惊异。他的书法初学苏、欧，晚似颜平原，为书法家所叹服，他的画也颇具青藤风格。蔡寅又留心乡邦文献，那清乾隆时翰林院待诏徐达源夫人吴琼仙，人称珊珊夫人的画像，刻于石碑上，立在平望莺脰湖的平波台上，后来遭遇变故而失踪。一天，蔡寅在黎里一家

蔡寅撰写的对联



豆腐店发现了，斥金赎取，让珊珊夫人回归夫婿故乡。陈去病了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特地撰写了一篇《赎碑记》以示对蔡寅的敬意。

时至今日，蔡寅留下的诗词墨迹为数不多，只在吴江博物馆、柳亚子纪念馆有四五幅手迹。这里介绍一副蔡寅所作的对联，以见他的诗词与书法之一斑：

上款：稚鹤姻长先生雅正

对联：藤垂绝壁云添润，风静寒塘花正开。

落款：清任蔡寅　下钤两方篆体印章：冶民（朱文），吴江蔡寅（朱文）。

黄元琳（1893-1943）出生黎里，南社社员，袁世凯称帝时期，柳亚子在家乡组织了南社分社酒社，黄元琳参与酒社，经常在金镜湖、开鉴草堂等地集会，喝酒吟诗，痛骂袁世凯，反对主和派。蔡寅则走出黎里，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四处冲杀，叱咤风云，演奏了一首又一首雄壮的曲子。

蔡寅与黄元琳是姻亲，两人又都是南社社友。蔡寅很希望家乡能够走出成批的有志有为的人才。可是，黄元琳才学虽好，刚过而立之年就患上了肺结核，只能居家养晦默默耕耘。1923年柳亚子在家乡创办《新黎里》报，黄元琳积极参加，出钱出力，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潮作出了努力。对于子女，黄督促严厉而有方，终于在自

已有生之年把子女都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蔡寅每次回乡，总要与黄元琳相聚。他看到黄元琳身体有病，但精神并不颓废，家境清苦，但培养的下一代颇有希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一天，蔡寅与黄元琳相叙之后，提笔挥毫写了上面这副对联相赠，

蔡寅这对联，诗中有画。描写了两种绝然不同的景色，上联一个画面，藤萝悬垂绝壁，一种险绝之境，但是“云添润”三字一出，绝处逢生，有那么多的白云缭绕，险景顿消，迎来一片蒸腾的氤氲。下联，刺骨的西风吹过，寒塘一片冰封，一种凄冷之景，但“花正开”一语殿后，那怒放着的艳艳的花朵，正吐着芬芳，立马生机一片，热闹、热烈也热情。蔡寅这副对联，寓情于景，含蓄地表达了由衷的肯定。

时日匆匆，60多年过去，黄元琳的女儿们手捧联语，反复咀嚼，不由得感慨万千。根据她们的回忆，黄元琳字稚鹤，也号自愕，学问功底颇为深厚，善书法懂绘画，为人真诚爽直。尤其是黄能写会算，一手算盘打得飞得起，他左手拨动算珠，右手执笔，边打边写，别人需要几天完成的帐目，他不消一个时辰就可以了结。黄还有一手绝技，更是令人惊叹。古人有“胸有成竹”之说，黎里人说黄“胸有算盘”，大凡加减乘除，不必用算盘，半天之内，杂沓的一大堆数字，他嘴里念念有词，手指凭空拨弄，最后报出的数据，一定丝毫不差，屡试不爽。因为有此绝技，民国初期，受人推荐参加吴江县粮食局的工作，可是粮食局内，帐目不清，官员贪污受贿，黄看不顺眼，当然更不愿同流合污，结果遭到排挤倾轧。没多少时间，黄就辞职返回黎里。“藤垂绝壁”，看来蔡寅使用了象征手法，暗示黄元琳身处险境。“云添润”，《荀子·劝学》：“玉在山而草木润”，比喻有德者足以润泽其身。因为联语描写的景色是“藤垂绝壁”，所以作者换“玉”为“云”，云也可以润身哪！《礼记·大学》有言：“富润屋，德润身。”黄元琳由于自身品质的决定，宁愿退居一隅，也不愿

与这些贪官污吏为伍。

下联“风静寒塘”，令黄氏后裔联想到贫寒的家境，正常的开销再加这样那样的花销，使本来拮据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黄元琳民国元年结婚，婚后10年育有四个子女，老大、老三为儿子，老二、老四是女儿。黄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子女成才，先让子女们在黎里读小学，再勉力读完初中，家贫无力深造，黄决定让子女们考师范，当时师范学校免收学杂费，还有助学金可以解决吃饭问题，读完师范再投考公立大学，公立大学考分要求高一些，但所收费用比起私立大学要少好多。就这样，几个子女先后进入师范学校就读，后来老大和老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分别考入复旦大学。每当节假日，寒暑假，儿女们回家来，黄元琳就在家里辅导功课、督促学习，俨然家塾一样。每年父亲都有新的举措，一年暑假，黄元琳拿出《资治通鉴》，让儿女们通读一过，说将来走上社会自会派上用场。还有一位沈月箴（1920-1981），本是平望人，跟随改嫁的母亲来到黎里徐家，因住地相近，也到黄家来与女儿黄家慧、黄苏珍和两位哥哥一起读书。沈月箴后来成为吴江有名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潘汉年等人一起展开地下工作，为革命出力。“花正开”，儿女们一个个成才，犹如怒放了的一朵朵令人羡慕的花儿。好手笔！

全联对仗工整，平仄合宜，对联犹如画幅，险夷相生，动静交替，真乃有声有色的高手。对联的书法富有特色，蔡寅诗词宗唐也揖宋。从对联的书法，可以看出苏东坡、欧阳询和颜真卿的影子，用笔丰腴跌宕，参以隶法，平正中蕴含险绝，也不乏天真烂漫之趣。

“经国有才皆百炼，著书无字不千秋。”这是蔡寅自书的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身处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他追求民主，追求进步，追求救国救民之路，可是他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宏愿。1934年，年方花甲的蔡寅因病赴上海就医，带着满腔遗憾离开人世。但是，蔡寅的人品才能，家乡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七、中国第一代影星殷明珠



殷明珠1945年留影

中国的电影已有百年的历史，第一部出现女性担任角色的影片是黎民伟拍摄于1913年的《庄子戏妻》，黎大胆地让妻子严珊珊在影片中担任角色，不过，严在影片中饰的仅为配角，女主角庄子的妻子仍由严民伟自己反串。此后8年，电影中没有女演员。1921年，终于又有女子走上了银幕，那就是《阎瑞生》中的王彩云和《海誓》里的殷明珠，前者妓女出身，从良后饰演的也是妓女，可是王彩云仅此一片就匿迹影坛；后者，担纲主演了近30部电影，殷明珠的成名比胡蝶、阮玲玉早得多，她的演艺轰动影坛，堪称我国第一代影星。

天生潜质

殷明珠（1904-1989）名尚贤，出身于书香门第，世居黎里镇北长田村，她的曾祖殷兆镛道光年间翰林，祖父梦琴，举人出身，在

浙江乌镇做官，平时好学不倦，有诗文集多部，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编著了一部《乌镇志》。父亲殷星环，进学成为秀才之后，专事丹青书法，遐尔闻名。母亲张慕莲出身举人之家，知书达礼，能诗能文，也能几笔丹青。清朝末年，匪盗横行，居于乡下可谓朝不保夕，殷星环夫妇决定迁居。黎里镇上多弄堂，一进进的石库门，一道道厚厚的键门，外人轻易不得入内。正当殷明珠牙牙学语的时候，迁居到了新胍家弄定居。

殷星环、张慕莲夫妇对于女儿，爱如掌上明珠，径以“明珠”作为女儿的爱称，后来大名尚贤不彰，明珠一名响誉海内外。也许是遗传因子的作用，也许受到家风的熏陶，明珠自小对形象、线条、色彩有着极强的感悟。5岁开始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习绘画，先花卉鸟兽，学一笔似一笔，画一幅像一幅，10岁以后，明珠要求学绘仕女，一开笔就不同凡响，笔下的女子，形体都是那么袅袅多艳，服饰都是那么鲜艳夺目。

6岁时，明珠的父母送她到黎里镇上的民立小学读书，启蒙教育遇上了一位开明的好老师。那就是民立小学创办人倪寿芝，当地有名的思想新颖的教育家。倪寿芝早年求学于上海城东女学，学成返里，1903年倾尽积蓄创办了“求吾蒙塾”，兼收男女学生。二年后，改名民立小学，设置国文、算术、自然等课程。1914年，与黎里镇另一所“明懿女校”合并，成立吴江第四区女子学校，倪寿芝任校长。由于洋学堂招收女生，改革课程，不读四书五经，遭到当地封建遗老和顽固势力的指责、攻击，倪寿芝毫不畏惧，坚持走教育创新之途。倪老师提倡男女平权，抨击传统的三从四德。在学校里，殷明珠一开始受到就是有别于传统的教育，倪老师抨击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批判德、言、功、容的“四德”，创立了“女子放足会”、“嘤鸣手工会”，鼓励女子放足，务必学会多种技能，以自食其力，争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倪寿芝办的

学校，黎里老百姓称为“洋学堂”，洋学堂内的女学生都是“洋丫头”。当时，尽管天足运动已经非常有声势，但是黎里守旧的家庭仍然要女儿缠足，好几次，倪寿芝带领一批洋丫头，去做说服动员工作，有苦口婆心的劝导，有通情达理的说理，还有滔滔不绝的演讲，总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那赤诚，那韧劲，使身临其境的殷明珠终身受益。殷明珠是洋丫头中最为突出的一位，敢于抛头露面，敢于发表意见，豆蔻年华的一颗明珠，悄悄闪耀出她的光华。

正当举家欢庆明珠的思想、学问和绘事与日俱进的时候，家庭突遭不幸，父亲得急病去世，那一年明珠才13岁。殷星环在日，喜欢购买“发财票”（就是彩票，黎里人习惯上这样叫法），去世之日正好有幸得到头奖，画家虽然已经听不到这个喜讯，毕竟为明珠母女留下了一笔不小的财产，开丧之后，数字仍旧相当可观。1917年年底，母女俩迁居浙江嘉兴，半年后再迁上海。

14岁那年，殷明珠进了上海中西英文女校，在那里，天资聪颖的明珠似鱼得水。明珠运动方面特别有天赋，身体的柔韧性极好，很快，她学会了骑马、骑自行车、驾驶汽车，更善于游泳，就连女孩子不能参加的足球她也敢于上场，与男孩子较量直至终场。各种舞蹈她一学就会，唱歌更是拿手。中西英文女校，为天生丽质的殷明珠展开了一片酣畅淋漓的崭新天地。

16岁那年，殷明珠出落得楚楚动人，身材颀长，鹅蛋形的脸庞，一双凤眼晶亮有神，不仅擅长运动，更喜欢模仿外国影星们的身姿，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尤其是善于得体地使用姿态语言。当时美国影

16岁时的殷明珠



片《宝莲历险记》正在上海上映，女主角宝莲由影星白珍珠饰演，明珠自小对服饰及其颜色非常敏感，她自己模仿着进行了一番设计，让裁缝定做了一套宝莲式的服装。明珠穿着这套自己模仿设计的服装，参加社会交际，顿时新潮的女性蜂拥而上，一时间，模仿外国影星服饰之风席卷了十里洋场。女校肄业后，殷明珠进入一家邮电局当职员。由于明珠能说会道，热情大方又彬彬有礼，一口流利的英语，使她跻身于上海滩的上流社会，悠游自如。但凡殷明珠出现身影的舞场、歌厅、咖啡厅等场所，必定人头济济，众星捧月似地围着她转悠。

一举成名

如果说天赋加上兴趣和学习，奠定了殷明珠成为中国第一代影星的基础，那么但杜宇则是殷明珠进入中国电影界的引路人。

但杜宇（1897-1972），祖籍贵州，生于江南南昌，原名祖龄，号绳武。自小聪明能干，喜欢绘画，在他13岁时父亲过早下世，从此家道中落，18岁那年，随母亲到上海，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擅长画美女，别具丰姿，当时上海的月份牌和一些杂志的封面，都向他约稿，由此名声大振，后来有《百美图》画集出版。但杜宇非常喜欢油画、水彩画和摄影，爱看电影，特别喜欢看外国影片。1920年春，但杜宇会同朱瘦菊（《歇浦潮》长篇小说的作者）和周国贤（即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以1000元的代价从一个即将回国的法国人贝克纳手中购得一架“爱拿门牌”电影摄影机。买是买了，三个人对拍摄电影纯属门外汉，不会使用，也无从请教，捣鼓了几天，仍然摸门不着，朱、周二人知难而退。但杜宇下定了决心，决意做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拆拆卸卸，装装配配，足不出户半月有余，渐渐摸到了门道，初步掌握了关节。接下来就试拍新闻片，居然颇

有成效，这一喜好比茫茫黑夜中望到了东方鱼肚白。他筹集资金办起了上海影戏公司，这是一个家庭公司，基本演员全是家庭成员，但氏自编自演自导自摄自洗，既是经理，又是家长，这就是中国早期电影的典型现象。杜宇发觉新闻片的内景与外国片相比，阴沉沉的，缺乏亮色。为了找到症结所在，他反复观看舶来片，忽然主人翁的瞳仁内有丝丝白光一闪，但杜宇恍然大悟，肯定是使用发光的物体照射所致。但氏立即制作了银色的薄板，用以反射太阳光增加亮度，一试，效果特佳。以后，电影技术进展到使用炭精灯、荧光灯、水银灯，但是影坛至今公认银光效果的创始人是但杜宇。攻克了反光技术的难关之后，杜宇决定拍摄一部爱情片《海誓》，准备在上海滩打响第一炮。所有的一切但氏都能够包揽，唯一不足的是女主角，家庭成员无人能够胜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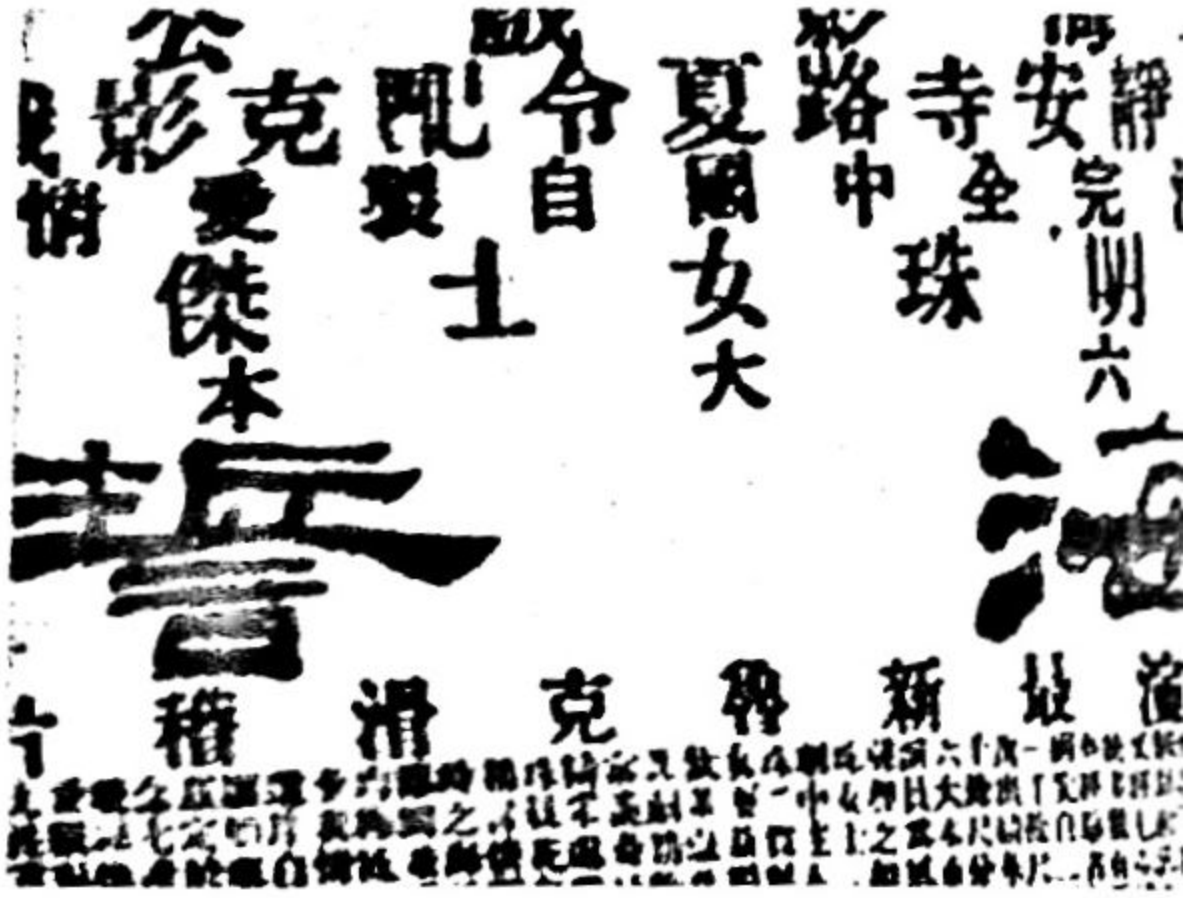
再说在中西女学读书时的殷明珠，就有“首席校花”的名声，踏上社会后，更是名动洋场的风流人物，人们称她为F．F女士(FORIGNFASHION)，意为“洋派”人物。许多杂志报刊上竞相刊登明珠的照片，当封面作广告，袁寒云等一些文人排日赋诗赞美。但杜宇看到了殷明珠的照片，非常羡慕明珠的风范，觉得《海誓》的女主角如果让殷明珠来饰演，定能生色。一打听，很是凑巧，但杜宇的一个侄女曾在中西女学读过书，认识明珠，杜宇立马请侄女作伐。当亭亭玉立的明珠出现在眼前时，杜宇的眼睛一亮，“就是她！主角非她莫属！”几句话，开门见山，但杜宇认定明珠就是理想中的女主角，明珠一向喜欢新潮，喜欢接受各种挑战，一听自己将走上银幕，就兴奋不已，两人一拍即合！

1921年，上海影戏公司的处女作《海誓》，在闸北的一块空地上搭设布景开始拍摄，编剧、导演、摄影、洗印以及美工、布景、制作等等全由但杜宇一人包揽，难怪后来但氏被人称为“中国电影的技术全才”。据上海《申报》1922年1月23日介绍：《海誓》“历时

六个月，始告完成，经七次试演，……自21000余尺中选出6000余尺，分为六大本，前后历时一年方才完成，实际是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之一。”同年1月29日首映于上海静安寺夏令配克豪华影戏院。

《海誓》故事内容洋味十足，极力赞扬男女自由恋爱，不过，此片在电影史上自有它的地位，属于“中国第一部爱情故事片”。影片描述了一个富有理想和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摩登少女福珠（殷明珠饰）与青年穷画家周选青（周国骥饰）相恋，私订终生，订婚后互相盟誓：如有负约，当蹈海而死！福珠的表兄（董廉生饰）非常富有，爱慕福珠美貌，穷追不舍，终于在钱财的诱惑下，福珠忘记了自己的盟誓，决定嫁给表兄。正当教堂举行婚礼之际，福珠忽然天良发现，幡然醒悟，念及前誓，逃离教堂，奔归画家周选青。可是选青余怒未消，斥责福珠负义变心，拒绝了福珠。羞愧不已的福珠，狂奔到海边，决意践誓投海自尽，选青见福珠情真，及时赶到，救福珠脱了险，两人尽释前嫌，终成佳偶。

《海誓》广告



也许国人看腻了中国的古装戏，全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逢旨完婚大团圆”那一套老式的婚姻三步曲，对这部模仿外国的片子，感到新鲜又新奇，情节新，人物新，服装新，思想感情新，结婚方式更新。记得上海滩有名的补白大王郑逸梅撰文说：“各家报纸纷纷登着影评，虽有挑剔陈设太欧化、生活场景处理

不妥等，但对殷明珠的表演是无懈可击，一致赞扬。”的确，中国的电影刚刚起步，没有什么技巧，全凭摸索，演员导演编剧没有分档，故事概况就是剧本，根本没有什么分镜头，更没有导演本，一部无声、黑白片，演员全靠表情和动作使观众了解剧情起因、经过、高潮和结局。可以说《海誓》的成功，全仗了殷明珠，是她成功地饰演了中国第一位女主角，她在片中能够深入角色，表演真切，形象动人，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能。明珠天生丽质，在银幕上更是光彩照人，影片轰动一时，人人争着一睹芳容为快。

与《海誓》同年拍摄的影片还有《阎瑞生》和《红粉骷髅》，《阎瑞生》由中国影戏研究社摄影，《红粉骷髅》由新亚影片公司拍摄，三者都属于小型公司，拍的又都是故事片，而且都是刚从短片尝试拍摄长片。三片分别出自小说改编、剧本改编和电影创作，奠定了后来电影的三种主要创作源头，给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无声电影创作以重要的启示和积极的影响，此时，中国无声电影萌芽已告结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杜宇，一位画家出身的导演，他刻意求美，拍摄不遗余力，制作一丝不苟。三部长片首轮均在夏令配克影院公映，听一听三片的售价，《海誓》首映票价5元，《阎瑞生》1.5元，《红粉骷髅》3元，《海誓》尽管价格偏高，但依然场场爆满，殷明珠的成功于此也可见一斑。

献身影坛

电影事业把殷明珠和但杜宇的情感牢牢地维系在了一起，尽管明珠的母亲认为女儿拍电影，似乎以色相示人，有伤殷氏门风，一度持反对态度，甚至不准明珠与杜宇往来，但是，殷明珠已经决心把自己奉献给了中国的电影，她与但杜宇之间的感情也到了瓜熟蒂落的火候。最后母亲想通了，不再以诗礼传家的旧观念苛求女儿，承

认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儿。在拍了《重返故乡》和《传家宝》之后，1926年2月1日，两人在杭州结婚，证婚人叶楚伧在致辞时说道："新郎为海上画家，为余旧友，新娘系黎里望族，与余有世谊。今日在杭结婚，而余为证婚人，其乐何如！"由恋爱到婚姻，由事业到家庭，最后叶楚伧称赞他俩"一双璧人，天作之合！"新婚伊始，杜宇和明珠吊心新片，西湖蜜月没有度完，就回到上海。友人们讨喜酒吃，夫妇两人就在摄影场地设下宴席，招待宾朋，热闹一番之后，立马又投入新影片的拍摄工作。

上海影戏公司的人员、装备和经费都有限，可以说捉襟见肘，要拍好一部电影，只有加倍付出劳动和心血。有时一个镜头卡壳了，不上不行，上又没有足够的条件。但是他们往往能够别出心裁想出点子，抓拍，抢拍，一次一次地获得成功。拍摄《飞行大盗》一片，那大盗有个犹如列御寇乘风而行的镜头，为了逼真，必须拍摄一群仰头观望空中飞盗的老百姓。这么多的群众演员，假如临时雇佣，得花好多钱，镜头仅此一用，花钱太不上算，可是不上又不行。于是两人处处留意，等待时机，其他镜头拍得差不多了，这一场戏仍旧没有拍摄。时机终于来了，那时的公司在严家阁路，后面是青云路，青云路畔的旷地边有一土墩，也不知从何处传来风声，说这儿将要做临时刑场，枪决罪犯了，一传十，十传百，拥来了一大群看热闹的，越挤越多。两人高兴极了："群众演员来了，大好机会啊！"电影中的群众，需要抬头仰望，夫妇俩灵机一动，立即让职工手持电烛，站到土墩高处，一一点亮，很自然的，群众都抬起头，仰望灿然的光芒，杜宇亲挟摄影机，把这些义务演员全都拍摄下来，再加上几个真正演员的镜头点缀其间，完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为了节约拍摄成本，但、殷二人想出了许多的奇思妙构。一次，拍一个舞蹈场面，需要打蜡的地板，可是摄影场因陋就简，没有此项设备，怎么办？二人稍一合计，有了！先把地板用水打湿，将干

未干的时候，命演员上去跳舞，摄出来的影片，地板亮晶晶的，活脱脱的打蜡地板。更多的奇思妙构出于平时的积累，但杜宇平时摄影机不离身，一旦遇到有感觉的镜头，就拍摄下来，诸如：风雨雷电、高山流水、亭台楼阁、花鸟虫鱼、市曹人群甚至邻里纠纷、民居失火等等，只要是美的，有意义的，或者相当特殊的难以碰到的，他都一一摄录保存，一旦影片需要，随时调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上海，除了殷明珠之外，还有两位凭洋气闻名全市的时髦小姐，一是AA，AceAce的缩写，意为王牌；二为SS，ShanghaiStyie的缩写，意为上海派。AA叫傅文豪，殷明珠中西女校的同学，领有上海公共租界第一张女子驾驶执照的洋小姐，具有新时代的摩登，殷明珠在《海誓》里饰演福珠成功，第二部国产片即将开拍时，她把傅文豪介绍给但杜宇，提议让傅文豪代替自己担任《古井重波记》一出的主角陆娇娜，为了使傅一举成功，明珠把自己饰演福珠的体会、演出的技巧毫无保留地一一传授给傅。明珠多么希望上海影坛能够多绽放几朵中国的玖瑰花啊！当时，傅文豪仍在读书，知道父母必然反对，好在公司的拍片安排在晚上，傅的母亲查问时，就推说在老师处补习功课，在同学处讨教习题，这样悄悄在进行着，很顺利，直到《古井重波记》拍摄完成，报纸上刊登了广告，傅的母亲终于知道了。尽管《古井重波记》的卖座率很高，社会反响很好，傅文豪高兴得几乎发狂，也想再拍第二部影片，可是傅家严厉的管束，最终使AA成为银幕上见首不见尾的一条神龙。至于那个SS，真名袁澹如，更是昙花一现，拍摄了一部片子后，嫁给了名画家、大收藏家颜韵伯，从此销声匿迹了。唯独殷明珠献身影坛，忠贞不渝。

但杜宇和殷明珠的上海影戏公司，1927年拍摄的《盘丝洞》一片，是最为卖座的片子。影片由管际安编剧，但杜宇导演，但淦享摄影，夏维贤置景，从筹备到摄制完成花去了一年多的时间。



《盘丝洞》剧照

《盘丝洞》一片的主题谈不上什么积极或者说教育意义，不过，影片源于《西游记》第72回“盘丝洞七情迷本，濯垢泉八戒忘形”，中国传统的题材，家喻户晓老少咸知。精于美术的但杜宇与布景师一起，刻意营造盘丝洞，那里蛛网密布，鬼影幢幢，阴森森，黑郁郁，整个儿的魔怪洞穴，引领人们进入了人妖不分，神怪难辨的氛围，观众几疑自己误入了魔窟。

情节上影片对原作进行了相当大的改编和艺术加工。因人员的限定，蜘蛛精由七个减至六个，殷明珠领衔饰演蜘蛛精甲，夏佩珍辅佐饰演蜘蛛精乙，再配备四个蜘蛛精。根据情节，众女妖幻化成女人之后，她们具备了一个正常女子的欲望，从而拘捕唐僧、逼婚成亲等等，中间安插了蜘蛛精裸浴、半裸舞等镜头，加上为色欲所迷惑的猪八戒，变成鲇鱼入池戏嬉众妖的场景。神怪氛围以及女妖们的表演，还有孙悟空的横空出世的打斗，观众源源不断地涌来，买座率大大高出同期所有影片，售得高价，公司大赚了好几万元。

《盘丝洞》之后，古装神怪影片盛极一时，甚至出现了南洋片商非此不购的局面。就摄影技术来说，《盘丝洞》的布景设置，别开生面，拓宽了影片题材，更开创了水底摄影的先例。

艰难跋涉

但杜宇、殷明珠夫妇拍摄叫座的影片以赢利，从而使影戏公司得以生存、发展，为此他们可以欣赏西洋的爱情，可以接纳色情场面，但是，他们决不能容忍有违于民族尊严的影片。1927年，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播映由罗克制片的《不怕死》，内中不乏侮辱华人的镜头。戏剧作家洪深当场挺身起立，高声抗议，一时群情激愤，观众纷纷涌出影院高呼“退票！”影院职工认定由洪深捣乱而起，揪住了洪深又推又搡，接着就是殴打，打过后又电告巡捕房解往法院，扬言要好好治罪。但杜宇和殷明珠二人闻讯，立即向媒体呼吁，要求支持正义，支持洪深，夫妇俩拿出巨资，聘请资深律师准备开庭。第二天一早，上海大小各报都以显著的版面刊发文章，报导事实真相，赞扬爱国心民族自尊心。还没有开庭，不请自来的律师就多达十余位，他们个个自告奋勇，愿意义务为洪深辩护。法庭最后判决洪深胜诉，影院赔偿洪深一切损失，《不怕死》予以销毁，制片人罗克向我国人道歉。

早期的上海影戏公司，素有“家庭公司”的雅号，主要演职员都是家庭成员或亲戚，但杜宇几乎包办了电影摄影的主要行当，女演员除殷明珠外，还有但杜宇的外甥女贺蓉珠、贺佩瑛，男演员有但杜宇的侄儿但子久、侄孙但淦亭、侄曾孙但二春等。随着事业的发展，上海影戏公司突破了家庭公司的范围，招聘了不少演员及工作人员。就拿《盘丝洞》一片来说，除上文谈到殷明珠和夏佩珍等6个蜘蛛精，片中角色更多，唐僧（蒋梅康饰），孙悟空（吴文超饰），猪八戒（周鸿泉饰），沙和尚（詹嘉利饰），黄花观妖道（陈宝琦饰），还有观音、道童、昂日星君等众神的饰演者。据回忆，韩云珍、史东山、王乃东、谢云卿、袁美云和王人美等都先后到公司演出或任

职。

公司人员一多，管理方面必然会出现问题。对此，杜宇和明珠两人费了不少精力，除了订立相应的制度，更多的是实行人性化的管理。

有个叫徐维翰的上海人，与公司的几位演职员友善，经常前来作客叙谈。不过此君染上了烟霞癖，一次，徐来上海影戏公司访友道故，烟瘾突然发作了，急忙躲到隔壁一间房子里，大过其烟瘾。但殷二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担心此君拖人落水，如果听之任之，那么说不定公司的演员和职工也会染上恶习。杜宇决定驱逐此人，宣布徐维翰为公司不受欢迎的人，假如此招不灵，那么下一步就报警，押送戒毒所。明珠认为，这样作可以达到目的，但也许会刺激徐氏的朋友，在他们内心留下疙瘩，拍片效果必有妨害。经过反复权衡，夫妇俩决定来一个寓劝惩于诙谐之中的活报剧。没几天，徐维翰在公司内又犯了瘾，又躲起来了。殷明珠马上嘱咐三四演员，拿出现成的警服和枪支，武装起来，直奔瘾君子而去。徐维翰正吸得起劲，突然几名警察从天而降，大吃一惊，急忙掷去烟具，站起来就想逃跑。这时，饰警察的演员忍俊不禁，哈哈大笑。徐氏才明白是假扮的，不过已经吓得浑身冒汗了。惊魂初定，但杜宇真诚地劝徐氏戒烟，后来徐氏终于戒除了烟瘾。

有一次，公司的一部影片刚刚上市，公司大门上，不知被哪个促狭鬼用粉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这是上海某些社会恶势力惯用的手法，目的大多是为了诈财。杜宇不想去理会，明珠认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经过反复分析，杜宇觉得，目前社会上的绑票，被绑的都是大富豪、大商人，掂量自己似乎不够资格，估计是公司中某个心怀不满者弄出来的小名堂。又经多方观察，初步确定是某某所为，接着，但杜宇突然邀请此人喝茶、聊天，发觉此人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内心却有许多异常反

应，断定就是他的故弄玄虚。谈话后的一个深夜，但杜宇秘密叮嘱一个工友在他家门上依样画葫芦地画上一个大白圈，杜宇认为，咱们彼此心照不宣，事情就此偃旗息鼓吧。明珠则认为，职工这样作，一定有他的不满或者其他原因，因此她对这位职工特别关心，相遇时，总是主动和他打招呼，后来，这位职工生活上碰到了困难，殷明珠动员但杜宇一起在经济上帮助了他。从此，那位职工内心的芥蒂彻底烟消云散，工作也更卖力了。

公司中有一个姓丁的职员，工作上颇有一套，但、殷二人比较看重，可是这个小丁虽早有妻室却仍旧喜欢拈花沾草。一段时间，小丁盯上了一位女演员，纠缠不清，女演员心神不定，排练时难于进入角色。女演员向殷明珠诉苦，殷略一思索，决定将计就计。一个星期天，女演员在明珠的陪同下，前往小丁家。那天女演员靓装艳服，神采飞扬，一到小丁家，就和小丁有说有笑，一副昵态。小丁神魂颠倒，身姿和眉眼之间时不时流露出垂涎欲滴的腔调。小丁老婆见了，当然醋性大发，和小丁大闹起来。殷明珠及时介入，双方约定，小丁交给老婆严加管束，女演员方面的工作，由明珠负责。小丁终于逐渐循规蹈矩了，虽有天鹅，也不能作癞蛤蟆之想了。令人头痛的性骚扰，就这样被明珠巧妙拆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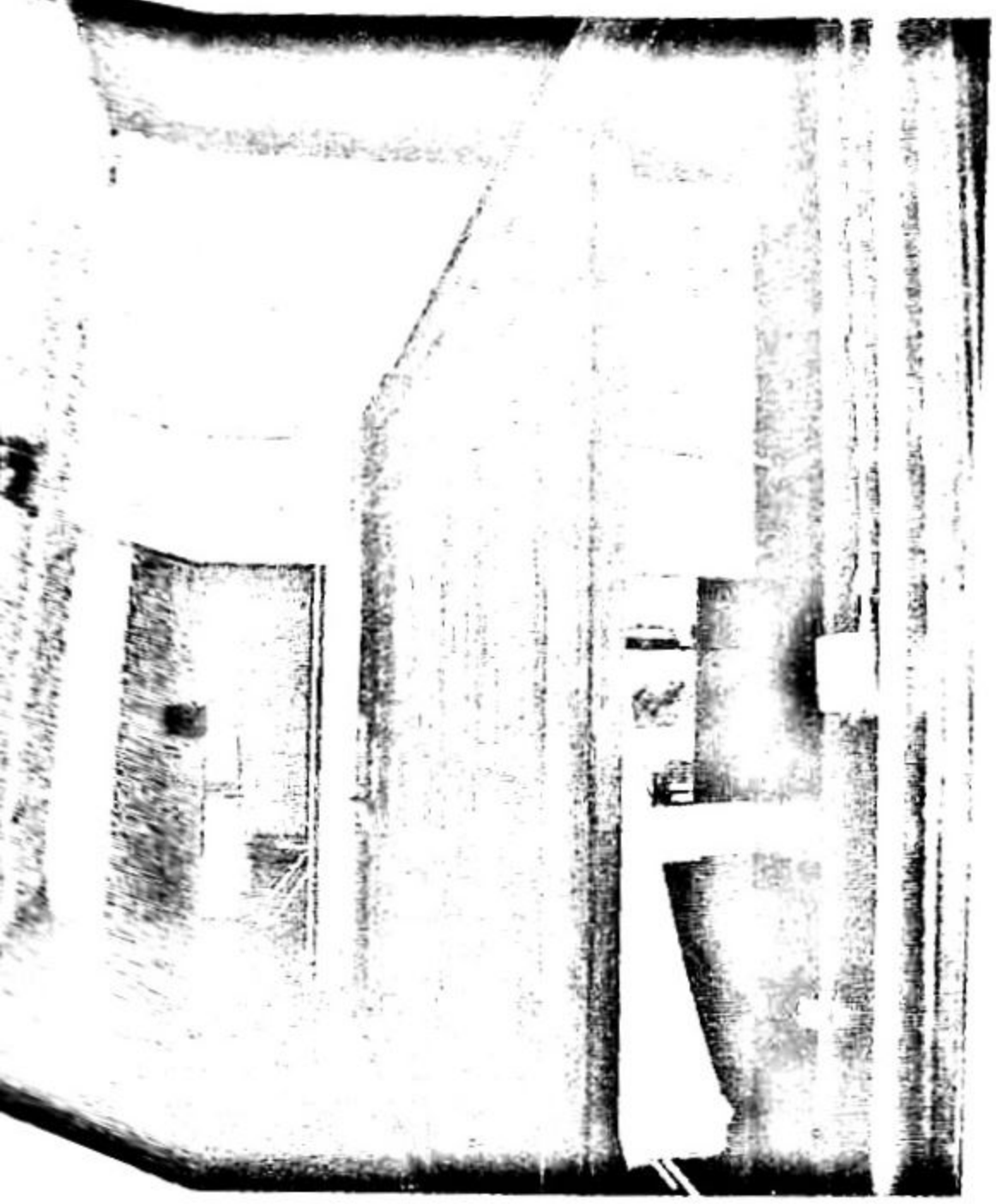
《盘丝洞》着实使上海影戏公司赚了一大笔，但杜宇决定拍摄古装片《杨贵妃》，这时明珠有孕在身，无法出任角色，杨玉环由贺蓉珠担任。公司花了血本，投入了大量资金、物力和人力。贺蓉珠作为女主角，显然没有殷明珠的卖座率，上海各影院上映此片，越到后来观众越少。《盘丝洞》的拷贝南洋一带购买最多，不料南洋喜欢看时装片，《杨贵妃》不受欢迎，拷贝推销不畅，公司血本无归，濒临倒闭。明珠没有怨言，拿出自己全部私蓄，将首饰之类的贵重物品尽行典质，撑持起公司的重担。

在但杜宇的主持下，殷明珠主演的无声电影将近20部，除《海



殷明珠故居南花园

殷明珠故居部分内景



不忘桑梓

誓》和《盘丝洞》外，主要的还有《重返故乡》、《传家宝》、《飞行大盗》、《金钢钻》和《南海笑人》等。1928年，上海影戏公司并入“六合公司”，1930年加入联华公司，但杜宇、殷明珠原属的上海影戏公司称“联华五厂”。1932年日寇进攻淞沪，联华五厂的摄影棚毁于炮火。1934年，但、殷夫妇东山再起，他们租赁福生路俭德储蓄会的健身房，独立创办“上海有声影片公司”，决意拍摄有声片。殷明珠先后主演了有声影片《媚眼侠》、《画室奇案》、《豆腐西施》、《古屋怪人》、《东方夜谭》、《桃花梦》和《富春江上》等多部。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公司的摄影棚再次毁于日寇的炮火，杜宇和明珠移居香港，始终念念不忘重振旗鼓，可是但杜宇由于屡遭打击，心境身体都受到巨大的创伤，无法如愿。杜宇晚年患了肠癌，在明珠悉心的照料下，时好时坏好几年，1972年5月6日这位电影界的全才终于遗憾地离开了人世，享年75岁。

再说《海誓》在上海轰动了整个影坛，黎里的家乡父老听了振奋不已。黎里是个建于南宋时期的古镇，文化积淀深厚。黎里新蒯家弄有个“蒯厅”辟有书场，专说苏州评弹。听说殷明珠担纲主演

的《海誓》蜚声海内外，蒯厅主人当即赶赴上海，找到明珠，说明来意，希望《海誓》能够到黎里蒯厅去放映，让家乡父老一饱眼福，明珠一口答应。哪知《海誓》到蒯厅一映，四乡八村，周边市镇的观众接连不断地拥来，盛况空前。原定放映三场，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本来只能晚上放映，为增加场次，蒯厅四周围上厚厚的黑色窗帘，白天加映；原打算下午加映两场，后来干脆从早晨开始，一场映完再接一场，周而复始，就这样整整连放了一个星期，才勉强结束。家乡父老好评如潮，大家都为黎里出了电影界的一代影星而高兴。从此以后，黎里古镇开了放映电影之风，只要有新影片问世，黎里总千方百计要来放映。明珠知道乡亲们爱电影，凡是她后来拍成的影片，以及上海滩新上映的片子，都让家乡父老一睹为快，这一来，使本来不算闭塞的古镇，更与上海这样的开放城市拉近了距离。

殷明珠的父亲殷星环在日，曾经多次说起租房的不便，想要建造一幢属于殷家的住房。1925年，殷明珠将父亲购买彩票遗留下来的部分钱款，再加自己的积攒，在黎里镇夏家桥北堍建造了一幢气派的西式洋楼。楼房落成之后，明珠每隔一二年总要返回家乡居留几天，与亲友相聚。1935年早春的一天，明珠从上海乘轮船，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抵达家乡已是暮色苍茫的傍晚，天公又不作美，一阵阵的蒙蒙细雨。那时的轮船码头建在镇的最西头，距望平桥还有好长一段距离，灰暗的天，灰暗的地，欢迎的乡亲们将一条小道挤得水泄不通。明珠从跳板上下来，忙着同乡亲们打招呼，前脚刚刚落地，还没开步就倒了下去。“哎呀！小心！”“伤着了没有？”欢迎的人惊叫的惊叫，询问的询问，一阵骚动。明珠站起来，朗声说道：“不碍事，不碍事，我先给乡亲们请个安，请个安！”事后，殷明珠知道，从镇上到轮船码头一里有余，尽是窄窄的泥路，码头更是简陋，只垒了几块石头，七高八低的，一不留神就会跌倒。在黎里逗留了几天，临别时，她拿出5000银元，给黎里西半镇的镇长，

让他主持工程，用花岗岩条石修建一个码头，再铺设一条石子路。在1964年之前，黎里没有公路，这轮船码头一直是黎里人出行的起点，更是迎接游子归来的重要平台。

一年以后，轮船码头竣工，殷明珠再次返里，受到了家乡父老盛大而又热烈的欢迎。抗日战争开始，殷明珠迁居香港，可她时时系念家乡，好容易盼到了日寇投降，她千里迢迢回到黎里，与亲朋好友，与家乡民众，共庆胜利。此后，每隔三五年，必返里省亲一次。文革开始，殷明珠省亲之路被阻，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79年，殷明珠已经75岁高龄，她最后一次回到孕育她的故乡，居留半月，会见了亲戚朋友，拜访了邻里乡亲，巡访了儿时的种种足迹，不胜沧桑感慨之至。

殷明珠与但杜宇有个女儿但菜迪，菜迪承袭了父母双亲优良的遗传，天生美人坯子。1952年，菜迪参加“香港小姐”的评选活动，这一届的香港小姐首次同“世界小姐”接轨，获胜者无需参加世界小姐的预选，直接可去美国进入世界小姐的竞选。赛事在丽池花园夜总会举行，参加预赛的有40位佳丽，筛选后复赛是20位，取10

殷明珠晚年像



名决赛。通过三轮角逐，又通过便服、礼服加泳装的展示和表演，年仅21岁的但茱迪艳压群芳，脱颖而出荣获“香港小姐”的美称。获封香港小姐之后，但茱迪赴美国参加世界小姐的竞选，表现不俗，获得了第4名的佳绩，在当时那是东方美人在世界小姐竞选中的最好名次。茱迪的美貌和气质，引起了美国环球电影公司的兴趣，环球公司立即邀但茱迪签下演出合同。为了更好地造就这颗好苗子，环球公司让茱迪接受为时半年的演艺培训，受训期间给予每周250美元的薪金。培训结束，但茱迪依约参演了著名影星尤伯连纳主演的名片《国王与我》，饰演其中的一个嫔妃，演出非常成功，正当环球公司寄予厚望的时候，但茱迪却息影银幕，与一位姓胡的美籍华人结婚了，此后，相夫教子，为家庭默默作出奉献，但茱迪至今生活在美国，也许这就是典型的东方美女的归宿吧。

1989年，一代影星殷明珠香港逝世的消息传到黎里，家乡人默默哀悼，黎里镇文学和书画沙龙的一批知识分子聚集一起，缅怀这位为电影事业作出了不巧贡献的乡贤前辈，合作了如下一副挽联：

影坛肇基，往昔伉俪同奋力；桑梓受惠，至今里人感深情。

1932年殷明珠



《桃花梦》剧照



八、东京审判中的倪徵噢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正义的审判，这次审判对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保卫亚太与世界和平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法官肩负祖国的重托，在南京政府发动全面内战无暇他顾的困难情况下，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对法西斯战犯的刻骨仇恨，团结战斗，代表中华民族参加了这场伸张正义、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庄严斗争，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著名法学家倪徵噢先生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倪徵噢



根据《波茨坦公告》，盟国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经与受降诸盟国进行磋商后，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审判甲级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英国、法国、苏联、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印度、菲律宾11个国家组成，于同日开始工作。

东京受挫

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出了司法官员，选定了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汝璈作为东京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向哲浚为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

梅汝璈和向哲浚带着秘书到达日本东京就职，还未参与工作，就差一点退出审判法庭。原来各国约定，法官的座次按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上各受降国签字的顺序决定，这样中国法官就与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著名律师韦勃爵士一起，处于中心位置。不料开庭前，英国和荷兰代表竟然要求把他们的座位排到中国的前面，也就是他们要处于中心位置。梅汝璈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座次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于是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滔滔不绝据理力争，畅谈了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巨大贡献，声明决不允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会上列强欺辱中国的事件重演。假如要移动座次，那么中国司法人员只能退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强硬的态度迫使西方法官对中国法官刮目相看，梅法官最后还是坐到了原定那个显著的位置上。

座次问题是解决了，但笼罩在东京国际法庭上的气氛却实在让人困惑。中国的司法人员明显地感觉到，血债累累的日本甲级战犯在美、日当局的庇护下，态度十分猖狂，竟公然叫嚣："我们是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好朋友，我们是为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独立而战，我们没有罪反而有功！"

中国政府对审判日本战犯的准备很不充分，甚至可以说是差劲，草率！

远东军事法庭开庭之前，各国派遣司法人员前往东京的阵容都

相当强大。就拿对日宣战仅仅一个星期的苏联来说，他们计划参加检察工作的人员超过了70名，后经盟军总部调整，才减为30名。诺大一个中国，派出的检察人员区区不过9名。

中国大陆的司法审判一向采取纠问制，审讯提问主要由法官主持，英美采取告诉制或者叫对质制，审讯提问主要由双方律师担任。双方都凭证据说话，证据本身是否合法，有无凭信力，由双方辩论，凡是法官认为不合法或证据无可凭信的，当庭拒收；反之，法庭才予以接受。在英美制度下，律师的作用非同小可。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当时美苏之间的对峙已经形成，美国从政治和军事需要出发，不拟对日本军国主义严加惩处。因此，允许日本组成庞大的辩护律师团，由日本颇有名气的律师鹅泽聪明、清濑一郎出任日本辩护团正副团长，此外，还有一些美国人充当起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前不久的“纽伦堡审判”，为纳粹战犯辩护的律师，几乎清一色的德国籍，决没有盟国国籍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只规定法庭使用的语言，不提律师的国籍。于是就在日本律师不谙法庭所运用的审判程序之类的借口之下，每一个日本战犯居然配备了一名甚至两名美国辩护律师。这些美国律师，喧宾夺主、态度嚣张，与日本辩护律师团一起，与主张宣判日本甲级战犯无罪的印度等国法官互相呼应，使审判进程受到严重的影响。

东京审判是从1946年5月开始的，第一阶段，主要审理中国受侵略的问题。中国方面本来没有估计到审判战犯会如此复杂，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侵略者，审判充其量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有料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简直是苛刻。因此东京审判的最初几个月里，正当中国提出主要的控诉事实时，美国辩护律师利用英美诉讼程序的特点，多方阻挠多方留难，中国的检察工作陷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一次，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秦

德纯到庭作证，秦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就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席。

东条英机因为制造了太平洋战事，袭击珍珠港，美国不会放过他，要处极刑，早已成为定局。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已经有国际难民组织人员、外国籍传教士以及屠杀中幸存的中国受害者作证，因此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日本统帅松井石耕罪责难逃，也是必死无疑。然而，自始策划“九一八”事件，制造“满洲国”等傀儡组织的板垣徵四郎，还有猖狂进行特务活动的土肥原贤二，对照“证据法则”来看，似乎还不够确凿。这两个家伙如不处以极刑，受尽苦难的中国人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接受重任

梅汝璈忧心如焚，一再电告国内请求增援，要求来人带上确凿的证据资料。没等回音，向哲浚动身回国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司法部报告，请求立即增员支援。当他得知倪徵燠（1906-2003）刚从美英两国考察司法回来，熟悉英、美的法律程序，立即点名聘请，可是由于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已经明确，只能聘任首席顾问。向哲浚满怀歉意想要作些解释，倪徵燠哈哈一笑，表示自己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

倪徵燠出生于吴江县的古镇黎里，1919年毕业于吴江县第四高等小学，1923年毕业于沪江附中，因学业优秀直升沪江大学，选读文科，后来转学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1928年获法学学士学位，1929年留学美国，获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接着任美国约霍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1931年回国，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持志大学、重庆朝阳学院等校讲授国际法、国际私法、法理学等课程。多次出国考察司法制度。他的一生始终没

有离开一个“法”字，教法律、当律师、定法规、任法官，他把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中国法制事业，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倪徵噢是一位富有爱国心的法官，长达14年的抗战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祸害最深的劫难，苦难的14年岁月，日本帝国主义100万虎狼之师肆意践踏着华夏美丽富饶的土地，中国400万将士被迫奋起保家卫国喋血沙场，1800万百姓惨遭杀戮，1000亿美元的财产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掠夺，损毁！14年哪，多么漫长的煎熬！而今终于盼来了胜利，盼来了东京审判，倪徵噢时时刻刻都关注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及其进展。

倪徵噢接受了聘请，与向哲浚商议，组成顾问团前往增援。可是，当时内战已经爆发，蒋介石等国民党要员正忙于对付共产党，无暇处理东京审判所产生的问题。听说中国法官在东京陷入困境，大多数的官员都不愿涉足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倪徵噢会同向哲浚马不停蹄地奔走，终于聘定了上海律师鄂森和桂裕，南京中央大学法学教授吴学义，组成了一支精悍的生力军。

危难之际受命，照理应该立即前往东京。可是，倪徵噢了解到，东京检察方面陈诉分为几个阶段，关于中国部分已告一段落。目前正值太平洋战争阶段的审理，中国方面应当抓紧这段时间，多做准备。凭着多年来的经验，倪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世界一流的对手，他们熟悉英、美的法律程序，要战胜这些不可一世的对手，必须人证物证俱全。英、美司法，讲究的是证据，当务之急是迅速掌握一批能够制服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徵四郎等侵华元凶的罪证材料，最终将这批死有余辜的刽子手送上断头台。

决定了就立马付诸行动，倪徵噢首先走访了曾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秦德纯，秦是国民党第27军宋哲元的部下，出任过北平市长，与十恶不赦的土肥原打过交道，签订过所谓“秦土协定”，秦把自己所知道的土肥原的狡猾和恶行和盘托出。当倪徵噢问到东

京审判的情况时，秦叹了一口气说："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

情况严重，倪徵噢感到土肥原贤二是一头狡猾的狐狸，他在侵华战争中历任日本军方重要职务，但他一直躲在幕后操纵，总是隐藏在重大历史事件的最深处，要抓住他揪他出来，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还有那个板垣徵四郎，也是非常难于对付的傢伙。

倪为此绞尽脑汁，终于他想起已经被国内法庭判处死刑的罪犯。他想到了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赵欣伯，"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揖唐和南京"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他们都关押在北平监狱等死，可以劝说他们写一点关于土肥原和板垣的材料，这些死囚，随时可以执行死刑，也随时可能病死狱中，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次日，倪徵噢和鄂森驱车前往河北高院拜访了邓院长，然后去了设在陶然亭附近的第一监狱，邓院长事先暗示罪囚，有人要来为东京审判取证，能够有效地合作或许可以减轻刑责。可是，当倪徵噢他们到达监狱时，据说梁鸿志和王揖唐"昏迷不省人事"，只有赵欣伯神志清醒，对答如流，并表示愿意写些材料。

赵欣伯在北方法律界里是有些名气的，早年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东北历任高官，"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曾找他继土肥原出任沈阳市长，此人聪明机警，但反复无常。初次谈话，赵满口答应合作，几天后见面，忽儿变卦，态度蛮横地说："对不起，土肥原够朋友，他把沈阳市长的职位让给了我，我不能对不起老朋友！"倪徵噢耐心地教育他不能忘记民族气节，要他交出材料，赵冷笑连连。原来他对写书面材料能否减轻个人罪责，连日来将信将疑，接下来又听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将有出头之日，因此将所写材料，投入火炉一烧了之。

倪徵噢没有泄气，通过介绍，找到了北平吴佩孚的公馆访问吴的遗孀张氏。吴本是北洋军阀的领袖之一，思想反动，但据称他个

人私德“高超”，曾被日军认为有“号召力”，后来隐息家园。日本人认为可以利用，当时任陆相的板垣及特务头子土肥原就想利用吴佩孚与辛亥革命后出任民国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合作，成立一个颇有规模的傀儡组织。土肥原在上海设立了专门机关，密谋“吴唐合作”。计划没有实现，唐绍仪在沪被人杀死，吴被日本牙医毒死，这段历史，当时尚未广为透露。倪徵噢去访问张氏，了解到那天日本医生在楼下为吴治牙，注射了一种药剂使吴立即晕倒，张氏闻讯下楼，吴已经气绝身亡。后来，在东京审判中，关于“吴唐合作”的阴谋也是土肥原、板垣罪证的一部分。

倪徵噢与鄂森、桂裕、吴学义等人，四出奔走，到南京、重庆等地实地考察，赴国民政府军政部、司法部等机构仔细搜寻，终于获得了日本战犯不少的罪证。

就地取材

倪徵噢一行四人来到东京，受到了梅汝璈、向哲浚等人的热情地欢迎。欢迎会过半，直奔工作主题，不由得人人心情沉重。东京审判主要分三阶段：(1)检察官综合陈述和提证；(2)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3) 各被告个人辩护和提证。最后由法官评议并宣告判决。倪等四人到得东京，已经过了陈述和提证的第一阶段，即将进入第二阶段，被告方就中国、苏联、日德意轴心国缔约、太平洋战争等问题逐一进行综合辩护的阶段。

问题明显地摆在中国司法人员面前，错过的时机无法挽回，只有在被告土肥原、板垣进行答辩反证时，中国检察方面提出反证的反证，好，就利用战犯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我们重新提出有力的新证据。

还有一个麻烦，土肥原和板垣的控诉任务早先分配给了菲律宾的罗贝茨，必须争取复归中国方面负责。法庭开庭前，盟军方面鉴

于中国检察力量过于单薄，把对土肥原和板垣的控诉任务给了罗贝茨。向哲浚当即向检察长季南提出，中国检察力量较前充实了许多，土肥原和板垣二人的控诉工作应当复归中国。季南表示理解，不过，他认为土肥原、板垣两人在太平洋战事期间，先后在东南亚地区任日本侵略军指挥官，犯下了残害当地军民的严重罪行，由菲律宾检察官员担任主诉并无不妥，再说罗贝茨已经认真地进行了准备。季南建议我们直接去同罗贝茨商量。事不宜迟，倪徵噢马上会同向哲浚找到罗贝茨，双方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开门见山说明来意，罗贝茨也坦诚相见，最后约定分工，罗贝茨负责关于东南亚地区对两被告的反诘，中国检察人员专门对土原肥和板垣就中国问题辩护时进行反诘。

为了对证人、被告在反诘时补提证据，我们的证据必须确切有力，必须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于是，大家一次次开会商议对策，分头到日本图书馆、日本外务省查阅资料，最有价值的是要求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找寻日本侵华战争时有关土肥原和板垣的罪证。中国检察组决心要在被告辩护时挺身而出，严惩侵华主要战犯，当时受到整个法庭的注意，因此提议很快得到支持，顺利地进入了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可是卷帙浩繁，要找寻出有力的有针对性的证据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摘抄、翻译、整理，再根据资料拟出发言材料，全体中国司法人员通力合作。

倪徵噢他们想到祖国，想到家乡父老遭受的种种折磨和劫难，如果主要战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还能说什么维护世界和平？主持国际正义？还有什么面目回国去见江东父老？当然，身为检察人员，倪徵噢明白，今天审判日本战犯，决不是以牙还牙的单纯的复仇主义，从国际法的意义来看，主要在于维护世界秩序、张扬国际正义，为持久的世界和平扫清道路。明乎此，中国的检察组人员同仇敌忾，知难而进。组内的吴学义及刘子健两人深谙日文，阅读速

度超乎常人的想象。其他人员，在干中学习，好在中日两国文字有相似之处，辨别文件的标题和类别并非难事。除了准备材料，还常常研究对付日美律师的策略，甚至在住所内摹拟法庭的控诉演习，为了保密，为了防止窃听，检察组在交换意见、讨论罪证、摹拟演习时，大多使用上海方言，还创制一套暗语，比如称土肥原为“土老二”，板垣为“板完”等等。连续工作几十个日日夜夜，搜集到了日本战犯大量的罪证。

勇挫土肥原

审判土肥原贤二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一场攻坚战，名副其实的重头戏，倪徵噢会同中国法官立下了汗马功劳。

土肥原人称“东方的劳伦斯”，老谋而又深算，身处审判席，态度依然蛮横，且听他的扬言：“我土肥原要让中国人、美国人瞪大眼睛看看，真正的日本武士在失败时刻，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是个什么样子！”气烟嚣张之极。他认为中国方面不可能抓住他的什么重大罪证，所以大言不惭地为自己涂脂抹粉甚至大肆表功。倪徵噢决定先给土肥原一个下马威，他在发言中指控土肥原在中国犯有贩卖毒品罪：“日本魁首土肥原贤二利用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作为征服中国的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准备侵略并配合侵略中国的武器。这违背了日本签署禁止麻醉品的国际公约后所承担的责任，我们要指出，在日本武装侵略的前卫各地，都有日本代理人，既有军队的，也有民间的，从事非法贸易，大规模贩卖鸦片和其他麻醉品。这种贸易遍及中国的所有地区，那些代理人到从前不知道有海洛因、吗啡和其他鸦片制品的地方去生产上等毒品。”

这一发炮弹击中了要害，土肥原不由得不安起来，只听倪徵噢以更激愤的语调说：“简言之，有证据证明，日本拨款进行鸦片和其

他麻醉品贸易有两个目的，破坏中国人民的坚韧精神和抵抗意志；获取主要收入供日本进行军事与经济侵略。”

陷于狼狈的土肥原忙示意准备多时的证人出庭为他辩护。

第一个证人是土肥原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时的新闻课长爱泽诚，此人一开口就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倪徵燠质问道：“你在土肥原手下工作，1935年曾发动一次政治攻势，以向长城内派遣5个师并让满洲国皇帝进北平作威胁，要在华北建立一个独立国，你知道这件事吗？”爱泽诚一摇头，推得干干净净：“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倪徵燠紧追不舍：“为进行上述活动，1935年11月土肥原到过北平和天津，你知道吗？”

爱泽诚估计关系不大，就回答说：“知道。”倪徵燠不动声色，又问：“各国报纸都报导，土肥原在天津和北平的活动都同组织华北五省自治有关，你知道吗？”爱泽诚矢口否认：“当时报刊可能登载过那类报导，但我现在记不得了，我认为土肥原将军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倪徵燠耐着性子从爱泽诚的职务入手打开缺口：“既然你是新闻课的领导人，负责搜集情报信息，你读过那些报纸的报导吧？”爱泽诚无法否认：“我想，我读过。”倪步步诱敌深入，问：“日本驻沈阳军事使团搜集来的情报交给谁？”爱泽诚不知计，马上回答：“交给（关东军）司令官。”倪徵燠见愚蠢的爱泽诚已经入彀，就拿出爱泽诚签署的一份报告，语含讥讽地说：“这份报告是你们使团新闻课撰写的吧？当时你在那里任职。”爱泽诚接过一看傻了眼，只得承认说：“这是军事使团撰写的报告。”倪徵燠乘势发起攻击：“这一页上写着：‘一提起土肥原和板垣的名字，就足以使华北人民胆战心惊’，你看到了吗？”爱泽诚心头一阵慌乱，急忙把话头引开说：“我可以先说说这个报告吗？这是驻奉天（沈阳的旧称）军事使团撰写的报告，这类文件呈递给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副部和陆军省次官。”倪徵燠问：“但你没有回答我提出的问题。”爱泽诚慌忙回

答:“我还没有说完,土肥原将军掌握的沈阳特务机关,只是收集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土肥原将军忠厚坦白,完全可以信赖。”

面对爱洋诚左一个右一个“忠厚坦白”,成竹在胸的倪徵噢手拿一叠报纸,一叠1935年的沈阳特务机关专门用来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奉天特别机关报》,指着上面的报导说:“请看,这张报纸的首页盖有土肥原的印章,上面记载了沈阳特别机关在中国许多城市的阴谋活动,有一张清清楚楚这样写着:‘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就有谈虎色变之慨’,这是土肥原和板坦两人残害中国人民凶狠如虎的真实写照!”

爱洋诚面对铁一般的事实,不得不低下了头。这时不识相的美国律师沃伦上校,走上了辩护席说:“庭长阁下,刚才所说是在谈论老虎,与本案无关,不应讨论。”沃伦的话不是缘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话音刚落,在场不少人员面露讥笑。倪徵噢抓住时机语含辛辣地朗声说道:“谈虎色变是中国的一句成语,华南的老百姓说到土肥原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得脸色都变了……”法庭上全体人员听到这里,不禁窃窃讪笑。铿锵有力的话语,掷地有声,倪徵噢进一步从提供证据的程序规则方面解释道:“证人爱泽诚开口闭口说土肥原“忠厚坦白”,这在证据法内称为品格证据,我现在针对这一陈述提出土肥原的为人如同猛虎,这完全符合证据法内反诘时提出的证据必须有针对性的要求!”爱泽诚和沃伦犹如丧家犬一般,只能灰溜溜地下台。

土肥原提出的另一证人是日本前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土肥原奉命去天津,旨在运动废帝溥仪去东北充当傀儡皇帝。日本外务省担心这样的操作会使外交处于被动,指示桑岛主计前往劝阻,但是土肥原居然独断专行,依然挟持溥仪去塘沽,桑岛发出专电,报告外务大臣币原,说土肥原不听命令,我行我素,煽动天津保安队起事,将溥仪装在集箱内运往塘沽,登船后再转运大连去

东北，历历如绘。

倪徵噢当庭宣读了桑岛最早给法庭提供的如下书面证词："作为一个总领事，我搜集到有关被告人土土肥原贤二的各种消息（我认为他的活动同上述满洲事变有关），并利用电报把秘密消息转达给当时的外相币原或外务省亚洲司司长。其中一些电报已作为公诉方的证据交给法庭。"

此一时彼一时，提供了证词后的桑岛，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压力，一上证人席就极力想冲淡他原先所提供的证词在庭审中的影响，狡辩说原先的证言是他听信了流言蜚语写出来的，很不可靠。倪徵噢当即诘问说："电报中讲你和土肥原的几次谈话，是不是外边的流言呢？"桑岛沉默不语，倪又问："你是否知道应当延迟计划的实施？"桑岛说："我得到过外相的指示。"倪追问："这就是说你发出这种信息并不属于通常的电报往来，而是对币原指示的回答，是这样吧？"桑岛点头称是。倪徵噢抓住对手的把柄："证人先生，你在书面证言的最后一段说：'至于我同土肥原直接会晤问题，据我的记忆，我同他会晤过两次，我们的谈话只是交际性的'，可是你给币原的电报中，曾提到你同土肥原谈过好几次，这是真的吗？"桑岛矢口否认道："在任何一份电报中，我都没有引用过自己同土肥原的谈话……"倪徵噢见桑岛当庭撒谎，于是拿出一份桑岛给日本外相币原的电报，电文称："我已两次详尽无遗地向土肥原指明，他不能采取那样草率的行动，但他仍然打算推翻张学良政权，我担心，不久他将在天津策划一起新事件……"

倪徵噢拿出一个桑岛拍发的电报复印件，交于桑岛，电报上不仅有关于土肥原活动情况，还有桑岛自己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各种消息，然后倪徵噢引用了当时上海、南京和北京的日本领事某些电报作佐证。倪徵噢让大家看清了土肥原，他恣意蹂躏中华民族，达到了一意孤行丧心病狂的地步。这时的桑岛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垂

头丧气地离开了证人席。

土肥原所举其他证人，大多是避重就轻，软弱无力，证言前后矛盾，毫无凭信可言。

倪徵噢和中国法官乘胜追击，又揭露土肥原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策划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等罪行，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判处土肥原绞刑奠定了基调。

再挫板垣

板垣徵四郎是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和元凶，他按照同土肥原等人事先密谋的计划，派日本工兵偷偷炸毁了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恶毒地嫁祸给东北军，板垣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命令早有准备的关东军向东北军的北大营发起攻击，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板垣的直接策划、指挥下爆发了。

为给板垣开脱罪名，美日辩护团把陆军中将岛本正一作为第一证人推上证人席，岛本正一当时是驻奉天的关东军独立步兵守备队的联队长。

岛本正一气势汹汹地上了台，以见证人资格作证说，1931年9月18日，他在朋友家喝酒喝得醉熏醺的，回家后就接到发生“九一八”事变的报告……

敏锐的倪徵噢立马抓住了岛本正一的漏洞，打断了岛本的话头说：“证人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糊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作证人呢？”倪徵噢诙谐的语调引发了全场一阵大笑，是啊，美日辩护团怎么挑选出这么一个酒鬼出庭辩护，真正让人笑掉大牙？审判长季南主持正义，当即命美国宪兵把岛本轰出法庭。美日辩护团的阵脚顿时大乱。

仓促之间，美日辩护团又把板垣作陆相时的次官山胁请了出来。

这个山胁是板垣徵四郎的忠实信徒，一出庭竟然厚颜无耻地把板垣吹得天花乱坠，说板垣是中国人的好朋友，称赞他雷厉风行，整治部队很有一套，甚至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以早日结束侵略战争等等。

足智多谋的倪徵暎早就想好迎敌策略，他不慌不忙诱敌深入。“请问证人山胁，你身为陆军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陆相部署的了？”山胁不知是计，点头称是。倪正暎欲擒故纵，问：“那么，1939年2月，你以次官名义发了《限制由支（那）返日军人言论》的通令，也是按照板垣的意思承办的吧？”山胁无法否认，又点头称是。倪怀着堂堂正气，滔滔不绝地开讲道：该《通令》列举了返国军人向亲友谈话若干种，明令禁止传播，用意在掩盖日军在中国的罪恶，请看《通令》列举日本军人的某些谈话内容：“作战军人，经个别侦查，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强奸后如欲无事，或则给以金钱遣去，或则于事后杀之以灭口”；“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

1947年下半年远东军事法庭诘问板垣（站立戴耳机者为倪徵暎）

以机枪扫射，以测验军火的效力。”凡此种种都出于返日军人口中，群相转告，作为亲友间谈助。既然为陆军省《通令》引用，那么流传的广泛不难想见。陆军省为维护皇军的所谓尊严，不图根本制止日军在华暴行，却只禁止归国军人吐露中国战场实况，于是发出了如此堂堂的禁令，实属不打自招，罪无可绾！现在，山胁既然承认他所承办的事由陆军大臣板垣认可，陆军大臣放纵在华日军的罪责岂可逃遁？

这次反诘不仅对板垣，更牵涉到其他有关被告，使他们都无法狡赖。以后凡检察官控诉日军在华罪行，由此一纸《通令》，大多可以坐实。

一箭双雕

板垣眼看着自己的证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倪徵燠等人诘倒而下台，最后在战犯个人辩护阶段亲自出马，垂死挣扎。他向法庭提呈了经过长时间策划的48页书面证明材料，自我吹嘘是中国人好朋友，任陆相时主张撤军，张鼓峰事件发生他又主张就地解决，目的都在于实现和平等等。

倪徵燠和中国司法人员搜集的许多材料，此时发挥威力，一连3天，倪徵燠利用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美国占领军资料、日本政府元老西园寺、园田的日记、中国的证人证言等重要材料，与板垣的律师马塔司、山田半藏等人激烈论战，连续向板垣诘问。双方唇枪舌剑，出动了大批人员擂鼓助威，纷纷提供文件证据，各自出谋划策，开庭以来这是东京法庭最为激烈的3天。倪徵燠怀着民族义愤，最终将美日辩护团律师问得哑口无言。

已经体无完肤的板垣困兽犹斗，依然不肯甘休，仍然无理的狡辩：“无论如何，我对中国人充满深厚的感情，我在做陆军大臣时，就

主张从中国撤军，双方言和友好。”倪辛辣地追问说：“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你陆军大臣任内？”板垣无法否认，他1938年6月出任近卫内阁陆军大臣，1939年11月留任平治内阁陆军大臣，接下来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日军攻占广州、汉口都发生在他任陆军大臣和侵华日军总参谋任内。倪徵㬎问：“日军侵占广州、汉口，这是进军还是退军？”这一炮又击中了板垣击的要害，板垣张口结舌，低头不语。倪徵㬎连连追问，主审法官命令板垣必须作出正面回答，板垣不得已结结巴巴说：“这……这……这是进军。”

据倪徵㬎了解，板垣怀有胡吹乱侃的本领，神吹他们的侵略学说，别看他天花乱坠，鱼目混珠，居然颇能迷人。现在故伎重演，他在答辩词里，自称日本政府与德意商讨《三国公约》时，他不主张扩大战事；关于中苏边境事件，他竭力设法就地解决等等。针对这两件事。倪徵㬎突然转换了一个话题发问：听说因为上述两事，裕仁天皇当面指责说：“你（板垣）是当今最笨的人！可有此事？”板垣一直把天皇当作活人神，说天皇对他指责那是他一生的耻辱。倪徵㬎的话揭了他的伤疤，比揍还厉害，板垣既不肯当场承认，又不敢当众撒谎，只是惊恐地反问：“你，你从哪里知道的？”倪徵㬎冷笑一声说：“此时是我向你进行反诘，不是你来问我的时候，速速回答问题！”按照法庭庭规，板垣必须回答，他迟疑了好一会，只得有气无力地轻声说：“并无此事”。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否认天皇的指责，就等于否认《三国公约》和张鼓峰事件中的辩护，板垣自己抄了自己的耳光。

土肥原与板垣完全相反，他深信言多必失。审判开始在检察长宣读起诉书时，土肥原当庭声明不认罪，因为他相信法国江洋大盗临刑时说过的一句所谓名言：“我的朋友们，主要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对什么事情一概不要承认！”所以他自己不作任何陈述，上述第二

阶段“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就始终不发一言，并且放弃第三阶段自为辩护的权利。

土肥原不自为陈述，显然力图回避与中国检察官交锋，妄图逃脱中国方面的反诘和补证。面对一阴一阳两张面孔，倪徵噢决定步步为营，采取一箭双雕的办法，抓住板垣48页辩护词中的一个个细节，仔细盘问，时不时牵扯出板垣的同伙土肥原。土肥原尽管龟缩一边，但是这一对蚂蚱，依然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在倪徵噢犀利的反诘下，板垣受法律严惩已成定局，但倪还是不断地反诘板垣，特别强调他和土肥原两人共同策划的溥仪登基、华北自治等罪行。倪的反诘，形式上是核对事实，实质上是在重新提出罪证。娴熟的反诘技巧，敏捷周密的思路，博得全场听众一片赞叹，惊得板垣和土肥原的脸色由黄转红，由红变白。

在最后总结性的发言时，倪徵噢指着被告席右端土肥原的座位，连连向板垣发问：你在陆相后期派往中国去拉拢“吴唐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僭窃沈阳市长、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日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喧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危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贤二？一边口若悬河一边用手直指，双目怒视，简直要喷出火来。在场的全体成员都清楚，这样的发问只是促使大家注意，并非真正需要回答，因为大义凛然，因为扬眉吐气，更因为人心向背，所以大快人心。

战犯们震慑得龟缩成一团。48000余页的法庭记录，记载了壁垒分明的正义与邪恶，胜利地高扬起正义的旗帜！

被告个人辩护阶段于1948年1月12日结束，按照法庭规定的日程，检察方面可以作综合的最后陈述，接着是被告方面作总的陈述，全部辩论于1948年3月2日结束，宣判日期待定，这时倪徵噢等人才稍感轻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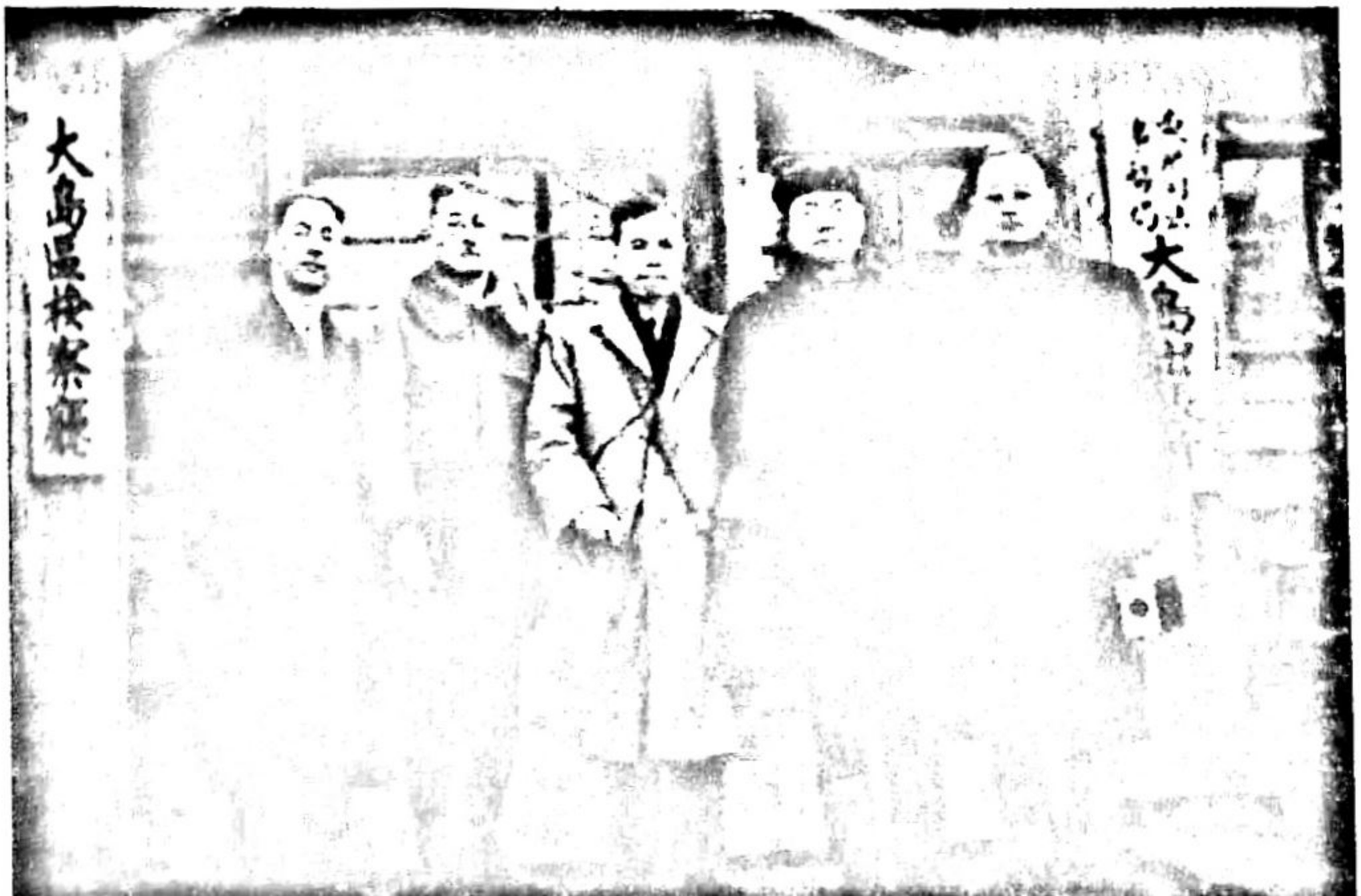
节外生枝

审理是结束了，但是判决尚未宣告，中国司法人员心中依然惴惴不安，担心节外生枝。

1948年11月4日，法庭开始宣读判决，直到11月12日宣读完毕。甲级战犯原有28名，审判中，前外相松冈洋右和前海相永野修身病死，极右法西斯主义活动分子在川周明突发精神病而免受审判。实际受审25名，7名判处死刑，依英文姓氏的拼法，顺序如下：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徵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耕、武藤章、东条英机。被告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贺屋兴宣、白岛敏夫、梅津美治郎等16名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乐乡茂德判处有期徒刑20年，被告重光葵判处7年有期徒刑。

历时两年有半的马拉松审判到此终于落幕，这是历史的审判，这是庄严的判决。可是中国司法人员的担心居然不是多余的，刑罚

东京审判期间倪徵燠(右二)与检察组参观大岛检察厅



正等执行之际，节外竟然真的生枝了。土肥原贤二、广田、松井、东条4个罪恶照彰的死囚，他们的美国辩护律师，于1948年11月24日向华盛顿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释放被告。上诉书声称：麦克阿瑟无权成立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任何美国法律或国际法均未规定侵略罪；被告所被指控的各项行为，均系遵守日本政府的命令等等。紧接着，又有木户幸一、冈敬纯、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东乡茂德5名被告，也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麦克阿瑟随即下令：所有被告暂缓执行判决所处刑罚。

舆论哗然，当死囚们提出所谓上诉时，善良的人们还以为美国最高法院会立即拒绝，却不料美国最高法院竟于1948年12月6日以5票对4票的微弱多数决定受理日本战犯的上诉。群情激愤，尤其在中国，抗战14年，又经过二年半的国际审判，还要由美国法院来作最终审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代表全体中国司法成员表示，根据国际文件与协议而成立的国际军事法庭所作的最终判决，尚须经过一国法院单独予以复查，则今后国际间的决定和行动均可由一国予以审查和撤销，这种危险行动，对于国际间的关系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世界舆论沸腾了。

《大公报》1948年12月8日发表社评，愤怒地指出：美国最高法院受理日本战犯的上诉，是对“远东各国抗战死难平民的侮辱”！苏联《真理报》载文谴责；英国驻盟国远东管制委员会代表指出，美国高院这一行动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地位”的打击；荷兰法官抗议说，美国高院这一决定“令人骇异的错误”；美国参议院议员劳伦卓·塔纳达指责美国最高法院“没有法律根据可以这样做”；就连日本共同通讯社也对美国高院这一决定表示惊异。

……

美国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出面向最高法院发出公

文，要求最高法院不要干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司法部副部长柏尔曼还指出，最高法院无权重新审查美国总统在战时与各盟国共同达成的惩罚战犯的协定。舆论，强烈的世界舆论，迫使美国最高法院于1948年12月20日宣布：不再审理。

美国最高法院上述决定一公布，驻日本盟军总部立即准备对土肥原等7名被告执行绞刑。1948年12月23日凌晨，盟国代表被邀请到东京郊外巢鸭监狱刑场监视行刑，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等人也被邀请参加见证。7名被告尸体随后被烧成骨灰，撒散于荒野，东京审判从起诉至执行至此全部结束，历时2年又8个月。

从东京回来，国民党政府特聘倪徵噢出任司法部副部长，他拒绝了，他对这个国民政府没有信心，法律只是摆设，他决心回归学校教育，回归平静的书斋生活。

从东京回国前，倪徵噢曾用两大木箱装运数以百计的法庭审判记录本、书状稿件及其他有关资料，收件人是上海高等法院，以期日后作为历史的见证。遗憾的是，这两箱珍贵资料，至今下落不明。在此文结束之际，期望有心人留意，有识者努力。

九、女中豪杰张应春

张应春，黎里葫芦兜村人，生于1901年，牺牲于1927年，是中国现代妇女界杰出的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先锋战士，她的光辉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她短暂的一生，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年号风波

张应春的父亲张农是清末秀才，1916年，离开了家乡葫芦兜小学，受黎里女子小学高小部之聘出任国文教员，张应春随父到黎里高小部住校就读。当时著名南社主帅柳亚子的二妹公权也在该校读书。柳亚子认为张农是个饱学的宿儒，思想又开明，决定请张农来家给公权面授国文。柳的四妹均权在高小读书，也是张农的学生。黎里女校是复式班，柳均权和张应春尽管不是同一年级，却在一个班里读书。均权本来比应春高一级，同班一年后均权高小毕业了，母亲不放心她到外地读书，就留校再读一年，这一年均权与应春不仅同学而且成了同桌。月换星移，柳张两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第二年，柳亚子就介绍张农加入了他所创建的南社，张应春因为均权

的关系也经常到柳家走动。

张应春在柳亚子的脑屏上首次留下印象，是在袁世凯称帝的那一年。

那时，学校的每个教室都有《课堂日志》，每天由值日生负责填写。1916年，校方迫于政治压力，规定学生记载《课堂日志》必须改用袁世凯复辟的“洪宪”年号。一天轮到应春和均权值日，应春悄悄地同均权商量了一下，就在《课堂日志》上填上了“民国五年”四字。有人指出这样填写不合规



张应春(1901-1927)

定，应春义愤填膺，激昂地痛斥袁贼倒行逆施的罪行，学校师生一片哗然。对于袁贼，张农与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一样，满腔愤慨，他心中暗暗赞赏女儿，但是他担心女儿遭到不测，只得违心地出来干预，劝说她服从校方决定，改民国为洪宪，可是应春态度坚决，不肯更改。

年号风波很快传遍了全镇，柳亚子听了，心中暗暗称赞，想不到张农的女儿竟有如此的胆识，从此他对经常和四妹一起蹦蹦跳跳的张应春注目起来了。

崭新天地

1920年，应春考入上海中国女子体育学校，1922年毕业后远

赴厦门厦岭学校任教。一年以后，柳亚子介绍她到江苏松江担任景贤女中的体育教师。景贤女中主持人是朱季恂和侯绍裘，朱是柳亚子早年在上海健行公学的学生，侯又是朱的学生，朱侯两人坚持五四精神，致力于促进女子解放和社会改造，两人都是国民党党员，1923年7月侯绍裘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景贤女中，一所弥漫着革命气氛的学校，张应春面前敞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1923年底，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柳亚子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一大期间，柳亚子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也就在这同一时期，张应春由侯绍裘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不久，柳亚子受在上海的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委派，在吴江秘密组建国民党地方组织。柳亚子四出联络，八方奔波，秘密发展了不少党员。8月24日，中国国民党吴江县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盛泽镇东庙书场秘密召开，县党部正式成立。这时正好是暑假，张应春和柳亚子、侯绍裘、朱季恂等出席了大会，会上，柳亚子讲演《中华革命史》，历述中国几十年革命历程，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组织国民党的意义和国民革命的含义，张应春听了很受启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

1925年初，张应春返回家乡，到黎里女子小学任教。开学不久，孙中山先生逝世，柳亚子在黎里筹备召开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柳自任筹备会主任，张应春和柳均权两人积极参与。她们要撰写一副挽联，想请柳亚子代拟，柳颌首答应，稍加思索，一挥而就：

与被压迫民族相提携，纵赤化兴谣，人言奚足恤；

为不平等条约而奋斗，奈黄肠遽掩，天道复宁论？

联语充分肯定孙中山中流砥柱顶住了所谓国民党被“赤化”的

谣言，无奈孙先生过早逝世，对他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能否继续执行下去，提出了深深的忧虑。张应春读了，连连点头，觉得这正是她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好辞。

5月3日，吴江民众追悼孙中山大会在黎里市民公所隆重召开。会场门口高高矗立一座苍翠青郁的柏枝楼，上有“追悼大会”四个大字。二门口高悬“为国捐躯”匾额。礼堂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大幅遗像，两旁是柏枝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上午九时，大会正式开始，张应春担任司仪，柳均权任司花。柳亚子以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作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的报告。被邀赴会的国民党江苏省临时党部侯绍裘发表了《如何竟孙先生之功》的演说。接着是张应春，她简单回顾了孙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的历史，接着论证说，主张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实行三大政策。如果没有共产党员协力同心，国民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抛弃三大政策，就意味着背叛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她号召大家时刻不忘忠实执行三大政策。张应春的演说旗帜鲜明，声情并茂，全场尽惊。柳亚子对张应春自认是非常熟悉的，可是她能够在大会上发表如此雄辩的演说，却让柳亚子深感意外，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看来此话不虚。

下午，大会举行了盛大的悼念游行。三里长街人山人海，庄严肃穆的游行队伍缓缓行进。张应春和另一女党员瞿双成捧着孙中山遗像，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时黎里女子剪发尚未盛行，她俩却是齐耳短发。有人悄悄地称她们是“盛泽尼姑”，几个小孩听了，就大叫起来：“大家来看盛泽尼姑！”柳亚子皱起了眉头，盛泽是吴江县的大镇，那里的尼姑大多做暗娼生意，张应春的发型同尼姑相似，这“盛泽尼姑”明显是带着侮辱性的。听了叫喊，人群中起了一阵阵骚动，但是，众目睽睽之下，张应春镇定自若，她满脸肃穆，两眼依然发着炯炯的光芒，坚定地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目睹此情此景的柳

亚子更加折服，他暗暗称赞说："好，一个思想健全的进步分子！"从此，柳亚子认定革命事业必须倚重张应春同志。仅仅过了14天，在5月17日，柳亚子担任临时主席的第四区（即黎里区）分部会议上，张应春被补选为区分部执行委员。

冲锋猛进

正当民众沉浸在痛悼孙中山先生的巨大悲伤之中，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了，消息传来，古镇黎里群情激愤。柳亚子张应春等人拍案而起，立即投身到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浪潮之中。6月2日，柳亚子与张应春领导的第四区分部联合吴江县党部及吴江各区、各公团发表通电，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收还全国租借地"等条款。3日下午，柳亚子、张应春还有小学校长毛啸岑等13 人召开第四区分部会议，讨论声援活动，议决由柳、张、毛等五人组成演讲队，向群众演讲宣传。当夜，就在业余夜校举行首场演讲。他们演讲的题目是《英巡捕惨杀学生的详情》《现在的国际地位和救国方针》等。柳亚子有点口吃，演讲的效果打了折扣，而张应春的演讲，声泪俱下，听者无不为之动容。黑压压的人群中，时不时响起口号声："打倒帝国主义！"听众内有几个人狠狠地把大英牌香烟扔在地上，高声宣称，从今往后拒购帝国主义的货物。

在柳亚子和张应春等人的努力下，黎里国民外交后援会宣告成立。简章规定：本会以取消不平等条约，收还全国租界及租借地为宗旨。不几日，国民外交后援会在吴江各乡镇如雨后春笋一齐涌现，全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怒潮。6月30 日，黎里全镇罢工、罢市、罢课，爿爿商店门前竖起白旗，条条标语赫然醒目："打倒帝国主义！""毋忘五卅，坚持到底！"柳亚子与张应春等人组织了三千多群众怀着巨大的悲痛，进行了五卅殉难烈士公祭大会。会场上

人人臂缠黑纱，会后进行游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传遍大街小巷。傍晚，张应春又赶回出生地葫芦兜，率领第五分校的学生，在尤家港、张家港等附近乡村游行示威，演讲宣传，散发传单。为在物质上救助上海五卅死难烈士家属，柳亚子、张应春、毛啸岑等带领人员进行募捐，张应春带头捐了大洋一元，全镇二百多个单位和个人共捐大洋338 元，小洋95角，钱40文。

在震天动地的怒吼声中，7月14日， 中国国民党吴江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黎里镇第四高等小学召开。中共党员应柳亚子之邀，前来的有侯绍裘、沈雁冰、杨贤江、王一知、姜长林、董亦湘等。张应春与三百余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柳亚子主持会议，会议议决成立青年、妇女、农民、工人四个运动部，领导全县的反帝斗争。7月15日至19日，历时五天的吴江地区夏令讲习会在第四高等小学举行。反帝斗争的实践锻炼了张应春，志士仁人的论说启迪了张应春。侯绍裘演讲的《五卅惨案与中国工农党》，使她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工农阶级的关系；沈雁冰讲的《最近国际间之政治状况》，为她拓宽了政治视野；王一知的《妇女问题》使她认识解放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朱季恂的《革命口号及其方法》，使她格外理解革命斗争必须讲究方法和策略……

有柳亚子引路，张应春踏着五卅烈士的足迹，在反帝斗争的风暴中跌打滚爬，不断受到革命理论的武装，正如她在《入了政党以后》一文中说：“既是入了政党，就只知有党，牺牲一切，努力的革命！努力的宣传！新社会就在目前了……向前冲锋猛进啊！”面对严酷的形势，张应春已经有了为革命献出一切的思想准备。

不断迈进

1925年5月，中共上海市地委召开会议， 研究在临时省党部

的基础上组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提出了包括柳亚子、侯绍裘、朱季恂等13名执委的名单。6月，侯绍裘就执委人选等事宜，写信给柳亚子征求意见，并要求柳亚子推荐一名省党部妇女部长。柳立即想到了张应春，刚好盛泽镇的徐蔚南有事到黎里来，徐是柳亚子赏识的人才，柳不但介绍他参加了新南社而且介绍他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来得正好，柳亚子就物色妇女部长一事征求他的意见。话音未落，徐氏就说非张应春莫属。所见略同，柳亚子非常兴奋。8月初，侯绍裘和姜长林从上海赶到黎里，专门同柳亚子一起确定省党部妇女部长的人选，柳亚子推荐了张应春。张应春本在松江女中工作过，侯绍裘、姜长林对她有较多的了解，就此确定下来。

8月10日，吴江县党部的同志约柳亚子在同里罗星洲聚首，这时罗星洲水中央的白莲开得正盛，柳亚子不由得“颇涉遐想，盖有感于百年前民族革命家白莲军女首领之故事”，由古而今，浮想联翩，一百多年前历史的需要，王赛昭出山，成为一代巾帼英雄；百年之后的今天，为顺应时代潮流，张应春又将作为女中豪杰登上历史舞台，叱咤风云，诗思涌上心头，于是口占一绝：

一蒲团地现楼台，秋水蒹葭足溯洄。猛忆船山诗句好：白莲都为美人开。

8月23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上海闸北景贤女中分校举行成立典礼。柳亚子、侯绍裘、朱季恂当选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张应春等九人当选执行委员。柳亚子任宣传部长，侯绍裘任副部长；朱季恂任组织部长，姜长林任副部长；宛希俨任青年部长，姚尔觉任副部长；张应春任妇女部长，杨明暄任副部长；刘重民兼工人部长；戴盆天任农民部长；黄竞西任商人部长，黄麟书任副部长。省党部设立秘书处，姜长林兼任秘书长。

遗憾的是，张应春因脚疾（患丹毒）发作而迟迟未能去上海就职。这时，国民党右派势力日益猖獗，早在5月17日南京市党部成

立大会上，右派就唆使流氓打手冲进会场，殴伤临时省党部朱季恂、张曙时等人。后又擅自另立南京市党部，企图接管临时省党部。右派分子还在广州、上海等地发行刊物，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全面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面对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江苏省党部一成立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柳亚子穿梭于上海、黎里两地，兼管江苏和吴江党务。张应春病卧在床，欲动不能，心急如焚。9月30日，她写信给柳亚子说:“这次常会我不能出席，您能够赴会也是我的幸事。因为您可以代我声明，而且返黎里，或可详细地告诉我议决的事情和指教我。不过我现在舍下，足病仍旧未愈，亦不见厉害，多走就感苦痛，多坐亦不见适，唯卧床则觉舒服，奈何！！！”又写道:“我意国庆日就近了，我们借这个机会可以增多些工作和活动力，所以议决的事情须急急执行，您道如何？但是我久病未愈，屡次缺席，问心何安呢？闷极！恨极！”

捱到10月下旬，张应春毅然冒着沪宁线上奉直军阀猛烈的炮火，扶病奔赴上海。

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20名执监委，中共党员12名，共青团员一名，其余都是国民党左派，堪称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亲密合作的典范。张应春一到上海就全力以赴参加工作，常同柳亚子、姜长林、妇女部秘书史冰鉴等研究工作到深夜。她深入南京、苏州等地作调查研究，妥善安排全省的妇运，协助组织部审查新党员发展党组织。

经历了斗争的考验，张应春由侯绍裘、姜长林介绍，经江浙区委批准，1925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当年12月17日给柳亚子写了一封信，说:“我以为入了党，当然以此为前提了，一切都可以牺牲的。至于使命呢？我们恐怕无异吧，孙先生遗给我们的使命吧。”

为了迎接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1925年11月 12日，上海执行部的女同志会上，张应春被推选为二大江苏女代表。她积极吸收多方意见，准备了向大会报告的三个问题：一、经费问题；二、妇女部独立，不要由男子任部长；三、注重劳动妇女工作。当天她写信给在黎里的柳亚子，通报情况，并征求意见说："其余的要求可以增加的我想不出什么，你可以代我想出几个么？全国大会我们省部也是要出席的，我们也可以先想了些事情去要求的，你道如何？"

国民党二大于1926年于1月1日至19日正式召开。张应春与朱季恂、侯绍裘等五人作为江苏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柳亚子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朱季恂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两人仍兼江苏省党部委员，负责江苏党务。大会期间，张应春聆听了代理中央宣传部长毛泽东所作的报告，邓颖超代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作了妇女运动的报告，以及何香凝在公祭廖仲恺公祭沙基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说。她认真撰写并递交了江苏妇女运动的书面汇报，提出了关于妇女运动的两项议案：一、中央各省党部组织妇女运动讲习所函授班案；二、中央各省各县党部附设平民妇女学校案。

经风雨见世面，张应春深深感到自己还太稚嫩，萌生了进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的念头，想多学点革命理论，可以更好地领导全省妇女运动。1月7日深夜，张应春在灯下给柳亚子写信说："在此我觉得我的能力实在太薄弱，学问实在不够，明年想进上海大学新社会学系求学，不知做得到么？你在同志的地位来切实地评论一句好么？"这一阶段的柳亚子正在平望召开第四次全县代表大会，张应春非常关心，她问"吴江方面党部进行如何？代表会结果谅很好，楚女、长林宣传结果如何？请告我听听。"她特地向二大会务处登记要求给柳亚子直接寄二百份大会日刊，以便让柳亚子等人对二大有个全面的了解。

在柳亚子等人的支持和努力之下，张应春如愿以偿，由省党部

具函介绍，做了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的旁听生。上海大学是中共创办的培养干部的学校，共产党人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肖楚女等都是这所学校的教员。张应春入学后，听得最多的是瞿秋白、恽代英的课。她如饥似渴，一边投身革命实践，一边学习革命理论。

创办《吴江妇女》

在上海大学期间，张应春边学习边思考，认识到革命舆论对革命实践的重要意义。她认为省党部应当办一份大型日报，妇女部需要办一份月刊或半月刊。说干就干，雷厉风行，这是张应春的工作风格。

办刊物，张应春很自然地想到了柳亚子。从1923年4月开始，柳亚子团结了 64位进步的知识分子，创办了《新黎里》报，柳曾经多次向张应春约过稿，应春根据亲身感受，在《新黎里》报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比如《剪发问题》《束胸和社交》等等。为了倡导妇女运动，1925年夏，张应春筹备暑期妇女学校，在《新黎里》报上刊出《招生简章》，发表了她撰写的《怎样可以补救我们年长失学的女同胞们》等文章，开学时还刊登了开学消息。有了过去的愉快合作，又加上柳亚子正好中止了《新黎里》报的业务，定居在上海，张应春就把创办《吴江妇女》的构思向柳亚子和盘托出，得到了柳亚子的肯定，她草拟了创办《吴江妇女》月刊的计划，上报中共党团组织讨论，转请中共上海区委批准。柳亚子提议，《吴江妇女》作为月刊，每月8日出版，创刊号定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以介绍国际妇女节为中心内容。

1926年3月8日，《吴江妇女》创刊号问世，《发刊词》没有署名，但一读就知道出自柳亚子之手，开宗明义指出：该刊的宗旨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推翻旧礼教、要求妇女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

柳亚子以他主编报刊的经验和能力，尽力支持，他在《吴江妇女》发表了《革命和妇女》等署名文章多篇，更多的是为刊物撰写宣言、檄文等重要文章。看到《吴江妇女》以她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创刊伊始，就像成束的手榴弹和密集的排炮，显示了它一往无前的革命朝气和战斗威力，同志们都十分兴奋，侯绍裘等人甚至戏呼柳亚子是“妇女部秘书”。《吴江妇女》是张应春和柳亚子成功合作的产物，早年柳亚子在《新黎里》报上多次以“ＹＴ”的笔名发表文章，张应春也曾以“ＹＣ女士”的笔名刊登过文章，《吴江妇女》一问世，“ＹＣ女士”和张应春署名的文章交叉互见。比如《吴江妇女》第四期于6月8日出版，首篇是张应春的《我们应该怎样纪念五卅》，还有柳亚子以“ＹＴ”为笔名的《革命与妇女》。《吴江妇女》的撰稿人除张应春和柳亚子以外，有名有姓经常供稿的有杨之华、高尔松、姜长林、瞿双成、葛季膺、张光炜等10余人，还有上海、南京、广州、南通、江西、铜山、川沙等地的妇联会。

为了编印《吴江妇女》，张应春呕心沥血，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当时江苏省党部的经费主要被上海执行部的右派分子克扣，办公与宣传费用分文无着，为了刊物得以正常出版，张应春总是千方百计筹划经费，常常自掏腰包。

当时白色恐怖弥漫，革命刊物的发行常常为租界巡捕房及军阀特务注目。但是，张应春勇于承担风险，为了广泛联系读者并约稿，她在每期刊物封面都注明自己的通信处：上海望志路永吉里41号张应春收转。雄心勃勃的张应春还打算在取得经验以后，扩大创办《江苏妇女》。

不惧风浪

1926年3月11日，张应春和柳亚子、侯绍裘、 朱季恂等江

苏省党部代表前往南京，参加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会。3月12日上午，阴雨绵绵。江苏省党部在南京夫子庙贡院召开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会。贡院内人头济济，挤不进门的就站在门外。登台讲演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张应春以省党部妇女部长的身份登台作了“中山先生周年纪念”的讲演，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张应春手执“拥护国民议会”的旗帜，精神抖擞地走在各界妇女队伍的最前面。

当天下午，细雨依然绵绵，中山陵墓地的奠基礼在紫金山麓召开。出席这次典礼的有宋庆龄、孙科，有国民党中央代表邓泽如、吴玉章和各地方党部的代表。柳亚子、张应春等江苏省代表的队伍到达时，右派雇佣的打手二百余人装扮成学生，混在纠察和服务人员中间。奠基礼刚结束，右派队伍中突然吹响了警笛，接着喊出了“打倒跨党分子！”“孙文主义学会万岁！”等口号。侯绍裘、柳亚子、张应春他们针锋相对，予以回击，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分子一面叫嚷着把省、市党部的旗帜撕破、践踏，一面同雇佣的打手抡着木棍、旗杆打将上来，顿时，秩序大乱。来南京前，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曾再三叮嘱，要绝对保证柳亚子的安全。危急之中，张应春挺身而出，立即和唐蕴玉、庄元勇等几名女同志护卫着柳亚子，匆匆往山下撤退，山路崎岖不平，又湿又滑，后面的右派打手又不时掷来石块，一不小心，柳亚子同搀扶他的唐蕴玉女士一齐跌倒，幸好柳亚子穿着皮袍子，没有受伤。侯绍裘一边上前说理，一边掩护同志后撤，结果被打得昏倒在地，直到黄昏时分才被同志们救醒过来。中山陵奠基典礼上这惊心的一幕，张应春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将会日益尖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应春一行刚刚返回上海，就传来了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消息。柳亚子和张应春愤慨

之极，形势越来越严峻了，柳亚子决定结束吴江、上海两地的奔波，留在上海主持省党部的工作。张应春很高兴，她知道柳亚子一介书生，不善于料理生活，就在生活上多多照料柳亚子，柳亚子则在工作上时时指点帮助张应春。

“三一八惨案”的抗议浪潮风起云涌之时，吴江的盛泽有人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邀请南京右派头目前往讲演，又企图组织伪县党部，将吴江的党纳入西山会议派的轨道。忧心如焚的张应春忙与柳亚子商量，决定在吴江同里镇召开国民党吴江县党部第五次代表大会，迎头痛击吴江右派的反动气焰。

4月5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同里召开，张应春和柳亚子以及应邀前往讲演的侯绍裘、杨之华等准时赴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天，上午是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下午是第五次全县代表大会，会议开到了晚上10点多钟才结束。侯绍裘讲演的题目是《反动派的历史》，杨之华讲了《妇女与政治》，瞿双成讲了《中国妇女与国民党》。张应春后来把杨之华的讲稿记录下来，刊登在《吴江妇女》第三期上。会议午休时，大家到位于镇东同里湖中的小岛罗星洲上去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杨之华、瞿双成两同志首次来到吴江，张应春等12位妇女代表集体合影留念。这次会议开得十分及时，把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鼓舞了士气，振作了国民党左派的战斗的精神。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5月15日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柳亚子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当面指责蒋是总理的叛徒。从此，柳亚子情绪低落，不愿再主持省党部的工作了。

二届二中全会结束，朱季恂留任广州国民党政府参事，侯绍裘也留在中央党部，一时间，江苏省党部群龙无首。右派分子频频扬

言，江苏省党部中共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他们要派人接管。省党部一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对严峻的形势，张应春屹然不动，她和刘重民、黄竞西、戴盆天、张曙时、姜长林等坚守阵地。他们发电抗议西山会议派，以接受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托的名义，调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伪中央的情况。同时，按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的退守方案，调整执监委人选，向广州国民党中央提出请求，让侯绍裘返沪主持省党部的工作。1926年7 月，侯绍裘受命返回上海，担任江苏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主持省党部工作。

9月上旬，柳亚子送儿子无忌北上清华读书，从黎里来到上海，住在振华旅社，抽空看望了张应春和省党部的同志。一天，张应春参加南京路上的示威游行，她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高呼着口号，几个军警拥上来要逮捕她。矫健的张应春奋力挣脱，镇静地转移，军警拼命追赶，她急中生智，避进了柳亚子租借的旅馆里甩掉了尾巴，这时她才感到肚子唱起了空城计，在旅馆里找一些食物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完后钻进浴室洗了个澡，休息片刻，又精神抖擞地出了门，继续奔波。次日，柳亚子从上海经嘉兴回黎里，张应春顶着风雨前往沪杭路南站送行，风雨中

国民党吴江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前排右二为张应春）

两人话题不断，列车开动了，柳亚子远远望见她头戴男帽，身穿绿色雨衣，在大雨中频频扬起手绢。

10月，柳亚子因孙传芳指名查捕，避居邻镇平望后又来到上海，化名唐蕴芝匿居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路）恒庆里。这时，柳亚子引退之心已决，不想把自己的行踪告知张应春和省党部的同志。张应春多方探听，得知柳亚子大致近况，便四出寻访，可是茫茫人海，遍寻不着，她登报再找，希望柳亚子能够同她接通音问。但柳亚子始终沉默不应，只是暗暗地注目张应春。

由于张应春的努力，江苏各地的妇女工作很有起色。南京、南通、丹阳等23个国民党市县党部成立了妇女部，南京、苏州、南通、无锡、镇江、宜兴、常熟等相继成立妇女协会，江苏的妇女运动出现了逢勃的高潮。1926年下半年张应春出任中共江浙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济难会委员。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形势大好，可是，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却指使他的党羽镇压革命群众，逮捕枪杀共产党人。3月下旬，蒋介石抵达上海，密谋发动反共事变，形势严酷。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较量已经迫在眉睫，根据党的指示，侯绍裘率领江苏省党部部分人员迁往南京，和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在安徽公学一起办公。当时张应春积劳成疾，回家休养。迁居南京后，侯绍裘十分需要力量，连续三封紧急电报拍发到黎里，催促张应春就职。张应春足疾并未完全好转，但是革命斗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她怎么可以不去？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4月7日，张应春打点行装毅然赶赴南京。

再说柳亚子，虽然避居在上海，心却一直在家乡，4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占领了吴江，他就回到黎里。知道张应春去了南京，柳亚子明白，既然“四一二”政变已经发生，张应春的凶吉就难以预料。柳亚子心急难耐地待了半月有余，越待越不是滋味，必须让张应春脱离险地，写信？拍电报？打电话？专门去人？柳亚子举棋不定，

最后决定还是写信，可是书信还没有寄出，5月8日深夜，蒋介石派了十数名军警直扑黎里，入室搜捕，柳亚子藏身于楼上的“复壁”间才幸免于难，雇了一叶小舟装扮成渔民，隐姓埋名取道上海亡命日本。

血花红染好胭脂

1927年4月2日，侯绍裘率领省党部迁抵南京，受到南京市党部和全市各界人民群众四、五万人的热烈欢迎。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协助下，取缔了南京伪市党部及劳工总会，改组了支持革命的市总工会、教育协会、妇女联合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和农民协会，又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等积极筹备江苏省政府，拟定于4月11日举行江苏省政府成立大会。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使出了釜底抽薪的杀手锏，他借口继续北伐，下令将同情革命的第二、第六军调往江北，开赴徐州。4月10日深夜11时，中共地下交通处南京大纱帽巷十号，侯绍裘他们正在召开紧急会议，11日凌晨2时，会场被包围，侯绍裘、 刘重民等十人被秘密逮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反革命事件。张应春风尘仆仆赶到南京，她先找到中共南京市委委员陈君起，然后两人一起前往大纱帽巷，被潜伏在那里的侦缉队逮捕，没过几天就被秘密杀害。

1928年初，国内局势逐渐安定，柳亚子带领全家于4月6日离开日本返回上海。4月26日，柳亚子专程前往南京，拜谒孙中山陵寝，同时希望探得张应春遇难的准确消息。可是传说始终纷纭：有说张应春刚到南京就被军警捕获，后与国民党妇女部长陈君起同处了绞刑；有说她和侯绍裘在秘密会议时被抓，同被缚置麻袋中，用乱刀攒刺，死后投到通济门外九龙桥下的秦淮河里……

上海一别，柳亚子与张应春终成永诀。柳亚子一再自责，是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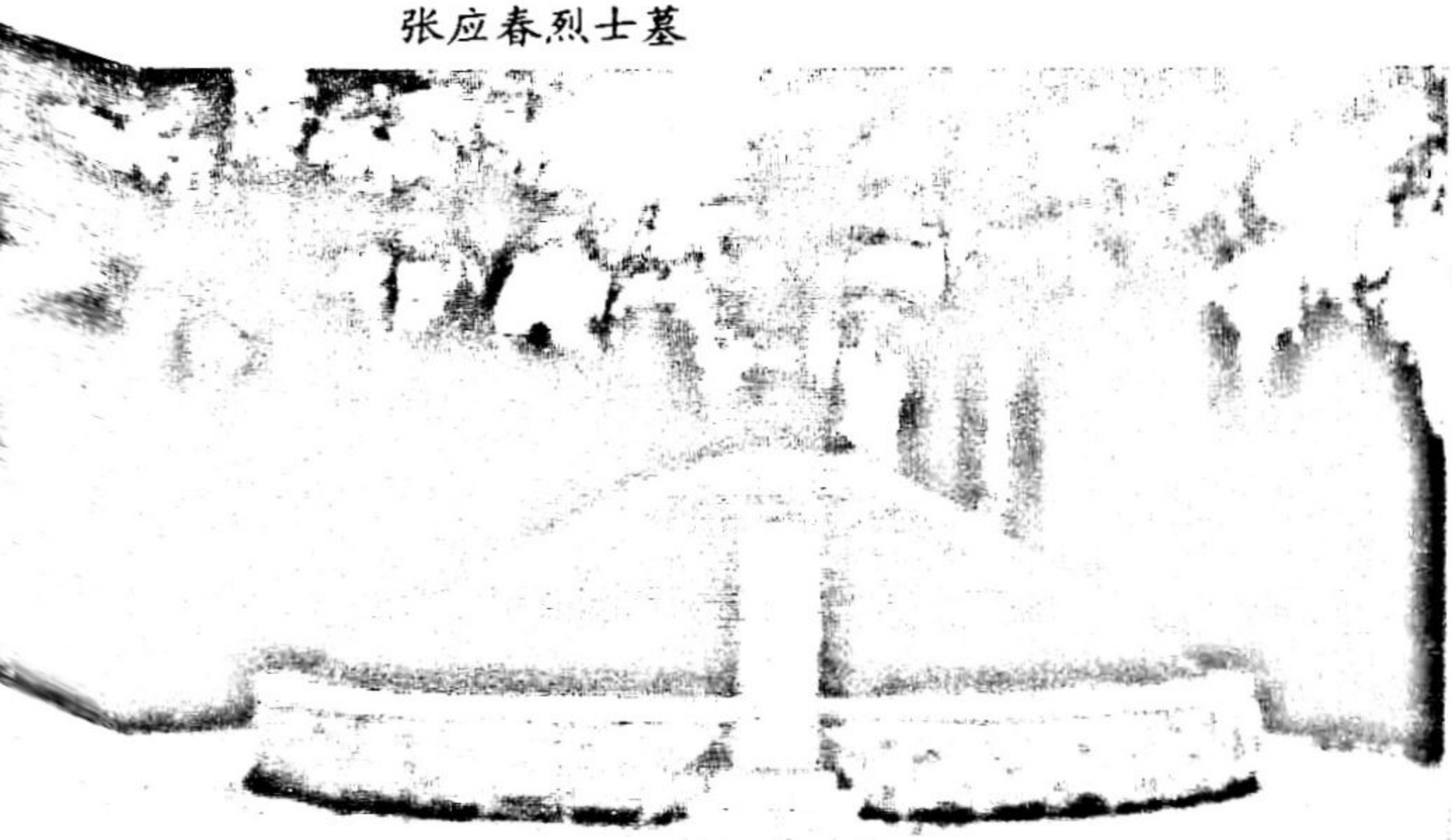
已把张应春推入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使她年仅27岁就被杀害，此恨绵绵无绝期。在闻知应春牺牲消息后当天，柳亚子悲愤交加，和泪感成一绝：

血花红染好胭脂，英绝眉痕入梦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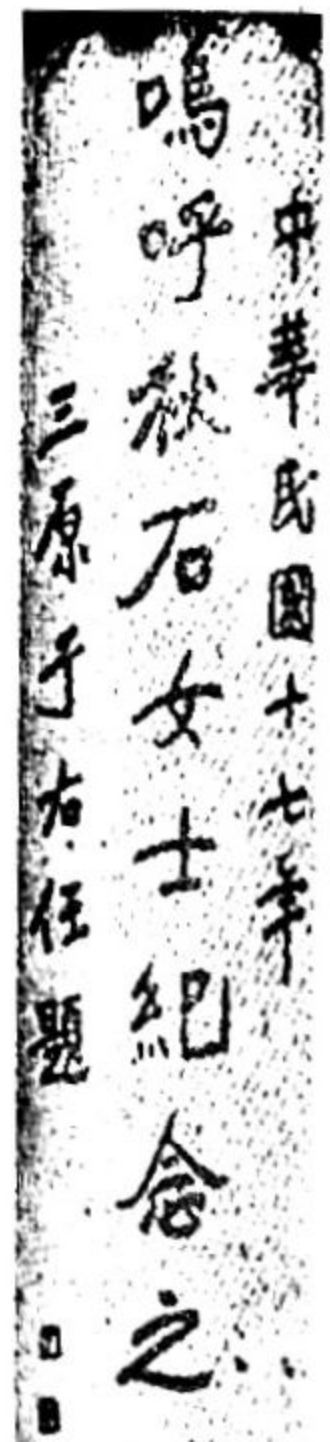
挥手人天成永诀，可怜南八是男儿。

扶桑归来，遍寻应春遗骸不着，柳亚子与南社旧友沈长公多次商量，为张应春营建衣冠冢。张应春家在分湖北边的莲荡滩畔，10年前柳亚子在这里的乱石荒草中觅得了明末吴江才女叶小鸾之墓，曾为小鸾重刻墓碑种植梅丛以为纪念，柳沈两人认为如果把应春安置叶小鸾墓侧那最是适当不过。迫于政治压力，1931年底，仅用一夜时间，应春的衣冠冢迅速建成。棺木内，应春生前用过的一个梳妆盒戴上帽子，作为烈士之首，随葬的物品有上衣、长裤、鞋袜，墓前立着一方石碑，上书“呜呼秋石女士纪念之碑”，那是柳亚子请南社旧友于右任所书。

张应春烈士墓



张应春烈士墓碑



十、农学家倪慰农

倪慰农



倪慰农（1889 — 1961），1902年，倪慰农13岁，那年前往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南洋公学是现在的交通大学的前身，当时南洋公学分为三院，下院，相当于小学，中院和上院则相当于中学和大学。在那里刻苦攻读了整整九年时间，从下院读到了上院，学得好多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认识了沈叔葵和黄炎培两位老师，从沈、黄两师身上，倪慰农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尤其是黄炎培，更多接近。当时黄炎培的弟弟黄猷培也在同一班上读书，倪慰农和黄猷培非常谈得来，因此同黄炎培非常接近，受到黄老师进步思想的熏陶。

辛亥革命后，入国立京师农政学堂，毕业考试全科第一名。应南通张謇之邀请，赴清江浦（淮阴）办气象观测所。

1915年，倪慰农受北京有关方面邀请，到农商部的商标局任职。在那里倪节衣缩食，积攒起了2000多块银元，本想以后创办农业实验园地，为中国的农业生产作点试验。可是，官场腐败之极，上

司以“实业救国”为帜子，侵吞了倪所有的钱财，倪告状无门，四处碰壁。1927年，无法适应官场生活的倪慰农愤而辞职回到家乡。

倪慰农对自身的定位有着清楚的认识，知道自己不适合在官场上周旋，发挥自己的专长，再说当前应当提高农民对科学种田的认识，为了让农民接受科学知识，必须创办一个农业实验园地。本来倪家祖上在秀水县（嘉兴）有数十亩土地，可是到倪慰农接手，农民来缴租他就收一点，不来也就作罢，后来走出校门，踏上社会有了工作，就不再收租。没钱办什么试验，更何谈农场实验。好得倪家在黎里镇有一排老宅店面房，九楼九底，可以收回部分店面，开张营业，赢利后再图进展。于是思虑再三后，倪家的杂货铺“萃英商号”开张了。

由于经营尽心尽力，不几年，倪慰农“慰农学圃”就开始筹备。他引进蕃茄、包心菜、白猪、长毛兔等，试种试养之后，逐步推广，特别是他试种的水稻亩产达到430公斤，当时农民种的田，每亩单产能够超过200公斤就是高产了，听说慰农学圃的亩产这么高，大家纷纷前来求取经验。每天，倪都用黑板抄录气象预报，挂到街头，直到1957年，数十年如一日。

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进驻黎里。倪慰农决定到浙江安吉去避难。他准备了船只，带领全家老少，又动员周边邻舍一起逃难。到达湖州，碰到了国民党吴江县公安局局长陈福。陈福带着几条枪船，一批士兵。患难之中，他乡相遇，当然别有一番滋味。陈福嘴上高喊到太湖去组织力量，准备在苏、湖一带进行抗日。其实内心深处想的是到太湖去与湖匪一起，打家劫舍，大捞一漂油水。倪慰农本来对陈福的为人有所了解，此时此地，他旁敲侧击，多方试探，觉得陈福似乎另有所图，不会真心抗日。于是婉言谢绝了陈福的动员，决定按原计划继续西行。事后证实倪慰农的感觉是对的，陈福后来的确堕落为土匪，与湖匪勾结一气，为害百姓。

再说，倪慰农与陈福分道扬镳之后，西行至晓墅、梅溪，在那里暂住了一段时间。人在外地，心却一直在家乡。不久打听到黎里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黎里镇偏于一隅，日军对它的控制相对来说比较松懈，再加黎里有很多暗弄堂，别说黑夜，就是白天也不敢轻易进出，因此日本在黎里没有驻扎军队，总是白天来，晚上走。周边乡镇的居民觉得黎里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于是纷纷前来定居，一时，黎里的市面反而比日军占领之前更加热闹。倪还听说有些商人乘此国难之期，生意做得非常火爆。逃难在外的倪慰农一家，连续遭到好几次抢劫，财物损失倒是小事，身家性命也随时可能会遭到不测。逃难已经失去了意义，逃难必将山穷水尽，于是倪决定全家化整为零，陆陆续续返回家乡，他自己殿后，最后一个挑着担子绕道步行回到黎里。

倪慰家回到家乡靠做一些小买卖苦度光阴。这时的黎里镇上鱼龙混杂，各种各样的人物纷纷粉墨登场。原来大叫抗日的家伙，一变而为爱乡会、维持会、招待会的头子，在这会那会的遮羞布的掩盖下，不折不扣地当上了汉奸。到家没有多少天，他就认清了好多人，有赤裸裸的汉奸，有汪伪的绥靖队，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也有地方上的游击队，实际上这些人都在发国难财，区别在于，前二者明火执仗，后二者则盗用抗日之名而大捞钱财的土匪式的人物。

倪慰农深居简出，不好交际，更不会去拜会那些墙头草式的变节者，只想平静地居家过日子。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黎里那批败类，对倪慰农的一切行动都密切监视着，他们自己落水变节，很想让倪慰农也同流合污。可是几次试探都碰一鼻子的灰，倪慰农不合作的态度，遭到这帮小人的忌恨。他们先暗中向日军告密，假日本人之手把倪抓起来。日本人要抓他的消息传到了倪的耳中，他逃到了邻镇芦墟的王家躲了起来。汪伪汉奸抓不到倪慰农，就绑架他的大儿子，抓到吴江关起来，逼迫倪家四出托人，花钱保释。

民国29年7月，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部队组织的所谓游击队，加上地方上的自卫队，联合起来去攻打汪伪的绥靖队，不料一打，居然不是绥靖队的对手。游击队和自卫队败退到黎里镇东头，据守在太平桥西，借口阻击绥靖队的攻势，竟然把太平桥以东的所有房屋，一把火全部烧毁了。倪家租赁给他人开店的九楼九底店面就在其中，计有豫隆酱园、玉明楼茶馆、于福兴豆腐店、张桓记切面店。大火烧过之后，竟然谁也没有认真追查。明眼人知道，阻止汪伪绥靖队完全没有必要焚烧房屋，这把大火，实际上是国民党的所谓游击队和自卫队对倪慰农先生的打击报复。这一把大火，也使倪慰农先生更加看清了游击队和自卫队那帮头子的真面目。

大火过后，日本人太田亲自来到倪家，登门拜访，假惺惺地前来慰问，可是开口见喉咙的，太田是想借这把大火把倪慰农拉拢到大东亚共荣圈里去。倪慰农心明眼亮，当然不会上小日本的当。还有一个伪县长张鑫长，是黎里葫芦兜人，他多次前来拜访，请倪先生出任伪职，最后一次说，具体职务和职责范围可以请倪先生自己挑自己定。一身正气的倪慰农，大义凛然，严辞拒绝，弄得张鑫长灰溜溜地不敢再开口。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倪慰农先生非常兴奋。决心再次创办农场，让农民接受科学知识，提高农田产量，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于是满怀信心的倪慰农逐级向上汇报自己的设想，取得了国民党吴江县政府中的某些官员的支持，一起向省里申请经费。可是经费到位之后，却被挪作他用，办农场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早年在北京，倪慰农的想办农业实验园地，结果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经费被上级尽数侵吞。现在，经费批下来了，又被尽数侵吞。倪慰农算是彻底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官僚的腐败了，为此，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老师黄炎培那里，借到了《我从延安归来》一书。这是一本禁书，可是他看得津津有味，倪先生对共产党的领导、政策等

等有了一定的了解。1947年后，国共两党展开了内战，吴江的地下共产党领导人金佩扬和张振海同他多次谈话以后，倪先生决心站在共产党的一边，迎接解放。

土地改革前，倪已经没有什么田地了，倪先生还将自家所有的农具、农船和新买的一条牛献给农会。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评定倪慰农为开明绅士。1956年，倪先生当选为吴江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又当选为县政协委员。他的工作在黎里中学，专教植物学。为了用自己的知识教育下一代，他把自己家的后花园，改造成为蔬菜花木实验园地，无偿地送给学校做实验基地。

1958年，倪慰农患病赴沪就诊，手术后回乡，可是竟成半身不遂，1961年冬病逝。著作有《中等农业气象学》、《新屯垦法》等。

十一、红潮碧血毛啸岑



毛啸岑

毛啸岑一向追随柳亚子先生，参加新南社，宣传新思潮，1923年两人一起创办《新黎里》报，宣传新文化，鼓吹革命。不料，柳、毛被芦墟的土豪告发为“过激党”，《新黎里》报一度被查封，二人同被通辑。对此，柳亚子专门作过一首五言律诗赠予毛啸岑，诗如下：“啸岑吾弱弟，比例到章邹。可惜同文狱，还成漏网舟。红潮新世界，碧血旧阳秋；何日冥鸿逝，同为万里游。”为国为民的坚强意志，岂是告密和通辑所抑止得了的！

毛啸岑（1900－1972），名兆荣，从小有志于普及教育，小学毕业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返回黎里，到吴江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俗称黎里庙桥弄小学当教师。当时四高小学清一色旧文人，只毛啸岑科班出身，专业教育人才。1923年，毛啸岑任四高校长，

他认为若大一个吴江县只有一所中学，无法满足小学毕业生升学的需求。于是他多方设法，积极筹措，又征得当局的资助，改建部分校舍，成立了初中部，聘请当地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当教师。在四高任职期间，军阀割据混战，同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新旧势力的较量非常激烈。1924年1月，毛啸岑由柳亚子先生介绍，加入了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坚决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啸岑下令在校内高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当时，革命军尚未到达，好些人为毛的这一举措忐忑不安。一天，吴江县教育局局长金天翮莅校视察，看到校内悬挂国民党党旗，心里很不托底，认为不宜悬挂，但毛啸岑态度坚决，面对视察者的批评镇定自若，应付有方。金局长不再批驳，留下了“未免太早”一语就匆匆离去。

1924年至1926年年间，吴江县党部先后举行五次代表大会，毛啸岑积极配合柳亚子筹备并主持了会议。又协助柳亚子创办《新黎里》报，宣传国民革命与三大政策，目的要把封建意识笼罩的旧黎里改造成为适合时代潮流的新黎里。《新黎里》报发刊词共有两篇，一为柳亚子所写，另一就是毛啸岑的手笔。毛文内有“黎里社会，沉寂极了！难道让他因循下去吗？我们既是黎里人；哪可不设法整顿呢！作中正的舆论为社会底南针，是本刊底惟一责任。”中间列举了黎里镇当时应兴应革的许多事情，件件切中时弊。接着写道：“大凡一种有益的事情，没有人去提倡，一定不能通行；一种堕落的事情，没有人去惊醒，一定不能觉悟，那提倡和惊醒底责任，本刊也是义不容辞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毛啸岑积极配合柳亚子，团结了当地和旅外的进步人士64名，顺利地刊出了《新黎里》报，从1923年4月1日开始，每月两期，发表种种振聋发聩的文字。意想不到的是，出到第6期，邻镇芦墟有土豪向官府告发毛啸岑和柳亚子等人为“过激党”，吴江县署奉省长公署之命，勒令《新黎里》报停刊，指令县警察所对柳亚子、毛啸岑和《新黎里》报从速调查。

士豪的阴谋得逞，叫嚣“折柳吹毛”，扬言要杀七个半头，头三名就是柳亚子、毛啸岑，还有芦墟的沈长公。面对压城的黑云，柳亚子沉着镇定，据理力争，毛啸岑则雇了一条小船遍游吴江18乡镇，向各界人士说明事实真相，请各界地方人士联名具保，务必让《新黎里》复刊。吴江县警察所命警佐李涤负责调查《新黎里》报一案。李涤字汝航，喜欢吟诗作画结交文人墨客，也是南社社友，一向敬仰柳亚子为人。李涤深入调查，主持正义，返回县警所后如实汇报。同时，吴江18乡镇各界为柳亚子抗诬，请求继续发行《新黎里》报的函件，犹如雪片似的飞进吴江县署，飞到江苏省长公署。最后《新黎里》停刊仅仅一月，就于8月1日复刊了。柳亚子和毛啸岑商量后，作了一些策略性的调整，总编辑改由毛啸岑担任，柳亚子发表文章改用“重瞳”“ＹＴ”等化名。

1925年10月，毛啸岑被县教育局选为县督学，当地家长与学生既高兴又惋惜，高兴的是选拔毛啸岑是吴江教育的幸事，惋惜的是黎里少了一名好老师一位好校长。当了县督学，毛啸岑将视察学校看作宣传国民革命的大好时机，活动范围日益扩大。次年夏天，守旧派实在憋不住，再次向军阀孙传芳告发毛啸岑，孙下了一纸密电，令吴江县署将毛啸岑“就地正法”。幸亏毛啸岑早得消息，立即离开黎里循迹上海，来到暨南大学任教。当时，江苏省省党部设在上海，正好需要人才，省党部负责人侯绍裘邀请毛啸岑出任省党部文书科长，后任秘书长。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工作重点，是反对封建军阀并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毛啸岑任省党部秘书长期间，与沈雁冰、高尔柏、沈联璧等人兼任《神州日报》与《中南晚报》编辑。1927年2月，孙传芳的爪牙李宝章查封两报馆，毛啸岑得知消息，立即奔赴报馆想通风报信，可是报馆已被查封，报馆的蒋裕泉已被租界捕房逮捕。毛啸岑只得退回省党部与侯绍裘商量，又找济难会设法营救，最终花

了四千两银子买通法国领事，蒋裕泉才免于引渡，不久国民党革命军打垮了李宝章，蒋裕泉释放出狱。

1927年3月，江苏省党部迁至南京。南京形势非常复杂，出现了三个所谓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四个南京总工会与劳工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那些假的市党部、总工会、劳工会等逐一被封了门。省党部迁抵南京后，正式的总工会、农民协会以及学生会等都在市党部的领导下进行正常工作。毛啸岑赴宁，又组织成立了市教育会。4月8日下午，省、市两党部被杨虎、张群率领一批人捣毁，工作人员打伤的打伤，绑架的绑架。毛啸岑隔夜接到过一个要他“明天当心点”的电话，所以预先有所提防，他把一切印信文件用手帕包扎一起，置于桌上，准备紧急时携带出走。一听有人前来抓人，毛啸岑立即把手帕包往米囤里一塞，和张曙时急急向后门跑去，可是后门也已经被人看管，最后在混乱的“打倒跨党分子”（指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国民党党员）的叫嚣声中，被绳捆索绑，挟出大门。正好碰到从汉口前来南京的少将吴淇，吴与张曙时相熟，问清了原委，当即喝令押解人员释放了毛、张二人。

黄昏时分，毛啸岑拿回手帕包，到旅社内与侯绍裘相见。侯说他们已经动员了近10万人，第二天将在半边街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将向蒋总司令请愿，提出三项条件：一，保证省、市两党部及人民团体的正常工作；二，释放所有绑架人员；三，惩办流氓暴徒。9日上年，毛啸岑和侯绍裘等人来到半边街会场，突然有情报说有人将在会场上暗杀侯绍裘，在众人力劝之后，侯绍裘才越墙离开会场。大会由毛啸岑和刘少游二人主持。侯临行时说，必须坚持斗争，万一失败，各回家乡，伺机再动。

请愿队伍集合完毕，三项请愿条件议决通过，整队到总司令部请愿。9时许，毛啸岑先后派遣了两批代表进去与总司令交涉，可是直到下午4时，依然没有什么信息。于是毛啸岑亲自率领代表进

入总司令部。终于，蒋介石开门出来，咆哮着说："孙传芳已在龙潭渡江了，没有工夫与你们多啰苏！"说完"呼"的一声关上了门。接着，听到司令部隔壁有人打电话命令接电话人："多来些人，要带铁棍！"不到半小时，大门外群众被手持铁棍的暴徒打散，许多人受伤。毛啸岑冲到外面，请愿人群已经被打散，他只得脱身离开。不几天，毛回到黎里，准备在家乡活动，可是5月8日夜半，蒋介石派人前来，指名查捕柳亚子和毛啸岑。毛闻讯立即藏匿在友人家，三天后往浙江西塘镇避难。同年9月，受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吴江乡村师范之邀，出任教师。

在乡村师范四年时间，毛啸岑的教育循循善诱，常寓革命道理于日常教学之中，青年学子，受过他教育的，思想都大有进步。其中陈树英、严汉民等，因为毛老师的影响，走上了革命之路。

1931年，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被捕，毛啸岑受命辞去乡师教职，以南京国民党革命军遗族学校教员的身份，在南京任救邓联络员。1932年，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毛啸岑又受命去杭州，和有关人士接洽，密谋策动蒋军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在杭州反蒋。

1932年9月，毛啸岑再到上海，先后任南洋高级中学、民立中学、正风文学院等教职。1935年9月，毛啸岑进入招商局会计室工作，"八一三"事变发生，上海沦陷，招商局改为卫利韩公司。当时大量的学校被日伪接收，爱国师生没有立足之地。这时，毛啸岑见到了两个吴江同乡，张贡粟和张仲友，张贡粟原是苏州中学教务主任，张仲友原是金山七县联立师范校长。决意帮助二张租用卫利韩公司大楼当校舍，使苏中与联师合并复校，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搞得有声有色，声誉大噪。

1939年毛啸岑离开上海赴香港，由同邑王绍鏊介绍，在徐明诚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香港沦陷后，毛又辗转到达重庆。在重庆，与柳亚子先生重逢，又得友人帮助，办起了保险公司。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毛啸岑于1946年5月回到上海，专程拜访了王绍鏊，王仍旧让毛啸岑参加情报工作。毛欣然受命，不久，王介绍中共下地党员徐雪寒、叶景灏与毛啸岑相识，希望毛啸岑不再搞什么保险，改行在上海成立一家由私人经营的银行。一方面，为党筹集活动经费，另一方面利用金融界的地位，团结一批中小银行中的上层人物，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准备。毛啸岑虽然不熟悉银行业务，为了顾全大局，慨然受命。

经过毛、叶、徐等人的积极筹建，仅仅半年时间，“中级信用信托公司”基本筹备就绪。公司名称是沿用一家已经停业九年而未撤销营业执照的单位。资金除毛、叶招股外，不足之数由中共提供。

为了使公司涂上一层保护色，特邀了国民党元老许世英任董事长，董事中有CC系红人秘书长仲肇湘、中央

何香凝柳亚子合作赠毛啸岑红梅



合作金库总经理陆再云等。毛啸岑任公司总经理，叶景灏任副总经理，共同负责经营业务。公司开业的同时，建立起一套暗账，逐月将账面的盈利暗暗转入，再购买黄金保值。1948年，每月大致转入30至40两黄金。

1949年初，毛啸岑知道叶景灏等人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对金融界上层人士做工作，为安定人心迎接解放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1950年4月起，毛啸岑先后担任中国通商银行公方代表、总经理、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民建委员和市工商联常务委员等职。

十二、梨村五子

清末民初，黎里有五位知识分子经常聚会、游乐，喝酒、吟诗、填词，议论时事，抒发感慨，时称“梨村五子”。梨村是黎里别称梨花村的简称。这五子是朱剑芒、朱剑锋、沈剑霜、顾悼秋和周云。他们追随柳亚子，全都加入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组织消寒社和消夏社，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后，柳亚子在黎里组织酒社，梨村五子全都成为酒社社员。接下来，顾悼秋还发起成立梨社，梨村五子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梨村五子以朱剑芒（1890-1970）最有成就，剑芒原名长绥，由于慕名古代侠士朱家而改名慕家，字仲康、仲亢，剑芒是别号，别署敏於、茗余、太赤、朱肆、古狂、佩双，室名吹花嚼蕊庐、莺愁蝶倦室。

剑芒幼年家贫，自幼同他的胞兄剑锋一起随父课读，剑芒少年早慧，11岁即能诗文、书法及篆刻，12岁能写擘窠大字，在全县数百人参加的书法比赛中获第9名，家乡人目为神童、小书家。1906年朱剑芒17岁，在

朱剑芒



乡间任塾师，开始独立生活。辛亥革命时，与吴江县在参议会任议员的表叔陈孟侠一起创办黎里平民小学，编辑《楔粹报》，组织禁烟分会，崭露头角，苏州多所学校都有意招聘他前去任教，一度出任苏州博文学校和桃坞中学教职。21岁那年，剑芒娶盛泽王湘君为妻，结婚时，南社社员王大觉送来的贺礼，竟然是白纸蓝边，就像平时丧事样的色彩。同时加送屏条四幅，是一首长歌，内容大意是:剑芒非常人，我不敢以常人目之。值其结缡，写诗以勖其志，弗以燕尔忘革命志业，还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等语。剑芒父亲尽管开明，但对此毕竟心存芥蒂，不允许悬挂出来。经剑芒协商，最后张挂在新房当中。

1919年剑芒到上海执教于环球中国学生会日校、竞雄女学和市北中学等校，兼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朱约顾悼秋赴沪，任职于湖州旅沪公学，二人诗酒往还无虚日，并与周瘦鹃、范烟桥、郑逸梅等南社社员密切交往。工作之余，朱剑芒经常向《大世界》、《新世界》以及先施乐园等创办的刊物上撰写各类文稿。

剑芒思维敏捷，信手涂抹，皆能成文，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善于打腹稿”。他草拟书信、缮写文章，诸如书写各种对联、条幅和市肆招额等等，只要是动笔的，一律不起草稿，似乎不假思索，信手为之，甚至抗战期间，卖文卖字为生，为人作长篇寿屏也不起草稿。

北伐军兴，朱剑芒秘密编著了一套《三民主义国文读本》，等到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各校普遍采用这套课本，由此声名大噪。1940年，朱在福建任监察院审计部驻外稽查兼福建审计处第三组主任。严家淦在闽任财政厅长，严是朱20年前苏州桃坞中学学生，严家淦登门访谒，请老师迁入省银行宿舍，聘为经济研究室特约编辑，严结婚时朱作为证婚人。新中国成立后，朱剑芒多次写信给在台湾的严家淦，希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1951年，任常熟市政协副主席，创建了政协文史组、金石书法组、诗词组，对常熟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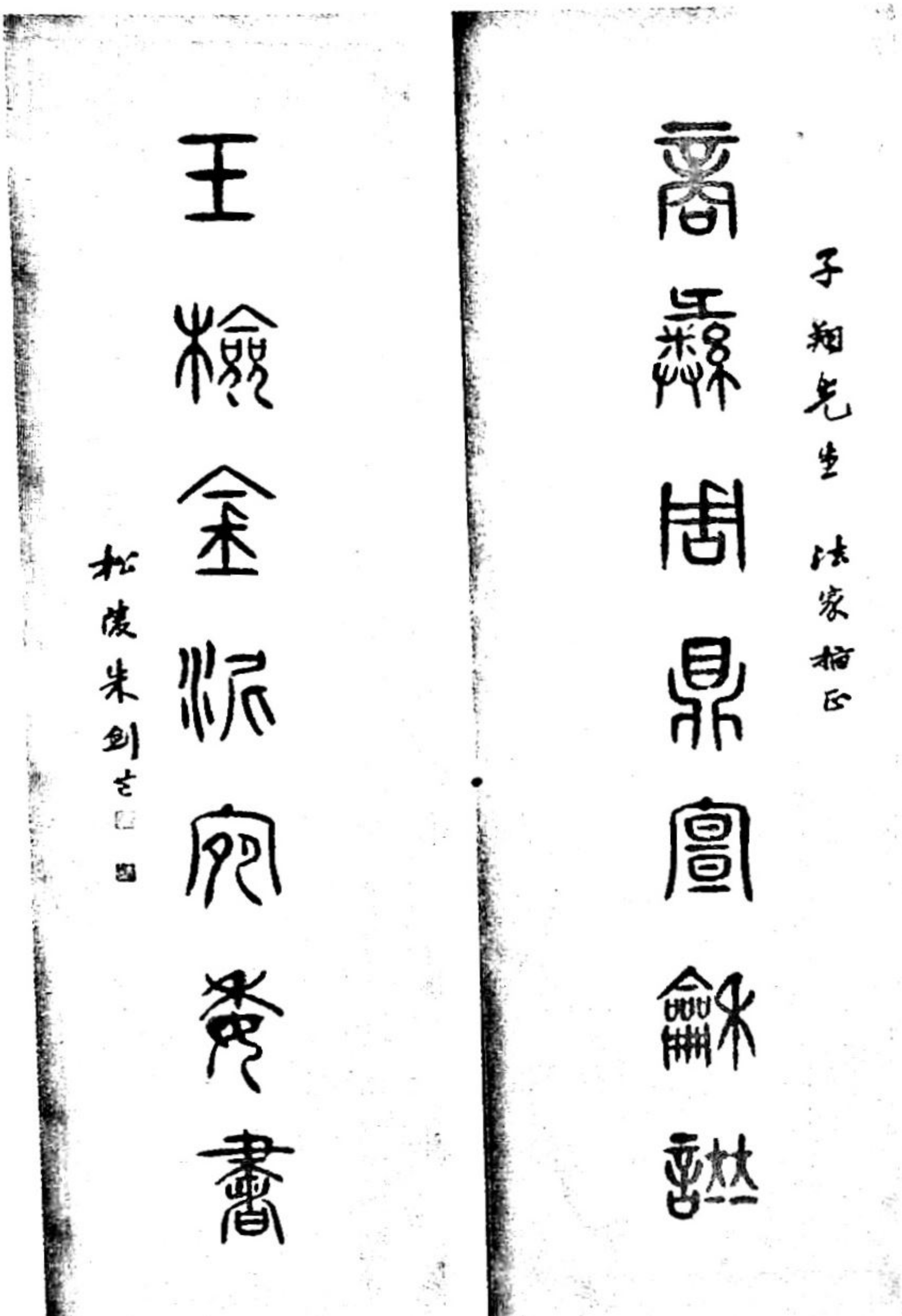
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未到芒在福建任职时，曾发起成立南社闽集，在《人报》上发表《南社感旧录》，在上海三乐社出处的《罗汉菜》刊物上，撰写了《南社诗话》。他还想调查南社各路人物，撰写《南社人鬼录》，他认为，经过时代动荡，政局变易，能保持正气，没有丧失人格者，即使已经死亡，但他们的精神不死，当称之为人。反之，虽然还在行走，但人格丧失，已无灵魂，当目之为鬼。

朱剑芒是一位教育家、作家、书法家，他又长于诗词、小说和杂文。主要著作有《我所知道的南社》、《南社史话》、《南社感旧录》、《国殇凭吊录》和《陶庵梦忆考》等。

朱剑锋（1888—？）是剑芒的胞兄，他们的父亲朱凤来，字少松，得中秀才之后乡试屡试不第，于是绝意功名，在家设课授徒，剑锋与剑芒随父课读。剑锋兄弟俩均未进过学校，除了父亲作他们的启蒙老师外，没有其他老师。好在家中藏书较

朱剑芒手迹



富，足够兄弟俩浏览攻读。外祖父赵龙门在吴江属于有名的书法家，兄弟俩耳濡目染，从小就养成临池的习惯，外祖父去世后，遗留的碑帖及墨迹兄弟俩视为珍贵的财富。剑锋、剑芒兄弟都能画，剑锋尤其擅长画梅，极负时人称赏，大凡有人求画，不管如何忙，一定按时交稿，且不收分文。平时兄弟两人相互朗诵，默背《昭明文选》及汉魏唐宋的名家名篇为乐事。少年时期，剑锋受康梁影响，认定中国必须走君主立宪之途，常常放言高论，作诗均以排满反清为宗旨。追随柳亚子，加入南社之后，由改良而革命，思想发生质变。在思想及书法等方面，剑锋、剑芒兄弟基本一致，但对于诗歌，兄弟俩有分歧。

剑芒喜欢裘自珍，直溯晚唐李义山，与柳亚子先生基本相同。而朱剑锋，还有梨村五子中的沈剑霜喜爱宋人诗词，两人作诗喜学山谷体。不久，南社中以柳亚子为首，发起了唐宋诗体的论争，一场轩然大波，波及了剑锋和剑霜，为示对柳亚子先生的尊重，他们不再公然张扬尊宋旗号。

五子中最年少的是沈剑霜（1892－1932），剑霜名次约，天资颖慧，自幼家乡有神童的赞誉，容貌秀美而文质彬彬。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剑霜20来岁就开馆授徒为业。剑霜曾在上海文生氏英文补习学校学过英语，梨中五子中只有沈剑霜通英文。剑霜曾经翻译英国拜伦的诗歌，中文与英文都亲手缮写，秀丽悦目，诗也译得隽永。二十年代后期，盛泽徐氏在上海经商，深慕剑霜之名，聘请他到江宁路课读徐家二个儿子。膳食住宿和薪金都比较优厚，规定每月可以返黎一次，休假三四日，宾主相处有年，习以为常。1932年暮春，剑霜返家仅仅三天时间，人未返回上海而报丧之信报到徐家，原来剑霜因为伉俪间由细故而争吵，竟然愤而服毒自杀。剑霜擅长书法，曾为徐家儿子写过一个扇面，遒秀有致，录有他自作的二首诗：“两行红粉影娟娟，小字应呼作绛仙。此夜平分春一半，可扶清

梦到花前。”又:“积雪空江岁晚时，早开枝易褪胭脂。为教花抱飘零恨，只待东风好护持。”扇子的另一面绘有梅花，剑霜这两首诗专为题梅而作，读后可以窥见剑霜诗作风格之一斑。扇骨上的书画，是剑霜手刻，刀法很古劲。作有《剑霜龛遗稿》，可惜没有刊印，至今已经散佚。

剑霜富有口才，善于交友，浙江余姚籍南社社友戚牧（1877-1938），拟写了一副对联赠予剑霜：

上款:剑霜老友阁下雅属

联语:乌巾漉酒蓝田叔，

群麈谭禅白鹿仙

落款:甲寅之冬饭牛戚牧

下 钤朱文印“余姚宁戚饭牛”。

戚牧赠沈剑霜对联

戚牧的联语，是对老朋友的充分肯定。

上联“乌巾漉酒蓝田叔”，运用了两个古人的故事，一个陶潜，一个蓝瑛。《宋书·陶潜传》载，陶潜嗜酒，有一次，上级官员莅临，正好新酒刚熟，陶当即取下头上的葛巾用以漉酒，滤过后，照旧戴上。后人就用“葛巾漉酒”形容爱酒成癖，嗜酒、直率而又超脱。对联中易“葛巾”为“乌巾”，前者侧重巾的质地，后者侧重巾的颜色，意思不变。蓝田叔，

姓蓝名瑛，字田叔，号蝶。明钱塘人，善画山水，也作花鸟兰石，书法与刻印也颇可观。两位古人，沈剑霜同他们非常相类。剑霜爱喝酒，时不时会醉倒黑甜之乡，又有蓝田叔的技艺，爱好书法绘画，尤其擅长篆刻，柳亚子主编的《新黎里》报上，经常刊出沈剑霜篆刻润格，请刻者不少。柳亚子先生悼念张应春烈士的那枚“礼蓉招桂龛”印，就由沈剑霜镌刻，刀法娴熟可喜。

下联“群麈谭禅白鹿仙”，也运用了历史典故。麈尾，我国魏晋时代清谈家常执的一种道具，直到唐代还在士大夫间流行，宋以后才逐渐消失。麈尾形如树叶，下部靠柄处一般呈平直状，有点像扇面。关于这一点，歧义很多，故多说几句。古人记载，麈是一种大鹿，麈与鹿同行，麈尾摇动，可以指挥群鹿行向。于是手摇“麈尾”，就有了领袖群士的意义。后世对清谈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是一种空谈，其实不然，魏晋清谈是一种正规的学术讨论。参加者必须是名士或者准名士，讨论都有确定的主题，有一定的辩论方式，大多采用“主”“客”问难形式，先由主方提出一项讨论内容，简单叙述自己的见解，称为“竖义”或“立义”，然后由一客或数客提出问难。主与客，特别是竖义的主，必执麈尾作道具，以助谈锋。记得《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过，孙盛与殷浩谈论很久，端上来的饭菜都顾不得吃，彼此大甩麈尾，尾巴毛都落在饭菜上，直到最后饭菜都不能吃了。麈尾是魏晋六朝士林中流行的一种雅器，所谓“毫际起风流”，凝聚了那个时期的绮丽与辉煌，昭示士人的倜傥与风流，极具文化内蕴。谭禅，六朝时期禅确实是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谭禅，其实已经远远不止讲究佛经教义，它包括当时许多哲理的阐发。据说麈尾中以白麈最贵，因为白麈是神异之兽，更能领导群鹿。受赠者沈剑霜虽然并不领衔群伦，但他的谈锋甚健，稠人广众间，毫不怯弱，常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意态自若，许多人都对剑霜的口才深表佩服。戚牧撰写此句是对老朋友高度的赞赏。遗憾

的是剑霜仅在不惑之年就弃世而去。

1913年12月，沈剑霜和顾悼秋等组织消寒社，汇合所作的诗词为《销寒集》。柳亚子为消寒社题了《消寒一绝》:“袁安高卧太寒酸，党尉羊羔未尽欢。愿得健儿三百万，咸阳一炬作消寒。”

朱剑锋与顾悼秋二人对衣服及色彩，别有所好。他俩平日在长袍之外，不穿马褂，喜欢罩一件背心，服装色彩特别浓艳，常常薰得香气扑鼻，蓄着一头长发，一般人都认为他俩怪癖。

顾悼秋（1886-1929），名无咎，字崧臣，别号悼秋、灵云和退斋等，还有其他别署如:老服、服媚、神州酒帝等，室名灵云别馆、服媚室等。论年龄他比柳亚子年长，论辈份他是柳亚子表侄，堂兄弟辈中排行第10，柳亚子爱称他“十郎”，民元前加入南社，入社号161。脸面白皙，犹如敷了白粉，南社中人把他看作三国的何宴再世，称为“何郎”。悼秋喜欢喝酒、听琴、观赏庭园小景，能绘画、能唱昆曲，擅长填词、吟诗、篆刻、书法，也善吹笛，好结交文人墨客。

顾悼秋早年着实满怀豪情，参加南社，以笔作武器，配合同盟会努力推翻满清王朝，迎来了中华民国肇造，袁世凯称帝，顾悼秋长歌当哭，赋诗痛骂。记得有一次悼秋喝得醉醺醺的，忽然有人拿来一本容庚的《圭塘倡和集》，容庚是袁世凯的别署，与几个清廷遗老所作的唱和诗，由袁氏二子寒云辑录后出版。悼秋一看，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掷到地上，拉起笔来，就是一首七律:

《醉后适有人持圭塘唱和集一卷投赠者遂掷之地并占五十六字呈南社诸子》

长醒何如长醉后，我虽醉矣愈于醒。

轮囷肝胆酹空泻，摇落河山月半荧。

宝剑不曾诛贼桧，神州拼使泣新亭。

愤来掷碎圭塘稿，便欲从军出井陉。

一气呵成，胸中的怒气、豪气，腾跃纸上。

可是接下来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顾悼秋陷入了迷茫，沉湎于酒，也沉缅于花花草草。

这位神州酒帝，专门为喝酒著了一集《服媚室酒话》，涉及了很多南社社友喝酒的趣闻。根据酒量与气度，顾将南社社友作了有趣的评述，“平生交游，如柳亚子、胡朴安、王大觉、朱剑芒、周瘦鹃，狂人之酒也。叶楚伧、陆伯鹓，酒人之酒也。沈剑霜、余十眉，诗人之酒也。余自谓在狂人酒人之间。大雅君子，其有言乎？”

对于表叔柳亚子喝酒的狂态，他也作了记载：“亚子表叔，平日滴酒不饮，迨意兴飚举之时，则立饮数斗不倦。乙卯中秋，同酒社时，尝与余及大觉乘醉至旷野奔走，折损其足，数阅月而愈。又尝游西湖，酒力既厚，感触国事，涕泪横胸，竟欲跃入湖中，其狂态盖可知矣。”

悼秋对自己的豪饮也有好些记录，录一例如下：“吴兴赵苕狂，性抗直，饮酒极豪，狂人之酒也，甫入座，即欲开战，且冒余有酒帝之号，乃树帜革命。余告以甲子逊位之诏，苕狂不信，已张拳作战状，而余亦雄心忽动，先浮六大白以应之，既而苕狂果降服矣。且曰：‘愿受册封’，乃予赵王之爵，一时豪兴，更可各他年掸掌。”

悼秋在上海，只要是酒店都可以一醉方休，可是偏偏有一家名为“马上侯”的酒家，别人请他光临，他不肯赏光，说：“马上侯，无非马上封侯之意，我淡泊功名，无干禄求官之想，不去，不去！”

顾悼秋除却喝酒，最喜的处身于江南小景格的园林，一边赏花，一边饮酒。每当酒至半酣，豪情顿起，或填词，或吟诗，或唱昆曲。顾悼秋更多的是吹笛，一支江南曲笛，非常悠扬动听。悼秋十分爱听琴曲，社中好有几个会弹奏几曲，他的外甥蔡冠洛便是操琴高手，一曲高山流水常令悼秋如醉如痴。1928年春，有个寄寓上海的广东人屠虞，善于操琴，珍藏有唐代雷氏旧物，泠泠七弦，极尽手挥目

送之妙。深慕悼秋的名声，致书备述倾慕之意，悼秋接到书信，非常兴奋，愿意订交。可不巧的是，悼秋有事急需返乡，等到重来上海，前往访晤，赓虞竟然已一病逝世，人天永隔。从此，悼秋听到琴声，必定念及赓虞，凄凄凉凉的直至伤心泪落，先前听琴是一种享受，后来听琴则是痛苦，最终不敢听琴。

顾悼秋擅长填词，不知为什么他又作怪地为自己刻了一方“词人半是娼家妇”，所填之词，落款常钤“飞燕旧主”印。1928年底，大约饮酒常常过量的缘故，顾悼秋突然小中疯，双脚难以行动，酒量大减，再也没了当年的豪情胜概。次年年初，悼秋卧病不起，病中不断地问家人“燕子来了没有？”家人莫名其妙，漫应“没有来。”3月22日下午，突然一双燕子喃呢入室，悼秋听了，含笑而去。那本是一时的巧合，可家人认定悼秋下一世将托生燕子，深信不疑。

顾悼秋除《服媚室酒话》外，还协助陈去病编辑《吴江县志》，与柳亚子一道搜罗乡邦文献，自辑了《禊湖诗续编》、《笠泽词征补编》，撰写了《灵云别馆散记》。还有诗词集子，去世后都留给了外甥蔡冠雄，可惜没有付印，时至今日看来已经散佚。

梨村五子最爱闹酒的是周云(1891－1951)，原名世恩，字一粟，号湛伯，别号酒痴，常常自称高阳酒徒。周云加入酒社，使集会多了一处场所，周云本是周元理第14代孙，家道殷实，家



开鉴草堂一角

有开鉴草堂，略具园林之胜，船厅、假山、石桌、石凳、荷花池、金银桂，再加一年四季的花花草草。每当良辰美景之际，贤主迎来嘉宾，四美偕俱，真正赏心乐事。

1916年夏天，酒痴把自家的开鉴草堂重新修葺了一下，继酒社之后又结消夏社，周云自己撰写了一首诗："草堂无恙守先人，庇荫垂今二百春。过眼烟云皆传舍，怡情风月老闲身。浚池引水休忘旧，种竹莳花点缀新。莫笑冥顽一拳石，沧桑几劫历红尘。"稍后，周酒痴又在草堂畔隙地增筑三楹屋舍，命名为"卷室"，将五子及黎里文人所作的诗篇一一粘贴在墙壁之间，琳琅满目的，供酒社朋辈观摹。

自号酒痴的周云，好客之极，开鉴草堂是梨村五子集会的据点，也是其他南社社员和外地来宾落脚的地方。开鉴草堂一共四进，名周寿恩堂，后二进，柳亚子一家从1898年起居住到1922年搬迁，柳亚子生活了整整24年。酒社、消寒社和消夏社存在的时候，柳亚子正好生活在此。因此，开鉴草堂天天高朋满座，诗酒留连。不过，周云的父母双亲，特别是母亲，不让儿子狂饮，每当朋好聚会吟饮，周家的婢女、奴仆一个个地被派来，传达家慈一道道训令，有时周老夫人亲自出马，耳提面命，絮絮不休。梨村五子习以为常，诙谐地称为"十二道金牌"。

梨村五子多次结伴出游。民国6年的春季，五子结伴同游杭州，与在杭的南社社员叙谈、交流，五人创作了大量诗词，多数载入《南社丛刻》。五人的交谊堪称莫逆，尽管个性志趣不尽相同，但他们行游与共，终生没有芥蒂。古人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梨村五子的交谊，堪作读书人的榜样。

十三、翳桑社

黎里作为江南文化古镇，文人众多，清代的黎川学舍，又名楔湖书院，是正规的学府，主要为应考科举而设。在书院设立之前，或者说已有书院，但是许多文艺活动在书院进行并不合适，因此古代的文人墨客，常常有雅集、雅聚，也称“文会”。

黎里的罗汉寺在明清两代，就是文人雅集之所。罗汉寺不是学府，但它胜于学府。罗汉寺的主持、方丈大多是饱学之士，还有其他一些高僧大德，他们多数拥有一技之长，诗歌、文章、书法、绘画、音乐、篆刻、棋艺、武术等等。因此，黎里的文人雅士，都与罗汉寺的和尚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结社，不过罗汉寺是经常性文会的宝地。

清末，柳亚子先生与同邑陈去病，上海金山的高天梅发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团结了一大批有志有为的青年，为反清排满不懈地努力，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为革命制造了舆论。柳亚子居住的黎里周寿恩堂和后来的赐福堂，那是黎里文人乃至全国各地进步知识分子汇集的处所。当然，南社与其他文艺团体存在明显区别，那就是南社雅集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黎里文人集会乃至结社，由来已久。抗日战争胜利后，黎里成

立了一个“翳桑社”，出版文艺刊物《浅作》。翳桑社是黎里地下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文艺团体，它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先说说翳桑社的组织和人员结构。

翳桑社的全称是“翳桑文艺研究社”。翳桑的含义是隐居在家乡的意思，发起人丁铎。1945年11月成立，按照当时规定，备专文向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报送社章、组织系统表、人事履历表、社员履历表和《浅作》试刊本，申请登记备案，到1947年2月20日因震泽女社员张育英被国民党震泽区区长逮捕，丁铎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出走而告解散，历时一年又四月。

丁铎与人合伙开设了一个文具店，地点在黎里镇上岸塘桥东边的问心堂中药铺下滩。翳桑社的社址就在文具店内。翳桑社成立的宗旨，《简章》和《征求同人办法》（刊登于《浅作》第三期）中明确规定：“联络友谊，研究文艺，练习出版技能。”

翳桑社规定入社的条件很简单：“思想纯正，意志坚定，爱好文艺之青年”。

入社手续也非常简单，一是自动加入，即写篇自我介绍，经社总务部认可就是；二是介绍入社，即由本社社员介绍。

社员入社，必须交纳一次性的入社费，还有每月的经常费。收费标准，由于通货膨胀而不断调整，据《浅作》登载，1946年3月到10月，调整过三次，入社费从50元调高到200元，月费从100元调高到500元。尽管有社费收入，而且不断提高，可是物价飞涨，社内经济仍然十分拮据，出刊《浅作》还得靠一些慷慨解囊的社员捐款。

翳桑社的组织形式，主要采取社员大会制，社员大会设社长、副社长，下设各职能组。职能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由各次社员大会通过确定，据第四次社员大会确定的组织系统表，社员大会之下设有三组、一会、一馆。发起人丁铎历任社长，副社长二次社员大会

上确定为徐可曼，三次大会后撤销了副社长一职。总务组，二次大会定为连一祥，三次大会后为邱宣明。出版组，二次大会是社长丁铎兼任，邱宣明为副，三次大会更换为凌行可，四次大会后是平静人。联谊组，由四次大会后增设，负责人丁铎兼。编委会成员，二次大会定有柳稚、丁铎、吴关龙、凌行可等四人。四次大会定为负责人吴关龙，阅稿平静人和凌行可。图书馆是三次大会起设立的，一直由徐可曼负责，吴关龙助理。

翳桑社的社员约有六、七十人，黎里占多数，其次是盛泽、横扇、震泽、芦墟等镇。邻县嘉兴、嘉善和南京、上海、苏州也有人参加。从社会职业来看，以青年店员职工为主，还有学生、教师和医生。

黎里:丁铎（店员）、徐可曼（医生）、连一祥（教师）、吴关龙（店员）、凌行可（店员）、邱宣明（店员）、周剑镕（司帐）、周陶兴、平藻、漆群、丁宝忠（学生）、凌肇基（职工）、蔡祺德、徐文跃、平静人（司帐）、平元增（职工）、柳龙柏（教师）、朱其坤、秦灵一（职工），还有孙君励、魏力能（职业不明）等。

盛泽:俞双人、周心雄、卢寿祺、钱增荣、蒋炳顺、沈旭、朱寒梅、张玉良、许铭、杨开明、卫朴、翁养时。

横扇:周一非、陈武场、家骏、吴鉴、史流。

震泽:张育英。

芦墟:许眉。

苏州:吕世健、包士清、范翔、顾家椿。

嘉兴:笠人。

嘉善:张鹤鸣。

南京:金培行。

上海:王维章。

其他地区不明的有:张暮霞、钱耀武、马侃、顾朗春、流萍、徐

仁。

再说说翳桑社的刊物《浅作》。

翳桑社的活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召开社员参加文艺座谈会，研究探讨文艺和写作方面的问题；二是出刊油印文艺刊物《浅作》；三是办“集阅图书馆”，设在徐可曼家里，书是向社员征集起来的，供社员阅读。三项活动，其主要的是《浅作》。

1944年，丁铎在官塘上裕隆酱园当学徒，与园内同事周剑鎔、吴仲弢等人自办刊物《浅作》，用八开的蜡纸油印，每期一二张，不装订，出了几期后停刊。1945年11月，翳桑社成立，在向国民党县党部申请登记备案时，出了一期试刊，用《浅作》复刊号名义上报送审，翳桑社的《浅作》16开大小，每期20余页，装订成册。第一二期，注明“纯文艺半月刊”，第三期起改注为“月刊”，每期都写有“本刊已呈请吴江县党部登记备案”和“非卖品”等字样。正式出刊是1945年12月6日第一期，到1946年12月11日第10期止，正好一年时间，计223页，平均每期刊文17篇。每期印数约七、八十册，后期最多达120册。

《浅作》内容比较丰富，有文艺评论、小说、剧作、散文、诗歌、木刻等等。大多是抒情性的，政治色彩不浓。封面、扉页设计考究，有木刻有题花。每期出版后寄上海生活书店，征求意见，对反馈来的批评、建议，在《浅作》上刊登出来，供大家学习参考。

写稿人，常见的有平天凤的封面设计，徐可曼的扉页木刻，丁铎的“编后”，柳稚的评论文和译文，邱宣明的散文，一菲的集邮漫谈，林莽、寄帆、冶金的小说，汀兰、孤雁、金伟的诗，还有吴关龙、凌行可、张鹤鸣、俞双人、平元增等，约56名。《浅作》的写作者都是爱好文艺的年轻人，稿子写得比较稚嫩，用词不够贴切，逻辑性不强，小说与散文也显得有点做作。但是，总体来说，能够歌颂进步，暴露黑暗，抨击邪恶，是积极向上的。

翳桑社在当时属于合法的群众性进步文艺团体，它的存在，促进了黎里等地文艺的发展，同时，翳桑社又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建立翳桑社，由黎里地下党肖方同志批准，由中共地下党员丁铎、迮一祥、吴关龙、凌行可等人实际组织操办。共产党通过翳桑社，团结了一批社会知识青年，从中发展了党的地下组织，翳桑社社员张鹤鸣、平元增、平静人等，就是从《浅作》起步同地下工作者接近，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

最后介绍一下翳桑社的实际创办人、领导人丁铎。

丁铎（1924 — 1987），原名丁源贵，后来改名陈振。

丁铎少年时在黎里镇东头的裕隆酱园当学徒。由于对文艺的爱好，学徒期间自创文艺刊物《浅作》。1944年冬，经地下党党员吴关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地下党决定在黎里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就让丁铎与迮一祥二人合伙在塘桥上岸开设一个文具书报店，借此掩护上级领导沈小方等人来黎里接头并开展工作。为了发展组织，1945年11月，地下党示意丁铎成立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翳桑文艺研究社”，由丁铎出任社长，出版油印刊物《浅作》。通过文艺活动，团结进步青年，宣传革命，发展组织。

1947年2月，震泽翳桑社女社员张育英涉嫌“赤化”，被国民党震泽区区长逮捕，押送吴江军事法庭审讯。地下党当即命令丁铎到邻镇梅堰暂避。同年10月，中统往梅堰捉拿丁铎，丁闻讯连夜出走浙江桐乡。到桐乡改名陈振，进桐乡简师读书，在学期间于该校建立党组织。中共吴嘉工委成立后，他在工委的领导下，积极发展党组织，开展统战、策反工作。1949年5月初，桐乡国民党党政要员投诚起义，解放军先头部队顺利进城，桐乡和平解放。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丁铎个人决定，打入敌人内部，想为党更好地工作，9月10日自行去盛泽参加“中统”组织。仅仅一个月，10月份就脱离该组织，自行返黎，同年12月与中共组织重新

接上关系。因为这一个人决定，丁铎在后来历尽坎坷。

解放后，丁铎在浙江省党校工作，1952年，浙江省委以涉及中统之嫌将丁铎开除出党。调到浙江省供销合作干校工作。1962年，丁铎又被精简至安吉县南北湖乡务农。1986年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经过复核，最终为丁铎平反，撤销过去的处分，恢复中共党籍。

1987年1月，丁铎病逝于浙江湖州。

十四、群像侧影

沈毓桂

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叟，赘翁。祖籍松陵镇，沈毓桂自小迁到黎里定居，早年读书应考科举，可是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始终没能进学，年近不惑，再次参加秀才考试，还是落第，终于彻底灰了心。43岁那年，沈毓桂来到上海，结识了清末著名政论家和学者王韬。沈毓桂与王韬的经历有以类似，王韬出生苏州，18岁考取秀才，接下来屡试不中，任职于英国教会所办的海印书局，后上书太平军献策，时人有“长毛状元王韬”之称。

沈毓桂经王韬介绍进入上海墨海书馆，接受西学并介绍西学。咸丰七年（1857）充当传教士的代笔文士，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接受了洗礼。稍后，跟随传教士艾约瑟到山东等地传教，同治五年（1866）被授予云南通判，但没有到任，同治七年，任传教士林乐知记室，协助林乐知创办《万国公报》，出任《万国公报》主笔，向国人介绍基督教，介绍西学，倡导革新。光绪八年（1882年）沈毓桂创办了上海中西书院，任总教习，努力传布新思想，努力培养贯通中西学的人才，就沈毓桂总教习任期内，上海中西书院培养各类

人才3000余名。

陈松夫

陈松夫（1867 — 1926），原名松甫，字岭秀，早年到嘉兴拜师学习绘画，民国年间在黎里第四高等小学及树人高等小学执教。对于丹青，陈松夫多方擅长，尤其精通仕女人物，风姿神态栩栩如生，笔下的花鸟则别有情趣，生意盎然。民国13年10月下旬，江苏省在上海兴办第一届美术展览会，陈松夫的国画作品参加展出，经评议，陈的作品列入超等，获得了金质奖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陈辞去教职，专事丹青，求画者络绎不绝。柳亚子先生创办的《新黎里》报上，留有杨千里、高旭、蔡寅等人专门为他订的一则润例，录如下：

山水中堂四尺八元，五尺十二元，六尺十六元，八尺廿四元，一丈四十元，丈二六十元；

屏条减半，横帧减半，立轴手卷每尺二元，扇面二元，册页同；

人物花卉七折，点品另议。

这在当时是非常高昂的价位，但求画者依然接踵而来，供不应求。

殷佩六

殷佩六（1881 — 1941），原名恭壬，号佩六，黎里镇长田人。少年时与弟弟星环（殷明珠父亲）随父亲至乌镇读书，又跟随乌镇的中医世家学医。

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24岁的殷佩六在新荆家弄悬壶

行医，辛亥革命后出任水警队长，驻守吴江县城区。民国5年（1916年），袁世凯称帝，殷佩六与何嘉禄会合组成独立军，又称护国军，宣布吴江独立，誓师讨袁。4月16日，殷佩六与何嘉禄带领护国军占领吴江县城，18日起，遭苏州水警及官兵2000人进攻。护国军英勇反击，可是双方兵力悬殊，武器装备尤其悬殊，激战三天三夜，21日护国军无奈败退，随后宣告解散。袁军悬赏3000块大洋缉拿殷佩六，殷佩六先后隐匿于家乡和上海租界。半年后，出任广东翁源县知县近3年，又调任连山县知县2年。五年知县期间，殷佩六捕盗贼，兴教育，修水利，行惠政，卸任时，当地人民沿途欢送。民国16年，因健康状况欠佳，返回黎里，在夏家桥设诊所，擅长内科、妇科，对贫困病人均施医施药。

民国11年5月，殷佩六倡议组织黎里市民公社，当选为社长。他发动社员多次参加反帝爱国政治活动，他个人经常在《民国日报》等刊物上发表通电，大义凛然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平时，殷佩六一贯热心公益善举，竭尽全力地修桥筑路、改善环境卫生、兴办平民教育、组织救火会、调解民间纠纷等，深得家乡人民的赞颂。民国14年，出任水警15队队长，后调任18队队长，不久，又任瓯海县长。民国17年，因气喘病日益严重，辞职返黎里，仍挂牌行医，民国30年逝世。

金一新

金一新（1890－1950），字瀛怀，黎里镇杨墅乡人，父亲金苍柏系著名中医。金一新兄弟四人跟随父亲先后在嘉兴、上海等地求学。金一新在上海民立中学毕业，成绩优良，被选拔赴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学成归国，先后在上海大学任教授，嘉兴永明公司经理兼工程师，江苏省南京工业专门学校代理校长兼机械科主

任。民国12年，江苏省教育厅赴日本考察团去日本考察工业，稍后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科长、浦津铁路局材料厂主任，抗战胜利后随该校迁回上海，依然出任教职，直到1950年因癌症逝世。

金一新著作有《基本工程画》、《机械工程画》、《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学》和《实用基本电工学》等书。

汝贤

汝贤（1891 — 1984），字圣秋，祖居汝家桥东侧故宅。

汝贤早年就读于邻镇同里金松岑创办的同川公学，毕业后兼任该校数学、体育教员，与陈去病、柳亚子等人是同窗挚友。汝贤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前夕不仅自己剪去辫子，而且积极参加吴江县的反满剪辫运动。1916年，同乡殷佩六先生讨袁不幸失败，汝贤暗中为殷佩六等人隐藏枪支，掩护藏匿，最后使殷佩六等人在紧锣密鼓的缉捕声中安然脱身。民国8年至26年，汝贤先后在15个水利工程部门发挥自己的水利专长，获得七级荣誉工务员证书，他积极从事抢堵沿海堤塘和决口的黄河，疏泄长

汝贤



江、淮河等水道，修建了众多的灌溉设施。解放后，汝贤协助土改工作组丈量土地，测绘图表，应江苏和苏州水利部门的邀请，视察太湖水网系统，特别对太湖的水涨水落和种种水利设施，深入实地收集到了许多第一手的数据，为全面治理太湖，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1954年太湖流域发生特大水灾，汝贤天天坚持测量水位，观测天象，汇总长江上下游地理环境及水系情况，经过综合与分析，向省人民政府提出了不少合理化的建议，使太湖流域化险为夷。晚年，汝贤改业西药。历任吴江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金诵盘

金诵盘（1894－1958），出身于儒医世家，自小禀承父教，在中医方面有着扎实的功底。21岁那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本科。民国五年任浙江督军府军医，不久辞职，到上海开设私人诊所。由于他将中、西医融会贯通，医术高明，病家纷纷前往求治。当时适逢禁烟令颁布，瘾君子前来求治，金诵盘自创酪酊法戒毒，效果良好，一般不到半个月，必定可以戒除恶习。

金诵盘为人正直，慷慨豪爽，交游十分广泛。他与孙中山先生交谊很深。孙中山先生几次病重，亏得金诵盘施妙手而回春。民国13年，孙中山先生患病，经金诵盘精心治疗，基本痊愈，孙中山先生欣然题写了“是医国手”横匾相赠。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军校时特地为蒋介石（蒋介石有二子）、戴季陶、金诵盘三人的四个儿子，分别取名为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金定国，取“经纬安定”意思。四人当年来往密切，亲如兄弟。民国14年3月，孙先生旧病复发，急电召金诵盘进京，可惜为时已晚，等金诵盘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孙中山先生已于3月12日病逝。金诵盘痛哭失声，晕倒在地，经北京医院抢救，月余之后才勉强康复。

黄埔军校创办后，金诵盘应邀前往，出任黄埔军校卫生处处长，兼军医补习所教务长。北伐战争开始，金任国民革命军卫生处处长兼总司令部侍从医官，后来由于同蒋介石意见不合，金返回上海，开设静安医院。

抗战爆发，金诵盘毅然将静安医院全部医疗设备及被服等捐献红十字会，只身赴南京请缨抗日，被任命为卫生勤务部野战救护处处长，后又任卫生勤务部部长。不久南京沦陷，他因救护伤员不及撤离，只好到外国使馆内避难，隐藏三月有余，经友人设法，化装成回乡难民，由上海转道香港来到武汉。以后任军医署卫生监察委员会主任、陆海空总司令卫生处处长、卫生部统计司司长等职，赴重庆后，任军医署副主任、院长。民国27年冬，他作为重庆方面代表赴延安慰问病员，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晤谈、合影，给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战胜利后，金诵盘认识到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不愿同流合污，于是辞职返回南京开设私人诊所。民国35年，被选为全国医师公会理事长。解放前夕，由南京迁回到故乡黎里设所行医，对经济困难者送医送药，每逢阴历初一、月半，一定到出生地杨墅乡送诊，风雨无阻，乡民有口皆碑。

解放后镇反时，由于金诵盘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过高级职务而入狱，先被判死缓，后因查无罪行，减为有期徒刑两年。他在狱中写下了近2万字的坦白书，自认扪心无愧。半年后邵力子闻讯，急告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当即电示华东军政委员会："查明金诵盘下落，予以特殊照顾。"接着经人保释来到无锡，出任苏南行署卫生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调任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驻会委员，后任顾问，当选江苏省政协委员。1958年，患胰腺癌医治无效逝世。

朱莲舫



朱莲舫

朱莲舫（1909－1983），1935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先后任上海医院、上海光华医院、陕西省立医院及陕西医专副教授、眼科医师。民国37年回到家乡黎里，与周自强合开同仁医院，医院设门诊部、住院部，1950年歇业。

1951年因政治嫌疑被捕，同年11月释放。1952年重返西安，在西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任眼科医师，不久升为眼科主任，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至1972年，朱莲舫10次被评为省、市和医院先进工作者、陕西省劳动模范。1956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委员，1978年以来为西安市政协委员。他业务上精益求精，既能为病人施行白内障、青光眼手术，又能进行斜眼、大小眼矫形手术。朱莲舫于1983年9月病逝，临终前，提出捐献遗体及眼睛要求，其遗体至今仍保留在西安医学院。

柳无忌



柳无忌

柳无忌（1907－2002），笔名啸霞，胜己，柳亚子儿子，美籍华人教授。

早年就读于黎里第四高等小学，聪明好学，与蒯世曛、傅伯伦，还有汝人玉、汝人铸昆弟合称“四高五虎将”。192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接着就赴美留学，在耶

鲁大学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1931年赴欧洲深造。1932年归国后，历任天津南开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6年应聘到美国讲学，此后定居美国，先后在罗林斯大学、耶鲁大学、哈脱威克大学、匹兹堡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任教。潜心研究中外文学，致力写作诗歌和散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印第安纳大学创办东方语文系，为沟通中西文化，培养人才，作出了贡献。列名《世界名人录》、《美国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和《国际名人传记》等。他青少年时代即随父参加南社、新南社的活动，1978年退休后，在海外发起成立国际南社学会，又被推为北京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名誉会长，积极筹措《南社丛书》的出版，为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和南社研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一生勤于著述，直到90岁以后仍然手不停笔。主要著作有中文书籍14种，英文书籍9种，英译中书籍5种，编选书刊14种，还有散见于各种报刊的中、英文章百余种。

柳无垢

柳无垢



柳无垢（1914－1963），柳亚子次女，1926年进上海大同大学附中读书，次年父亲遭到蒋介石的武装通缉，随父流亡日本。1928年返沪继续就读，初中毕业成绩全校第一名。“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运动，组织游行、演讲、贴标语、办壁报。1932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34年因涉嫌共产党被逮捕，经营救出狱返沪。次年9月，她赴美国留学，在佛罗里达州苏劳斯大学攻读社会学，在美国学习期间，她收到几经转辗的瞿秋白的信、诗词

和照片，她将其中一部分发表于《先锋论坛报》。1939年，她赴香港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桂林，任桂林中学高中部英文教师，1944年，柳无垢入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其间她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

抗战胜利后，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1948年她为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通信充当信使。1949年9月，陪同宋庆龄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1月入外交部工作，1954年翻译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并撰写了《美帝对台湾的侵略》，还著有《现代英语会话》，翻译萨洛杨《人类的喜剧》等著作。1963年病逝。

徐孝穆

徐孝穆（1916 — 1999），著名篆刻、竹刻艺术家，上海博物馆科技文物保管实验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常委。

早年，徐孝穆受到姨夫柳亚子诗画的熏陶，童年起就喜爱书画篆刻。孝穆8岁开始，刻治印章，10岁尝试竹刻。青年时期雕刻艺术大进，他刻石、刻木也刻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新艺术专科学校，1940年旅居九龙，解放后，一直在上海博物馆工作，历任上海市文管会文物保管部副主任、科技文物保管实验室主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纂、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上海生活美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学会上海分会会员、中国书法家上海分

徐孝穆



会会员。

徐孝穆长期以来着意研究流派艺术，他钟情于师承明代朱氏三家的刻功，也积极练习清代周藏岩的刀法，积半个世纪的经验，集竹刻、木刻、石刻、陶刻技艺于一身，所作刻品形象逼真，笔笔传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享誉海内外。

为了使画与刻的艺术相得益彰，徐孝穆广交国内外著名画家。著名画家唐云，与他堪称莫逆之交，唐家所有的文具杂件，都由唐云亲手绘上画作，再由徐孝穆一一加以精心雕刻。徐家所有刻品，诸如笔筒、杯盘、手杖、镇纸等等，又都由唐云绘画，徐孝穆自己再加镌刻。徐孝穆将朱屺瞻的多幅国画，艺术地镌刻于砚台，此类刻品珠联璧合，成为艺术瑰宝。1985年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80寿庆，徐孝穆为他刻了一块搁笔“稚柳为之图”，劲挺秀逸，别具锋芒，繁右而简左，造型独特，就连这件作品的拓片也为英国伦敦图书馆作为珍品妥为收藏。

徐孝穆为周恩来、宋庆龄、廖承志、柳亚子、郭沫若、何香凝、梅兰芳等众多的伟人、名人、艺术家镌刻肖像，每一尊都是难得的精品，刻功“有虚有实，亦柔亦刚”（作家老舍语），“铁笔挥自如，气韵生动，不可多得”（郭沫若语）。

1984年，上海电视台拍摄《竹刻家徐孝穆》专题记录片，介绍他的篆刻生涯。近年来，香港、台湾先后展出了他的作品，出了专辑。1986年，中国广播电台拍摄了《徐孝穆竹集》，他的竹刻专文屡在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也多次举办书法展览会，得到海内外诸多专家学者的肯定和赞扬。

附录一：

杨毕冤案的真相及创作

《树滋堂蒯家的兴衰史》一章，介绍了身居浙江按察使高官的蒯贺荪，此人负责浙江全省刑事案件的裁决，这位昔日受到林则徐亲睐，一向正直清廉的好官，在古稀之年，竟然晚节不保，一起参与制造了杨毕冤案，最后只得吞金自杀以谢国人。

对于杨毕一案，官家的“政要”、“实录”，私家的“日记”、“笔记”特多，纷纭错杂，歧异颇多。一般民众，犹如瞎子摸象，难得全豹，他们所了解的杨毕冤案，大多是评弹、曲艺、戏剧等等经过了艺术加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

北京的苏宝敦先生，是北京房山区文化文物局副局长，北京文物保护协会理事，他对冤案的来龙去脉，掌握着第一手资料。2004年春，黎里文保所有人专程寻访苏宝敦先生，登门访谒。不巧的是，苏先生出差在外，好在房山区文化文物局的办公室主任，提供了苏宝敦先生撰写的一本书，内里有资料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杨毕冤案。其中最为有用的资料是光绪元年（1875年）10月30日，刑部的一个奏本，题为《钦差查办案件》。此件是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录下的一

个副本。这个副本很重要，研读之后，杨毕冤案的来龙去脉基本清楚了。黎里文保所的有关人员又查阅了《光绪政要》、《光绪东华录》、《越缦堂日记》、《翁同和日记》、《翁同和自订年谱》，以及当时影响极大的《申报》上的有关报道，终于获得了《杨毕冤案》真实的前因后果。

冤案的酿成

同治11年（1872年）春，浙江余杭城内的豆腐店帮工葛品莲，娶了毕秀姑为妻，按当时的风俗，毕秀姑就成了“葛毕氏”。秀姑容貌清秀，喜穿绿色衣服，腰间常系一条白色围裙，于是得了个雅号“小白菜”。葛家租赁的是杨乃武家的房屋，比邻而居，房东与房客往来亲密，不时一起进餐。小白菜喜欢听杨乃武讲小说传奇等故事，还让杨教她识字。一次小白菜学习写字，杨乃武为她把笔，颇似拥入怀中的架势。葛品莲见了，心中不是滋味。葛母俞氏，对此更是看不入眼，从旁添油加醋。葛品莲做豆腐，每天天不亮就要去上工，有时就住宿在店里，实在不放心。曾连续几夜潜回家门窃听，只听到杨乃武为小白菜讲解佛经故事，没有发生什么奸情。尽管外间传闻沸沸扬扬，但只是怀疑，没有实据。

杨乃武本是秀才，按照清代惯例，秀才对县令有监督、评议之权。县令刘锡彤，在余杭为官多年，老于世故，曾经在征收漕粮时擅自加码。杨乃武掌握了真凭实据，向上控告，朝廷拟予革职。刘锡彤预先得知信息，立马与朝中权要通声气，买关节，依然稳坐余杭宝座。就此，刘锡彤与杨乃武有了过节。同治12年（1873年），杨乃武秋闱折桂，得中举人。刘知县深恐杨连战连捷，登上高第，危及自身，决定曲意交欢，赠以巨礼，时相过从，诗酒往还。杨逐渐放松警惕，以为前嫌尽释。

不料仅仅过了月余，10月初9傍晚，葛品莲身体不适，回家路上买了汤圆，吃下后翻肠倒肚全都呕吐出来，到家畏寒发抖，盖了两床被子，半夜过后就死了。葛母俞氏向余杭县控告葛毕氏谋杀亲夫，要求验尸。刘锡彤接状，正拟查访，正好当郎中的县学生员陈竹山前来县署为人看病，提及杨乃武与葛毕氏有染，街坊邻里尽皆知晓，葛品莲必被二人谋害无疑，言之凿凿。刚愎自用的刘锡彤深信所言。也真是天赐良机，此番杨乃武死定了！刘氏带领一干人丁来到葛家，见葛品莲尸首的口鼻有黑色汁液流出，仵作沈祥辨验不真，认为是“烟毒”，县衙门丁沈彩泉憶断为砒霜中毒，二人争执不下，就含糊报称服毒殒命。刘锡彤听了，改书“口鼻黑汁”为“七窍流血”，判定为砒霜中毒。毕秀姑被逮，不堪捶楚之苦，被迫伪供与杨早有奸情，合谋杀夫。于是刘锡彤一面上呈详请将杨乃武的举人斥革，一面将杨乃武拘捕到堂惨毒上刑。血肉狼藉之下，杨也被迫招认。刘锡彤以为大功告成，上报杭州府，杭州知府陈鲁先入为主，再审时仍然大施酷刑，杨、毕二人被迫继续诬服。于是判处杨乃武斩首，毕秀姑凌迟，上报浙江省院。

老奸巨猾的刘锡彤深知“打蛇不死必成害人精”，务必置杨乃武于死地。砒霜的来源，属于整个案件的关键。在县衙，刘锡彤对此紧追不舍，杨乃武熬不住，忆及有个姓钱的开有一爿爱仁堂药铺，就说自己在10月初3谎称灭鼠向掌柜钱保生买了红砒。刘某派人找到爱仁堂，根本没有钱保生其人。那里的掌柜姓钱名坦，人命关天，钱坦不敢应允。刘请幕僚章濬向钱坦写信，说杨乃武称买砒为灭鼠，掌柜不知害人，至多枷责罪名，尽管承认。刘知县软硬兼施，又许下重诺，允应钱不与杨当堂对质等等，钱才勉强答应。

杨乃武母亲和姐姐杨菊贞，向浙江省院鸣冤。按察使胡贺荪与巡抚杨昌浚指派有关官员协同会审，结果是维持县府原判。于是杨昌浚就依照杭州府的判决上报，专等刑部回文就地执行死刑。

同治13年秋，杨菊贞赴京告御状。当时《京报》发布了杨菊贞到京告状的信息。上海的《申报》于10月27日转载了《京报》上的消息，又派记者深入余杭，将呈控状的底稿取来，于10月29日全文刊出。随着案件的曲折变化，《申报》进行了追踪报道。《申报》在杭州等大城市都设有分销处，杨毕一案很快在浙江乃至全国各地迅速传开，激起了全国的关注，特别是一批著名人士的关注，在浙任职的林则徐儿子林拱枢就急起呼吁，要求为杨申冤，这大大地激励了杨家申冤的决心，也迫使朝廷对此案予以重视。

杨菊贞在刑部右侍郎夏同善为首的一批浙籍京官的帮助下，终于将此案告到了两宫太后跟前，西太后下谕：让刑部下令，着杨昌浚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问，务得实情。杨巡抚接到谕旨，并不亲审，委派他信得过的湖州知府许瑶光等人审理。在许知府面前，杨和毕一起翻了供。审了二个多月，许瑶光竟然无法定案。有位给事中王书瑞上疏，建议朝廷另派大员赴浙审案。于是礼部侍郎、浙江学政胡瑞澜接受了审案的差使。据杨乃武的女儿杨浚在建国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说，这位省教育胡厅长，日夜熬审，用遍了各种刑具。杨两腿均被夹断；毕十指拶脱，还用铜丝穿入乳头。二人受刑不过，仍被诬服。胡学政复奏朝廷云："反复讯究，此案实系杨乃武因奸起意，令葛毕氏将伊夫葛品连毒毙，供词佥同，案无遁饰……原拟罪名并无出入。"至此，杨乃武绝望了，他在狱中自挽一联：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

当时杭州的一批举人、生员及杨的好友汪树屏等30余人联名，向刑部和都察院控告，揭露官府严刑逼供，屈打成招，草菅人命，欺罔朝廷。在京浙籍京官与家乡的信只往返中，也大多认识了此起冤案。于是夏同善等28人联名上书朝廷，要求委派专人复审。

刑部尚书桑春荣，会同两位侍郎夏同善与沈家本，研读了浙江巡抚杨昌浚和学政胡瑞澜的奏折，又参阅了给事中边宝泉和王书瑞

等人的上疏，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奏折指出：杨昌浚与胡瑞澜等人的案卷，“逐一详核，尚多歧异之处”，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四方面：（一）关于葛品莲发现杨与毕奸情的细节，前后矛盾，先说杨毕奸情被葛撞破，后来却又没有撞破奸情的供词。（二）杨乃武到钱保生药铺买毒药的时间，前后不一致。钱保生系重要人证，为什么只在县里传讯了一次？为什么杭州府没有亲自审问？杨多次要求与钱当堂对质，为什么均遭拒绝？钱保生为什么在胡瑞澜复审之前会死于狱中？又据同监犯人称，系被害而死，钱的死因究竟是什么？（三）邻居王心培证言中说，葛毕氏经常白天不在家，夜间常听其开门，来往究竟是何人？葛毕氏没有交代，复审时也没有详讯和记录。（四）杨乃武牵告县令刘锡彤之子刘子瀚（按：根据案卷，此人曾下迷药强奸过毕秀姑，后怕事泄，积极参与制造杨毕冤案等语），可是此人却从未出庭，只派人传过一次，后来前去传人者却回说刘海升（按：系刘锡彤另一儿子）已经回原籍了。刘子瀚与刘海升是否同一人？没有交代清楚。最后刑部在奏折中说：“以上各节均系案内紧要关键”，而胡学政在复审中没能“逐层剖析”，也没有说明“供词因何不符”，所以请求朝廷降旨命胡学政提集犯证，将复审与原审情节因何歧异之处再次讯取详细供词，具奏朝廷，再由刑部核议。

就在胡瑞澜复审之时，宁波给事中边宝泉奏请朝廷将此案提交刑部详细研讯。但是边宝泉的建议被驳回了，当时外省案件繁多，朝廷认为不可以开此先例。不过，朝廷显然对此案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先是严饬胡瑞澜“秉公研究，不得回护同官、含混结案”，并反复指示刑部“悉心推究”、“详细研求”、“俾成信谳”（即定案准确无误）。

胡学政硬着头皮再行审理，这次不敢违旨滥用刑具逼供了，可是连审了两次，杨毕二人连续翻供。胡学政害怕了，战战兢兢地再次上奏：“案情重大，人言纷纷，实非愚臣所敢专断，请特简大臣，另行复审。”

冤案的平反

杨毕一案，自浙江三级七审之后，刑部派令胡瑞澜再审，可是审来审去，始终没能审出结果，全国的反响越来越大，迫使朝廷最终下令将此案移解京师审理。

光绪元年（1875年），杨毕冤案已经历时三载。是年8月，刑部右侍郎夏同善迁吏部任右侍郎，接任者不是别人，就是常熟籍状元翁同和。翁侍郎一上任，力持正义，提出了杨毕案件五大疑点，在一次奏事之后，翁同和力言事关逆伦，人命至重，请求敕下巡抚，将棺木人证尽数移解京师，听候覆检，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夏同善尽管已经调任吏部，仍然着意关注杨乃武冤案，支持杨菊贞再次向刑部呼冤控告。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西太后下谕：将此案交刑部彻底根究，提京审问。刑部当即令余杭县令刘锡彤将全部人犯、证人押解来京，务使此案大白于天下。

光绪元年冬11月，太后特旨：着杨昌浚派委妥员，将杨乃武葛毕氏人证卷宗解交刑部，途中加意防范，倘若有他故，惟该抚是问！葛品莲棺木着刑部派司员前往余杭，会同刘锡彤验明加封，一同解京。

光绪二年（1876年）春4月初旬，人犯解到京师，刑部全体会审。杨乃武当堂痛哭历诉冤惨，闻者无不为之动色。当时大多数官员认定，杨乃武确系冤枉，但是葛毕氏毒死亲夫，应无疑义，同谋者当另有其人。二旬过后，葛品莲棺木运到，同月24日，刑部在海光寺当众开棺验尸，那天顺天府仵作全到，特别是邀到了刑部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仵作到场。各官先验棺上封条，县府院印封重叠无误，然后开棺验尸，棺内仅存白骨一具，老仵作亲手检验，先取囟门骨

一块，映日照看，轻声报云：此人实系病死，非服毒也！大出刑部意料，命仔细验查，不得有误。于是老仵作一一细检，回答说，自己在刑部60年，凡服毒而死，囟门骨必有黑色，现在莹白无色，何毒之有？群情大哗。

次日，三法司会讯，按律令定拟。刘锡彤身为知县，误听人言，且心术不正，罗人重罪，革职发边充军。十余日后，有御史认为刘锡彤罪重罚轻，再次参劾，改为长流黑龙江，不多久，刘氏死在道途之上，人心大快。胡瑞澜朝廷交办重案，根本没有悉心研究，却滥用刑罚，有负委任；杨昌浚身负重任，有违皇恩，二人均系大员，特奏朝廷，不二日，有旨革职。杨昌浚闲居二年后，由左宗棠奏保，出任新疆巡抚，后升陕甘总督，胡瑞澜则一蹶不振，灰心丧气而终。按察使蒯贺荪未等朝廷处置，吞金自杀。杭州知府陈鲁，下属制造冤案毫无觉察不算，亲自审问时又严刑逼供，削职为民。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有令辅助学政胡瑞澜审案，泛泛空论，未能深入根究；候补知县郑锡滜，巡抚派令密查案情，没能详细查访，就以无冤无滥附和原审案官员禀复，以上数员全部革职。凡参与审案的大小官员，革职的革职，降级的降级，多达数十人。刘锡彤之子刘子瀚于福星轮失足淹死，药铺钱保生因畏惧而自缢于狱中，不论。其他诸如刘锡彤的幕僚、仵作、门丁、郎中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判罪及处罚。毕秀姑牵攀杨乃武，出于畏刑，无罪释放。杨乃武并无通奸实迹，但平时与葛毕氏来往不知避嫌，一度诬攀何春芳与葛毕氏有染等等，纯属无中生有。考虑到杨为开脱自身罪名，并非存心陷害，故不治罪，但诬陷平人，毕竟有违定制，更使案情扑朔迷离，虽可免于罪责，只是已革之举人不予恢复。

杨毕冤案自1873年10月始发，到1876年4月结案，历时四个年头。事后记述冤案的人很多，诸如《奇案录》、《余杭奇案》、《余

杭大狱记》和《杨毕冤案》等等，所记不仅多处歧异，更夹杂着作者倾向性观点。比如对杨乃武本人，有人就认为“虎而冠者，邑人皆畏之”，就是说杨乃武不是善类，经常同官府作对。有人说杨乃武与毕秀姑确实行为不检点，因而招致冤案。有人说，毕秀姑是暗娼，本来就同杨乃武、刘子瀚都有暧昧关系。有人说京城老仵作，仅凭囟门骨没有黑色，就断定不是中毒，似乎无法让人信服，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川督丁宝桢，当时丁正好入觐，闻知复验结果，丁督大怒，说葛品莲死已三年，毒消当然骨白，岂可为凭？此案可翻，则外吏不可为矣！与此相反的看法是，昔日社会能毒人致死的药物有限，老仵作据此作出判断完全是经验之谈。最多的说法是，杨毕案件之所以得以澄清，完全是帝后两党相争的结果，往往用“风云际会”含蓄表达。冤案大白于1876年，当时光绪皇帝只有5岁，刚刚确定翁同和为老师，党羽还没有形成，这完全是两宫，主要是西太后的旨意，西太后是祸国的，但这冤案是她下令澄清的，也应当实事求是。

有关《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创作

杨毕一案，从酿成冤案到彻底平反，案件本身复杂而又曲折，社会上流传着众多的实录与笔记，广受欢迎。

清末民初，有评弹名家李文彬，根据《余杭大狱记》等稿本进行艺术加工，取名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初一出台，就大得听众叫好。李文彬的儿子李伯康、李仲康，还有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严雪亭等人，再作丰富提高，使《杨乃武与小白菜》成为评弹中的传统书目。许多地方戏曲剧种，如沪剧、曲剧、评剧、京剧都移植过去，创作、加工、润色，增加了许多曲折的情节及感人的细节，使冤案过程更加曲折动人，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后来拍摄成电影，影响尤其

广泛。

作为著名文艺作品《杨乃武与小白菜》，增加的主要情节有二，一是刘锡彤之子仗势欺人，强奸小白菜不算，还想长期霸占，于是趁小白菜丈夫葛小大（艺术作品中一般改葛品莲为葛小大）患病之际，投砒霜于所服的药剂中，致葛死亡，然后嫁祸于杨乃武。二是，刑部侍郎夏同善智激醇亲王（有作恭亲王、裕亲王的），两人假说隔日将杨乃武与小白菜行刑，同时设下密室，让杨乃武与小白菜相会，杨痛说冤狱之苦难，小白菜终于说出了真凶，案情大白。增加的细节，比如杨乃武每次被迫诬服，总是以蝌蚪文将“屈打成招”四字画押等等，很多。改造的细节也不少，比如钱保生，本是杨乃武因受刑不过而胡乱攀供的名字，真名叫钱坦，刘锡彤按口供找到钱坦，勒逼钱坦以保生之名作伪证，《杨乃武与小白菜》中，钱保生是刘知县直接找得的伪证等等。

杨毕一案，暴露出来的政治、社会问题特多。比如官府对老百姓的压迫，案件牵涉了许多无辜平民，杨乃武的姐姐，毕秀姑的婆婆与母亲，钱怛（保生）的母亲等等，都曾押入牢狱。科举矛盾明显，杨乃武中了举，即将步入青云，一帮秀才出于嫉妒，捕风捉影，对杨乃武与毕秀姑的传闻大肆宣扬；另一帮秀才及同科举人，则为杨鸣冤叫屈。官场的派系，刘锡彤因是大学士宝鋆乡试的同年，刘氏凭此不断巴结交好，后来的承审官深谙此道，杨毕翻供，诉说刘锡彤制造冤案，承审官大多充耳不闻，反以非刑对待以维持原判，卫护刘氏及其他官僚。京官与外官的矛盾，浙籍京官夏同善等人与浙江杭州一帮官员对杨毕案件明显观点有别。封疆大吏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杨昌浚自恃大权在握，根本没把刑部的号令放在心上，藐法欺君，两宫太后乃女流，光绪帝还是个孩童，对她们所下的旨意毫不重视，直到下旨提请解京由刑部验审，杨巡抚仍固执己见。朝廷的腐朽确也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据来往文案看，各省诸如此类的

案件非常之多，即使告到刑部，甚至告到御前，朝廷下令复审澄清，督抚们绝大多数仍旧毫无顾忌地维持原判。再则，从杨毕一案的审理结果看，毕秀姑是平反了，但仍以不守妇道为由，判定“杖八十”；杨乃武除革去举人外，也判令“杖一百”，还有其他多数牵涉者，都有“杖八十”“杖一百”的判词，对这类惩处，官府都下令用银钱来赎，总之一个字，要“钱”！

杨毕冤案，犹如一座宝塔，一座多层多面多角的宝塔。它给了文艺创作者们广泛挥洒的空间，根据不同的主题，可以选择不同的材料，突出不同的主体。因此《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版本众多，直至今天，仍然有人在不断更新不断再创作。

《杨乃武与小白菜》除了主题有所不同外，宣传的正面人物往往也有所不同，有的强调翁同和，有的突出夏同善。

近年来，江南古镇旅游热，方兴未艾。好多游人寻访历史遗迹，杨毕冤狱牵涉的人事，颇受人关注。黎里古镇的蒯厅，不准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因为祖上按察使蒯贺荪一起参与制造了杨毕冤案，至今不时有人前来寻访。常熟虞山的翁同和故居，参观者中不乏问讯杨毕冤案的。乌镇有个夏同善的“翰林第”，前不久开发出来供人参观，那里的讲解小姐，生动地向寻访者、向游客介绍《杨乃武与小白菜》。有意思的是，她们还生动地演绎了这么一个传说：

当年杨毕冤案昭雪后，参与设计密室相会的裕亲王十分好奇，什么女子竟使我朝大小官员数十名都被革去了顶戴？特地令刑部带小白菜来一见，嗬，小白菜尽管面容憔悴，但是不掩风姿，仍然楚楚动人。裕亲王同情之心顿生，不禁问小白菜有何要求。小白菜见问，想到当日在狱中许下的一个愿心：“谁为我洗清冤情，我情愿服侍他终生”。今天既然见问，不妨说出来。裕亲王倒为难了，太后曾有谕旨，小白菜应进庵堂了却余生。可自己话已经说出了口，怎能收回？思虑片刻，就出了个两全的主意，为小白菜明冤的主要人物

是夏同善，那么就让小白菜赴乌镇翰林第侍候夏同善三个月吧，不过必须不见天日地悄悄去，悄悄回，三个月后再进庵堂。就这样小白菜在夏府还了心愿，她住的那间房子是翰林第第三进内厅的一间底屋，没有窗子，这间屋子现在还布置着呢！后门和长廊据说都是为了使小白菜能不见天日的来去而筑就的。

一个好的文艺作品，如历史上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往往有真人真事为蓝本，还需要经过许多人，甚至几代人的艺术创作。《杨乃武与小白菜》评弹的脚本，就由李文彬父子及他人的艺术加工。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戏剧和电影，更是创作、移植、再创作的结果。现在，乌镇又出现了民间传说，也许过些时候还会有更新版本的《杨乃武与小白菜》问世。

附录二：

黎里的南社社员

南社成员1182人，还有新南社社员400余名。柳亚子是南社的三位创始人之一，又是领导南社随着时代不断前进的主帅。柳亚子居住的周寿堂，内设磨剑室书斋，是各地南社社员聚集的好场所，又是柳亚子《南社丛刻》的编辑室。黎里作为柳亚子先生的家乡，追随柳亚子，参加南社及新南社的人员不少，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人，列如下：

王汾，字达泉，号达庵。入社号770

王涟，字咏青。入社号585

丘庚藻，字纠生。入社号968

朱霞，字佩侯，号剑锋。入社号545

朱慕家，字仲康，号剑芒，朱霞弟。著述有《南社诗话》、《梨湖小识》、《南社感旧录》、《我所知道的南社》、《陶庵梦忆考》等。入社号437

吴家骅，字介庵。入社号808

沈次约（1892－1932），字剑霜，一字剑双，号秋魂，著作有

《剑霜龛遗稿》，未刊行。入社号553

周云（1891－1951），原名世恩，字一粟，号湛伯，别号酒痴。入社号422

柳无忌（1907－2002），字小亚，也作小霞，柳亚子儿子。1946年后定居美国加州，著述和编译众多，计《苏曼殊全集》、《拋砖集》、《英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古稀话旧集》、《西洋文学研究》、《柳亚子年谱》等三四十种。

柳弃疾（1887－1958），字安如，号亚庐，别号亚子，后以亚子行。著述有《磨剑室诗集》、《磨剑室词集》、《磨剑室文集》、《乘桴集》、《左袒集》、《羿楼文集》、《南社纪略》、《南明史纲史料》、《自传年谱日记》等。入社号3

张恒（1891－1968），字久之。入社号966

张农（1877－1927），原名肇甲，字都金，一字多金，号鼎斋，有《葫芦吟草》手稿存世。入社号954

陈洪涛（1895－1918）字沧海，号厓厂，著作有《淮海游草》。入社号531

陶绍煌，字粟己，号亦园。入社号931

陶赓照，字承周，号神州。入社号81

彭久岳，字维清。入社号701

黄复（？－1963），字娄生，号病蝶，著作有《谈南社》、《戊申大丧述闻》等。入社号498

黄元琳（1893－1943），字稚鹤，号自愕。入社号792

蒯文伟（1892－1925），字一斐，著作有《醒梦庵诗钞》等。入社号828

蒯贞幹（1879－1918），字虎岑，号啸楼。入社号700

蔡寅（1874－1934），字清任，号冶民。入社号204

郑瑛（1878－1962），字子佩，号佩宜，柳亚子夫人。入社号5

顾无咎（1886 — 1929），字退斋，一字崧臣，号悼秋，别号灵云，编著有《楔湖诗拾续编》、《笠泽词征补编》、《灵云别馆散记》、《服媚室酒话》等。入社号61

以上南社社员，以下新南社社员：

毛啸岑（1900 — 1976），名兆荣，1923年至1926年间曾协助柳亚子主编《新黎里报》

朱智千（？ — 1951），别号起手。

汝景星（1900 — 1959）。

沈华昇（1896 — 1974），毛啸岑夫人。

柳无非（1911 — 2003），柳亚子长女。

柳无垢（1914—1963），柳亚子次女，译著有《现代英语会话》、《人类的喜剧》、《阿莱罕姆短篇集》、《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英文）》等。

蔡真（1900 — 1938），字冠雄，南社湘籍社员，有《拊蕉桐馆印集》存世。

第四章　风情篇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探究其实质，所有的风俗习惯都与社会经济、民众心理相关联。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农业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家庭一直是生产单位。江南农村，十几亩田地，一条牛再加一条船，那就是相当不差的家庭了。牛耕船载，肩挑人扛，生产力是非常低下的，因此社会进步缓慢。那些风俗习惯倒也相对稳固，从南宋到民国，似乎没有太多的变化。

本章写到黎里的种种民风民俗，都可以从社会的经济与百姓的追求方面寻得渊源。

兜火把与打田财那是祈求农业丰收，兜火把时那一声“三石一亩我家来”，打上了千年的烙印。三石，每石以150市斤计，也只有450市斤，已经是江南农民的丰收之梦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黎里出了个农学家倪慰农，他的田亩产860市斤，当时可是轰动江南的大事。春台戏的起源就是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有个好年成。其他的节令，比如接财神、八月的迎神赛会、年廿四的送灶，等等等等，无不与祈求农业丰收、生活美好密切相关。本章专门有一节写到黎里农民的抗租暴动，土地兼并，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了抗租暴动。

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生活质量差，又加缺医少药，于是酝酿出了“请”长命锁之类的习俗。问心堂中药铺之所以生意兴隆，当然与它的药材加工以及尽心服务有关，不过深思一下，也还是与生产力低下有关。本章还提到一爿老茶饭万

云台，这是农业社会里的“新华社”，几乎所有的信息，市场价格、天气变化、社会变故、周边环境等等，都可以在这里获取，外加可以销售一些鸡鸭蔬菜之类的农副产品。

黎里的“叫火烛”，是贫穷社会的必要服务设施。中秋“显宝”，则是富家大户显示自己、炫耀门第的举措。黎里人名字中多“官”，因为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深入到社会的角角落落，渗透到每个人的脑细胞，为了摆脱贫困，为了出人头地，在封建社会，除了读书做官，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途径。

黎里的历史始终处于缓慢平稳的进程之中，那些风俗习惯也一直保持着，九百来年没有多大改变。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打开了国门，与世界接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原有的陈规陋习已经扬弃殆尽，别的不说，单说年卅，旧有的七规八矩抛之脑后的为多，新的习俗代之而起。吃年夜饭，现在黎里市镇居民一半以上包在饭馆里。黎里大型的饭馆，可以安排二十至三十桌圆台（每桌至少12人）有10家，十至二十桌的有20来家，十桌以下的还有30来家。这么多的饭馆，能够赖以生存，而且有好些还生存得非常好，本身就能说明好多问题。吃了年夜饭之后，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话拜年，手机短信恭贺新春。这些必须在各家各户都有彩色电视，都有了电话和手机之后，才能问世的新风俗。

一、抗租暴动

常听人说，江南人是水做的骨肉，柔弱，温顺。其实，水固然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威猛的另一面。封建时代，黎里农民抗租的激烈行动，吹响了一曲曲雄壮的号角。

明清两代，生活在金陵宝塔最底层的农民，受尽压迫和剥削，光租米一项就足以使一个农家在丰收之后所剩无几，更何况还有众多的苛捐杂税。民谚有云："饿煞不如犯法"，一向逆来顺受的黎里农民，实在无法生存下去了，被迫起来暴动，反抗地主官府的欺压。

为催租逼债，地主们的手段迭出，有些是相当残忍的。

每年秋收登场，各家地主的门前都会挂出一块收租牌，上写"某某堂收租处"，帐房先生一手执笔一手操着算盘，地主的家丁则四出催租。收租期限分为三限："飞限"、"二限"、和"三限"。如果到了第三限农民还不来交租，地主就派人会同黎里镇司官衙门的兵丁，到乡下去提人，押送到帐房先生处训话，假如仍然交不出，不消说得，押解去坐班房。那个班房，其实是庙经浜底的一所庵堂，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欠租看守所"几个歪歪斜斜的字。庵堂不大，三开间两厢房，中间一个天井，再加一个墙门。关押到这里的农民，不管男女老少，白天全都坐在天井周边的走廊里，一律被铁

练条锁在廊柱下，活动不得；晚上，庵堂大门紧闭，农民进入满地乱草的屋内，有盖破被老絮的，有披破棉袄的，更有什么都没有坐等天亮的，唉声叹气的，咳嗽吐痰的，病奄奄呻吟的，胡乱大小便的，乌烟瘴气，臭气熏天。

欠租看守所归圩甲看管，当上圩甲能够看管班房的人，同司官衙门都有那么点花头经。晚清年间看管人叫许阿天，到这里坐班房的人，一日三餐不得自家送来，必须吃许阿天办备的粥饭，都是陈糊烂米，价格却高得咬人。谁叫你坐班房，坐班房就得任人宰割。班房规定，每10天算一限，到限不交，就提到司官衙门打一顿板子，过10天又一限，再提再打，直打得皮开肉绽，流血化脓。有的地主到农历12月20日，放农民回家去过年，过了年再来坐班房。大多数的地主不许农民回家，要到第二年春耕才勉强放回，等到秋收过后，老帐新帐一起加利追算。

黎里有个东圣堂，在明清时期是宣讲乡规民约的社坛，那里保存了一块苏州府勒下的严禁抗租碑。

反面文章正面看，黎里农民抗租在苏州府一带不愧为一面高扬的旗帜。黎里的抗租暴动，史籍有所记载的就有二次。一次在咸丰年间，黎里人称之为“七十二只半圩田农民暴动”，另一次在辛亥革命前夕，黎里人称为“吃倒胜家馆”，传承至今。

抗租碑



黎里农民所受的压迫与剥削，就从那块《苏州府严禁抗租碑》，就可以读出农民兄弟的无数苦难。

且看严禁抗租碑中的几句话："尔等须知，业户置买田产，衣食课赋，皆须取给于斯"。抗租碑是苏州知府明令颁刻的，上面署名的黎里地主竟多达50名，这50名都是大地主。封建时代不主张分门立户，一般都是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父母、兄弟、妻妾，小妾往往还不止一房，子女，封建社会提倡多子多福，子女总是一大群，还有更多的家人、丫头和佣仆。50户地主都是一大家子，衣食住行全靠收租，更有甚者浪吃浪用挥霍无度。说它是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丝毫不为过。

严禁抗租碑："每届秋收登场，赶砻出粜，不剩颗粒。"秋收之后，佃农家已经颗粒无存，照地主们的说法，是佃户出粜了，那也是没有办法呀！多半是因为青黄不接之时，寅吃卯粮，田里的收成早已不属自家的了。

严禁抗租碑："避匿他境，提追无从。芒种之后，回家播种。""刁佃视为得计，迨至秋收，仍施故技。他佃闻风兴起，日甚一日，纷纷效尤。"佃户们因为缴不出租子，只好躲避到别处，芒种之后，才回家种田。看来这不是个别佃户，大多如此，"纷纷效尤"一语，传递的信息应当说这是普遍现象。

严禁抗租碑："或有到案之后，偶尔因病不及请保在押身故，或佃属因病死者，或因他事短见者，适催租者到门，该佃属即藉端纠集无赖，或抬扛尸骸，或扶佃属亲老到业主家，百般逞凶，毁抢诈扰"。催交租米，常常逼出人命来。有的因为忧忧急急，染病身亡。有的交不出租子，被抓起来，关进班房。关押期间，病故身亡的实多，催租催出了人命，当然群情激愤，抬杠尸骸到地主家也是被逼无奈。

逼租终于激起了民变，"甚至有掳捉业主、司帐勒赎"（严禁抗

租碑语），抗租暴动的酿成，看来事出必然。下面且看一看黎里历史上最为有名的抗租暴动吧。

七十二只半圩田农民暴动

咸丰三年（1853）冬，由于田亩收入无多，黎里的佃户们无法缴纳租子。汤字圩农民陆孝忠、陆孝恩、陆阿大等人，要求减免租粮，双方发生争执，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地主拒绝。艰难的大半年好不容易熬着，想等新的一年有所好转，可是天不帮忙，次年秋收，年成依然不好。地主及帐户催交紧逼，佃户们无法可想，有的人家只好将粞谷一起缴了上去，结果双方的争执又起。地主扬言诉诸官府，决不宽贷。

陆孝忠、陆孝恩、陆阿大、庞耀采和顾胡子等人，眼见得没法活了，带头造反抗租。振臂而呼，旬日之间，周围的农民群起响应。地主们见势不妙，向吴江县县令告发。吴江知县周文得报后，表面不动声色，暗中进行了布置，安排几个小头目，到黎里镇上开起了花柳场，引诱抗租人的到来；又在黎里西边的牛头湖设下了哨卡，聚集了三十多条枪船，悄悄监视，待机行事。知县已经设下罾缴，就等时机下手了。

临近年关，农民们大多想上街一走，陆孝恩及陆孝中之子陆阿大上街赴市，被牛头湖的哨卡侦得，悄悄尾随，与花柳场的暗哨一起将二陆逮捕，立即押送县衙。

一石激起千层浪，陆孝恩和陆阿大被擒，激起黎里农民极大的愤怒，纷纷会集，决定与官府拼一个鱼死网破。咸丰五年（1885）二月初一夜，陆孝中、庞耀采和顾胡子等人，联合了汇聚而来的七十二只半圩田的农民，约三千人。愤激地涌到长甸村大地主殷家，将殷熙民的嗣母和妻子劫去。又蜂拥到镇上，进入大地主蔡岭香、沈

实堂家大闹，刚好遇到了蔡、沈两家的帐房先生。这两个帐房先生一直为虎作伥，每当秋收登场，威逼勒索，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动不动将佃户押入班房。农民们恨之入骨，当即劫持了这两个帐房。一时之间，声势大振，黎里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抗租行动暴发了。佃户们扣押了殷家及帐房作人质，作为向地主们讲条件的法码，只要减免租子，那么人质将毫发不损地回家。

黎里镇上的大小地主、还有官府眷属惊恐万状，一家家裹了金银细软，急欲逃往外地避难。农民早有防备，他们用竹签将镇的东西南北四栅用钉钉住，派人守卫，任何人不得随便携带财物搬场。

二月初三日，陆孝中等人又赶赴平望的司官衙门，命令司官衙门下令，所有地主、官府一律停止收租。

二月初四，吴江县和苏州府接到黎里农民暴动的呈报，立即派出近千名官兵前往镇压。佃农们探得官兵出动的消息，马上纠集农船，开至凤仙庵荡，与官兵对峙。官兵并不喊话，六七十号战船，一齐进发。民船数量众多，约有四五百条，可是佃农手里只有锄头、扁担和棍棒。官兵将战船分作四行：一行船载炮，二行船为鸟枪手，三行藤牌兵，四行长枪手。混战开始了，佃户用棍棒搠死了一个官兵，用锄头砸伤了4人。官兵一看不妙，竟然火炮轰轰地吐出了一团团烟火，当场就有数十名佃户被轰倒，农民无法抵挡，只得纷纷逃逸。官兵们趁势进击，缴获了农船50来条，抓获了农民两人。

二月初五，官兵落北征讨，沿途见人就拦截，就盘问，是嫌疑的佃户就捕捉。在苏州知府的驱遣下，吴江、震泽两知县如临大敌，一齐亲临平望指挥，纠集了1000余官兵驻扎在黎里北栅，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出击。有探子报告，佃户们近日常在黎里北边的大王庙内烧香点烛，焚烧甲马，祈祷神灵捕捉地主，战胜官兵。初六日苏州知府平越峰，会同吴江、震泽两知县，率领着藤牌兵、长枪手、鸟枪手再加炮兵，发了近百艘战船，浩浩荡荡直奔大王庙。一到大

王庙，知府就命分湖司赵某领兵拆毁大王庙，木头、门窗全部烧毁。进而宣布了江苏抚宪下达的文书，扬言将用大炮轰击，玉石俱焚，将把黎里七十二只圩尽行剿灭。二月初九日，江苏上宪再次命令发兵1000名，带着大炮，进行镇压。官府为刀砧，手无寸铁的佃农是鱼肉，当然只能任由宰割。最后，庞耀采、顾胡子等5人又被逮捕。

佃农激于义愤，他们只是想减免租粮，得到喘息，根本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和领导，他们更不会想到地主官僚们会如此狠毒，竟然会操起火枪，甚至推出大炮。一场震惊江南的暴动很快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陆孝中隐避在蝴蜂庙内，官府四处追捕未能获得，于是出高价悬赏。一个礼拜后，有流氓贪图奖赏到官兵处通线出卖。吴江县县令立即上报苏州府，府县两级即密拨枪船十余艘，兵丁一百名，趁夜将蝴蜂庙团团包围，将陆孝中擒获。

最后，发动暴动的三位农民头领陆孝恒、陆孝中、陆阿大，押至苏州，苏州府判令斩首。3月初9日三陆被害，官府将三人之首级悬挂在黎里罗汉寺前示众。其余数十人，判刑的判刑，脊杖的脊杖，罚款的罚款，各有惩罚。至此黎里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农民暴动惨遭失败。

吃倒胜家馆

宣统二年（1910），吴江淫雨成灾，全县农作物严重歉收，农民饥不得食，可是地主依然按照原先的定额收取租粮，腐败的清朝政府也继续向人民勒索搜刮，农民们实在走投无路，无法生存了。

农历八月初五，100多名农民自发地聚集起来，拿了锄头、菜刀、木棍，涌向黎里镇上，喊杀连天。第一件事就是奔进司官衙门，向司官衙门的官吏们兴师问罪，可是司官闻风已经出逃。就连司官的太太小姐，也逃逸得不见踪影。灾民们找不到人，一腔怒火无处

发泄，就捣毁司官衙门出气，衙门里的所有木器家具，都碎成了木片，丢到市河里。灾民们又涌到黄绅士家，同样不见一人，也以乱捣东西以发泄愤恨。

那时黎里镇上有一家菜馆叫“胜家馆”，平时常备喜庆筵席，也有堂吃，价钱很贵，只有地主富商才能踱进去吃吃喝喝。农民兄弟们从来不会有机会进来坐一坐的。这时的农民兄弟，捣毁了司官衙门和黄财主家之后，趁势涌到了胜家馆，命令上酒上菜，大吃大喝起来。百余名精壮汉子，肚子里好久没得油水了，胃口当然格外的好，不到一个时辰，就把胜家馆内的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吃了个精光。尽管好些农民兄弟，并没有吃饱，但他们只吃专门伺候财主官府的胜家馆，对其他店铺则秋毫无犯。

第二天，司官偷偷潜回镇中，联合全镇的地主，联名具报吴江县衙门告急，层层上报，直到省里。江苏省巡抚程德全得报，当即派出了洋枪队赶到黎里，同来的有吴县知县。司官衙门一带，岗哨林立，处处严防，一时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人物进进出出，传唤的，告密的，戴上手铐的，都有。全镇层层盘查，四乡人人自危。谣言四起，有的说只要到里边说清楚就可以无事，有的说带头造反者将灭九族，有的说司官衙门的官员将要削职，有的说惩处完这起乱子后官员们都将升官。最清楚不过的是，司官衙门贴出通告：凡来报信因而捕获“乱民”者，赏洋 100 元；洋枪队会同黎里团防局四处捉人，已经捕获20余人了，似乎还没有就此收敛的迹象。事情拖拖沓沓的，鸡犬不宁了一个多月。其中两个吃倒胜家馆的首领，一个姓张，一个姓王，在伏虎洞边上的花园地被枪决，其余有的判了徒刑，有的打了重棍，有的被罚了款。事后，镇上设立警察局，明为维持治安，实则是用以弹压老百姓的暴动。

这次农民暴动，从八月初五开始到初七日，苏州巡抚派兵镇压平息，前后不过三天时间，不过波及的乡镇不少，当时吴江县其他

地方，如北厍、平望、八坼等乡农民都有人前来黎里，串联互通，准备回家乡也搞一起类似的运动。

那块《江南苏州府严禁抗租碑》，苏州府刻于光绪32年2月22日，那是公元1906年，而1906年前后，没有大规模农民抗租暴动的记载。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黎里的农民抗租活动，从未间断。

附录：

《江南苏州府严禁抗租碑》

钦加三品衔调补江南苏州府正堂加三级随带加二级记录十次许为

颁示勒石严禁事。据吴江县绅士周郑表、黄元芝、张鸣骆、汝燮庚、徐世泽、钱崇威，蒯思曾、殷文谟、沈正模、范曾泰、黄福年、蔡甲先、柳念曾、鲍其淦、冯秉钧、徐巨璋、陶耕经、殷葆濬、丁煜、蒯文鼎、徐文藻、徐士诒、柳受恒、陶耕经、汝仁龙、蔡寅、张履、徐康、王嘉珍、王荂培、王锡田、蔡祖铿、陶仁恺、丁玉墀、金东清、金昌年、鲍其煌、毛林麟、陈兆麟、顾久贤、李思永、金寿榕、蔡福潮、蔡维城、王桂良、陆圻鸿、朱祥麟、邱敬承，金寿祺、丁士坚呈称：窃绅等薄有田亩，坐落吴江县治，给佃耕种，良莠不齐，人情疲玩。租风之坏，倍于从前，刁顽之户不得不禀请比追。詎近来奸计万端，每届秋收登场，赶砻出粜，不剩颗粒。避匿他境，提追无从。芒种之后，回家播种，业户恐妨东作，无复顾问。年复一年，刁佃视为得计，迨至秋收，仍施故技。他佃闻风兴起，日甚一日，纷纷效尤。甚至禀请提比，佃则躲避，耸令白头亲老、幼稚妇女，出头蛮霸，寻死觅活，百计恫吓。土客民教混杂。在教者幸经神符司铎主教函请，如有藉教抗租，照例送请比追，不致公然挺比。惟客佃开垦，或有借本垦种，秋收之后，携资脱逃。土著越境躲避，请追无从。或有到案之后，偶尔因病不及请保在押身故，或佃属因病死者，或因他事短见者，适催租者到门，该佃属即藉端纠

集无赖，或抬扛尸骸，或扶佃属亲老到业主家，百般逞凶，毁抢诈扰，甚至有掳捉业主、司帐勒赎，虽经禀办，贻害匪浅。更有绝不干涉之产亡痘疡，任意牵拉硬砌。种种恶习，莫可言宣。环求颁示，勒石永禁，俾挽颓风而全租赋等情到府。据此，刁佃藉端诈扰，图遂其吞租之计，殊属可恶。除批示并行县一体示禁外，合行颁示，勒石永禁。为此示仰吴江县各区各圩农佃圩催人等，一体知悉。尔等须知，业户置买田产，衣食课赋，皆须取给于斯，额外既不能取，亩额内即不任短少。即该农佃等，一家数口，虽云自食其力，而思源推本，究从业田而来，抗欠已属不应，何可别施刁狡！自示之后，务当激发天良，各安本分。每届刈获登场，即将名下应完租籽，赶紧依限清缴。庶业无催追之烦，佃无比枷之累。倘再仍前，顽抗以及藉端诈扰，或扶病人，或扛尸骸，或因妇女产亡、小儿殇夭，辄向业主逞凶噪闹。种种不法情事，一经本府访闻，或被业主指禀，定即照例从重严办。圩甲串庇，并于加等惩办。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光绪叁拾年贰月廿二日示

二、中药铺问心堂

黎里镇的陈同春中药店，开设于道光21年（公元1841年），属于吴江最早的中药店，可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停了业。稍晚于陈同春的要数开于同治10年（公元1871年）的问心堂了，至今仍然兴旺，黎里镇上唯一的一爿百年以上的中药老店。

历经130多年，问心堂仍然在原址经营（现在是黎里镇中心街13号），门面占地86平方米，安排着“百眼橱”、“丸散橱”等六个橱柜，每个排列45个隔屉，合计270个，橱柜上层安放38个锡盖磁瓶，其中有些磁瓶是康乾年间的，比问心堂更年长。隔屉内储存普通药材，磁瓶中存放名贵的中药。

吴地有句俗谚，“七世修来街面屋”，要在苏杭一带的古镇，特别是热闹繁华地段，拥有一间店面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当年，问心堂药店就会同天福永布店同时开业，三开间门面，东边一间是问心堂，西边一间为天福永，当中一间两家公用。这样的布局俗称“和合门面”，顾客上门既可以赎药，也可以剪布。天福永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迁走了，房屋全部归属问心堂，东边仍旧是中药铺，西边则开辟成西药柜台，中间仍然是走道。

说起问心堂的开创，涉及到许景星的一段掌故，黎里的老一辈

至今津津乐道。

那是光绪初年的秋季，一天，许景星到陈同春药店抓药，由于病情较急，央求伙计快一点。当时黎里就陈同春一家中药铺，生意一忙，人手一紧，中药的质量、价格难免不如人意，抓药也时不时会闹点别扭。对于许景星的央求，伙计只冷冰冰地回答，上午来方子下午取药，这已经是店堂里不成文的规矩了。许央求了多次，伙计不阴不阳地发话道："只有老板关照下来，才能提前，我哪能自作主张？""除非你自己当老板，否则只能等下午！"许景星受到奚落之后，一发狠心，就与亲戚朋友毛冠生、迮子善和鲍润生四人联合创办了一爿药店，他们立下宗旨，一定凭着良心为桑梓服务，特取名"问心堂"。

其实，许景星受到奚落，只是开药店的一条导火线。诺大一个黎里镇，加上一百多个村庄的乡脚，只一爿陈同春怎么照顾得周全。乡亲们有了病痛，多数能挺的就挺；实在拖不了，就在走方郎中处胡乱抓点药。许景星与迮、鲍、毛四家，审时度势，认定再开一爿中药店大有市场，一则为家乡父老解决抓药的难处，二则站稳脚跟之后，必定有相当的利润。由于许景星他们尝到了缺医少药的苦涩，因此竭诚为民，坚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力求时时处处问心无愧。

古语云"巧诈不如拙诚"。问心堂从进货、加工到发药、售药，从制作丸散，到创出品牌，为家乡预防疾病抵抗时疫，他们付出了力气更付出了心血，真正做到了问心无愧。

进货，问心堂坚持选择优质药材。当时苏州是一个江南最大的中药药材市场，几乎全国各省所有的药材在这里都有周转、屯积和发售。选药一项，不仅学问深，生意经也多，问心堂凭着自身的良心选购的尽是上好药材。采购时坚持选优拒劣，如人参必进"二十支天字别直参"，楝树子，四川出产的质量最为上乘，就专进"川楝子"，枸杞子甘肃最佳，专选"甘杞子"，伏苓则进白净的"云苓"。

同是蜀产药材，也有讲究，杜仲必进大而厚实的“川仲”，川贝必进“寿桃贝”。有时一些药材掮客找关系上门推销，问心堂坚持“认货不认人”，只看药材的质量，不管人情厚薄。

老话说“病有四百病，药有八百药”，中药质量由于产地不同，其药效相差非常之大。至今，在问心堂还保存着一块招牌，“问心堂各省药材”，选择各省最为上乘的药材，成为问心堂生存的根本，用时髦话说这是他们的生命线。

药材运到问心堂，有专人保管，有专门库房，存放、通风、晾晒，还需要精心整理、加工与炮制，确保药效。后坊加工场所叫内场，人员有“头把刀”、“二把刀”和“打杂”三种，刚进店学徒，必从打杂做起。打杂主要对药材进行整理和翻晒，“打杂好做，黄梅难过”，每年的黄梅雨季，必须保证药材不发生霉变，否则不仅丧失药效，有的甚至会产生毒性，因此这是后场人员最为费心费力的日子。从事加工的伙计，他们的活儿，既需体力更需技术和细心。就拿一支当归来说吧，须分成三份，归头、归身和归尾，各有各的用处。饮片加工最讲刀功，片子需厚薄均匀，边型呈特定规格，有“凤眼片”、



问心堂药铺用具

"瓜子片"等等的分档。问心堂有一句老话:"白芍不见边,附子飞上天,一只槟榔切成一百零八片",咀嚼此话,问心堂药材加工的细到可见一斑。

黎里人吃中药,都把药渣倒在通衢路口,这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习惯。有说,这样做为了提醒路人,附近有病人,不要惊扰;有说,这是一种迷信,药渣让路人践踏过后,病人的晦气就被路人带走了。问心堂也提倡病家把药渣倒出来,用意是请人民大众监督问心堂所配中药的质量及其数量。扪心自问,问心堂的中药质高量足,君臣佐使,配伍比例得当,相信众口可以铄金,长期坚持自有公论。另一则,郎中开药,药店卖药,只能疗病,无法医命,万一病人有个三长两短,那么药渣可以作证,问心堂问心无愧。

膏丹丸散,是问心堂的品牌。药谚云"仙人难识丸散",经过研磨加工,成为粉剂的中药,即使最有经验、最有眼光的老中医也难以识别。这中间,名贵的与普通的,价格高昂的与低廉的中药所占的比例,全凭店家自定。问心堂的品牌,打的就是膏丹丸散。有活络丹、三蜜丸、保和丸、六味地黄丸、杞菊地黄丸、霍香正气丸、纯阳正气丸,还有龟板膏、驴皮膏及行军散等等。问心堂开业伊始,就坚持做到精心加工,成色足,配料精。君臣佐使,主药的比例、品级档次,货真价实,决没有任何伪劣,决没有任何欺诈。

问心堂一直坚持诚信服务桑梓,时刻想着乡里乡亲。每年的端午节前夕,供应雄黄和苍术白芷,让乡亲们驱赶毒虫蚊蝇。每年炎夏到来之前,加工各种花露,金银花露、地骨皮露、蔷薇花露等等,预防暑热,解毒清火消炎。不仅治病,还预防疾病,为抗时疫作出奉献,为黎里奠定了健康的基础。

最值得一提的是"八珍糕"。

八珍糕是"小儿八珍糕"的简称,问心堂特制应市为儿童补虚健脾。小儿一般爱吃零食,炎夏季节,最容易患消化不良症,八珍

糕却是一种特殊食品，可以“治小儿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形容色黄，腹膨便溏”诸症。

八珍糕有明确的处方，问心堂以《汤头歌诀》为标准，“八珍糕与小儿宜，参术苓陈豆薏依，淮药芡莲糯粳米，健脾益胃又何疑。本方用潞党参三两，白术二两，茯苓、扁豆、薏苡仁、淮山药、芡实、莲子肉各六两，陈皮一两五钱，糯米、粳米各五升，加白糖十两蒸制成糕。”八珍糕用中药配伍，既是食品又是药品。自入夏后应市，立秋后停产，一年一度，销售时间约三个月。八珍糕非常受小儿欢迎，外形也好看，形似麻酥，每包十块，包小块多，色、香、松、甜，家长们常常多买一些，存放在燥瓷中。八珍糕价廉物美，常常有一些小孩子，入夏后自己寻找知了壳，到问心堂换取八珍糕，渐渐地这就成了黎里的一种民间习俗。

八珍糕应市，刚好也是各种花露生产的旺季，为了一年一度市民的需要，问心堂的全体员工加班加点，常常操劳到后半夜，至今问心堂的老职工回忆起当时情景，总觉得甘苦同在，苦中有甜，拿他们的话来说：“这行业么，落在其中，乐在其中。”

开中药店的人，老话戏称为“药猢狲”。一般说来，药猢狲是善于赚钱的一种隐晦称呼，带有贬义。“大秤进，戥子出”，不消多动手脚就能赚钱。中药繁多，药名更多更繁，一种药，往往有几个名称，比如商陆，就有白母鸡、张国老等等的异名，有二三个异名那还算少的，多的要五六个呢。一味中药，买进卖出，叫法总是不同，就拿农田里最普通的三荔草根来说吧，“进店香附子，出店地九薑”，收购价与出卖价相差悬殊，名目一多，花样就可百出，一般老百姓当然如堕五里雾中。

问心堂的职工们竟然也自称“药猢狲”，他们的药猢狲有别解。问心堂上自经理下至学徒，双手双脚还有脑子，都一息不停地劳动。店堂伙计虽有“头柜”、“二柜”和“坐帐”之分，但生意实在忙，所

有的人员，就连老板也参与动手，看方子、称药材、开抽屉、关抽屉，从这屉到那屉，从这瓶到那瓶，一帖药，内里总有几个小包，先煎的要包开，后煎的也要包开，内里的小包有纸包的，有纱布包的，更有要用鲜荷叶特殊包装的，鲜荷叶上再用针刺上一排排小孔，费工费时又费心。问心堂的店堂里上上下下，常年一齐动手，穿梭不停。当时隔屉上不写中药名称，也不标价钿，全凭脑子记忆，问心堂的伙计们个个都下过苦功，练到一抽一个准，一抓一个准，抓一张方子比其他任何药店都要快速。尽管这样，由于生意兴隆，伙计们仍然忙得不可开交。抓一帖药不知要走多少来回，因此问心堂除了戏称自己为“药猢狲”外，还戏说自身“日行千里，足不出户”，真实的情景，诙谐的言辞，内中也不乏自傲。

店堂里是药猢狲，后面的伙计也同样是药猢狲。光加工丸散，他们就有蒸、浸、泡、漂、渍、煎、炒、切、炙、碾、揉、筛，样样俱全。与多数店家一样，问心堂也是传统的前店后坊，总共三进房子，第一进店堂，二三两进是作坊，最后还有一个近三亩地的药园，“一亩园十亩田”，侍弄这么一个药园，劳动量之大可以想见。园里常年种植着竹子、女柏、菊花、薄荷、藿香、沙参、菖蒲、大叶青、何首乌等等药草。尤其是那竹子，时不时要自吊鲜竹沥，街坊乡亲都知道，问心堂自吊的鲜竹沥，治无痰的干咳特别灵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药业公司提倡就地收购药材。这一下药猢狲更得手脑并用，一刻不得停息了。一般是每年收购一季，鸡黄皮、知了壳、地鳖虫、百脚、壁虎、乌梢蛇，还有草药，地丁、金钱草、苦瓜、无花果、蒲公英等等。收购季节来临，刚开始的前三天，特别忙。收购最多最费手脚的是乌梢蛇，有一年仅仅三天功夫竟收到了800余斤，杀、洗之后，用烘箱烤干，再进一步加工制作。劳动人民风里来雨里去，湿热病较多，乌梢蛇专治风湿病，颇受欢迎。

问心堂的全体人员，平时都要自学《汤头歌诀》、《本草纲目》等

药书，理论再加实践，积累到一定火候，成为“半个郎中”，资深者还能对各种药方进行鉴别和调整。除了正宗郎中的方子外，问心堂常常接到“仙方”、“野方”和“单方”。仙方主要是巫婆、神汉开在红纸上的药方，这种药方或多或少对病人有所危害，问心堂接手后，一般总要详细进行询问，根据病情，对所下之药的品种、份量，进行加减调整，对一些烈性药暗中予以剔除。野方，江湖游医所开，大多是“既不伤命，也不疗病”的所谓药方，问心堂的伙计们必定认真对待，询知病情后，或帮助增减，或劝告病家另请郎中。单方就是民间偏方，旧有“单方一味，气死名医”的说法，这种药方专治某种疾病，经过长期的社会应用，证实了药效，对此，问心堂的伙计们了如指掌，他们所把的关，就是问清病情，对症下药。

问心堂的经理、伙计，他们的经济收入比较可观，一人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一个中等之家。但是，看看他们的付出，这样的收入也就问心无愧了。

光绪年间，问心堂出过一次差错，因为处理恰当，坏事变好事，竟使问心堂的声誉更加卓著而近悦远来。那是光绪初年秋季的一天，店堂里同时接收了两个张阿毛的方子。因为抓药的人多，方子都只能压着，上午拿来，要等下午才能拿药。到下午，一个张阿毛先来了，伙计拿起药一看姓名对头，就交付了来人。不料，发出的是另一个张阿毛的药。没多久，伙计们就发现了，马上派人四出寻找，可是等找到病人，一帖已经下了肚。问心堂马上承认交错了药，先是赔罪，接着诚心诚意地请郎中重新开药，承诺所有的药费全部免费供应，直到病家病体痊愈为止。这一来，更加显现了问心堂为民的诚意，街坊邻里四乡八落，纷纷前来作成生意。别说整个乡脚，北厍、芦墟等邻近市镇，乃至浙江的南汇、廊下、汾玉等地也都相信问心堂了。

出了这一差错，问心堂从中吸取了教训，不但抄下方子录下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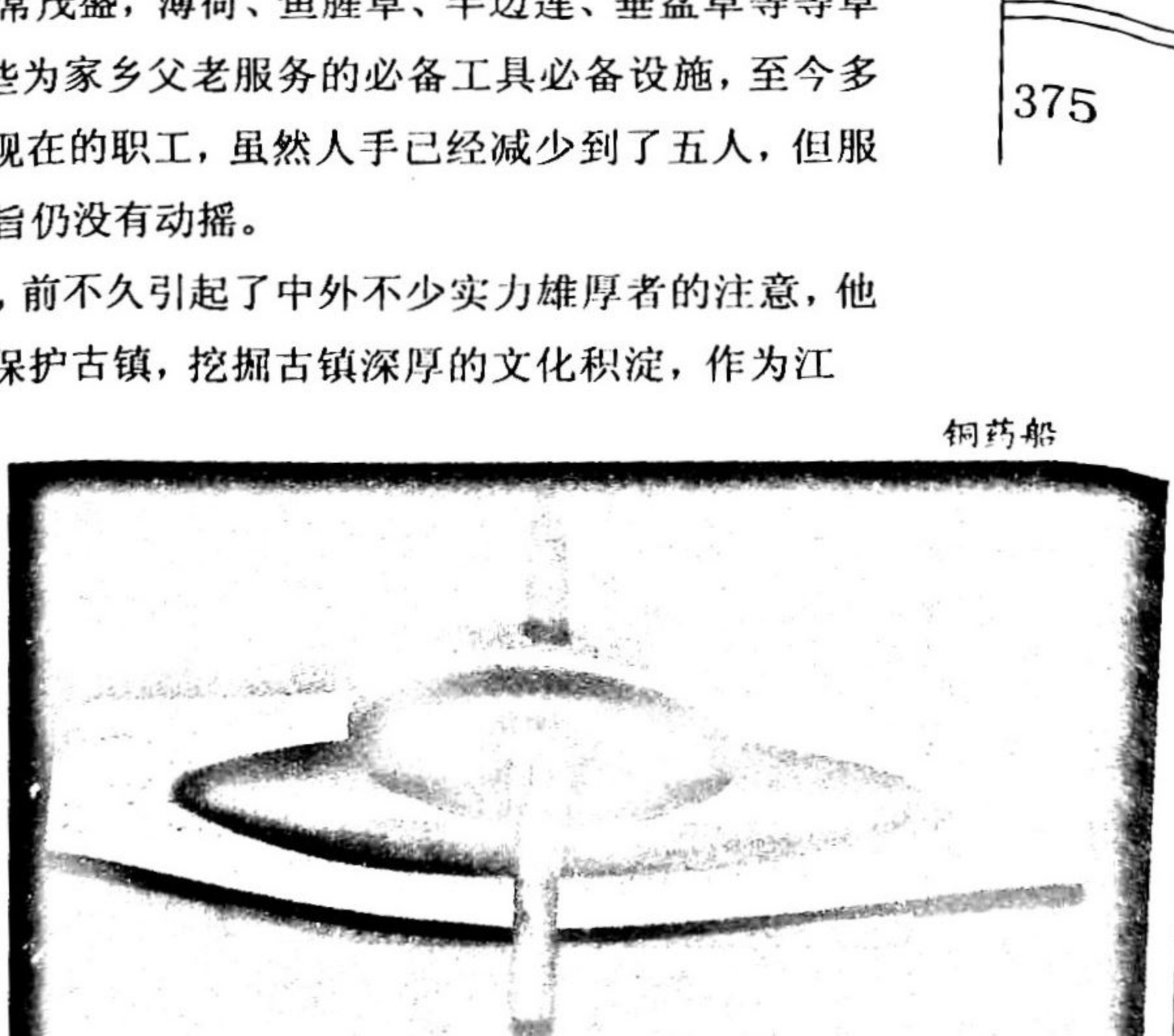
名，而且录下地名，里弄或者村庄，再加上男女性别、年龄等其他各种信息。从此，问心堂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闪失。

问心堂以诚信起家，他们从“街庄生意”做起，又争取到了大量的“乡庄生意”，换句话说，问心堂不仅争取到了黎里镇居民的心，还取得了乡下农民弟兄的信任。陈同春以及后来开出来的仁心堂等几爿中药铺，大多只有三五个人，至多七八人，独问心堂最多，常年在十五六人，仍然忙不过来。

而今的问心堂，生意仍然做到问心无愧。店堂里除了木橱隔屉和磁瓶，还有二个搡筒，三把戥子，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三只药船，其中一只铜药船，与问心堂同岁，仍然金光锃亮。后二进，各种加工用具一应俱全，扳刀，那是切药材的；瓷盂，直径达52厘米的一个大瓷盂，那是碾朱砂、珍珠粉的专用工具，在吴江堪称硕果仅存的了；灶头一座，这是每年冬至煎膏子药的设备；还有各种团匾，那是制作丸药称手的工具。工场后的药园也在，只是小了不少，一棵杜仲一棵枳树长得非常茂盛，薄荷、鱼腥草、半边莲、垂盆草等等草药也一片碧绿。这些为家乡父老服务的必备工具必备设施，至今多数保留着，问心堂现在的职工，虽然人手已经减少到了五人，但服务于黎里人民的宗旨仍没有动摇。

黎里作为古镇，前不久引起了中外不少实力雄厚者的注意，他们愿意投入资金，保护古镇，挖掘古镇深厚的文化积淀，作为江南又一个旅游胜地。到那时，问心堂中药店，作为百年老店，必将再显辉煌。

铜药船



三、老茶馆万云台

江南市镇是商业、手工业的中心，它的结构与功能不同于乡村，也不同于作为政治中心的县府城。市镇上遍布牙行、作坊、商店、酒肆，茶馆，充斥客商、作坊主、工匠、脚夫、伙计、佣工，大量商品在这里集散运转。乡村闭塞，县府城为条条框框束缚，呆板而僵化，二者都缺乏活力。市镇作为江南经济的重心，富有开放性、灵活性和进取性。市镇在运作过程中，茶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小茶馆显现的是一个大世界。它不仅饮茶聊天，更是经济交换、信息流通的重要阵地，还具有休闲、赌博、娱乐、评判是非、调解纠纷等多种功能。

明清两代，黎里镇上的茶馆之多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晚清至民国时期，黎里镇的茶馆多达40余家，遍布于街衢闹市乃至冷僻的市梢头。茶馆多以楼、阁、园、轩、台、春命名。比如得凤楼、万年楼、桥楼、第一楼、双凤楼、四经楼、近水楼、阳楼、大观楼、红梅阁、东来阁、二友轩、春园、红星园、喜春台、万云台、顺和春、小南洲、义泉等等。时至今日，镇上的顺和春和万云台尚在原址经营，顺和春已经改建，万云台则旧貌依然。

万云台，地处镇东热闹之地，真可谓万商云集。万云台始创于



茶馆评弹 摘自《茶馆风景》

1890年，由孟世恒与钮阿金二人合作经营。座北朝南，分内外堂两进，外堂子三楼三底，楼上楼下共有20来张茶桌，做乡庄生意，来者大多是短衣邦。内堂子是面阔三间的一座客厅，安排10来张八仙桌，东边一间为笼糠间，西边一间老虎灶，8口七石缸半埋在地下。内堂子做街庄生意，茶客都是长衫邦。万云台一日两市，上午称为“上昼茶”，下午叫做“下昼茶”，乡庄生意主要在上午，街庄生意上昼茶紧接下昼茶，下午还要开书场。

伙计4人，内外堂各一个堂倌，冲水泡茶，侍候茶客，一人专管老虎灶，供给茶客茶水，也供应周边居民前来泡开水，另有一人挑水，假如书场开张，那么就掮一扇大牌子，周游全镇作广告。

乡庄的茶客主要是四乡的农民和镇东的渔民兄弟，也有一些候船的旅客和航船的主家。

渔民兄弟是最早到来的茶客，他们带来了鱼虾河鲜，养在木盆中，不必吆喝，只管喝茶吃早点，东南西北地谈山海经，一个早晨下来，鱼鲜很快会被新老主顾们买去。

早早到来的常客更多的是黎里镇东郊的农民，还有浙江陶庄、汾玉、下甸庙的茶中瘾君子。他们天色未明就起身，踏着星光残月，涉足田间小道，迎着卯风，急急前来。有时需要带上较多的农副产品，那么就摇着小船，两三人结伴同来。赶到万云台的第一件事，是到木接口（预热锅）里舀一勺热水，洗一把脸，擦去露水和风尘，笃

悠悠地坐下来喝一口头泡茶。

农民兄弟三四个、七八人围坐一起，边喝边聊，探听各路行情，茶喝得差不多了，他们带来的糯米、赤豆、鸡蛋、家禽、芋头、蔬菜什么的，也已经换成了铜钱。

明清两代的江南市镇，形成丝绸、棉花、粮食三大经济板块，黎里属于粮食专业板块上一个重要据点。黎里四乡农田生产的粮食有限，主要从两湖两广及四川运进大批粮食，再以小船分装供应周边市镇的需要。晚清时期，黎里的大小米行不下30家，吞吐着整船整船的米粮。由于每天的市价变动不一，米行的老板们到万云台集会，公议市价。

俗话说“茶馆兴盛百业旺”，在火车、飞机、电话、电视一类新的通讯设备、联络方式出现之前，一个茶馆就是一个镇上的“新华社”，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异常重要。

茶馆的茶客一般说是比较固定的，俗称“老主客”，每个老主客差不多都有固定的座位。清代的黎里有“九当十三车”的俗语，是说黎里镇上有9家典当13个榨油作坊，他们喝茶都有固定的茶馆，当房的老板们集中在得凤楼，油车的坊主们会聚在二友轩。万云台的老茶客除了米行老板，还有米业市镇派生的另一重要行业糖坊业的作坊主，再加五匠作头及一些过往客商。万云台，黎里镇人气最旺的茶馆。

茶馆是社会的缩影，它的触角联着四乡八村。明清两代的黎里人丁兴旺，闲杂人员也多，茶馆是这些人消磨时光的好去处。正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家庭以天伦合，学校以道义合，工商以职业合，而茶肆以市井游荡合。无职业者茶肆为其第二家庭，怡情会友，享社会之乐。”在茶馆喝茶的人多而杂，其中必有四种人，那就是“业、蚁、催、数”，业是业主；蚁，白蚂蚁，暗指专做房产买卖的经纪人；催是催子，专门催租的人；数是知数，即商店、钱庄或大地主

的帐房先生。

茶馆，小世界大社会，世俗生活的窗口。茶馆宽松的环境，与社会各个阶层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爱国者可以利用茶馆作为宣传阵地，文化人可以在这里作茗叙雅集，有闲人拎着鸟笼大谈鸟经，行商坐贾洽谈贸易，戏剧曲艺爱好者在此听书赏曲。茶馆，它五方杂处，信息灵通，文化气息浓郁，汇聚了众多的民情民俗，折射出社会的各个层面和时代风雨。

黎里有句俗语，“茶馆一壶茶，胜访千家屋。”在那个时代，老百姓碰到难事，只要到茶馆里一说，保你都有办法。看一看万云台为家乡父老办理的桩桩件件，就可以知道此话不虚。

万云台茶馆是民众通讯联系的据点。万云台的廊柱上挂有一个专用信函木盒，每天各路航船都把捎带来的信件插到里面，再把需要寄出的信件带走。民国年间有了电报，拍发电报总是急事，万云台接到电报，从不怠慢，必定千方百计于当天将电报交到收件人手中，从来没有误事的。万云台又是个不挂牌的联系点，延请和尚、道士、土工（办丧事的杂役）、媒婆、喜娘、茶酒担、堂名、戏班、乐人、掌礼、风水先生，请郎中出诊、唤泥水匠拾漏，还有几个小有名气的算命先生、代写书信房契田契乃至卖身契的落第秀才、代画寿照的画师等等，都同万云台茶馆有交道。

万云台茶馆急人所难，深受民众欢迎。黎里镇上某某郎中擅长医治什么病症，诊所在哪一弄哪一号；浙江嘉善的陶庄有个姓高的郎中，看喉咙毛病特别拿手；吴江莘塔有个姓凌的郎中，医皮肤病最为灵验，乘什么船走什么路，万云台上自老板下至伙计人人心中清清楚楚，遇到病家，一一给予指路。

万云台的老板善于为人排忧解难，他们雇佣的堂倌，都是精明能干的角色，眼观四方耳贯八面，善于捕捉社会各个角角落落的种种信息，综合、比对、筛选后储存在心。茶客或邻里乡亲遇到难事

急事，储存的信息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用。清朝末年，地方治安混乱，民众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常常发生绑票事件，万云台的老板和伙计们，总是竭尽他们所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家乡父老尽心尽力。宣统元年冬，镇东聚兴馆的老板娘突然不知去向，估计遭人绑架了。聚兴馆的沈老板，急忙来到万云台，请求打探消息，三天后探得了实信，是浙江一伙杆子所为，目的是敲诈钱财，还是万云台老板指的路，沈老板花钱消灾，孝敬了黎里当地的一名老头子，最终使老婆脱离虎口，安然回家。

万云台的堂倌人头熟，会说话，态度又极谦恭。他们待客不仅有礼数，更有本事。手勤脚快，频频为顾客斟茶续水，只见他左手拎起壶盖，右手提起锃亮的长颈铜壶，射程远而准，一道水柱在空中划出一弯优美的弧形，一壶茶，连注三次，滴水不洒，干净利落，行话叫作“凤凰三点头”，算是对客人的敬重。

茶馆例行在大年初一到初三泡元宝茶，就是在茶壶盖上放两枚青果（新鲜的橄榄），橄榄象征元宝，寓意“招财进宝”，“喜事成双”。元宝茶是店主对客人的新年礼，不另加茶资。饮元宝茶的客人都乐意给堂倌们略付小费，也算对他们一年来种种服务的犒赏。

万云台两进的穿堂里，常年有一名剃头师傅，安有一张剃头的凳子，剃头、修面、挖耳、捶背、翻眼睛，样样在行。为了方便茶客，万云台内堂子的深处折出一角，用布作帷，隔成小间，添置木盆、毛巾，供茶客沐浴，俗称“茶馆盆汤”。好些客人，早上去喝茶，傍晚去洗澡，于是调侃为“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也算是健身方法，公认的养生之道。

黎里人说是吃早茶，其实兼带吃早点。每天曙色朦动鸡叫头遍的时候，茶客就上门了，昏昏沉沉地走进茶馆，一杯浓茶下肚才真正清醒过来，一天的生活开始了。第一壶清胃，洗净隔夜的沉积，饥饿感觉上来了，就吃早点。万云台隔壁有个陆寿生大饼店，那里烘

出来的大饼特别香酥，再加新尕出来的油条和油墩。不需跑动脚步，只要招呼一声，一副大饼油条就送到嘴边。各种小贩都来兜揽生意，除了大饼和油条，还有麻团、粽子，油炸臭豆腐干、鸡鸭血粉汤、白糖莲心粥、小馄饨、香烟、瓜子和五香豆，都来轧一脚，凑热闹。如果想到东面的聚兴馆吃碗面，尽管走，只要把茶壶盖子翻过来，堂倌一看知道客人还要回来的。

喝茶的悠闲是很让人眼馋的，黎里人习惯上把坐茶馆叫做“孵茶馆”，可以想见喝茶闲坐时间的悠长，大约可以长到母鸡孵出小鸡来。喝茶，是生活的享受，辛劳奔忙之余，到茶馆泡一泡，安闲地坐上几个钟头，是紧张生活的缓冲，涤虑忘尘的休闲法子。记得徐志摩有一首写茶馆的打油诗：三间东倒西歪屋，几个稀奇古怪人。屋里屋外人济济，茶壶在手不计年。徐志摩写的是越地的茶馆，不过吴地没有什么两样。茶客们一壶在手，悠然忘记了岁月，这里正是最好的休闲场所。

孵茶馆在于一个趣字，老人最怕孤独，家里有儿孙老伴，可是有些话却是不好同家里人讲的，只有在茶馆里才能尽情地宣泄，所以喝茶可以享受人生可以稍稍放纵，二三知己会聚畅谈，有茶有物更有趣，趣是茶馆独有的，谈山海经、摆龙门阵、社会新闻、小道消息，农事、收成、灾祥、米价，各类行情，无所不包，更无奇不有。老虎灶的氤氲，茶水的香味，随意而融洽，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茶馆内往往设赌场，那个时代的赌博，应有尽有。什么扑八叉、马吊（斗纸牌）、游和（小纸牌）、幻和（又名翻百劳）、挖花，乃至斗蟋蟀、斗鹌鹑等等。民国时期，赌博也赶上潮流，麻将、牌九、扑克、骰子……当然，万云台也经常有人赌博，大多数人是小来来，偶尔也出现大赌或者想豪赌一场，老板和伙计自会通过种种社会关系，加以制止，不让酿成祸患。

茶馆又是娱乐场所。明清两代，社会公共的娱乐活动，除了春社、秋社和庙会外，其他的娱乐不多。茶馆，只有茶馆，几乎每日每时都有娱乐，因此是最能聚人的场所，诱得周边摇船动橹的人不少。南词、滩黄、花调、道情、戏法、隔壁戏、木人戏、莲花落、小热昏、百唱梨膏糖等。偶尔也有卖唱的，一个姑娘搀着一个戴墨镜的瞎子，走到茶馆中央，瞎子拉着二胡伴奏。在电视或电影里，我们看到的姑娘都漂漂亮亮，歌喉响亮，事实上那些姑娘，为生活所迫，多数面黄肌瘦的，曲也唱不像腔，只不过讨人可怜，求几个铜钿罢了。

万云台最为有名的娱乐是听苏州评弹。黎里镇的评弹演出至少有150年的历史了，有单独的书场，更多的是茶馆附设书场。黎里有个传说，它把评弹与茶馆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道光30年（公元1850年），宣宗去世，大清推出国葬规格，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三年。这可难为赖说书为生的艺人，生计问题如何解决，于是有人想了个办法，说书艺人到茶馆里来开张，很快的，那些专门说书的场馆也改称茶园，卖茶与说书二为一体了。事实上茶馆与书场结合，确是两全其美的好事。茶客既可以喝茶又可以听书。再则说书艺人，道具简单，一桌一椅（或二椅），三弦琵琶，一把扇子、一壶茶就可以了，嘴巴说得干了，还有堂倌冲茶。

有人说，评弹是用茶水浇灌出来的艺术，很有道理。黎里人爱到茶馆，一半为喝茶，一半为听评弹。凡茶馆鼎盛之处，书场、评话艺术必随之而兴起，名演员辈出。

民国年间，万云台请过好些名角儿，人称“描王”，擅长说唱《描金凤》的夏荷生就是其中一位。《描金凤》的情节跌宕起伏，曲折动人。一次夏荷生到万云台演出《描金凤》，半个多月过去，场场爆满。书里有两处死刑的描述，一是主人公徐惠兰在开封遭人陷害，被判死刑；二是金继春私放徐惠兰后被绑赴刑场，最后为徐的仆人约请

绿林好汉劫法场而脱险。说书犹如章回小说一样，说到紧要处，总不外“欲听性命如何，各位明日请早”。却说黎里镇上有一位姓陈的老翁，此老年逾古稀，别无所好，独喜苏州评弹。他听书成瘾，每天必到。徐惠兰被判死刑，担心了好几天，后来为金继春义释，老翁总算舒了一口气。不料，金继春被判死刑，而且已到法场立马要断头了，陈老头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偏偏夏荷生让听客们“明日请早”了，老翁勃然动怒，站起来，奔到前面，指着夏荷生破口大骂，说什么“这样的好人，你就不救他？让他绑到明天，真正没有心肝！狼心狗肺！……”这一突然举动弄得所有的人都楞住了，夏荷生先是一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听骂声之后，恍然大悟，不但没有发火，倒暗自高兴起来。连连请老先生息怒，接下去，破例为他重新坐下来，续说了“劫法场”一段。陈老头得胜了，兴冲冲地回家去，以后逢人必讲自己刀下救人的英勇故事，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苏州弹词极其细腻生动，唱腔优美，叙事或刻画人物极为细腻，故事情节大多与苏州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有关，能把市民生活和心理表达得淋漓尽致，幽默风趣。曾有一首《竹枝词》：萧条市井上初灯，取次亭门顾客疏。生意数他茶馆好，满堂人听说评书。万云台茶馆的内堂子，下午总有专场说书，有时大书，更多的小书。

“一壶茶品人世沉浮，百张口讲苍生百态。”这是万云台茶馆里的一副对联。到茶馆吃茶，怎么不谈生意经不谈山海经，百张口都来“讲”，讲什么呢？

原来，晚清和民国，皇权更替，社会国体风雨飘摇，政府职责每况愈下，地方政权缺乏权威，社会治安异常混乱。就在茶馆这公共场所里，逐渐酝酿出了一种民众自治的“吃讲茶”。那时，好多的民事纠纷，比如兄弟分家，财产问题；邻里建房，用地问题；还有债务、口角等等，常常摆到茶馆里来给众人评判。当事双方摆开阵势，唇枪舌剑，最后请有名望的人出面裁判。吃讲茶的情景很有趣，茶馆似乎变

成法庭，双方都请了能说会道的人申述理由，和现在请律师差不多。充当裁判的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坐在正中一张茶桌上，俨然法官一样，孵茶馆的老茶客就是陪审团。不过，茶馆到底不是法庭，缺少威严，动不动就会大骂出口，大打出手，打得壶杯乱飞，板凳桌子断脚。这种情形，万云台老板见得多了，站在一旁，不动声色，不愠不怒也不急，反正一切损失都有人赔，败诉的一方承担一切费用，包括陪审团们今天的茶资。

吃讲茶的裁判具有很大的社会约束力，有的失败者即使上官府告状，黎里人称为“落北去”，因为吴江县衙在黎里镇的北面，落北去暗指上县衙告状，即使县衙告状转败为胜，社会也照样不承认，说那是用钱买通了衙门的勾当。且别怪老百姓，要怪该怪那时衙门的官吏贪赃枉法，判的多是冤案、假案、糊涂案。

茶馆的民众自治不仅有吃讲茶，甚至还召开集体除害的会议。

二十世纪初年，浙江嘉善芥字港村的二十几家户主，来到万云台合议，议题是村上有个叫歪三的，吃鸦片，酗酒，赌博，强奸妇女，游手好闲，借钱不还，村上每家都借到了，为了借钱，赖在人家家里不走，要吃要喝，临走必得拿到钱或者值钱的东西。有了钱吃喝嫖赌，没钱了就滥诈不休，偷东挪西，无恶不作。已经坏了芥字港村的名声，常此下去，人人自危，于是全体决定“种荷花”。

这么多人在外堂子吃茶公开议事，当时有人问他们，难道不担心走漏风声，让歪三逃脱？内中一位长者说得非常有道理：如果有人给歪三报信，说明歪三还有一丝人缘，或者说还有人可怜，那么他命不该绝。事实上歪三早已是人人深恶痛绝，没有人会给他报信的。果然，全体议决后的第三天深夜，全村每家派出一名青壮年，冲进土地庙，抓住了歪三，缚住手脚，扛到大河边，再缠上一块大石头，种了荷花。事后，四乡八镇都称赞这为民除害的义举。

茶馆虽小，折射的世界却大。

四、中秋显宝

明清两朝，黎里镇有个特殊的风俗习惯，每逢八月中秋，全镇的富户望族、商家庙宇，都要向民众“显宝”，少则三天，多者五六天。就是把家藏的古董珍奇拿出来，尽是历代名人书画、古瓷玉器、官服佩饰、珍珠玛瑙之类的古玩，供奉在店堂中、客厅里，让族中亲属四方乡亲前来观赏。每逢中秋那几天，不仅是黎里，就是四乡的民众也都要到黎里镇上走一遭。平日那些大门不出二门少迈的家庭主妇、小姐，也都穿上鲜艳的服饰，淡妆浓抹，胸挂项链，臂挽玉镯，光彩照人地前来赏宝。

晚清及民国时期，至今古稀之年的老前辈还清楚记得那时的盛况。镇西的城隍庙供出的是一对二尺多长的硕大玉如意；镇东的土地堂显上各式宫灯，外加一只玉蛋，就如一个新疆的哈蜜瓜似的，灯光照耀，玉色半蒙胧半透明，煞是可爱。

最让人们心动的是工部尚书周元理家显的宝。清代黎里有八大姓，“周陈李蒯汝陆徐蔡”，周氏居首。周家第三厅名“赐福堂”。每年八月中秋节，赐福堂主周元理将家藏的瑰宝供奉在赐福堂上，显宝有三件，一是乾隆皇帝用过的御笔，黑漆管上嵌有“赐福苍生”四个金字；二是一把永保温凉长喝不完的铜茶壶；三是唐伯虎的《双雀



唐寅《双雀图》

图》。周家的赐福堂平时轻易不让人进出，只有中秋前后显宝的三天，四村八落的民众才可以自由出入，隔着竹帘子赏宝。

周氏三宝，唐寅的《双雀图》最最神奇。隔着竹帘子，影影绰绰的，老百姓都说他们看到的那对麻雀是活的，甚至有人亲眼看见周家的佣人在地上撒了一把米，一双麻雀就飞下来，“啄啄啄”地吃起来了。

显宝之风一直沿袭下来，周元理的子孙后代也一直将御笔、茶壶和唐画作为传家之宝。至今健在的老人清楚记得周家最后一次显宝，也是黎里镇最后一次显宝，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秋。

显宝风俗，不可否认满溢着豪富们炫耀门庭的傲气，但是这一风俗大半值得肯定，是个良俗。在封建社会，没有什么博物馆，不管是官家还是私人的都没有。那些瑰宝，古董，多半属于文物，显示出来，让四方民众一饱眼福，客观上起到了宣传文物、认识文物的作用。

光阴如箭，岁月匆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古镇上所显的瑰宝，大多数已经不知去向。惟独唐伯虎的《双雀图》，辗转流传，几经易手，最后由吴江文物陈列室移交给吴江博物馆。这是吴江市惟一的一件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堪称国宝。一年一度的吴江博物馆建馆庆典，唐寅的《双雀图》真迹都会让大家一饱眼福。

五、名字中的“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就连长辈为孩子取名，也大多打上了风习的烙印。10年文化大革命，家长多为子女取了“文革”“红卫”“捍东”等名字。这里要说的是黎里带“官”字的名字。

明清两朝及民国年间，黎里人取名多带“官”字。至今50岁上下的黎里人，带“官”字的还有不少。这，透视一下，可以感觉到，黎里人重视读书谋求考秀才中举人中进士做大官的普遍心态。在封建社会里，要想飞黄腾达，舍此似乎没有其他途径。黎里是这样，江南其他乡镇的心态也大同小异。那为什么独独黎里人的名字多“官”呢？考诸历史，竟然同一个古老的传说有关。

明朝初年的一个晚上，朱元璋的智囊刘伯温在紫金山上观测天象，当看到三吴地区的吴江，大惊失色。一旁的朱元璋忙问：“军师，何故吃惊？”刘说：“吴江地区风水奇妙，芦墟地势广，似有千军万马；盛泽地气盛，能日出万侯；黎里文气足，官员多得如芝麻绿豆。”明太祖一听，着实吃惊不小。心想：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开创了这大明江山，而今天下刚刚太平，又要出现“千军万马”，还要“日出万侯”“官员多得如芝麻绿豆”，这岂不是横生枝节？天下已经太平，要千军万马何用，官员太多，如何封赏？沉思了大半宿，忽然想到，天

下人都说我皇帝是金口，一言定鼎，我何不……

次日早朝，朱元璋召集了满朝文武，开了金口："昨夜，朕与军师看过天象，吴江是个好地方，芦墟地势广，可出'千砖万瓦'；盛泽地势盛，能'日出万绸'。那个黎里嘛，文气足，要出三斗三升芝麻绿豆官，辅助大明江山。"刘伯温听了，不禁点头叹服。

从此，芦墟广建窑墩，盛泽织机隆隆。黎里呢，日夜书声琅琅，不绝于耳。于是，孩子一生下来，就给他取一个带"官"的名字，诸如"晋官""金官""福官"，希望孩子能够勤奋苦读，应科举做大官，荣宗耀祖，光辉门第。有的人家在孩子的小名里带个"官"字，有的按排行带"官"字，如大官、二官、三官，有兴趣排的话，排到九官毫不困难。不仅男子这样取名，连女子也是这样。柳亚子先生的三个妹妹，长妹叫龙官，二妹叫闰官，三妹叫申官。

风俗习惯一旦形成，力量就非常强大。它常常可以活过产生它的经济基础。科举制，其实到公元1905年就已经寿终正寝了，但是整个民国期间，黎里人生下的孩子，带个"官"字的仍然不少。因此，今天，我们还常常听到"海官""明官"的叫声。直到改天换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黎里古镇才觉醒过来，彻底甩弃了那个封建剥削的"官"字。

六、“请”长命锁

封建时代，吴地的小孩头颈里都要套一条项链，链下挂一把小锁，叫长命锁。据说有了这件小锁，小孩就可以无灾无难长命百岁。富贵人家的长命锁用金子铸成，贫寒人家则打一件百家锁，向邻里亲朋每家讨一个铜钱，打成一把小铜锁。

黎里的长命锁颇为特别，一则不用金不用铜，由银子打成，二则不是父母自家请人打，而是到寺庙里去“请”。

从晚清到民国期间，黎里各寺的和尚特制了一种银锁，每件的大小同成年人的二节小指差不多。首创此举的当推罗汉寺的僧众，他们每年至少有一名和尚志愿“坐关”。罗汉寺正殿西边建有一排“静房”，静房面积很小，里面只容得下一铺一桌和一个净桶，四面不开窗户，只有一扇紧闭的门，面南的墙壁上开一小方孔，供递送碗筷茶饭，墙壁下凿一个长方形的洞，刚好可以让净桶移进移出。紧闭着的那扇门，“搭扣”和“权头”特别多，通常不少于二十副，每副权头上锁上五件连环长命锁。坐关和尚在静房里念经，静房外典客和尚轮流侍坐，旁边的案头上放着一本缘簿，封面上写着“遂愿乐助”四个火黄色的大字。

这时，知客和尚四出活动，生孩子或即将有孩子的人家挨家挨

户登门拜访，邀请他们到庙里“请”锁。施主上门时由请客侍者引领，先在大雄宝殿向如来菩萨焚香点烛，然后再到静房，让施主在缘簿上写下捐款数目。民国年间，一般每“请”一件长命锁，少则二块大洋，多则一二十块。施主如果写得少了，侍立在旁的书记侍者会说：“请施主高升，施主高升，吾佛如来保佑令郎长命百岁。”捐助之后，施主可以从静房门上开启一把长命锁“请”回家中。一般每天都需要开掉一把锁，坐关和尚在静房里坐满百日就可出关。如果“请”长命锁的施主多，捐助的数目特别大，提前完成募捐款项，不消百日就可自由了。记得圆寂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道生和尚，民国年间曾多次在罗汉寺坐关，他每次都超额完成募捐指标，每次都提前走出静房。

罗汉寺首倡此风，黎里四周的寺庙庵堂，纷纷效仿。后来，有些庙祝香火把小银锁缀成项链，挂在菩萨头颈里，让人“遂愿乐助”，“请”回长命锁。一件小银锁当时工本市价不会超过四角小洋，一般可以换取四块大洋，获利十倍。因此，那时寺院里的静房大兴，刘皇菩萨、朱天菩萨等正神散仙，颈项里都围着长命锁链。黎里一带富家豪绅没有一家不花上百儿八十地去“请”上几件长命锁，就是平民百姓，只要不是穷得镂盖吸牢镂子，也都要给孩子“请”上一件。百多年来，向寺庙庵堂请长命锁成为黎里特有的风习，直到今天，还有人家把保留下来的银制的小小的长命锁套在婴儿的头颈里。

七、叫火烛

民国年间，黎里镇除了打更，还有“叫火烛”一行。属于民间自发形成的防火制度，由叫化甲头专门负责。整个民国年间，叫化甲头兼带叫火烛的共有三人。第一个是镇西头开大陆饭店的老板沈方，接下去的是大陆饭店的伙计无锡阿二，无锡阿二年老力衰叫不动火烛时，把这衣食饭碗传给了杨大。

无锡阿二叫火烛从民国七年开始，一直到抗战结束，叫的年数最长。现在70岁以上的老人都不会忘记无锡阿二那别有功架的装扮和声调。

每天夜晚起更，约摸晚上8点，无锡阿二身上背一个竹梆，那是二尺来长的一段毛竹，左手拎着一面大铜锣，右手一个棒槌。“点笃点笃点点笃，吮——吮——”先敲梆后敲锣，敲过三遍，拉直了喉咙高叫：

寒冬腊月，火烛小心。河干水浅，风干日燥。水缸拎满，灶口扫净。前门撑撑，后门关关。小心小心，谨防坏人！

无锡阿二慢吞吞地从镇西沿三里的市河开步，先上岸（黎里的主要街道有两条，中间隔着市河，河北叫“上岸”，河南叫“下岸”）从西向东，到镇东头九成湾上梅兰桥，折向下岸，再由东向西回窝。

叫火烛，每年腊月初一开始，到年三十为止。一个月的收入十分可观。全黎里光商店就有近三百家，腊月廿四那天都要付辛苦费，少则小洋四角，多则大洋一元，除了商店，有的富家大户也要破费一点。因此，这一笔收入足够一户中等人家一年的吃用开销了。

叫火烛很有油水，引得三教九流各式人等眼红异常。民国九年黎里南港有一帮油车（榨油的小作坊）工人，大多来自绍兴和宁波，人称绍帮，公推长臂膊和生为头，同叫化甲头沈方讲斤斗，硬要拆份头。争来争去，双方各不相让，两边各派代表在顺和春茶馆吃了几次讲茶，可是仍然僵持不下。为了避免大打出手，沈方提出“油锅拎铁”来解决纷争。长臂膊和生也有顾忌，绍帮虽然是强龙，毕竟是客籍人，难压沈方这批地头蛇，也就答应油锅拎铁。

拎铁那天，当街架起一口大锅，注满菜油，用木柴烧沸，扔进一块四寸长的铁片。任何一方只要用手探入沸油内拎出铁片，就算取得叫火烛的权利了。

沸油足足一尺来深，上下翻腾，烟雾缭绕，就是千里眼也无法看清铁片的位置。全镇的男女老少都来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叫化甲头沈方扬起右手，清理了一下喉咙，高声宣布油锅拎铁开始，接着胸有成竹地让绍帮先下手。可是，绍帮个个都是青壮年，来黎里打油吃饭全靠双手，长臂膊和生自己当然不肯下手，他向身边示意了好几次，可同行们一个个都装聋作哑，呆立不动。和生指挥不灵，只得请丐帮先动手。叫化甲头微微一笑，他回身只点了一下头，一名老态龙钟的老叫化颤巍巍地来到油锅边，捋起袖子，露出了瘦骨嶙峋的胳膊。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只见老叫化嘴一抿，眼一闭，右手“嗤”的一声探进了油锅，马上缩了回来，几分钟后又探了一下，接着下了狠劲，“嗤啦啦”一阵响，老叫化第三次把右臂伸了下去，黄瘦的面皮不停地抽搐着，痉挛的左手狠命地抓着右胳膊，在沸油中转了半个圈子，“叮”的一声响，铁片拎了出来，老叫化随即倒地，

不省人事。哗——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人群发出了一阵惊叫声。

从此，叫火烛的专利权一直归叫化甲头所独享，直到民国结束，再也没有人敢同丐帮争风。沈方也没有食言，一直把老叫化供养到寿终。

八、岁时节令

黎里人对岁时节令非常重视，每个月都有活动。从正月至十月，每月至少有一句谚语，叙说节令及与节令相配的活动。本节就从每月一句的谚语入手，简单介绍黎里的岁时节令，以及安排在当月的民间习俗。对于几项比较大的节令活动，比如三月里的春台戏、立夏日的野火饭、中元节的祭台会，还有年廿四的送灶与年初五的接路头，在本节后面作为专题介绍。黎里八月半的城隍庙会是异常隆重的，因为已经安排在《杂录篇·俗语数则》的“雨打八月半，一场不好看”一节，这里不再重复。

正月半，出马灯

据《唐书》记载：“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请于玄武楼外燃灯百千供佛，纵都民出观。”正月半出马灯，早在唐代就已经是民间流传的风俗。

正月半出马灯，习称上元节，也叫灯节。黎里的男女老少，多数出动，成为一次群众性的灯会。入夜，上岸、下岸和横街，所有的商店一律开门做夜市，门前张挂出种种纸灯，市河里，画舫游船，

张灯结彩，街道、市河一片通明。街道上，敲锣打鼓，鞭炮阵阵。各式各样的灯笼，拥上街头，排成长长的队伍自发地游行。游行队伍里，自有种种表演，有走马灯，有串龙灯，也有调狮子和甩流星，热闹非凡。

正月半，又是元宵节。各家各户都要用糯米粉做圆形的食品，就叫“元宵”。小的元宵不放馅，大的像汤圆，里面尽是馅。家家吃元宵，是大团圆的象征，或者说是祈盼团圆。

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的宝座，袁的爪牙曾想把“元宵”节改称为“元夜”节，“元夜”是“袁爷”的谐音，黎里人民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坚持“元宵”之称，在黎里人民的心目中，元宵就是“袁消”，注定袁世凯其人不得久长。果然，不出所料，袁世凯的大总统做得还不过瘾，他要登上洪宪皇帝的宝座，结果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仅仅做了83天的皇帝梦，袁氏就消亡了。

正月半，黎里的农村里还有“打田财”和“斗火把”的习俗。

入夜，各村各庄都要打田财，市镇的居民前往参与的不少，观看活动的更多。打田财并不复杂，先用稻草扎在竹杆的一端，两头小中间大，扎成橄榄形，然后直竖在空场上，四面用绳子拉紧。围观者规定只能站在空场四周，大约一丈开外，点燃手中的小百响或者月炮，向柴草把掷去。一次次地掷，一次次地被击中。直到田财燃烧起来，才算成功。田财的火烧得越旺，那么预示今年收成越好。如果燃起熊熊大火，那么今年肯定是个兴旺发达的好年。在大家“打中财神啦，打中财神啦！“的欢呼声中，最终得胜收兵。

打田财是集体活动，斗火把则是农家单独进行。预先扎好草把，天黑了，开始点燃草把，在自家的田埂上，晃动火把，奔走欢呼。欢呼的内容主要有:“三石一亩吾家来！”“我家田里全是旺稻”。偶尔也有人喊出这样的内容，“我家田里全是旺稻，人家田里全是稗草”，这样的呼喊似乎不大中听，太过自私。不过大家嘻嘻哈哈的乐，

大多不会去认真理会。火把快烧到尾部时，就丢在春坂田里。农村家家户户都斗火把，每家派出还不止一人，因此远远望去，黑暗的田野里，火把一团团，一簇簇，移动着，翻滚着，有时好几家的火把连接起来宛如一条条长龙，蜿蜒曲折地游动着，伸缩着，煞是好看。远在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刀耕火种，燃烧枯禾，为的是烧除各种杂草，消灭田间虫害，争取农业有个好收成。斗火把看来是先民农耕的遗风吧。

二月二，撑腰糕；二月二，放鹞子

二月初二，黎里家家户户都要做年糕，俗称“撑腰糕”。也叫牛舌头糕，一种长圆形的糕，不用馅子，加糖放在油里煎熟。据说，吃了撑腰糕，全年可以解除腰痛。那时的劳动人民，一年到头辛勤劳作，腰酸背痛的事时有发生，解除腰酸背痛当是他们的祈求。

黎里还有二月二放鹞子的说法。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黎里民众不管年老年少，自会饶有兴趣地自制各式各样的鹞子，到空旷的场地上去放飞。百脚鹞、蝴蝶鹞、月亮鹞、加官鹞，最简单的瓦片鹞。心巧的人还在鹞子上装上鹞琴，随风发出动听的音乐声。有时，还会自发地举行比赛呢。

三月三，野菜开花结牡丹

三月份，正是野菜（黎里人说的野菜，其实就是荠菜）和牡丹开花的时节。黎里人在三月初三日，有插野菜花的习俗。这一习俗大多是为缅怀祖先而立，妇女们在头上插上洁白细小的野菜花，丧偶的妇女更是没有一个不插这种花。把野菜与牡丹并提，显然有着祈求富贵的意味。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一年的开初，有的是时

间，一定还会有新的机会。

公历4月5日前后是清明节，农历一般在三月初头，清明前一日是寒食，两节相连。对于寒食，出于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早年带领了一班随从出亡，19年后重耳依靠秦国的力量得以回国，登上王位，世称晋文公。晋文公对追随他的一那帮臣下一一赐禄加爵，唯独介子推不言禄，晋文公也没有给介之推官禄。后来，有人向晋文公说起介子推在出亡期间的功劳，文公顿悟，四处寻访，得知介之推和他母亲隐居在绵山之中。文公亲自带领手下到绵山请子推，可是子推深藏不出。这时手下有人献计，让文公焚山，迫使子推出山。不料就是这个馊极了主意，将子推母子俩烧死在丛林之中。烧山之后，晋文公终于找到了这对母子，在一棵烧得只剩一段主干的大树下相拥而死。文公万分哀痛，下令全国，每年的这一天禁止举火，只能吃冷食，这就是寒食风俗的由来。文公又把子推母子身边的那棵烧焦了的树干取来，做成一双木屐，每每对着足下的木屐哀叹："悲乎，足下！"久而久之，足下衍化为对人的敬称。寒食之风，开始只在晋中推行，至唐朝，在全国已经普遍实行。有唐韩翃《寒食》诗为证："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处于江南的黎里，唐时仅仅是村落，北方的风俗也未必传入。到南宋时期，北人大量南移，带来了好多风俗习惯，内中当有寒食。不过，晚清和民国时期，黎里百姓往往把清明与寒食混为一谈，并没有真正的吃冷食。

清明节，黎里人非常重视，祭祖扫墓、包粽子，还踏青远足。清明节家家祭祖，备菜备酒，点烛焚香，跪拜祖先，俗称过节。菜肴视各家情况当然不尽相同，但粽子必不可少，必须供上桌面。酒过三巡上饭，最后焚化纸锭，祭祖才告结束。黎里约定俗成于清明前后10日扫墓上坟。不过一般说，黎里人习惯于清明节前10日上坟，到祖坟上扫墓，化纸箔长锭，有的备有酒菜，点烛祭供。如果远道

外出，小辈也得去。如果是新坟，死后的第一个清明，往往有人哭祭，直哭得“路上行人欲断魂”。祭祀之后，需要清扫坟墓，培植新土，或者种植松柏，以寄托哀思。清明时节气候温和，结伴漫步，踏青远足，不论老少都是非常好的活动，有益于身心健康。这时黎里的镇郊，异常热闹。

四月四，桃梅李果青如珠

四月里，桃梅李三种果树都已经结果，不过没有成熟，果实呈青绿色，粒大只有珍珠大小。这时，春季播种即将开始，启蒙读物《千家诗》上说得好：“乡村四月闲人少，折了蚕桑又插秧。儿童未解供耕织，亦傍桑阴学种瓜。”

五月五，买条黄鱼过端午

五月初头，农村插秧即将结束，端午节前后，正是黄鱼上市的好时节，家家争买黄鱼尝鲜。

端午节，也称端阳节、当午、重五和中天节。黎里不仅吃黄鱼，还喝掺有少量雄黄的黄酒，雄黄属于中药，有毒，多放了不行。雄黄不仅喝，还要洒在床底下、墙壁角落里等阴湿之处。小孩的肚脐上涂了雄黄，额头上用雄黄写一“王”字，胸前挂上大黄香袋，门楣上挂着菖蒲、艾叶和大蒜，用以祛邪。室内用苍术、白芷、芸香进行烟熏，驱除害虫。家家裹粽子，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甚至有“端午不吃粽，死了没人送”的说法。

黎里人除了吃黄鱼、粽子，喝雄黄酒之外，还吃酒酿饼、芽菱、荸荠、杏子，最好吃的要数麦芽塌饼。

麦芽塌饼的制作自有一套复杂的工序。黎里人早在清明前后，

就把麦芽发好、晒干，并且磨成了细粉，到田野里四出采集两种草药“紫艾头”和“石灰萍”，拣选晒干。麦芽塌饼的馅都是赤豆净沙，配上猪油、桃肉。放入一定的粳米粉，与麦芽粉混合，比例必须适当，这是关键。麦芽粉多了，就软烂甚或做不成饼，少了则显不出小麦芽饼的软糯香甜。把“紫艾头”和“石灰萍”煮熟后，用手搓烂后拌入粉中。做成的麦芽塌饼，先在蒸架里蒸熟，再在饼的两面洒上芝麻，放在平底锅里用菜油煎透，稍稍冷却后浇上一层糖水。鲜美可口，真可谓天下少有的美味，再加上两味草药，还有一定的食疗功用。民国早年，著名画家、诗人、中日混血儿苏曼殊，尝到了柳亚子夫人郑佩宜的麦芽塌饼，一下子吃了15档（30个），至今文人中仍传为笑谈。

别的食物如果发了霉，出了毛，那么只好一扔了之，可是麦芽塌饼不同，用菜油煎一煎，更加的甜腻可口。

六月六，买点馄饨（面条）落一落
六月六，猫狗水中浴

六月初，农村春播已经结束，新麦上市，面粉新鲜，家家有了空闲，黎里百姓午餐大多吃馄饨和面条，因此传有“六月六，买点馄饨（面条）落一落”的民谚。

农历六月六，叫天贶节。这时正值盛夏，高温干燥，日光强烈。黎里有句民谚：“六月六，晒到鸭蛋熟。”俗称六月六是猫狗生日，黎里人习惯上要将猫狗放到水中洗浴，很简单，把猫狗抛入水中，看着这些爱物在水中挣扎、扑腾，再游上岸来，耸身抖掉水珠，也算是乐事一桩。

黎里文化积淀深厚，读书人众多，藏书比较多的人家，这天都要拿出书籍来，曝晒一通。

七月七，买个西瓜切一切

七月七，西瓜正当令，家家户户买西瓜，降温消暑。

这一天，黎里妇女有乞巧的风俗，中午时分，拿出一个面盆，盛水照着太阳，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一根针放进面盆，要让铁针浮在水面上。再看水底的针影，如果成云龙状、花草形，那么就是得巧，如果形状像椎如轴，那么就为拙。晚上，在庭院中陈列瓜果，妇女们观看流星，向织女乞巧。

7月半是中元节，也称鬼节。且听黎里谚语："甜馒头，苦粽子"。因为中元节到来，田间劳作基本结束，农家进入空闲阶段，这里的农民大多有时间做馒头和发糕，作为节日食品和祭祀供品。因此，中元节吃了馒头，田里活儿一日轻似一日，而清明节吃粽子，田间操劳一日重于一日。

中元节，黎里民众要祭祖，一般是提前一二天，家家户户备酒菜、水果、糕点，供奉祖先，再化黄纸、锡箔。

阴历7月30日，传说是地藏菩萨生日，黎里的妇女都要到镇东头的地藏殿拜佛烧香，自早到晚焚香点烛的人络绎不绝，入夜，寺内灯烛辉煌，更加热闹。一些老年妇女焚香点烛后虔诚地坐殿内蒲团上诵经念佛。

晚上，家家户户在自家门前点上蜡烛，石阶上、门槛边、道路旁乃至河埠头都插上红色蔑竹柄的地藏香，少则数十根，多则几百根。

黎里传说，点地藏香是为了纪念张士诚。张士诚，沙洲（现在的张家港市）人，字九四，也作久思。元朝至正13年（公元1353）起兵反元，次年称吴王，元至正16年定都平江（苏州），17年秋，朱元璋的名将常遇春攻打张士诚，平江被攻破，张士诚被俘，在押

解南京途中绝食而死。张士诚在吴中称王时，广泛延揽人才，施行惠政，颇得民心。平江攻破之日，正好7月30，老百姓怀念士诚的仁政，哀悼他的死亡。于是，人们在那天晚上明为点地藏香，暗中称为“狗屎香”、“九四香”，是为了掩人耳目，免遭执政当局猜忌，一直沿习至今。

八月八，买些红菱剥一剥

八月初，红菱上市。一种叫红边早的菱，个儿较大，早熟上市，清凉爽口，鲜嫩又有香感，还有中秋菱，也是鲜嫩可口，特别糯净。黎里民众非常爱吃。

八月半的黎里，镇西城隍菩萨出会，金镜湖上盛况空前，详细可参见《杂录篇·俗语数则》中的“雨打八月半，一场不好看”。

九月九，糯米饭烧来韧绉绉

九月九重阳节，新糯米上市，黎里老百姓有烧糯米饭的习惯。老人们此日吃重阳糕，登高祈求长寿。黎里八景之一“中立晚眺”，在镇东头，明清两代镇上最高的建筑，每当重阳，老人们都爱到中立阁去走一走，登高望远，黎里镇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天高气爽的日子里，真令人心旷神怡。黎里也有走桥的风俗，男女老少在这天都要走桥，走三桥、二桥和一桥都行，说走了桥，就可以消解身体上的病痛。

十月十，十个姑娘上苏州

黎里距离苏州古城，只有85华里，称为脚边路。姑苏城里风

光独好，苏州的服装特佳，领周边各乡镇的潮流。黎里的姑娘们有上苏州的习俗，她们有的买衣服，有的办嫁妆，有的走亲戚，尤其是好年成，丰收在望，更是喜气洋洋。

十一月里有冬至节，黎里好几句俗语："冬至大如年"，"有嘛冬至夜，吠嘛冻一夜"。前句说过冬至节比岁末祭祀来得重要，冬至夜是一年中夜最长的一天，冬至进行祭祀，那么祖先可以从容度过冬至夜，如冬至不祭祖，在这漫漫长夜里，祖先只能挨饿受冻。所以黎里对冬至节非常重视，祭祀时间都在傍晚，祭酒不用黄酒，改用冬酿酒，这天黎里民众大多饮冬酿酒。立冬起九，黎里谚语有云："一九二九，吃饭相手；三九四九，冰上可走；五九六九，偎在灶口；七九八九，穷人脱苦头；等到九九，犁耙齐出手。"

十二月廿四，俗称年廿四。这一天，黎里称为小年夜，而苏州其他地方的小年夜则是除夕的前一天。

黎里在小年夜前的二三天，家家都要搞一次卫生，俗称"掸檐尘"，以求干干净净过个年。小年夜那天家家都用糯米、粳米混合粉作皮，用赤豆沙、黄豆粉、猪肉、罗卜丝、野菜等作馅，做团子吃。有的人家加做一个大团子，比平常团子大三四倍，专为敬奉父母长辈的。也做一些小团子，比平常团子小一半，用来祭祀祖先。黎里有的人家，还做年糕，有白糖年糕和红糖年糕二种。

再将黎里岁时节令中比较重大的活动，在下面叙述一下。

春台戏

三月份，江南农村盛行春台戏，黎里特盛。

春台戏又叫"草台戏"，一种文娱活动，在电视问世的时候，农村生活是异常单调乏味的。三月份又是夏收夏种大忙之前，正好忙里偷闲，娱乐一下。

黎里的春台戏，一般是演出京剧，群众称为大戏，地方戏像越剧之类称为小戏。较大的台脚（关于台脚，请参阅本书《杂录篇·俗语数则》中的“一塔廿五坊”一节）总要演出三天。华字村，是较有名的大台脚，每年邀请有名的戏班子来做三天戏。台脚小的可以二天，不过多数为了地方上的面子，总以演三天为多。

说起来，春台戏是为了娱神，为了让神仙保佑一方平安丰收。其实说到底，娱神是为了娱人。拿黎里老古话来说就是“做戏无法，请个菩萨”。演出与迎神相结合，现坊（轮到主持演出的村庄）村子演戏，除了请当坊的神灵外，还要请几尊邻村的菩萨叙一叙，共享人间烟火。

戏班子是隔年就定好了的。民国年间，黎里镇东市汝家桥南堍的阳春轩茶馆，专门承接订演京剧的业务，经办人叫“排话”，老板胡银官。这家茶馆的店堂里、墙壁上，挂满了写有水粉笔的黑板，上面是种种戏文的名称和定戏的村窝，还有演出日期等等。农民都把演春台戏当作一件大事情。定戏都由村上的头面人物主持，主持人称为“大阿爹”。冬季农闲，选定一个黄道吉日，由大阿爹带领一批年轻力壮的水手，摇着快船，旗帜飘扬，锣鼓喧天地到阳春轩茶馆订戏，签订演出合同。

点戏颇有讲究，必须老生、小生、大面、短考、长枪、花旦，各个角色都点到，每场戏，也就是一个下午每个角色都须得上场，否则有的戏子就会不高兴，甚至掼纱帽。

每副戏班子都有自己一个乌篷船船队，黎里人习惯上叫作“绍兴船”，大的七八条，小的三四条，没有机器开动，全靠人力。那时的戏班子都很守信用，不管前后演出的台脚相隔多远，甚至百余里开外，必定如期赶到，从不误期。

春台戏的演出场地，都在现坊村预先留下的春花田里。戏台用门板、柱脚临时搭起来。台一般是“凸”字形的，有前台、后台和

两只耳朵三个部分。台顶镶嵌横匾，匾上写着“风调雨顺”等字样，有的在字当中还要画一个太极图什么的，台前两边角柱上，挂一副应景楹联，台搭得很高，底下可以走人，老远地方就可以望见戏台。

戏台的对联和匾额一般不得请人代写，一定要本村本坊自己撰写，春台戏也是显示人才的水平的地方。写得好不好，水平高不高，自有众人嘴里出。黎里的戏台上的对联，有几副撰写得实在有水平，至今依然活在人们口头。日本鬼子投降后的那年，有一联令人过目不忘：

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举国若狂，群狂群狂群群狂。

横匾额：预庆年丰。

还有一副也水平也不弱：

是真是假上下几百年原来如是；就近就远东西三千里尽在其中。

戏台对面搭有老爷棚，就是请来的当坊神灵和邻村菩萨，远远的面向舞台，老爷棚前面备有烛台架和拜坛，供人祭祀膜拜。演出往往要等“老爷棚”里点放几个炮仗，叫“追开场”，于是，戏台上开始“闹场”。

戏台前面的左右两侧，现坊的村民搭起临时看台，考究些的用门板铺底，稻草盖顶，放上一些长凳，供观众入座，每条凳子有时也酌收几个小钱。台前大片的空地，是大多数观众站立的地方，这是最热闹的地带。

春台戏的戏文，以武打最受欢迎，《三本铁公鸡》和《四杰村》等等，其次是做功戏和诙谐戏，《徐策跑城》、《打鼓骂曹》、《三岔口》、《拾黄金》、《小放牛》和《丑表功》都是，再次是唱功戏《失、空、斩》和《玉堂春》等等。

春台戏一般分四场：开场、早台、正本、送客，每场二出，所以老古话有“神戏八出”之说。开场前有闹场，约20分钟，锣鼓频敲，声震远近，引得四面八方的看戏人闻声纷纷前来。

开场有大、小之分。一般演出三台的台脚，头天必以跳加官的天官赐福大开场，即全体戏子化妆成形态各异的天神天将，以赐福凡间，打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条幅，再配以简短的表演。这主要是为显示班子的阵容，因而黎里人称为“晾行头”。小开场，由福禄寿三星，表演祝人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等。大开场也好，小开场也好，开演前，都以赐福民间的“福星”，戴上面具，由加官锣鼓伴舞，手捧“天书”边舞边向观众翻出“安居乐业、人寿年丰、洪福齐天”等祝颂语。这个动手勿开口的“大面”是吉祥的象征，是福星。因此，黎里有些富户、绅士，或为喜添贵子，或为老人祝寿，或为发利市，他们特意向台上送去红封筒，要求专门为他们加跳一个加官。

早台是开锣戏，演出后稍事休息。正本是当天的主戏，送客戏是正本结束后加演的戏，因为是在乡下，又是晚上，路远的观众，需要早一点返回，所以最后二出往往开始散场，这就算送客戏了。

前往看戏，步行的当然很多，镇上的油坊、米行、酱园等商号老板，他们自己有船，开了船办了酒水果品，优载游哉。

一年一度的春台戏，为看戏人服务的设施不少。

一是“长摆渡”，就是专门为赶戏场服务的临时航船，坐满了人就开。

二是赶戏场为看戏人服务的，各行各业都有。最多的是茶棚、酒摊，供人歇足，喝酒喝茶。海棠糕、粉条子（粗粉丝发开后，用肺头汤烧煮的小吃）、油煎豆腐干、梨膏糖等等。各种小工艺品也来轧闹猛，泥塑、纸扎、竹制小件，小胡琴、短笛、吹叫子、竹龙、小篮、纸风车、小灯笼等等。还有打拳头，卖膏药，变戏法，摸彩头，套泥娃娃，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当然也有赌博。戏场上人多复杂，有人设立赌台，聚众赌博，大多设下圈套，出老千，骗人铜钿。晚清一年的3月13，黎里华字村

演出春台戏，有一帮太湖强盗，四处看戏轧闹猛，到处赌博，结果赌输了铜钱，开码头到黎里。正好是华字村演戏的最后一天，街上人少，防备松懈。这帮强盗窜到镇上大肆抢劫，一时弄得商店打烊，人心惶惶，被抢最多的是东西二片典当，贵重金银饰品抢劫一空。强盗的流弹打死了一名正在天主堂门前卖淘箩的妇女。黎里后来流传着一则顺口溜，姑且记在下面："三月十三，华字末台（春台戏最后一台）光蛋（土匪）到来，黎里倒霉。"顺口溜可知此事在民众心中的影响。

戏场上不但有赌博，而且还有抢亲风波。经常发生这样的场面，一个男子拖着一个姑娘，快步狂奔，四周有人一边放鞭炮，一边护卫开道，不远的河边一条船正等在那里。

这种抢亲，与古时候的"掠夺婚"，应当说大有区别。掠夺婚始于原始社会的大多数部落，男子抢夺其他部落的女子作为自己的妻子。而黎里的抢亲，大多源于经济原因。过去男女还在孩童时期就要早早订亲，可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时，男方却无力承担结婚费用。这时，多数的男女双方尊亲暗中商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男方将新娘抢到家中，婚姻就算定局，一切排场开销就全免了。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左邻右舍也都心照不宣。

再有就是女方父母索要财礼而引发抢亲的。这事并不发生在黎里，但因为它有趣，也典型，记录在清代《点石斋画报》上，现在引录出来供读者一哂。

那是抢亲中的一则笑话，叫"妇负新郎"。清代末年，苏州郊区有一对男女，早就订亲，那村姑内心一直期盼新郎前来迎娶，可是由于女方父母索要过多的财礼，女儿的佳期一再拖延，无奈之中，男方决定趁看春台戏之际抢亲。到了那天，村姑主动配合。抢亲有规矩，一是，新娘不能跑到男家，应当乘船或乘轿，二是，即使女家都同意，也必得虚张声势，假意追赶。可是那天，新郎没有船也没

抢亲·妇负新郎 录自《点石斋画报》



有轿子，只来了几个人，新娘只得伏在新郎背上迅速逃离。新郎身材矮小，新娘倒人高马大，没多久新郎官就气喘吁吁，体力不支了。眼看女方父母就要追上了，突然新娘和新郎换了个个，新娘背起新郎官朝新郎家狂奔起来。这种见所未见的新娘背新郎的场面，旁观者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忍俊不禁。笑得新娘父母满面羞惭，只得灰溜溜地停止了脚步。

还有双方青年自由恋爱，可是遭到女方长辈反对，反对的理由大多也是门第与经济。恋人双方悄悄约定，以抢代抗，免遭私奔之嫌。对此，周围的群众大多抱着同情之心。

抢亲，封建时代十分盛行，直至民国，仍然存在。今天审视起来，看到的该是“经济”二字。男方抢亲，源于贫穷；女方索要财礼，也仍然脱不了贫穷。

三台戏，经济花费非常可观，戏钱倒是有限，就是现坊施主家留客吃饭和其他经费不能轻看。有的人家老亲多，甚至还有些难以说得清的缠勿亲，一顿饭，吃吃两三桌，四五桌也是常见的事，他们早早来到，吃了中午再吃晚饭。因此轮到演出春台戏，家里预先得准备好鱼肉荤腥，还得准备几甏老酒。那时还有“带吃饭”的陋习，一个人可以带上一帮人去亲戚朋友家中吃饭喝酒。有时本身的亲戚不多，可就是带吃戏饭的人倒多。

因此，黎里有“富的出风头，穷的当当头（到当铺里去当东西）”的俗谚。三天时间的热闹，有多少人家为了争面子而暗吃苦头。富裕人家来说，可能吃点喝点无所谓。可是那些清贫之家，实在难言个中的苦恼。风俗如此，只得强颜欢笑，硬撑场面，到时别无他法，只好跑典当了。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田板角落做啥个戏，搭台搭勒自宅基。囡囡女婿全载到，远房亲戚来仔勿勿少。呒没铜钿买东西，床上拿条旧单被。一跑跑到典当里，几只铜板一肚皮的气。只好买点白菜豆腐衣，个种年成做啥个戏。”

野火饭

五月初五或者初六，是立夏日，那是黎里儿童们特别愉快的节日。在这一天，用大号杆秤称人，说称量之后可以不患“疰夏”，现在看来那是一年一度的体格检查。这一天，不仅能吃到前文说的种种食品，特别令孩子们兴奋的是烧野火饭。

野火饭其实是蚕豆饭。立夏时节，时鲜的蚕豆刚刚上市。一大清早，小伙伴们三五成群，结伴去附近农村，田角、地头、路边，采摘嫩蚕豆，农民是不会指责的，民情民风如此。当然采摘的蚕头数量不会太多，大多一碗豆子也就可以了。有了蚕豆，伙伴们再分工合作，有的去“派”（不叫讨）糯米，拿着淘米箩，一家一家地派，

跑他十来家，总能积到二三斤，也就够了。有的去派油，有的去派盐，有的向肉店里派一点猪油，最好再派一点咸肉什么的。还有铁锅、铲刀、碗筷之类，也都分人去一一派来。

烧野火饭，那是最高兴的事。先寻觅一块空地，挖一个半尺来深的坑，上面用砖头石块搭砌成一个烧饭的行灶。烧柴由大家分头拾野柴，树枝、枝叶、木片、竹头、笋壳等等。一个个轮流烧火，烧熟后再焖一焖。俗语说“千烧不及一焖”，最难熬的就是这一焖，小伙伴个个都像花果山上下来的小猴子，抓耳挠腮的，垂涎欲滴哪。亲自动手做的野火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每人一碗，三下五除二就碗底朝天了。即使烧成了夹生饭，照样吃得有滋有味，锅底朝天。

立夏野火饭，在于一个野字。豆、米、油、柴、盐都必须是野的，而且要的是“百家”，也就是越是多派人家越是好。据老一辈传下来，小孩立夏日吃了百家饭，可以百病不生。因为是老规矩，所有的，包括肉店的伙计老板，都笑脸相迎，不作兴让孩子们空手而返。只有蚕豆例外，可以叫“偷”。镇郊多的是蚕豆，青绿油油粒粒饱满。就是撞上蚕豆的主人，也不会心虚，主人也决不会呵斥制止。

野火饭，孩子们一次有益的锻炼，好一种良俗。

祭台会

中元节，黎里镇上也有庙会一类的活动。镇东的土地庙和镇西城隍庙，两家都要雇佣大小船只举行“祭台会”。传说明朝朱元璋少年时别母离家，浪迹江湖。母亲盼元璋回家，后来出门寻访而病死他乡。朱元璋登基后怀念母亲，遍访无着，知道母亲已经离开人世，由母亲元璋又想到其他流落异乡的可怜人，就着地方官员在中元节那天对所有荒坟祭扫吊唁，以告慰那些幽魂。

黎里中元节的祭台会，规模不小。两个庙各出动大船一艘，小

船二条。小船上坐着金鼓手、衙役和开道人。大船装饰华丽，搭彩绸棚，挂红流苏，船艄悬挂的旗上书有“里域明王奉旨祭扫”，舱内陈设豪华，在黄缎蟠龙金绣当中，镇东船上供土地神像，镇西船上供城隍像，佛像前红烛高烧，香烟缭绕，门子、内班侍役两边伺候。起碇先鸣锣，再吹锁呐，打击，铜鼓，开道船上吆喝声一阵又一阵。直驶到镇郊的乱坟冈子靠岸，小船先到，各役人等早已站立两旁，佛像在乐曲声中抬至船头棚，面向荒坟，有门子司仪手捧疏牒高声朗诵，词意不外是“奉旨祭扫，尔等游魂”等。接下来城隍或者土地菩萨祭拜仪式，由司仪高唱：

“洗手！”随从人员用毛巾在佛像手上轻擦一下；“掸须！”小木梳在佛像须上略梳一下。还有“照镜”、“正冠”、“下香”等，最后是“叩首”，随从将佛像向前略一低头就算叩了首。

总共上香三次，叩首九次，然后焚化纸钱，鸣锣带队返回庙中。

有趣的是，城隍菩萨还要与土地菩萨会话，也都是随从一问一答，无非是互相赞颂对方，什么四境安康，田蚕丰登，六畜兴旺等等，最后说什么等待中秋出巡再会云云。

船上坐着的都是商贾，富绅，觥筹交错，大吃大喝一通。

与立夏日的野火饭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是迷信，一种恶俗，民国过后已经消亡。

接路头

黎里的风俗，年廿四要送灶，年初五接路头。

黎里不管是乡村还是市镇，每家的灶头上都供有灶君(灶神)和路头菩萨，路头往往不止一个，老百姓都说路头菩萨有五路，因此有五路财神的说法。在年底前，黎里人都要送灶君和路头菩萨上天，俗称“送灶”或者叫“辞灶”。黎里民众焚化路头菩萨，还留有一手。

因为路头菩萨有灵，近悦远来，财帛进门，因此每家都要留一个主财神，继续在家中顶礼膜拜。黎里人认为送灶最迟不得过年廿四，有这样一句俗语，“热晕颠倒，廿五送灶”，在年廿五焚化灶君和财神，那就有点离谱了。送灶时，将灶君和路头从山上请到正屋桌上，备有豆制品、干鲜果品、糕点团子、麦芽糖，点燃香烛祭供，酒过三巡，把稻草扎成的三脚草帚，锡箔摺成的元宝，纸糊成的坐轿，连同灶君和路头像一起焚化，滑稽的是，黎里百姓怕灶君到天上向玉皇大帝说人间的坏话，竟然别出心裁，专门用麦芽糖抹在灶君嘴上，让他甜一甜，据说这样灶君就会“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老百姓也真够幽默的。

宋代苏州诗人范成大专门留下了一曲《祭灶词》，“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酱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角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黎里送灶君和路头还要化元宝和纸轿，没有纸轿，就折几枝马尾松，让灶君和路头骑马上天，一边焚化一边还要叨念：“一蓬青松一蓬烟，恭送路头（灶君）上青天。”祈求发财的心理驱遣着黎里对路头竭诚膜拜，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如此。连妓女都要路头保佑烧财香。

接路头在黎里是一件最为隆重的大事。年初四清早，街巷之间就有许多挑着水桶的渔民，“元宝鱼呃……”一声吆喝，引来百家争买，特别是商店，家家必买。渔民从水桶里抓出鲜蹦活跳的鲤鱼，熟练地用红丝绳穿进背鳍，一手提着，另一手给贴上一张红纸，嘴里高喊：“送元宝啦！”为了吉祥如意，为了讨口彩，买家从不还价，相反情愿多发利市，加付一点脚步钿。有人别出心裁，用活鲤鱼祭路头菩萨，祭供后送到放生池去放生，讨取“鲤鱼跳龙门”的口彩。接路头据说用羊头更好，因为羊与银洋、洋钿的洋谐音，鲤鱼谐利，都

是讨吉祥发财的意思。黎里很少养羊，大多用猪头代替羊头。供品还有路头鸡，也叫元宝鸡，囫囵烧的，加上各种果品和黄酒白酒。

黎里的商家为靠路头而财源滚滚，所以接路头是商家一年之中的第一件大事。大凡店家年廿四送过路头之后，差不多就虚应市面或关门大吉。初一到初四不开门，要到吃过路头酒之后再开张营业。黎里的接路头，从初四黄昏开始直到初五清晨结束，爆竹鞭炮整夜不息，热闹赛过除夕之夜。

黎里西半镇庙桥南堍有座财神庙，民众习称路头堂。初四那天，各商家经过聚议，由“行老”确定路头出会的行进路线。或者自镇西向镇东游行，或者先东后西行进。为了抢路头，常常争得面红耳赤。记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路头菩萨出会，由庙祝阿金敲着大铜锣领班，引着整套锣鼓家什开道，四名轿板老爷抬着一座赤膊大轿，轿中端坐着财神菩萨，轿后跟一辆手推车，车上有两栲栳的元宝（锡箔摺成），吭——吭——吭——汤汤且汤且汤吭，汤汤且汤且汤吭。每到一爿商店门前，阿金让停止敲打，面对老板高唱：“财神老爷驾到——”响亮的声音传遍整个店堂，老板伙计，男女老少一个个笑脸相迎。“财神老爷送元宝来啦！”阿金又是一声高唱，快步上前，把铜锣锣面朝下，“吭”的一声按在柜台上。老板马上捧出一个红封筒，里面少则银洋4枚，多则12枚，一边往铜锣里放，一边满面春风的说：“谢谢财神爷送来元宝！”这时店堂里的伙计全体出动，“啪，啪，”高升不断；劈劈啪啪，鞭炮齐鸣；哧一哧一哧一花筒乱飞。老板带领店员抱着五路财神，围绕路头菩萨的大轿，恭恭敬敬地转上一圈，兴高采烈地把财神菩萨接进店堂，端端正正地请上供桌。接着还有一个节目，就是“调元宝”。老板拿出一栲栳元宝化给财神老爷，化时留下一个，到后面的手推车上向财神老爷调换一只元宝回店堂，调换的时候也需要送红封筒一个，两个红封筒都由紧跟领班的小金生收进褡裢袋中。一夜下来，可得五六百枚银元。

一处接财神仪式完毕，领班阿金带领人马吱——吱——吱——汤汤且汤且汤吱——，又上路了。黎里两条三里长街再加横街，每一爿商店行号都要逗留完成接财神仪式，沿途弄头巷尾的寻常百姓也都出来凑热闹，围绕财神大轿一迭连声的“接财神”。不知何年何月，也不知何方光棍，忽发奇想，说如果“惹毛”了财神菩萨，即惹财神发火。财神手里没有别的东西，他就会拿金元宝掷人，那么惹毛路头的人就会发大财了。于是，有的人请路头时用手扯着财神爷的长袍，请他一起回家，有的手拉财神的纱帽耳朵，有的抚弄财神的面孔或胡须，顶顶令人捧腹的要数民国36年的那一桩怪事了。

那年有个叫倒头矮五的油头光棍，嗜赌如命，每赌必输，孤身一人，家徒四壁。这年冬天，倒头矮五输得分文全无，穷极无奈，急得发蹦。正好路头菩萨出会，倒头矮五紧跟在大轿后面，大轿来到同仁烟纸店门前，锣鼓家什刚停，老板出来相迎。递过红封筒，冷不防倒头矮从斜刺里窜出来，伸手一抓，把财神爷的胡子拔了一大把，往袖口里一塞，马上溜之大吉。第二天，听人说倒头矮五昨天大发利市，赌博时连押连配，坐庄连台，着实赢了一大笔。同仁老板听了大光其火，说倒头矮五抢了他家的仙水，冲了同仁的财气。初五晚上，老板命人把倒头矮五押到店堂，开出三个条赋：一，给同仁店堂的财神爷磕三个响头；二，把财神爷的胡子尽数拿出来，供在财神爷的供桌前；三，赢来的钱得呕出来。光棍不吃眼前亏，三个响头倒头矮五碰得乓乓响，财神的胡子恭恭敬敬的捧上供桌，可是第三个条件，却死也不肯照办，逼急了大有拼掉一个够本，拼掉一双赚一个的架势，同仁老板也只得作罢。

旧时商店初四夜里接过路头，初五早晨就正式开张营业。第一位走进店堂的主顾，老板和伙计必定小心侍候，务必作成生意，以示开张大吉。初五傍晚，商店老板要举办路头酒，请全体伙计，这是商店伙计们最最担惊受怕的时刻，照老规矩，职工的留用或解雇

都在吃路头酒的席上决定。如果被回掉生意，那么最多给一个月薪水，留一宿三餐之后，必须“吃百叶卷”，卷铺盖回家。

黎里荣和烟纸店有个伙计叫徐生祥，20岁开始就为荣和店“跑街”（探听市价并推销货物），手脚勤快，健步如飞，整箱整箱的香烛掮在徐生祥肩膀上可以打挺，真是一个抵四手的好角色。民国34年，徐生祥63岁了，年老力衰，又得了气喘病，老板有意辞退他了。那天初四夜接来了路头，老板带头向财神唱了个喏，然后招呼“阿大”（相当于经理）唱喏，又叫“阿二”（相当于协理）唱喏，接着又让朋友们一个个都唱了喏。唯独不请徐生祥，老徐预感不妙，但想到自己为荣和店赤心忠良，辛劳40多年，使荣和从一爿小铺发展到颇具规模的大店，更何况而今的老板还是自己看着他长大的，想来老板不会过份吧。年初五请吃路头酒，老板避而不见。老徐内心不托底，看着酒杯发呆，酒过三巡，“阿大先生”向老徐拱拱手，开口道：“老徐师傅，请到别处去发财吧！”说完拿出一个红封筒来，放在老徐面前，又说：“老板看你在店多年的份上，托我把这个给你。”老徐知道，自己犹如风中残烛，烧完了灯芯熬完了油，店里已经容不得他了，求也无用，因此一言不发，默默地点了点头，又暗暗的摇了摇头。第二天一早，老徐把铺盖和一个藤箱拿到店堂里，照老规矩当众“亮相”，抖开皮褥，整理藤箱里的衣裳，然后再捆扎停当，拎起藤箱，背起铺盖，咳嗽着，佝偻着双肩蹒跚地离去。

老徐膝下没有儿女，只有一位年龄相仿的老伴，老徐失业后靠老伴替人汰衣裳寻几个小钱换点粥吃。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忍饥挨饿，忧忧急急，不到一年，两位老人相继去世。

送路头、接路头及回头生意，已经成为历史，不过年初五吃路头酒的习俗保存至今。每年正月初五的傍晚，黎里整个乡镇，不管能喝的还是不能喝的，都要端起酒杯喝它几盅，这顿酒就是“路头酒”。

第五章　杂录篇



本章一共三节，分别介绍了黎里专有的俗语、独特的对联和地名传说。

黎里专门的俗语，很多，除了下文重点介绍的几个，还有不少。比如黎里人说到距离长，或者走的路多，往往会说“从城隍庙到八角亭”。城隍庙，现在称为禊湖道院，八角亭正式的名字叫中立阁。二者相距1500多米，三华里左右。晚清至民国年间，黎里有“九当十三车”，九当，指九爿典当；十三车，13个榨油的作坊。九当十三车，常常用来形容人事的闹猛或者事物的繁多。本章第一节《俗语数则》，介绍了10多条俗语，都是黎里独有的。

黎里毕竟是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古镇，文人墨客众多，对对子是每个读书人必须熟练掌握的技巧，从蒙童开始，就二言、三言对至五言、七言，由此大量对联中，对得巧对得妙的联语着实不少。据说，邻镇芦墟的文人出了一个上联，“梧桐横架杨柳枝”，拿到黎里来，请黎里的文人作对，黎里人以“汾湖浪激泗洲滩”相对，将芦墟的汾湖、泗洲滩二大名胜做进了对子。也有人说，这个对子是由柳亚子先生对出来的。本章第二节，介绍的“东西典当”一联，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上联：“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有人对以“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认为对得工整。其实，对得并不工，因为上联的最后一个“东西”，变了词性，而下联的“南北”没有改变词性。黎里的上联“东典当、西典当，东西典当东西”，比“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要难对得多。诸如“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之类的下联就对不上。

还有黎里的地名好多同传说有关，本章第三节有所介绍。

一、俗语数则

黎里民众长期以来，创造出了不俗语。带着浓重的生活气息，富含黎里特定的地方色彩，大多同黎里的行业、人物、事件、建筑、地域、风俗习惯等等密切相关，而且颇具故事性。试举几例如下：

忧啊忧，八角亭上只葫芦，看你奈何抹油

忧也勿要忧，八角亭上只葫芦，照样抹油

黎里八角亭本名中立阁，建造在镇东头的小官荡中，仅有一座梁式石桥与北岸相连，此桥名宛转桥，那曲折通幽的妙处当不难想见。史书记载，中立阁始建于乾隆9年（1744年），同治8年（1869年）重建。

不过在黎里的民间传说中，八角亭的建造则要早得多。明朝朱元璋曾经派丞相刘伯温前来黎里相过风水。黎里市河很像一条龙，风水特别好，文气特别盛，恐怕要出大亨，甚至冒一个真命天子出来，与朱元璋争夺帝位，于是建八角亭镇住龙头，使龙无法扬威。亭高三层，明清两代，八角亭不仅是黎里的标志性工程，而且还是黎里的最高建筑，黎里民众，常常登高游览，尤其是重阳佳节，游人更是络绎不绝。“中立晚眺”，历来是黎川八景之一。向西望去，这



黎川八景·中立晚眺

里是黎里三里长街的起点，小桥流水，参差上万人家，鳞次栉比的市廛，来来往往的农船商舟，一派繁华。假如在冬天，向东眺望，可以望见黎川八景的另一景“揽桥残雪”。南向而望，那是附近的荡上村及浙江的河荡、农舍和稻苗。北向而望，那是地藏殿和牛王殿，红墙黄瓦连成一片，还有几座石牌坊，高高耸立，那是为镇上的几位百岁老寿星特建的。小官荡中，水鸟翔集，帆樯片片。要是夏天，还可以看到黎里的水中健儿悠游自如的雄姿，更令人称绝的是，荡上村的牧童们，驱牛入水，站立于牛背上，稳稳当当的，还唱着牧歌，吹着短笛呢。

八角亭上竖有一个铜锡合金的葫芦，高一丈二尺，那是很难爬上去的，因此老百姓就编造了“忧啊忧，八角亭上只葫芦，看你奈何抹油”的俗语。事实上，为了保护好这一风水，使“中立晚眺”一景代代传承，每隔几年，都会有专门的工匠上去，抹上一层桐油。因

此黎里人又有了“忧啊勿要忧，八角亭上只葫芦，照样抹油”一句俗语。

浒泾弄里摇船，勿推扳

现在镇上的浒泾路，原先是一条小河，一条箭径，只容得一条农船通过，实在太狭小了，在浒泾弄里，别说两船交会，就连推艄扳艄也是用不到的。于是黎里人就创造了“浒泾弄里摇船——勿推扳”一句歇后语。勿推扳，在黎里俗语中，形容不差，不错。

鹤脚扇屋脊高，十个姑娘九个俏

鹤脚扇地处后长荡大平荡畔，黎川八景有“鹤渚渔歌”一景。大平荡是渔民聚居之处，鹤脚扇一带的百姓购买鱼虾等水产既便利又便宜，所以常吃水产品。年年月月，世世代代，长此以往，由于营

黎川八景·鹤渚渔歌



养丰富，这里的民众身体大多比较健康，尤其是姑娘们，细皮白肉，长得特别水灵。小伙子都以娶得鹤脚扇的姑娘为荣。喜鹊总将高枝攀，鹤脚扇的姑娘多数嫁得好儿郎，门第自然而高。由此，不难理解“屋脊高”与“姑娘俏”之间的内在联系。

龌里龌龊道南桥

像道南桥介龌里龌龊

龌龊得赛过道南桥

道南桥处在黎里镇南港，明清时期开设了不少油车，黎里有“九当十三车”的说法，当指典当，车就指油车。榨油需要牛力，于是各家油车饲养了不少的牛。南港是油车比较集中的地方，道南桥就在南港靠街道一侧，每天放牛草总要路过此桥，牛有一种习性，上桥特别紧张，而紧张又特别容易撒粪。因为清扫不及时，日积月累，臭气熏天，行人怨声载道，所以就有了“龌里龌龊道南桥”之说，后来凡是看到肮脏的地方，黎里民众往往诙谐地打比方说“像道南桥



道南桥

介龌龊”、“龌龊得赛过道南桥”。

厚脂纳德梅兰桥

像梅兰桥介厚脂纳德

脸皮厚得赛过座梅兰桥

关于梅兰桥的“厚脂纳德”，详见本书古桥一节。

七粒米八担水，跳个后长荡进去了

平望镇有个莺脰湖，平望的民众，形容烧的粥稀薄，往往会就地取材，进行夸张式比喻，“七粒米八担水，跳个莺脰湖进去了”。现在，由于建设性的破坏与蚕食，莺脰湖的面积越来越小，人们已经难以领略那浩瀚的水景了。同样，黎里的民众也有这么一种夸张和比喻，不过跳进的是黎里镇北的后长荡。这句老话，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贫穷，艰难，下层人民所烧的稀粥往往稀薄得照得出人的影子。

火烧马张店，迟早要归天

（明清两代，黎里特产迷信品纸马，俗称马张。马张专供斋祭焚化，所以有此一说。）

歪马张（马张作坊常常有次品出现，纸马上的神像印得面目歪斜，黎里人用歪马张一语来形容某些人行为不端，不走正道。）

面孔吃得像马张（马张上的神像大多面孔绯红，黎里人用来形容那些常常喝得如泥烂醉的人。）

三句俗语都同黎里镇明清两代“搨马张”相关，搨马张，简称搨马或马张，那是一种古老的手工业，用木板雕刻，苏木汁印刷。生产出来的成品，有神有马，称为“马张”，供祭祀鬼神之用。可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木刻比美。

马张，古代的北方称为纸马或者甲马。赵翼的《陔余丛考》卷39有记:“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马以为乘骑之用，故曰纸马。”《天香楼偶得》:“俗于纸上画神佛而祭赛之，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凭依，似乎马也。”在罗贯中、施耐庵的著作中也屡有提及，比如《水浒传》38回:“但出路时赍书飞报军情事，把两个甲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法，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水浒中写到的甲马显然大大地神化了，但它至少证明了甲马在那时的真实存在以及人们对它的迷信。因为在那个时代，上自宫廷皇帝，下至市井百姓全都迷信鬼神。

马张生产，刚开始凭手工以五色纸画上神佛与神马;发展到木刻套印和描绘相结合，再后来出现了简易的方法，用油纸雕刻代替木雕，不过质量毕竟比不上木刻。黎里的搨马张生产规模都不大。大的多数雇工三五人，前店后坊，称马张作;小的仅夫妻老婆的烟纸店。马张的质量有“正作”与“水作”之分。水作，大多用厚油纸雕出人物形象的纸模，在黄色土纸上印出大红大绿的色彩，以红色为主，标上神名。正作，一般用木刻模板套色印行，红橙黄绿蓝青白黑，结合手工描绘，考究的还饰以金粉。大小一般比八开纸狭长些，也有大于整张报纸的。仔细辨别，马张还有神魔之分，黎里人俗称正神与邪神，种类繁杂，正神有六种，每种又有六个名称，那些财神、灶君、王母、观音、城隍、土地等等属于正神，印刷最多。还有一些神像，不写明神名，称为“空相”。黎里的淫祠邪神特别多，每每有佛娘、巫师杜撰祭神，于是马张作坊按照需要，随意填写邪神名称，诸如某某老爷、某某太太、某某娘娘等等。黎里的马张销路很广。除了供应本地邻近集镇之外，那些正作精品，大量批发到长江沿线和南方省市，在当时堪称一项重大的商业经营。

马张的出现，与民风息息有关。黎里的习俗，有送灶君，接财神，斋观音等等，各家往往都有信奉的菩萨，需要定期供斋、诵经

和礼忏。生了病，好些病家不请郎中，往往仰赖求神祭鬼，焚烧马张，祈祷消灾祛疾。为了治病购买的马张，多数是邪神，由佛娘巫师判定，然后虔诚地购进，一一焚化。

黎里马张生产，据老一辈传说，起源于明代初年。朱元璋的丞相刘伯温到黎里查访，看到民风醇美，风水特好，黎川市河自东向西，宛似龙形，刘伯温本是善于相风水的军师，他担心黎里要出正命天子，与朱家争夺帝位，特地在镇东头营建了中立阁，即八角亭，压住了黎里的风水。刘伯温还不放心，皇帝不出，至少还要出大量的官员。刘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以阴代阳的拆解妙着，让黎里不出阳官专出阴官，于是刘让黎里生产马张，马张上的神灵都有官位爵禄，这样多出阴官就可以少出阳官了。

吴阿毛吃施粥，轮来轮去轮不着

有铜钿人勿要眼价高，但看驳家甸上吴阿毛

吴阿毛确有其人，黎里驳驾田村人（也叫北草村），吴阿毛出身于一方首富之家。可是阿毛好吃懒做，狂嫖滥赌，最后家庭败落，老婆被休。吴阿毛的妻子后来发迹，寒天行好事发放施粥，阿毛常去。由于来得较晚，总是轮不到。

话说很早以前，八家甸的荷花池里停着一只网船。一天清早，一只雄鸡刚刚起啼，网船上出世了一个千金。雄鸡啼落，荷花池边上吴员外的儿子吴阿毛也落地了。三朝过后，吴员外请人为自己宝贝儿子算了一命，不想到算命先生说："网船千金在雄鸡起啼，将来命里要十富，吴家儿子生于雄鸡啼落之时，将来命里是十败。"吴员外为了挽救儿子，延续吴家香火，决定让儿子长大后娶网船千金为妻，以十富抵御十败。他又给儿子造了一千零八间房子，别人家房子用砖，吴家房子砚台当砖，要是儿子实在穷得没法子，房子上拆块砚台卖一卖，也够他吃用一世的了。

吴员外死后，吴阿毛成人，遵照父亲遗嘱和网船千金点起龙凤花烛完了婚。吴阿毛娶这个妻子为的是尽孝，可是娶来之后，横看竖看不入眼，想方设法要将她休掉。他对妻子说："立起廊柱有眼识，横倒门槛无脸面。我们是石板上掼缽头，不碎也得碎（散）。"妻子泪眼盈盈，说不上一句话。吴阿毛又说："趁日头还没落山，挑金拣银，要啥有啥，不枉我们也算做了一场夫妻。只是从此再不得踏进我吴家的门槛。"网船千金指指磨房里那头瘦骡子说："不喜金不爱银，就要骡子伴我行。"

网船千金牵着骡子，对它说："我骑在你身上，你只管走，啥地方停下，就是我们的落脚点。"骡子走啊走，走了三天三夜，在一个荒山野地的茅草棚前停了下来。网船千金跳下来，走到前面茅草棚里，只见一个老太太，就向她乞讨说："老太太，行行好，给我一口饭吃，我三天三夜没东西落肚了。"老太太叹口气说："我家穷得空落落，吃口水也是冷的，你别处去吧！""你不要瞒我，你灶头上的压火砖就是金子做的。"老太太一听，简直要跳起来，念着佛说道："阿弥陀佛，四村八舍都晓得我山西蒯家的穷名。一个儿子30岁，打了半辈子光棍，怎么会藏得起金和银？"网船千金说："右脚踩金，左脚踏银。角角落落好用畚箕坌。"原来网船千金一走出吴家，吴家的金银财宝跟着飞了出来，落到老太太的破茅草棚里。从此，老太太快快活活地过起了安乐生活，儿子也同网船千金成了亲，几年后老太太病故。

那个吴阿毛自从摆脱了妻子的管束，每天神魂颠倒，吃酒赌钱，真正一个败家子。可叹他几把牌九将几百亩良田输个精光，父亲叮嘱他房子必须拆拆卖卖，可是他几把骰子又将千把间房子整个儿的输了。没有几年光景，阿毛就靠沿路求乞过生活。

再说网船千金与丈夫一起有了家底，又勤俭持家，生活过得非常写意。网船千金是苦出身，非常同情穷人。一连好几年的寒冬腊

月，都在自家场上给穷人施粥。阿毛听说有施粥，当然急急忙忙赶了过去。可是他来得还是晚了一点，十几张八仙桌已经坐满了人，他只在最西边找到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蒯家的施粥每天都从东边施放，阿毛在最西边，那天没有发到。网船千金眼尖，已经看出前夫吴阿毛，而且知道他没有发到施粥。第二天，网船千金决定施粥从西边发起。阿毛想自己第一天坐的位置不对，应当坐到东边去，第二天他坐到了最东头的八仙桌边。施粥发到阿毛那里，又发完了。第三天，网船千金叫手下人，施粥从两头施放，可是阿毛这次坐到了中间，又没有轮上。

一连三天，网船千金看到前夫没有吃到东西，于是就叫两个丫头去施舍给他，丫头们对阿毛说："东家娘娘见你可怜，打发你十个糠饽饽。记住，吃一个掰两块。"吴阿毛接过饽饽，问："你们东家娘娘是什么样子？"丫头指指楼房窗口的身影说："看，这就是我们的东家娘娘。"吴阿毛一望，只见东家娘娘的身影一闪，喔，原来是……阿毛不觉羞愤交加。妻子呀妻子，你不肯来认我吴阿毛，倒也罢了，那么施舍一顿饭食总可以吧，竟然只给我几个糠饽饽。想到这里怒火上来，就把十个饽饽一下子向河里甩去。九个饽饽下水沉了，一个搁在岸边石头上。吴阿毛还不解恨，朝这个饽饽狠狠踹了一脚，饽饽碎了，竟滚出了一锭银子。阿毛拾起来，后悔莫及呀，他号啕大哭起来，我吴阿毛错把妻子的好心当负心啊，我真不应该啊，想当初……最后昏倒在地。

等吴阿毛醒来，两个丫头又来了，拿出一串钥匙递到阿毛面前，说："本东家娘娘吩咐，这串钥匙里面你可以随便挑一个，一个钥匙可以打开一间房子，有金库也有银库，打开的房子，里面的东西随你拿。吴阿毛一听，顿时来了劲，一串钥匙托在手上，开哪一间好呢？大户人家天天斗金斗银地取，要挑就挑最亮的那一把。阿毛兴高采烈，嘴里念不劳叨地哼着山歌，可是当他打开一看，不是金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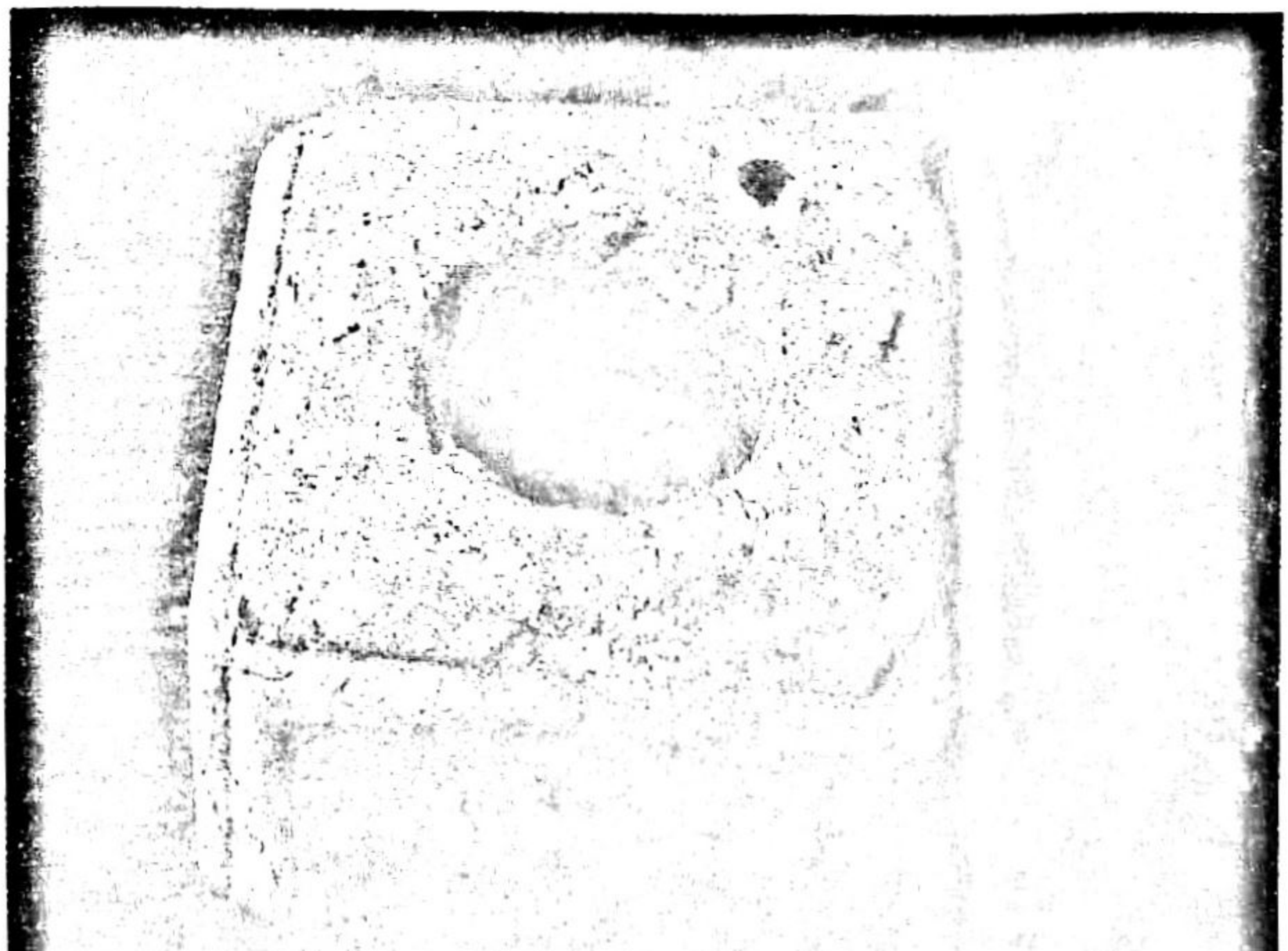
也不是银库，却是毛灰间。家大人多毛灰天天要出清爽，这个钥匙自然锃光丈亮了。阿毛跨到里边，双目紧闭，长叹一声，解下裤带自缢在毛灰间里了。

现在黎里驳家甸还有一个荷花池，千把间房子的地基，河东有个垃圾墩，河西有个草鞋墩，那是吴家兴盛时留下的遗迹。

雨打八月半，一场不好看

在明清两代及民国年间，黎里中秋节前后有盛大的迎神赛会，这是中秋的重头戏。传说农历8月15是城隍菩萨生日，这一天要出“城隍会”，8月16再为城隍夫人出会，叫“夫人会。出会的场面很大，前有仪仗、鼓乐，中有城隍或夫人的銮驾、轿舆，还有不少提锣、提香、扮演戏文的善男信女。浩浩荡荡，从城隍庙出发，经过上岸到镇东上梅兰桥，经九成湾到下岸回到城隍庙。出会总是在晚上，这时三里长街及金镜湖上，灯市如林，各店铺开市营业，供奉香斗，店堂里烛光融融，铺面上香烟缭绕；富家大户都搬出专门雕琢的灯柱石，插上木柱，悬挂出自制的精美灯彩，镇上近二十座主

灯柱石



要桥梁，搭起了桥亭，挂出各式灯笼。城隍庙内的戏台上，连续四天下午和晚上演出各种戏剧。

游湖赏月也是黎里民众的习俗，金镜湖中画舫游船络绎穿梭，秋禊桥中叽咯之声不绝于耳。金镜湖本名禊湖，因为他状如一面巨大的青铜镜，所以得了这么一个别称。秋禊桥俗称叽咯桥，城隍庙建造在金镜湖中的一个孤岛上，就靠这么一座三孔梁式的秋禊桥与西岸相通，桥极玲珑，梁式三孔，36块石板，平铺在桥梁上，游人一走，发出“叽叽咯咯”的声音，因此黎里人称它叽咯桥。“禊湖秋月”本是黎川八景之一。入夜，皓月东上，游人就摩肩接踵而来，画舫张灯结彩，荡漾水面，弦管之声齐发，热闹非凡，令人心旷而神怡。

但是假如老天不作美，偏偏在这几天下雨，甚至下大雨，那么大煞风景，什么游湖、赏月、看戏、观灯，都成了泡影。这样的年月，并非没有，远的不说，就说1921年吧，霖雨成灾，田地尽淹，农民兄弟吃饭都成问题了，天时地利都无，人心惶惶不安，那个中

黎川八景·禊湖秋月



秋过得悽悽惨惨的。因此黎里人才有了那句“雨打八月半，一场不好看”的俗语。推而广之，大凡原本“想得辘轳圆，最后剩个骨碌圈”的事，黎里人都会以“雨打八月半，一场不好看”一叹而罢。

一塔廿五坊

一塔廿五坊，除出高树港

黎里这句俗语，凡是事物的范围大，或者事情闹得大了，就会用“一塔廿五坊”来形容。

这句俗语出是出在黎里，不过说的却是与黎里相邻的塔上。塔上在黎里镇南，那里有黎川八景之一的“鸭栏帆影”，明清时期相当有名，与鸭栏泾相隔一河的地方就叫“塔上”。明清时期，两地的农民多数互有婚姻关系，你来我往的，十分闹猛。塔上，现在属于浙江省嘉善县地界。

一塔廿五坊的出处与古代的“春台戏”有关。明清时期，农村

黎川八景·鸭栏帆影



没有多少娱乐活动，对每年的春台戏特别关注，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力和物力，从隔年冬天就开始筹备。春台戏的演出，与庙宇，或者说与菩萨有关。春台戏的“台脚”有大有小，台脚是专用术语，就是为演出春台戏出钱出力的范围。每个庙宇都有一定的复盖面，或者说每个菩萨都有一定的管辖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划分几个坊，称头坊、二坊、三坊，坊数越多，户数就多，田亩也多，经济实力当然就大。比如刘王庙，要为刘王菩萨做戏，城隍庙要为城隍菩萨演出，还有什么相公庙、财神庙等等，都有春台戏。每年按坊的顺序轮流当家，轮到的坊当家，就叫“现坊”，轮不到的称“闲坊”。现坊不仅要操办一切，还要出钱，闲坊只要拿点钱出来就行。现坊的头头，称为“大阿爹”，而且往往是承袭传代的。大阿爹拥有相当的权力，大多颇有威信，他的话就是命令，大家都得听从。坊内的好多事情，比如婚丧喜庆，也请大阿爹来主持。

现坊行事，一年一轮，每年的正月13是交坊日子，头坊交给二坊，二坊交给三坊。根据规矩，庙里的菩萨一般在腊月20日这天开始歇年，不再理事，叫“封印日”，到次年的正月13交坊，重新“开印”办事。开印、封印，实在是照搬衙门里的那一套。现坊当家办事，大多在正月至二月底之间，到各戏班的联络点去定戏。联络点有个专名叫“牌话”。多数牌话就是镇上的茶馆。定戏并不是难事，只要选定戏班子，安排好日子、台次和地点。一般地点总在田间，选定的田亩，必须预先通知主家，不再种春花。较费事的是收钱，规定按照田亩摊派，每亩规定钱数，这叫“照田起派”。必须明列帐目，到时报帐。

相对来说，黎里镇还算富裕，每个菩萨管辖的范围也不小，总有10来个20来个坊，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春台戏演出都比较顺利。但是，比起鸭栏泾对面的塔上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塔上的庙宇管辖着25个坊。这一塔廿五坊，每年要定两副戏班子，同时开锣演

出，两个戏台并排搭建，叫“立台戏”，两个戏台对面搭建，就叫“对台戏”。不过立台戏也好，对台戏也好，有个规矩必须遵守，就是戏目要交叉上演，这里唱文戏，那里就演武戏；这台唱小生戏，那台就唱老生戏。一般春台戏连演三天，塔上的三天戏，比别坊六天戏的花费还要多得多。

所以一塔廿五坊，就成了黎里人口中形容范围大、野辖辖的俗语了。

为什么后面有人还要加上一句“除出高树港”呢？芦墟镇的高树港村，那里庙宇掌握的坊不比塔上少，除了演出春台戏，每年7月15还要加做一台夏戏。

陶白虱　青布衫上白虱，吃人又钝人

查三爷　查三爷放金叶子

麦调米

三个俗语都是黎里特产，都属贬义词。

陶白虱，指那种专门爱占小便宜，且占了小便宜之后还要贬损他人的人。陶白虱实有其人，晚清时期是镇北梓树下村的一名小地主，薄有田产。后来迁居到黎里镇上，因为上岸已经挤满了人家，就在塘桥附近的下岸造屋定居。一个乡下地主新来晚到，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颇不容易立足。偏偏陶氏也不是善类，门槛刮精，非常会算计。有几次陶氏赴他人的宴请，不与镇上的头面人物同席，也不和一般的客人同桌。主家因为客人多，有时专门为孩子们安排一个席面，陶氏就喜欢与孩子同席。陶氏的食量特别大，很能吃，一桌酒菜，他一个人能包个十之八九。他又特别爱吃肉，一只蹄子，他先是“卷铺盖”（揽蹄子的皮），接着再“劈硬柴”（吃蹄子的精肉），三下五除二就全进了肚里。每每这种时候，有人就会冷嘲热讽，什么卷铺盖、劈硬柴之类，都是旁人为陶氏造出来的讥讽

话。陶氏则反唇相讥，往往抓住对方的瑕疵，一拳来一脚去。于是，有人专门为陶氏取了一个绰号“陶白虱”，说他“青布衫上白虱，吃人又钝人”（黎里比喻式土话，占了别人的便宜，还要用话贬损别人），久而久之，陶白虱之名就此传开，陶的真名反倒不被人记起。后来，陶白虱就成为“吃人又钝人”者的代名词。

查三爷，相当于二百五，说到查三爷，黎里人习惯上要加上一句“放金叶子”。查氏晚清至民国时人，排行老三，家住黎里镇北的查家浜，算不上富户，不过他有田有地，常年还养有一群蛋鸭。查氏为人直爽，没有城府。大凡到他那里想揩点油、得点好处的人，只要说上几句恭维话，戴上一顶高帽子，查三爷大多会答应人家。特别是油滑的三姑六婆，常常到查三爷那里去，说说俏皮话，送送媚眼，临走时拿上一包鸭蛋那是笃笃定定的事。因此查三爷那群鸭子，下的蛋，每年差不多全被那邦打秋丰的打了去。于是，黎里有人杜撰了“查三爷，放金叶子”的故事，揶揄查三爷，将金子打成了极薄的片子，然后在桥上随风放飞。

久而久之，查三爷一名也就成了二百五的代名词。

麦调米，与查三爷一样，是个贬义词。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那时每当大麦上场，生产队里各家的口粮都已紧绷绷的了。大麦难抵口粮，于是许多生产队都到镇上的粮管所换大米。一斤大麦只能调换八两大米，打了折头。于是好事者讥讽人就给人取绰号“麦调米”。这一切口式的讽刺语暗暗流传开来，流传到今天，现在大麦已经不再需要调什么米了，可是依然挂在人们的嘴上。

三个贬义的俗语，还有上文谈到的“歪马张”，全产生于特定的时空，都已活过了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究竟还能活多久，拭目以待。

二、对联趣话

晚清时期，黎里镇上开有十来爿典当，其中最有规模的两爿典当，一爿开在三里长街的东半街，一爿座落在西半街，老百姓习称为“东典当”和“西典当”。

民国初年，有人出了一个上联：

东典当，西典当，东西典当当东西

征求下联。时间过去了一年多，没有人能够对得上来。

后来，有人把上联拿到了诗人柳亚子那里，请柳亚子拟个下联。柳亚子作诗填词思路敏捷，落笔如飞，在对仗方面也是一流高手。可是，柳亚子不看则罢，一看连连称绝。

说它绝，主要绝在“东”、“西”两字，这两个字先分后合，分开的“东”和“西”是方位名词，句中合成的“东西”仍然是方位名词，不过到句子末尾的“东西”，不再表方位，转化成代替一切事物的普通名词了。其次，“典”和“当”本是动词，合成“典当”变成了名词，句末又抽出其中一个“当”字，恢复动词功能，组成“当东西”这么一个动宾短语，这也有一定的难度。

柳亚子先生思考良久，要对出下联，关键在于找到与“东西”二字相对应的词，既可以拆分又可以组合，还可以转义，这样的词语实

在难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最后柳亚子表示自己学养有限，让请他作对的人另觅高手。二十世纪悄然而过，其间许多人都试着作对，可是绞尽脑汁，都没能对得工整。

为此，李海珉在《吴江日报》（2002年2月1日）发表了《令柳亚子赞叹的绝对》一篇文稿，征求高手妙对。稿子刊出以后，有过许多电话，也有过爱好者的专程来访，不过，对得不甚工整。

二年以后，黎里镇的80老人翁惠农先生拟得了一个下联：

春读书，秋读书，春秋读书书春秋

好联！好在“春”“秋”两字，先分后合，分开使用时表时间春季与夏季，句中第一次合成的“春秋”仍然表时间，不过到句末的“春秋”变了，开始转义为“历史”。到目前为止，应当说此联是对得最为工整的了。不过，如果吹毛求疵的话，此下联还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典当”是并列结构的词语，而与之相对的“读书”一词，却是动宾结构。这，有待于大方之家了。

翁惠家老先生，还拟有一个上联，征求下联：

望平桥上望平望，平望吴江高八尺（八坼）

望平桥是黎里镇最西的一座梁式桥，全句意思是：站在望平桥上，远望平望镇，再望到吴江（即松陵），吴江比平望高了八尺，这八尺是地名八坼的谐音。游戏文字一段，供人一哂，有兴趣者可以试对一下。

木雕：狮子滚绣球



三、地名及传说

黎里镇的地名，包括乡脚的地名，品味一下它们的出处实在很有趣味。

前文说到弄堂，黎里八大姓都有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地名也有不少以姓氏命名的。镇上的大户人家在乡下有田地，或者购置土地，建造坟墓，有的人家造有几间坟堂屋，派人看守，逐渐繁衍成村，这样的村庄往往称为某家坟，比如周家坟、汝家坟等。一个村庄往往聚居着一个姓氏，或者说以某姓为大姓，这样的村庄大多以姓氏命名，比如施家浜、张家兜、查家浜、张桥。

一些地形特征，特别的人物、事件，或者特殊的物事等等都能成为取名的由头。

好多村落是以地形特征命名的。鸭头湾，那里的一条浜河形状就像鸭子的头颈；蜘蛛潭，犹如一只巨大的蜘蛛；马鞍坝，形状像一个马鞍。鹤脚扇，边上原本是一个巨大的芦苇荡，经常栖息着一群群白鹤，黎里人爱鹤，认为鹤群栖息是祥瑞，就以“鹤渚渔歌”作为黎川八景之一，又因为村庄形状像把扇子，于是就取名为鹤脚扇。紧靠着罗汉寺的和尚圩，与罗汉寺密切相关，罗汉寺的和尚分为堂头和尚与门头和尚，门头和尚可以娶妻生子，附近村庄大多是门头和尚的后代，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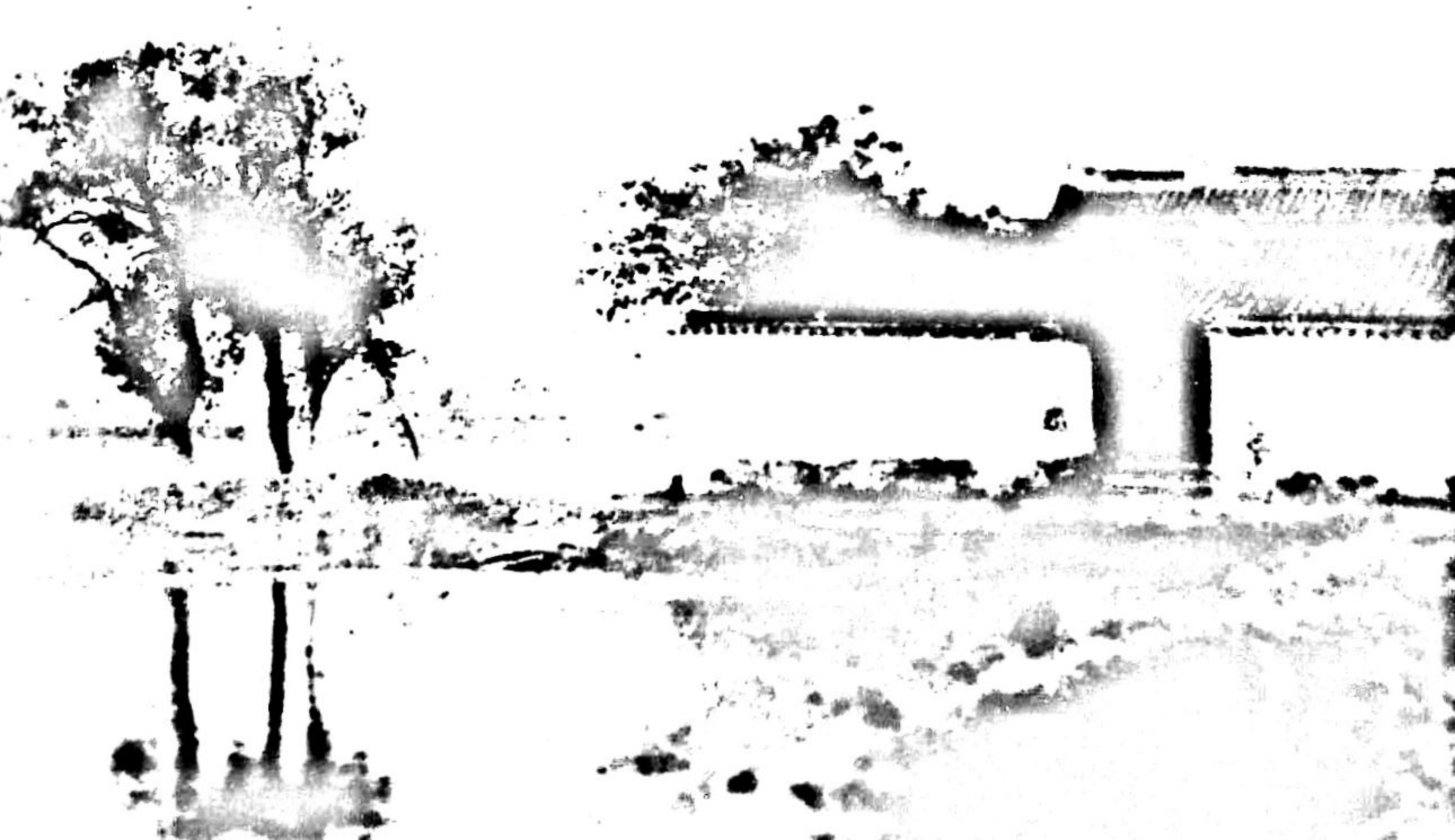
自然的得了个和尚圩的专称。木排浜，此浜在镇上的下岸，柳亚子故居对面，专门停放木排，因而得名。匠人港，该村多木匠、铁匠、漆匠，因此称为匠人港。黄杨浜，村上有一棵千年老黄杨。虎啸浜，曾经有老虎出现，夜间听到老虎叫声。十三湾，从村到镇，要经过13个湾子。鸭来泾，传说唐代陆龟蒙来此养鸭，此村原先有一座石拱桥，取名“天随桥”，那是陆龟蒙的别号。诸如此类的地名很多，下面两个地名就专门由民间传说而来。

伏虎洞

康熙初年，不知从什么地方窜来了一头老虎，常常在黎里浒泾弄一带出没，附近的鸡鸭猪羊差不多每夜都要丢失。老虎不知盘伏在镇北的哪个地方，昼伏夜出，搞得全镇百姓惊恐万分，不敢随便走动。

南栅浜有个胡大肚皮，身体壮，个子大，胆子更大。一天下午，

黎川八景·江村夕照



胡大肚皮自告奋勇说:“待我前去打探好老虎的踪迹,再纠集人马为乡亲们除掉这一大害。”他走走,停停,看看,来到了一个竹林旁边,正要往里张望,“呼”的一声响,那猛虎已经到了面前,张开血盆大口,舞动着锋利的爪子。胡大肚子一个急转身,慌忙往回奔,还算命大,可是大腿上已被老虎抓了一爪子,一瘸一拐地逃得了性命。不过,胡大肚子就此成了瘸子。看来要除掉老虎只有禀报官府,官府得报,张贴了招贤榜,准备招募一批猎手除掉这一大害。

再说,黎里镇东桥后底有个杀猪作坊,一天杀僵了一口金华两头乌猪,那猪挣脱之后,乘着夜色,负痛乱奔,逃到了镇西北的罗汉寺,惊动了寺里的老和尚。老和尚一看淌着鲜血的乌猪,慈悲之心顿生,马上把它安置在膳房后边的破屋内,精心地饲养起来。半年过去了,乌猪养得高高大大。和尚不准杀生,乌猪继续长,就像牯牛似的。

一天后半夜,突然乌猪发出阵阵异样的叫声,老和尚被惊醒了,仔细一听,发觉猪叫声里好象夹杂着老虎的吼声,他马上披衣起身,点上了灯笼,急急忙忙地往后边赶过去。啊呀,已经晚了,只见乌猪倒在血泊之中,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不多时就死了。凑着烛光,只见猪的嘴巴里、爪子上尽是虎毛,心痛的老和尚,连连念着“阿弥陀佛”,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天亮了,老和尚召集了全体和尚,下令四出搜索。结果,在罗汉寺西南方向的一个土洞里,找到了一头浑身是血的老虎,也已死去。

不多时,全镇百姓奔走相告,“老虎死了”,“老虎被罗汉寺的老和尚除掉了”,“老虎被罗汉寺的金华两头乌猪咬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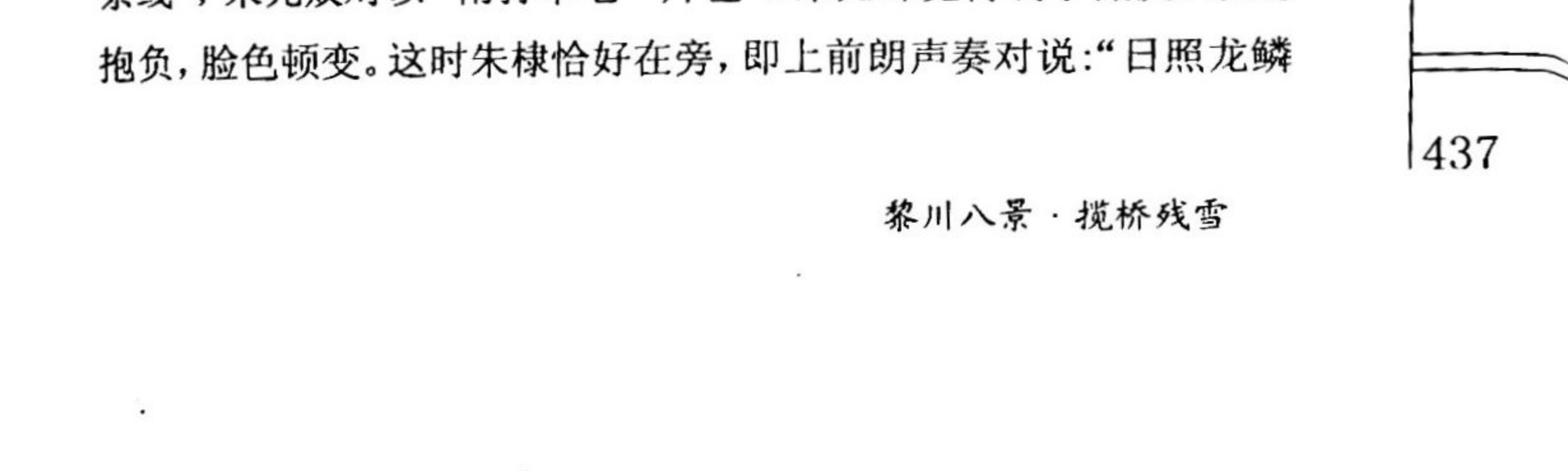
老百姓为了纪念这桩异事,就把老虎盘伏的地方称为“伏虎洞”,把老虎经常出没的那条道路叫作“虎径弄”,写成浒泾弄,那是后人改的。

藏龙寺、藏龙荡、藏龙乡

明建文帝元年（公元1399年），建文帝朱允炆推行削藩政策，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军南下，号称“靖难军”，发动了一场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皇位争夺战，史称“靖难之变”。

朱棣，是朱元璋第四个儿子。洪武3年（1370年），封为燕王。洪武13年，到封地北平驻守。燕地与蒙古接壤，朱棣经常奉命出塞巡边，筑城屯田，多有建树。又多次率诸将出征，威名大振。洪武末，皇太子死，朱元璋立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棣心中非常不满。一次，朱元璋想试试皇太孙的才情，令朱允炆赋诗，朱诗的最后两句是“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洲。”朱元璋看了认为诗意衰飒，大有落魄的隐忧。又令皇太孙答对，朱元璋出语“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以“雨打羊毛一片毡”。朱元璋觉得调子低沉，缺乏抱负，脸色顿变。这时朱棣恰好在旁，即上前朗声奏对说：“日照龙鳞

黎川八景 · 揽桥残雪



万点金”。朱元璋脱口而出道“好对语！好对语！”连声叫绝。于是对朱棣非常宠爱，隐隐有更换皇储的念头。可是因为大臣面前难以交待，没有吐口。但是这却大大增长了朱棣接替皇位的欲念和野心。

洪武31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位。当时黎里东杨和西杨各有一位大臣在朝做官，一位叫史仁杰，一位叫唐朝义，他们是一对好朋友。建文帝即位不久，史仁杰因年老多病，决定辞官回家。可是建文帝爱他忠心，多方挽留。史仁杰又在京城任职，半年之后，觉得自己精力不济，再次辞官，才得到建文帝的恩准，唐朝义继续在朝供职。次年朱棣就在北平起兵，四年之后，攻陷南京，建文帝仓皇出走，流落民间，真的“隐落江湖里”了。

朱棣夺得了皇位，带领文武百官一起迁都北平。临行，他不放心建文帝。命唐朝义带领兵马，四出寻访缉捕。最后在浙北一带乡村拿获，当即打入囚车，星夜兼程押赴京城。不几天，人马进入家乡黎里东西阳地界。唐朝义突然望见黑压压一簇人，走近一看，不是别人，竟是老朋友史仁杰，领着史、唐两姓全体族人，俯伏在地。囚车一到，史仁杰膝行而前，扑向建文帝，放声大哭，说道:“万岁，受苦了！老臣来迟了。想当初，万岁待臣……如今却被乱臣贼子惩治得这般痛楚，心痛死老臣了……”史、唐两族的男女老少口呼万岁，齐声恸哭，引得两旁的军卒也直淌眼泪。

唐朝义手足无措，真想上前劝说几句，史仁杰勃然大怒，举手一掌，重重地打在了唐朝义的面孔上，骂道:“不要脸的唐朝义，想先帝对你恩重如山，你却叛主杀君，陷吾君于囹圄，你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唐被骂得羞愧难当，哑口无言。突然，唐朝义拨开众人，奔到建文帝面前，双膝跪倒，呜咽道:“万岁，臣有罪，死有余辜，望圣上宽恕。”话未说完，猛地向囚车撞去，一刹那间，头破血流，气绝身亡。

史仁杰马上命令军士把囚车打开，放出建文帝，君臣携手同住在

村边的一座寺院里，叙说别后之情。史当着建文帝的面写了一封书信，遣散所有军士，命令其中一名北方小卒，带上书信到燕王朱棣处复命，信的结尾说："我史仁杰生为建文帝臣民，死是建文朝的鬼魂！"

建文帝在东西阳住了一段日子，唐、史两族子弟除了照顾生活外，天天在寺院、湖荡周围站岗放哨。时间一长，有消息说，朱棣将派兵前来捕捉。史仁杰随带家中所有金银细软，陪同建文帝远走高飞，不知所终。

封建社会，称皇帝为龙种，皇帝是真龙下凡，所以建文帝住过的寺院，后来称为藏龙寺，边上的荡改称为藏龙荡，东西杨称为藏龙乡。

后　记

撰写《古镇黎里》是我的夙愿。

黎里历史上有三本镇志，第一本徐达源的《黎里志》问世于1805年，第二本蔡丙圻编著的《黎里续志》，成书于1897年，两本镇志都属私家撰编，第三本《黎里镇志》由黎里镇政府组织人力，起步于1988年，出版于1992年。客观地说，三本镇志都有不足。前两本限于个人的阅历、眼光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最后一本，从编写到成书仅仅四年时间，太过仓促。

黎里作为古镇，从南宋起步，至今已近九百岁，它的地理环境、水系情况、民居建筑，主要源于明清两代。换句话说，黎里是由特定的时间累积而成的古镇，同时，它又是特定空间的产物。中国北方和南方都不存在黎里这样的古镇，它是江南独特的遗产。现在保护得比较好的古镇，也只有周庄、同里、甪直、木渎、南浔、乌镇、西塘等十来个。由于建设性的破坏，能够称得上江南古镇的已经很少，即使现在开始全部保留下来，也不会超过五十个。这些古镇从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看，仅仅沧海一粟，珍贵异常。古镇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无论如何也都无法原汁原味地再现。如何保留黎里古镇，把这一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留给子孙后代，是我多年来无法释怀的一件心事。

一是尽力做好文保工作，将黎里镇列入江苏省和全国历史文化名镇行列，二是完成一本记录古镇黎里的书，这本书起到填补黎里历史上三本镇志的不足。

目标确定，就付诸努力，十多年来从不间断。

我广泛阅读和查证，实地踏勘和考察，查看黎里有关家谱，采访黎里散居各地的后裔，多次召开乡贤宿儒座谈会，汇集第一手资料。考虑到第三本镇志成书仅仅 10 多年，推倒重写的时机似乎尚未成熟，因此本书并不以镇志的面目出现，写法上也与镇志有所不同，不是面面俱到。原先镇志缺失的，就补充；原先错误的，纠正过来；原先镇志语焉不详的，就充实叙写。

《古镇黎里》一书，当然有我个人智力、体力、毅力和财力的付出，但决不是我一人的功劳。假如没有家乡父老和领导的支持、关心和扶持，那么此书是无法问世的。

家乡的老前辈，给我的帮助极大。今年已经 82 岁高龄的翁惠农先生最为热心，不少资料的查证及难题的解决，都有他的心血，我的许多单篇文章写出之后，第一个读者就是翁老先生；费新生、褚炎鑫、孟祥官三位，我多次同他们座谈，向他们讨教，获益匪浅；汝孝先和蒯庆生等人向我提供了汝氏和蒯氏有关家史、家谱；从萧庸斌和李文龙等人的口中，我得知了不少黎里民俗的风情和传说。还有殷昭女士、陆新民、王福荣、金菊生等先生，采访他们，我都有所进展。

除了本镇，我找到了不少移居外地的老前辈，苏州的顾平，上海的倪九余，远在杭州和福州的张曜后裔张振华、陈碧贞和张信锐，南京和兰州的殷明珠后裔殷恭毅和殷元骐，也拜访了北京倪徵噢的女儿倪乃先女士，在同他们的通信及交往之中，《古镇黎里》一步步地充实起来。

好多指教者并不是黎里人，但从他们身上，我也获得相当

的教益。震泽的李廉深，平望的黄积苏，松陵的俞前，芦墟的张舫澜，盛泽的李炳华，还有甪直的翁培荣、南浔的朱家虹、德清的朱建明等等。

本书配上了一百多张照片，在拍摄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的支持，黎里的翁惠农和陆新民先生，吴江博物馆的朱永兴、吴正明先生，在他们的支持协助下，我获得了周元理的手迹、徐达源的墨梅，蔡寅、蔡真等人的墨迹。

《古镇黎里》的最后出版，由黎里领导拍板。

知道我正着手撰写《古镇黎里》，黎里镇党委书记徐晓枫先生多次与我谈及，而且让我制订计划，拿出初稿。坦白说，我这个人还是有惰性的，如果没有人督促我，那么这本书可能还在孕期之中，甚至难产。书是杀青了，不过，由于我的阅历和我的才力，失误和不足肯定在所难免。仅举两例：我推断黎里在北宋时期至少有两个村庄，南宋时跃升为集市；黎里八大姓从来没有正式见诸文字，这次我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说。祈求黎里的父老乡亲，也祈求一切读者能够不吝施教。争取再版，到那时我可以更正、充实以求完善。

书是问世了，我那颗感恩之心久久不能平静：感谢生我养我的家乡黎里，感谢黎里的父老乡亲，感谢徐晓枫书记和严伟方镇长的期待，感谢他俩为本书撰写序言并出资印行。

李海岷

2006年3月18日于柳亚子纪念馆